出版说明

本书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原书名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梵蒂冈与天主教》，是本社已出版的《梵蒂冈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姊妹篇，今据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本书深入探讨了自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梵蒂冈与天主教历史的主要问题，用大量档案、资料和文献揭示了梵蒂冈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作用和天主教的发展过程。无数事实证明梵蒂冈史不单是宗教机构的历史，而且也是社会、政治机构的历史。

本书所述梵蒂冈史也是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分。梵蒂冈同帝国主义各国一起推行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勾结和斗争。特别值得一读的是本书叙述了梵蒂冈在我国的所作所为。梵蒂冈及传教士在我国进行宗教欺骗，

帮助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等等都有所论述。

本书资料丰富，是研究梵蒂冈史的有益参考书，但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请读时注意。

本书作者舍英曼（M. M. Шейнман）是多年从事梵蒂冈史研究的苏联历史学博士，亦即本社已出版之《梵蒂冈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者。

书末之人名表及引用资料文献目录是原书已有的，其中有不少错误和遗漏，我们凡发现的已作了改正，恐尚有未发现者，希读者注意。

1980 年 1 月

目　　录

前 言

本书的任务是深入研究自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梵蒂冈与天主教历史的主要问题。

有关天主教会的宗教、政治中心——罗马教廷的图书文献，内容广泛，不仅有关于中世纪的，而且有关于近代的和现代的。这些著作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颂扬性的，愈接近现代，批判的成分愈弱。这固然由于研究罗马教廷历史的阵地多为天主教的历史学家所盘踞，同时也因为当代的资产阶级非常重视罗马教廷这支反共力量，认为使它丧失尊严于己不利。

有关本书所研究时期的罗马教廷的著作，大都是颂扬性的，而且局限于为教皇树碑立传，其中利奥十三世——帝国主义时期的第一任教皇，所占篇幅尤多。

在天主教的宗教著作与资产阶级的世俗著作

中，缺乏密切结合帝国主义的一般历史去研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罗马教廷史的篇章。在这些著作中，罗马教廷以超民族的和超阶级的机构的面貌出现，它的全部活动是受“最高尚的”道德宗教目的和意念支配的。

实际上，罗马教廷史并非一个个教皇的历史，而是一定的社会、宗教政治机构的历史。这一机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全部活动都与一般的世俗历史、阶级斗争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帝国主义时期的梵蒂冈史，应当作为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分，与这个时代的一切主要现象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4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深刻化——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的深刻化（由此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增长）、殖民地及附属国的人民与殖民主义强国之间矛盾的深刻化（由此引起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增长）、参加瓜分世界的资产阶级强国之间矛盾的深刻化（结果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书作者正是密切结合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特征来研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罗马

教廷史的。

有关梵蒂冈与天主教的问题范围极广，作者仅能选择其中最重要者进行研究。

本书所研究时期的罗马教廷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

罗马教廷是作为宗教机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然而历史形成的状况却是它自古至今从不局限于从事宗教活动。不可忽视的是，罗马教皇神权统治的国家——教皇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直到 1870 年才消灭，而 1929 年又在极小的版图上复国。因此，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罗马教皇既是教皇国的国君，又是整个基督教会（不仅是罗马天主教会）最高权力的觊觎者。同时，罗马教廷还往往使各国天主教会的利益服从于它的世俗统治利益。

"罗马问题"——罗马教廷争取恢复世俗权力的斗争，如本书所述，在教廷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外交方针中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1870 年事件发生后，这一问题在罗马教廷的政策中意义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问题"的意义便逐渐缩小了。

在帝国主义时期，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斗争在罗马教廷的全部宗教-政治活动中日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十九世纪末，在最主要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天主教逐渐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昔日的封建教会变为现在的资本主义堡垒。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变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支柱。于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斗争，自十九世纪末期便逐渐成为罗马教廷全部宗教-政治活动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梵蒂冈从二十世纪初采取亲威廉二世的德国的方针，不仅说明宗座指望德国帮助解决“罗马问题”以维护教皇的利益，而且这一方针也是梵蒂冈的传统政策，也就是依靠当时最反动的以及梵蒂冈的政治家们所认为的最强大的国家的政策。宗座认为威廉二世的德国是最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堡垒，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罗马教廷史是罗马教廷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史。

第一章　帝国主义时期的天主教

教皇世俗政权的消灭

罗马教廷产生于中世纪早期。它的存在与西欧诸国的封建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中的天主教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而天主教机构，首先是罗马教廷，是封建世界的组成部分。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的实力基础是土地资源。恩格斯写道："……采用捐献、勒索、欺骗、诈骗、假造证据以及其他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来的教会地产，在短短几世纪间竟然达到了极其庞大的数目。"①

教皇是教会封建贵族的首脑，其生活方式与世俗封建主不相上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46页。

教皇国（教皇辖地）曾在现今意大利领土上存在过一千多年——自八世纪中叶至1870年。这个国家的元首是罗马教皇，最重要的行政职位由主教和隐修士担任。教皇国中的制度甚至引起天主教会忠实信徒的深切痛恨。最后一任教皇兼世俗国君的庇护九世（1846年—1878年在位），是一个仇恨民主、科学，尤其仇恨社会主义的人．他在1864年的《西拉布斯》（《谬论目录》）中"谴责了"科学、民主、言论出版自由、信仰自由、信教自由、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谴责各种各样异端邪说时，《西拉布斯》还提出给那些认为"罗马第一神甫可以并应当容忍和同意进步、自由8主义及现代文明"的人以开除教籍的处分。①

庇护九世甚至反对在教皇领地上铺设铁路。对1870年罗马教廷的状况，《欧洲导报》概括如下："现在，罗马教廷象一千年前一样，靠援引各种宗教会议的决定和古书条文以及教权来源于神的说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它没有想到，这

① 威·格莱斯顿：《罗马与教皇在良心与历史审判台前》，莫斯科，1903年版，第173—174页。

一来源早已枯竭，古书过于陈旧，而宗教会议的决定也早已失去了对所有人的约束力。”①

1870年8月，教皇国灭亡。帮助教皇维持政权的法国军队，因普法战争而不得不撤离教皇辖地。罗马爆发了反对神权统治的起义。意大利国王惟恐人民起义发展壮大，急忙于9月份把军队开进教皇国并占领罗马。罗马被宣布为意大利的首都，教皇国的领土并入意大利王国版图。但梵蒂冈宫、拉特兰宫(在罗马)和夏宫冈道尔夫别墅留给了失去世俗政权的教皇。

10月初，前教皇国居民几乎全体一致投票赞成归附意大利（赞成教皇世俗政权的在罗马仅有四十六票，而在整个前教皇国仅有一千五百零七票)。

当教皇世俗政权临近末日时，梵蒂冈宗教会议也着手结束工作。

前一次宗教会议——特利登宗教会议在十六世纪中叶举行。那是在宗教改革运动遍及欧洲许多国家，罗马教廷受到威胁时召开的。那次会议

① «欧洲导报»，1870年4月，第849页。

的主要鼓舞者是耶稣会士。

特利登宗教会议开过三百年之后，庇护九世又召开新的宗教会议，以动员宗教力量反对新时代精神并拯救腐化堕落的罗马教廷。这次会议于1869年12月在梵蒂冈开幕，会议的主要鼓舞者也是耶稣会士。

这时的历史环境对教皇世俗政权不利。考虑到这种情况，耶稣会士便坚持不懈地努力巩固教皇的宗教地位，巩固罗马教廷这一机构——世界各国僧俗天主教徒所公认的权威。为此，他们力求宣布教皇永无谬误的教条（这是罗马教廷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事，但受到极其强烈的抵制，最甚者是主教们，还有信奉天主教的国君，后者担心教皇权力过大）。

在关于1869年12月8日召开宗教会议的1868年6月29日训谕中，庇护九世写道：天主教会“在可怕的暴风雨中飘摇”，教会本身、教义、教权以及教会的最高权力——教皇权力，全部遭到攻击，“各种无神论著作及有毒的报刊与形形色色的邪恶教派风行于世。”教皇通谕召开宗教会议，以找出消除“教会与世俗社会一切灾难”的办

法，俾使天主教及其教义得以“活跃于各地，愈传愈广，并取得统治地位……”。①

耶稣会士认为，通过教皇永无谬误的教条是巩固罗马教廷权威的方法之一。

宣布这一教条的计划，甚至在天主教界也遭到反对。1869 年 9 月在富尔达举行的德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发表牧函，驳斥了关于在宗教会议上将通过新教条的谣言。主教们在给教皇的秘密致敬信中写道，目前不利于通过教皇永无谬误的教条。

反对的意见还来自法国。持反对意见者的基本理由之一是：通过这一教条必然使罗马教廷与世俗当局发生冲突，因为虽然形式上说的是宗教事务中的“永无谬误”，但要划清宗教领域与国家当局职权范围的界线却非常困难。

为在宗教会议上击溃反对派，耶稣会士用尽一切手段。在七百五十名宗教会议（1870 年 1 月 6 日）参加者——红衣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及修会会长——之中，约有一百五十名反对通过新

① 引自《欧洲导报》，1886 年 7 月，第 155—156 页。

教条。与会者中有许多人既不愿意支持新教条的拥护者，也不愿意投反对票，便在会议结束之前离去。7 月 18 日，宗教会议通过新教条，条文如下：教皇在作为全体基督教徒的导师站在布道台上讲话时，因有上帝帮助及其对使徒彼得的保证而永无谬误。

10 新教条条文的措辞实际上宣布了教皇不仅是处理纯粹宗教问题，而且是处理社会生活问题的“永无谬误的法官”。

新教条的通过还遭到某些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对。例如，曾任英国大臣、首相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格莱斯顿——一个丝毫不反对天主教的人，针对教皇永无谬误的教条(在 1875 年出版的书中）写道：……教皇“只要一说：‘我宣布 ex cathedra①’……如此宣布之后所讲的一切话，任何一个承认梵蒂冈为自己导师的天主教徒都必须无条件接受，象接受天主教徒用神学语言称做‘神圣的信仰’一样，象教义要旨一样……从此，一个人的意志和判决将决定半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应

① 意为“行使职权”。——译者

当具有什么内容。"①

各国少数拒绝承认新教条的主教与僧侣，组成脱离罗马而独立的"旧天主教会"。

梵蒂冈宗教会议扩充了1864年的《西拉布斯》，增加了类似的反对科学的规定。这些规定甚至以开除教籍威胁一切主张可以承认违背"默启"的科学发现是符合真理的人。

由于普法战争爆发及后来意大利军队进驻教皇领地和罗马，梵蒂冈宗教会议停止活动（1870年10月20日），教皇国不复存在。教皇诅咒一切参与剥夺他世俗政权的人并自称为"梵蒂冈的囚徒"。

1871年5月13日，意大利政府颁布《教皇与至圣宗座特权法》，或称《保障法》，该法规定"教皇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侵犯教皇人身按侵犯国王人身论处。《保障法》规定罗马宗座的年金为三百二十二万五千里拉，保证教皇行使教会首脑职权的充分自由，保障外国驻教廷外交代表的特权和教皇与国外自由来往不受意大利当局干涉的可能

① 威·格莱斯顿：《罗马与教皇在良心与历史审判台前》，第148—149页。

性。教皇拒绝接受《保障法》。

庇护九世及以后的各任教皇，遇到适当机会就对“抢劫”罗马宗座——剥夺教皇世俗政权公开提出抗议，并且时常以离开罗马相威胁。教皇国被消灭一个月之后，普鲁士驻罗马大使阿尔宁打电报给俾斯麦，内称，教皇国务卿安东奈里红衣主教问，教皇能否指望在普鲁士国王的帮助下无阻碍地离开罗马。俾斯麦给了肯定的答复。

11

由于教皇国被消灭而产生了“罗马问题”，即宗座争取恢复教皇世俗权力和归还罗马的斗争，这一斗争延续将近六十年之久，时起时伏。

1870 年事变后不久，在一部分梵蒂冈主教和意大利天主教权势集团中出现了对意大利王国的妥协派。他们懂得，逝者不可返，恢复原有版图的教皇国是不可能的。

可以认为，庇护九世也懂得这一点。

在原法国外交部长儒勒·法夫尔公布的关于“罗马问题”的往来信函中，有一篇关于庇护九世在 1871 年 4 月 26 日与法国大使德·阿尔库尔伯爵谈话的报告。教皇对德·阿尔库尔说，他不提过分的要求；他表示，希望法国政府建议意大利

政府谨慎从事，不要作仓猝的决定。教皇说，他反对宣布罗马为意大利首都。教皇对法国大使所说的原话，儒勒·法夫尔援引如下："在现在这种时候，主权问题已无考虑的余地。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的全部希望就是有一隅之地由我主宰。即使向我提出归还我的国家，我也拒绝接受。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一隅之地，就不能够完满地履行我的宗教义务。"①

关于教皇这段声明的报导，梵蒂冈已予否认。但是却没有理由不相信法国大使向本国外长作的关于同教皇谈话的报告。

12

在说明德·阿尔库尔的报告时，儒勒·法夫尔写道："……可能他（指教皇——舍英曼注）是第一次声明：即使建议他收回自己的国家，他也

① 儒勒·法夫尔：《罗马与法兰西共和国》，巴黎，1871年，第109页。请对照美国天主教神甫、梵蒂冈"传信"大学心理学教授Дис·范德维尔德的报导："当意大利政府提出给他（指庇护九世，在1929年缔结关于消除"罗马问题"的协定时——舍英曼注）更多的领土时，这位英明的人拒绝了，声明：他既不要领土，也不要臣民，因为，他笑着补充说，他不喜欢受罢工及其他不愉快事情的打扰。"（J·A·范德维尔德：《建立在高地上的一座城市》，纽约，1946年版，第60页）。

不接受。他对政权投以忧郁而冷漠的目光，并说，今天'不应该寻求政权'。"[1]

但是，庇护九世及其最近几代继承者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要求，尤其是对罗马的要求。庇护九世的继承者们对意大利持不妥协态度，想从意大利政府手中多讨些便宜。"罗马问题"成了教皇政策的工具。

奥地利、法国及其他各国的罗马教廷拥护者，虽然因庇护九世被剥夺世俗政权而向他表示同情，但当时及后来都不打算认真反对意大利，用武力恢复教皇国；但是后来的事态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乐于利用"罗马问题"为它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教皇世俗政权存在一千多年之后，在各族人民的心目中，首先在意大利人民的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如果说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国是封建国家，那么，在资本主义时代它只能是带有大量封

---

① 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缔结协定，建立了现代的"梵蒂冈城"教皇国，于是，庇护九世想得到完全由教皇主宰的"一隅之地"的希望，在他死去六十年之后终于实现了。

建残余、伴随社会分化和充满尖锐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教皇及其国家机器必然要更公开地充当有产者、剥削者反对无产者及被剥削者的奴仆。这样的地位无助于教会权威的巩固，因为对教会来说，最有利的还是让千百万教徒不把教皇看作是某些人群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而是“全人类”利益的代表。

此外，教皇的世界主义目的、他做全体基督教徒乃至全人类精神领袖的要求，与他小国世俗统治者的地位是不相容的。因此，消灭教皇世俗政权客观上有利于罗马教廷，便于它改弦易辙，适应新的环境。

消灭教皇国加速了罗马教廷由以封建为主的[13]组织转变为资产阶级组织的过程。

天主教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应

资本主义时代，宗教不断地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宗教组织逐渐沦为资本组织与国家组织的附庸；在中世纪，教会及与其有关的组织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而现在，它们却变为资本占有者和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参加者。

宗教思想体系的性质也相应地改变。宗教保存了几乎全部超自然观念并逐渐使这些观念适用于新的环境。

美国作家戴维斯教授写道:“……宗教活动与资本主义密切结合。虽然资本家有意识地压制宗教劝戒，但宗教对资本主义更为广泛而复杂的依附，在颇大程度上却是无意识的过程，其根源在于教会本身经营工商企业与教会领导者奉行的方针，而这一方针却从来无人加以抨击。”①

欧洲诸国的天主教与天主教机构与封建社会有一千多年的联系。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天主教转变为资产阶级宗教的过程是缓慢的，而且往往受封建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结合程度的制约。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如此。哪个国家工业发展速度缓慢，那里的天主教就比较长久地保留着封建宗教、封建教会的特点(西班牙、葡萄牙)。

美国的天主教与天主教会受封建传统束缚较少。威廉·福斯特写道:“在创立美国社会制度的

---

① Д·戴维斯:《资本主义及其文化》，莫斯科，1949年版，第410页。

事业中，资本主义基本上不受封建残余的束缚，而封建残余却是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① 由于美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建国伊始就是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从属于资产阶级、托拉斯和银行，较之在欧洲诸国为早。 14

关于美国教会对银行的依附问题，保尔·拉法格在 1903 年写道：“如果卡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一旦需要辉煌的新论据，那么，提供这种论据的便是托拉斯。托拉斯不仅统治着经济领域，而且控制着美国人民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托拉斯在制造美国人民的历史。

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兴建教堂、创办大学……他们的神甫和教授千方百计满足财阀们的愿望……在美国，教会不拿国家津贴，僧侣靠教徒群众慷慨捐助生活。教堂完全象企业一样，由

---

① 威廉·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莫斯科，1951 年版，第 40 页。

股份公司建立。在这些教堂里，每个礼拜日祷告时都说：‘感谢赐予我们捐款的主啊！’各教派僧侣无一不对大资本家——这些赐予他们衣食、住所及其他财富的真正上帝——顶礼膜拜。不久前，纽约一位天主教主教革去他教区里的一名神甫的教职，因为他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波士顿的一位新教主教在讲道坛上公开地说，假如耶稣现在降临尘世，他也要在交易所从事投机买卖，因为没有比干这一行更光荣的事了。尽管如此，洛克菲勒还嫌僧侣的活动效果欠佳。他打算组织托拉斯出版教科书，准备删除《旧约》和《新约》中对富人义愤填膺的抗议。僧侣和知识分子奴颜婢膝的行径使剥削工人阶级的人们坚信，他们——象旧制度下的国君一样——根据神授的权利占有矿山、工厂和银行……”①

美国垄断集团是靠流血、灭绝印第安人、奴役黑人、残酷剥削那些被无地、饥饿和失业驱赶来的欧洲移民发展起来的。美国百万富翁所擅长的宗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2卷，莫斯科，1928年版，第213—214页。

教伪善行为，必须掩盖其残酷剥削者的真面目。宗教伪善行为和“慈善家”的美名，过去和现在一贯帮助他们欺骗劳动人民和制造工人与资本家“精神”平等的幻想，他们（资本家）“关心穷人”，创办“慈善”机构，不仅兴建教堂，而且积极作礼拜，还常常在教授圣经的主日学校中亲自给工人讲课。

1893年，《欧洲导报》杂志的美国通讯员写道：“宗教伪善行为，而且往往是性质最恶劣的，在美国，尤其是在南部诸州，极为流行。投机商越能冒险，土地经济人越会花言巧语，工厂主的心肠越歹毒，律师越狡猾——那么他们每一个人表面上参加宗教活动就越积极，对各种宗教需要的捐献就越多。许多教会堂区极为富有，因此教堂的建筑和设备也富丽堂皇。每座小城市……必然有十座、十五座教堂，其价值往往为三四万，甚至十万、十余万美元，更不用说大的中心城市了，如纽约，那里刚竣工的一座灰色大理石天主教大教堂耗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价值五百万美元以上。”①

① 《欧洲导报》，1893年1月，第77页。

天主教适应现代环境并获得资本主义宗教的性质，在美国比在欧洲诸国迅速。在1889年美国天主教会议上，美国天主教会的领导人之一阿兰德大主教宣称："我们应当生活在我们的时代，熟悉它，与它相联系……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时代讲它感觉到的东西，并且使用它懂得的语言。我们应当置身于我们的时代之中并与它在一起，假如我们希望它听从我们的话。根据这些理由，必须对我们的国家怀有最充分的爱。当然，美国的教会也应当是耶路撒冷、罗马那样的天主教会；不过，既然它的外衣受到当地气氛的熏染和支配，它应当是美国式的。"①

在当时美国颇有权威的天主教大主教的这篇发言中，阐明了美国主教们的纲领：成为美国式的教会，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各种制度的、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支柱，简而言之，就是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支柱。

1884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其牧函中宣称，美国的政治措施比欧洲的好，它们预示"天

① 转引自 Th. 梅纳德著：《美国天主教史》，纽约，1943年版，第511页。

主教将取得较之在中世纪更为绝对的胜利。”① 16

综上所述，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十九世纪末之前已经宣布：天主教在美国自认为是“美国式的天主教”，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机构之一。美国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们写道，在美国“天主教会实际上是美国各种制度的自然支柱”，“它感到在美国比在现代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要自由。”②

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最主要的制度是私有制，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统治人民群众。美国的天主教和天主教机构(象其他宗教一样)，是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政权的支柱之一。

1938年1月，芝加哥大主教、红衣主教蒙德林在对美国天主教“圣名”会会员讲演时承认，过去（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美国天主教会“过分经常地做了坏的一方的”，“做了自私自利的企业家们的”“盟友或者卷入了他们的联盟”。③

---

①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512页。

②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10页。

③ «工人日报»，1938年1月4日，纽约；Th.梅纳德：前引著作，第433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的特征是：当它成了资本家统治的支柱之一后，便开始坚持不懈地为教会争取产业工人，力图使他们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红衣主教蒙德林在上述讲演中对美国天主教活动家说："我们的岗位是在工人之中，他们是我们的人民，他们建设我们的教堂，我们的神甫是他们的儿子。"

天主教向资本主义社会宗教转变的过程，天主教机构受资本主义支配的过程，在西欧诸国比在美国复杂而且缓慢，因为这里的天主教千百年来是与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即使在这些国家中，宗教关系方面发生的现象也反映着经济领域与阶级斗争发展中的种种过程。意大利政论家 Э·塞雷尼在《意大利农业问题》一书中写道："必须指出，自上个世纪末起……土地贵族已陷入标志着意大利金融寡头政治王国诞生的建筑投机事业与银行纷争之中……""在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与大资本之间建立起空前密切的关系，经济17利益的相互渗透也更加深广了。"①

① Э·塞雷尼：《意大利农业问题》，莫斯科，1949 年版，第 113—114 页。

地主贵族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不仅是由于经济利益一致。促使他们建立密切关系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仇恨，十九世纪末这一运动在欧洲许多国家中具有广大的规模。塞雷尼针对意大利的情况写道："对土地占有制中封建残余的任何打击，都空前经常地使金融资本统治集团与托拉斯巨头感到不仅是对私有制形式之一的一般攻击，而且是对他们的特权之一、切身经济利益之一的直接攻击。"①

地主贵族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对西欧诸国天主教转变为资产阶级宗教，对教会适应资产阶级需要起了巨大的作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成了天主教的主要教义，而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斗争则被认为是教会活动的主要任务。

关于这一点，保尔·拉法格写道："……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它反对僧侣支持的贵族，它当时是伏尔泰派，甚至与无神论调情。但是它刚一掌握政权，便立即倒戈，急忙皈依先辈的宗教：这时它不再害怕宗教麻醉剂，并

① Э·塞雷尼：《意大利农业问题》，莫斯科，1949 年版，第 120—121 页。

尽量利用这种手段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它通过法令恢复当初按照它的法令废除的上帝，重新建立起被它推翻的祭坛，负责赡养它自己从前驱除和迫害的神甫。神甫们原来是些卑躬屈膝的奴才。因此并不奇怪，工厂主热衷于最卑鄙的伪善行为，而天主教与新教的牧师们则用烈性毒药毒害工人的思想。神甫为供给他金钱的人服务……”①

在法国，天主教主教们转向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后，仍然经常留恋过去。他们与资产阶级共同仇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他们的全部理想寄托 18 在过去。天主教主教们与贵族共同向往君主制。他们至今念念不忘使他们深恶痛绝的 1789 年（天主教主教中最反动的人士现在仍认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一切“罪恶”——民主、唯物主义、科学与社会主义——都来源于 1789 年的法国革命），念念不忘 1848 年 6 月和 1871 年的“公社”。天主教主教们早在十九世纪末就认为，宝座与祭坛相结合，即王权依靠于教会，是防止革命的保障。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 3 卷，第 435 页。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僧侣和梵蒂冈积极参加了以复辟法国王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保皇派的阴谋没有成功，僧侣参加这些阴谋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敌视。

十九世纪末，天主教主教们被迫走上"承认"共和国的道路。但是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民主的宗旨。他们开始为新的主子——工业资产阶级服务。

1877年1月份的《欧洲导报》杂志上刊登了埃米尔·左拉的通讯报导——《法国僧侣的类型》，作者在这篇报导中生动地描写了法国天主教僧侣对当代法国社会各种不同阶级的适应情况。左拉对五类僧侣作了分析。

1. 乡村神甫。他紧紧控制着政治上落后、受压迫而不敢反抗的乡村居民。所有的人都对乡村神甫唯命是从，按照他的指示办事。"他所代表的权力比市长还要强大：市长讲话仅仅代表政府，而他却代表上天。上天对于农民来说仍然是可怕的力量，农民对上天是俯首听命的。"乡村神甫了解农民的需要，他用"圣水"医治病人，为愚昧无知的人驱逐"魔鬼"，等等。"全村的人都崇拜他，把他当作上帝的代表，而上帝是可怕的，能够以

死亡惩罚人们。”

2. 在城市贫民中工作的城市神甫。他住在城郊工人区中，认为宗教应当征服城市居民。“但是他的一切努力因遭到不可战胜的厌恶而告失败。城郊居民不仅不相信宗教和对它漠不关心，而且仇恨神甫，仇恨通过神甫所看到的宗教。”但是这种神甫仍然坚持不断地到工人家庭中去，争取工人回到教会的怀抱。

3. 资产者的神甫。他得到一个油水多的本堂教区，随心所欲地享受。这种神甫善于同所有的19人和睦相处。“伪善者崇拜他，不信教的人宣布他是一个亲切可爱的人。”“他不仅主宰那些垂手低头而来的女人，而且支配伏尔泰派的男子汉，对后者说来，在亲近的人们中间宗教是经常受嘲笑的对象。”

4. 为小姐服务的神甫。他的教会象一座大沙龙。这种神甫是三十岁左右身材颀长的黑发美男子 他是大工厂主的儿子。他的教女是侯爵小姐、伯爵小姐等等。“最优雅的女士见到他都欣喜若狂。”“神甫这样漂亮的男子，穿着一身雅致的教袍，可以为任何一个沙龙增光。”

5. 主教大人，干瘦的六十岁老头子。他本来是龙骑兵上尉。在军中服役已使他厌烦，“而教会是显身扬名最方便的舞台”。退伍之后，他着手研究神学问题，开始与“我们时代的精神”斗争 他当上了主教，并且希望成为红衣主教。“退伍的龙骑兵上尉显然认为自己依然身在沙场，用主教的权杖猛击敌人。他在杂志上作战，利用小册子作战，用尽一切手段，甚至最世俗的手段……对于他来说，宗教是他赖以击溃一切不崇拜他权力的人的舞台。上帝不过是他的宪兵而已……他以上天的名义要求神甫做地上的主宰……”①

美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对加速西欧诸国天主教会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环境的过程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教导自己的欧洲教友说，天主教会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也可以繁荣昌盛，与资本结盟比与地位不巩固的帝王结盟有利。1892 年到巴黎的美国大主教阿兰德在会见法国天主教界著名人士时说：“过去有人说，天主教会与共和政体势不两立”，“美国的空气对天主教会有致命的危害”。阿

① 《欧洲导报》，1877 年 1 月，第 416—442 页。

兰德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宣称，美国天主教会“习惯于呼吸共和国的空气，并在这种空气中蓬勃发展。”①

美国的主教们还建议罗马教廷——教皇及其周围的人，承认宗座的新处境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1876 年访问罗马的英国红衣主教曼宁抱怨说，在梵蒂冈，1870 年事变之后有一部分人在等待奇迹，另一部分人则无所事事并反对那些想出面“调停”的人。②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首先在美国，然后在欧洲各国紧张地进行着天主教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结合的过程。天主教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支柱之一。

资本侵入教会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宗教机构本身逐渐变成最大的资本占有者。教会及与其有关的组织向人

① 引自 C·S·菲利普斯：《1848—1907 年的法国教会》，纽约，1936 年版，第 246 页。

② 同上，第 164 页。

民宣扬安贫并把“阴世的幸福”情景说得天花乱坠，但它们自己却扮演资本家和银行家的角色。教会的巨额财产和收入改变了使用方式，它们现在被投入资本主义企业。宗教机构的收入来源本身也在改变：不仅来自教徒，而且还从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中取得巨额利润。

许多欧洲国家的天主教会在十九世纪中叶仍然是大土地占有者。土地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不算为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所收费用的话)。根据1858年的材料，意大利（不包括教皇国)天主教会(加上天主教修会)，每年的土地、房屋、畜牧场和资本（估计总共有二十亿法郎）收入总额为七千五百二十六万六千四百一十六法郎，其中各项收入如下①：

收入来源	法郎
土地	40,522,325
畜牧场	20,708,253
资本	5,890,056
房屋	5,503,669

① 资料取自《祖国纪事》，第157册，1864年11月，第127—128页，圣彼得堡。

其　　他…………………… 3,642,113

从这一资料中可以看出，意大利天主教会收入的绝大部分(七千五百万法郎中有六千一百万)来源于教会的土地和畜牧场，仅有比较小的一部分（约六百万）来源于资本。因此，十九世纪中21叶的天主教会(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欧洲各国)首先仍然是大土地占有者。这种情况反映了天主教与天主教机构的性质主要是封建的。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方面的情况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宗教机构变成了大资本占有者。例如在巴伐利亚，据1910年资料统计，教会组织的全部财产有七亿一千九百万马克，其中土地和森林价值一亿零三百万马克，教会建筑物价值两亿九千九百万马克，而教会资本占三亿一千八百万马克。①

在天主教保留封建宗教性质较欧洲其他国家为多的西班牙，教会一直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然而天主教机构，尤其是耶稣会，在十九世纪末就同时是最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了。这个国家的

① 《宗教与教会统计》，慕尼黑，1921年版，第90页。

耶稣会士和教会通过委托人占有银行、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轮船航线。1910年刊登的西班牙通讯中说：僧侣变"昔日的祈祷场所为现代化的工厂……在任何一个隐修院中都可以买到上自念珠、圣像，下至女人衣服花边的一切物品，而且比在专门经营这些东西的部门购买要便宜、迅速、方便得多。人数众多的修生与修士的无偿劳动，使修道院有可能大规模地经营五花八门的工业企业，用廉价的产品破坏附近出现的世俗生产部门……"①

在法国，十九世纪末有许许多多修会从事工业活动。他们有自己的企业（缝纫厂、巧克力糖厂、干酪制造厂、旅馆）、商店，他们还经营葡萄酒批发业，等等。

由下列实例可见当时修道院企业中所行的制度，这样的例子远不是独一无二的。"慈善的牧师"女修道院在1903年前夕共有收容所二百二十一座，除七千名修女外还有四万八千名女工。修道院收容寡妇、孤女和孤儿，在本院的企业中残

① 《欧洲导报》，1910年8月，第341页。

酷地剥削他们。甚至僧侣们也承认，修道院中存在着苦役般的劳动条件。例如，南锡一位主教丘22里纳茨声称："全国再也找不到比披着慈善的外衣剥削孤儿寡妇的女修道院更残酷地剥削工人的无法无天的企业主了。"女工们从事刺绣。由于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和营养不良，她们患眼病、贫血病，死亡率非常之高。修女严格监督女工，不许她们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由于一位社会党议员在国会中提出质问，这种制度的问题才成为行政当局侦查的对象，收集了大量关于修道院企业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资料。①

比利时的修道院在十九世纪末也从事企业活动。据路易·德·布鲁凯尔说，在比利时，修道院"让贫穷的孤儿在它的作坊里作工，安排儿童在它的学校里念书，给贫苦的农村花边女工分派活计。由于它付给工人的报酬极少，所以能够以低于其他手工业者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它用这样的方法使洗衣工和裁缝破产。它在疗养区开设廉价的旅馆，办工厂生产啤酒、蜜酒、巧克力糖

① 《世界》杂志，1903年3月，第55—57页。

等千百种东西，这些产品的销路不断扩大。修道院与监狱一样实行苦役……”①

美国的宗教机构，尤其是天主教机构，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就是大资本所有者，它们的财富从那时起大大地增长起来。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教会，西奥多·德莱塞写道：“不可估量的财富——这就是教会的巨大威望为它创造的东西。全美国二十五种教派的教徒1928年一年所捐赠的财物就有四亿零二百六十八万二千九百八十一美元八十二美分。相形之下，一个石油康采恩的收入又算得了什么呢？……”

1928年教徒自愿捐赠的财物，加上遗赠教会的财物所生的利息，给美国二十五个教派带来了五亿三千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七百一十四美元的收入。德莱塞写道，教会拥有巨款，就能够“对国家的管理和我们整个的教育制度施加影响”。② 这笔巨款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天主教会手中，天

① 亨·德·曼和路易·德·布鲁凯尔：《比利时工人运动》，莫斯科版，第80页。1911年该书用德文初次出版。

② 《德莱塞文集》，第11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256及257页。

主教会成了工业企业、石油公司、橡胶园等等的股东。

23　梵蒂冈是帝国主义时代最大的资本家和银行家。黄金链条将它和国际金融资本联系在一起。梵蒂冈的保险柜里存放着世界各国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股票，它与武器、火药生产和殖民剥削利益攸关。

梵蒂冈在中世纪时期就与银行家族有联系。在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期，当教廷的利益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联系便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了。

1899年，威廉二世从巴黎获悉梵蒂冈财政困难的消息，即令德国驻罗马武官恩格布列赫特了解梵蒂冈的有关情况。德皇认为，意大利皇室可能从这种情况中得到好处。恩格布列赫特在报告中说，庇护九世死后，梵蒂冈的财产共计有八千万里拉。利奥十三世接受法国投机商邦特的建议，决定将梵蒂冈的财产化为资本。它建立了“罗马银行”（1880年），积极参加金融业务和各种企业活动。由于进行这些金融活动和通过“彼得捐献”而获得的收入，恩格布列赫特报告说，现在（即

1899年底）梵蒂冈的财产估计有一亿四千万里拉。此外，梵蒂冈的不动产估计价值一千二百万——一千五百万里拉。梵蒂冈全年的预算为六百万里拉。① 参加建立梵蒂冈银行的意大利贵族中有帕切利银行家族，教皇庇护十二世即出身于这一家族。②

焦利蒂报导了1892—1893年开始闻名的“罗马银行”的金融投机活动，它发行了好几千万里拉伪钞。③

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代表古巴斯托夫在1903年7月向拉姆兹多尔夫（外交大臣）报告，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献给梵蒂冈的捐款平均每年有六百——七百万法郎，而在圣年多至一千万——一千二百万法郎。④

这位古巴斯托夫在1903年2月还曾向拉姆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书信选集》，斯图加特——柏林，1928年版，第330—332页。

② 关于“罗马银行”的情况，见有趣的研究性著作——安·诺维茨基：《帕切利的梵蒂冈银行》，华沙，1952年版。

③ 焦·焦利蒂：《我的生平回忆》，伦敦，1923年版，第78—82页。

④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1，第124页。

兹多尔夫报告，利奥十三世为庆祝自己当选教皇二十五周年而解私囊布施穷人五万里拉。古巴斯 24 托夫说，梵蒂冈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就此事发表文章说，这笔赠款出自"一位大家所敬仰的长者之手，他被迫生活于贫困之中，全靠忠于他的儿女们的施舍度日"。① 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就在1903年，教皇利奥十三世一命呜呼。古巴斯托夫在1903年12月2（15）日由罗马发给拉姆兹多尔夫的紧急报告中写道："他(利奥十三世——舍英曼）所积累的财富的确切数字不知究竟有多大。有人说，大到三千二百万——三千五百万里拉，也有人肯定地说，已超过四千万里拉。大笔钱款变为有息证券，证券既有意大利的，也有外国的。"此外，利奥十三世"还遗留现金七十万里拉，作为自己的殡仪费和教皇选举会的用费"。②《罗马观察家报》硬说"生活在贫困之中"、靠教会忠实儿女"施舍"度日的这位"贫穷的长者"，实际上却拥有这样的巨资(四千万里拉！)。他从自己的四千万里拉中抽出五万（即八百分之一）赠给穷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1。

② 同上，第219页。

人，便被誉为卓越的仁爱之举！

在利奥十三世的继承者任教皇期间，梵蒂冈的巨资增加了许多倍，宗座参加资本主义企业活动——当然是隐蔽的——具有广大的规模。这可以根据报刊上公布的许多资料中看出。意大利作家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乔·哲曼内托写道："意大利没有梵蒂冈不投资的经济活动部门，梵蒂冈有时直接掌握股票，有时则通过代理人间接领导实际上属于梵蒂冈的企业。梵蒂冈通过著名的金融资本家和工业家——诺加拉（梵蒂冈财政部部长）、帕切利（教皇的侄子，被墨索里尼晋升为公爵）、加列阿齐、萨克蒂等家族，控制最重要的股份公司。它手中有三十一家公司的股票控制额，这些公司的资本共有三百三十亿里拉之多；它拥有所有经济和金融活动部门（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等等）的股票，总资本为二百五十亿里拉。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大银行，如商业银行、"圣灵"银行、罗马银行等等有联系。"①

梵蒂冈的金融和工业活动从来不限于意大利 25

① 乔·哲曼内托：《'神圣的一年'与梵蒂冈的政策》，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0年8月11日。

国内。法国、瑞士、西班牙的工业、南美的公用设施，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军事企业，都有梵蒂冈的投资。①

弗·伊·列宁曾经指出，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将国家机关、科学、文学、艺术统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大资本还控制着宗教机关。在美国，“控制教会的仍然是控制经济生活的那些资本主义集团。”②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中都是这样。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902年说道：“现在，教会象从前拥护奴隶制和农奴制那样拥护保存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③

在中世纪，天主教是封建宗教，天主教会是封建组织，那时教会的上层人士——教皇、红衣

① 关于梵蒂冈和最大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经济利益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见И·拉弗列茨基：《梵蒂冈》，莫斯科，1957年版。

② Д·戴维斯：《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第383页。

③ 奥古斯特·倍倍尔：《倍倍尔演说选集》，柏林，1926年版，第45页。

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等——主要从贵族家庭中选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就其地位、血统和生活方式来说，接近富翁、银行和工业界。

在封建贵族仍然有势力的地方，天主教会上层人士的利益与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相互交织，并未削弱罗马教廷与封建贵族的联系。在许多国家中，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教会本身仍然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在资产阶级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是大土地占有者。因此，梵蒂冈与天主教主教们全力以赴，为争取保留这些国家大地主的特权和教会本身的封建特权而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在帝国主义时代，梵蒂冈和天主教同帝国主义结成一体，资本侵入教会，并在教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天主教中的现代主义

26

天主教的教义并没有随着天主教适应资本主

义而改变。天主教的特点之一，就是把中世纪的天主教观念带进了二十世纪。天主教的保守和对一切新事物及进步现象的不容忍，把现代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因为后者现在也惧怕社会向前进步发展。革新天主教教义使之现代化的尝试受到梵蒂冈的极端敌视，终究没有成功。

一部分教会活动家，注意到社会中的新现象和科学进步（例如在宗教批判方面）以及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与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观念相抵触），力求使天主教与现代妥协、一致，因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生了一个名为"现代主义"的流派。

现代主义派的思想家及其最大的代表人物都是天主教神学家。通过对教会史，特别是早期基督教史和圣书的研究，他们坚信，天主教的传统教义中有许多东西经不起科学批判，为保持自己的威信起见教会应当抛弃显然已经过时的概念，按照新的生活条件的要求改革教义。

现代主义思想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有拥护者。

在此之前，十九世纪末期，现代主义思想比

较有限的部分在美国天主教会中得到传播，还博得了高级僧侣的同情。罗马教廷和教会官方领导给美国僧侣界这一流派起了个外号，称它做“美国派异端”。

“美国派异端”的特点是，力求保证美国教会有较多的（脱离罗马的）独立性，要求在移居美国的多民族居民中采用新的方法宣传天主教。

鼓吹这种观点的人之一是由德国迁来的伊萨克·海克尔神甫。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就提出了天主教会争取美国新教居民的想法。为此目的，1858 年经教皇庇护九世同意，他建立了“使徒保罗的传教士神父会”。海克尔担任总会长直到 1871 年。海克尔认为，天主教按照美国的条 27 件改变宣传方法后，才能在美国获得成功。1871 年，他在其匿名著作《教会》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海克尔写道，上帝从来不让自己的形象重复出现，他不断创造反映他形象的新形式；上帝向人类显现形象的方法经常变换。①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教会生活应当比从前有更多的自由，靠

① 见 B·克连斯基：《罗马天主教的现代主义》，哈尔科夫，1911 年版，第 10 页。

纪律建立的单调生活应当多样化，在工业时代象独身、安贫和顺从这样福音书所说的理想，是没有宗教道德意义的。

罗马教廷看出，美国天主教徒中的新流派十分危险：不仅有朝着"自由化"的方向修改天主教教义的趋向，而且更糟糕的是，有削弱教会中央集权，使美国教会脱离罗马而独立，由"普世"天主教会的一部分变为独立的美国教会的趋向。

在有权势的美国主教（吉邦、阿兰德）中，当时确实可以看到明显的使美国天主教美国化的倾向，它完全符合这个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1891年，巴尔的摩市大主教吉邦写道："……如果教会要在美国深深扎根、开花，就应当依靠在它的（即美国的——舍英曼）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家乡里培养出来的、呼吸美国空气的、随着美国的成长而成长的、与美国的民事和政治机构协调一致的人。"①

美国主教中的代表人物希望，不要把美国天主教及天主教机构看作"外国的"组织，而要看作

① 引自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503页。

美国的组织。他们认为，为此教会应当放弃保守主义，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措施与自由的不容忍态度，放弃对科学的公开敌视，应当比较机智灵活地行动。美国的主教们承认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在美国多民族、多宗教居民的条件下，不承认这一原则就可能经常发生宗教冲突），而当时欧洲诸国的天主教则坚决反对这一原则。

俄国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代表恰雷科夫在1899年2月14（26）日向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写道，美国派问题的实质“如下：作为拉丁文化，尤其是 28 罗马城文化的特殊产物的、以盲目崇拜权威为基础并习惯于依靠世俗政府权力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否能够……，这个教会是否能够按照现在这种样子在北美立足并取得成效？因为在这里英德文化居于统治地位，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建立在自由和独立的基础上，教会完全脱离国家。”①

“美国化”的方针使美国天主教中产生了分立主义的倾向和削弱罗马教廷对美国教会统治权的要求。后面这种情况最使梵蒂冈不安，梵蒂冈准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25页。

备对美国教会中的某些革新放任不究，但是对削弱宗座的权力却不能够容忍。1899年发出了致巴尔的摩市大主教吉邦的教皇通谕《慈惠的证人》，其中谴责了"美国派异端"。这一谴责与教廷的其它类似文件不同，写得极为巧妙。恰雷科夫写道(1899年2月14（26）日)，利奥十三世在致吉邦大主教的通谕中说，"为了罗马教廷的利益，要非常机智与灵活地处理问题。"①

教皇谴责海克尔及其追随者阐述教义的论点与教会的说法不一致，并且指出，如果把"美国派"这个名称理解为海克尔的论点，那么"美国派"应当受到谴责，如果把这个名词理解为美国人和其他民族固有的法律、风俗习惯和民族性格的特点，那么就没有理由驳斥"美国派"了。②

恰雷科夫同权威人士谈论教皇通谕时，按照他的说法，"得到的印象是：利奥十三世的决定确实有利于在北美发展罗马天主教"。对于罗马教廷来说，重要的是——他接着写道——在美国派问题上不造成分裂的后果，以免丧失在这个国家里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26页。

② 同上。

的政治影响和从这个国家得到的物质财富。①

美国天主教主教们也无意与罗马决裂，建立脱离罗马的美国独立教会，即无意与传统决裂，因为这一传统使天主教享有“使徒之王”继承者所领导的教会的荣誉。访问罗马的阿兰德大主教，29 为使教皇确信美国教会对教皇忠诚不渝（美国主教否认美国存在“美国派异端”），曾以美国主教团的名义感谢利奥十三世消除了“误会”并声明，美国的主教和教徒服从教皇。

据俄国驻梵蒂冈代表萨宗诺夫报告，利奥十三世在1900年8月庆祝自己命名日的招待会上，对当时在座的美国大主教阿兰德特别殷勤。萨宗诺夫说，为了结束关于美国天主教徒要求独立的议论，利奥十三世在这次招待会上向阿兰德提出了两个罗马天主教世界观要点方面的问题：一、罗马教会最高领导的统一问题和二、它的首脑的世俗权力问题。阿兰德对这两个问题向教皇作了完全令人放心的回答，“年迈的教皇显然高兴地听取了他的回答……”这些声明，萨宗诺夫写道，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27页。

"不管在上述场合中有多大价值，在梵蒂冈毫无疑问将被解释为北美天主教居民全部接受了教皇权力至上论。"①

法国、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现代主义派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批判基督教教会史、所谓的"圣"书和一系列天主教的基本原理。

法国现代主义派的著名代表是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希伯来语和圣经诠释教师阿尔弗雷德·卢阿齐神甫（1857—1940年）。当他开始用历史批判法研究圣经时，便被学院解聘（1893年）。加尔纳克《基督教的真谛》法文版问世，使卢阿齐有了发表《福音与教会》一书的理由。卢阿齐在反驳加尔纳克时写道，基督教的真谛不是从描写耶稣生平的资料中和福音书中引伸出来的②；对于研究者来说，耶稣不是神，而是犹太救世主，他降临尘世之前和离开尘世之后的一切，都不是科学研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103页。

② 加尔纳克在《基督教的真谛》讲稿中写道：要回答"什么是基督教？"这一问题，到何处请教呢？答："回答简单而又详尽：'去请教耶稣——和他的福音书'。"（A·加尔纳克：《基督教的真谛》，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11页）。

究的对象；耶稣不是千古不变的神的启示的代表，他是宗教运动的首倡者，这一运动的力量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宗教教条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千百年来一直在发展。 30

1903年，卢阿齐出版了第二本书《关于一本小书》，书中论证了他原来的那些思想。这两本书和卢阿齐在1903年出版的关于第四福音一书，当年就被梵蒂冈列入《禁书目录》。

卢阿齐断言，宗教教条、圣礼和法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这样，他就驳斥了神的起源和教条、圣礼永远不变的教会学说。他批驳圣经的"天主的默启"，捍卫对圣经的历史批判权。卢阿齐证明，旧约书是根据犹太传说逐渐编成的，这些书的作者是人，《摩西五经》并不是摩西写的。

教会曾两次强迫卢阿齐承认他的观点错误，并于1908年开除了他的教籍。1909年，卢阿齐被选为法兰西学院历史学教授，这件事毫无疑问是法国知识界进步人士对梵蒂冈的示威和对迫害卢阿齐的抗议。

我们还从外交文件中了解到梵蒂冈和天主教主教们对待卢阿齐的一些详细情况。

1903年12月16(29)日，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代表古巴斯托夫向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尔夫报告，目前法国神学界正在进行着一场使梵蒂冈感到非常不愉快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年轻有才并深受欢迎的教授阿弗雷德·卢阿齐神甫。他去年与柏林教授加尔纳克就后者的《基督教真谛》一书展开论战。热衷于研究对象和辩论的卢阿齐对耶稣的学说，尤其是罗马教会的教条发表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被巴黎大主教看作是反对天主教的。红衣主教里沙尔将他的《福音与教会》一书作为未经宗教书刊检查机关许可出版的书籍加以禁止，并请求教廷列入《禁书目录》。

利奥十三世对此事未作仓猝处理，而将这本书交给圣书研究委员会审查。后者也未仓猝谴责作者——当代优秀的圣经诠释家之一。

然而，事隔不久卢阿齐神甫却发表一系列致宗教界人士谈神学问题的信件，在信中他不仅对31这些宗教界人士，而且对罗马教会本身看待圣经的编写方法、第四福音在《新约》其他各册中的意义、圣礼的制定等这些最复杂的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大胆地提出异议，最后还用批判态度分析了

教会的威信问题。

这部新的著作(«关于一本小书»)刚一问世，里沙尔便来到罗马，要求尽快谴责卢阿齐的著作。12 月 16 日(1903 年)，罗马宗教裁判所谴责了他的五本书。现在，古巴斯托夫写道，他的宗教领导要求他销毁他的著作并放弃谬论。①

在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教会史多年的天主教历史学家路易·杜尚神甫(1843—1922 年)，做了大量教会史方面的批判工作。他的«古代教会史»一书引起了宗教界官方人士的不满。对作者提出的罪状是，他在对教会史的批判中避而不谈教会史中的“超自然”因素。②

杜尚并没有象卢阿齐那样对教会的传统作激进的批判。他甚至反对那样的批判。杜尚在他书中的前言里写道：“对以士宾根派为突出代表的各种荒诞体系的迷恋，现在已经过去；不错，又有一些其他的体系取代它们，因为人的头脑具有不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1，第 237—239页。

② 1955 年，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向罗马世界历史学家会议代表讲话中声明，天主教会具有神圣的起源和超自然的性质(见«纽约时报»，1955 年 9 月 8 日)。

断产生怪诞理论的能力。然而存在着一种中间流派，它代表着思维健全的人的意见，它正逐渐成为一切冷静判断事物者的权威。不用说，我认为自己是这一流派的拥护者。”①但是，罗马教廷(象许多其他宗教一样）不能容许对教会史采取排除超自然力量干涉的批判态度。

杜尚遭到教会主教们的迫害。他在天主教学院的教学活动被停止，他的书被列入禁书目录。对杜尚的迫害甚至激起了法国保守派的抗议。1910年，他被提名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教皇权力至上论者却提出巴黎天主教学院院长博32德里亚尔（后来为红衣主教）作候选人来与他抗衡。结果当选的是杜尚。

德国现代主义派的著名代表是盖尔曼·歇尔(1850—1906年)——维尔茨堡大学的辩护学、基督教艺术和考古学教授。

《天主教教义是进步的原理》(1897年)一书，是歇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于受到使天主教会出丑的勒奥·塔克西尔事件影响而写成的。歇尔在

---

① 路·杜尚：《古代教会史》，第1卷，莫斯科，1912年版，第10页。

这本书中反对相信奇迹、魔鬼、巫婆，反对僧侣监护俗人，反对耶稣会士统治教会。他批驳了关于在阴间永远受折磨的天主教教义。在《新的时代与旧的信仰》（1899 年）一书中，歇尔批驳了“庸俗化的”天主教，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允许教徒信仰自由和与科学不相矛盾的、“真正的”或“理想的”天主教。歇尔宣称，教条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

歇尔的著作在 1898 年被列入梵蒂冈的禁书目录。他本人则受到教会主教和耶稣会士的经常攻击。①

英国现代主义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耶稣会士蒂勒（1861—1909 年）。按照他的说法，“相信自己所信宗教的基本真理与现代基本真理可以综

① 梵蒂冈不仅善于对活人，而且善于对死者进行报复。1907 年德国成立歇尔纪念碑修建委员会。一些天主教活动家，其中包括班贝克大主教和帕萨主教参加了委员会。教皇庇护十世就此事致函维也纳神学家柯梅尔，称赞他对歇尔的批判，并提醒说，歇尔的一些著作曾受到教会的谴责。教皇写道，敬仰歇尔并参加给他修建纪念碑的人或是不懂天主教，或是反对宗座的权威。教皇赞许反对歇尔的人（见《欧洲历史年鉴》，慕尼黑，1907 年版，第 125—128 页）。

合”的教士，称做现代主义者。蒂勒研究、证论经院哲学和从事圣经研究工作二十多年。用历史批判法研究圣经终于使他同教会发生冲突。他企图用与教会不同的精神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蒂勒证明，教条在进化，重要的是教条中的道德涵义。1906 年他被耶稣会开除，此后即屈服于罗马教廷。但是，由于他反对关于现代主义派的 1907 年教皇通谕，同年被开除教籍。

33　　蒂勒死后，梵蒂冈继续对他进行迫害，禁止按照宗教仪式埋葬他。

据英国现代主义的拥护者们说，英国现代主义的特点是：它承认科学中的进化和历史学中的批判法，它所要求的不是放弃基督教的基本原理，而是根据不断发展的知识修改它们；现代主义力求使基督教的两种世界观——进化史观和另一种认为默启在基督教历史中起作用的历史观——结合起来；现代主义是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革新基督教的尝试；它力求保存过去宗教中一切重要的东西，同时“要用现代的头脑思考，用现代的语言讲话”；现代主义是一部分思想家用现代的，而不是古代的术语教授“基督教真理”的尝

试。①

意大利现代主义派著名代表人物是罗莫洛·穆利神甫（1870—1944年），他是意大利基督教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穆利和他的同志们集中注意的不是神学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现代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天主教神学界普遍存在的、性质驳杂的流派。现代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从不同方面修改天主教的基本教条和改变教会的实践活动。他们没想和教会断绝关系，但是斗争的逻辑必然使他们这样做；否则，他们就得放弃自己的观点，服从梵蒂冈的命令。

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下列几条：宗教是信仰的事实，它是由人创造的；宗教仪式的形式是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因素；启示没有历史根据，启示故事具有叙事诗的意义；圣史是基督教的幻想史，而不是真实事件的历史；教条没有永恒真理的作用，而是内心宗教状态的表现，因

① 《大英百科全书》，第15卷，伦敦，1951年版，第638页。

此是变化的；从福音书中不能够为基督教教条找到根据；耶稣没有创立教会，教会不是神的机构。由此得出结论，天主教会不是唯一的“救世”机构。根据这个道理，一些现代主义者批驳了教皇最高权力论，同时也批驳了教皇永无谬误论。现代主义者还批驳基督的神性和仿佛由它创造的奇34迹。他们还批驳了关于原罪的教条，关于存在地狱和阴间折磨的教义。①

这样的纲领远远不是所有的现代主义者一致遵循的，列举出来的是现代主义派各种代表人物所持观点的总汇。正如意大利天主教运动进步历史学家 Дис·康德洛罗所说，现代主义具有“极其多种多样的形式，由它所表现的领域而定……例如，出现过哲学教条现代主义……还出现过历史诠释现代主义，它的基础是对《新约》、《旧约》和全部基督教史作新的历史批判性解释……还有一种现代主义是社会政治现代主义，它联合了最激进的基督教民主流派，例如穆利派……所以，现代主义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相反，

① 见 B·克连斯基：《罗马天主教的现代主义》，第 33—47 页。

它身上带着实证主义、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各种各样影响的烙印。这是一个富有各种不同色彩和倾向的派别，这些色彩倾向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①

罗马教廷嗅到了现代主义的巨大危险性，它的宗教机关全力以赴对现代主义进行猛烈抨击。它禁止发行和阅读现代主义者的书籍并将它们列入《禁书目录》②，停止现代主义者在天主教学校里的教学活动，开除他们的教籍，等等。反对现代主义的斗争由利奥十三世开始进行。1902年12月，在就天主教神学院的教学问题致意大利僧侣的教皇通谕中，利奥十三世宣称，教学的任务在

① Л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莫斯科，1955年版，第338页。

② 1948年梵蒂冈颁布的《禁书目录》中有下列著名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书籍：路易·杜尚的《古代教会史》，根据1912年1月22日命令列入《目录》；阿弗雷德·卢阿齐的《福音研究》、《福音与教会》、《第四福音》、《关于一本小书》、《以色列的宗教》，根据1903年12月16日宗教裁判所命令列入《目录》；他的《现代宗教史笔记》、《全集》，根据1932年6月1日宗教裁判所命令列入《目录》；他的《现代道德之危机与人类的教育》、《乔治·蒂勒与亨利·布莱蒙德》、《曼德主义与早期基督教》、《基督教的产生》、《‘新约’的来源》、《以色列的宗教》（第三版）、

于抵制不合乎僧侣本性的思想潜入僧侣界。教皇通谕中说："世界上有一种对不明智的和可悲的革新的向往，但是僧侣应该高于凡人的意见和制度的可变性……"③利奥十三世号召僧侣对"不明智的和可悲的革新"毫不妥协（他并且没有忘记攻击社会主义），但同时又劝说要"明智地适应时代条件"。

庇护十世把反对现代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管理教会的中心任务。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历史学家路·帕施托尔在1903年10月17日教皇庇护十世接待之后，即庇护十世当选教皇后不久，写道：

《'新约'书信体文简记》、《宗教与道德是否存在两个来源》，根据1938年7月20日宗教裁判所的命令列入《目录》；罗莫洛·穆利的《现代意大利问题》，第1卷——《教权主义政治与民主》，根据1949年1月4日命令列入《目录》；他的《现代的斗争》、《民主与基督教》、《新哲学与反对现代主义的教皇通谕》、《基督教的宗教生活》，根据1909年7月5日命令列入《目录》；盖尔曼·歇尔的《天主教教义讲解六卷集》、《天主教教义是进步的原则》、《神圣的基督教真理四卷集》、《新的时代与旧的信仰》，根据1898年12月15日命令列入《目录》（《禁书目录》，1948年，第146、286—287、335、431页）。这仅仅是梵蒂冈至今禁止教徒阅读的一小部分现代主义作品。

③ 摘自《教会通报》，圣彼得堡，1903年版，第4期。

“至于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态度，我认为，新教皇将比利奥十三世更为严厉。”①

庇护十世在1904年12月的讲话中告诫天主教的主教们：“小心看管你们的神学院和未来的神甫……在现代居统治地位的、肆无忌惮的批判精神的鼓舞下，年轻教士已经毫不尊重教会神父和教师……传授的科学了……”教皇号召将自由思想者撵出神学院。

1907年7月4日，宗教裁判所主教会议颁布新的《西拉布斯》——六十五条受到会议谴责的论点，这六十五条论点概括了现代主义者(或“自由主义天主教徒”)的基本观点。

第一部《西拉布斯》，或《现代谬论目录》，前已指出，是庇护九世在1864年颁布的。它谴责了科学发现、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时隔四十三年，庇护十世又颁布一部《西拉布斯》，谴责对教会教义阐述与权威的批判。

庇护十世的《西拉布斯》谴责旨在反对教会书刊检查的种种观点。谴责那种认为教会不能对纯

① 路·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1854—1928年》，海德耳堡，1950年版，第420页。

释的人类知识作出判断的说法，谴责对圣经的批判和说上帝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的论点。

庇护十世的《西拉布斯》还谴责与基督教教条和启示的教义不一致的论点：教条不是神授真理，而是对宗教真理的一种解释；在圣书的内容中以及教会的各个论点之间可能并且存在着分歧；宗教教条只有结合它们的实践意义，即作为行为的准则时，才应当遵循。《西拉布斯》谴责与基督的神性、圣礼的神圣来源与意义的教义不一致的种种论点。

《西拉布斯》中的许多条款都谴责现代主义者对教会体制问题的看法：谴责那种认为教会体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彼得从未想到基督委于他教会中最高职位的观点（这种观点破坏了对罗马教廷最为重要的教会学说：天主教会把关于教皇是彼得继承者的学说与关于使徒彼得的学说联系在一起）。

《西拉布斯》谴责那种认为罗马教会成为整个西方教会的首脑不过是政治情况造成的（而不是上帝安排的）观点。

这样，庇护十世的《西拉布斯》用简明的形式

驳斥了现代主义派的全部基本论点①。为反对现代主义而颁布的《西拉布斯》，实质上就是全面反对宗教史、基督教史和教会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梵蒂冈打算通过颁布新《西拉布斯》恐吓天主教群众，让他们去反对现代主义"造反派"。

1907年7月10（23）日，当时俄国驻梵蒂冈公使萨宗诺夫报告，梵蒂冈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红衣主教同他谈话时声称，并不指望在新《西拉布斯》出来之后唯理论将不再取得成就，但"仅希望，新《西拉布斯》的出现能够使许多天主教徒免受唯理论批判的恶劣影响"②。

继《西拉布斯》之后，1907年9月8日又出现了一个反对现代主义的教皇文件——教皇《牧羊通谕》，它扩展了《西拉布斯》的主要论点。这是一篇致"总主教、首席主教、大主教、主教和其他地方当局"的洋洋万言的文告。

庇护十世在教皇通谕中写道，现代主义的哲学观点是以称做不可知论的学说为根据的，从这

---

① L·瓦尔蒙德：《天主教世界观与自由科学》，慕尼黑，1908年版，第51—55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1，第16页。

一学说得出的结论是：上帝是不可知的，他不是科学的研究对象，不能把他看作历史活动家。这种观37点，教皇宣称，已受到1870—1871年梵蒂冈宗教会议的谴责，对那些“说人类智慧的自然之光不可能真正透彻了解主的创造物——唯一的、真正的上帝的创造物”的人，那次会议给予开除教籍的处分。因为这种观点是通向无神论的！对现代主义者来说，教皇写道，“确定不移的事是：科学和历史应当是无神论的。”事实上现代主义派与无神论实际上毫无共同之处。庇护十世指责现代主义者搞无神论，不过是要强调他们对教会是何等的危险。

教皇驳斥了现代主义派的宗教历史发展论和天主教与其他一切宗教的产生方式相同论。教皇惊呼道：“这样狂妄的说法，这种渎神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按照教皇的说法，从现代主义派的观点还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无论是在称做基督的人心内，还是在我们心内，我们神圣的宗教都是自发地产生于自然界。还可能有比这更彻底地消灭一切超自然因素的说法吗？”①

① 《法国宗教哲学思想的现代流派》，彼得格勒，1915年版，第115页。

教皇的《牧羊通谕》批判了现代主义派对教条的来源和本质的看法。从他们的观点，教皇说，得出的结论是：教条是"符号"，不包含绝对真理并随着宗教感情发展。教皇写道，现代主义者作为哲学家不否认上帝存在的现实，但是这种现实性仅仅存在于信徒的精神之中并以信徒的个人经验为根据。"上帝本身是否不依感情和观点为转移而存在呢？对此哲学家并不知道，也不关心。"①如果说宗教是信徒的"个人经验"问题，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种宗教，包括多神教，都应当认为是与真理相符的……庇护十世问，现代主义派有什么权利否定伊斯兰教徒宗教经验的真理性，而把符合真理的经验仅仅给予天主教徒呢？现代主义派确实不否认这样一点：秘密地或公开地，但是他们承认一切宗教都是与真理相符的。"②这种观点激怒了天主教会首脑，因为他认为，只有天主教才是唯一符合真理的宗教。

教皇还指责现代主义派说，他们从宗教是信

---

① 《法国宗教哲学思想的现代流派》，彼得格勒，1915年版，第118页。

② 同上，第119页。

徒的经验问题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必然在宗教传说方面也会得出对教会有破坏作用的结论：对现代主义派来说，教皇声称，传说只不过是向人们38传授原始经验；这个经验有时深入人心，有时消失，当它深入人心时，是符合真理的。由此，教皇说，“又可以作出结论，一切现存的宗教都是符合真理的。”

庇护十世在总结现代主义派的观点时写道，他们在信仰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因为从他们的观点引出的结论是：科学不依赖信仰，信仰服从科学。“这一切都与我们的先皇庇护九世的教导直接矛盾：在与宗教有关的一切问题上，哲学不应当为主，而应当为仆，不应当发号施令该信仰什么，而应当自觉地虚心领会上帝的奥秘，不应当刨根问底，而应当以虔信和谦逊的态度尊重它们……”庇护十世要求科学做神学的附庸。

庇护十世批判了现代主义派对教条的观点（他们把教条看作表示宗教意识的“公式”）、对宗教仪式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宗教仪式产生于企图感性地表现自己信仰的内心动机和要求）、对圣礼的观点（把圣礼视为象征）、对圣书的观点（按

照他们的意见，圣书不是上帝给的，而是“某一宗教的经验汇编”)、对教会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教会并没有神圣的起源，由于信徒要求把自己的信仰告诉别人，便产生了教会，所以教会是“集体思想”的产物)。

教皇谴责现代主义派要求教会生活民主化，谴责他们同意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谴责他们要求取消教会外表的豪华。

庇护十世在《牧羊通谕》中宣称，现代主义派学说的要点是进化论，这种理论断言，一切都应当变化：教条、教会、仪式、书籍、对圣者的敬仰和宗教本身。承认宗教、教会和教义的进化，意味着承认这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和“神圣的”。正因为如此，教皇才驳斥了宗教和教会进化的观点。他提到，这样一些观点在1846年已经受到庇护九世的谴责，后者曾经写道，“狂人”“想要把它（指“进步”——舍英曼）引入天主教，仿佛这个宗教并不是上帝的创造……”

教皇的《牧羊通谕》中不少篇幅驳斥了现代主义的历史批判态度：驳斥他们把基督看作人而不是神的观点、第四福音（约翰福音）是虔信思考

的结果的论证、圣经不是所说的那些作者编写的、圣书中有许多错误的说法。

39 在教皇通谕的结束语中，谴责了现代主义派关于改革教会和教会管理的建议。

教皇的《牧羊通谕》还提出了一系列反对现代主义的措施。

《西拉布斯》和教皇的《牧羊通谕》① 是庇护十世一系列反对现代主义措施的基础。1907 年 11 月 13 （26）日，俄国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代表萨宗诺夫由罗马报告：“一个接着一个地开除教籍，最近几天还公布了教皇的《自动通谕》，使所有对圣书的观点得不到圣经委员会同意的天主教学者受到开除教籍的威胁。这个圣经委员会是利奥十三世在晚年建立的，庇护十世确认它有解释圣书经文的特权。”②

各国主教按照梵蒂冈的要求攻击现代主义，根据教皇通谕的精神发表牧函。

---

① 教皇通谕全文见《现代主义纲领》，纽约——伦敦，1908年版，第 148—243 页；《欧洲历史年鉴，1907 年》，第 367—375 页；《法国宗教哲学思想的现代流派》，第 108—156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9，第 357 页。

意大利现代主义者在1907年发表《现代主义纲领》①，广泛地回驳了教皇的《牧羊通谕》。《纲领》的作者自称是教会的忠实儿子，并写道，他们不乞求宽恕，而要求将他们的观点付诸公论。他们写道，教会永远不可能遇到以特利登宗教会议的思想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教会不能够，也不应该要求托马斯·阿奎那回答二十世纪的宗教问题。《纲领》的作者们宣称，他们欲将天主教引上二十世纪的轨道并以此为教会服务。

《现代主义纲领》逐点驳斥了教皇的《牧羊通谕》的论点。《纲领》作者捍卫圣经批判权并宣称，圣经批判对启示的概念作必要的修改，加进宗教进化的概念。《纲领》作者捍卫的不仅是对圣书，而且是对整个基督教历史的批判权。他们捍卫宗教（其中包括天主教）进化的思想。他们写道，最初，宗教没有固定的形式和教义讲述；它逐渐地发展起来，获得了固定的形式。

《现代主义纲领》由意大利语译成了其他语。虽然该书作者未曾超越教会的雷池一步，但毕竟

① 《现代主义纲领》，纽约—伦敦，1908年版。

40给了庇护十世的反现代主义教皇通谕以毁灭性的批判。梵蒂冈将它列入《禁书目录》(1908年3月17日法令)。

庇护十世继续反对现代主义斗争的顶点是1910年9月规定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宣誓。要求各天主教神学系全体教授、僧侣在晋级（自副助祭级开始）礼之前，要求主教区和罗马教廷所属机关的全体职员、传教士、修会会长宣誓忠于天主教教义。宣誓者矢言，坚信教会的教导，尤其是启示、奇迹和预言，坚信基督教的神圣起源、教会是启示的保护者，拒绝“现代的一切谬论”和现代主义派的全部论点（教条进化论，宗教是人创造的，等等)。宣誓者必须承认并服从教皇的《牧羊通谕》和庇护十世的反现代主义《西拉布斯》。

1910年8月31日（9月13日）俄国驻梵蒂冈代表沃尔康斯基公爵写道，教皇在新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决定中特别“禁止阅读一切报纸和期刊，即使最好的也不例外”，这些决定不仅流露出不信任，而且还流露出“对教学人员和一般僧侣群众可靠性的担心”。沃尔康斯基公爵又写道：“最近我问红衣主教国务卿，象《罗马观察家报》这样

的机关报在神学院里今后是否允许阅读，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沃尔康斯基指出：“这就等于，譬如说，禁止我们的士官生阅读《俄罗斯残废军人报》上军事部门下达的命令。”① 由于害怕“造反”，罗马教廷甚至不允许神学院的学生阅读它自己的、极为反动的《罗马观察家报》。

进行反对现代主义宣誓的规定引起的强烈反应远远超出教会范围以外，在德国尤其如此。甚至有些地方的神甫也拒绝宣誓。要求神学系教授宣誓被认为是梵蒂冈干涉该国内政，尤其是大学生活。1910 年 12 月，宣誓问题被列为德国国会的议题（因为国立大学的神学系教授也必须宣 41 誓）。②

1910 年 10 月，科隆大主教费舍尔红衣主教前往梵蒂冈，经过一番努力，放宽了德国天主教徒对教皇圣谕的执行。③ 教皇认可，不担任教会职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27，第 121—122 页。

②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 7 卷，科隆，1932 年版，第 350—352 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27，第 150 页。

务的人无须进行反对现代主义的宣誓（这涉及国立大学的神学系教授），但是重申，在僧侣直接管辖的学校，所有的教师都必须进行这种宣誓。1911年1月，普鲁士宗教部长也宣布，德国大学的天主教神学系教授无须进行反对现代主义的宣誓。

现代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大加深了的天主教危机的表现之一。这种危机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与僵化了的中世纪教会学说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在同等程度上，引起这一危机的还有社会上民主力量的意向与罗马教廷及教会的反动意向和爱好之间的矛盾。现代主义派反映小资产阶级中天主教集团的思想情绪，他们相信这些矛盾调和的可能性，相信天主教改革的可能性。

现代主义运动并未超出天主教神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的比较狭小的圈子，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①

统治阶级（和许多教会活动家）不支持它，因

①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东正教、犹太教和其他一些宗教中也表现出类似的现代化倾向。

为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已成为巨大力量的时代，统治阶级对动摇和削弱宗教及其组织的一切，都抱敌视和怀疑态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罗马教廷能够扼杀现代主义。但是，无论是庇护十世，还是他以后的教皇，都没能克服天主教中的危机。至于工人阶级，他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在对宗教的批判方面勇往直前，使现代主义派望尘莫及，他们拥护唯物主义和无神论。

客观上，现代主义起了动摇教会组织的作用，42 有助于揭示分裂教会的矛盾，并通过对天主教教义、《圣书》和教会史的批判，为比较彻底地批判基督教和一切宗教提供了材料。

天主教中的现代化改革

梵蒂冈批驳了现代主义。在宗教仪式和教义问题上，教会认为丝毫不能脱离中世纪的教会学说。但是在一系列别的问题上，生活迫使教皇和天主教会屈从时代的要求，不然的话，天主教就不能够起它的资产阶级社会支柱作用。在对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所有制、雇佣劳动、阶级和社会阶级划分、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态

度方面，利奥十三世和以后的教皇都无保留地采取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

同时，教皇又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罗马教廷本身并在一定限度内使整个教会组织现代化。教皇还应当通过某种形式表示自己对最新科学发现的态度，因为完全否定这些发现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动摇教皇的威信。

由于现代主义派圣经批判的压力和对圣经的科学-历史批判日益强烈，利奥十三世于1902年成立了圣经委员会，以便解释和注解圣经并制定对待圣经批判的一般原则。梵蒂冈打算通过建立圣经委员会将圣经研究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1902年11月，俄国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代表古巴斯托夫向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尔夫报告：神学未必能随着新委员会的建立而吸收新发现；“更正确地说，可以认为建立它是为了遏止一些年轻的天主教神学家渴求走上比较自由地思考和解释《圣经》的道路。”①

1909年，梵蒂冈建立专门的圣经学院，以便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9，第158页。

培养能够在天主教学校讲授圣经并保护圣经抵御批判的教授。院长由耶稣会士担任。萨宗诺夫（当时俄国驻梵蒂冈公使）1909年6月由罗马报 43 告，建立教皇圣经学院“是为了让在现代水平上联系历史与考古学的圣书研究受宗座的直接监督……新机构委任耶稣会士领导。”“上述措施是庇护十世顽强地反对他所痛恨的现代神学派而采取的一连串措施中的新环节。”①

罗马教廷，即梵蒂冈一切隶属教会首脑教皇的机关的总和，是千百年来逐步建立的。这些机关的体系极其错综复杂，已经不适合执行教廷的新任务。1908年，庇护十世着手改组教廷：简化了机构，给各机关划分了职权范围。教廷职员，象世俗国家的官员一样，被分成等级，给他们规定了固定薪金，而在这之前他们得到的是教皇机关收入中的捐款。②

1910年，庇护十世采用新的、统一的主教与教皇联系制度，同时废除自西斯廷五世（十六世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55—56页。
② 同上，案卷23，第152—156页。

纪下半叶)以来沿用的旧制。从此，每位主教(或其助手）五年内必须到梵蒂冈向教皇汇报一次本教区的情况。

1905年，庇护十世采用新的修会建立制度：以前，在主教辖区内建立新修会和社团由主教许可，然后由罗马批准。今后建立这样的团体，经主教呈报后只有得到梵蒂冈的书面许可才行。①

这一措施不仅与许多修士机构、社团中风气腐化极端影响整个教会声誉有关，而且与工业蓬勃发展时代修士生活业已过时有关。

庇护十世的另一项与资本主义发展利益直接有关的措施，是1911年减少必度的宗教节日。一部分宗教节日被取消，一部分移至礼拜日。关于减少节日的教皇圣谕中说，鉴于人类社会制度的要求已经改变，故采取这一措施，宗教节日太44多不适合工商业生活的现代化速度和商业与交易活动的发展。庇护十世同时企图表白，采取这项新措施还出自对工人的关心：在关于减少节日的圣谕中说，在生活费用上涨的情况下，劳动者可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7，第166—167页。

能因现在休息日太多而蒙受损失。

1911 年 7 月，俄国驻梵蒂冈公使布拉策尔在评论教皇这一新措施时写道：“……数年来还没有一项梵蒂冈的措施受到过象现在这样的赞许，而且是教权主义者和反教权主义者共同的赞许……最近改变教历所作的让步是极其重要的，毫无疑义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①

1903 年初，教皇利奥十三世下令重新审订天主教圣徒传记，这是一次促使天主教适应“时代精神”的尝试。实质上是说，要把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荒谬神话从圣徒传记中清除出去。

梵蒂冈的 1904 年官方年鉴公布了“核实的”罗马教皇名单。传统的名单上有二百六十四位教皇(自一世纪至庇护十世)，而新名单中只包括二百五十八位教皇。在天主教的官方刊物上，至今登载着自一世纪神话性的使徒彼得开始的教皇名单。在这一名单中，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教皇多半是臆造的。在科学批判的压力下，梵蒂冈在这方面也必须对时代精神让步。关于梵蒂冈年鉴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30，第 89 页。

上公布的、经过修改的教皇名单，古巴斯托夫在1904年2月写道："年鉴编辑部天真而又坦率地声明，在此以前所发表的名单仅仅是按照圣保罗教堂中的教皇画像编写的，这些画像在第五、六世纪开始绘制，而教皇的名字显然到了七世纪末才随意标上。今年的名单是根据法国学者杜尚神甫修改过的《主教礼仪书》编写的，因此不包括科学批判认为实属可疑的教皇……"古巴斯托夫继续写道："虽然年鉴并没有下决心为科学真理牺牲罗马市的第一批主教并且照旧从使徒彼得开始列名单，但是却首次在他统治罗马讲道坛年限的神话般数字旁边画了个问号……"①

45　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根据现代主义者杜尚神甫的研究对罗马教皇的名单作了修正！

二十世纪以前，天主教会中使用十三世纪编纂的、特利登宗教会议（十六世纪）决议和教皇命令增补的教会法典。这部宗教法典自相矛盾，不适应新的环境。庇护十世即位后，立刻成立了教会法编纂委员会。它的任务，按照俄国驻梵蒂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15—16页。

冈代表的说法，是“修订整个教会法，消除及调和矛盾现象，废除不合时宜的陈规旧章并建立符合现代要求的新规章”。[①] 这项清理教会法使之适应（当然是极其相对地）于现代的工作到1917年初宣告结束。

1911年，梵蒂冈开始改革1568年编写的天主教圣礼书。俄国驻梵蒂冈公使布拉策尔写道：“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大量减少一切宗教仪式，尤其是礼拜日和节日的宗教仪式……”[②]

现代化改革触及的并不是天主教的主要方面。教皇警惕地注意着，要使中世纪的天主教学说，尤其是那些感化广大信徒阶层的做法——豪华的宗教仪式、敬仰圣徒、相信魔鬼和妖怪的存在，牢固地保留下来。不但如此，对天主教的这一方面，教皇愈来愈重视，好象与时代精神针锋相对似的。因此，克·阿·季米里亚捷夫写道：“世界教权主义普遍地武装起来，期望夺回它失去的权力，而它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当然是科学。在这一黑暗与理性的斗争中，最强大的武器是追求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44，第4—5页。
② 同上，案卷30，第149页。

奇迹。”[①]“追求奇迹”成了天主教中广泛流行的活动。

利奥十三世恢复了中断七十五年之久的大圣年的庆祝活动：1899年5月宣布1900年为大圣年。[②]恰雷科夫在1901年1月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在这一大圣年到罗马来的朝圣者多达四十万，他们送交教皇国库“约两千万法郎”，此外，庆祝大圣年激起整个罗马天主教界“对教皇有益的”宗教感情的高涨。[③]

46

在开展大圣年庆祝活动的日子里，梵蒂冈为将近八十名新的“圣徒”和“真福”——先后在中国、朝鲜、日本和非洲从事传教活动的僧侣和神甫，举行列圣品和列真福品典礼。[④]

1904年，天主教会遵照教皇旨意庆祝童贞女马利亚“无玷始胎”教条宣布五十周年。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代表在1904年11月写道：“在圣彼得教

① 《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文集》，第9卷，莫斯科，1939年版，第200页。

② 在此之前庆祝的最后一个圣年是1825年。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164—165页。

④ 《教育部通报》，1900年8月，第148页。

堂的庆祝准备活动（指庆祝教条五十周年典礼的准备活动——舍英曼），坦率地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并引起旅行者的好奇心……”①

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随着梵蒂冈传播对奇迹的信仰。1891年在特里尔(德国)，教会展出了基督的“圣袍”（外套)。“圣物”吸引来一百多万朝圣者，使教会得到了一笔不小的收入。1902年再次举办了这件“圣物”的展览。②

十九世纪末轰动一时的勒·塔克西尔事件证明，在人民中间散布迷信的天主教会上层人物自己迷信到何等地步。

法国新闻记者勒·塔克西尔（加布里埃尔·约翰·帕热斯，1854—1907年）虽然受过天主教精神的严格教育，但多年来作为激烈的反教权主义者著书立说，尖锐地攻击天主教会、教皇、教会生活和道德。1885年4月，塔克西尔声明悔罪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182页。

② 甚至自己并不反对利用据说是属于基督的“圣物”来提高宗教情绪的东正教徒，也对这次展览会表示愤慨。彼得堡神学研究院的刊物就1902年特里尔展览会一事写道，这样的“圣袍”有不下二十件，这一切都是“教皇权力至上论者的迷信”（见《教会通报》，1902年，第38期，第1208页）。

并重新皈依天主教。宗教界对此感到高兴。驻巴黎圣使季·连季建议塔克西尔今后要用自己的笔象过去为教会的敌人服务那样来为教会服务。塔克西尔把共济会定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利奥十三世仿佛到处都看到他认为引起革命、动摇教会与帝王权力的共济会组织在秘密地活动。

塔克西尔选定共济会与魔鬼的联合为自己的47写作题材。1886年，他出版了《三点弟兄》一书，书中说，共济会分会的会议由魔鬼主持，有许多圣经上诅咒的人物（该隐、摩阿布等）参加。塔克西尔把共济会组织接纳新会员的场面描写得荒诞离奇，似乎入会时要向撒旦宣誓，举行献祭礼，等等。他还详细地描绘了妇女分会吸收新会员仪式的淫秽情节（顺便说一下，从来不存在妇女分会）。

塔克西尔的“揭发”受到教会欣喜若狂的欢迎。他的书被当作一个原共济会会员关于共济会分会的机密、关于共济会会员与撒旦联合的《供词》而广泛宣传。塔克西尔此后所写的书中，关于“魔鬼”的杜撰就越来越多了。

不久，别的作者也开始写反对共济会会员的

书，把他们与“魔鬼”的关系说得更加玄妙了。巴泰利博士（塔克西尔的同事）在1893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魔鬼》一书中讲道，新加坡住着一个女人——魔鬼的代表，直布罗陀驻有魔鬼军团，他——巴泰利，曾经和这些军团的首领图巴尔卡因见过面；巴泰利还描写自己同“魔鬼教皇”的会晤，以及怎样跟着他到天狼星上去游历。

巴泰利荒诞的作品也受到天主教会的欢迎。接着又有一位新作者——意大利人马尔吉奥塔登上舞台，他写了一本关于意大利共济会会员和他们“与魔鬼的关系”的书。

Д·沃甘自1895年起发表“揭发”崇拜撒旦的文章——“一个过去的女魔鬼的”回忆录。她的《回忆录》逐月连续发表了两年；她说，她是魔鬼比特鲁的女儿、魔鬼阿斯马捷的妻子，自十岁起领导共济会分会。她叙述自己与魔鬼军团的交往，接受新会员时的淫秽场面，到火星去的飞行，最后还介绍了自己加入天主教的过程。

这些骇人听闻的无稽之谈，一贯受到教会和梵蒂冈的极大欢迎。红衣主教帕罗基(1895年12月16日）写信给沃甘说，他早就对她抱有好感，

她的"揭发材料"非常有意思，她信奉上帝是上帝慈悲心的胜利，他为她祈祷。1896年5月27日，这位红衣主教又写信给沃甘说，教皇利奥十三世"非常愉快地"阅读了她的作品。红衣主教令她继续揭露"不信上帝的宗派"——共济会会员。

塔克西尔得到了教会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宠幸。后者1887年在梵蒂冈接见他时对他说："……你的生命对宗教斗争还是大有用处的。"

48

1896年，教会人士在特里延特召开反共济会大会，有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甫、天主教新闻记者参加。塔克西尔受到大会的高度尊敬。他的肖像同圣像挂在一起。只有一个参加大会的人对Д·沃甘的存在表示怀疑，请求说出是哪位神甫接纳她加入天主教的。他的话谁也不愿意听。

1897年4月，塔克西尔在巴黎的大会上，当着耶稣会士、教权主义者、出版界代表们的面说，他有意识地从事欺骗活动整整十二年，他所写的一切都是谎言，根本不存在Д·沃甘这个人，作为她的《回忆录》出版的所有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塔克西尔最后说，我很高兴，我能够向世界

证明，任何瞎话教会领导人都肯相信。巴泰利博士（他的真姓是哈克斯）在报刊上发表了同样的自我揭露性讲话。① 结果教皇和教会丑态毕露，整个事件以此告终。

教皇开除了塔克西尔的教籍。天主教报刊极力隐瞒这一事件，但是全世界却又得到一个说明蒙昧主义统治着天主教会和梵蒂冈的明显证据。

天主教的传记作家把利奥十三世写成一个不反对现代科学进步并希望"调和教会与文化、信仰与知识、理性与启示、哲学与神学"② 的人。但是，利奥十三世相信塔克西尔所写的关于魔鬼的种种谎言诞说这一件事，就足以断定教皇及其周围的人精神境界的高低。

利奥十三世和他的继承者们敌视科学的发展并力图使科学服从宗教。

---

① 见F·希尔施：《塔克西尔的骗局》，维也纳〔1928年〕；Д·E·米赫涅维奇：《天主教反动派历史概论》，莫斯科，1955年版，第114—119页；勒·塔克西尔：《神圣的巢穴》，莫斯科，1930年版。

② E·索德里尼：《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1卷，伦敦，1934年版，第129页；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慕尼黑，1934年版，第393页。

这正是教皇的《永生之文通谕》（1879年）的要点，在通谕中教皇宣布教会神父——首先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为天主教哲学。遵照利奥十三世的旨意，1880年在罗马开办了托马斯主义学院，在鲁文天主教大学设立了经院哲学教研室。教皇下令出版托马斯·阿奎那全集。于是，在利奥十三世的倡议下托马斯·阿奎那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开始复兴。

49

给新托马斯派提出的基本任务是伪造科学以便使科学与宗教“调和”（即服从宗教）。

教皇庇护十世继续坚持这条路线。1904年，他颁布关于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教皇敕书，按照他的说法，目前由于敌视教会的学说流行，需要这样做。

庇护十世在他的反现代主义文告中还建议僧侣在神学院和天主教学校中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精神传授神学和哲学。

天主教的主教们不可能直接了当地反对科学。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代表大会常常作出关于宗教与科学“合作”、它们之间不存在矛盾的决议。1907

年，在红衣主教迈尔西埃、M·马菲和拉姆波拉的倡议下建立了促进天主教徒科学进步协会。

然而，这一切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个固定的目的——将科学变为神学的婢女。

教皇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愈来愈多地插手科学，为的是利用科学巩固宗教。这一情况证明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地位的虚弱。

资产阶级对天主教的向往

弗·伊·列宁在1913年写道："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衰老的资产阶级与一切衰败了的和正在衰败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陷于动摇状态的雇佣奴隶制。"①

十九世纪末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对天主教的向往和天主教的"复兴"，并不说明天主教在人民中的地位加强，而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虚弱和缺乏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49页。

信心及其反动性的日益增长。

克·阿·季米里亚捷夫在1909年写道："……腐朽的资产阶级与日暮途穷的形而上学日益接近，甚至不惜与神秘主义和黩武的教会结盟……"①

50 在说明二十世纪初期科学状况的特征时，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指出："……然而不单是科学成就引起了每个善于深思细想的观察者的注意。与科学成就同时出现了科学思维退化衰落的明显迹象，而这正是旧世纪结束新世纪开始的一般反动转变的具体表现。这就是那些教权主义形而上学高潮中产生的明显返祖性(退化)的流派，它们的表现是追求奇迹的兴致勃发(洛治)，由理性向本能(直觉——柏格森)的倒退；还有倒退到生机论和颂扬生物学中的孟德尔主义，相信瓦拉穆驴（超人之马）的复活，以及其他种种人类智慧的失常现象。在细心的观察者看来，这些科学思想退化的迹象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与此相同的变化，不过是早有预谋的教权主义——资本主义的

① 《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文集》，第9卷，第100页。

政治反动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一切黑暗势力都勾结起来，反对两种主宰未来的力量：在思想领域——反对科学，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社会主义。只有在神智混乱的基础上，这一黑暗与暴力的捍卫者的联盟才能够期望自己成功……"①

天主教的一系列特点引起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注意。这些特点是：一、对一切新事物、对进步运动、科学理论，首先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誓不两立的态度；二、保留中世纪的全部宗教感化武器，包括迷信圣徒，相信奇迹，等等；三、有比较便于利用宗教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强大而集中的教会组织；四、最后，有进行社会蛊惑性宣传和从思想上俘获群众的丰富经验。

天主教信徒的人数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显著增加。到1910—1911年，全世界天主教徒的人数达到两亿九千万，1956年又增加到四亿七千万。② 在世界人口普遍增加的情况下，许多其他宗

① 《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文集》，第9卷，第18页。

② 《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第4卷，土宾根，1913年版，第2215页；《美国年鉴》，纽约——芝加哥——华盛顿，1957年版，第676—677页。

教教徒的数量也增加了，但没有达到天主教那样的程度。应当特别指出在新教居民占优势的国家中，如美国，天主教徒人数增加的情况，根据官方教会资料过分夸大的统计，最近五十年来美国51天主教徒人数的变化情况如下：1890年——七百三十万，1906年——一千四百二十万；1916年——一千五百七十万；1926年——一千八百六十万；1936年——一千九百九十万；1944年——二千三百四十万；1956年——三千三百五十万。①

同时还要指出，美国天主教徒人数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外国移民。天主教历史学家写道，加入天主教的人数"太少，甚至没有脱离天主教的人数多"。②

随着天主教徒人数的增加，建立了强大的天主教会组织。在美国，自1884年至1921年天主教神甫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人，主教辖区由五十五个增加到一百多个。③一百年前，美国总共只有

① 根据《商务部，宗教团体调查》资料，华盛顿，1926年、1936年；《美利坚合众国统计概要》，1955年；《美国年鉴》，1957年。

②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612页。

③ 同上，第523页。

四万五千名左右的天主教徒和三十名神甫。1900年，天主教徒人数增加到一千万人，而神甫人数——一万一千六百名。①

英国资产阶级与贵族和一部分英国国教高级僧侣，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也明显地流露出对天主教的向往。英国国家教会——英国国教——与罗马天主教会在许多教义问题上观点不一致。这些分歧溯源于十六世纪。英国国教不仅否认教皇在教会中的最高权力，而且认为，罗马关于炼狱、赦罪符的学说、对圣像和干尸的崇拜和敬仰、对圣徒的敬仰，纯属“臆造，无经典根据，尤其违反上帝的旨意”。这些话见于1571年国会通过的表达英国国教信条的所谓《三十九条》中的第二十二条。

这些和其他一些被英国国教批驳过的天主教法规，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引起一部分英国贵族和高级僧侣，即所谓“高等教会”代表的向往。

---

①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慕尼黑，1933年版，第494页。在以后几十年中，天主教会人员增加得更多了。据1955年资料统计，美国有四万八千三百名天主教神甫（见《美国年鉴》，1957年，第676页）。

“获得选举权而具有政治力量的下等阶级正在悄悄地摆脱宗教影响，因此而担心的英国国教神甫自问：怎样取得这些阶级的信任呢？神甫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福音教派激发感情的手段，应当重新采取天主教惯用的方式：缭绕的香烟、52 豪华的仪式、对童贞女马利亚和圣徒的崇拜……世俗人随着他们对自己信仰的新教的放松而对此逐渐习惯。既然他们应当有宗教，而且有一种使神甫不让他们考虑教条的宗教，他们当然愿要令人喜闻乐见仪式的宗教……”①

早在1875年，教皇就将1834年转入天主教的原新教神甫威斯敏斯特大主教曼宁晋升为红衣主教。由英国国教转入英国天主教的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是纽门。利奥十三世在1879年将他晋升为红衣主教。

纽门和曼宁在英国国教僧侣中都有拥护者。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高等教会”拥护者中产生了一个与教皇妥协的计划。到罗马去的代表团力图说服利奥十三世承认英国国教神甫职位从

① Э·加列维：《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史》，第1卷，莫斯科，1937年版，第157页。

教规观点来看是有效的。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英国统治集团与梵蒂冈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更加密切合作。在不列颠帝国居民中当时有两千万天主教徒，其中只有二百五十万居住在英国本土。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统治阶级在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上需要梵蒂冈的支持。例如，教皇曾大力援助英国资产阶级镇压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天主教增强的过程自十九世纪末期也在德国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1881年波美拉尼亚湾的路德派教会事务协商会议上，有一位路德派教权主义代表克莱斯特-列佐夫伯爵声称，必须在路德教徒中建立象“最有益、最美好、最值得崇敬的圣耶稣天主教会”，即耶稣会那样的“团体”。参加会议的路德派神甫对这个建议鼓掌欢迎。于是，在路德故乡的路德派教徒中便出现了耶稣会的捍卫者，而耶稣会的建立却首先是为了镇压路德派的。①

---

① «欧洲导报»，1881年12月，第880页。

53　天主教在德国的传播情况有下表为证①：

年份	德国人口	其中	
		福音派教徒	天主教徒
		百分比	%
1871	41,052,792	62.31	36.21
1910	64,925,993	61.59	36.69

普鲁士的天主教徒人数比德国其他部分增长得快，自1871年起到1910年止，天主教居民由33.5%增加到36.3%。

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天主教中央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便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领导党。它在内政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上一贯支持政府，特别支持德国军国主义化的政策、建立强大的海军、给军队拨款，但常常随机应变，有时乔装“反对派”。中央党依靠教会组织进行活动。天主教会以对社会民主主义毫不掩饰的敌视和对德皇的矢忠博得德国统治阶级的青睐。每年一度的全德

①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7卷，科隆，1930年版，第360—361页。

天主教大会（“天主教日”）提出，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是教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1903年8月，科隆大主教费舍尔红衣主教在第五十届全德天主教大会上发言，他说，“政变的精灵”正在从事破坏御座和祭坛的活动。因此，德国一切信奉基督的人们都应该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地为反对这一危险而斗争。[①] 红衣主教费舍尔所指的“危险”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天主教甚至引起沙皇俄国某些东正教教会人士的向往。彼得堡神学研究院的机关刊物《教会通报》在1911年9月写道：“最近我们的宗教界有人怀着某种羡慕的心情注视着天主教和天主教会组织。令人神往的当然不是它的精神实质（东正教神学研究院的机关刊物不能不作这样的声明——舍英曼），而是它的外部形式，这些形式显然是使天主教对信奉该教的各族人民具有相对的声望和影响的保证。”[②] 54

在梵蒂冈和梵蒂冈的机构中，特别是在外交、宣传和传教机关中占据了一切关键地位的耶稣会

① 《欧洲历史年鉴》，1903年，第125—126页。

② 《教会通报》，1911年，第35期，第1079页。

士，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在天主教会内部起的作用比以前更大了。耶稣会士的人数也大大增加。1870年耶稣会计有七千五百二十九名成员，1906年——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四名，1909年——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九名，1950年——三万零九百五十名。美国耶稣会士人数的增长尤其明显：1870年这个国家有三百五十名耶稣会士，不到全会成员总数的5%；1955年美国有七千九百名耶稣会士，超过该会成员总数的25%。

德国元帅瓦德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在1903年5月随德皇威廉访问梵蒂冈时同耶稣会总会长Л·马丁的谈话。元帅写道，耶稣会总会长特别称赞美利坚合众国，说美国以最友好的方式欢迎耶稣会，其次称赞英国，说英国在它的殖民地得到耶稣会"很多好处"①。马丁在同瓦德西谈话时还说，耶稣会特别重视与社会主义作斗争这一社会问题。最后这一点使耶稣会士的活动在资产阶级眼中显得特别重要。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天主教会及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斯图加特——柏林，1923年版，第213页。

其有关的机构，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愈来愈积极的作用，教会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建立起各种各样的联系，教会开始坚决地争取控制学校。

同时，每个国家的教会也在不断地适应本国的条件。

帝国主义时代特有的民族主义精神也深深地渗入宗教组织，尤其是在事关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别国资产阶级时，作用特别明显。

“普世性的”罗马教会实际上分裂成了国家性的教会，它们之间往往爆发尖锐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反映各国资产阶级利害冲突的各国教会之间的斗争也波及梵蒂冈，在这里，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天主教主教(他们的靠山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为自己争权 55 夺利。二十世纪初期，在美国主教中间（大主教阿兰德）出现了一种想法，认为教皇不应当再是意大利人，而外国人，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天主教徒，应该更多地参加教廷的管理工作。[1] 驻梵

① 《教育部通报》，1901年9月，第47—48页。

蒂冈俄国公使布拉策尔在1911年11月写道，由于红衣主教中非意大利人人数增多，现在已经开始谈论“选举非意大利红衣主教当教皇的可能性”①。

梵蒂冈与教会的统一问题

十九世纪末，各基督教会联合的倾向和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不同宗教相互接近的倾向逐渐强烈起来。梵蒂冈也日益积极地为争取一切基督教会归教皇管辖而奋斗。各种教会在共同反对人民中日益增长的无神论思想和对宗教冷淡态度的基础上，在教会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斗争的总纲领下，形成了它们之间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教会领导集团中，十九世纪末期已经产生了建立“统一宗教”的思想。

1893年9月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神道教、婆罗门教、佛教和许多其他宗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0，第134页。

教的代表。大会发言和决议的基调，是要求一切宗教联合起来。尽管基督教会的个别代表证明基督教的优越性，但是他们的发言没有得到大会的支持，会议宣布，拒绝把多神教看作不过是“低级下流的迷信的东西”；会议宣称，“说基督教完美无缺，而其他宗教一无是处”，是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说：“最好的宗教必将出现，最终它将在其他一切宗教消亡之后继续存在，因为它包含着一切其他宗教中符合真理的东西。”

英国国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领导机关，对大会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大会认为各种宗教一律平等，都具有真理的成分，这样就贬低了基督教。不过，象红衣主教吉邦、大主教阿兰德、拉扬这样一些美国天主教主教，都参加了大会筹备委员会和大会的工作。① 大会结束不久，美国宗教界便兴起了争取建立能够联合各种不同宗教信徒的“普世教会”运动。

梵蒂冈对这些计划，象对宗教大会一样，持

① 见帕蒂克·亨利·艾亨：《美国的天主教大学，1887—1896年》，华盛顿，1948年版，第67—68页。

否定态度。利奥十三世在1895年致美国主教的信中写道，天主教徒应当单独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① 梵蒂冈不反对基督教会联合的思想，但过去和现在的立场一贯是：联合应当通过一切非天主教基督教会归教皇管辖的形式。积极主张教会的这种联合的人是教皇利奥十三世，他认为这是恢复教皇中世纪世界权威的条件。②

1898年2月，利奥十三世接见了当时在罗马的作家博博雷金。教皇在同博博雷金谈论各种问题时，提到了教会联合问题。他"指出"，如俄国驻梵蒂冈代表恰雷科夫的报告中所说，"他真心诚意地准备承认不仅是东方教会的全部习俗和仪式特点，而且还有教义方面的特点。"恰雷科夫说，教皇追求的预定目标是："利用东正教教会组织的软弱和缺点达到使它服从统一的罗马纪律的目的。"③

① 见帕蒂克·亨利·艾亨：《美国的天主教大学，1887—1896年》，华盛顿，1948年版，第67—68页。

② 见E·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1903年》，柏林，1950年版，第19及以后几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66—167页。

利奥十三世准备承认东正教会教义方面和其他的特点，但要求东正教会承认教皇对它们的最高权力。

斯福尔扎伯爵说，当他在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大使馆任随员期间，他的长官曾委托他同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约基姆三世就利奥十三世的通谕，讨论教会联合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之后，总主教说："利奥十三世的想法是很高尚的，我祈祷上帝，愿它实现。但有哪些阻碍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罗马主教的虚荣心。"①

实际上却有更深刻的原因，曾经阻挠并正在阻挠教会的联合。不过，罗马教皇的虚荣心，更确切地说是野心，确实也很大。 57

1894年6月20日，利奥十三世"向各国君主与各族人民"发布通谕。他写道，在整个世界上传播基督教是他最大的愿望。由于他——教皇，在地上占据着"万能上帝的地位"，所以竭力引导世人走向"神圣信仰的统一"。但是，还有为数众多的人们"游离于天主教之外"，一部分人"误入歧

① 卡·斯福尔扎：《五十年来巴尔干的战争和外交》，纽约，1940年版，第182页。

途”。教皇首先向东方呼吁：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的分歧并不大，他说：“同我们的意见不一致的主要问题，是罗马第一主教应居首位的教义。”教皇肯定地说，罗马主教在教会中居于首位是基督的安排；而教皇的最高权力曾有许多宗教会议承认。他号召东正教会同罗马教会重新联合并恢复统一，而且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教会的权利、特权和仪式将不会变动。

在这篇教皇通谕中，利奥十三世还向各斯拉夫民族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同天主教会恢复统一。对不久前“脱离罗马教会的”各族人民，即新教教会的拥护者们，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教皇通谕还号召教会和国家统一，因为“来自共济会的”“巨大危险”威胁着……“共济会”曾经是利奥十三世借以吓人的工具。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名词，却成了他的继承者们借以吓人的工具。

利奥十三世写道，教会和国家和睦相处对双方有利，因为教会“善于适应时代的各种变化进行活动”。他写道，社会时刻受到社会与政治危险的威胁。教会“根据福音书”来解决社会问题。

至于政治问题，按照教皇的说法，教会更可以给予特别有益的指示，因为教会一贯教导，“权力来自上帝的安排”，“理性本身承认，合法的统治权主要地是属于一部分人，而服从的义务则主要地是属于另一部分人。”①

所以，利奥十三世的通谕不仅说明教会在教皇统治下联合的好处，而且说明，天主教会使信徒养成服从当局、乐天知命的习惯，对统治阶级 58 多么有益。

利奥十三世不指望东正教会响应他的号召，对合并派教会却寄予巨大的希望。1894 年 12 月，教皇发布《关于赞同和确认东正教会的仪式与纪律》的新通谕。在重申自己力求达到教会联合的意图之后，利奥十三世宣布，他打算赞同“东正教会本身纪律的完整性”、它们的仪式、弥撒。通谕中有关于地方天主教会与合并派教会相互关系的制度的指示。教皇要求对合并派教会的特点表现出容让的精神。

利奥十三世不仅对东正教归顺教皇抱有幻

① 《教皇利奥十三世关于教会统一的通谕》，圣彼得堡，1895 年版。

想。他还在1895年4月向英国人发出通谕，提到他们在中世纪时同宗座的关系和后来“可悲的分裂”，并表示，希望“对邪说的厌恶”与对（同罗马天主教会）重新合并的渴望占上风。①

利奥十三世的继承者教皇庇护十世，继续执行使基督教会服从罗马管辖的方针。1910年12月，庇护十世向驻东方的宗座代表致函谈教会联合问题。声称他象前任教皇利奥十三世一样也是教会联合的拥护者，他反对在教义问题（父子共发圣神、教皇权力、马利亚“无玷始胎”、炼狱，等等问题）上对东正教会让步。

庇护十世还非常重视虽然保留着东正教的仪式和礼节，但承认教皇统治权的合并派教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赞成合并的运动在保加利亚②、罗马尼亚③活跃起来。

---

①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第489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政治档案全宗，1913年，案卷1074，第309页；案卷1351，第143—144、169页。1908年12月，俄国驻梵蒂冈公使萨宗诺夫向伊兹沃利斯基书面汇报他同梵蒂冈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红衣主教的谈话，他们谈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奥匈帝国的合并问题，与此有关的天主教会在那里的情况，以及当地主教打算发起赞成同罗马教会合并的运动的传

梵蒂冈尤其重视在加里西亚宣传教会合并，59
教皇把这个地方看作在俄国宣传教会合并与传布天主教的起点站。由于梵蒂冈这样重视加里西亚的教会合并宣传，所以舍普季茨基伯爵被提升为加里西亚合并派教会的都主教，他实际上是梵蒂冈在俄国组织教会合并的全权代表。

关于舍普季茨基的情况，萨宗诺夫在1907年5月由罗马给伊兹沃利斯基发出的紧急报告中写道，罗马教廷“同意任命他为都主教，只是因为对他有特殊好感的奥地利皇帝坚持这种主张。”④

1908年4月萨宗诺夫报告，梵蒂冈对教会合并问题，尤其是对俄国教会合并前途⑤的兴趣，

说可靠程度如何等等。麦里·德尔·瓦利说，主教们确实想在这些地方组织这种运动，但至今尚未进行认真的活动。关于这个问题，萨宗诺夫写道，毫无疑问，一旦时机成熟，教廷将动手实际解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教会合并问题，并“将得到奥匈帝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3，第305—306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政治档案全宗，1910年，案卷691，第48页。

④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9，第161页。

⑤ 同上，案卷23，第81页。

更加浓厚了。为了弄清在俄国进行教会合并宣传的可能性，舍普季茨基在1908年秋季使用假护照到俄国去了一次。[①]他曾企图说服旧教教会归顺教皇。[②]

在梵蒂冈的权势集团中，有人主张在教义问题上向东正教会让步，以便把这些教会吸引到教皇方面来。现存有关于彼得堡电讯社代表同“罗马教会高级官员”（文件页边上有人写了“红衣主教列多霍夫斯基”几个字）在日内瓦就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互相接近问题的谈话的1916年10月13(26)日呈文（“绝密”）。[③]“罗马教会高级官员”表示赞成天主教会同东正教会和英国会教会接近并且合作。“按照天主教高级官员”的意见，教义方面的差别（呈文中说）无论如何不能妨碍互相接近，起码在天主教会看来是这样。

这些教义方面的差别，例如父子共发圣神的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6，第49页。

② 同上，案卷26，第51—52页；同上，特别政治处全宗，1915年，案卷161，第42页。

③ 呈文中附带说明，同彼得堡通讯社代表谈话的人闻名于天主教界，“谈话在信任的气氛中进行……”

补编，产生于愚昧的中世纪时期，那时，隐修士们由于无事可做而过分热烈地、徒劳无益地醉心于他们智力所不及的而又不应当研究的问题……”① 呈文中说，教会高级官员这些话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位“天主教信仰纯洁性的维护者认为所有这一类曾经是绊脚石的问题，现在都是空洞无用的废话……”②

虽然教皇在最近五、六十年期间尽了一切努力，教会联合仍然没有实现，不仅由于宗教上的分歧，而且还有政治原因：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制造了并正在制造各国教会之间的矛盾，尽管这些教会同属于一种宗教。

同时，反对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教会合作，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形成了。

天主教影响的衰落

正当宗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政治作用和在一部分城乡居民中的影响加强的时候，日益深刻的宗教危机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形成，宗教机关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04，第9页。

② 同上。

开始失去它们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间的影响。

在宗教衰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和企业家的压力、传统和资产阶级社会舆论的力量始终起着遏止作用。

帝国主义时期特有的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的贫困化、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军事冲突的危险——这一切都是产生宗教信仰和促使劳动人民保留宗教信仰的因素。然而另外一种人——被生活擦亮了眼睛，认清宗教在社会中的真正作用的人，也同时在增多。弗·伊·列宁说过："现代有觉悟的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争取人间的更美好生活。现代无产阶级站到社会主义方面。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信仰。"①

宗教危机由一系列原因造成，其中主要的是：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3页。

对周围世界的现代认识水平与宗教世界观之间的矛盾，人类大多数在改造社会的事业中所面临的[61]任务与宗教本身所抱的目的之间的矛盾，最后，还有宗教训示与教会及其他宗教机关的实践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日益广博的宇宙知识与宗教宇宙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并不妨碍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坚持宗教观点。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神秘主义和宗教的向往是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个特点。资产阶级把宗教当作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加以重视，他们的阶级偏见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传给这些学者，但他们在实践中，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却象无神论者那样进行工作。这些学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资产阶级的旧口号——“宗教是人民的需要”。

广大人民群众对宗教的冷淡和否定态度，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日甚一日。经过阶级斗争教育和社会主义政党宣传教育的工业无产阶级，比其他劳动阶层更快地认清了宗教与现代的矛盾、宗教训示与宗教机关实践的矛盾、宗教的目的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目的之间的矛盾。这更加促

进了一切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危机。

欧洲某些国家天主教危机加深，是有一系列特殊原因的。

在法国，反对保皇派搞阴谋、保卫共和国的斗争，反对宗教团体把持一切、争取国家的世俗性质、争取世俗教育的斗争，使广大劳动群众时常与阻碍社会进步并把社会拉向后退的教会组织和反动僧侣发生冲突。此外，工人阶级在捍卫自己的迫切要求时，总是遭到教会的仇视。结果，宗教在法国工人阶级中就大大地衰落了。

在意大利，教皇和保守的天主教人士差不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反对国家统一，主张把意大利分裂成一些小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反教权主义在意大利社会各阶层中的广泛流行，便是对教会这种立场的抗议。

在 1900 和 1914 年期间，与教会的尖锐斗争也在西班牙开展起来。国家和教会之间发生的磨擦，终于导致了各阶层广大人民与教会组织的冲突。同教会的冲突是围绕着限制修会势力、剥夺它们的特权并要它们与一般世俗团体平等诸问题

62

而产生的①。俄国驻梵蒂冈公使布拉策尔在1910年5月写道，“这个要求其实还得到工业界出于物质性动机的支持，他们看到许多修会中有他们危险的竞争者。”② 西班牙政府同梵蒂冈关于修会的谈判于1904年结束并达成协议，其中规定凡1851年宗教条约上未提及的修会，一律应当服从一般结社法。这项协议使一部分修会失去了特权。

与教会的分歧并未就此告终；1906年及以后，分歧又围绕着承认不按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僧侣管理墓地的权力、对修会进一步限制③ 等问题以及国家承认非天主教信仰等问题爆发出来。

资产阶级为削弱教会的经济特权而与它进行争执，但最后同教会达成了协议。然而，在西班牙人民群众中积蓄了千百年的对教会剥削者的抗

---

① 二十世纪初，西班牙修道院占有的财产，价值十五亿丕塞他（西班牙本位币名——译者注）。修道院拥有当局无权干涉的企业。教会一年的收入有七亿七千三百万丕塞他。教会每年还向国家领取四百四十万丕塞他，同时，国家还为掌握在教会手中的国民教育支出八百万丕塞他（《欧洲导报》，1910年8月，第341—343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7，第57页。

③ 同上，案卷17，第189页。

议，有时却爆发为公开的行动。例如，1909年7月，巴塞罗那的工人就以全面罢工和巷战来回答政府宣布后备兵参加同摩洛哥人作战的动员令。工人斗争的矛头也是指向教会和修道院的。茅拉教权派政府对这些行动进行血腥的镇压。教权主义分子乘白色恐怖之机在当年10月份枪决了他们痛恨的进步教师、为世俗教育而奋斗的战士弗兰西斯科·费勒尔。① 枪杀费勒尔的卑鄙勾当在63许多国家引起了群众性的抗议。②

① 天主教阵营中的历史伪造者们硬说，费勒尔是巴塞罗那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暴动时似乎有不少于六十五座教堂和三十一所修道院被焚烧，他是根据“正确进行的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和政府的决定被枪毙的。例如，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历史学家巴赫姆就是这样为卑鄙镇压费勒尔开脱罪责的（见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7卷，第329—330页）。实际上，费勒尔没有参加巴塞罗那事件（见《欧洲导报》，1909年11月，第409—410页）。何况他还是一个革命斗争的反对者（见P·拉穆斯：《弗兰西斯科·费勒尔》，纽伦堡，1929年版）。西班牙耶稣会士利用合适的时机杀死了他们痛恨的进步教师、世俗教育的拥护者。

② 1909年10月13（26）日，布拉策尔向萨宗诺夫写道，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在同他谈话时声称，罗马举行的同情费勒尔示威游行，是由于“这里接到法国共济会会员发出的命令”引起的（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6，第115页）。

1910年6月，西班牙颁布法令，允许今后使用表现非天主教团体宗教信仰的题词、旗帜、标志、布告和其他这类外部表记。这意味着非天主教宗教的合法化。梵蒂冈认为这项法令是对西班牙天主教垄断权的打击，因而立即表示抗议。① 梵蒂冈抗议国家承认其他宗教，因为它仍然站在中世纪的立场上，不仅不容忍自由思想和无神论，而且不容忍非天主教的基督教徒。

梵蒂冈、西班牙僧侣和国内支持他们的反动集团，在教堂中举行示威，反对自由派政府采取对天主教会的垄断稍加限制的谨慎措施。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教会和僧侣的敌意强烈起来，有时通过自发的反教会示威游行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庆祝宣布信仰自由的示威游行吸引了数万名参加者。②

千百年来，天主教在西班牙人民的生活中起了极其阴暗的作用，二十世纪，它继续起这样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已有大规模的反教会运动，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包括同教会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7，第72页。

② 《欧洲导报》，1910年8月，第344—345页。

有宗教关系的人）对天主教所起作用的回答。

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葡萄牙也曾发生过人民反对天主教会的群众性运动。天主教会对1910年资产阶级革命、对推翻君主制建立葡萄牙共和国抱敌对态度。在君主制统治的最后几年，耶稣会士对王权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全国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临时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颁布了驱逐耶稣会士出境的法令。

在1910年12月24日的牧函中，葡萄牙主教64团宣布临时政府驱逐耶稣会士，取消宗教宣誓和学校中的宗教课，承认离婚合法等法令是“非法的”。耶稣会士在国内组织保皇派的阴谋活动。

庇护十世也发布教皇通谕反对葡萄牙国家同教会分离，并谴责共和政府的活动。天主教报刊开始登载关于葡萄牙“宗教迫害”的文章。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代表H·博克写道，关于八百名葡萄牙神甫同意承认国家同教会分离的法律，叛变梵蒂冈的消息，对梵蒂冈来说是一件“出乎意料而又不愉快的”事。“这样一来，”博克写道，“全体葡萄牙神甫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投到共和国方面。这种情况给天主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

重新分裂的危险。”①

葡萄牙天主教主教们终于适应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并恢复了自己原来的特权地位。但是，1910 年革命时期教会和人民之间明显出现的鸿沟却依然如故。

综上所述，某些欧洲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发生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与天主教会和梵蒂冈的尖锐冲突。冲突以建立合作而告终。这些冲突显示出，广大人民群众往往在表面上对教会表示顺从和忠诚(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而实际上对教会及教会机构怀着深切的敌意。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工人阶级与教会之间形成了特别深刻的裂痕。罗马教廷采取各种社会蛊惑宣传手段，以便把工人争取到教会方面来。然而所有这些创举都未能奏效。

“宗教的迅速衰落，”威廉·福斯特写道，“是最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②“宗教解体正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着，甚至在执政的资产阶级为达到剥削的目的而坚决利用一切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31，第 46 页。

② 威廉·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第 115 页。

可能利用的手段培养和保持劳动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国家中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宗教解体进行得尤其迅速。”①

保尔·拉法格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1909年）中写道：“当宗教感情在资产65阶级各个阶层中已经根深蒂固并通过千百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在工业无产阶级中却出现了本能的、但不可动摇的宗教冷淡。布斯先生在对伦敦的宗教情绪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一个区一个区的，一条街一条街的，常常还挨家挨户的调查’——之后说明，‘人民群众确实不信仰任何宗教并且对宗教仪式完全不感兴趣……称作工人阶级并介于小资产阶级与乞丐阶层之间的相当大的那一部分居民，完全处于各种教派的影响范围之外……他们习惯于把教堂看作富人和希望得到地位优越者庇护的人集会的场所……温顺和犯罪感也许和工人本性格格不入。’这就是通常认为如此笃信宗教的伦敦工人本能地不信仰宗教的确定无疑的事实。最肤浅的观察者在法国工业城市中也

① 威廉·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第118页。

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如果在那里遇到伪装出宗教感情或真正具有宗教感情的工人——后者很少——的话，那么，宗教是通过各种慈善事业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在宗教方面的冷淡态度这一最严重的，按照拉梅耐的说法，不信神的症候，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天性……欧美的工业无产阶级既没有表现出创立新宗教以代替基督教的愿望，也没有改革基督教的要求……"①

1903年，《每日新闻》为了弄清礼拜日（犹太教是礼拜六）上教堂、犹太教堂和其他祈祷场所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在伦敦被调查的二十九个街区中，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居民在礼拜日到祈祷场所去。②

"……民主机构的发展，"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写道，"迫使如此乐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民族的英国人相信了一个他们从前由于轻视平民而不屑于注意的情况：英国信仰宗教不过

---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3卷，第163—164页。

② 《欧洲导报》，1904年11月，第39页。

是社会上层人士特有的表面现象。"①

66 天主教会敌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使劳动群众对它更加疏远了。

1910年8月，柏林召开全世界"自由基督教与宗教进步"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神学界著名代表人物。在这次大会上，许多参加者承认，教会由于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维护现存制度而失去了工人的信任。②

基督教社会运动活动家、萨克森大补祭瓦尔特·克奇克在到工人中间进行专门访问所得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了工人用以反对教会的论据集录。我们从中引出以下几条：一、教会与阶级国家密切相关；反对国家的人也反对教会；二、教会是一支反动力量，它阻止对现代国家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改造；三、神甫是国家的奴仆；适合于他的成语是"吃谁的饭听谁的唤"；四、神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敌人。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正义事业，反对提高工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五、

① Э·加列维：《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史》，第1卷，第149页。

② 《欧洲导报》，1911年2月，第340—341页。

教会支持现存制度，称它为“和平秩序”，虽然它混乱得一塌糊涂；六、教会的慈善事业不能够使工人容忍它。工人不要恩赐，而要求他们有权得到的东西。必须创造条件，使慈善事业成为多余之举；七、教会使工人处于愚昧状态，把创造世界的圣经神话献给人民；八、阴世并不存在，因此应当在现时把生活安排得又好又美。①

十九世纪末期，各国开始出现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的组织并召开全国的和国际的自由思想者代表大会。虽然这些组织没有明确的纲领，并且还有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它们的活动，但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逐渐扩大。自 1880 年起到 1913 年止，举行了十七次国际“自由思想”大会。在 1880 年布鲁塞尔举行的大会上，威廉·李卜克内西同毕希纳和摩莱肖特一起参加了建立国际自由思想者联盟的工作。

对待宗教和教会的态度问题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上曾经讨论过。当机会主义分子开始在第二国际的政

① 《欧洲导报》，1911 年 2 月，第 338—339 页。

党内逐渐占上风时，他们也以机会主义精神解决党对宗教的态度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提交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中的其他要求进行批判时，也批判了与宗教有关的要求。草案的有关条目中写着："信仰自由"。因此马克思写道："'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象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①

在1891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中，关于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写道："……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取消国家用于宗教和教会事务的一切拨款。教会和宗教团体应当被看成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3—24页。

务上完全独立的私人团体。"恩格斯认为，这种要求不符合工人党的利益和任务。他在1891年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爱尔福特纲领》）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纲领："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并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①

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是就其对国家的关系而言，并非对党的关系。他在1891年脱稿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

在谈到巴黎公社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的法令时，恩格斯写道，公社"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 68
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②

关于恩格斯对待社会民主党内认为宗教对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77页。

② 《法兰西内战》，中文版，第7页。

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种机会主义观点的态度，列宁说明如下："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虽然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争辩，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辩论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①

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对待宗教和教会的态度问题，列宁写过许多著作。1905 年他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一文中写道："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觉悟的先进战士争取工人阶级解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2 卷，第 377 页。

放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正是为了要反对任何通过宗教来愚弄工人的行为。从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①

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的拉法格和盖德、德国的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俄国的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美国的丹尼尔·德莱昂、 69 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表著作，对宗教和教会，尤其是天主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社会民主党的无神论宣传帮助工人认清了宗教在社会中的真正作用。这导致一批批工人与宗教组织断绝关系，从而加深了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危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3、64页。

70

第二章 罗马教廷和工人运动

利奥十三世和教会“社会”活动的加强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罗马教廷便被社会主义运动的节节取胜弄得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就认真关心起工人问题来。这种关心出自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的深切担忧。

在帝国主义时代，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便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已成为一项实践的任务。从事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使其能去实现这一任务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在十九世纪末就已在许多国家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资产阶级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来阻挠工人阶级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开足国家机

器的马力，动用警察、军队和非常法来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资产阶级根据德国的经验深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不能阻挡社会党人把相当大数量的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政党周围，因而确信：只用镇压的方法不能窒息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们在不放弃镇压手段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采用其它斗争手段来对付社会主义，首先是分裂工人运动，向工人阶级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瓦解工人运动。

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搜括来的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促使工人贵族的形成，依靠他们的帮助，向群众灌输改良主义思想。弗·伊·列宁写道：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 71 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拿出一小部分掠夺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保证他们在平时可以过普通的小市民生活，并雇佣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①

机会主义分子宣扬“改良”和“纠正”资本主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57页。

义。他们力图证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不是尖锐起来，而是缓和下来。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呼吁"阶级合作"，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正在进行。他们的全部宣传和活动都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削弱了革命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书信中曾尖锐地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之流）。这些人建议把为党的纲领而进行的斗争"推迟"到渺茫的将来，暂且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些可怜的修补工作，以免吓坏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74页。

恩格斯在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谴责了那些“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① 的机会主义分子。

机会主义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弗·伊·列宁写道：“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敌人……”②

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到工人阶级中来的不仅仅是参加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本身也力图通过自己的各种组织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到工人群众中。从十九世纪末 72 起，各教派的宗教团体也都致力于此，而且规模甚大。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对资产阶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各种宗教组织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人民中间颇有影响，并有对人们进行思想感化的各种手段和经验。

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十九世纪末以来从教皇利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73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57页。

十三世开始的反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在罗马教廷的全部宗教政治活动中占有中心地位。

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为1878年至1903年。这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的年代。弗·伊·列宁在论及1872—1904年这一时期时写道："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①

这些年代正好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时期。这位教皇梦想恢复罗马教廷的中世纪的盛世，梦想将由罗马教廷来充当各国间法律纠纷的国际仲裁人的时代的到来②。俾斯麦讨好教皇，满足其虚荣心，在同西班牙争夺加罗林群岛的冲突中选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38—439页。

② 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1747—1920年》，慕尼黑，1954年版，第351页。

他为仲裁人。教皇对此喜出望外。然而，罗马教廷政治强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在政治上的野心与各国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罗马教廷只有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才能指望多多少少满足自己的要求。罗马教廷仅仅在一个方面能得到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各国资本家的无条件的支持，这就是同社会主义作斗争。

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颁发教皇通谕有三十多次，几乎在教皇的所有这些言论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号召同"离经叛道思想"即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同社会主义作斗争。

教皇在其 1878 年 4 月 21 日的第一号通谕(《深奥莫测的天主》)中，即谈到破坏教会威望和 73 危及国家的"社会秩序的敌人"。他所说的"社会秩序的敌人"指的是那些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们。教皇的另一通谕，即 1878 年 12 月 28 日通谕（《宗徒任务》）包含有尖锐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①。教皇大发雷霆，因为共产

①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1卷，伦敦，1934 年版，第123—124 页；O·席林：《教皇利奥十三世的社会学说和国家》，科隆，1925 年版，第46—47 页。

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拒不服从最高当局”，“鼓吹在权利和义务上人人完全平等”！这种要求引起了教皇这位剥削者政权卫道士的怒火。他要求各国人民都承认政权神授，对于当局“人人均应服从”。利奥十三世声言，在教会的教义和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社会主义者“坚决主张人与人之间天生平等”，而教会则教诲不平等“源于造物主”。教皇还说，教会始终不渝地向自己的教民灌输如下的使徒圣训：“没有不是神授的政权，现有的政权都是神授的。”

甚至即使君主“滥用职权，天主教教义也不允许擅自造反作乱”。

最令利奥十三世气愤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迷恋暂时的福利”（其实利奥十三世本人就是这样），“攻击财产私有权”，“侈谈其渴望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和满足每个人的一切需要的意图……”。这位天主教会的首脑以老爷式的态度，蔑视人民群众，不承认他们有权满足自身的需要，却声言：企图侵犯私有财产，将其转化为公有财产——真是骇人听闻，因为，

私有财产，按教皇的说法，或是通过“合法的继承”，或是通过劳动，或是“由于节俭”才获得的！教皇声言：教会教诲说私有权和占有权是天生的权利，必须由所有者掌握，不得受任何侵犯和破坏。

教皇断言，灾难的发生都是由于抛弃了“信仰的超自然的真理”，由于人们不再考虑来世的惩罚与奖励。

利奥十三世在其教皇通谕中向统治阶级证明：只有宗教，只有天主教才能保住他们的权力和财产，帮助他们把人民群众控制在羁绊之中。 74

教皇通谕最后声称：有鉴于社会主义者的信徒主要是在工人中间，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们中间，教会就应当与社会主义工会相抗衡，“支持和赞助在宗教的庇护下成立并使其所有成员都安于天命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工会……”就是这样，在 1878 年的这道教皇通谕中利奥十三世即已向教会发出训示，加紧成立分裂性的工会，亦即工贼工会。

害怕社会主义是利奥十三世即位后立即坚持寻求同德国政府就撤销文化斗争法令问题达成协

议的主要原因。利奥十三世在其即位致德皇书中表示希望改善德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在这封信的结尾他说："陛下的天主教臣民都是安分守己忠诚不渝的。"① 也是在1878年，利奥十三世在另一封致德皇书中提到"危及社会、政治和宗教秩序的""毁灭性学说"。教皇写道，为了与之作有效的斗争，德国政府和教会之间需要和解。仍然是在1878年，教皇在致书科隆大主教梅尔海斯时写道，"毁灭性学说""危及社会、政治和宗教秩序已到如此地步，我们认为不给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以教会所掌握的切实有效的救世措施，便不能履行我们的使徒使命的义务。"② 在各项"救世措施"中，利奥十三世指出有必要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和废除文化斗争法令。

1878年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统治阶级对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日益增长怕得要死，而文化斗争法令现在成了联合各种反动势力的绊脚石了。

---

① 《俾斯麦全集》，第8卷，柏林，1926年版，第249页。

② B·索柯洛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天主教会和德国政府》，喀山，1912年版，第319页。

利奥十三世不断地向同梵蒂冈有联系的列强代表证明：所有国家都关心同罗马教廷结盟，因为正是罗马教廷支配着这样一种能有效地对抗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就的力量——教会组织。

1898 年 9 月，意大利政府照会列强驻罗马外交使节，建议召开国际性会议来同"无政府主义"[75]作斗争。利奥十三世虽然一向与意大利政府为敌，但对它想要召开这样一种会议的计划却抱同情态度。教皇 1898 年 12 月 23 日向红衣主教团讲话时声称他欢迎各国政府"建立反毁灭性图谋的堤坝"，但是如果敬畏天主之心不能在人们意识中扎下根来，那么这个目的也就不会达到。

耶稣会总会长 Л·马丁于 1903 年 8 月 1 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大选取胜一事致书德国元帅瓦德西伯爵时写道：所有已采取的企图挫败社会党人的措施，都是不足的，能战胜社会主义的是天主教，因为"只有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才能建立有效的阻挡平民欲海浪涛的防波堤"。马丁写道：天主教"能击败社会主义在人的灵魂深处产生的激情"，因此马丁竭力劝说瓦德西伯爵：要是准许该会重返德国（于1872 年被逐出德国），

它就能施加"有益心灵的影响"，即帮助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马丁劝说道："在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天主教徒同一切保守分子的联合极有必要。"①

利奥十三世向往教皇和三国皇帝(德、奥匈、俄）的同盟，据他看来，这可以作为一条反社会主义的防洪堤。他不止一次地通过沙俄驻梵蒂冈代表建议同罗马教廷结盟反对"危险运动"，反对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沙俄是反动派的堡垒。弗·伊·列宁 1895 年写道："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② 寻求同这个反动的俄国，同沙皇政府结盟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也有利奥十三世。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刚一获胜，罗马教廷就站到新俄罗斯的敌人营垒里去了。

1899 年 4 月，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代表恰雷科夫从罗马报告：教皇向晋谒他的比利时天主教各报主编建议联合天主教各派力量来对付社会党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 3 卷，柏林，1923 年版，第 235—236 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94 页。

人，因为他们，用教皇的话来说，是“天主教和当代国家社会制度的最危险的敌人”。

76

恰雷科夫指出：“现代罗马教廷与反政府的社会主义政党为敌，它的积极作用值得充分重视。”①

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各国的天主教团体都按照罗马教廷的反社会主义方针行事。这些教会团体的领导人竭力以自己和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态度来博取本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

1890年1月底，德国国会讨论政府提出的关于加紧迫害社会党人的法案。1月22日，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文德霍尔斯特代表该党党团在国会上发言，抱怨普鲁士当局，说他们除了警察和武力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反对社会主义的手段。文德霍尔斯特说：“但是我可以断言，思想上的企求，思想，特别是不道德的思想，要战胜它，只有用健全的思想，而不是用鞭子。”② 这位中央党主席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150—151页。

②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六届议会第五次会议，1887—1890年》，柏林，1890年版，第1157页。

所谓的“不道德的思想”，指的就是社会主义思想；而必能“战胜社会主义”的“健全的思想”，则是指天主教。文德霍尔斯特谈到在平息人民群众对其受奴役的处境的抗议时，教会（特别是它下属的各种修会）可能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文德霍尔斯特说，各种修会能安慰今世丧失了幸福的人们，并向他们指出“一种最崇高的东西”（即向他们许愿，保证死后“幸福”）。文德霍尔斯特及其政党指出，教会比起警察和军队来更善于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文德霍尔斯特次日在德国国会上发言时宣称：宗教是反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好手段，在德国，凡是天主教会势力强大的地方，社会党人的成绩就微不足道[1]。据此，文德霍尔斯特要求国家帮助天主教会，并给予它和各种修会以行动自由。

当时，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还有效。1890年10月非常法不得不废除。文德霍尔斯特建议要考虑到这一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痛苦的经验教训，他象教皇利奥十三世一样，推荐更为阴险毒辣

① 《帝国主义听证速记报告，第六届议会第五次会议，1887—1890年》，柏林，1890年版，第1184—1186页。

的反社会主义的手段——宗教和天主教会组织。

1895年1月9日，德国国会再次讨论反社会党人和反社会主义出版物法案。天主教中央党代表格雷贝尔提醒统治阶级：天主教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可靠支柱。格雷贝尔引证文德霍尔斯特1890年1月23日在德国国会发表的演说，承认暴力不能战胜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他本人并不赞成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中完全排除暴力手段。格雷贝尔声称，天主教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有力的工具。他要求废除反耶稣会士法，要求允许教会活动自由，以便全力以赴地参加反社会党人的斗争。格雷贝尔以下面的一番话结束他的演说：在老百姓中间保留宗教才能得救；要是人们不再信仰永恒的真理、天主-审判官和死后的报应，那么诸位将如何使他们作出牺牲和安分守己呢？①

天主教会指出，与其他教派的教会比较，尤其是与新教教会相比较，它有许多优越性。1895

77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九届议会第三次会议，1894—1895年》，柏林，1895年版，第213—226页。

年8月慕尼黑全德宗教会议上国会议员巴赫姆在关于社会党人世界观的报告中声言：因为新教支离破碎，所以只有掌握“全世界”的天主教才是社会主义的劲敌。1898年8月克雷费耳特全德宗教会议上发言的一位神甫扬言：天主教会业已表明它是对付社会主义的“拯救万物的力量”，它甚至在国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也能有效行动，因此这位梵蒂冈的代表人物要求：为了认真对付“大变革”，需要帮助教会并扩大宗教在老百姓中间的影响。

这样的路线为许多国家的天主教会主教们所奉行。天主教会作为一股同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力量积极参加了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已经组织到政党、工会和其它团体里的条件下，天主教主教们决定让僧侣亲自到工人群众中去，并在教会的领导下把他们联合起来。教皇利奥十三世竭力怂恿教会及其所有团体如此行事。

利奥十三世竭力使十九世纪前半叶出现的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适应于帝国主义的条件，而这位如此仇恨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皇本人则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保护人和提倡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 78

“基督教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基本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改造社会以提高人民群众福利的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很久以前就为基督教所宣扬，这种思想的实现，不能通过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所坚持的道路，不能通过阶级斗争的途径，而只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采用提高人们宗教道德水准的办法。

“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作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始终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为敌的。它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们都利用社会主义思想已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这一情况，把似乎是相同的，但却是用基督教教义圣化了并得到教会支持的思想偷偷摸摸塞给群众。“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吹鼓手们广泛采用社会蛊惑手段，起初，在其刚一出笼之时，对资产阶级社会曾经进行比较尖锐的批评，后来，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期，则进行比较谨慎的批评，竭力企图以此取得劳动人民的信任，并使他们离开社会主义运动。

基督教社会主义编造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

谎话，与此同时又竭力使人相信是基督教早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前就首先出来反对不公平，宣告了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各项原则。他们断言，这些原则在福音书里都早有阐明，在早期基督教教会里就已实行，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背离“基督教的原则”，“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这类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才处处占了上风。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原则”似乎首先是由基督教宣布的这种论断，实际上与事实毫无共同之处。同样，他们引证福音书把它们作为似乎是最早宣告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原则的书，也是随心所欲的杜撰。福音书中固然有威胁奴隶主和安抚奴隶的话。但是，福音书却号召奴隶们对奴隶主要服服帖帖。福音书中更没有让奴隶们起来消灭奴隶制的号召，却要竭力使人们相信，当奴隶是上帝为他们安排的命运，他们必须逆来顺受，指望“死后”会有善报。

福音书和基督教会的全部学说的整个精神，正象其它各种宗教的教会学说一样，都不敌视人

79 剥削人的制度和阶级的不平等。恩格斯在批驳那些引证圣经，断言“基督教即共产主义”的人们

时，写道：如果这些人更好地了解圣经，那么他们“就会相信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① 基督教并没有提出以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目的的改造社会的任务。基督教宣扬，人们尘世的种种企求都是徒劳的，号召准备进入“永生世界”，基督教许下诺言说那里是幸福的天堂。恩格斯指出：“早期基督教历史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②，正如工人运动一样，基督教在其产生之时也是受压迫者的运动。不论是基督教，还是工人社会主义，都宣扬将来会摆脱奴役和贫困；然而“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③

早期的基督教团体都相信“千年王国”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到来，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则把它的到来推迟到渺茫的、遥远的未来，那时将发生“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25页。

③ 同上。

的精神自我升华”。

早期基督教作为受压迫者的运动，曾经是革命的潮流，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具有“民主的革命的精神”。这一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吹鼓手们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时力图加以利用。但是早期基督教的民主的革命的精神，被两千年来一直保护奴隶制、以后又保护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所丧失殆尽。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信誓旦旦地要人们相信，教会是工人利益的真正保护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教会始终关心穷人，它在中世纪即已成立专门机构来救济穷人。但同时，他们一开始便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抱敌视态度，而这一斗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唯一能改善劳动人民处境的手段。他们把阶级斗争同改造人们道德精神面貌的说教对立起来，同战胜“利己主义的恶魔”的说教对立起来，而他们所认为的“利己主义的恶魔”就是工人们通过罢工来改善自己处境的渴望。

80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说教的对象不仅是劳动人民，而且还有上层阶级。他们呼吁后者“博爱仁慈”，号召他们关心工人。英国“基督教社会主

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莫里斯写道：上层阶级应当承认工人的人格，并兄弟般地支持他们。这样一来工人消灭阶级差异的迫切愿望也定会消除。英国的另一“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金斯利牧师于1863年以宫廷讲道师的身分向女皇和内侍官们宣讲自己的主张。

“基督教社会主义”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有利于人民的切实可行的改造社会的纲领，因为要进行这种改造势必破坏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而这是违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吹鼓手和提倡者的心愿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混乱”的批判调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蛊惑人心的成份在这一批判中日益占优势），把劳动群众中处于教会影响下的政治上不大开展的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劳动人民中的这些阶层虽然敌视使他们注定受苦受穷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仍然上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吹鼓手们宣传的当。扮演吹鼓手角色的多半是僧侣。

在较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活动家中间也确有这样的人士：他们同情劳动人民并相信争取改善人民群众处境的运动可以由教会领导。然

而，他们的宣传在客观上却是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因为这种宣传有碍于人民群众理解他们受苦受难的真正原因，有碍于他们看清摆脱这种处境的真正道路。

弗朗茨·梅林写道，“基督教社会主义”有两个历史根源：有些情况下，它与带有宗教色彩的“朴素的工人共产主义”早期阶段一起产生（例如卡贝和魏特林），这一层薄薄的宗教色彩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很快就消失了。梅林又写道，在另一些情况下，“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作为封建社会主义的伴随现象而出现在有产阶级中间的。因此它用不着一开始就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宗教思想家可能真心地相信，通过宗教的途径可以帮助贫民和受苦受难者。但是，81 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注定是短命的：它的反动的内容很快就突破了无产阶级的形式。有时它也非常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可是只要一旦触动到剥削制度本身或者开始攻击剥削制度本身时，它就不管怎样总得投降……”①

①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莫斯科，1924年版，第109页。

各教会的主教们，无论是天主教的，还是各派新教的，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宣传，开始时都抱敌意。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中有许多人却又是教会代表人物。教会的领导人对“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所采取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缺点”所做的那种往往是激进的批评，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群众从这些批评中会做出自己的结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主教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后者原来是一种反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非同小可的斗争手段。

“基督教社会主义”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它的社会性质已起变化，不同于十九世纪前半叶的那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它所保留下来的仅仅是原来的宗教躯壳。

“基督教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

“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在吓得统治阶级丧魂落魄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革命事件直接影响下，在

西欧诞生的。它是作为“封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出现的。对于“封建社会主义”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有过光辉的论述。当时充当基督教社会主义宣道士的是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破产（因而甘心充当资本主义“反对派”的角色），并且同时被劳动人民革命运动的规模吓破了胆的封建贵族。

从贵族的圈子里向资产阶级发出了大声疾呼的警告：如果不改善人民的处境，就会发生爆炸性的社会危机。

《共产党宣言》指出：封建社会主义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①

82

法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最有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弗利西泰·罗贝尔·拉梅耐。他在其1833年出版的，模仿新约《启示录》的小册子《一个教徒的话》中写道：“上帝并没有创造大人物和小人物、统治者和奴隶、帝王和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4页。

民。他造的人，都是平等的。"①

拉梅耐愤怒地写到他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必不可免地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贫困时说："狐狸有自己的洞穴，鸟儿也有安乐窝，可是人之子却无栖身之所。"②

然而，他又断言："穷人永远都会有，因为贫穷——这是人们腐化放荡的结果。"他写道："穷人永远都会有，因为人永远不能消除自身的罪恶"，人们只应当"消除自身的罪恶"，也就是说，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这样他们就一定能在社会上消灭奴役现象。

拉梅耐如同许多宗教预言家一样，认为社会上万恶之源是人性的败坏。因而就不可能指出消灭他坚决抨击的那种罪恶的途径。

虽然《一个教徒的话》一书对现状有所批评，对人民所受的灾难有所谴责，但是这一著作的积极方面也是含糊其辞的。拉梅耐并不反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制度，相反地，他还赞成私有制。

---

① 弗·拉梅耐：《一个教徒的话》，莫斯科，1911年版，第39页。

② 同上，第45页。

他写道："消灭贫困的途径并非把他人的财物据为己有……人人都有权保有属于他自己的一切东西。"① 虽然拉梅耐也说，他已看到，人们已经悟出和看出，他们并非被创造出来就是奴隶，于是就起来反抗那些给他们带上枷锁的人们，因而就不再有什么穷人和富人了，但是他所想的反抗并非真正的反抗，而是象征性的反抗。他劝说："如果发生什么对你们不公正的事情，你们首先要做的事便是驱散自己心灵中的任何仇恨的感情。"② 他呼吁祈祷上帝，让上帝来结束不公正的事。这 83 种说教当然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启蒙事业服务的。

但是，就连他著作中所包括的这一点批评成分，罗马教廷也认为是危险的，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于1834年谴责了拉梅耐的这本书，而作者也因此被撤销教职，革出教门。③

拉梅耐在其另一著作《现代奴隶制》中写道："现在无产者对资本家来说是什么呢？干活的工

① 弗·拉梅耐：《一个教徒的话》，莫斯科，1911年版，第46页。

② 同上，第53页。

③ 《一个教徒的话》一书，天主教会至今仍禁止教徒阅读。拉梅耐的这本书和其他许多著作都列入1948年公布的梵蒂冈禁书目录之中。

具而已。他被现行的法律所解放，按照法律规定有人身自由，他已不再是使用他的人可以买卖的财物。但是这种自由是虚假的。人身虽不处于奴隶地位，但意志却是如此。难道可以把只能在可怖的、不可避免的死亡和接受强加的法律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那种意志称作自由意志吗？现代奴隶制的锁链和手段便是饥饿。”①

拉梅耐在这部著作中，正如他在《一个教徒的话》中那样，呼吁人民醒悟过来，抛掉自己身上的奴隶枷锁。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是不要诉诸暴力，不要用革命的方法，他竭力使人们相信："在大自然中一切都是通过发展的途径，逐渐的但却是经常不断的进步来完成的。这是一个毫无例外的规律……因此群众本能地厌恶暴力。"

拉梅耐宣扬：得救在于"基督之爱"，在于加强"人民的道德联系"，在于"他们和平地运用自己的最高权力"等等。

综上所述，拉梅耐虽然也尖锐地抨击了给人民群众带来前所未闻的苦难的资产阶级制度，但

① 弗·拉梅耐：《现代奴隶制》，诺夫戈罗德，1905年版，第7页。

是他为被压迫群众所指出的摆脱这种处境的出路却是不正确的。他宣扬对压迫者讲仁爱，宣扬“精神上的自我完善”等等，并反对唯一能改变现状的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拉梅耐归入“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拉梅耐自己也深信无疑：只是用未来的惩罚相威胁和呼吁自我完善并不足以改变事物的现状。于是，他便同教会决裂，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阵营，1848 年时，他是革命的一名积极参加者。

拉梅耐以其一生的经历证实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破产。

84　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的另一“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圣西门主义拥护者菲利普·约瑟夫·毕舍(1848 年立宪会议主席)。他主张在国家支持下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企图实现这一思想的有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有德国的拉萨尔分子。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分子要求由国家贷款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91 页。

建立生产合作社时写道：这个要求“……是从路易-菲力浦时代毕舍在《工厂》上所倡导的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纲领中逐字逐句抄来的。”①

1848年革命后，“基督教社会主义”在法国开始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并且受到教会的赞许，这时资产阶级同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幽灵”。天主教僧侣都投入斗争，起劲地反对社会主义。教会的许多教职人员和天主教活动家得出了一个结论：反社会主义宣传要在工人中间取得成功，就需要同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某种帮助工人的“积极的”纲领。他们批评工业的无政府状态、竞争和强大的垄断组织的横行霸道。他们宣扬，教会应当是社会的基础，它理当站在穷人一边。他们维护私有制，但劝说所有主“不要滥用财产”，要把自己看作天主托付经管财产的人。这一论点写入利奥十三世1891年的教皇《新事物通谕》。在这些人看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能够进行社会改良，他们应当保护工人阶级。

法国工人对天主教会人士和贵族中的“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47页。

持怀疑和敌视态度。“在十年反动（1851—1861年）期间，在各大城市工人中间有一种顽强的毫不妥协的反天主教倾向悄悄地发展起来。厂主强迫自己的工人履行宗教仪式时，这种倾向更为加强。”①

在巴黎公社遭到镇压后，法国的“天主教社会主义”敌视工人阶级的性质进一步增强，因此教会将其置于卵翼之下。由于工人不信任资产阶级的和教会的“庇护人”以及工人们渴望建立自己的独立的组织，天主教活动家们便开始在教会的协助下成立起敌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天主教工人组织。充当这些团体组织的发起人的是两名保皇党军官——参加镇压巴黎公社的德·曼伯爵和拉图尔·杜-潘。

85

1871年末，德·曼在僧侣参与下成立了一个协会，以便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领导这个协会的是德·曼自任总书记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一名教皇指定的红衣主教的监督。以后在一些大城市中也出现了这个协会的分会，从事组织天主

① Ж·魏尔：《法国社会运动史（1852—1902年）》，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55—56页。

教徒工人小组的工作。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神甫。在这些小组里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德·曼及其所领导的协会力求建立以“劳资合作”为原则的联合工人和企业主的基督教劳资协会。

法国工人的基本群众都没有参加天主教小组，尽管这些小组的数目在初期迅速增长。参加这些小组的，人数最多的是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

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宣传开始于宪章运动的最高潮时期，是与这个运动唱反调的。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是英国圣公会（金斯利、莫里斯等人）和贵族界代表人物。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承认工人的贫困状况。1850年，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拉德罗曾问道：“‘低工资’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窃盗。上帝说过：‘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吃自己的饭’。这既是天诫，又是圣令。然而英国却宣告这一天诫是假的，因为女裁缝一天工作十八小时，却经常挨饿。我们急于在工人住宅墙上和楼梯上为穷人写着：‘不劳动者不应得食’。然而我们却很缓慢地理解到：前引指示在原则上又包含着另一条指示，即谁劳

动谁不得食。"①

拉德罗和其他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是什么呢？拉德罗写道：能使工人的境遇有所改善的手段是"完全改变观点"②，"首先在于排除心灵中的邪念"，也即改变人们的道德精神。拉德罗鼓吹工人应当竭力设法取得境况的改善，但86却不得通过各种罢工的途径。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批评英国国教圣公会，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这个教会的代表人物。1851年金斯利牧师在伦敦的一次布道演说中说过："在许多人心目中关于基督教会的观念往往与关于牧师和帝王统治的观念，关于镇压思想家的观念，关于迫害和暴政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有理由把教会同一些人施加于另一些人的这类可怕的罪行联系起来，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教会在各个时代的历史都充满了关于僧侣阶级这样对待人民的可悲的记载。"③但是，同一个金斯利认为：

---

① 转引自路·布伦塔诺《英国的基督教社会运动》（莫斯科，1906年）一书，第96页。

② 同上，第98页。

③ 同上，第114页。

僧侣应当领导改善人民处境的运动。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批评富人时语尖词严。金斯利宣教说："有产的人们进天国难上难。富人们，你们是会倒霉的，因为你们已得到安慰。你们是会倒霉的，因为你们吞并一栋又一栋的房屋，吞并一片又一片的田地，企图掌握整个大地，一席之地也不留。你们是会倒霉的，因为你们是靠牺牲贫苦民众发财致富的少数。你们是会倒霉的，因为你们从自己的兄弟的贫苦中得到好处。"①

然而，他们的激进也只是在口头上批评富人几句而已。金斯利竭力使人相信：社会上的任何变革都不能使人们变得更为幸福，"必须有道德上的根本转变"。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呼吁宪章派勿用暴力手段。他们说：任何改革都必须从修身开始，而修身最好的方法又莫过于宗教。他们向宪章派证明：工人无须去争取普选权和参加立法。照他们看来，后者似乎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社会问题，他们是这样"解决"的：有产阶级应当省悟到："私有主掌管自己的财产，同时又为上帝和世人服

① 转引自路·布伦塔诺《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莫斯科，1906年）一书，第118页。

务”，而劳动者则应当保持“纯朴、无求和诚实；对企业主忠心不二，彼此之间赤诚相见……”①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他们走访伦敦和其它城市的贫民区，作一些慈善事业，为成年人举办学校。

87 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类似法国的毕舍)宣传建立各种工人生产合作社来作为改善工人处境的手段。在富有的保护人的资助下，这样的合作社(成衣匠、鞋匠和其它行业工人的合作社)在伦敦和其它城市建立起来。但是好景不长。它们没有导致，也不能导致“社会的改组”，没有争取到大量的工人阶层，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并非象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因为工人智力不够发达，道德水准不够高，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诸如此类的合作社必然或转化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组织，或更为常见的：因无力同资本主义大企业竞争而消亡。此外，这类合作社不能在工业的主导部门（冶金业或矿业）建立，而只能在诸如裁缝业、制鞋业

① 转引自路·布伦塔诺《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莫斯科，1906年）一书，第30页。

等等手工业行业中建立。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对英国的各种工会的和工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影响极坏。他们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宗教伪善的纲领中接受了不少东西。①

德国鼓吹“基督教社会主义”开始的是天主教会人士。德国最出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美因兹教区主教冯·克特累尔男爵。以后不久，进行这种宣传的还有新教教会人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些人“不能让自己的天主教对手垄断向社会主义的献媚。”② 在新教派牧师中，叫得最凶和煽动性最大的是御前讲道师施特克尔。

克特累尔对教皇利奥十三世影响很大。这位教皇的《新事物通谕》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是克特累尔的观点的复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后者可

---

① “……现代工党的纲领是一种极不稳定的调和折衷的体系，纲领的基本部分主要从职工会大会的纲领和合作联盟纲领中借用过来的。这两者在制订当时彼此毫不相干。纲领中除其基本核心或基本部分以外，还有一些次要成分……这些次要成分的来源五花八门。基督教社会主义便是其来源之一……”（P·A·布雷廸：《不列颠的危机》，莫斯科，1952年版，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27页。

88 算是教皇"社会"通谕的精神上的前驱人物之一。

克特累尔出身于一个保守思想根深蒂固的贵族家庭，受业于耶稣会士，在普鲁士政府任官吏数年后，一心攀登教阶，1844 年当上了神甫。他在 1848 年大力进行反革命宣传，在社会问题方面发表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的言论，为安贫和驯服大唱赞美诗，呼吁劳动人民放弃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而安于现状，因此博得了教会和世俗当局的青睐，沿着教职的阶梯很快地爬了上去。根据教皇圣谕，1850 年他被授予主教衔，管辖美因兹教区。

克特累尔懂得工人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于是便要求教会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以便抵消社会党人在他们中间的影响。他也象其它国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一样，力图使人相信：只有基督教才负有解决当代一切社会问题的使命，只有天主教会才是工人利益的真正保护者。克特累尔在 1847 年 12 月发表的一次题为《基督对穷人之爱》的布道演说中声称：耶稣"爱的是精神上的穷人，而对精神上的富人则有厌恶之心"①。这

① 《威廉·埃姆马努埃尔·冯·克特累尔文集》，第 1 卷，慕尼黑，1924 年版，第 63 页。

位主教在“穷人”和“富人”之前加上“精神上的”几个字决非偶然。

克特累尔在其布道演说中说道：听讲的诸位一定会说，基督是谴责富人的，这指的是那些住高楼大厦的人，而不是指我们这些穷人。我们都是福音书上所说的“穷人有福”这句话里的穷人。克特累尔否认这些观点。他说：不对，福音书上所说的“富人们，你们要倒霉”这句话，决不是反对富人，而“穷人有福”这句话决不是指穷人和无财产的人。克特累尔写道：可能既是穷人；同时又属于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倒霉，富人们”这句话中的富人。克特累尔男爵解释道：“你们要倒霉，富人们”这句话中的“富人”也指虽然一无所有，但对尘世上的财物却孜孜以求的穷光蛋，这样的人为基督所谴责。福音书上所说的“精神上的穷人有福”这句话中的“穷人”也指那些尘世财物极为丰富，但却能正当使用这些财物，且又“不爱财如命”的人。克特累尔解释说：基督并没有要求人人都把自己的财物施舍给穷人。他声言：离基督最近的是那些一无所有或只有最必需的东西叫道：让穷人们 89
但却安贫知命的人们。这位身穿道袍的贵族大声

认识到，在他们的贫穷中有多么伟大的品格呀！①“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冯·克特累尔就是这样想让受剥削者信服：他们的处境是天主所最乐意的！

克特累尔的最主要著作《工人问题和基督教》出版于1864年。它是针对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不断取得成效而写的。克特累尔写道，要改善工人的处境，遵循教会的教导并同教会合作才能达到。他蛊惑人心地断言："只有基督和基督教才能拯救世界，特别是工人阶层。"②克特累尔把“工人问题”归结为援助穷人的问题。

克特累尔在议论工人阶级的苦难时，也象他以后的所有“天主教社会主义者”那样，避而不谈下列问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据克特累尔的意见，要改善工人的处境，最好让工人参加分红。这一点是能作到的，如果工人是企业的股东的话。克特累尔写道：在英国和法国，工人办起了以工人为部分股东或全部股东的企业。但是要兴办企业需要

① 《威廉·埃姆马努埃尔·冯·克特累尔文集》，第1卷，第64—65页。

② 同上，第3卷，页5页。

资本。他写道："激进党"(指拉萨尔分子)建议在国家的帮助下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但是国家能拨出款项来建立这类合作社吗？国家的这种所作所为会不会触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准则呢？

克特累尔反对破坏私有制的法权。他认为国家帮助工人生产合作社超出国家活动的职责范围，干涉到它无权干涉的领域，即私有制的领域。

关于私有制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在克特累尔的书中给予了极大的注意。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议论，全都写进了利奥十三世的教皇通谕之中。

克特累尔所提出的纲领，其内容之贫乏空洞与其声明之蛊惑人心适成正比。他论述其"积极的"纲领时一开始就提及教会坚持私有制。他写道：一个在所有必需品方面都十分贫困的人有权满足自己的需求。国家政权应当责成一切公社使富人关心穷人，即让他们从自己财产中拿出一部分生活必需品来分给穷人。克特穷尔写道：除此以外，神学不知道其它减轻穷人贫困的义务。① 90

① 《威廉·埃姆马努埃尔·冯·克特累尔文集》，第3卷，第70页。

这样一来，关于改善工人处境的问题便归结为慈善事业的问题：工人是资本家理当施舍的穷人。他宣布说，不照这样办的私有主将要做出答复——但是不在凡人面前，而是在“最后审判台”上。①

克特累尔写道：基督教提出以下措施改善工人的贫困处境：为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建立慈善机构；使宗教深入每个家庭，对工人进行宗教教育；成立浸透宗教精神的各种工人的（如手工业者的、职工会的以及其它的等等）组织，并且建立生产合作社，工人在其中既是雇工又是主人。

克特累尔的“纲领”被吸收进天主教会的“社会活动”纲领，并成为德国以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纲领。

克特累尔相当公开地向资产阶级解释，基督教对于巩固他们的统治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他写道：工人想要的也无非是企业主所有的那些尘世福利而已，但是这种福利他们却没有。由此产生了不满足和不满意的情绪。但是这种情况是会

---

① 《威廉·埃姆马努埃尔·冯·克特累尔文集》，第3卷，第71页。

变化的，只要工人相信基督教是为所有等级而存在的，相信基督成了工人的基督从而表明了他同工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只要工人相信福音书上关于富翁和穷汉拉撒路的故事，相信自己个人永生不死，只要他相信贫穷和劳动比富足和清闲更可贵。①

关于教会方面的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诸如此类的纲领，弗·伊·列宁曾写道："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②

克特累尔的追随者们抓住了他的建议：在工人阶级中灌输宗教思想，并成立针对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的天主教工人组织。

梅林写道："教皇权力至上论毫不害羞地将 91
社会主义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以此引诱在它

① 《威廉·埃姆马努埃尔·冯·克特累尔文集》，第3卷，第113—11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2页。

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工人群众。由于它的手段巧妙，到处都建立天主教协会，这些协会成了许多能够吸引手工业帮工的中心；美因兹大教堂仪礼员莫方提出的社会政治纲领，从远处看来，同拉萨尔的纲领差不多。”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组织成为1870年建立的天主教中央党的群众基础。

与天主教会同时，在德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开展“社会活动”的还有新教教会。多年以来在新教教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的反动透顶的牧师施特克尔。

“福音派社会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如鲁道夫·托特牧师甚至断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除开无神论以外，在福音书中都已形成。社会民主主义对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指控是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种种要求（除无神论外）也即是福音书的要求。托特写道：同福音书相矛盾的也仅仅是社会民主党想要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①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第43页。仪礼员莫方是克特累尔最亲密的合作者。

那么这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托特想如何实现“福音宝训”呢？他想如何改变人民的处境呢？他认为能达到这些目的的途径并非阶级斗争，而是改良，而改良“必须在有产者、无产者和教会的协助下由基督教君主制国家付诸实施”。① 这样一来，德皇的普鲁士警察士官国家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面前也就理当成为引导人民到天国的救世主了！施特克尔牧师，这个运动的思想家之一，他同威廉亲王（未来的威廉二世皇帝）及其将军们和官员们在“基督教社会”活动的领域内携手合作。

施特克尔于1874年被任命为宫廷讲道师，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师的随军牧师。1877年，他和托特以及另外一些人成立了一个“以宗教和君主立宪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中央联盟”。该组织的纲领中说，要实施社会改良的政策，需有“君主国和工人阶层之间的相互信任。” 92

祖巴托夫和加邦的这些老前辈谈到在君主保护下实现“国家社会主义”，谈到“社会君主制”。他们认为他们的中心任务是使工人接受阶级和睦

① P·格雷：《福音社会运动》，莱比锡，1896年版，第15页。

的思想，并使工人相信普鲁士国家的超阶级性。

施特克尔企图向柏林工人传播自己的反动思想。他在工人的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攻击社会民主主义。但这种集会往往以其主持者的失败而告终：在会上出现的论战中，得胜的从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常常有工人激于对施特克尔的挑拨离间的义愤而在会场上当众宣布与教会决裂。

1878 年，施特克尔成立了一个“基督教社会工人党”。同年颁布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当然有利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不论其为天主教的还是新教派的）在工人中进行其宣传。奥古斯特·倍倍尔在论及施特克尔及其同伙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时写道：“福音派社会主义政治家们不甘落后于天主教社会主义政治家，他们也竭力争取那些尚能争取的福音派工人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①

该党纲领第一段开宗明义：“基督教社会工人党以信基督和爱君主与君主国为本党之根本。”党纲第二款则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劳动保护、组织在普鲁士国家监督下

① 奥·倍倍尔：《我的生平》，莫斯科，1925 年版，第 342 页。

开展业务活动的养老金机构、仲裁法庭、“正常工作日”（但并未指出其时间之长短）方面的极其有限的温和的要求。纲领表示赞成组织职工会，这指的是教会、国家和企业主控制下的工会。对于有产者，纲领要求他们“准备欢迎无产者的公平合理的要求”。至于判定这些要求是否公平合理，那当然是有产者、剥削者的事了。

工人并不支持“基督教社会工人党”。1878 年柏林大选，施特克尔得票总共只有八百二十张。只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施特克尔才取得几分成绩，他用无所顾忌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宣传吸引了一批商人、职员、大学生、手工业者加入他的组织。他及其同伙利用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93]展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贵族的艰难处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为了吸引他们到其政党方面来，他把罪名强加在犹太人身上，说犹太人使他们处境困难，以此为德国资本家以及整个资本主义辩解。在施特克尔及其党（1880 年已改名为“基督教社会党”，不复再冠以“工人”的字样了）手中，反犹太主义已成为了俘虏小资产阶级的主要诱饵。恩格斯在反犹太主义中看出了封建社会

主义的再现。他于1890年写道："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是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型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① 施特克尔由于其广泛采用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说他是法西斯煽动家的一位老前辈也是当之无愧的。

1881年，施特克尔当上了国会议员。就在那个时候，这位新教教会的代表人物，就同天主教中央党的代表开始谈判关于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行动问题了。

十九世纪末叶，当"基督教社会主义"从一个封建主义的流派转化成资本主义的流派时，施特克尔和其它福音派的"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也有了变化，这也与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活动性质有所改变的情况同出一辙。

至于在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较为缓慢的国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页。

则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在十九世纪末叶还仍在鼓吹十九世纪上半叶封建社会主义者的说教。

例如在奥地利，1882年贝尔克雷迪伯爵，国会工业条例审订委员会的报告人声言："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组织劳动的巨大任务，但在此以前，我们还不得不经受同流动资本的艰苦的斗争。这种流动资本在过去的年代中已大大增强了，在全国到处起着破坏作用……在农业方面，土地易主的现象已达到顶峰。自古以来定居在一个地方的家庭，被迫放弃自己的土地……土地所有者欠债每年增加一亿零八百万，数字惊人……赋税愈增愈多，百姓普遍贫困，已到了国家无力救济的地步。"① 94

另一个大富豪利赫坦施太因公爵声言："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劳动是甲方卖出乙方买进的商品……这种见解是多么庸俗，多么无聊……""这些由于众所周知而无需列举的不祥的征候预兆着大变动的到来，现代社会就是摇摇摆摆地迎着这变动在前进。奥地利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巨大影

① 《欧洲导报》，1883年1月号，第411—412页。

响……法国革命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必要的各种改良长期拖延，以致人民等得不耐烦了，不得已而诉诸武力。因此，我们就要趁时机尚未失去的时候，趁尚未有人强迫我们的时候，完成各种必需的改良……"① 由于害怕革命，显赫的贵族老爷们变成了"社会改良"的拥护者。

类似这样的言论是"封建社会主义"的典型表现。贵族不仅有他们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不满的理由，而且还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关于这种经验教训，他们曾向资产阶级作过警告，因此奥地利贵族提起法国大革命，这决非出于偶然。

甚至连俾斯麦都认为有必要警告资产阶级，向他们指出需对工人的境况作一定的改善，否则社会民主党就要把工人拉跑。1884 年 5 月 9 日，俾斯麦在德国国会会议上声言："工人健康时，给以劳动权，当他健康时，给以工作，当他有病时，给以照顾，当他年老时，给予救济。如果你们肯做出一些牺牲来做到了这些事，并收起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高调，如果有什么人提出'保障老年'

---

① 《欧洲导报》，1883 年 1 月号，第 411—412 页。

的口号，如果国家对工人再稍示基督式的关怀，那么，我相信，一旦工人发现了政府和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各种机构都在认真从事关怀他们福利的工作，这时维登纲领①的保卫者们的大吹大擂就是枉费心机——云集在他们周围的追随者将会因而大减……”②

俾斯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敌人和社会改革的对头。梅林写道：“如果人们想要谈论什么俾斯麦社会主义，那么就必须把它叫作乞丐社会主义或奴仆社会主义……”“俾斯麦社会主义（如果人们想要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目的始终是用施舍残羹剩饭来欺骗工人，使他们象宫奴一样随和，并且更加顺从。”③

95

封建社会主义是社会思潮中的一种反动流派，是一种反动社会运动。关于封建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

① 1880年8月，德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在苏黎世州的维登堡召开，会上通过修改后的党纲。

②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五届议会第四次会议，1884年》，第1卷，柏林，1884年版，第481页。

③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3卷，1921年版，第112—113页。

义原理》一文中写过下面一段话：前者的吹鼓手们"是那些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和日益消灭着。这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代社会的苦难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的和宗法的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苦难。这一类人的一切主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和为此而洒出热泪。"①

几乎直到十九世纪末叶，直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前夜，"基督教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还都保留着以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成分。这个时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宣传主要面向手工业无产阶级和被资本主义弄得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这些人中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关于在国家资助下兴建作坊的宣传，关于恢复雇主和工人间的宗法关系的宣传，关于复旧的宣传，都能引起共鸣。他们的宣传在客观上是反动的，因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24页。

他们的计划与社会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剩下来的只是它的宗教的表面形式和“基督教社会”的空谈；而它的本质则有了变化：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使“基督教社会主义”具有反资本主义特点的东西已经消失了。现在它开始面向产业工人和大工厂的工人。对于这些人，它既不能用在国家资助下兴建作坊，也不能用兴办慈善事业来作诱饵。“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所持的出发点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它不反对，反而加以神圣化，而且还以巩固资本主义社会 96 为己任。现在“基督教社会主义”进入工人群众，企图把他们组织到各种教权主义的工人组织、工会、文化团体等中去，使这些组织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相对抗，并且阻挠革命斗争。

大力促使教会在十九世纪末改变社会政策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教皇利奥十三世。

帝国主义时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在论及利奥十三世的“社会”活动（这种“社

会”活动的衣钵一直为以后历届教皇所继承，而当代的教皇也基本上是本着这一精神来进行这种社会活动的）以前，应当指出，与教皇利奥十三世登场的同时，所谓的“国家警察社会主义”也企图向工人阶级讨好。这种社会主义存在的时间比较起来并不算长，而且一出笼就受到工人唾弃，因为他们看出它是警察暗探局的产儿。

德国的“警察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威廉二世。他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工人子民们的“慈父”，家长般的君主。正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竭力拉拢同教会有联系的工人加入其组织并通过他们对广大的劳动阶层施加影响的时候，威廉二世及其辅臣也力图扮演工人庇护人的角色。这些“人民之友”想使工人不去成立自己的组织，并相信一切都会由德皇及其大臣们为他们安排好。威廉亲王1887年12月21日致书俾斯麦，在谈到组织“内部机构”的计划时写道：他想“在这个基督之爱的事业中”把各种党派的人士都联合起来，拟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根据他，也即威廉的建议，这个委员会“由斯托尔贝格伯爵、冯·普特卡默大臣、冯·戈斯莱大臣、瓦德西伯爵、戈赫贝格

伯爵及他们的夫人来主持工作”。他们和另一些普鲁士伯爵和大臣一定会为德国的工人阶级造福！威廉写道：只有这样的“机构”（施特克尔牧师也积极参加这类机构的活动）的工作“才能提供同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最有效手段”。①

弗·伊·列宁针对威廉、俾斯麦之流的这一政策，于1901年写道：“……在以私有制和一小撮富翁奴役千百万无产者和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里，政府不能不是剥削者的最忠实朋友和同盟者，不能不是剥削者的统治地位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在现代，要成为一个可靠的捍卫者，仅仅有大炮、刺刀和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使被剥削者相信，政府是超阶级的，它不是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是为公正的利益服务的，它是关心保护弱者和穷人，反对强者和富人的，等等。法国的拿破仑第三、德国的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都费了不少力气来耍这种讨好工人的把戏。”② 弗·

97

① 奥·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3卷，莫斯科，1941年版，第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64—65页。

伊·列宁指出：这一谎言很快就被揭穿了。

威廉及其政府的言论的伪善和虚假的性质从下述事实即已明显可见：德皇打算在不触动德国工厂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工人的处境。他力图使人相信，工人的福利决定于德国资本主义的繁荣。

1890年2月4日，威廉下达给首相的一道圣旨，写道：他已决定促进德国工人处境的改善，但是决不能影响德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威廉声称，他有意首先同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政府就迁就近年来在历次罢工和以其它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工人的需求和愿望的可能性问题谈判一项国际协议。① 威廉接着写道：要是这一点在原则上得到赞同，他就向各国政府建议召开劳工问题会议。

1890年5月，根据威廉的倡议，在柏林召开了“劳工问题”国际会议，以确定制订劳工法令的共同原则。这个会议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它的召开被用来显示对工人阶级的慈父般的“关

① 《1890年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第19—20页；《欧洲导报》，1890年3月号，第413—417页。

怀”。

教会异常积极地参与了这场愚弄工人的骗局。它随声附和关于德国国家具有“超阶级”性质和皇上关怀工人之类的鬼话。在1890年8月25日于科布伦茨举行的第三十七次全德天主教会议（“天主教日”）上，根据中央党领袖文德霍尔斯[98]特的提议通过一项决议，对德皇表示感恩，感激他“有利于社会和睦的活动”。同年9月，在布鲁塞尔天主教国际社会大会上，柏林劳工问题国际会议被捧上了天，并通过了一项内容如下的决议：“大会认为柏林会议对于社会和睦来说是一大幸福的事件。”

就召开柏林会议问题，威廉二世也曾致书教皇利奥十三世。教皇在1890年3月14日复信中写道：他欢迎国际大会的召开以寻求改善工人处境的办法，并向威廉保证教会方面的支持。

天主教教会及其头子拥护威廉的“社会活动”。

1893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向当时访问梵蒂冈的威廉二世声称，教皇在有关改善工人处境问题上的见解同德皇以及德国天主教徒的见解相吻

合。①

威廉二世的“警察社会主义”一事无成。其它一些国家资产阶级政府所奉行的类似的政策也未能取得什么成绩。工人们既信不过威廉，也信不过他的仿效者。他们跟着社会主义政党走。

二十世纪初期在俄国也曾有人试图推行警察社会主义。成立在警方监护下的工人联合会的发起人是宪兵上校祖巴托夫和牧师加邦。

僧侣积极参与警方的这些反对工人运动的阴谋。在1902年7月8日莫斯科工厂主会议(在这次大会上祖巴托夫阐述了他的活动纲领）的决议中曾顺便提及道：“密探局已安排了一系列演说，邀请莫斯科都主教大人讲道，应世俗长官的邀请，他已开始从事以基督教教义之光教化工厂工人的新事业。”②

弗·伊·列宁在揭露沙皇制度和保皇党黑帮向工人买好的徒劳挣扎的挑拨离间的性质时写道：“这是很有意思的：将军和神甫、祖巴托夫特

①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与德国的文化斗争》，因斯布鲁克—维也纳—慕尼黑，1935年版，第304页。

② 《教育》，1906年1月号，第217页。

务分子和忠于警察精神的作家们竟打算'帮助'工人摆脱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而且还可顺便帮助钓不小心去上钩的工人……"①

99

多亏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先进工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祖巴托夫分子和加邦分子企图在俄国工人阶级中灌输僧侣警察思想意识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在揭露国家警察"社会主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资产阶级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长期装扮成"超阶级力量"的这一事实。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在其对内对外政策中是公然作为垄断资本的工具登台表演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警察和官僚机构向工人花言巧语地讨好，不能持续多久。

然而"基督教社会主义"却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新条件的能力，因为它同教会有着联系，善于巧妙地利用宗教感情达到政治目的。

天主教书刊，同时再加上整个资产阶级书刊都努力把教皇利奥十三世打扮成"社会改良家"和"工人的伟大朋友"。在这方面，他 1891 年的《新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272 页。

事物通谕》就首先可以用来作为证明。

这一份教皇通谕真是“交了好运”：它自颁布以来，时间过得越久，资产阶级的，特别是天主教的政论家和史学家环绕它所编的神话也就越多。这一教皇通谕被他们用来冒充“劳工大宪章”和“社会改良”纲领等等。他的作者利奥十三世则被虔诚的教会作家们称为“伟大的、工人的教皇”。① 意大利天主教政党的创建人之一斯图尔佐神甫写道，利奥十三世是历代教皇中第一个从事为工人确立公平之道的人，其根据就是教皇《新事物通谕》。②

在1931年发布的为纪念《新事物通谕》四十周年的教皇通谕《第四十年》中，教皇庇护十一世声言：利奥十三世的教皇通谕与以前的历任教皇的社会文告之不同在于它指出了“幸福地解决”“社会问题一类的众所周知的问题”的“正确途径”。

---

① 见C·瓦尔特巴赫《利奥十三世与劳工问题》，慕尼黑，1931年版，第4页。

② L·斯图尔佐：《意大利和世界新秩序》，伦敦，1944年版，第151页。

利奥十三世的教皇通谕的产生是以各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近半个世纪的活动为基础的。与天主教的冯·克特累尔主教、新教的施特克尔 100 牧师、金斯利牧师相比较，与德·曼伯爵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其他思想家相比较，利奥十三世并没有说出多少新东西来。利奥十三世1891年文告的出笼，与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直接有关。

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迅速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法国，尽管巴黎公社遭受镇压以后一片恐怖，工人运动仍然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保尔·拉法格写道：“公社失败后过了十年，有法国全国各地工人阶级代表参加的马赛会议不顾数量不小的少数人的反对，通过决议，要把工人组织到阶级的政党中去。”①

在德国，1890年10月1日废除了存在达十二年之久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它表明资产阶级窒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企图未能得逞。在反社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1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17页。

会党人法统治时期，社会民主党在1888年大选中获得了三十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一票，1884年大选得五十四万九千九百票，1887年大选得七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十八票，1890年2月大选得一百二十四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倍倍尔写道："这表明：非常法统治的十年期间内，选票（指投社会党人的票——舍英曼）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五十七。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一跃而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全世界都为之震惊。"①

1889年国际工人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成立了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制订了社会主义政党必须为之而进行斗争的各项要求的纲领，其中也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

1890年，工人们第一次庆祝自己的五一节。行将到来的庆祝五一的活动在许多地方使资产阶级惊慌万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0年5月1日写道："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

① 奥·倍倍尔：《在十月一日》，载《新时代》1890/91年，第1期，第7页。

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①

101

1890年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不但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新的苦难，而且也促使工人阶级的愤慨情绪不断增长。

利奥十三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于1891年5月15日发表教皇《新事物通谕》的。当时资产阶级已动用其武库中的种种手段对付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愤慨情绪。这份通谕当然也该是教皇对这个武库的一份贡献了。

教皇通谕一开始就指出：各种“变革”和“革新”的精神既触动了政治领域，也触动了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向前发展，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量的人却遭受贫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4—245页。

正在联合到各种职工会中的工人已日渐觉醒。这一切不断引起社会冲突。教皇声言：有鉴于此，他认为有必要就工人问题发表意见。

教皇声言：发生在工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导致各种手工业者联合会的消失，其结果是工人在“丧尽天良的企业家”面前逐渐变得无力自卫。不仅如此，工业和商业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一小撮超级富人把奴役的羁绊套到无产的广大群众身上。教皇对“富人”的批评也就仅限于这些话。不能不指出：利奥十三世以前的教皇们在“基督教社会活动”的领域内批评资本主义及其统治对人民群众产生的后果，在程度上往往更为尖锐，虽然也是具有蛊惑人心的目的的。

教皇在确认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系的各种新现象后，批评的矛头所向，并非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教皇通谕中有一章就叫作“假药，社会主义危害工人”。利奥十三世写道：社会党人认为出路在于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教皇不同意消灭地主资本家所有制。他写道：要是这样做了社会“更加危害工人

102 自身”，此外，对资本家进行限制也会显得“不公

道"，最后还会动摇国家法制。

为了"证明"废除私有制"危害工人自身"，利奥十三世采用了令人发笑的论据。他的宏论是：工人的目的是要获取财产，他可以用省吃俭用的办法来储蓄，以购置田地；要是私有制为社会党人所消灭，那么工人的境遇就一定要恶化，因为他获取财产的前景被剥夺了。整个论点不值一驳。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的工资照例总是低于最低生活费，他不可能有什么积蓄，以便置产——地产或工矿企业。资本主义的法则是小私有者的数目不再增加，他们只有破产，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使工人丧失那些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东西。弗·伊·列宁1902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写道："社会劳动和日益社会化的劳动生产力在大力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利益却为极少数居民所垄断。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是私有者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加深和扩大。"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1页。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断地进行着劳动人民相对的和绝对的贫穷化的过程。可见，利奥十三世的宏论，即似乎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成为私有者，而要求实现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社会化的社会党人却在阻挠工人去取得那种“可能的”幸福的那番宏论，只不过是对千千万万的无产者的嘲弄！

教皇《新事物通谕》的相当大部分（第二章）涉及的是私有制问题，是论证私有制为万古长存的制度，是论证一个人“天生”就有占有财产的权利。教皇还声言：人在本质上有别于其它动物的地方正是在于他占有财产：其它动物只会利用它们在大自然中所找到的东西，而人则因具有理性，所以他长期所掌握的不仅仅只是在使用中消耗的东西，而且还有能继续使用的东西，诸如土地。教皇想要使人相信财产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范畴，是不能与人分开的。但是，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只是少数人的财产，而大多数人——劳动人民——则不占有财产。为什么“上天”所关心的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而忘了大多数呢？利

103

奥十三世为这种情况辩解，他声言：天主把土地恩赐给全人类社会这一情况与个人占有的存在并不矛盾。他解释道：天主把土地恩赐给所有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一定是土地的主人。天主划分和分配私人产业所根据的是人们的“勤劳”程度和各族人民自身的各种“风俗”和成规。利奥十三世就这样想使人相信：地主和资本家获得财富的途径并非靠剥削劳动人民，而是靠自己的“勤勉”。这是剥削制度辩护士的老生常谈。他们都力图使人相信：劳动人民之所以贫困只是因为他们懒惰和懈怠。

教皇力图使人相信：土地分给私人掌管，并不影响它为“共同的整体”服务，因为没有一个人离开了土地生产的东西而能够生活；没有地产的人，就靠他在地里和工厂里劳动来取得土地的产品。教皇着重指出：由此可见，可以再一次得出结论：私有制出于天命。

利奥十三世就是这样解决当代最重大的问题的：在资本主义世界有公道与和谐，这表现在一部分人占有一切，另一部分人则一无所有，但是后者却为前者干活，并以此取得微薄的报酬。教

皇郑重其事地宣布：这微薄的报酬就是无产者和穷人的财产。

教皇声言：况且，神律禁止希图他人财产，因为说过"别希图他人之财物"。教皇就是这样以"神律"为据，宣告工人为消灭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秩序而作的斗争——为消灭资本家和地主私有制而作的斗争为"盗窃"。

在教皇的《新事物通谕》中还提及：不管你试图如何提高下层人民的福利，都要坚定不移地从一条基本原则出发：私有制不得破坏。

保尔·拉法格就这一问题写道："教皇利奥十三世在其有名的劳工通谕中"把财产私有权当作"天主教会的一个教条"。[①] 利奥十三世想要确立"社会公道"而又不去触犯剥削阶级的利益，把解104决当代的根本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办慈善事业。

无论是《新事物通谕》，还是以后的教皇们的言论，其中都有不少劝诫资本家与地主的话，要他们"仁慈一些"、关心"共同福利"，有不少关于"更为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之类的话。对于这样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3卷，第82页。

的"公道"，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一再鼓吹，但剥削阶级根本不欢迎。

弗·伊·列宁写道："不夺取银行，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但是不对全体人民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的生产资料组织民主管理，不吸收全体劳动群众，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来民主地组织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力量和参加国家管理，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①

利奥十三世在其教皇通谕及其全部活动中都处心积虑地要阻挠工人阶级去战胜资本主义、夺取银行、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利奥十三世在教皇的《新事物通谕》中，也象克特累尔在《工人问题与基督教》一书中那样，花费了许多笔墨去大谈教会在解决当代社会各种问题时的作用。教皇声称：教会以其教义和精神影响来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会是根据哪个阶级的利益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对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只要看一看前面所说的利奥十三世最为关心的是保存私有制不受触动这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4页。

事实便够了。

他的文告的阶级性在下引论点中表露得更为清楚。他声言：在世俗社会中高等人和低等人之间不可能讲什么平等；对此社会党人却竭力以求，然而“反对天道的斗争是毫无前途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天生就存在着深刻的各种各样的不平等。”

为了“证明”阶级的不平等也是“天生的”，利奥十三世声言：每个人在能力上，在体格上都天生不平等；社会中也是这样，因为社会要求人类活动要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因此，便理所当然地有不平等的存在！用并非人人体力相同的理由来为社会上的不平等辩解，正如用人的机体（两脚105走路，双手干活，头脑思考和管理）来比喻人类社会那样，是主张社会不平等千秋永存的卫道士们惯用的伎俩。实际上，社会上的不平等并非天生就有的，而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暂时的现象。而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资本家和地主——之所以能处于社会阶梯的最上层也决非象利奥十三世的社会学所作的结论那样是由于他们最为勤勉和最为能干。

为了证明不平等有理，对劳动人民进行社会

压迫有理，利奥十三世还乞灵于古老的宗教神话：劳动是上帝对“原罪”的惩罚，世上一切不幸都是“罪孽的报应”。教皇声言：因此最好是安于现状，这也就是说教皇号召劳动人民安于他们受奴役的地位，因为命该如此！从这种社会学得出的结论是：使得人民群众灾难重重的罪责不在于加这些灾难于人民群众的资本主义，而劳动人民自己反倒是因“原罪”而得到受苦受难的报应。①

真是对剥削阶级十分有利的理论！

关于教会“原罪”说的政治作用，马克思曾写道：“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它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②

工人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都足以驳倒旧世界卫道士们的谰言：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现状和消灭人民

① 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其《人类通谕》中重复了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关于“原罪”的神话，把它作为社会混乱的根源。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18页。

群众的疾苦。正是革命政党所组织领导的工人阶级，才是负有改变世界的使命的力量。

利奥十三世写道：在工人问题上所犯的主要错误是有人认为阶级之间互相敌对，而必须彼此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才行。然而，教皇力图使人相信，正如人体的各种不同器官之间存在着协调一致一样，上天有意要使得一个国家之内的两个阶级互补不足，以便进行合作，做到“同心同德”。教皇在论及社会各阶级的义务时，他所指的主要 106 是工人对资本家的“义务”。他写道：他们应当忠于自己的义务，不得给企业主造成损失，甚至是在保卫自己利益的时候也不得“造反”，不应听信别人的教唆。

教皇教导企业主不要象对待奴隶似的对待工人，对他们要公道，要给他们宗教活动所需的时间，要付给他们“公平合理”的工钱。为了不得罪资本家，利奥十三世措辞谨慎地声言：强使工人去干他们力所不及的活是不公道的。但是他却避而不谈规定工作日时间的明确要求。当时工人阶级已经在社会党人的领导下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强大有力的斗争，显而易见，利奥十三世以

及跟在他屁股后面跑的作家们的关于教皇《新事物通谕》是在保卫工人利益的种种说教是多么的虚伪。

利奥十三世在回到教会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作用时，声言：教会提醒人们注意“最高宗旨”、“彼岸生活”。教皇着重指出：“我们真正的生活只是在与尘世生活诀别之时才开始”，上帝造人是“为了天上的欢乐”，永生并不取决于贫和富，相反，财富是通向永乐的障碍！利奥十三世就是这样劝说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他们的贫穷保证他们死后得以永乐。不能不指出，利奥十三世也象历任教皇以及教会的权贵们一样，他自己却宁要钱财而不愿贫穷。

教皇呼吁有产者“正当地”支配自己的财富，“正当地”加以利用。教皇马上又声言：当然，谁也没有义务在“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从自己手里拿出东西来施舍他人；谁也没有义务“不过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生活。因此，百万富翁没有义务在“损害自己”的情况下让出其资财，没有义务“不过与自己地位相称”的生活。资产阶级和贵族都过着豪华的生活，以便“与自己的身份相称”，

照利奥十三世的劝谕，他们应当为了自己的利益，“从自己的过剩财物中”拿出一部分来施舍给穷人。对教皇来说，“工人问题”能在“慈善事业”的范围内解决。利奥十三世也象他的老前辈们，特别是克特累尔那样，劝说资本家采取施舍的方法来减轻工人的疾苦。

利奥十三世这是建议把工人放在乞丐的地位，而资本家在实践“爱近人”的基督教格言时给107乞丐以施舍。这种论点正是马克思在谈到“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时所抨击的：“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①

利奥十三世并不指望基督式的“爱近人”这一教条真的能建立起“阶级间的和睦”来，真的能解决社会面临的全部问题。他并不指望资本家对他言听计从，真的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共同福利”。教皇更不指望无产阶级会放弃阶级斗争，并且为了“爱近人”的缘故而爱自己的剥削者。这就是为什么教皇《新事物通谕》用专门的章节来大谈特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18页。

国家在实现教皇所宣布的“社会原则”中的作用。

利奥十三世说，对于国家，我们的理解并不是某种统治管理的特定的形式，而是国家的“概念”本身。在天主教会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利奥十三世也断然使教会组织倾向资产阶级国家方面，不言而喻也就倾向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君主制已不再是有产阶级统治的唯一形式。使利奥十三世深受感动的美国的榜样向罗马教廷显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保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长期存在方面并不亚于君主国。这就是为什么教皇一再强调：对于教会来说，国家体制的形式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反正都是一样。

然而利奥十三世却反对国家政权归人民所有①，他把资产阶级国家（无论是共和制的还是帝制的）都看成是一种“超阶级的”，对社会上“一切阶级”都一视同仁的力量。

利奥十三世写道：国家应当关怀各个等级的福利（因为任何社会要是没有等级的划分都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应当关心工人福利的提高。他

① 不妨说，他的所有后任教皇也都莫不如此。

要人们相信：在国家之内，所有公民（有产者或无产者）都权利平等。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所关心的并非什么“公共福利”，而是剥削者的利益。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更是毫不掩饰地充当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这便是为什么教皇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关心“一切人”利益的“超阶级”机关的说教是尤为虚伪的。

108

利奥十三世宣称：国家应当关心“公共福利”。然而他却并没有提出体现国家对劳动人民关怀的任何具体要求，只是指出国家对工人可能做到的帮助是有限的。教皇这样避而不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须知要真正帮助工人，就需侵犯私有制的“神圣权利”。然而，当事情一旦涉及保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时候，教皇却找出了十分具体的对策。他声言：国家应当关心“安定和秩序”，一旦工人们的造反行为引起危险的“动乱”威胁着人们时，或一旦出现危及宗教和道德的威胁时，国家就应当加以干涉。教皇《新事物通谕》中说道：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私有财产不受群众侵犯，“他们贪图他人财物之心甚盛”。教皇攻击“贪图他人财物之群众”，仅此一事，便足以勾划出教皇“劳

工”通谕的阶级性来。

教皇通谕中说道，国家应在不触动“他人”(即资本家)的权利和特权的条件下去帮助工人。一旦有人起来号召闹事和使用暴力，它必须出面干预，国家应当预防“抢劫私有者”。

国家对工人的“关怀”只应体现在对他们“精神福利”方面的关怀上。教皇为工人要求礼拜日休息，以便他们在这一天有可能去祈祷，此外，他还要求对童工劳动加以限制。他大谈“公平合理”的工资，然而却又补充道：在工资和劳动日的长短问题上，国家不宜过多加以干涉。

综上所述，可见按照教皇通谕的说教，国家的职能归根到底应当是剥削者国家在事实上所行使的职能：用警察来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保护资产阶级不受“教唆者”和“暴民”的侵犯，通过立法在工资和工作日方面，贯彻资本家认为对自己有利并需要采取的那些措施。

教皇通谕的结论部分专门谈论“工人自助”问题。通谕中说道，能做到改善工人境况的是工人自己创办的或工人与企业家合办的机构，属此类机构的有互助会和在工人有病、年老、不幸时给

予救济的机构。教皇声言，他对成立由工人或由109工人与雇主双方组成的工人联合会持赞许态度。这种联合会的最重要任务应当是关心工人精神上的、宗教上的和物质上的各种需要。教皇写道，国家应当帮助这种联合会，而对成立“危及”“社会利益和道德”以及“社会安宁”的联合会则应加以阻挠。工人的各种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就是利奥十三世所认为的“危险联合会”。他提议工人天主教徒成立天主教工人联合会，以抗衡在社会党人影响下的工会。

尚在教皇1891年通谕公布之前，利奥十三世即曾提出成立受主教监管的工人组织的计划。

利奥十三世在1890年4月19日与《纽约先驱报》记者谈话中说过，他有意在各教区成立以主教为首有工人或同情工人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假期节日负责召集工人，向他们灌输“真正的道德经义”。

在教皇《新事物通谕》中，利奥十三世还主张：天主教会应当促成教权主义的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以便切断工人天主教徒去参加自己阶级的工会或无产阶级的其它团体组织。

综上所述，可见教皇的“劳工”通谕《新事物通谕》与工人阶级利益毫不相干。它的主要使命便是动员教会力量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在这一文件中概括了天主教教会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看法。保护资本主义所有制、使人剥削人的制度万古长存、对社会主义深恶痛绝，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利奥十三世的“劳工”通谕的基础。

弗·伊·列宁写道：“滥用字眼原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例如，一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既有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又有俾斯麦的信徒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朋友。”①

资产阶级报刊以肯定的笔调来评价利奥十三世的教皇通谕。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勒卢阿·博利埃在《两个世界的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教皇通谕。勒卢阿·博利埃写道：利奥十三世的教皇通谕标志着同历届教皇的传统决裂，是教皇对民主制消除敌意的一个表示。

由于恐惧社会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成了天主教和罗马教廷“社会政策”的拥护者。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15页。

110　弗·伊·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11年）一文中对"基督教社会主义"作了卓越的全面评论，并评价了它的历史作用。列宁写道："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它是与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后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早在六十年前，马克思在评价其它各种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评价过了。"①

无论是拉梅耐的，还是利奥十三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其中都有批判性的成分。但是，二者批判的意义并不相同。

拉梅耐以及其他十九世纪上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言行，尽管其学说的特点是乌托邦的和反动的，但多少有所裨益，因为其中也有批评现存秩序和谴责人民受压和受苦受难的处境的内容。在帝国主义时代，"基督教社会主义"中的批判性成分却具有社会蛊惑的性质。这种宣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页。

传只能带来最直接和最深重的危害。

在教皇《新事物通谕》公布十年以后，俄国驻梵蒂冈代表萨宗诺夫（1901年2月12日）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利奥十三世把“互爱与和睦的新约格言作为其社会学说的基础，并规诫人们，不论贫富，在调整社会经济问题时不要离开这个立足点，而且教皇还提醒穷人，忍耐是基督教的最高美德之一。”①

教皇《新事物通谕》对天主教会的所谓“社会活动”是一股新的推动力，促使它更起劲地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利奥十三世在1898年11月15日致书方济各会总会长时写道：“如果说有什么时候社会治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当今之世；因此，僧侣的责任是好好了解、帮助、教诲和安抚民众。”②然而，这种“帮助”是特殊的帮助。利奥十三世对劳苦大众觉悟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增长深为不安，于是便要求僧侣到民众中去，竭尽全力，以断绝工人和社会主义的联系。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第18页。

②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210页。

天主教会的这一方针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许111多国家出现群众性天主教工人组织是分不开的。

基督教工人组织

各种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工会是与自由（阶级）工会同时开始成立的。虽然它们都是由与天主教会有联系的人士组织起来的，然而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甚至到更晚一些时候，教会当局却对工会持怀疑态度。教会当局反对根据阶级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会，主张把工人吸收到各个共同的基督教工会之中。这些工会的宗旨是对工人进行宗教教育，而不是在企业主面前捍卫工人的利益。这说明了这些工会的弱点以及工人（其中也包括与教会有联系的工人）宁愿加入工会来为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斗争这一事实。只是由于对这种情况惊惶不安，教会当局才对成立基督教工会不复持否定态度。[1] 但是同时教会通过世俗天主教徒来施加影响，它认为以不突出僧侣在这些工会中的作用为上策；以免把与天主教没有多大联

① 卡·富格：《德国工会运动史》，柏林，1949年版，第56—57页。

系的人或属基督教其它教派的人从工会吓跑。

在居民中天主教徒为数较少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单独成立带有宗教色彩的工会不能获得什么成绩，教会当局便促使天主教活动分子渗透到已有的各工会组织中去，力求取得有势力的地位。据一位为利奥十三世立传的人士说，教皇曾劝诫僧侣们："你们要在民众中用基督教团体来同社会主义团体相抗衡。使民主成为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民主一事,取决于你们。走出法衣圣器室,到民众中去……"①

美国天主教史研究者梅纳德写道：美国天主教主教们对一切使人想起革命运动的事都吓得要命，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反对与私有制是"天经地义"这一天主教教义相抵触的各种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思想。

这位史学家承认，要划分为数不多的教会领 112 袖同认为教会的权势应当用于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富有的世俗天主教徒在立场上的界线，事实上并不经常都是容易的。②

①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210页。

②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432—433页。

美国教会当局所奉行的方针是：通过在已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内建立自己派系的办法来争取权势。这成了它的传统政策。威廉·福斯特写道："美国工会运动的现状说明，天主教会宗教影响力量是不可轻视的。天主教会当局及其天主教职工协会会员赤裸裸地千方百计想把美国各种工会都抓到自己手里。"①

美国教会当局与"劳动骑士团"的关系史可以说明问题，该团是十九世纪末有影响的美国工会组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团员已有六十万人之多。②

美国天主教会当局对"劳动骑士团"持怀疑态度，因为尽管领导该团的波德利是与天主教会当局合作的，而且是社会党人的对头，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已在该组织成员中广为传播。③

第一个使梵蒂冈注意"劳动骑士团"问题的是

---

① 威廉·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第128页。

② Φ·福纳：《美国工人运动史》，莫斯科，1949年，第572页。

③ H·布朗：《天主教会与劳动骑士团》，华盛顿，1949年，第90—92页。

魁北克大主教塔什罗。他对该团在加拿大所取得的成绩焦虑不安。1883年他给罗马送去一份该团团章，请求做出判断。这个问题交到红衣主教会审议。梵蒂冈认为："劳动骑士团"团员大多数是"异教徒"，因此天主教徒同他们的接触对信仰来说是一种危险。

1884年8月，罗马异端裁判所通过决议，决定"劳动骑士团"应当视作教皇所禁止参加的团体。梵蒂冈传信部建议美国主教们在美国建立诸如德国、法国现有的天主教工人团体那样的组织，这类组织虽也追求尘世的和物质的目的，但却服从僧侣，并听其指挥。① 可见梵蒂冈是在促使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分裂工人运动，在国内建立从属于教会领导的天主教工人联合会。 113

美国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而天主教在美国又并不是大多数居民都信奉的宗教，要建立天主教工人联合会非但不会得到成功，而且也会使这一事业的发起人名声扫地。这一点美国教会当局的权势人物心里明白，他们反对罗马的指示，

① H·布朗:《天主教会与劳动骑士团》，华盛顿，1949年，第100页。

并且坚定地力争取消对“劳动骑士团”的谴责。

以红衣主教吉邦为首的美国教会当局部分人士的出发点是：教会对在工人中颇有影响的“劳动骑士团”的敌视，会使工人疏远教会。吉邦在上书梵蒂冈传信部监牧时写道：“劳动骑士团”无论是同禁止参加的组织，还是同社会主义都毫不相干。该团的宗旨是“以合法手段”保护工人免受富人欺压。吉邦着重指出：禁止教徒参加“劳动骑士团”必将会极大地妨碍天主教的传播，这必然会使工人同教会断绝来往，并相信那些声称教会会站在压迫者一边的人。①

吉邦也得到了另一些美国主教的支持。

1886年末，美国大主教阿兰德和主教基恩同赴梵蒂冈，而在1887年2月间红衣主教吉邦和倡议谴责“劳动骑士团”的大主教塔什罗也同抵罗马。

吉邦在梵蒂冈作证说：“劳动骑士团”无论是对教会，还是对国法都未持敌对态度，而该团领导人波德利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接着吉邦在其备忘录中涉及了一系列关于教会同各种工人团体联系以便对他们施加影响的重要性的一般性问

① H·布朗：《天主教会与劳动骑士团》，第193页。

题。他在致教皇的备忘录中写道："不必花费很多时间同国会和君王周旋，而应当同群众打交道，同人民打交道"，[①] 即应当去争取这些群众。

1888年春，异端裁判所主教会撤销对教徒参加"劳动骑士团"的直接禁令，从此以后，这个团体就许可天主教徒参加了。在异端裁判所的决定中指出：一切在"劳动骑士团"团章中"可能引起误解"之处，均须一一加以修改；团章中应当说明，人人均有权占有土地，但在行使这一权利时不得破坏私有制原则。 114

等梵蒂冈"承认""劳动骑士团"时，这个组织已丧失掉它昔日的战斗性和革命性。波德利是个主张同资本家实行阶级合作的人。"最后，波德利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工人运动中最反动的人物之一。他出卖了1886年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罢工。"[②] 吉邦的罗马之行，是在他同波德利会见之后，后者提出保证，由他波德利领导的团体"不

---

①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167—168页。

② 威·泽·福斯特：《美国政治简史》，莫斯科，1953年，第459—460页。

遵循与教会为敌的学说”。因此红衣主教吉邦轻而易举地同他达成了牺牲工人的利益的协议。在宗教异端裁判所废除严禁教徒参加“劳动骑士团”的禁令后，波德利会见了吉邦，并表示准备满足天主教会当局的一切要求。

教会当局对他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大。1887年吉邦致书波德利说，劳资之间不得有冲突，因为二者都为人类所不可少。吉邦写道：为了“劳动骑士团”的利益，就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其它“危险团体”。僧侣们不断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到这个组织中去，并竭力使它具有阶级合作的思想。

福斯特写道：“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从一开始便不得不排除来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家阶级方面的反抗。在这一持久的艰苦的斗争中工会给予工人以极大的帮助。但是它们在这方面还根本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工会的第一个缺点，也即它们最主要的缺点，便是它们意识形态上的落后性……”①

美国资产阶级竭力想把美国工会运动在意识

① 威·泽·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第81页。

形态上的落后性固定下来。为此，他们特别利用移民工人的各种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天主教会当局就是按这一方针行事的。

从十九世纪末至1910年，天主教神甫约克在旧金山工人中，主要是爱尔兰工人中间，便是这样从事活动的。他本着教皇《新事物通谕》的精神宣扬阶级合作的"思想"。1889年，约克受到了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接见，教皇赞扬了他和他在美国的同事们的活动。[1]

115

约克最初的活动是建立在选举运动期间能选出有利于教会的候选人的天主教组织。二十世纪初旧金山罢工期间约克扮演了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他哗众取宠地批评一下企业主的所作所为，但同时又呼吁工人不要采取暴力手段来反对老板。他在写作和布道时都宣扬：对工人运动来说，主要的"内部危险"是政治和社会主义，因此工人应当放弃政治斗争。他进行宣传反对工人阶级的政党，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对工会的影响。约克同全美国的教会当局一起，极

① B·C·克罗宁：《约克神甫与1900—1910年旧金山劳工运动》，华盛顿，1943年版，第37页。

力在工人中散播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他断言，社会主义在“破坏工会”。

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在美国工人中间的所作所为，促使这个国家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落后性得以长期保存下来。

在英国，创立单独的天主教工会的尝试也未能奏效，因而天主教会（以及英国圣公会）当局在遵照利奥十三世命令的精神行事时，也力图对已有的工人组织施加影响，与各工会领袖联系，拉拢他们接近教会。

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期间，红衣主教曼宁自告奋勇，以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仲裁人为己任。大部分码头工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接受了红衣主教曼宁的游说。他的调解表现在：当罢工将告结束时，他向工人游说，使他们接受了公司经理的条件。①“不邀自来的调解人——红衣主教曼宁与洛德·巴克斯顿——的干预使得工人的各项要求未能完全满足……”② 码头工人主要的要

① 汤姆·曼：《回忆》，莫斯科，1954 年，第 51 页。

② A·哈特：《英国的工会运动》，莫斯科，1954 年版，第 51 页。

求是提高工资和加班费。

红衣主教曼宁属于那些十九世纪末天主教会当权派中主张教会应当争取工人阶级并以此来阻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代表人物之列。曼宁支持红衣主教吉邦为争取撤销严禁教徒参加“劳动骑士团”的禁令所作的努力。1887 年 3 月11日，他致书吉邦时写道，在此之前，管理世界的都是各个王朝，但从今而后，宗座却要与人民打 116 交道，而他属下的主教们将要时常与人民接触。这一点被认识得越是充分，罗马教廷就会越加强大。①无疑，象吉邦、曼宁这样的有势力的教会主教的立场对教皇利奥十三世影响很大，对他奉行的“劳工问题”方面的社会蛊惑政策也起了不少作用。这一政策也反映在《新事物通谕》中。

在德国，天主教教会和天主教中央党从十九世纪末起就开始认真地致力于天主教徒工人的组织工作，使之处于教会的控制之下，其目的也是想阻挠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传播。

因此社会问题也就成了传统的全德天主教年

---

① H·布朗：《天主教会与劳动骑士团》，第 255 页。

会的讨论课题，这一会议的参加者有主教、天主教政治活动家和各天主教团体领导人。在历次年会上都大谈特谈教会对工人的同情，但一涉及到具体决议时，历次年会总是把问题局限于微不足道的愿望上。1894年全德天主教年会上根据关于“社会问题”的报告通过一项决议：争取实现礼拜天休息制、创办互助储蓄会、通过国际协议的途径调整工作日。然而对当时业已成为工人阶级战斗要求的八小时工作制问题，在历次天主教年会上却根本没有议论过。

1899年8月全德天主教年会表示赞成对已婚女工的劳动时间加以可能的限制，对童工的劳动进行可能的改善。但是这次会议却又认为向企业主提出有利于工人的任何具体要求都是不可能的。1902年8月在曼海姆召开的全德天主教年会上，有一位德国国会天主教议员蛊惑人心地说：工人到哪里寻求帮助呢？可能是从国家那里吧？不，国家能给工人的只是征税单和大炮（天主教中央党在国会的议员始终不渝地支持大炮政策、军国主义政策）。可能是从企业家那里吧？当然，企业家对工人是有所帮助的，但是太少了。于是

他便作出结论：只有教会才爱工人，正象它爱一切人那样。这类蛊惑性言论，对出自于教会营垒的"工人之友"来说是有典型意义的。

十九世纪末在僧侣和天主教中央党的积极参加下，各种基督教工会开始建立。1894年，在维斯特利亚天主教和福音派教徒矿工会议上，成立 117 了一个"基督教徒矿工工会"，同1889年成立的矿工工会相抗衡。会章中说，该会宗旨是："在基督教和法律的基础上"提高矿工的道德水准和社会地位，保持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友好和睦"。在会章（第三条）中说道，该工会"效忠德皇和帝国"，入会者以此表明：承认自己为社会民主主义诸原则和意向的反对者①。

工业其它各部门工人的基督教工会也步基督教矿工工会的后尘而相继出现。1899年在美因兹召开了各基督教工会的首次会议。

恩斯特·台尔曼写道，在德国"基督教工会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些基督教团体，无论按其组织结构或是以其所进行的宣传而言，

---

① 卡·富格：《德国工会运动史》，第57页。

都是彻头彻尾地建立在与按阶级特点组建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工会相抗衡的基础之上的。"①

各基督教工会虽然得到教会、企业主和当局的支持，但是从下面的统计资料来看，它们所能联合的是人数比较少的一部分德国工人。②

年　份	基督教工会会员人数	自由(阶级)工会会员人数
1895	5500	259000
1900	76000	—
1905	191000	—
1910	316000	2017000
1912	350000	2553000
1913	341000	2573000
1914	218000	2075000

天主教工会与其它各种天主教世俗团体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能不按阶级的特征来建立。这就使得它在创建初期招致天主教教会当局和天118主教中央党部分领袖的怀疑。然而这些人也不得

① 恩斯特·台尔曼：《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党——中央党》，载《国际》，柏林，1932年，第1期，第14页。

②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7卷，第210页。

已而同意这类组织的存在。

根据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文德霍尔斯特的倡议，各种天主教群众性组织，其中包括工会在内，于 1890 年合并为“争取天主教德国人民联盟”。在该联盟成立宣言中说道，天主教应当以团结一致的力量来与社会民主主义相抗衡。

在德国天主教界，在天主教中央党领导成员中以及在德国主教团中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环绕着基督教工会应当是怎样的工会的问题，始终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代表教皇权力至上论分子的所谓的“柏林派”主张基督教工会应该是严格的信教的组织，应当由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工人组成，并处于教会的领导之下；另一派，即所谓的“科隆派”则认为，为了有效地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进行斗争，基督教工会应当作为跨教派的组织而成立。这类工会所接纳的不仅是天主教徒，而且还要对一切基督教徒开放。而僧侣介入这些工会的活动也应当是隐蔽的。普鲁士主教们在其 1900 年 8 月的一份信函中表示反对跨教派的工会。①

① 《新时代》，1901/1902 年，第 2 期，第 343 页。

"柏林派"得到勃列斯夫利红衣主教柯普的支持。天主教中央党内多数人主张跨教派的工会，因为工会如按此组织，他们就能把新教界人士也都吸引到天主教中央党影响的轨道上来，更何况新教派的资产阶级还自愿要同天主教派资产阶级合作反对社会民主党。

除天主教中央党领导外，"科隆派"还得到科隆大主教费舍尔红衣主教和德国政界中对纠集各种力量来对付社会民主党颇感兴趣的人士的支持。此外，普鲁士政府驻梵蒂冈代表米尔贝格在其出使的头几年也竭力对教皇及其国务卿施加影响，为基督教工会说好话。①

梵蒂冈教会当局比较赞同"柏林派"，而对基督教工会则不怀好感。天主教中央党领导人施潘119伙同"人民联盟"的代表分别于1908年和1910年两次前往罗马，去向教皇陈述天主教中央党的观点，劝他倾向于跨教派的基督教工会②。

---

① M·佩尔诺：《庇护十世的政策》，巴黎，1910年版，第240页。

②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7卷，第213页。

俄国驻梵蒂冈公使布拉策尔于1910年11月报告说，科隆大主教费舍尔红衣主教于10月份抵罗马。普鲁士驻梵蒂冈代表米尔贝格就此事告布拉策尔说，在梵蒂冈“科隆大主教已在对德国天主教徒关系重大的若干问题上达到了他所预期的结果”。最使费舍尔感兴趣的是关于基督教职工协会的问题。据布拉策尔说，红衣主教“力图向梵蒂冈证明，不准其他一切基督教徒入会对该协会极为有害，因为由于协会对新教徒关门，他们便转而加入各种社会主义团体，这倒反而促进这些团体更为发达兴旺。这样一来，以同社会主义作斗争为宗旨而成立的协会自己倒反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队伍。根据上述理由，费舍尔请求废除这一限制。”①

1912年5月，天主教中央党机关报《德意志报》公布了教皇告柏林派各工会书。在这份文告中庇护十世写道：他已知悉这些工会的宗旨，以及他们同其它组织之间的分歧（指的是同“科隆派”之间的分歧）。教皇接着写道：正是柏林派工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7，第150—151页。

会才是他所赞成和承认的；而对其它工会他并不赞成，但却也不加谴责。然而他，教皇，对于这些工会的基本原则不能予以承认，因为这些原则是谬误的。教皇声言，一旦生活中的经济方面与宗教相脱离，就会产生可悲的结果。他不赞成坚持那些原则的团体。教皇接着写道，如果说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服从教会权威的，而作为一个团体却又不然，那么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文告结束部分教皇保证赞成柏林派的(即清一色的天主教徒的)团体。①

但是无论如何梵蒂冈却得作出让步。1912年9月，庇护十世颁布了关于基督教工会的教皇《非常之事通谕》。这份教皇通谕是致德国主教团的。教皇声言：值得支持和赞许的只有那些在天主教教义基础上作为经济性的工会而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工会。教皇通谕中说：无论如何，由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组织的混合工会是不能予以赞成的，因为除了其它原因外，在这类工会中，对教会的恭顺会受到威胁。因此，教皇赞成德国已有

120

① 《1912年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第187页。

的天主教工会。教皇通谕接着说：好在德国天主教徒同非天主教徒为改善工人的境遇而共同工作。然而，教皇认为，为此目的最好是天主教和非天主教的团体之间结成同盟，订立协约。教皇通谕中说，有鉴于德国情况特殊，他，教皇，同意采取容忍混合性工会的立场，并允许德国天主教徒参加这类工会。但却应遵守以下条件：(1)混合性工会会员中的天主教徒应当同时是僧侣监督下的天主教工会的会员；(2)天主教徒只能参加那种活动不违背天主教会教义的非宗教组织。

综上所述，梵蒂冈是不得已从其敌视天主教徒在共同基督教工会里与非天主教徒合作的立场上后退，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使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和政府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能轻装上阵。

俄国驻梵蒂冈公使涅利多夫在谈到这份教皇通谕时写道："毋庸置疑，这一让步是在德国政府的压力和许多德国主教的坚决要求下作出的。"①

围绕基督教工会问题在德国天主教界所进行的斗争就是在教皇通谕颁布后仍在继续，直至第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第二厅全宗，Ⅱ5，案卷107，第2页。

一次世界大战。互相斗争的两派各自都对教皇通谕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庇护十世并不隐讳自己对清一色的天主教工会的支持。罗马教廷史学家路德维希·帕施托尔写道：1913年2月，他在受到教皇庇护十世接见时，曾谈起教皇通谕（《非常之事通谕》）及其解释。教皇说他准备写信给红衣主教柯普，说明“容忍并不等于赞成”。教皇对“科隆派”混合性工会持容忍态度是有鉴于德国国情特殊。然而，这种容忍只不过是暂时的或权宜之计。①

尽管存在这一切分歧，但是无论是这一方面，还是那一方面都一致认为：按宗教原则建立的工121人团体（天主教的或混合性的）的主要目的是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分裂工人阶级，使教徒离开社会主义运动。

恩斯特·台尔曼写道：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会的竞争，迫使基督教工会在组织方面采取阶级原则和表面上承认“罢工”和“斗争原则”。“显而易见，所有这一切都只限于空谈，事实上这丝毫无

① 路德维希·弗赖黑尔·冯·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572页。

碍于其在企业家面前可耻地卑躬屈膝和无止境地出卖基督教徒工人的利益。”①

1912 年鲁尔区二十五万矿工为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期间,天主教矿工工会扮演了工贼的角色,帮了煤矿辛迪加的大忙。②

天主教教会和天主教中央党还竭力把农民组织置于教会监管之下。德国第一批天主教农会于 1895 年在巴伐利亚省成立。天主教政客和主教们都把赌注押在农民的保守性上，并指望天主教农会成为反对革命工人阶级政权的支柱。

与天主教工会建立的同时，新教界也开始建立“福音派”工会。1882 年，这类工会首先在来因维斯特法利亚地区建立。1889 年福音派工会数目已达七十之多，会员约两万人，1896 年——工会达三百五十个，会员八万人。这些工会也与同类的天主教工会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反动的和反社会主义的性质。

1885 年通过的福音派工会会章宣称，工会立

---

① 恩斯特·台尔曼：《德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党——中央党》，载《国际》，柏林，1932 年，第 1 期，第 14 页。

② 《星》，1912 年3 月1（14）日、13（26）日。

足于"福音派基督教"的基础之上，以通过提高道德水准和教育水平的途径在会员中间唤起"福音觉悟"为宗旨；工会反对关于必须没收私有生产资料的学说，力求保障工人同资本家的"和睦合作"，在会员有病和困难之际给予帮助，教育会员效忠德皇与帝国。

福音派工会在其成立初期带有一定的反天主教的性质。但是事隔不久，在许多地方就开始同天主教工会在共同仇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对这些工会活动施加了巨大影响的是施特克尔，他同保守的封建人士有更多的联系。

122 福音派社会运动中的另一派代表人物是纳乌曼牧师。他充当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积极的殖民政策的狂热的卫道士。纳乌曼谴责那些"现今仍抱定昔日的理想不放"的基督教徒。他大叫大嚷："上帝要的是技术的进步，他要的是机器。"①他发表蛊惑性的言论，说什么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基督教，基督教社会运动必将取代社会民主主义；耶稣反对拜

① Fr·纳乌曼：《何谓基督社会?》，莱比锡，1896年版，第33、35页。

金主义，反对积累资财，他保护穷人。纳乌曼牧师同时写道：耶稣“不是共产党”，他来到人间并不是为了毁灭，“他将凯撒之物归还给凯撒，他改变了世界，但他并非革命者”。①

纳乌曼成了给德帝国主义唱赞美诗的人，他宣扬德皇应当依靠资产阶级，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侵略性扩张。他呼吁工人放弃社会主义的志向，帮助资产阶级实现发展德国工业和使全世界服从于其工业统治的任务。

德国工人大多数既不跟倾向容克地主的施特克尔牧师走，也不跟“为了福音”而倾向帝国主义的纳乌曼牧师走。至于那些个别真心真意想帮助工人阶级的新教派神职人员，则已确信基督教社会运动是工人的阶级敌人的工具。这些人找到了通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途径。格雷牧师就是这样的人。在 1896 年他还曾写道：福音社会运动“必然取代社会民主主义”。② 然而后来他确信这一运动

① Fr·纳乌曼：《何谓基督社会？》，莱比锡，1896 年版，第 9—10 页。

② P·格雷：《福音社会运动》，莱比锡，1896年版，第176 页。

已成为德帝国主义的工具，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来；1899 年，格雷转而参加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列里来。

在法国，根据保尔·拉法格的说法，十九世纪末天主教神甫们“决定同社会党人进行斗争，以扩大在工人中的影响。根据罗马密令，许多修道院长、神甫、隐修士开始参加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已久不露面的公开集会。他们的演说比资产阶123级政客和律师更为高明巧妙。他们不公开表态反对社会党讲演人，而是决定设法取胜。因此他们甘于无条件承认工人的处境已变得难以容忍，承认社会党人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所作的批判完全公正。但是除此他们还要补充说：当然，全部的罪恶之源都在于世人背弃了教会所指引的道路，藐视它的训诫。不言而喻，社会党人也象他们所攻击的那些人(如共和派、共济会员等等)那样，对根除人民的贫困无能为力。只有教会，上天才赋予使命去改善当代劳动人民和负担沉重的人们的命运……”①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 1 卷，莫斯科，1925 年版，第 23 页。

拉法格写道：修道院长、神甫并不满足于在集会上大发宏论，因为在这种场合往往要受到社会主义拥护者的批驳，他们开始在教堂里大事鼓吹，在这里他们不可能遭到什么反对。“为了使教堂里的集会也具有公开的民众集会的色彩，他们恢复采用了一种中世纪的传统手法。当布道者在发挥其基督教社会主义纲领的大道理时，跳出来一个中世纪称之为‘魔鬼的辩护士’的论敌来和他唱对台戏。这个人当然是为非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辩护的。不言而喻，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尽是些荒唐透顶的无稽之谈，因此，为天主辩护的一方总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制服了。”①前来听讲的往往还有社会党人。这样一来，天主教徒工人也就有机会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那里听到有关社会主义的真理。拉法格写道：“有教职教衔的人物亲自出马要想杜绝社会主义，其结果只是促进了社会主义的传播。”②僧侣们终于被迫放弃公开讲演。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1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24页。

② 同上，第25页。

利奥十三世的教皇《新事物通谕》在法国也成为创设基础较先前的天主教徒工人小组更为民主的天主教工人组织的推动力量。现在已不再突出工厂主和贵族“庇护人”在天主教工会中的作用，而是赋予这些工会这样的色彩：在这些团体内主动权属于工人（虽然工会实际的领导权仍然操在修道院长之手）。在许多城市里，神甫们经大主教和教皇的赞同开始建立“基督教工人小组”、天主教青年组织，此外，也成立各种工会，但他们对此已不大热心。这一运动也得到了先前的封建的“天主教社会主义”活动家德·曼和拉图尔·杜-潘的支持。德·曼认为同社会主义斗争已是“当124务之急”，而斗争的方法又有两种：其一是与资本家联合，其二是与民众联合。“德·曼特别强调第二种方法，即向群众进行蛊惑性欺骗对教会十分重要。”①

法国的天主教“工人”团体进行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宣扬工人同企业主的精诚团结。同共济会的斗争和排犹主义对这些工会所提出的口号

① A·З·曼弗雷德：《1871—1891年的法国对外政策》，莫斯科，1952年版，第489页。

起了不小的作用。僧侣们扮演了"劳动人民之友"的角色。他们召开"社会问题大会"，讨论"工人问题"。与此同时，主教团和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却都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各种天主教工人团体，担心组织在天主教工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会占上风，担心组织上的宗教外壳束缚不住人的革命化。对于某些教会领导人来说，德·曼的理论显得有些"危险"，"与社会主义同出一辙"①。

而德·曼本人所担心的则是天主教徒工农团体并不会满足于教权主义政治家们给他们划定的活动范围。

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无论是德·曼，还是别的天主教头面人物都主张：天主教工人团体都必须置于教会的经常监督之下。德·曼曾不止一次组织法国天主教徒工人去梵蒂冈作群众性的朝圣。第一次朝圣是在1887年，有一千四百名工人、一百名企业家、三百名神甫参加。教皇利奥十三世在向朝圣者讲话时要他们相信：教会是劳方的保护者。另一次来自法国的朝圣活动是在

① O·S·菲利普斯：《1848—1907年的法国教会》，第224页。

两年以后，为首的仍然是德·曼，还有兰斯教区大主教，参加者有四千人之多[1]。

俄国驻梵蒂冈代表恰雷科夫于1898年10月报告说，有一千五百名法国朝圣工人抵梵蒂冈，他写道：教皇在其演说中“对闻名于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表示热情鼓励”。[2]

在比利时，自教皇《新事物通谕》问世以后，在主教们的庇护下成立了一个天主教工人协会联合总会[3]。德·布鲁凯尔1911年曾写到过广泛的

125 “比利时教权主义分子的社会活动：比利时的天主教社会机构中有以免费就餐、射击有奖游戏、免费音乐会来引诱会员的工人之家，有‘黄色’工会，即受企业主一些小恩小惠拉拢的工贼组织，以及依靠政府和私人津贴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同工人组织进行竞争的互助会和合作社。除此，还有以廉价出售保守观点的小报的‘宗教出版机构’和依仗施舍穷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的圣维安桑·德·保罗事业。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农会’通

---

①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108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22页。

③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203页。

过其收购和经销机构及保险机构操纵农民的全部经济生活，结果在有些农村里农民如果不参加这种农会或想要摆脱教会的庇护便几乎无法生活……神甫们用于生猪保险、油类买卖、发售报纸、管理医疗费用和收买工贼这些事情上的时间，比用于宗教仪式、接受老祈祷者忏悔的时间要多。”①

教会对合作社给予了特殊的注意。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1902年曾写道：“……消费合作社在比利时社会党人手中是一种如此有力的工具，连组成比利时最反动的党派的天主教界人士也懂得了这一工具的方便，决定利用合作社来同社会党人作斗争。他们也开始组织起自己的合作社来，引诱尚未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以及无知的农民(主要是后者)。”② 在天主教党和僧侣阶层的领导下成立了各种经营种籽、肥料、机器买卖的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牛奶合作社以及其它合作组织。各种天主教的合作组织都要求其社员效忠于宗教

① 德·曼、德·布鲁凯尔：《比利时工人运动》，莫斯科(出版年代不详)，第79—80页。

② 《火星报》，1902年5月1日，第20号。

和其它“社会基础”，即效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荷兰也成立了天主教工会。关于这些工会在1903年初铁路员工罢工（天主教政府实施恐怖法令来对付工人）期间所持的立场，《火星报》曾写道：“基督教工会在激烈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的所作126所为是这场斗争中最可悲的插曲之一。这些与众不同的‘基督教徒’尽是些出卖自己的正在斗争的同志的货真价实的叛徒，很少有什么例外。他们对于自己的同信仰的当权派（当时教权主义政党是执政党——舍英曼）象狗一样的忠实，声言自己拥护这些‘严酷的法令’。”①

尽管意大利的主教们对于即便是在教会领导下的工会也持不信任的态度，但是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工会也在意大利开始建立起来。斯图尔佐神甫直言不讳：意大利成立各种天主教工人团体的起因是急于阻挠天主教徒工人团结在社会主义政党周围。1902年1月，共有十万会员的二十二个天主教工会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全意大利天主教工会中心。

---

① 《火星报》，1903年5月15日，第40号。

沙俄政府官员和东正教主教们也在研究西欧各国“基督教社会运动”和基督教工会的经验，以便结合俄国的条件加以应用。

后来官至正教院检察长的君权主义者萨布列尔于1906年赴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其它各国，考察这些国家所采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方法。他最为满意的是天主教教士的活动。他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僧侣们和同情他们的政论家和活动家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①

建立教权主义工人组织的尝试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年代更加紧进行。

1905年，教权主义政党“基督教奋斗兄弟会”宣告成立，要为“实现普世基督教的诸原则”而奋斗。该“兄弟会”纲领中列入了一些“激进”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却必须在“基督教之爱的原则”的基础上实现。② 米·奥利明斯基就此问题在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上写道：“几乎经过了二十个世纪以后，我们的基督教徒才忽然想起需要

① B·萨布列尔：《论与社会主义之和平斗争》，谢尔基也夫镇，1911年版，第10页。

② 《前进报》，1905年3月23（10）日，第11号。

提出‘大力实现普世基督教诸原则’来作为奋斗目标。这就是那种恭顺、忍让和期望死后报应的原则吗？不，就连最‘干净’的基督教也是有害的。”①

127　1906年彼得堡神学院《教会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吹捧克特累尔、利奥十三世、施特克尔和其他“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呼吁东正教教会也要以天主教会为榜样，充当工人和企业主的中间人，并在各教区建立基督教工会。②

但所有这些痴心妄想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对资产阶级和神甫们分化工人运动的企图进行了反击而一一落空。

综上所述，天主教会（在居民为非天主教徒的国家内则为新教派教会和其它教派教会）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便遵照利奥十三世教皇《新事物通谕》所阐述的纲领，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在资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下充当了敌视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团体（基督教工会、合作社以及其它组织）的一名主要组织者。这些团体的根本宗旨在

① 《前进报》，1905年3月23（10）日，第11号，4月12（3月30）日，第14号。

② 《教会通报》，1906年第40号，第1285—1290页。

于：以宗教为掩护，冒充“非政治”团体来分裂工人阶级，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削弱工人运动，阻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阻挠工人阶级去完成其历史使命。

工人运动的成就越大，教会反对它也越起劲。同社会主义作斗争成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罗马教廷政策的最主要目的之一。

天主教主教们和罗马教廷都鼓励所谓的基督教社会运动，把它作为可以转移部分工人对自己处境不满情绪的一条出路。但与此同时，教会上层分子对各种群众性的天主教徒工人组织又不完全放心，因而对它们实行监督，使其不越出罗马教廷和资产阶级所划定的框框，但是基督教基层工会组织却常常不顾僧侣阶层和天主教政治活动家的控制，支持罢工运动。

教会当局也担心天主教工人组织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组织相接近。

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特征是社会蛊惑——对资本主义“缺点”的批评，现在则是提出“建设性”的纲领和天主教社会团体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国务活动。扮演这一角色的必然首先是十128

九世纪末出现于欧洲一系列国家的所谓基督教(天主教)社会党。基督教的其它社会组织(工会、合作社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这些政党的群众性的支柱。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活动家
论"基督教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对于在工人中间鼓吹"基督教社会主义"，不能漠然视之。因为后者在理论上同科学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而且在实践上也使一部分劳动者脱离阶级斗争，在他们中间散播幻想，成了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的工具，从而给工人阶级造成极大危害。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一篇著作《"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中论及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时写道：这些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18页。

恩格斯在其《共产主义原理》(1874年)一文中揭露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敌视工人阶级的性质。他写道:“希望恢复贵族、行会师傅、手工工场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代社会的各种缺点,但至少会有同样多的其它灾难,而且它也不会开辟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途。”①

恩格斯指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害怕工人阶级的革命化,并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在这种场合下,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②

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作为封建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其反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揭示:“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总是同 129 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基督教社会主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25页。

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①

在德国，面对僧侣阶层讨好工人并劝诫他们说什么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所维护的原则也就是社会主义所维护的那些原则，奥古斯特·倍倍尔曾于1874年挺身而出加以反对。早在1873年11月22日，天主教神甫霍霍夫致书《人民国家报》反对倍倍尔的观点，企图反驳他对天主教会反动活动所做的批判。霍霍夫硬说基督教会想要加以消灭的，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想要消灭的东西。霍霍夫写道："请对我说出你们认为是可耻的和卑鄙的东西和你们想加以消灭的，那怕一件两件，如果人们信奉了天主教教义，这些就不可能清除或消灭。”②

倍倍尔在答霍霍夫书中揭露：企图把基督教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是行不通的。倍倍尔写道：在十八个世纪的过程中，基督教“这一爱的宗教”在实际上一直都是“仇恨、迫害和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75页。

②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卡普兰·霍霍夫和奥·倍倍尔二先生之宗教论战》，柏林，1906年，第4页。

迫"的宗教；"基督教敌视自由和文化。基督教传布温顺地服从'上帝安排的'当局的教义，鼓吹在苦难中容忍和宽恕，鼓吹今世的一切苦难不幸将在死后得到极乐幸福的报应的许愿从而引诱人类离开他们的目标——在一切方面都不断进步，力求达到人类的最高发展水平，尽情享受已经获得的福利。基督教把人类紧紧地束缚在受奴役和受压迫的状态之中，而且时至今日仍然被利用来作为政治社会压迫的一个最重要工具，它就是为此服务的。"①

倍倍尔谈到了教会贵族的假仁假义。这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之友"，鼓吹兴办慈善事业作为医治资产阶级社会各种"缺陷"的良药，以便阻挠人民大众为争取自身解放而积极斗争。倍倍尔写道："你们的主教们，你们的神甫们，你们的伯爵们、男爵们和资本家领导着天主教运动，他们都不是我们的人，他们不希望人人平等和幸福，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或至少应当利用这种地位来促进人类 130

①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卡普兰·霍霍夫和奥·倍倍尔二先生之宗教论争»，柏林，1906年，第13页。

的繁荣昌盛，他们不是也表示追求这一目的吗？然而他们却是各种特权、等级和阶级统治的主要卫道士，他们所要的不是公道，而是慈善事业，不是平等，而是逆来顺受，俯首听命，不是科学，而是迷信。"①

倍倍尔表示相信：现在跟着教会走的天主教徒有一天一定会睁开双眼并转到社会民主主义方面来。

倍倍尔在结束他的复信时写道："总而言之，我对您所说的基督教所追求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这样一种观点不能苟同。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互对立，如水火之不相容……"

倍倍尔在其1901年所写的答霍霍夫书新版序言中指出：这本小册子所提的全部问题虽然是二十七年以前提出来的，但是至今仍然未失去其意义。

在德国，反对企图把社会主义同基督教混为一谈的还有约瑟夫·狄慈根。关于他，弗·伊·列宁曾写道：这是一个"杰出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著

①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卡普兰·霍霍夫和奥·倍倍尔二先生之宗教论战》，柏林，1906年，第15页。

作家和哲学家”,[1]他“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虽然也常常陷入混乱,但仍能“怀着多么深厚的真正革命者的热情抨击并痛斥了唯心主义教授们和实在论等等这些‘僧侣主义的老牌走狗’”

狄慈根曾批判过社会党人中有人企图以基督教偷换社会主义,破坏工人运动。他写道:“据说基督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其实社会主义与基督教风马牛不相及,有如白天之于黑夜。当然,他们也有类似之处……那么二者又有何不同呢?白天和黑夜的共同之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时间的一个时段,魔鬼和天使虽然皮肤前者是黑的而后者是白的,但两者总有一点相同,即都有皮肤……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是否有许多共同之点,且不去说它,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要是有人把基督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他也就有资格被称之为有害社会的糊涂虫。只知道事物之间的共同性是不够的,还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2]狄慈根证明了:基督教关于逆来顺受和上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63页。

② 约瑟夫·狄慈根:《社会民主主义的宗教》,柏林,1891年版,第27页。

帝(人在其面前无能为力)万能论的教义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敌对的。

在法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革命马克131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拉法格和盖德出来反对宗教把工人诱入歧途。

保尔·拉法格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史的有价值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他将各种宗教观念的世俗渊源一一加以揭示。拉法格在其抨击性小册子中全面揭露了宗教的反动作用，指明了：教会从属于资本，梵蒂冈与天主教的主教们参予反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阴谋活动。

拉法格写道："工业大资产阶级尽管对天主教僧侣的教阶制，对他们的贪得无厌和干预家庭事物很有反感，但是在政治方面和财政方面也还是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勾当中为自己多方效劳。"①

拉法格把资产阶级的信奉宗教同工人阶级的无神论及其对宗教的冷淡态度作了对比。工人阶级是把宗教和教会当作资产阶级的统治支柱来与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3卷，莫斯科，1931年版，第184页。

之进行斗争的。他写道："……在欧美工业无产阶级中间，既没有发现有什么创始新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的动态，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把基督教加以改良的倾向。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各种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对于有关宗教教条和唯灵论世界观的论战都丝毫不感兴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所有一切教派的神职人员当作资本家阶级的奴仆而与之进行斗争。"①

同拉法格一起反对宗教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还有朱尔·盖德。他揭露了德·曼这种类型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缺乏论据和蛊惑人心，并坚决批驳了把社会主义同基督教混为一谈的任何企图。

盖德在1879年发表的《致利奥十三世先生》的公开信中写道："您在以比我们更为权威的身份来代替我们回答那些非难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早期基督教的剽窃者，说我们也是赞成'那些学说、那些理论和那些原则'）的政客们时，没有忘记断定：我们所要的平等是物质上的直接的平等，与福音书上所说的柏拉图式的非尘世的平等

① 《保尔·拉法格文集》，第3卷，莫斯科，1931年版，第164页。

毫无共同之处……"①

盖德写道："……每个严肃的、正直的、有头脑的人都不能把某些基督教派主张的古老的财产公有同现在所说的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前者的基础是对'暂时的'荣华富贵嗤之132以鼻，漠然视之，而后者力求对一切现有资本实行共同或集体所有，其目的是保证人人都能享受为了积累这些资本而付出的精力和劳动的全部成果……"②

1896年6月15日法国议会会议上盖德发表演说反对德·曼这位"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和"关心"起工人来的教权主义分子。他声称：如果说资产阶级及其奴仆竟然也来关心工人问题了，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在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反抗的压力之下，在对社会主义宣传深入人心感到恐惧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罢了。盖德质问企图在法国议会中扮演工人"庇护者"角色的德·曼伯爵和"天主教社会主义者"们时说道："过去是完全

① 朱尔·盖德：《妇女和资产阶级社会》，莫斯科，1925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第13页。

地绝对地属于你们的。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呢，基督教徒先生们？十八个世纪之内你们一直都是世界的主宰，你们的教皇把国王和皇帝都踩在自己的脚底下。十三个世纪以来，你们对人类随心所欲地加以摆弄，你们不去解放他们姑且勿论，你们甚至连创造条件保护他们免遭注定要发生的潜伏的种种危机的侵袭也未能做到。你们两手空空而来……你们尽是无能之辈！这一点已为全部历史所证实……如果你们有时也再度在舞台上出现，那么这也并非是为了那些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救自己的工人的利益。你们插手，为的只不过是反对他们罢了……"①

盖德揭露了号召人类复古倒退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计划。他在议会的同一演说中说："对于德·曼先生及其来自右的应声虫们来说，解决政治问题在于有一个仁爱的国王。宪法无济于事，人权也是枉然，只要有神权就足够了。而神权又是遵照神的恩意体现在国君身上。仁爱的国王，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当今之世，

① 朱尔·盖德：《议会演说集》，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198页。

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你们来说就在于有一个好主人身上。这就是可以称作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那种东西的基础和实质。"①

在第二国际所属各党内，势力越来越大的机会主义分子们，在其对宗教的态度问题上，特别是在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也开始使社会主义政党采取错误的方针。他们磨灭两者之间的原则差别。卡·考茨基在其论文集《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会》(1902年)中写道：天主教僧侣阶层是"任何一个革命运动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对消灭剥削制度和阶级差别的任何愿望都怀有刻骨的仇恨。"然而考茨基却又认为："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消灭阶级差别的愿望与基督教的福音教义都是一致的。"② 考茨基写道："它（指基督教——舍英曼）在符合社会主义的愿望这一意义上来说是可取的。"但是须知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都表明：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别的什么宗教，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愿望"，两者无

133

① 朱尔·盖德：《议会演说集》，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199页。

② 《新时代》，1902/1903年，第1期，第4页；卡·考茨基：《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会》，莫斯科，1906年，第16页。

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敌对的，而且事情还不只是在于考茨基所说的僧侣阶层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态度。

对于这类观点的谬误之处，弗·伊·列宁在其发表反对寻神说的意见时曾指出过。例如，在致高尔基信(1913年)中，他表示反对高尔基的下述观点："神是部落、民族和人类制定的那些观念的复合，这些观念为了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为了抑制动物性的个人主义而去激发和组织社会感情。"这样的观念既错误，又反动。弗·伊·列宁写道："象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一种最坏的'社会主义'和一种对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歪曲）一样，您使用的方法（尽管您有最好的愿望）也重复僧侣们的那套把戏：从神的这个观念中撇开历史上和生活里的东西（鬼神，偏见，愚昧和闭塞的神圣化以及农奴制和君主制的神圣化），并在神的观念中加进善良的小市民的词句（神＝'激发和组织社会感情的观念'）以代替历史的和生活的现实。"①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可以断言基督教"符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09页。

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愿望"，即：如果基督教抛弃近两千年间基督教之所以为基督教的一切东西。两千年间它一直大肆宣扬奴隶制有理、农奴制有理，资本主义有理，而现在则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圣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对劳动人民的奴役。

"基督教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固然是"一种最坏的'社会主义'和一种对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歪曲"，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说134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条件下对于劳动人民中政治上不甚开展，尚未自觉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那些阶层来说，"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能唤起对受压地位的反抗感情。

1905年5月，列宁写道：俄国人民中间积累了许多革命的活力——工人运动的扩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壮大，所有这一切，也象僧侣界骚动不安，教派分子和"异教徒"愤慨不平，"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出现"等等一样，"都最最有利于革命"①。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8页。

然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反动的，同样，那些在教会和资产阶级积极参与下，打着这些思想的旗号，以联合劳动者为宗旨而建立起来的和正在建立的组织，也是反动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同“基督教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认为把社会主义同基督教混为一谈毫无根据，但是从来都不曾反对过主张社会主义的工人同信仰基督教和其它宗教的工人之间的团结。

弗·伊·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教水火不相容，进行反对宗教的思想斗争对无产阶级政党极为必需。他写道：“我们的党是觉悟的先进战士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愚昧的表现置之不理。”①

与此同时，列宁一再指示：为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胜利，劳动者不分宗教信仰实行团结极有必要；这个团结比一切都重要，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任务来看，对待宗教的不同态度是次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4页。

的问题。列宁写道："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页。

第三章　梵蒂冈与“基督教民主”

“基督教民主”的产生

十九世纪末期，从“基督教社会运动”中分离出一个既相对独立又与它紧密相连的所谓“基督教民主”运动，后来发展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

从组织上来说，天主教会的基督教社会活动集中于基督教工会和其它工人组织、慈善团体和类似的团体，而基督教民主活动则集中于竞选团体、政治团体和政党。

基督教民主派以超阶级的、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力量”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始终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效劳。它过去(和现在)都把社会主义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

基督教民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于它具有宗教色彩，所以能够

吸引小资产阶级中相当广泛的阶层和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参加。

基督教民主的产生反映出一种情况：在帝国主义时代，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积极的政治活动了。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担当了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领袖。资产阶级力图使劳动人民离开社会主义政党，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为此，过去和现在一贯与无产阶级民主为敌的天主教会，不得不以拥护"民主"的面貌出现，以求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 136 组织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保卫资本主义。承担这个任务的便是基督教民主团体和天主教政党。

对待教会及其背后的势力，基督教民主运动并不是时时处处唯命是听的。这一运动吸收的参加者是人数众多的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他们真诚地相信，沿着教会指示的道路前进，就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并实现社会正义。许多国家的运动在某些时候（如在意大利和法国）超出了教会和与教会有联系的天主教活动家划定的范围。那时梵蒂冈就不惜采取迫害基督教民主组织的手段。

许多国家中出现的基督教民主团体和政党，未能制订某种明确的纲领以阐明这些政党的基本原则、宗旨和实现宗旨的途径。这是由于天主教政党和基督教民主团体想要成为"一切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在已经划分成阶级的社会中这是不可能的。这些组织，把反对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尽管它冒充什么"第三种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督教民主党在一些国家(奥地利、比利时等等)掌握了政权，它们利用国家机器的暴力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们成了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

基督教民主和它所创立的政党和团体，广泛采用社会蛊惑宣传。这种宣传表现为对"金钱势力"的攻击和对穷人及被压迫者虚伪的同情。社会蛊惑性宣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吸引政治上落后的劳动者，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教权派政党的手段之一。

中央党变为德国资产阶级领导党的过程

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在西欧诸国的天主教

政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不是从基督教社会运动中产生的，但实际上却起着类似其它国家天主教政党和团体的作用。中央党作为南德意志割据主义者的政党产生于1870年末，最初是"天主教137界保卫自己反对统治普鲁士的新教与自由主义的工具。"①"可是，中央党的力量，"恩格斯写道，"与其说在于天主教的宗教，不如说在于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目前要求统治德国的道地的普鲁士制度的反感。"②

割据主义是中央党政治纲领的特点之一。

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党的领导和财政大权就完全掌握在西里西亚——维斯特法利亚封建贵族手中，他们除占有极大的领地之外，还拥有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煤、铁)。"③靠反对普鲁士——俾斯麦德国起家的中央党，后来却逐渐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领导党、德国军国主义化和侵略性殖民政策的积极带头人和以反对劳动人民为目的的

① 恩斯特·台尔曼：《德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党——中央党》，载《国际》杂志，1932年，第1期，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7页。

③ 恩斯特·台尔曼：《德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党——中央党》，载《国际》杂志，1932年，第1期，第10页。

反动对内政策的拥护者。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央党在政府政策的某些问题上有时还采取自己的特有立场。然而，当触及德国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时，中央党就成了这些利益的捍卫者。1887年和1893年，中央党在国会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增加和平时期部队军事预算的军事法案。中央党反对建立强大军事机器计划的立场便从此告终。中央党首领卡尔·巴赫姆就这件事写道：在1893年不顾中央党的反对通过了军事法令之后，必须刻不容缓地改变党的政策；面临的问题是：当反对党呢，还是立足于新的事实。① 中央党没有当反对党，而是同军国主义者、同政府结成了联盟。巴赫姆用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们惯用的理由来为这一方针辩解：别的国家威胁他们，而他们自己是希望和平与正义的。巴赫姆写道："法国武装自己是为了战争，而德国武装自己是为了保持和平；法国实行的是帝国主义实力政策，德国实行的是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5卷，第307页。

法制与和平文化建设政策。"①中央党的党魁们就138是这样美化德皇威廉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的。

十九世纪末，德国开始建设庞大的海军，这与德、英争夺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有关。中央党的党魁们赞成建设海军，理由是："为了保卫德国的海岸和冲破封锁"需要这样做。但同时又躲躲闪闪，装出一副不完全同意黩武主义的样子，1897年12月，中央党首领李伯尔在国会中以中央党党团的名义宣称，建设海军将需要大量经费，会成为居民的沉重负担。但李伯尔根本不是建设海军的反对派，只不过对法案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正，对事情本质毫无影响。问题提交国会预算委员会。1898年3月，当国会讨论预算委员会的决定时(代表委员会作报告的人是李伯尔)，中央党的大多数议员对法案表示赞成，而社会民主党议员则表示反对。

1900年2月——6月，建设庞大海军法案在国会中再次进行讨论，政府的计划是在十六年内建成一支巨大的海军，需要花费十六亿马克。问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5卷，第309页。

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央党议员的态度。统治集团在德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梵蒂冈的协助下，竭力对中央党的首领们施加影响。1899年末，德国报刊上登载了一则消息，说国会议员盖特林格(中央党)代表本国政府在梵蒂冈同教皇进行谈判。德皇政府答应取消反耶稣会法并在柏林建立教皇圣使馆，这一切都是对中央党支持海军法案的报答。①虽然德国天主教报刊否认这则消息，但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和外交大臣比洛曾向中央党代表（施潘和阿伦贝格）宣布，教皇希望海军法通过并为此尽自己的一切努力；这一点他曾特地告诉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罗滕甘。②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的首领、该党的国会议员仍然装出一副不完全支持政府计划的样子：他们提出了与政府计划的本质毫无分歧的修正。建设海军法案在国会中进行最后宣读时，在中央党的支持下通过了。 139

后来，当1906年和1908年在国会中讨论海

---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309页。

② 同上。

军法时，中央党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方案。中央党议员投票赞成愈来愈庞大的军事建设计划、国家军国主义化，因而也赞成德国帝国主义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准备。

1902年9月24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班贝格发表的演说中，关于中央党对待政府军备政策的态度问题是这样说的：在这件事上帮助政府的"首先是中央党的成员，因为以极其赞许的态度投票赞成增加海军和陆军拨款的正是他们。中央党年复一年地同意政府这样做……""也就是说，一个自称保卫'基督教'、愿做和平博爱之党的政党，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为了大规模的屠杀而支持国家政权。我们应当把大力革新海军装备的功劳归于谁呢？首先，归于中央党……"①

中央党逐渐成为政府党并支持政府的一切措施。

梵蒂冈希望中央党成为政府党，而不希望它成为反对党，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天主教在德国的

① 奥·倍倍尔：《社会民主党与中央党》，柏林，1903年版，第8页。

阵地和罗马教廷本身的阵地，所以梵蒂冈促使中央党与政府接近。1900年10月26日（11月6日），俄国政府驻梵蒂冈代表萨宗诺夫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梵蒂冈人士对任命比洛为德国首相表示赞许。“教廷对新首相表示十分热烈的情意，”萨宗诺夫写道，“据我听说，还力求达到另外的、更加深远的目的。有人认为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希望得到帝国政府的好感，以便更有效地促进，倘若可能的话，政府与中央党接近……”“假如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在这方面如愿以偿，”萨宗诺夫继续写道，“中央党就会变成执政党，就有可能投效德国政府而向它漫天要价……”①

中央党愈益成为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党，它就愈加积极地支持不仅是军事建设计划，而且还有德国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性侵略性殖民计划。如果说这个党以“自卫”的需要来为发展军国主义辩解的话，那么，中央党为强占殖民地开脱罪责时，用的却是宗教理由——必须“用基督的真理之光”“使野蛮人开化”。 140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136页。

中央党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个党的功劳就是在德国殖民扩张初期挺身而出，拥护实行殖民政策并在1884年的选举宣言中支持“健康的殖民政策”。① 1885年，中央党的首领和创始人之一文德霍尔斯特宣称：“我们现在拥护，将来也拥护明智的殖民政策……”②

在1896年多特蒙德的全德天主教大会上，中央党活动家阿伦贝格亲王发言拥护德国的“基督教殖民政策”。③

中央党的历史学家和首领之一卡尔·巴赫姆假惺惺地断言，中央党重视的首先不是从殖民政策中获取物质利益；对中央党来说主要的问题似乎是使非洲人民基督教化并提高他们的文化。④这种说法是积极支持德国殖民者的教权派假慈悲的典型论调。中央党的首领们有时仅只反对德国

---

① L·查赫：《中央党五十年》，柏林，1921年版，第83页。

②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6卷，第331页。

③ 《欧洲历史年鉴，1896年》，第102页。

④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5卷，第50页。

行政当局在殖民地的过分严重的暴行，因为这些暴行激起当地居民对殖民者的仇恨并使他们的地位发生动摇。1906年3月，中央党议员施潘在国会中说，我们的宗旨是向殖民地国家"输送文化"，而不做征服者，德国殖民地文化的发展依靠的不是我们的军事力量，而是我们的传教士。①中央党的著名首领之一埃尔茨贝格也这样断言。他写道，德国关心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和经济繁荣。②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殖民政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是传播文化的政策。那些渲染德国（和一切其它）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的人，只能促使他们对殖民地人民犯罪，而德国的金融巨头和工业大亨，其中包括中央党本身的某些活动家，信仰新教的也好，信仰天主教的也好，都同样地从掠夺殖民地中得到好处。

1906年12月国会讨论殖民政策问题时，中央党议员列连发言反对殖民机关的非法行为，但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十一届议会第二次会议，1905—1906年》，第3卷，柏林，1906年版，第2028—2029页。

② M·埃尔茨贝格：《德国殖民政策的结果》，载《从世界法庭看德国殖民政策》文集，巴塞尔，1918年版。

不反对殖民政策。发言反对殖民主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①

中央党在国内也维护违背德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反动政策。中央党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它认为，靠政府的镇压手段同社会党人斗争是无济于事的，于是自荐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精锐力量，并在该党的竞选纲领中这样吹嘘自己。②

中央党拥护政府的反波兰方针，虽然从策略上考虑（为了不失去波兰天主教徒的选票）中央党的首领们还是装出一副不完全同意这一方针的样子；他们反对政府政策的程度以这种政策触及宗教问题的程度为限（例如，祈祷仪式和教授波兰儿童神学课使用什么语言的问题）。但是中央党不进行反对强制波兰人外迁和抗议反波法令的斗争。卡尔·巴赫姆写道，波兰人往往坚持“不明智的”、“不可理解的”立场，因此中央党在波

---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十一届议会第二次会议，1905—1916年》，第5卷，第4052—4071、4085—4096页。

② 见《新时代报》，1903年，第41期，7月，第473页；L·查赫：《中央党五十年》，第46—47页。

兰问题上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不指望得到他们的感谢。① 显然，中央党的这位首领(象其他首领一样）认为，波兰人应当感谢他们的压迫者——普鲁士——容克国家及其帮凶。

中央党还积极参与使阿尔萨斯-洛林德国化的活动。

中央党与德国其它资产阶级政党有什么区别呢？中央党是一个"天主教的"政党，依靠天主教会的支持并在它的帮助下吸引信仰天主教的群众，其中包括相当大的一部分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关于中央党，弗·伊·列宁曾经说过："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德国反动的'中央'党，即天主教党怎样组织人民群众，这是很有教益的。他们在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口号下，竭力号召群众来保卫资本 142 主义……"②

"……在德国"，列宁写道，"政治斗争采取特别尖锐的形式，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觉悟也特别高，但那里，仍然存在着象中央党那样的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5卷，第410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6卷，第206页。

政党(而且是强有力的政党)，它们以特殊的宗教标志来掩盖各自的（一般说来无疑都是反无产阶级的）阶级内容。”①

由于中央党具有天主教的性质，所以天主教僧侣在党内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僧侣代表不仅在本教区担任中央党的宣传员，而且还在党的机关里占据重要职位。②这助长了党内反动势力的加强。中央党通过天主教主教团和天主教政治活动家与梵蒂冈联系起来。

教皇密切注意中央党的活动。党的首领常常到梵蒂冈去，并且必须使自己的活动符合梵蒂冈的旨意。1900年11月，中央党首领李伯尔访问梵蒂冈并受到教皇利奥十三世的隆重接见，教皇奖给他一枚大十字庇护勋章；过了不久，教皇又授予他教皇高级侍从的称号。③

天主教会依靠中央党为教会组织争取特权并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1页。

②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5卷，第30页。

③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6卷，第141页。

使社会生活日益教权主义化。

为了控制劳动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中央党采取社会蛊惑手段。它无条件地维护私有制、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并鼓吹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卡尔·巴赫姆写道，中央党的社会政策是对生活贫困的同胞施以"基督之爱"；这一纲领来源于教会的教义：关于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人的教义、关于在尘世生活中的任务和最终的目的的教义、关于他们应当在尘世生活中寻找通向"永恒幸福"之路的教义；所有的人都具有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尘世幸福的权利，但不要让它成为"拯救灵魂"的障碍。① 中央党的社会纲领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是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的。

教权主义政党对工人的"灵魂"表示关心，它答应给予劳动人民死后的"永恒幸福"，但拒绝给予他们尘世上的幸福。中央党提出，"基督教职业阶层的劳资协会组织"的原则② 是"经济健全化" 143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4卷，第95—96页。

② 同上，第9卷，第129—130页。

的指导性原则。大家知道，这个原则后来成了法西斯“社会纲领”，即在“阶级合作”和工人与企业主利益一致的借口下让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纲领的核心。标榜自己是工人利益捍卫者的中央党，实际上却支持威廉二世的“工人政策”。

中央党“捍卫”工人利益的表现，可以从下面这件事来看：早在1899、1900年，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时候，中央党却主张每周工作六十三小时。①

中央党领导下的基督教工会分裂工人阶级并削弱它的力量。

由于中央党变为执政党，它原来的狭隘的天主教性质就可能在新教居民占优势的国家妨碍非天主教徒团结在党的周围。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年代，中央党内发生了关于党的性质的争论：中央党应当是一个宗教性的，而且仅仅是天主教的党呢，还是一个虽然是天主教的，但并非狭隘宗教性的政党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从1909年科隆天主教徒会议上开始的。一

① L·查赫：《中央党五十年》，第93页。

些天主教活动家主张，中央党仅仅是天主教党、宗教性的党。天主教的《科隆时报》反对这种主张，坚持中央党应当联合一切基督教徒反对“自由主义”的纲领①。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联合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敌对力量。这个问题在1909年通过的德国国会中央党党团领导、普鲁士地方自治代表会和普鲁士中央党执行委员的共同宣言中得到了解决。宣言中说，中央党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党，这个党立足于德国的宪法并关心整个社会的福利、“所有阶级”的所有公民的福利；同时，它认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捍卫德国天主教徒的利益是自己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宣言中还说，中央党并不因此而失去纯粹政治性党 144 的性质，中央党从来不使党籍从属于天主教教籍；国会中央党党团的成员中也有非天主教徒。②

中央党已成为全国性的政党，在新教居民占多数的国家中不能作狭隘的天主教党。于是中央党宣称，它是以天主教势力为主的跨宗教政党。

---

① M·佩尔诺：《庇护十世的政策》，巴黎，1910年版，第233—236页。

② W·蒙森：《德国党纲》，慕尼黑，1952年版，第78、79页。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天主教的主教们也反对中央党具有宗教性，支持党内主张中央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那派人士，① 因为主教们依靠政治性的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较容易。

中央党这样的性质也比较符合罗马教皇的意图，教皇希望中央党在德国的生活中起主导性的政治作用。1908 年 4 月，萨宗诺夫就比洛首相访问罗马并受教皇接见一事向伊兹沃利斯基写道，罗马教皇主张中央党同政府合作；教皇恐怕“中央党由政府党变为反对党，逐渐失去它特殊地位的利益”②。

当时中央党反对比洛政府，这引起梵蒂冈的不满。1909 年 1 月 20 日（2 月 2 日）萨宗诺夫写道，中央党同比洛之间斗争的尖锐化“使教皇极为不快”，“中央党由政府党转变为反对党使他对天主教在德国的前途感到担心”③。

1914 年 2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中央党领导批准了国会党团和普鲁士地方自治代

① M·佩尔诺：《庇护十世的政策》，第236—237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23，第 94 页。

③ 同上，案卷 26，第 11 页。

表会议1909年11月关于党的性质的宣言。宣言说，它以德国的法律为基础，党的拥护联邦制、忠于国家、卫国和保皇性就是由此而来。①

中央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也是一个政府党。

总之，中央党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就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起巨大的作用。政府的法案通过与否，往往取决于国会中中央党议员的立场。　145

中央党的首领们硬说，该党的目标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保护所有阶级的利益，该党根据"基督教原则"推行政策。实际上，中央党积极拥护德国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殖民侵略、国家军国主义化和战争准备。在对内政策方面，中央党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沆瀣一气，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主要的敌人。直到霍亨索伦王朝末日，中央党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皇党。

中央党是一个权势极大的政党，但没有做过一件有利于德国劳动人民的事。它的全部活动都是符合德国容克地主和工业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① «欧洲历史年鉴，1914年»，第68页。

的。

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央党虽然有资产阶级和教会的支持，而在国会选举时投票赞成它的人数增加得比较慢。从下列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①：

年 份	赞成中央党的票数（以千计）	赞成社会民主党的票数
1890	1 342	1 427
1893	1 468	1 788
1898	1 455	2 107
1903	1 875	3 011
1907	2 180	3 259
1912	1 997	4 250

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执政

有些欧洲国家，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基督教社会党就成了执政党。他们有可能实践自己的“基督教原则”。这些“原则”实际上是些什么货色

① Г·霍费耳德：《1849—1934年德意志帝国历史文献》，第2卷，莱比锡，1934年版，第874—875页。

呢？

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就是这样的政党之一。它于十九世纪末成立，在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为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并为德奥合并作好准备。基督教社会党自称是"真正自由思考的"、"真正保守的"、"真正人民的"党。它吸引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 146 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广泛阶层、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农民。

基督教社会党没有制订出固定的纲领。它欺骗那些处于教会势力之下、受肆无忌惮的社会蛊惑、民族主义和排犹宣传影响的政治上不大开展的人。它许下诺言反对大资本家，实际上却没有为劳动人民做任何事情并以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敌。

基督教社会党作为教权主义的政党，是以1891年教皇《新事物通谕》中阐述的所谓天主教会"社会纲领"为出发点的。这个标榜自己是"小人物"利益捍卫者的党，坚持私有制原则并敌视工人的阶级斗争。党的领导人和思想家随着教会一唱一和地说，当代人民的灾难来源于以唯物主

义为基础的世界观的胜利①。

基督教社会党没有提出任何改善劳动人民状况的纲领，但却极其重视在人民中传播宗教。它维护宗教婚姻，力求使教会在家庭生活中起统治作用。它非常含糊地说，工人有权利得到“合理的工资”，然而它虽然在各下议院，尤其是在维也纳占多数，却没有为工人谋过任何福利。它反对男女平等，反对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但这并不妨碍它通过僧侣感化妇女，让她们的丈夫投票支持它的候选人。

基督教社会党提出种种“援助”农民的方案——符合富裕农民和地主利益的方案。它要求“农户不可分解”②，其结果必然是相当多的农民群众无产化。这项要求后来成了德国法西斯的农业基本纲领。为了富裕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基督教社会党还要求限制农民迁入城市。这必然使地主和富裕农民得到廉价的劳动力。在竞选期间，

① T·W·泰芬：《基督教社会党及其纲领》，维也纳，189……年版，第7—8页。

② 同上，第10页。

基督教社会党随便许诺，以讨好各阶层居民，但 147
并不打算履行自己的诺言。

该党的创始人和多年来的首领一直是1895年当选维也纳市长的卡尔·柳叶格尔(死于1910年)。奥地利主教胡达利写道，柳叶格尔同时与纳粹主义真正的先驱者舍涅勒尔有联系①。柳叶格尔本人也是希特勒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关于他的情况，英国外交家格雷戈里写道，这是一个专搞祭坛与王位结盟的蛊惑家；他最有力的武器是排犹②。排犹的蛊惑性宣传使柳叶格尔及其追随者能够象希特勒分子后来所做的那样，欺骗政治上落后的居民阶层，把他们所受灾难的罪责推到犹太人身上，使小资产阶级不再仇恨世俗和宗教封建主、奥地利和其它国家的资本家。

该党煽动敌视各斯拉夫族人民（捷克人等）的情绪，它是黑暗的反动势力和教权蒙昧主义的

---

①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1806—1918年》，慕尼黑，1952年版，第240页。舍涅勒尔是奥匈帝国反斯拉夫与反犹太的"德国国家党"的首领。

② J·D·格雷戈里：《在外交边缘上(1902—1928年)》，伦敦，1928年，第45页。

支柱。

从基督教社会党诞生的第一天起，梵蒂冈就非常重视它并且支持它。奥地利统治集团起初对它抱怀疑态度。他们害怕柳叶格尔及其追随者进行社会蛊惑性宣传与煽动民族主义；他们还害怕该党掀起的群众运动，虽然领导运动的是低级僧侣。反对基督教社会党的有红衣主教——维也纳大主教格鲁沙、布拉格大主教顺博恩、萨尔茨堡大主教卡特施哈尔捷尔和奥地利贵族的头面人物。

政府首脑文季施格列茨公爵和教育大臣写过关于基督教社会党的备忘录，经内阁一致通过。这份备忘录通过红衣主教顺博恩送呈教皇。备忘录中说，保守的天主教党在奥地利已存在六十年，它代表宗教和君主制原则并坚持旧的经济生活方式，它不仅在宗教问题上维护着主教们的权威。近来，社会问题具有日益重大的意义，而近十至十五年内崭露头角的人士在自己的宣传中也在利148用社会矛盾。他们批判获得地产的方式，煽动敌视流动资本，用社会民主党的论据来反对现代的社会制度。他们引用《新事物通谕》，实际上却以

自己的结论反对教皇通谕宣扬的社会和平，为了博得下等阶层的好感，他们怀疑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财产，以此迎合其嫉妒心，他们进行空前的排犹主义宣传。备忘录中指出，新运动煽动低级僧侣敌视高级僧侣。①

向梵蒂冈呼吁毫无结果：教皇站在基督教社会党一边。该党发现耶稣会士是它热情的捍卫者。耶稣会士比主教们更早地懂得，基督教社会党可能成为教权派在奥地利的重要支柱和耶稣会的工具，实际上果然如此。② 驻维也纳圣使阿利亚尔季也是这个党的捍卫者。

梵蒂冈人士站在基督教社会党一边，他们并不重视它的社会蛊惑性宣传，但却珍视它对教会和君主制的忠诚，尤其珍视它对社会主义毫不妥协的精神。

1895 年 11 月 16 日，奥地利驻梵蒂冈代办阿姆勃罗就柳叶格尔当选维也纳市长一事向本国外

① A·富赫斯：《1867—1898 年的奥地利思潮》，维也纳，1949 年版，第 55—56 页。

②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1806—1918 年》，第 241—242 页；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 2 卷，第 476—477 页。

交大臣戈卢霍夫斯基写道："柳叶格尔博士的胜利就是梵蒂冈的胜利。当红衣主教拉姆波拉接到驻维也纳圣使报告维也纳市长选举情况的急电时，他对在座的主教高声叫道：'……看，我们胜利了！'"我明白了，"阿勃罗接着说道，"柳叶格尔成了这里的风头人物和胜利的呼唤，这一呼唤从红衣主教国务卿的房间发出，传到梵蒂冈的每一个角落。"①

基督教社会党也要求按照教皇的意图解决"罗马问题"。1910年11月6日，基督教社会党与其他教权主义者在维也纳市政局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主要发言人——维也纳第一副市长波尔采尔宣称，意军占领罗马——这是"当代历史上的149可耻污点"，不仅是占领罗马者的耻辱，而且是允许占领罗马者的耻辱。发言人又说，"罗马问题"应当作为国际问题来解决，因为意大利政府的表现说明它不能够维持本国的秩序。②

① 引自E·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0—1903年》，柏林，1950年版，第158页。

② 《总政策》，第27卷，第1册，柏林，1925年版，第380—381页。

基督教社会党自二十世纪初期就成了奥地利资产阶级的领导党、政府的主要支柱、侵占巴尔干的政策和与德帝国主义结盟的拥护者。主教团开始对该党的活动发生巨大的影响。该党领导人原来对主教团的反对和不信任已荡然无存。它同贵族和银行的联系加强了，同王位继承者弗兰茨-斐迪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14 年战争刚一开始，基督教社会党就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①

奥地利的工人阶级对基督教社会党抱敌对态度。工人们看穿了教权派的社会蛊惑和宗教——民族主义宣传所包藏的祸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党在其所依靠的那些阶层中的影响也开始衰落。

1907 年国会议员选举期间，基督教社会党有九十六人当选为议员，其中二十人是代表维也纳市的议员（该市共有议员三十三名）。1911 年，基督教社会党有七十六人当选为议员，其中有三名是维也纳市的议员。该党的影响在城市中更是一落千丈。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却加强

① A·富赫斯：《1867—1918 年的奥地利思潮》，第 66 页。

了：1907 年，代表维也纳市参加国会的议员有 10 名，而 1911 年有 19 名。[①]

但是基督教社会党在农村和相当广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仍然有影响。奥地利资产阶级和国际反动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利用这种形势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

基督教社会党在奥地利将近二十年的统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动地说明，基督教社会党所鼓吹的并打算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据的天主教“社会原则”是站不住脚的。以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政党起家的基督教社会党，成了奥地利资产阶级的领导党。

梵蒂冈对法国“犁沟派”的谴责

十九世纪末，法国出现了基督教民主运动。150 它的倡议者与领导者也是领导天主教工人组织的那些人——德·曼伯爵、加尔尼叶、诺杰、列米埃神甫等。象其它国家的民主教组织一样，法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提出的纲领性要求也极不明

① 《欧洲导报》，1911 年 7 月，第 322—324 页。

确。它要求保护小商业、小工业，“维护正义的”劳工法，建立由厂主与工人组成的混合委员会。然而，即使这些要求也引起主教团的不满，主教团害怕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独立运动，因为这一运动虽然具有天主教色彩并有僧侣参加，但却表现出激进化的倾向。

1897 年，德·曼伯爵在天主教小组的年会上发言说：“我们基督教民主派的朋友们似乎想给我们所发动的伟大的社会运动规定方向，对此我毫不担心。社会不能够超脱人们可以不承认但却不能够消灭的那些原则而存在。上等阶级的社会作用就属于这类原则……”① 显然，德·曼伯爵及其同伙要使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相信伯爵们和银行家们有“伟大的救世主的社会作用”并不容易。

在法国基督教民主运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马·萨尼埃组织的“犁沟”会。萨尼埃及其追随者拥护共和国并抱定宗旨要使“民主基督教化”。萨尼埃希望天主教与共和国和解并在天主教界建立

① Ж·魏尔：《法国社会运动史》，第 372 页。

一些团体，这些团体将能够肃清天主教中一切削弱天主教地位并妨碍在民间传播基督教的东西。犁沟会员们宣传，天主教必须脱离政治上的反动派和保守派，必须看到，法国的大多数人民是接受民主原则的①。“犁沟”会的核心是年轻的天主教徒小组，他们研究社会问题，进行以“和平革新”社会制度为目的的讲演活动。“犁沟”会在教义问题上服从主教和教皇，而在政治问题上要求自主。

151 这一点恰恰引起法国主教团和利奥十三世继承人庇护十世的怀疑。前已指出，这位教皇被现代主义吓破了胆，他在位期间一直与现代主义派打仗。他把犁沟派的运动也同现代主义联系起来。1910 年 8 月发布了谴责“犁沟”会的教皇致法国红衣主教与主教书。这个组织的罪行是：它的拥护者脱离教会当局的领导。教皇写道，犁沟会员对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看法与教会的教义不一致。信中说，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必须牢记

① F·高盖：《法国的基督教民主》，载 M·埃诺第、F·高盖：《意大利与法国的基督教民主》文集，印第安纳州，圣母院，1952 年版，第 112—113 页。

利奥十三世的教导：基督教民主应当坚决遵守的原则是，阶级和等级的差别是组织良好的国家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犁沟会员主张各个等级平等的理想违背天主教教义①。教皇还谴责犁沟派招引其它教派的信徒。

1910年8月17（30）日，俄国代办沃尔康斯基向萨宗诺夫写道，教皇的信"实质上是对犁沟派的起诉书"，"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一种特殊宣传品"②。

教皇书函产生的后果是：1910年8月末"犁沟"会自行解散。法国主教团与梵蒂冈不能够允许一个有组织的法国天主教派别在罗马教廷与法兰西共和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宣扬民主和同共和国合作的主张。罗马教廷不能够容许仅仅在宗教问题上尊重它的权威，而在政治问题上想要摆脱它的控制的"异端"。此外，还有法国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极为赞许的社会平等思想，与罗马教廷肯定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的社会纲领是不一致

① V·哈特莱因：《社会主义与天主教》，帕德博恩，1929年版，第72—73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7，第112页。

的。庇护十世不惜解散有影响的法国基督教民主组织。

基督教民主运动领导人的特点是：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了教皇的命令，公然背离他们原来所宣扬的原则。

152 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

十九世纪末，意大利出现了基督教民主运动，后来从这一运动中产生了"人民党"。这个运动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是意大利统一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天主教徒。与保守的天主教徒相反，他们主张天主教徒应当正视意大利的现状，参加国内的政治生活，根据利奥十三世宣布的原则从事社会与政治活动并用这种方式同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基督教民主运动自诞生以来，就遵照反对劳动群众社会解放的最重要的教皇文件——1891 年教皇的《新事物通谕》，以反抗社会主义运动为己任。然而客观形势却提出，必须保卫工人的、尤其是农民的和其它参加基督教民主运动的落后阶层的利益。因此这一运动在初期(当它尚未与保守的天主教流派融合时）常常与当时

的统治阶级进行公开的，有时甚至是坚决的斗争。"①

1899年在都灵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基督教民主运动的纲领性要求，其中包括应当满足社会各个阶级需要的种种要求。首先，纲领要求建立劳资协会"以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维护共同的利益"。纲领为工人提出了有关制定劳动保护法的微不足道的要求。在农业问题上，提出"有效地保护""农业阶级"和他们作为小私有者的利益；为他们组织信贷、制定相应的法律、建立农业机构等要求。

在工业问题上，基督教民主派提出"有效地保护和有组织地支持工商业阶级及其利益"、建立生产者和商人的劳资协会、打击高利贷和买卖外汇以及"非生产的资本主义投机"等要求。 153

纲领中还包括改革税收制度、保护公民自由、削减军费、发展民族文化等要求。②

① 《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来的生活与斗争》，莫斯科，1953年版，第109页。

② E·索德里尼：《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205—207页。

虽然这些要求“无所不包”并欲满足一切人的需要，它们却象初期的意大利基督教民主运动本身一样，反映出相当多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的意向，他们虽未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但反对天主教反动集团与梵蒂冈强加于他们的那条路线。天主教反动集团与梵蒂冈期望意大利国家衰弱，力求恢复教皇世俗权力，因此要求天主教徒拒绝参加政治生活。

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在运动兴起时期“曾真诚地相信，天主教徒能够实现社会革新。最后，他们终于象当时的意大利知识青年一样处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社会主义对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与其说表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不如说表现在他们对待劳动群众的态度上（在这一方面，左右他们的不是教权主义者特有的仁慈和父道主义，而是追求正义和社会革新）。社会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他们所坚持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上，他们极力将天主教徒引上建立工会组织和政党的道路。”①

① 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297—298页。

这一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思想家是罗莫洛·穆利神甫。"穆利禀性爱虚荣,不安分守己,头脑灵活,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感觉敏锐……"①

1898年,罗马开始出版基督教民主运动的刊物《社会文化》②。

"……《社会文化》杂志的编辑们自创刊时起就宣布自己'是矢忠教皇和大多数意大利天主教教友的地地道道的天主教徒……'……此外,他们还宣布既要同自由主义斗争,也要同社会主义斗争……但这一对不妥协原则忠诚不渝的声明附带着一定的社会性要求:杂志公开谴责资本主义,并说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准备'主要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其政治与社会纲领'。"③ 154

穆利及其拥护者们宣传,必须建立能够为实现基督教民主所提要求而斗争的天主教政党。

① 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299页。

② Л·斯图尔佐神甫也是基督教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社会文化》杂志(1898—1905年)的编辑,后来是天主教党"人民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梵蒂冈开始镇压基督教民主运动时,斯图尔佐便同运动疏远了。

③ 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300页。

天主教权势集团极其敌视《社会文化》的纲领。他们指责穆利及其拥护者将天主教运动由宗教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过分重视社会政治活动，而将超自然的一切置于次要地位。基督教民主运动虽然受到抵制，在二十世纪初仍具有比较广泛的规模，穆利及其拥护者不仅在现有的天主教组织中宣传自己的主张。许多城市都建立起独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当时，在欧洲其它一些国家，如奥地利、比利时，天主教主教们和罗马教廷都支持基督教民主运动，因为看到这一运动首先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但是在意大利，梵蒂冈与天主教主教们对这一运动却抱截然相反的态度。意大利天主教反动集团千方百计鼓励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反社会主义活动，而罗马教廷在意大利地位的特殊性却又使它成了这一运动的反对者。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主教们害怕不愿受教会管束的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民主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的那些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改革社会和建立劳动群众独立组织的要求，尽管还模糊不清，也引起罗马教廷的猜疑。由于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宣传天主教徒参与政治生

活的必要性，他们也就站到反对教皇宣布的不承认意大利国家和阻止天主教徒参与国内政治生活的政策（《不许》）的立场上去了。

教皇利奥十三世在1901年1月18日的教皇《公共大事通谕》中对基督教民主运动中的激进派作了全面的谴责(后面将具体说明)。这涉及到世界各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至于意大利本身，罗马教廷多年来一直反对那些真正相信根据"基督教民主"原则可以实现重大的社会改革的天主教民主人士。 155

保守的天主教徒与穆利拥护者之间的尖锐分歧表现在历次天主教代表大会上和报刊的论战中。

梵蒂冈特别坚决地反对在意大利建立天主教党，而这正是穆利及其拥护者一贯鼓吹的思想。这样的党从梵蒂冈不承认意大利国家的观点出发，在任何条件下都必然采取反对这个国家的立场，因此在一系列问题上就要与左派一致行动。这是不符合意大利资产阶级与梵蒂冈的利益的。如果天主教党在某种情况下支持政府，就意味着承认现存的国家和政府并与其合作。这又不符合

梵蒂冈不承认意大利国家的政策。因此利奥十三世和庇护十世坚决阻止在意大利建立天主教党。

1899年1月，恰雷科夫向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报告，教皇希望加强国内对教权主义的好感，但不愿建立天主教党，即“不希望他的党做软弱无力、无所作为的反对派，他等待意大利天主教徒能够有机会在管理王国中起至少象‘中央党’在德国国会中争取到的那种重要作用”①。梵蒂冈的这些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全部实现。

1904年5月，俄国驻梵蒂冈代表萨宗诺夫向彼得堡报告，一部分天主教教权主义者希望……“与意大利政府订立和平相处的协议，它将使他们能够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党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意大利政治事件的进程”②。但是梵蒂冈坚决反对这种计划。

156 1905年3月，俄国驻梵蒂冈代表纳雷什金写道，“据消息灵通人士说，教皇庇护十世允许天主教徒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意大利政府机关的政治生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52—153页。

② 同上，案卷13，第54—55页。

活，但禁戒建立团结的民主天主教党，这样的党必然在意大利议会的众议员中引起反应并使罗马教廷同王权的关系尖锐化……"①

但是天主教界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宗座极力限制基督民主主义者的活动，取消他们据以进行宣传活动的天主教组织中的领导作用。

1904年7月，按照梵蒂冈的旨意进行了意大利天主教团体的改组；其中一部分被取缔，其余的则被置于主教的监督之下②。按照梵蒂冈旨意取缔了力量最强大的天主教组织"事业会"，"使穆利及其拥护者失去了在有组织的天主教徒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可能性。他们只能走创立自己运动的艰难道路。有些拥护穆利的人试图走这条路，但没有成功，因为遭到梵蒂冈的反对……"③。

穆利及其拥护者，前已指出，坚持天主教徒在宗教问题上必须服从教皇而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自由的观点。穆利在《社会文化》杂志上发表的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5，第8页。

② 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328—331页。

③ 同上，第331页。

文章中贯穿了这一观点。他甚至认为天主教徒可以同社会主义者合作并且亲自接近屠拉梯，按照萨宗诺夫的说法，这“引起了庇护十世对他的不满”①。

教会当局迫害《社会文化》杂志，禁止天主教徒阅读，最后，穆利按照梵蒂冈的要求于1906年6月停止出版这一杂志，但创办了新的刊物——《文化评论》来代替它，对这一新刊物教会当局又起来反对。

1909年3月意大利议会选举时，穆利参加竞选成为候选人，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当选为代表蒙特乔尔乔市的议员(他在议会中参加激进派)。

在竞选期间，教会当局用开除教籍来威胁他，要他退出竞选。在给费尔莫斯大主教卡斯捷利的

157 复信中穆利写道：“我知道，一个神甫的深刻而真诚的宗教信仰已经不能够，也将不能够长久地遵照庇护十世及其官方教会的要求来进行从宗教上和道德上革新现代民主社会的工作了……现今在意大利与您分道扬镳可以创造出比同您在一起更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7，第115页。

多的精神财富……" 宗教裁判所命令开除穆利的教籍并宣布他为人人应当回避的人。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梵蒂冈还继续迫害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派，对穆利仍持敌对态度。1913年11月，俄国驻梵蒂冈代表Д·涅利多夫报告，"意大利'民主基督教徒'的领袖、被开除教籍的神甫罗莫洛·穆利"竞选时在蒙特乔尔乔落选一事，使梵蒂冈感到"特别满意"①。

1914年4月，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声称，在意大利建立天主教政党就是公开反对教会的"最高权威"，教会不愿在这个国家建立无论是哪一派的国会天主教政党②。

十九世纪末在意大利兴起的、声明永远忠于教会并准备按照利奥十三世的教皇《新事物通谕》原则行动的基督教民主运动，仅仅在初期受到罗马教廷的欢迎。梵蒂冈原指望这一运动成为在意大利人民群众中已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对立面和教权派的工具。然而运动超出了梵蒂冈给它规定的范围。尽管它反对社会主义，但在信奉天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4，第93页。

② 《欧洲历史年鉴，1914年》，第738页。

主教的劳动群众的压力之下还是提出了某些有利于劳动群众的社会要求。这一点以及基督教民主运动给自己提出的政治任务与罗马教廷在意大利的政治目的发生了矛盾。因此梵蒂冈对意大利天主教运动左翼、基督教民主派组织迫害并千方百计破坏它们在天主教组织中的威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被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吓破了胆的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主教们为抵制这一运动而批准斯图尔佐神甫建立天主教政158党（“人民党”），而基督教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就加入了这个党。同时，教皇依靠这一运动的极右分子，一如既往地排挤主张不同资产阶级而同无产阶级的组织合作的、比较民主的、激进的基督教民主人士。

罗马教廷与“基督教民主”

十九世纪末期，基督教民主运动在西欧许多国家吸引了相当广泛的小资产阶层和信奉天主教的工人。教会和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运动领导人物，利用破产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力图用这种不满情绪来反对工人运

动和社会主义。教会和基督教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努力说服天主教徒——工人、手工业者、农民、知识分子——使他们相信，只有根据"基督教原则"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才能改造社会。

利奥十三世的教皇《新事物通谕》批准建立天主教工人组织，这一通谕在初期促进了基督教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利奥十三世本人支持基督教民主运动，认为教会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够有效地抵制社会主义的影响，既然阻止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应当设法将这些组织置于教会领导之下，教会将引导这些组织的活动去反对社会主义。德国驻维也纳大使爱伦堡伯爵在1895年3月30日就红衣主教顺博恩晋谒教皇控诉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一事向柏林霍恩洛厄首相写道，教廷的倾向是，给予低级僧侣中的民主潮流以自由表现的机会，不要遏制它①。

工人天主教徒相信，教皇是赞成民主原则的，当然是"基督教的"民主原则。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外乎利奥十三世与运动领导者赋予它的含

① 《总政策》，第7卷、柏林，1924年版，第143—144页。

义。但阶级斗争的逻辑和来自基督教民主组织成员的压力，必然使这些组织提出超越利奥十三世限制基督教民主活动范围的政治和经济要求。

159 接近利奥十三世的索德里尼伯爵写道，除其它原因外，下列情况也引起对基督教民主派的不信任：行动激烈；希望立即实现并不十分明确的目的；爱讲工人的权利，而不大讲他们的义务；过分尖锐、广泛地批评上等阶级，而这种批评又有破坏而不是巩固这些阶级的威望的嫌疑；过多地向群众宣扬物质福利而没有指出宁可多得精神福利的必要性；最后，把“离开法衣圣器室……”这一口号解释得过分广泛①。

看到基督教民主运动激进化这一事实，最初鼓励基督教民主运动的利奥十三世确信运动具有危害教会和当权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性质时，便开始反对它。

1901 年 1 月 18 日颁布了关于基督教民主的教皇的《公共大事通谕》。利奥十三世首先强调，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天主教 社 会

① E·索德里尼：《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 211页。

主义"这一名词本身就是不能容许的；至于基督教民主，则不能赋予它政治意义：它仅仅是"在人民中间的基督教活动"。教皇通谕中说，"使基督教民主具有政治性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虽然'民主'一词从辞源上看，从哲学家赋予它的那种意义看是表示人民的权力，但对于我们来说，它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只应当有一个意思：基督教徒为人民谋福利的有益活动。"

基督教民主，教皇解释道，应该希求正义并捍卫获得权和占有权，应该保护各个阶级，它们都是"组织良好的社会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基督教民主根本不应当有不服从"合法当局"或建立反对派的意图，天主教徒不应偏向某一政体。即使他们研究贫穷阶级的福利问题，也不要轻视"在维持和改善社会的事业中有同样价值的"上等阶级。

利奥十三世忧心忡忡，唯恐天主教徒不再服从"上等阶级"，他希望天主教徒们永远记住，是上帝创造了阶级的差别。教皇通谕中说，最要紧的是使天主教徒得到"在出身、财产、知识和教养方面在国民中享有最高威信的人的好感和合 160

作”。教皇通谕中又说，任务是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创造比较不严酷的生活条件。这只有靠仁慈才能办到。利奥十三世，象教会过去所做的那样，坚持说，慈善事业是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手段。

总之，教皇要求从基督教民主中排除一切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不行，他要求用阶级调和的精神解决社会问题，主要的是建立慈善机关和“改造心灵和性情”①。

教皇通谕中所有这些论点的目的在于反对运动左派代表所理解的那种基督教民主，反对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的政治独立，反对他们的独立组织和作为达到自身目的手段的政治斗争。

按照利奥十三世的说法，基督教民主应当归结为“通过基督教活动施恩于人民”。

教皇谴责制订童工工厂劳动法、养老金、八小时工作制、农业工人最低限度工资等要求是“标

---

① E·索德里尼：《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213—214页；O·席林：《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国家与社会学说》，科隆，1925年版，第148—151页；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320—322页。

新立异"①。

用天主教神甫路易吉·斯图尔佐的话说，利奥十三世力图取消基督教民主运动的任何政治作用，而在社会领域中取消它的革命倾向②。

关于教皇的《公共大事通谕》，萨宗诺夫在1901年2月12日(1月30日)由梵蒂冈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这一通谕与《新事物通谕》截然不同，"教皇的《新事物通谕》中所阐述的教义成了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中保守的高级教阶与容易受民主思潮影响的低级僧侣不和的根源……"有关国家的政府，萨宗诺夫写道，曾不止一次地"请求 161 教皇遏制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狂热"。"利奥十三世看到，沿着梵蒂冈革新者诱惑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对教会本身极其危险，因此他认为必须在新的通告中详细解释'基督教民主'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一学说中什么是可以允许的。"萨宗诺夫写道，在谈到教会的社会学说的本质时，利奥十三世将福音书所教导的相

---

① C·C·埃克哈特：《罗马教皇与世界大事》，伊利诺斯州芝加哥，1937年版，第254页。

② 路·斯图尔佐：《意大利与新的世界秩序》，第91页。

亲相爱和一心一德作为基础并“告诫富人和穷人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时不要离开这个基础，但是教皇却同时提醒穷人，说忍耐是最高尚的基督教美德之一”①。

利奥十三世只向穷人，只向人民群众宣传福音书关于“忍耐”是高尚的美德这一教导。

但是教皇通谕“并没有说明自己对待各种不同政体和政党的态度，所以并不公开禁止天主教徒坚持这种或那种政治观点。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利用的正是这一点”②。

利奥十三世为了明确表示他反对天主教运动中的民主流派，便委托宗教非常事务圣部发表关于意大利基督教民主的指示（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签署，1902 年 1 月 27 日颁布）。指示中说，不应当把基督教民主看作达到政治目的或改变政体的手段，在纲领、报刊中和会议上，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应当讨论有关正义必胜和对人民表示实际的仁慈等问题，这才是基督教民主的主要宗旨。指示反对那些谈论“基督教文明的新方向”、“教会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8，第 16—18 页。

② Дж·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 321 页。

的新政策"、"僧侣的新使命"的人①。

教会当局的限制和禁令并非时时处处有效，教皇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处理他们如此讨厌的基督教民主问题。1904年9月《罗马观察家报》驳斥报刊上关于似乎教会人士中有人同情基督教民主中出现的自治运动的说法：《罗马观察家报》解释说，教会当局对基督教民主中的自治运动的好感也好，容忍也好，都是无稽之谈；基督教民主自治运动与不久前的教皇通谕和教皇指示是矛盾的②。 162

后来，教皇多次提起这个问题。庇护十世在1906年7月颁布的致意大利主教教皇通谕中写道，任何可能引起人民"对上等阶级反感"的意见都是不能允许的；教皇要求天主教书刊回避使用那些"散发着不健康的革新气味"和讲解"基督教生活的新方针"、"僧侣的新社会使命"、"新的基督教文明"的词句；僧侣应无条件地服从教会当局，向人民指出通向道德生活的道路并捍卫基督

① E·索德里尼：《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217页。

② 《欧洲历史年鉴，1904年》，第267页。

教之爱的原则。教皇通谕中说，“为建立一道抵制坏思想侵入的堤坝”，禁止僧侣参加不受主教管辖的任何组织。①

这样，在教会主教的积极参加下，尤其是利奥十三世政策的感召下产生的这一运动，落到了受主教们厌弃和迫害的地步。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梵蒂冈的计划中，无论是基督教民主运动还是基督教社会运动都应当是信奉天主教的劳动群众反对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应当为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压制天主教徒群众的革命情绪服务。实际上适得其反：已产生的天主教徒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不满足于“关心灵魂”的任务，而提出政治和社会要求，批判资产阶级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并要求教会本身采取“新的方针”，即依靠民主而不依靠“上等阶级”的方针。

梵蒂冈和天主教主教团把基督教民主运动向右推，推上同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组织合作的道路。他们支持这一运动中最反动的集团。有些国家（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的基督教民主

① 《欧洲历史年鉴，1906年》，第349页。

运动（成分异常复杂）已经通过运动中产生的天主教政党掌握了政权，在这些国家这一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忠实侍从。163 在那些运动中的民主分子占上风的地方（法国、意大利），梵蒂冈不惜采取迫害和解散组织的手段。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梵蒂冈对待基督教民主才比较宽容，因为按照梵蒂冈和资产阶级的计划，基督教民主应当在反对欧洲各国兴起的革命运动中起巨大的作用。

基督教社会运动和基督教民主运动自诞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证明，教会所领导的天主教运动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没有做过任何实际的、从根本上改善劳动群众状况的事。梵蒂冈密切注意，不让天主教运动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合作而使其最后成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

164

第四章　帝国主义时期的梵蒂冈外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罗马教廷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

十九世纪末，欧洲开始形成两个强国同盟。

为说明十九世纪末期国际关系的特点，恩格斯于1893年写道："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①

1879年订立德奥同盟，1882年意大利参加，形成了三国同盟。

1891—1893年又形成了与这一集团相对立的法俄同盟。

由于英国同法、俄之间存在矛盾，所以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9页。

1891年重新订立三国同盟时，英国支持这一同盟。但是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英德之间的矛盾，主要在殖民地问题上，比英国同法、俄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所以英国倾向于法俄同盟。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1907年又签订英俄协定。这就为英—法—俄三国协约奠定了基础。

意大利形式上是三国同盟的成员，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就脱离这一同盟，愈来愈向另一强国集团靠拢。

欧洲分成了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准备战争的两大阵营。

每个大国都力图使本国在梵蒂冈具有最巩固 165 的地位，并不是由于笃信宗教，仅仅是为了利用梵蒂冈的组织和它对世界各国千百万天主教徒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用宗教使自己的侵略计划神圣化。

自十九世纪末期起，决定罗马教廷在国际问题上立场的两个基本因素是：（1）它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敌视及（2）所谓“罗马问题”，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是因1870年消灭教皇国并将其领土并入意大利国家版图而产生的。

如前一章所述，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会极端敌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成就。罗马教廷不仅动员教会和宗教反对社会主义；它还竭力在世俗组织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反社会主义斗争中起主导作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在罗马教廷的国际政策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教廷这方面的活动博得了资产阶级世界领导集团，其中包括同天主教会无关的人士，对它的好感。

亚历山大三世政府派往梵蒂冈进行谈判（以恢复俄国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而顺利结束)的A·伊兹沃利斯基，在1888年8月21日(9月2日）向外交大臣吉尔斯作的报告中谈到他觐见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情况："……利奥十三世按照惯例即兴发表了冗长的政治讲话。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是论证为保持欧洲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而不倦工作的宗座与伟大的、保守的国家，尤其是俄国的团结一致的必要性。"①

在1888年12月19（31）日的信件中，伊兹

① E·A·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冈的外交》，莫斯科，1931年版，第89页。

沃利斯基报告了再次觐见教皇的情况。这次利奥十三世又谈到“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联合世界保守力量的必要性”①。教皇建议亚历山大三世为“支持保守因素”②而结盟。

亚历山大三世被俄国的革命运动吓破了胆。他不顾波别多诺斯采夫和东正教会主教们的反抗，准备同教皇合作，反对革命。在亚历山大三世致利奥十三世的信件草案(1888年）中说：“我愿以深为满意的心情看到我的政府同宗座之间的友好关系重新恢复，如果这种关系能使我们达到至圣的教皇和我同样关心的目的的话……”③

166

利奥十三世同俄国驻梵蒂冈官方代表谈话时，曾多次提起罗马教廷与沙皇政府结盟的计划。

1898年2月，利奥十三世在接受俄国罗马教廷驻办公使恰雷科夫对他即位二十周年的祝贺时说，“他在祝贺他即位周年的外交官中看到……俄罗斯帝国的代表感到特别愉快。”利奥十三世

① E·A·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冈的外交》，莫斯科，1931年版，第102页。

② 同上，第33页。

③ 同上，第99页。

还说："目前，俄国皇帝是世俗权力原则最强有力的，甚至唯一的代表，就象教皇是宗教权力的代表一样。不与革命因素和人民权力因素勾结的只有俄国皇帝。刚才我向奥地利大使说①，自从奥地利帝国走上立宪制度的邪路后，它的威力和作用一落千丈。梅特涅公爵任国家首相时难道是这样吗？现在，波希米亚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大家都要求特权，使帝国的地位受到损失……"教皇接着说，"在德国皇帝的权力也不断缩小，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逐渐发展。军队当然是良好的支柱，但最可靠的支柱是人心。俄国皇帝有这种支柱，如果他作为世俗权力的首脑同宗教权力的体现者——教皇订立协定，那么这样的协定对世界和整个地球上的精神世界来说，不能不是极其珍贵的……"②国务卿拉姆波拉红衣主教也向恰雷科夫谈过"皇帝和教皇的观点与志向的共同性"。

除俄国的沙皇制度外，罗马教廷还认为德皇

① 在此之前，列维尔捷拉伯爵曾受到教皇的接见（恰雷科夫注）。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5，第 8—9页。

③ 同上，第 114 页。

威廉及其政府是它反对社会主义的盟友。后来，罗马教廷便采取了首先依靠德意志帝国的方针。原德国首相比洛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了1903年5月德皇访问梵蒂冈时利奥十三世和威廉二世的谈 167 话记录。教皇吹捧德皇所遵循的“统治原则”。按照教皇的说法，威廉二世将自己的权力“建立在纯粹的基督教基础之上”。教皇说，象威廉二世这样思想和行动的国君仅仅有过一个，那就是查理大帝。他受“上帝的委托，使当时的整个文明世界拜倒在十字架下，这一使命是从当时的教皇利奥三世那里接受的”。教皇接着说，现在的德国皇帝从他——教皇利奥十三世这里接受“使命，让欧洲回到基督教的怀抱中来，对抗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利奥十三世又说，他（教皇）非常了解，“欧洲是由独立的国家和民族组成的，政治上不可能统一在一个帝王的权杖之下，但在精神上，德国皇帝当然可以以身作则，施加影响和进行规劝，使这些国家重新归附基督教和教会……”①

威廉二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这次谈话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1卷，柏林，1930年版，第612—613页。

中利奥十三世告诉他，“德国应当成为天主教会的剑”①。

梵蒂冈不断地向统治阶级的代表们授意，只有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它具有对民主和进步运动一贯的不妥协精神，并忠实于专制独裁——才能够联合保守势力反对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反对社会主义。

在1898年12月23日向全体红衣主教发表的演说中，利奥十三世号召欧洲各国政府联合行动，反对“毁灭性的企图”。利奥十三世和他的继承者们觊觎国际反社会主义十字军征伐中的领导作用。在组织这样的征伐中，他们甚至准备同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他们并不十分支持的力量合作。众所周知，罗马教廷世世代代的理想是君主专制的国家政体，即天主教君主制。然而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由于在一系列国家中出现了天主教会同资产阶级接近的局面，同时为了团结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罗马教廷便开始在资产阶级共和制取胜的地方同它合作。

① 威廉二世：«1878—1918年的人与事»，莱比锡——柏林，1922年版，第177页。

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1881年6月29日颁布了论教会对待国家政权态度的教皇通谕，利奥十三世在这一通谕中写道，教会保障社会"秩序"，同时却没有理由仅仅承认君主专制的国家政体。 168

耶稣会总会长在1903年5月向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将军说："国家政体对于我们（耶稣会士——舍英曼）来说没有意义。我们既乐意同共和制合作，也乐意同君主制合作……"①

这个或那个国家政府的宗教信仰问题对梵蒂冈来说同样也毫无意义。利奥十三世和他的继承者们，曾在不同时期同法国"不信仰上帝的"政府、新教徒德皇威廉二世、东正教徒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合作过。利奥十三世还和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埃及总督、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皇帝、波斯国王、印度王公、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互相通信②。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斯图加特，1923年版，第212页。

②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慕尼黑，1934年版，第504页；L·F·兰克：《罗马教廷史画册》，慕尼黑，1914年版，第393页。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天主教会是国际中心，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不再起国际中心的作用。每个国家的天主教会都同梵蒂冈有联系并听命于梵蒂冈，但同本国统治阶级的联系更为密切。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廷过去和现在都能够成为联合资产阶级世界的力量，不过仅在涉及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各教派的剥削者最根本的阶级利益问题上，即在与保全他们的私有财产和统治有关的问题上。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长期决定罗马教廷国际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罗马问题”和与之有关的意大利—梵蒂冈关系。

“罗马问题”与二十世纪初的意大利—梵蒂冈关系

1870 年之后和 1929 年之前，每位新当选的教皇都声明不放弃“圣彼得的领地”。半个世纪来的历任教皇在适当的情况下都要提醒人们的注意，他们不放弃世俗权力，认为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并埋怨意大利“篡权政府”给“基督全权代理人”造成的“不堪忍受的处境”。罗马教廷仍然认为，在法律上教皇国是存在的，虽然暂时受

169

梵蒂冈领土的限制，教皇仍然视自己为握有主权的国君①。

最后一任教皇兼世俗国君庇护九世至死是意大利国家不共戴天的仇敌。当他的任期将结束时，梵蒂冈出现了将“圣彼得宗座”迁移到梅克林（比利时）的方案。有关同意大利政府达成协议的事，庇护九世根本不予理睬。

他的继承者利奥十三世（1878年）当选教皇后不久便声明自己是“囚徒”，只要罗马存在意大利政府，他将永远是“囚徒”。1879年，利奥十三世在致天主教新闻工作者罗马大会的祝词中，谈到了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必要性。

伊兹沃利斯基1889年2月14（26）日在致吉尔斯的信中，谈到利奥十三世的情况时写道：“现任教皇主要是一位外交家和政治家；十一年来他的全部努力旨在达到两个目的：恢复罗马教廷过去的国际威望和对欧洲事件进程的影响；争取恢复它在意大利的历史地位，在要求世俗权力方面

① H·费奈：《教会法规史》，第1卷，魏玛，1950年版，第574页。

寸步不让。"①

同年5月22日伊兹沃利斯基又写道："利奥十三世一年比一年更倾向于极端不妥协派并从某时期起大力压制意大利主教们为同政府妥协寻找根据的一切活动。"②

曾任（1882年起）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的库尔德·冯·施勒策尔，长期以来在梵蒂冈领导集团中享有威信。他也指出 利奥十三世要求恢复教皇世俗权力。施勒策尔写道，1887年7月22日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发出致圣使、副圣使与其他外交代表的通告，强调罗马教廷对意大利王国的不妥协态度，而相互接近的第一个条件是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施勒策尔认为，梵蒂冈这个受到法国鼓励的政策，随着利奥十三世的逝世方告终结③。

恢复教皇国意味着意大利的四分五裂。梵蒂冈的主教们需要的正是这个。1898年7月，恰雷

---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06页。

② 同上，第108页。

③ 库尔德·冯·施勒策尔：《最近的罗马信件，1882—1894年》，柏林，1924年版，第111页。

科夫向彼得堡报告说，《罗马观察家报》——梵蒂 170
冈的半官方刊物——发表文章，证明罗马教廷的“一贯理想”是“将自由的意大利公社统一在它的领导之下”①。

斯福尔扎写道，利奥十三世与他所在的意大利从来没有关系。他梦想破坏意大利的统一；统一的意大利应当给以教皇为首的小意大利共和国联邦让位；他梦想教皇离开罗马并在奥匈帝国反对意大利的战争胜利之后凯旋而归②。

关于这一点还有其它证据。比洛讲到他在1904年同焦利蒂谈话的情况。按照他的说法，焦利蒂说：“利奥十三世和拉姆波拉抱定宗旨消灭意大利君主国，以便建立在法国保护下以教皇为首的意大利联邦共和国。”③

综上所述，罗马教廷的政策与意大利人民的根本利益矛盾，因为它的目的是消灭意大利国家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92页。

②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纽约，1944年版，第89页。

③ 伯·比洛：《回忆录》，第2卷，柏林，1930年版，第60页。

并使其四分五裂，这不仅会阻碍意大利的进步，而且还可能使分裂后形成的一些弱小的意大利王国和公国成为各大强国，首先是奥匈君主国的傀儡。

按照英国罗马教廷历史学家Д·宾奇的说法，利奥十三世认为意大利国家“不仅危害罗马教廷的独立，而且是一种人为的和转瞬即逝的东西……”①

亲梵蒂冈的传记作家将利奥十三世描绘成“缔造和平的”教皇。但这位“和平缔造者”不反对通过欧洲大战来恢复罗马教廷原先的地位。1890年3月12（24）日，伊兹沃利斯基由罗马向吉尔斯写道：“……他（利奥十三世——舍英曼）深信普遍的危机不可避免，力图主要保证宗座能够从未来的事件中获得利益。”②

1890年5月30日施勒策尔报告，耶稣会人士坚持下述观点，即只有欧洲大战才能为恢复教皇国扫清道路，利奥十三世并非没有这种意图。

---

① Б·А·宾奇：《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和教会》，伦敦，1941年版，第35页。

② Е·А·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14页。

同年9月，加利姆别尔季——驻维也纳圣使——秘密地向施勒策尔说，“至今一向主张保持和平的利奥十三世，不久前开始明显地愈来愈倾向于不妥协派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大家知道，是只有通过欧洲大战圣彼得宗座才能恢复“自己的权利”，教廷现在不能期待某些天主教国和非天主教国的任何支援；欧战之后，列强应开代表大会，重新承认教皇的世俗权力……”①

这种思想的主要拥护者是耶稣会士。帕施托尔是梵蒂冈主教团，尤其是利奥十三世的亲信，1902年5月14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他被邀请到红衣主教桑米尼阿特利家里，托斯卡纳的主教们全在那儿。当提到教皇世俗权力的问题时，红衣主教说：“只有剑或奇迹能够解决”②。

利奥十三世和他的继承者们力图把本来是意大利内部的“罗马问题”变为国际问题，让欧洲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国的天主教组织参加他们同意大利政府的争论。这样，“罗马问题”在将近半个世

① O·贝克尔：《俾斯麦与德国的包围》，第2卷——《法俄同盟》，柏林，1925年版，第135页。

② 路·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392页。

纪期间做了反意大利阴谋的工具。1903年7月15（28）日，俄国驻罗马大使A·涅利多夫向彼得堡报告利奥十三世逝世的消息并就此分析罗马教廷的政策，他写道："由于各种情况奇怪的聚合，无论是德国、奥地利，还是法国，都不能够真心诚意地希望罗马教廷同意大利和解。前两个帝国……在缔结三国同盟时利用了梵蒂冈对意大利政府的仇恨，答应向国王提供援助以抵御为恢复教皇世俗权力而可能采取的行动。倘若罗马教皇承认王国首都中已建的世俗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将不再需要现在这些盟国的庇护。"① 涅利多夫又写道，法国对罗马教廷的影响使它有可能对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而这种影响，在梵蒂冈同魁里纳尔宫和解之后必将大大地削弱，这就可能极其敏锐地反映在我们的盟邦共和国的内政上。"②

172 可见，参加两个敌对同盟的大国政府各怀鬼胎，都需要保持因"罗马问题"而引起的梵蒂冈-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03年，案卷92，第1卷，第143页。

② 同上，第143页。

意大利敌对关系。德国驻罗马武官冯·恩格布列赫特，1888年1月12日向瓦德西伯爵写道，只要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象现在这么紧张，就不能够期待梵意关系的改善。恩格布列赫特又写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幸运的情况，因为第一，教皇将继续表示对我们不妥协的态度；第二，意大利不能逃避承担义务。根据这个理由我认为，确切了解与梵蒂冈内部形势有关的一切情况对我们来说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在那里不应当仅仅处理我们的宗教政治事务。"①

梵蒂冈积极努力吸引欧洲各国和天主教组织参加它为恢复教皇世俗权力同意大利进行的斗争。在德国，为恢复教皇世俗权力进行活动的是德国天主教中央党。1871年德国第一届国会开幕时，中央党代表发言反对德国不干涉别国事务的原则，因为承认这一原则意味着拒绝为教皇的利益进行干涉。"我不会为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讲话，但也不为此设立绝对的障碍，"中央党代表当时这样说。从那时起，在每年一次的德国天主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书信选集》，第1卷，斯图加特——柏林，1928年版，第143页。

教代表大会上不断地作出要求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决议。但是当中央党愈来愈支持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变为政府党的时候，为了不引起意大利——德国在三国同盟中的盟友——的不满，便在教皇世俗权力问题上改变策略。中央党首领之一巴赫姆写道，1887年，值全德天主教徒代表会议即将在特里尔召开之际，在梵蒂冈的压力下提出了起草坚决谴责意大利“掠夺”教皇并要求恢复教皇国决议的建议。中央党首领文德霍尔斯特反对这样的决议草案。预定为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巴列斯特列姆伯爵支持他。文德霍尔斯特建议另外一种提法：不要说“恢复教皇国”，而说“恢复教皇的领土主权”并将其归还教皇。这种提法回避了把教皇原有的教皇国中的那些东西归还173给他的问题；又加进了承认教皇仅对梵蒂冈一地拥有主权的内容①。这一提法在以后召开的德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上也被采纳。

但是连这样的妥协性提法也给德国在德、意的相互关系方面造成了困难。巴赫姆报告说，比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9卷，科隆，1932年版，第9页。

洛首相在同中央党首领李伯尔谈判时向他指出，每年一次的全德天主教代表会议要求恢复罗马教廷“领土主权”的旧决议危害德国的外交活动。1898 年全德天主教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不再包括教皇对领土主权的要求，而提出教皇作为教会最高首脑享有“履行自己最高牧师职务的完全的和真正的自由”①。

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照常战胜了天主教会活动家们的宗教意图。

1888 年，利奥十三世利用威廉二世访问罗马的机会，企图使他卷入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冲突。但德皇访问梵蒂冈的活动组织得无懈可击，既不能说是承认从教皇手中抢走罗马，也不能说不承认这个行动。按照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施勒策尔的建议，威廉二世前往觐见教皇不从意大利王宫出发，而从普鲁士领土——普鲁士驻罗马大使馆出发，乘坐专门由德国运来的马匹和车辆②。

10 月 12 日接见威廉时，利奥十三世对罗马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 9 卷，科隆，1932 年版，第 48 页。

② 库尔德·冯·施勒策尔：《最近的罗马信件》，第 128 页。

教廷在意大利的地位，对自己“梵蒂冈囚徒”的处境表示不满，虽然事先威廉通过施勒策尔请求谈话时不提及教皇世俗权力问题，教皇却偏偏转到这个问题上。他还不忘向客人指出，“无政府主义党派”的加强使他感到不安，应当联合一切反对它们的力量，把它们消灭。

教皇必然在威廉面前提出使德皇尴尬的“罗马问题”早在意料之中，因此事先吩咐亨利亲王在觐见时进入厅中。梵蒂冈警卫队奉命在教皇接见威廉时禁止任何人入内。但亨利亲王在外交大174臣赫伯特·俾斯麦的陪同下突然闯入觐见厅，教皇开始的、德国不希望谈的话题中断了。有亲王在场，谈话仅以德国的宗教关系为题继续进行。这一事件引起了梵蒂冈极其强烈的不满①。

但由此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说德国政府拒绝利用“罗马问题”反对意大利。1888年，当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时，支持教皇的要求对威廉不利。但德国政府不止一次动用“罗马王牌”——以支持

① 见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8、95页；《欧洲导报》，1888年，第11册，第435—439页；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1747—1920年》，第364—366页。

梵蒂冈的要求相威胁，正是为了把意大利拴在这一同盟中。在德国外交人员手中，“罗马问题”是压制意大利政府的工具，强迫它忠于三国同盟。德国统治集团还打算利用“罗马问题”反对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1887年8月，俾斯麦在同巴伐利亚大臣格莱尔斯盖姆谈话时，后者提到恢复教皇世俗权力问题，这时俾斯麦说：“这件事要到意大利宣布共和国成立之后再谈。”① 这就是说，如果意大利人民宣布成立共和国，那么德国政府就要求恢复教皇国作为镇压共和国的借口。

梵蒂冈通过主教们在许多国家组织支持恢复教皇国的运动。在一年一次的奥地利天主教代表会议上通过相应的决议。1891年11月，天主教议员查林格尔在奥匈议会发表演说，支持恢复教皇国，他说，教皇的要求是合法的，恢复他的世俗权力问题不是意大利的，而是国际性的天主教问题。

奥匈统治集团支持罗马教廷的计划，但保持

① 艾伦布克-哈特非得的菲利浦：《五十年间》，柏林，1925年版，第134页。

有意大利参加的三国同盟对它们有利。正因为如此，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卡利诺基伯爵在回答查林格尔的发言时说，政府同意奥匈帝国中信奉天主教居民的合理愿望应当尽可能得到满足，政府希望教皇获得他所需要的完全独立。卡利诺基接着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同处于一个政治同盟之中，它怎么能够大胆介入梵蒂冈问题而不伤害意大利人民的情感呢？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尚未找到①。其实，卡利诺基也是以意大利忠于三国同盟作为奥地利不介入"罗马问题"的先决条件。

175

1901年1月，以诺福克斯基公爵为首的英国天主教徒朝圣团，为庆祝大圣年来到罗马，向教皇致祝词，祝愿并希望看到教皇世俗权力的恢复。在此之前不久，美国主教阿兰德申述了他的同胞希望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愿望②。所有这类活动都与梵蒂冈把"罗马问题"变为国际问题和全世界天主教徒的事情有关。

梵蒂冈人士指望，法、意矛盾将使法国成为恢复教皇国的积极拥护者。在法国，最热心的拥

① «欧洲历史年鉴，1891年»，第213—214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第8—9页。

护者是法国保皇派。

十九世纪末，法意关系如此尖锐，以至“克里斯比预料法国什么坏事都会干，可能打算恢复教皇国”①。

1892年8月，伊兹沃利斯基向吉尔斯写道，梵蒂冈的对意大利不妥协派“博得法国的好感”②。

梵蒂冈在法国天主教徒中煽动反意大利情绪。在1891年10月意大利解放纪念日，法国僧侣组织了天主教徒到罗马朝圣的群众性活动。他们在罗马举行了反意大利的示威游行。对此意大利组织了对抗性示威游行。意大利当局因此暂时禁止朝圣者进入罗马。

意大利政府主张，“罗马问题”是意大利内部的事，应当由意大利和梵蒂冈解决，无须外界干涉。意大利政府嫉妒地注视着，不让梵蒂冈在国际关系中占据可能使它成为主权国的地位。176

1899年在海牙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会议的

① H·弗里德云格：《帝国主义时代》(1884—1914年)，第1卷，柏林，1919年版，第110页。

②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20页。

正式任务是限制军备。

梵蒂冈曾努力争取参加会议。在1899年2月同恰雷科夫谈话时，利奥十三世说："意大利政府断言，它保证宗座享有主权国的权力。可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教皇有了参加会议的机会，即使不以世俗国君的身份参加，他也有道德上的主权……王国政府对此却千方百计极力阻挠……"①

国务卿拉姆波拉红衣主教当时也向恰雷科夫宣布，意大利"不想让教皇象其他国君一样应邀参加会议。而我们却不能放弃教皇与其他国君平等的原则……"② 恰雷科夫从自己同利奥十三世和拉姆波拉的谈话中得出结论，"对罗马教廷来说，教皇权利的原则性问题比会议的成就或巩固世界和平的问题重要得多……"③

意大利政府对邀请教皇表示抗议并且声明，如果邀请梵蒂冈，意大利将不参加会议的工作，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布列斯拉夫尔大主教、红衣主教柯普提出，请他敦促德皇要求邀请教皇。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39页。

② 同上，第42页。

③ 同上，第43页。

德国政府考虑到，如果它对梵蒂冈的要求采取赞许的态度，这将是对意大利的挑战并可能使三国同盟破裂。德国外交大臣向红衣主教柯普说，既然意大利在邀请教皇的情况下拒绝参加会议，那么三国同盟的另外两个大国参加会议的工作对这个同盟本身也是危险的。因此德国政府不能够支持教皇的要求①。

结果，由于意大利所采取的立场，未邀请教皇参加会议。利奥十三世在1899年12月14日向红衣主教讲话时说道，反对教皇参加海牙会议仅仅只有一票——投这一票的是那些人，他们“占领了罗马，想看到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政权俯首听命……”利奥十三世大声疾呼道：“那些胆敢在欧洲面前侵犯我们神圣权利的人还 177 要使我们遭受什么样的灾难啊……”②

罗马教廷也努力给意大利国家制造外交困难。

梵蒂冈认为每次外国首脑对罗马意大利政府的访问都是对教皇的侮辱，因为这样的访问意味

① 《总政策》，第15卷，第173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154页。

着承认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教皇在1870年事件之后宣布，到罗马访问意大利国王的信奉天主教的帝王，梵蒂冈将不予接待。意大利政府与许多国家政府之间的冲突和误会便是由此产生的。1875年，意大利国王访问维也纳。奥匈帝国皇帝的回访不是在罗马，而是在威尼斯。1881年意大利国王再次访问维也纳。然后奥匈帝国方面宣布，皇帝准备同意大利国王在除罗马之外的任何一个意大利城市会见。意大利方面不同意这一点。1890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通过奥地利驻罗马大使布鲁克男爵转告意大利政府，说他希望同意大利国王会晤，如果国王邀请皇帝观看意大利军队演习，将欣然接受。同时还建议布鲁克声明，出席演习并不免除皇帝对罗马的回访(对1881年的访问)，但访问罗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可能导致同教皇决裂，这是奥匈帝国皇帝应当避免的。意方没有接受这个建议①。

① 《F·克里斯比回忆录》，第130—131页；伊塔利库斯：《意大利的三国同盟政策(1870—1896年)》，慕尼黑，1928年版，第126页；H·弗里德云格：《帝国主义时代》(1884—1914年)，第1卷，第370页。

为了巩固三国同盟，威廉二世企图在这一争论中担当调停者。他建议，弗兰茨-约瑟夫到达罗马后由意大利国王、亲王和政府到车站迎接，他和国王维克多-厄曼努伊尔三世由车站前往古姆贝特国王墓前敬献花圈，然后离开维克多-厄曼努伊尔，到梵蒂冈去参加接见。梵蒂冈不同意这项建议。约瑟夫认为还是不同梵蒂冈争吵为妙①。

1885年，由于梵蒂冈的干涉，葡萄牙国王卡罗斯预定的罗马之行取消了。

1885年10月1日，卡罗斯国王动身前往西班牙，然后由西班牙到巴黎、罗马和柏林。当天，意大利驻里斯本代办电告罗马：圣使认为，如果葡萄牙国王到罗马访问意大利国王，教皇将同葡萄牙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教皇都不接见国王。葡萄牙外交大臣向意大利大使证实，葡萄牙国王在罗马访问意大利国王将使教皇圣使离开里斯本，这将对葡萄牙产生严重的后果。国王卡罗斯由巴黎向意大利国王提出请求——非正 178

①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大使馆，1806—1918年》，第268页。

式地接见他并且不在罗马，但遭到拒绝①。

会晤未成，因为葡萄牙国王不愿使他同梵蒂冈和在葡萄牙国内有权势的天主教会的关系紧张起来②。

梵蒂冈对意大利毫不妥协，有时反而对梵蒂冈自己不利。1902年，波斯国王到罗马访问意大利国王。访问之前，波斯驻罗马公使就提出了国王拜谒利奥十三世的问题，教皇也希望他来。但教廷方面提出条件，希望国王访问梵蒂冈时没有波斯驻意大利大使陪同。波斯方面拒绝接受这个条件，更重要的是，国王访问教皇可能使意大利国王不愉快。访问也就没能进行③。

---

① «F·克里斯比回忆录»，第225—229页；又见：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54页。

② 1908年，由于梵蒂冈阻挠，摩纳哥国公取消了预定的罗马之行。红衣主教、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就此事向俄国驻梵蒂冈公使萨宗诺夫宣布，罗马教廷不能违反如下规定：凡到过罗马的天主教国君，即使是意大利宫廷的非正式宾客也不得进入梵蒂冈。按照萨宗诺夫的说法，红衣主教显然满意摩纳哥国公服从教皇意志并取消罗马之行的决定(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1，第79页)。1910年摩纳哥国公到罗马去引起了梵蒂冈同摩纳哥暂时断交的后果。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9，第82—84页。

意大利方面企图同梵蒂冈解决外国执政者访问罗马的问题。1908年9月5日，意大利外交大臣蒂托尼在萨尔茨堡同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会晤时，曾问后者是否准备试探梵蒂冈，要哪些条件才允许信奉天主教的帝王访问罗马，以便结束非天主教国君同教皇联系比信奉天主教的国君容易这样不正常的状态。埃伦塔尔回答说，他 179 也热烈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就会排除影响奥匈帝国与意大利关系的消极因素，但考虑到梵蒂冈的主导情绪，他认为这样的试探不起作用①。

利奥十三世及其近臣极力在天主教界造成教皇在罗马的处境不堪忍受的印象，这样下去他就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并将皇宫迁到别的国家。

---

① 《自1908年波希米亚战争至1914年战争爆发时期奥匈帝国的对外政策》，第1卷，维也纳——莱比锡，1930年版，第75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教皇立即取消了不许信奉天主教的国君访问罗马的禁令。在此之前已采取了放松这一禁令的步骤。1913年7月摩纳哥国公来到罗马并受教皇接见，因此俄国驻梵蒂冈代办Н·博克写道，这"作为取消不许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首脑到罗马去禁令的第一个步骤，是值得注意的"（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58页）。

每当同意大利的关系变得比较尖锐紧张的时候，利奥十三世就威胁说要离开罗马。1881年教皇致函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说明自己打算迁到奥地利去，问他意见如何。信奉天主教的奥匈帝国虽然对教皇赤胆忠心，但不愿为罗马教廷的政治野心而与意大利发生冲突。他在致利奥十三世的回信中表示，希望教皇不要离开圣徒们的陵墓，相信意大利政府能保护罗马教廷不受革命力量的侵犯①。

梵蒂冈对这封回信很不满意。1882年3月，弗兰茨-约瑟夫派男爵希勃涅尔前往罗马劝阻教皇不要采取这一危险的步骤。

斯福尔扎报告，1919年在奥匈帝国档案中发现一些文件，证明弗兰茨-约瑟夫派男爵希勃涅尔前往教廷安慰利奥十三世，因为教皇打算在萨尔茨堡定居等待天主教国家的反意大利十字军征伐。按照皇帝圣旨，希勃涅尔应当向教皇说明，如果他离开罗马，他的个人威信会下降；此外，他的自由和独立在奥匈帝国是否比在意大利受的

①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第414页。

限制少，这还大有问题，因为意大利有《保障法》，虽然它本身并不好，但却给教皇提供法律上的地位，不管怎么样，教皇是自己宫殿里的主人①。

皇帝的使者向利奥十三世说，弗兰茨-约瑟夫准备接待教皇，但奥地利应同意大利保持友好关系②。在以后的年代里，利奥十三世还曾询问奥匈帝国政府，他是否可以指望奥地利的好客。 180

同向教皇提供避难所③的法国相反，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为了自己的盟国意大利的利益，劝阻教皇不要提出这样的抗议④。1888年8月24日，奥匈帝国驻梵蒂冈代办奥科利沙尼向外交大臣卡利诺基写道：现在可以帮教皇做的唯一可行的事，就是促使他安静耐心地等待⑤。

胡达利主教在他的奥地利驻梵蒂冈大使馆史中说，在1889年6月为树立乔尔丹诺·布鲁诺

①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第85页。

②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第414页。

③ 伊塔利库斯：《意大利的三国同盟政策》，第124页。

④ E·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1903年》，第56页。

⑤ 同上。

纪念碑举行的示威游行之后，红衣主教团在梵蒂冈讨论了在梵意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教皇离开罗马的可能性问题。红衣主教们意见分歧，因为大家知道1889年3月驻维也纳圣使加利姆别尔季已向梵蒂冈报告，按照普鲁士驻维也纳代表的意见，教皇离开罗马可能损害教会本身的利益。持这种意见的还有德国天主教中央党首领文德霍尔斯特。1889年7月初，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奥地利驻梵蒂冈大使说明了教皇宫廷迁移计划，但大使给予否定答复，因为考虑到克里斯比曾向奥匈帝国驻罗马大使声明，如果教皇离开罗马，只有用武力才能回来。胡达利主教写道，“这些反复提出的迁移计划主要地是作为借口，不让‘罗马问题’‘睡觉’，这是根据同教皇和国务卿拉姆波拉红衣主教的谈话”列维尔捷拉伯爵得到的总印象。胡达利主教强调，“实际上，没有那级有权势的梵蒂冈机关想把整个管理教会的庞大机构迁到国外去”①。

1889年6月23日（7月5日），伊兹沃利斯

①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大使馆，1806—1918年》，第237—238页。

基报告说："对教皇要离开罗马的一贯传说，意大利官方报刊处之泰然，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①181 但是，这些传说使克里斯比首相惊慌不安，他认为教皇离开罗马可能被法国利用，作为反对意大利的借口，因此首相在同意大利政府成员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派自己的心腹弗兰切斯科·库奇去见俾斯麦，共同商量当时出现的情况。1889年7月23日，库奇同俾斯麦进行会谈。从库奇给克里斯比的信中可以看出，俾斯麦向他说，不相信利奥十三世会离开罗马。在他看来，罗马教廷的威望是同罗马的历史和传统、圣彼得教堂和整个梵蒂冈的宝物与豪华联系在一起的。离开罗马，教皇就不再是天主教这个古老而又强大的机构的代表，而会象一个波斯国王一样，靠别人出钱在欧洲闲逛。对天主教国家政府和法国来说，把教皇当作客人接待也非常困难。库奇报告，俾斯麦说几天以前德国驻西班牙大使电告，马德里正在等待教皇光临，但俾斯麦回答大使说，禁止他电告这种没有意思的东西。俾斯麦从维也纳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10页。

得到消息说，那里也向教皇建议，只要群众不用暴力撵他，就不要离开罗马①。可以有把握地说，关于教皇准备离开罗马的传说是梵蒂冈人士散布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为了唤起社会舆论并引起全世界天主教徒的注意，教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实际上，利奥十三世并不打算离开罗马。传统在每一门宗教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罗马教廷的传统是和梵蒂冈联系在一起的。离开梵蒂冈，教皇就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在教徒的心目中失去自己是“使徒彼得全权代理人”的威望。教皇只是以离开罗马进行威胁而已。意大利的敌人乐于随声附和地传布这种传说。但是，无论利奥十三世还是他的继承者，都不会下决心出去做新的“阿维尼翁的囚徒”。

罗马教廷不仅在国际上，而且还在国内给意大利政府制造困难。它竭力挑动信奉天主教的群众反对政府。例如，梵蒂冈的主教们指责政府，说它没有能力镇压国内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

1890年10月15日，利奥十三世向意大利

① 俾斯麦：《俾斯麦全集》，第8卷，《谈话录》，柏林，1926年版，第664页。

主教、僧侣和人民发布教皇通谕，在通谕中以国 182
内革命运动发展而产生的“危险”进行恫吓，谈到了侵犯教会权利和反宗教斗争的情况，并且断言，意大利政府受共济会和异教派的支配，要根除宗教并破坏基督教生活。教皇通谕不顾历史事实地断言，罗马教廷给意大利带来了幸福和光荣。教皇号召为反对威胁宗教的危险而斗争。他宣布，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恢复教皇的完全独立①。

1870—1900年期间，意大利国家最大的弱点“产生于它旁边的梵蒂冈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个反动的反国家集团，这个集团由大地主和广大受富裕的土地占有者与神甫操纵和指导的落后农民群众组成。梵蒂冈的纲领由两部分组成：反对统一的‘自由’资产阶级国家和同时建立由农民组成的后备军，以便阻止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进攻……”②

1868年颁布并在1874年再次颁布的教皇法

①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第419—420页。

② 1926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意大利形势与意大利共产党的任务》，载于《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来的生活与斗争》文集，莫斯科，1953年版，第228页。

令《不许》[1]，在革除教籍的威胁下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选举和被选入议会，因为参加意大利选举意味着承认意大利国家，所以也是间接同意消灭教皇国(禁令不涉及市政府选举)。利奥十三世不止一次提醒意大利天主教徒注意教会这项要求。1903 年 12 月发表新教皇庇护十世的声明：1868 年与 1874 年庇护九世和利奥十三世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参加选举的命令仍然有效。

但事实说明，这项命令对教会本身并不利。一方面，许多天主教徒不遵守它，这就破坏了教会纪律和罗马教廷的威信。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许多天主教的劳动者也投票赞成社会党，天主教的主教们和统治阶级都惊慌不安，确信社会党在选举中获得了成就。

1903 年 11 月，俄国在梵蒂冈的驻办公使古巴斯托夫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梵蒂冈正在讨论 183 取消《不许》令的问题；教权派也主张取消，他们想使自己的儿子免受不参与国家事务的限制。古巴斯托夫又写道，教皇能够给予他们儿子的仅仅

① «注意到一切情况，不许可»(拉丁语——«attentis omnibus circunistants, mon expedit»)。

是教皇近卫军中几个军官职位和光荣的梵蒂冈称号。此外，主张取消《不许》令的人证明说，为了使保守分子参加议会并建立与自由派和激进派相对立的强大党派，必须这样做。

庇护十世与梵蒂冈权势集团，如前章所述，反对在意大利建立天主教政党。因此，古巴斯托夫写道，这位教皇力图找到另外的出路："有人对我说，他正在研讨授权主教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授权本堂神甫允许至今由于顺从而不参加选举的选民出来当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适当时机。"①

为了使信奉天主教的选民脱离社会党并把他们置于教权派的控制之下，庇护十世实际上已将他以前的历任教皇和他自己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参加议会选举的命令化为乌有了②。

为意大利的统一英勇奋斗几十年的意大利人民，不愿倒退复旧，不顾天主教会的强大势力和国内教权派的横行霸道③，坚决反对罗马教廷的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1，第214—216页。

② 《不许》令于1919年由教皇本笃十五世正式取消。

③ 1882年意大利仅修士和修女就有三万五千四百名，1901年——四万七千名，1909年——五万名。

计划。广大的人民懂得，梵蒂冈的主教们为追求狭隘自私的目的而拖着国家倒退，恢复以罗马为首都的教皇国意味着意大利的四分五裂，而教皇国，就象在1870年被消灭之前那样，要采取依靠外国列强的方针并成为外国在亚平宁半岛上互相倾轧的工具。

对罗马教廷反意大利政策的回答是国内反教权主义的发展，它远远超出了执政的资产阶级所许可的范围。

1889年，在罗马布鲁诺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地方举行乔尔丹诺·布鲁诺纪念碑揭幕典礼，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反罗马教廷示威。到罗马来参加纪念活动的有意大利、德国、法国、比184利时、匈牙利、丹麦、美国和其它国家的代表。

伊兹沃利斯基在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中谈到“梵蒂冈极端气愤”，它反对在罗马建立布鲁诺纪念碑[①]。

正是在纪念布鲁诺示威的时候，梵蒂冈讨论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09页。1900年，意大利政府为了讨好梵蒂冈禁止公开纪念烧死乔尔丹诺·布鲁诺三百周年。

了教廷离开罗马迁往西班牙的问题。

国内反教权主义情绪的高涨不是罗马教廷终于愿意同意大利政府妥协的决定性原因。促使教皇同意大利政府寻求妥协的主要原因是他希望把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联合起来。应当指出，梵蒂冈故意特别公开地、引人注目和大叫大嚷地实行其反意大利方针，为的是引起信奉天主教群众的注意和同情；同意大利政府谈判妥协问题，却是秘密进行的。

工人运动的成就使意大利统治阶级和大多数属于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梵蒂冈主教们胆战心惊。二十世纪初，参加意大利工会的劳动群众有二十六万。1892 年产生了社会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特点是它的战斗精神。罢工次数年年递增：1880 年——罢工二十七次，1882 年——四十七次，1884 年——八十一次，1886 年——九十六次，1888 年——一百零一次，1890 年——一百三十九次①。"在这个时期，即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

① H·古阿尔季叶里：《意大利的工人运动》．纽约，1946 年版，第 143 页。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一些特点展示出来，这些特点将它推向国际工人运动的前列。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战斗精神和对组织起来的渴望，即劳动群众对团结的渴望，以便从主人手中夺取哪怕一小块面包也好。合作社和工会运动的大规模发展便由此而来……"①

利奥十三世与梵蒂冈主教虽然对意大利政府施展阴谋，但却乐于享受他们所仇恨的这个王国政权的保护。他们表示不满的只有一点：按照他185们的意见，这个政权对镇压工人运动不能胜任。请看B·H·拉姆兹多尔夫(当时的外交部顾问，后来的俄国外交大臣）1891年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关于伊兹沃利斯基由梵蒂冈报告那里对意大利工人庆祝五一节的反应："……在意大利，主要在罗马，五一节发生骚动，伊兹沃利斯基4月24日——5月4日的考察提供了关于这次骚动的有趣的详细情节。梵蒂冈表示抗议并指出，如果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条件最优越的意大利工人走到这样的极端，那么这就证明，通过革命建立的

① 《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来的生活与斗争》，莫斯科，1953年版，第40页。

王国政府既没有必需的力量，也没有威望战胜他们……宗座也问自己，保护罗马的圣地和艺术珍品是否与整个文明世界利益有关……”①

在一切涉及保护资产阶级制度和反对人民的问题上，意大利教会的主教们和梵蒂冈都同政府合作。

1898年5月，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意大利。米兰的起义工人同军队进行了五天巷战。人民群众生活困难所引起的风潮吓坏了资产阶级，也吓坏了梵蒂冈。1898年2月1日，当此事件尚在酝酿时，恰雷科夫向彼得堡报告了他同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的谈话。后者说，意大利有三百名主教；他们来到罗马向他报告国内局势。这种局势非常严重，人民对国务活动家和议会失掉信心。拉姆波拉说，“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正在作出巨大成绩。”同恰雷科夫谈过话的另一位红衣主教也指出，为压制人民的不满，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必须和解。恰雷科夫写道：“同时还必须指出，不仅上面提到的红衣主教，而且教皇

① B·H·拉姆兹多尔夫：«1891—1892年日记»，莫斯科，1934年版，第110—111页。

本人对意大利目前的混乱局面都丝毫不抱幸灾乐祸的态度……”①

1898年5月10日，正当意大利国内风潮如火如荼的时候，恰雷科夫报告说，拉姆波拉针对他的问题“是否应当担心罗马市的秩序受到破坏呢?”回答说，政府在罗马集结了许多部队，不用担心。恰雷科夫说：“从国务卿的话中可以得出186结论：教皇政府虽然不承认《保障法》，但实际上却依靠国王的警察和军队来保护梵蒂冈的安全。”②

利奥十三世所指望的正是他诅咒的那个政府的士兵；教皇准备同这个政府合作反对人民。恰雷科夫写道，罗马教廷预料，也许政府“在社会危机日益迫近意大利的时候会主动向教皇请求援助，当然不是无代价的……”③

果然不错，意大利高级僧侣，按照恰雷科夫的说法，放弃了在事件开始时采取的“观望态度”，许多主教向本教区僧侣发出呼吁，坚决要求他们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3—4页。

② 同上，第63—64页。

③ 同上，第64页。

支持地方当局①。

1898年8月5日，利奥十三世发表致意大利僧侣和民众文告。教皇写道，天主教徒应严格遵守法律，不参加罢工和反对当局的暴动；同时他们也不能不希望把真正的实际的自由归还教皇②。恰雷科夫就教皇发表文告一事指出，最近发生的事件"对梵蒂冈，尤其是对梵蒂冈的'不妥协派'最为有利"③。

由此可见，当人民群众奋起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梵蒂冈的主教们便将对意大利政府的敌意置之脑后，帮助它镇压人民的风潮。他们还想从这些事件中大捞资本：向执政阶级证明，国家同教会的联合是维持现行制度的前提。

1899年9月12日（8月31日），萨宗诺夫（当时的俄国驻梵蒂冈公使馆秘书）向拉姆兹多尔夫书面报告自己同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的谈话。后者说，意大利的复兴只有"通过合理解决'罗马问题'"和同教会和解才能达到，不然的话，它（意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71—72页。

② 同上，第100—101页。

③ 同上，第103页。

大利政府）“必然成为它赖以建立意大利统一的那个革命的牺牲品”。萨宗诺夫说：“尽管教权派对王国政府的缺点和失败有些幸灾乐祸及毫无疑问的夸大，但我觉得，梵蒂冈看到政府权力有可能进一步削弱也有一些担心。不论梵蒂冈发出什么怨言，利奥十三世毕竟心里明白，意大利国王在守卫他自愿居住的囚牢，同时还保卫罗马教廷不受教会之敌与社会秩序之敌的侵犯。”①

187

意大利统治集团也想同教皇妥协，以便巩固同天主教会的合作，反对国内的革命运动。意大利政府特别努力拉拢物质生活条件与梵蒂冈主教们的富裕生活相差很远的低级僧侣。意大利国王古姆贝特 1898 年 11 月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讲道：“我的政府在处理同教会的关系时将遵循自由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础是意大利的民间传说和意大利人民的感情，并且由于一贯尊重宗教，在任何情况下也能够保障民政的权利……”国王演说后紧接着宣布提出增加农村僧侣薪金法案，他们“将在对宗教和对祖国承担义务的鼓舞之下履行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6，第 104—105 页。

他们的职责”①。

教皇对意大利“掠夺”他们的抗议，后来逐渐流于形式。1900年12月16日，利奥十三世在秘密宗教法庭上照例发表抗议意大利侵占教皇国的演说（这一抗议已通过照会形式通知驻梵蒂冈外交团）。1900年12月5（17）日，恰雷科夫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今天同教皇国务卿谈话时，他让我注意上述抗议的含蓄和分寸。我觉得利奥十三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罗马教廷的基本权利和走走形式，而不指望有什么实际效果……”②

促使双方寻求妥协的另一个情况，是随着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主贵族界也发生变化，当时地主贵族是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主要支柱。

188

埃·塞雷尼在他研究意大利农业关系的著作中写道，地主贵族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发生。“必须指出，”埃·塞雷尼写道，“自上个世纪末期……地主贵族就完全陷入标志意大利金融寡头政治诞生的建筑投机事业与银行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134—135页。

② 同上，案卷7，第156页。

丑闻之中。"①

参加银行投机事业，不久又参加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殖民地企业的，还有梵蒂冈的主教们②。

1900年11月，萨宗诺夫向拉姆兹多尔夫书面报告盗窃梵蒂冈巨额有息证券的情况，"这次查明，梵蒂冈的相当大一部分款项存在利率为百分之四、五的意大利有息证券上。这里的政府报刊提到这一事实时指出，它说明意大利财政赢得了与意大利不共戴天的仇敌——教皇的信任……"③财政利益使梵蒂冈与意大利渐渐接近。

---

① 埃·塞雷尼：《意大利农业问题》，第113页。

② 1893年，意大利揭露了一件数千万里拉的大宗金钱舞弊案，罗马银行被牵连在内（焦利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这件事——见他的《我的生平回忆》一书，伦敦，1923年版，第78—84页）。关于这个案件，恩格斯写道，罗马银行行长汤隆古"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每天清早四点钟都要去做弥撒，有些代理人和中间人是他不愿在自己银行的办公室里见到的……他就在做弥撒时同这些人打交道。汤隆古同梵蒂冈的关系很好，他就把一个文件匣子交给了意大利警察当局所望尘莫及的梵蒂冈保管，那里面所装的正是那种能保证使他不致遭受有势力的朋友和庇护人谋害的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24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116—117页。

正象埃·塞雷尼所指出，大资本家与地主贵族之间政治联盟“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广泛而有效的互助，不如说是由于同劳动阶级斗争的社会反动势力政治利益的一致”①。

包括意大利高级僧侣和大多数梵蒂冈主教在内的意大利贵族，需要巩固资产阶级国家以镇压人民的抵抗，因此教权派权势集团日益倾向于必须消除教会与国家的分歧。1887 年和 1888 年，意大利高级僧侣代表与同梵蒂冈有关系的人士就提出解决“罗马问题”但不恢复原来教皇国的方 189 案。1887 年由别尼迪克丁的卡西诺山修道院神甫路易吉·托斯蒂发表小册子《和解》。托斯蒂参加同克里斯比的谈判并在梵蒂冈同意之下行动。他在自己的小册子中“预言和解并花言巧语地颂扬可能的调停人——利奥十三世……有根据推测，托斯蒂的小册子在发表之前确实是经过利奥十三世批准的，我们知道，他并不嫌弃使用这类‘探测气球’”②。据德国驻罗马武官证明，教皇对这

① 埃·塞雷尼：《意大利农业问题》，第 113—114 页。

② 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 233 页。

本小册子作了亲笔修改①。

1888年3月，克雷莫纳主教鲍诺麦利发表文章《罗马与意大利》，证明恢复教皇国是不可能的。他写道，教皇具有足够的道德威信，它比世俗统治更能保证教皇的独立，可以给他留下一小片领土——从特韦雷河至海边的小小的国家②。这正是四十年之后，即1929年，作为教皇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缔结的拉特兰条约基础的那个方案。1888年梵蒂冈对这个方案持否定态度，于是克雷莫纳主教的文章便列入禁止天主教徒阅读的书籍目录，鲍诺麦利不得不公开否定自己的文章。

梵蒂冈集团中愈来愈多的人得出结论，恢复原有疆界的教皇国是不可能的。据帕施托尔提供的1902年的证据，利奥十三世的来信索德里尼伯爵告诉他说，"现在梵蒂冈没有人再考虑恢复整个教皇国的问题了"③。

---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书信选集》，第1卷，第141—142页。

②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第418页。

③ 路·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395页。

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里，列宁综合 1870 年以来世界历史主要资料时写道："1888—1895：梵蒂冈同克维里纳尔谈判。没有成功！"①

利奥十三世开始同克里斯比政府（克里斯比在 1887 年首次任意大利首相）秘密谈判。梵蒂冈希望以意大利把罗马市或至少该市的一部分和至海边的地区让给教皇为条件解决冲突②。　190

谈判没有成功：意大利政府不能把一部分意大利领土连同罗马市划给梵蒂冈。这样解决问题会引起人民极其强烈的义愤。而在梵蒂冈，当时不妥协的红衣主教们还很强大，他们在梵蒂冈外和意大利国外都有势力强大的庇护人，他们反对放弃恢复教皇国的要求。

德国驻罗马武官恩格布列赫特 1888 年 1 月 12 日致瓦德西伯爵的信中，引用了梵蒂冈同克里斯比谈判（卡西诺山修道院神甫托斯蒂受教皇委托进行谈判）的某些细节。恩格布列赫特说道，意大利政府准备向梵蒂冈作很大的让步。但谈判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9 卷，第 789 页。

②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 110 页；又见 L·兰克：《罗马教廷史画册》，第 392 页。

中断。克里斯比向受教皇委托同他进行谈判的中间人宣布，他有确切的根据，说明梵蒂冈在耍两面把戏：拉姆波拉的通告不久前才发出去（指1887年7月22日拉姆波拉致梵蒂冈外交代表的通告，其中说道，与意大利政府接近的第一个条件是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教皇和法国共同反对意大利。克里斯比向梵蒂冈代表说，法国到处——在君士坦丁堡、埃及、马萨瓦——进行反意大利的活动，既然教皇参与这种活动，那么根本不可能继续谈判下去①。

然而在此之后谈判还不止一次地恢复过。1899年2月2（14）日，恰雷科夫向穆拉维约夫写道："……我从私人的，但完全可靠的来源得知，去年秋季海军上将卡涅瓦罗，还有富蒂斯先生（共济会会员、农业大臣）与罗马教廷进行和解谈判，富蒂斯先生通过阿洛伊西奥·马增季尼先生斡旋，并且有波伦亚大主教、红衣主教斯瓦姆帕的支持。不久前，著名的英国罗马天主教政论家威尔弗里德·沃德先生到这里来过，据我所知，他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书信选集》，第1卷，第141—142页。

受东印度总督洛德·柯曾的委托接受了在红衣主教拉姆波拉与海军上将卡涅瓦拉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任务。这一切尝试都完全失败了：红衣主教宣布，为了罗马教廷必不可少的独立，王国首都应当从罗马迁到别的城市，给教皇开放出海口。海 191 军上将反驳说，放弃罗马可能毁灭的不仅是任何一个部，而且是一个王朝，将梵蒂冈与海隔开是要更好地保证它的安全，免受外国的压力……”①

恰雷科夫说，尽管谈判不成功，但他的紧急报告中所提及的意大利活动家仍幻想和解。

和解的条件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梵蒂冈不放弃获得罗马的希望。还在1902年9月，俄国在梵蒂冈的驻办公使古巴斯托夫就向彼得堡写道：“……在梵蒂冈，不仅宗教界，而且世俗人士都毫无疑问暗怀希望，在内部或外部困难的影响下，圣彼得的城市归还它唯一合法继承者的那一天，迟早必将来到……”②

主和派对利奥十三世的继承者改变梵蒂冈的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179—180页。

② 同上，案卷9，第142页。

方针寄予巨大的希望。1903年7月末，在利奥十三世生病期间，俄国驻意大利大使涅利多夫写道，意大利统治集团显然希望，这位教皇的继承者是一位多管宗教事务而少管政治的"非政治性"教皇。涅利多夫又写道："善良的意大利人认为，选举首先关心教会的教皇就有希望在王国政府根据《保障法》允许他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梵蒂冈与奎利纳之间可能出现即使不是公开的和解，起码也可建立正常的关系(临时协定)，这将促进年轻王国内部局势的稳定……"①

1903年8月4日由教皇选举会选出的新教皇庇护十世，在他的首次教皇通谕中没有攻击意大利政府。古巴斯托夫在1903年9月23日(10月6日)写道，意大利报刊因这一通谕而十二分热烈地赞扬教皇，"特别称赞他打破先皇们的惯例，用最温和的、几乎是神秘主义的言辞表达了教会必须不依赖任何外国的思想……"② 但是，不妥协派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03年，案卷92，第1卷，第142—143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1，第176—177页。

在梵蒂冈仍然相当强大。11 月 9 日，庇护十世在 192
他当选后的第一次宗教法庭会议上讲话。他对红衣主教们的讲话与他的首次教皇通谕大不相同。这时他反对“罗马教廷的屈辱性地位”，并宣称，“要他不过问政治问题是妄想；相反，他根本不打算把政治与基督教的道德分开……”①

总之，不管怎么样，庇护十世在他即位初期就使人们了解，他在“罗马问题”上将坚持以前历任教皇们的方针。但实际上，在上述的意大利国内原因以及新的国际情况的影响下，庇护十世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他毫不妥协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意梵关系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罗马教廷的整个国际政策中占有很大的地位。罗马教廷坚决要求复辟教皇国，多年来以“罗马问题”为中心的斗争也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梵蒂冈的国际方针。

梵蒂冈与三国同盟

三国同盟的主力是德皇帝国。梵蒂冈和德国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1，第 208 页。

统治集团彼此都要求接近和互相合作。罗马教廷坚定不移地指望德国，尤其是俾斯麦的支持①。对罗马教廷来说，首先是在“罗马问题”上的支持。不管这件事怎么样，敌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德国政治制度是比较合乎梵蒂冈主教们的心意的。自从沙皇制度的不稳固性日益明显之后，梵蒂冈主教便把德国看作整个欧洲的主要反社会主义堡垒。利奥十三世也对威廉二世的社会蛊惑和利用解决“工人问题”反对社会主义很感兴趣，因为教皇本人也以同样的精神并抱着同样的目的进行社会蛊惑。

德国统治集团也乐于同梵蒂冈合作，他们力争在那里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德国需要教皇支持它在巴尔干半岛、近东的对外政策和它的殖民扩193张。德国统治集团还需要梵蒂冈支持他们的对内政策，首先希望在梵蒂冈与主教团的帮助下以政府的政策精神对天主教中央党施加影响。梵蒂冈确实促进中央党由“反对党”变成了执政党。德皇政府还希望梵蒂冈支持它在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9卷，第5页。

的反波兰政策，结果它得到了这种支持。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三国同盟订立伊始，梵蒂冈与这一欧洲列强同盟的霸主之间就形成了友好关系。

1887年，文化斗争年代颁布的反天主教会主要法令几乎全部取消。形式上仍然有效的是反耶稣会士法，但实际上已无人遵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才彻底废除。发动文化斗争的俾斯麦，自己也开始同天主教中央党和梵蒂冈妥协。1887年4月21日，俾斯麦在说明自己拒绝继续进行文化斗争的理由时声明："我们必须在国内外战斗的严重考验来临之前结束一切不是由极端必要性引起的内部纷争"①。

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馆在文化斗争结束之前就已恢复(1882年)。库尔德·冯·施勒策尔被任命为大使，他把拥护三国同盟的、亲德的梵蒂冈主教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受到利奥十三世的宠幸②。1885年，俾斯麦向教皇作出友好姿态：建

① 引自E·A·阿达莫夫的前引著作。

② 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1747—1920年》，第437页。

议他担当德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仲裁人，两国因争夺原属西班牙，但后被德国占领的加罗林群岛而发生了冲突。

教皇作出所罗门决议，实际上使德国获胜：群岛仍归西班牙所有，但德国得到了它在商业、航海业方面所追求的一切，以及在群岛上设海军基地的权利。教皇决议于1885年12月为双方所接受。

俾斯麦因推选教皇为仲裁人而博得利奥十三世的好感。实际上，德国首相并不认为教皇的仲裁有多大意义。1885年到德国来的英国银行家亨194利·吉布斯在同俾斯麦谈话时说道，英国人认为推选教皇担当加罗林群岛争议的仲裁人是聪明的步骤。对此，俾斯麦笑着回答，正是这样，“况且他的决定对我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①。

关于教皇的仲裁，瓦德西在1885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德国推选教皇担任加罗林问题的仲裁人，全世界都认为是英明的步骤；“我们得到还是得不到加罗林群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

① 《俾斯麦全集》，第8卷，第533页。

样。主要的是，这件事值得进行到底。"①

梵蒂冈对这件事非常认真并竭力将俾斯麦的步骤解释为罗马教廷国际威望提高的明证。

1886年1月15日，利奥十三世在向红衣主教讲话时得意扬扬地说，两国伟大而坚强的人民向教皇提出，请他判断他们的是非以达到和平的目的。教皇没有忘记指出，请求他担任仲裁人这一事实证明，限制罗马教廷固有的自由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因此受到损失的，按照他的说法，不仅是公理和宗教，而且还有社会安宁②。利奥十三世还谈到，要回到教皇是各族人民之间法律问题上的裁判那个时代③。

教皇因此事奖给俾斯麦一枚带钻石的基督勋章并写信赞扬他在建立日尔曼帝国中所起的作用。施勒策尔也得到一枚梵蒂冈勋章。

俾斯麦与梵蒂冈结盟，还有更为重要的收获，他在利奥十三世的帮助之下取得天主教中央党对政府措施的支持。

---

① 阿·瓦德西：《回忆录》，第1卷，第262页。

② 《欧洲历史年鉴，1886年》，第355页。

③ 库尔德·冯·施勒策尔：《最近的罗马信件》，第79页。

1887年1月，国会通过核准七年新军事预算与和平时期大量扩军的法令。中央党当时已支持政府的军事计划，这次也丝毫不反对扩军，但考虑到选民对法令可能作出的反应，建议将七年改为三年；中央党还建议稍加缩减重建营的数目。俾斯麦通过施勒策尔请求教皇支持。为回答这一请求，在1887年1月3日红衣主教国务卿给驻慕尼黑圣使发函，教皇希望中央党对军事法令采取195最善意的态度，命圣使在中央党首领们的帮助下说服该党国会议员支持新军事预算。信中还说，他们支持新军事预算将给教皇带来很大的愉快；况且这对天主教会又非常有利；即使新军事预算的通过与新军事法令将给百姓带来新的沉重负担，但从另一方面他们将得到最高幸福的宗教世界的奖赏。

因此，为了天主教会狭隘的利益，为了保持教会和梵蒂冈同德皇政府的和平友好关系，利奥十三世要求中央党支持军事法令。

国会中央党团首领弗兰肯施太因男爵未将教皇来信通知本团成员。1月11——14日，新军事预算法案在国会中讨论并被否决。中央党团与

反对派一起投票反对。此后国会解散。

在通过驻慕尼黑圣使转呈教皇的复信中，弗兰肯施太因男爵解释了中央党的立场并写道，在宗教问题上，中央党服从教会的权力，但在纯粹政治性的问题上，它需要完全自由。

在另一封显然施勒策尔参加写成的致驻慕尼黑圣使的信中，国务卿亚科比尼红衣主教重申了教皇的立场。信中说，教皇不同意中央党在新军事预算问题上的立场。对中央党捍卫德国天主教徒利益的活动，教皇极为珍视，如果他认为必须表示自己对新军事预算的意见，那么这样做是因为宗教和道德问题与这一问题有关。亚科比尼又写道，可以认为，新军事预算的通过可能促进彻底修正五月法令并为保持和平服务。此外，教皇希望通过劝说中央党支持德国同罗马教廷签订的条约以取悦于德皇和俾斯麦。

为了向中央党团施加更强大的压力，梵蒂冈公布了教皇 1 月 3 日的信件。

2 月 21 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3 月份，国会开始讨论新军事预算法案。中央党议员牢记教皇的希望，没有投票反对法案，而是弃权，于是法案

通过①。

196 中央党的“反对立场”并不持久。1887年12月16日，它的首领文德霍尔斯特在国会讨论预算时发言声明，他和他的政治朋友（即中央党团）支持政府一切建军措施②。

梵蒂冈在以后也要求中央党按照德国政府的意图行事。

驻巴黎圣使恰基(1879年—1882年任圣使)曾向未来的首相比洛说过，“利奥十三世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同贵国首相（俾斯麦）达成协议”③。

波兰人民是俾斯麦和利奥十三世结盟的牺牲品之一。利奥十三世及其以后的历任教皇屡次谈到他们对波兰人民这一“信奉天主教”人民的“同情”和“爱”。

① 《欧洲导报》，1888年1月，第414页；《欧洲历史年鉴，1887年》，第67—68页；库尔德·冯·施勒策尔：《最近的罗马信件》，第90—93页；L·兰克：《罗马教廷史画册》，第388—389页；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第356—357页；《俾斯麦全集》，第8卷，第549页；G·赫特林：《生活回忆录》，第2卷，慕尼黑，1920年版，第64—66页。

②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七届议会第二次会议，1887/88年》，柏林，1888年版，第296页。

③ 伯·比洛：《回忆录》，第4卷，第527页。

亲梵蒂冈的历史学家不顾事实广泛散布罗马教廷对波兰之“爱”的神话①。事实证明却完全不是这样。

被德皇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分割的波兰，使罗马教廷感兴趣的程度决定于教廷牺牲波兰人的利益而能够预先得到德皇、奥皇或俄国沙皇对当时梵蒂冈所关心的问题有多少支持。波兰问题是梵蒂冈外交人员手中的一枚辅币。

罗马教廷支持一切压迫波兰的人并要求波兰天主教徒服从这些压迫者。

罗马教廷这一敌视波兰人民的政策与上述三国的波兰地主和波兰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矛盾。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既同德皇的制度又同奥皇、俄国沙皇的制度和睦相处，因为这些制度都保证他们能够剥削波兰和非波兰工人、农民。

弗·伊·列宁在1903年写道：“现在，波兰

---

① 利奥十三世的亲信，他的官方天主教历史学家索德里尼伯爵断言，利奥十三世“热爱波兰”并且似乎不同意俾斯麦的反波政策（见教会当局批准出版的E·索德里尼著《利奥十三世与德国的“文化斗争”》一书，因斯布鲁克，1935年版，第310页）。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的统治阶级、德奥的贵族地主、俄国的工业金融
197 大亨，都支持压迫波兰的各国统治阶级……"①

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的天主教高级僧侣，就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们有的同威廉二世政府合作，有的同尼古拉二世政府合作，有的同弗兰茨-约瑟夫政府合作。

恩格斯在1892年写道，在波兰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②

德国统治集团力求依靠梵蒂冈、德国、天主教主教团与中央党支持其反波政策。

普鲁士政府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坚决强迫波兰人德国化，收买和没收波兰居民的土地，将他们驱逐出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兹南。德国的沙文主义者、泛德意志主义者开展了猖狂的反波兰人运动。1886年1月15日，波兰议员亚兹泽夫斯基在德国国会上对从普鲁士、波兹南和西里西亚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17页。

②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单行本，1964年版，第20页。

驱逐四万波兰人提出质问。一贯坚决反对普鲁士当局迫害波兰人的只有社会民主党议员李卜克内西与辛格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痛斥政府的行动是野蛮行为；他说，瓜分波兰是非正义的和犯罪的行为，而恢复波兰是德国的幸福。为了人道和德国的荣誉，李卜克内西宣布，他抗议驱逐波兰人[1]。

天主教中央党代表文德霍尔斯特发言，首先向德皇表示忠诚。他虽然也反对驱逐波兰人，但把整个事情说成：对波兰人的迫害是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一种迫害。文德霍尔斯特极力掩盖事情的政治内幕，那就是，政府打算用从波兰人那里抢来的土地满足德国富农和容克地主的欲望；俾斯麦把波兰人驱逐出东部地区，还打算准备一个将来同俄国作战的战略基地。

文德霍尔斯特原则上不反对政府的驱逐权，但反对驱逐的数量和方式。中央党实质上是拥护德意志化政策的。 198

罗马教廷也坚持这种路线。为了同德国接近，

---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六届议会第二次会议，1885—1886年》，第1卷，柏林，1886年版，第537—538页；《欧洲导报》，1886年1月，第910—915页。

利奥十三世不反对俾斯麦的反波政策。教皇实际上通过促进波兰区天主教会与人民教育的德意志化来协助俾斯麦。

"……随着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德国当局甚至在波兰天主教神甫中也往往发现'大波兰主义的危险'。德国沙文主义者大肆叫嚣波兰神甫的'大波兰主义阴谋'，并要求不仅新教教会，而且天主教教会的一切宗教职务都改由德国僧侣担任……

德国统治集团广泛采用这种独特的德意志化方法，将德国天主教僧侣不仅安插在西部波兰地区，而且还安插到来因-威斯特伐利亚区。

教会德意志化在上西里西亚实行得最为广泛。1887年梵蒂冈任命的西里西亚大主教、红衣主教柯普，在天主教中央党的积极协助下系统地将波兰神甫更换为德国神甫。九十年代末，根据普鲁士官方统计资料，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僧侣中共有波兰人五十三名，而德国人则有九百一十七名。"①

① E·И·鲁宾斯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帝国主义在西部波兰地区的政策》，莫斯科，1953年版，第54—55页。

社会主义宣传在波兰劳动人民中影响的增长使梵蒂冈人士忧虑不安，于是教会神职人员便唆使教徒反对社会党人并引诱他们脱离反对波兰人民压迫者的斗争。

在向波兰地区委派高级神职人员的问题上，梵蒂冈向德国政府让步。1886 年 1 月，在普鲁士一连拒绝了十三名波兰神甫候选人之后，教皇批准德国人金捷尔为波兹南和格涅兹诺的主教。这是俾斯麦外交的胜利①。"波兰人的一切抗议都遭到利奥十三世的无情拒绝。善良的波兰天主教徒又被梵蒂冈当作商品利用了，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次。"② 1891 年末，普鲁士政府与罗马教廷达成协议，确定了格涅兹诺与波兹南教区大主教空缺人选，波兰主教弗洛里安·斯塔布列夫斯基被批准为大主教（接替 1890 年去世的金捷尔）。 199

1891 年 11 月 19 日(12 月 1 日)，伊兹沃利斯基就此事向外交大臣吉尔斯写道，教廷坚持"波

---

① 库尔德·冯·施勒策尔：《最近的罗马信件，1882—1894 年》，第 80 页。

② F·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1903 年》，第 44 页。

兹南大主教必须是波兰族人”。这一点普鲁士政府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是对神甫会向它提出的候选人却一一拒绝，最后同意斯塔布列夫斯基为候选人①。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伊兹沃利斯基解释道，德国让步的原因之一，是威廉“坚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满足德国的波兰人的民族感情，以便一旦与俄国发生冲突时使他们站在德国方面”②。

威廉同意斯塔布列夫斯基为候选人时知道，德帝国主义认为他是个最忠实的教会主教。

斯塔布列夫斯基在1891年5月4日的讲话中声明自己忠于德国并准备对这个国家尽一切义务。不久，斯塔布列夫斯基又声明，他感到自己是普鲁士的臣民，无条件地承认现行国家法制③。

1891年11月2日斯塔布列夫斯基在托尔纳天主教代表会议上讲话，颂扬威廉二世同“新时代的破坏性因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斗争。

---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17页。

② 同上。

③ M·劳伯特：《1772—1914年普鲁士对波兰的政策》，克拉克夫，1944年版，第152页。

讲话结束时，斯塔布列夫斯基说道，波兰人应当忠于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并支持德皇威廉的计划①。斯塔布列夫斯基一贯是普鲁士君主制的忠实臣民并要求僧侣和全体天主教徒忠于君主。他向普鲁士的官僚们说明，在波兹南，威胁现行制度的危险不是来自波兰人，而是来自社会党人。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伊兹沃利斯基说，斯塔布列夫斯基"根本没有波兰爱国小组那种毫无意义的热情"②。其他的波兰（和德国）天主教主教也象斯塔布列夫斯基大主教一样极力诱导波兰天主教徒丢掉对德国殖民者的仇恨并燃起对社会主义的敌意。 200

波兰地区的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是普鲁士反波政策的传播者，同时还在讲道坛上公开要求波兰天主教徒听从"上帝安排的"当局③。

---

① 《欧洲历史年鉴，1891年》，第130页；《总政策》，第7卷，第383页。

②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18页。

③ 梵蒂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也是这样为德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那时，在希特勒匪徒占领的波兰，梵蒂冈派一些同占领者合作的德国主教管辖波兰主教区。但泽主教卡尔·马利亚·斯普列特执行波兰人德国化政策狂热到了命令不仅将天主教堂里的，甚至连墓碑上的波兰字统统磨掉的程度。

总之，九十年代末梵蒂冈同三国同盟的霸主建立了友好关系。每当遇到适当的时机，威廉二世便强调教皇对他的好感。

参加三国同盟的另一个国家——奥匈帝国，也被梵蒂冈视为欧洲的天主教堡垒与在巴尔干诸国传播天主教的基地。1898 年 12 月恰雷科夫由罗马写道，为纪念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位五十周年罗马举行了有梵蒂冈官方代表参加的隆重祈祷仪式。虽然教权派报纸对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结盟表示遗憾，但对弗兰茨-约瑟夫个人对教皇的忠诚和与梵蒂冈缔结（1855 年）宗教条约作了应有的评价。皇帝在庆祝国庆时授予拉姆波拉奥地利圣斯杰凡勋章①。

德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一等秘书利赫诺夫斯基公爵在 1899 年 6 月 17 日向比洛写道，老皇帝日甚一日地听从教会并受耶稣会士的影响②。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受耶稣会士的影响更深。

罗马教廷在奥匈帝国的主要支柱是信奉天主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5，第 140—141 页。
② 《总政策》，第 13 卷，第 174 页。

教的贵族①。基督教社会党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起愈来愈大的作用，后来成为奥地利资产阶级的领导党。 201

梵蒂冈不得不考虑到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并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南方斯拉夫人日益强烈的民族运动。罗马教廷虽然不愿意，但仍然准备在教会体制的某些问题上迁就信奉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允许用本族语祈祷)，然而在政治问题上，它维护哈布斯堡君主制的利益及其对南方斯拉夫人的统治。

梵蒂冈极力削弱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利奥十三世支持所谓"天主教泛斯拉夫主义"——南方斯拉夫人在奥皇的最高权力之下，在天主教的怀抱中联合起来的计划。天主教泛斯拉夫主义所抱的宗旨是巩固教权派封建主义分子在南方斯拉夫人中的地位以对抗南方斯拉夫人的进步运

① 奥地利的天主教主教与修道院院长属于封建贵族并且是大地主。据英国外交官格雷戈里(最初在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工作，自1914年任英国驻梵蒂冈公使馆秘书)供述，奥利缪茨主教每年的收入为六万英磅，施特罗斯迈耶主教每年的收入等于二十万英磅（J·格雷戈里：«在外交边缘上（1902—1928年)»，伦敦，1928年版，第46页)。

动。天主教泛斯拉夫主义的捍卫者是扎科夫（克罗地亚）主教施特罗斯迈耶，他得到利奥十三世的支持。他虽是一位著名的克罗地亚资产阶级活动家，但同时也是哈布斯堡君主制的忠实拥护者①。

恰雷科夫（在1901年3月）称施特罗斯迈耶为“教皇宠爱的一位使南方斯拉夫人天主教化的活动家”②。天主教泛斯拉夫主义具有明显的亲奥地利性质。1881年利奥十三世在罗马举行“全斯拉夫的”基里尔·美多德节，关于这件事伊凡·弗兰科写道，教皇“竭力宣扬现在斯拉夫人所向往的新中心是奥地利而不是俄国，宣扬奥地利是主要的斯拉夫和天主教国家，而俄国虽然是斯拉夫国家，但不信奉天主教……”③

奥匈帝国统治集团对天主教泛斯拉夫主义的

---

① H·汉施：《奥地利史》，第2卷，格拉茨——维也纳——科隆，1953年版，第512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政治档案全宗，1914年，案卷2906，第9页。

③ 伊凡·弗兰科：《天主教泛斯拉夫主义》，载于《十九世纪乌克兰革命民主主义者社会政治与哲学著作选集》，莫斯科，1955年版，第226页。

态度问题比较复杂。他们支持在天主教会的庇护下教会合并的主张以利于他们压迫南方斯拉夫人的政策和在巴尔干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时他们却怀疑施特罗斯迈耶及其同伙的关于建立南方斯拉夫人国家的计划，虽然这个国家在哈布斯堡的庇护之下。他们尤其敌视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运动。 202

萨宗诺夫在1900年10月由梵蒂冈写道，“……很难想象施特罗斯迈耶与施塔特勒尔(萨拉热窝大主教——舍英曼)蒙席进行宗教-民族宣传是自冒风险，而没有罗马教廷的鼓励。对使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各民族与罗马统一仍然抱有幻想的利奥十三世，据我听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施特罗斯迈耶蒙席的政治思想，认为它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教皇与红衣主教国务卿丝毫不因奥匈政府对上述二位主教的活动进行公开谴责而束手束脚，不错过机会向他们表示自己的厚意，他们每次在罗马出现都会引起某种使奥地利大使馆伤脑筋的事件。”①

加里西亚的合并派教会也为梵蒂冈和奥地利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124页。

统治集团的利益进行活动。

加里西亚的天主教主教属于波兰贵族。地主与天主教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盟。《火星报》在1902年报导加里西亚的情况时写道："地主和神甫是这个奥地利地区的全权主人；一部分人掌握着整个政权、所有的议员席位、全部行政机构、整个法院；另一部分人则掌握着农民的头脑和心灵。地主和神甫二者通过剥削贫困愚昧的农民牢固地联系在一起。"①

半个世纪以来，领导合并派教会的是舍普季茨基伯爵——一个出身于波兰富裕贵族的人。他这个杰出的奥军军官，脱下军服换上袈裟，受到梵蒂冈的爱抚，忠心耿耿地为罗马教廷与哈布斯堡王朝服务，后来为毕苏斯基反动制度服务，晚年又为希特勒德国服务。

德国统治集团也渐渐对教会合并派发生兴趣。1912年1月，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吉尔斯向彼得堡外交大臣写道，德国"千方百计向加里西亚的希腊天主教徒，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希腊教会

① 《火星报》，1902年10月15日，№26。

合并派信徒表示自己的好感……"① 舍普季茨基和许多教会合并派活动家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投靠法西斯侵略者证明，德国统治集团对教会合并派的"好感"产生了效果。　203

由此可见，梵蒂冈在三国同盟的第二个参加国——奥匈帝国具有巩固的地位。

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使梵蒂冈同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了。梵蒂冈人士对这两个国家同意大利——教皇权利的"篡夺者"结盟不满意。然而，梵蒂冈以红衣主教加利姆别尔季、列多霍夫斯基、阿利亚尔季为首的强大的亲德派，积极地为巩固罗马教廷与三国同盟的关系进行工作。"教皇的助手与顾问……加利姆别尔季经常利用自己对教皇的相当大的影响促进梵蒂冈与德国合作。"② 三国同盟的拥护者加利姆别尔季认为，为加强这一强国集团，梵蒂冈必须同意大利和解。1892 年 8 月，伊兹沃利斯基向吉尔斯写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 19 卷，下册，莫斯科，1938 年版，第 18 页。

② E·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1903 年》，第 45 页。

道：加利姆别尔季“以同意大利和解和同三国同盟国家友好的公开拥护者而闻名”①。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施勒策尔就是依靠加利姆别尔季及其追随者的。1885年，教皇任命加利姆别尔季为梵蒂冈最重要的圣部——宗教非常事务圣部秘书，它同梵蒂冈外交活动的领导有最直接的关系。1887年，加利姆别尔季被派往维也纳任教皇圣使，他从事有利于三国同盟的活动并主张梵蒂冈同三国同盟合作。

列多霍夫斯基系波兰-奥地利贵族，自1865年任波兹南与格涅兹诺主教。在文化斗争年代，因对抗五月法令被判处两年监禁。梵蒂冈将他提升为红衣主教。1885年，列多霍夫斯基被召回罗马并被任命为宣传圣部——教皇宣传部首长（长官）。他由于拥护三国同盟反对俄国而与德国统治集团和解了②。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21页。

② 关于列多霍夫斯基的情况，古巴斯托夫在1902年写道：俾斯麦公爵下台之后，列多霍夫斯基“很快忘记个人的恩怨，变成了普鲁士政府真诚的拥护者”（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9，第110页）。

1895年，列多霍夫斯基因积极支持三国同盟和奥匈帝国向巴尔干渗透而获得奥匈皇帝授予的最高奖赏——列奥波特大十字勋章。

列多霍夫斯基在德国同德国政府在波兹南的傀儡斯塔布列夫斯基大主教合作，在巴尔干——同萨拉热窝大主教施塔特勒尔合作。“……有人认为施塔特勒尔大主教具有极端的天主教幻想主义并不愿承认塞尔维亚人民的统一。他的理想是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体居民天主教化。”俄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二等秘书在1914年7月8日（6月25日）的报告中这样说①。 204

梵蒂冈依靠三国同盟的主要国家——德国与奥匈帝国，这与梵蒂冈外交在一定情况下转向法俄同盟一方并不矛盾。文献中把这种转变同似乎对德奥怀有敌意的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不能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例如，比洛对拉姆波拉的评语很好，说同他处于“友好的关系之中”，拉姆波拉“对俾斯麦钦佩”之至，在他的办公室里只挂着两张画：穆里略“圣母像”的复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4卷，莫斯科，1931年版，第308页。

制品和俾斯麦向威廉一世报告工作的画像①。

拉姆波拉象利奥十三世一样致力于恢复教皇国和提高罗马教廷的国际作用。他所实行的政策取决于这一主要任务。仅仅在明显地看出德国与奥匈帝国都不打算为了梵蒂冈而同意大利闹不和之后，他才成了与法俄友好的拥护者并按照这一方针积极行动。但在十九世纪末梵蒂冈外交又恢复了同德国和奥匈帝国长期密切合作的政策。

文献中对罗马教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外交评价不一。E·A·阿达莫夫在关于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冈外交史的宝贵著作中写道，自1887年末“梵蒂冈的外交家们由于看到法俄协约逐渐变为财政和军事政治联盟而坚信欧洲大战不可避免并即将爆发，还同样坚决相信德国不可能成为两条战线战争的胜利者，便以反德意志同盟积极盟205员的身份全力以赴参与包围德国的政策。

英法冲突改变着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外部表现，梵蒂冈外交家便立即同两国同盟疏远——过去他们甚至把建立这一同盟的荣誉归于自己。南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4卷，第679页。

非战争使欧洲的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光明：英国危机四伏，反英外交阴谋的罗网在编织，损害英国利益的最大胆的设想和计划在形成，于是，梵蒂冈外交界又闻到了火药味，准备投入这一冒险事业，站到正在动员起来反对大不列颠帝国力量的前列。"①

象E·阿达莫夫那样断言，自1887年末梵蒂冈就"以反德意志同盟积极盟员的身份全力以赴参与包围德国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恰恰在这几年，梵蒂冈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尤其是在扩充德国军队的问题上，表现出它同德国统治集团的同心同德。前已指出，1887年梵蒂冈曾向中央党施加压力，要求它支持彻头彻尾反对法国的军事法令（谢普捷纳特法令）。

同时，利奥十三世与威廉二世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又建立了合作关系。1890年，利奥十三世同意邀请威廉二世参加柏林的讨论"工人问题"的"社会会议"。

1891年，普鲁士政府和罗马教廷就波兹南与

---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63页。

格涅兹诺教区主教补缺问题达成协议。

1893年，当梵蒂冈似乎“参与包围德国的政策”时，威廉二世前往梵蒂冈，以便在教皇的帮助下预先获得中央党对军事预算法案的支持。德国国会中有一个强大的派别反对再给扩军与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增加大量拨款。为强迫中央党团议员投票赞成法案，政府首脑卡普里维请求布烈斯拉夫尔市大主教、红衣主教柯普的支持，德皇也同后者谈过这个问题。

1893年4月23日德皇访问罗马并同教皇进行了会谈。通过会谈使教皇了解到如果中央党党团不支持军事法令，党内将发生分裂，那时中央党将失去它的影响。红衣主教柯普也积极支持军事法令①。

206

当中央党党团内围绕军事法案问题的争论激烈起来的时候，国会中央党团主席巴列斯特列姆

① 1906年德国报刊报导，在克洛维-霍恩洛厄公爵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有材料说明，在讨论军事法令问题时利奥十三世向德皇威廉索取五十万法朗的高价。中央党历史学家巴赫姆绝对否认霍恩洛厄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5卷，第282—283页）。

伯爵向本党团报告了教皇接见他的情况。他说，利奥十三世不干预军事法案问题，但明确地表示，鉴于宗教政治原因，希望同政府达到相互谅解；同政府分裂是最不符合他的心意的。国务卿、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巴列斯特列姆说，教皇非常重视保持中央党在国会中的巩固地位，因此需要考虑——将这种地位变成下次选举中的赌注是否聪明①。

总之，利奥十三世既“不干预”军事法令问题，又坚持要中央党投票赞成它。不错，中央党多数对法令表示反对，而国会解散，新国会通过法案，中央党党团几乎全体都投了反对票。

综上所述，利奥十三世支持军事法案和主张中央党同政府一致行动恰好是在梵蒂冈似乎参与“包围”德国的政策的时候。

还可以指出，在威廉二世访问梵蒂冈期间，奖给红衣主教拉姆波拉一枚德国黑鹰勋章。威廉二世同红衣主教列多霍夫斯基和解也在那些日子。德皇赠给他一个金制鼻烟壶并说：“往事已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5卷，第286页。

忘”，指的是文化斗争刚开始时列多霍夫斯基与政府的冲突。

最后还有，当梵蒂冈似乎在参与“包围”德国的政策时，罗马教廷开始积极支持德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

德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温特在他研究十九世纪末梵蒂冈外交的宝贵著作中，写了九十年代梵蒂冈外交方针倒向法俄一方的问题。他认为其原因在于，当国际局势改变和两大强国集团关系紧张时，利奥十三世认定，“实现他的计划的时机已到”①。爱·温特写道，利奥十三世对法国一向抱有好感。他促使法国保皇的右派天主教徒拥护共和国，打算从此将共和国变为沙俄可以接受的盟友并实现他同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计划，希望这将加速教会的联合。此外，温特接着写道，利奥十三世认为法俄联盟有解决“罗马问题”的可能，而这个问题只有削弱意大利才能解决。由于后者参加三国同盟，所以只有削弱这个同盟才能够实现罗马教廷的这一目的。最后，按照温特的

① 爱·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1903年》，第47页。

意见，对利奥十三世支持法俄友好起了不小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梵蒂冈已从英国天主教徒的领导人诺福克公爵那里了解到，一旦爆发战争英国打算站到法俄一方。在这样认识形势的情况下，大风暴掀起后哪一方取胜，对利奥十三世来说是清楚的。温特最后写道，为什么利奥十三世自1887年拥护法俄友好，而把自己说成或允许把自己说成法俄友好的保护者，甚至倡议者，是可以理解的①。

综上所述，阿达莫夫认为，梵蒂冈希望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在它所期望的战争中败北，因而从1887年便将自己的外交方针转变为与法俄同盟友好。此外，爱·温特又提出两条理由——利奥十三世对法国久有好感和教皇渴望接近俄国以实现教会联合。

至于说到利奥十三世对法国的“爱”，那么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他在1878年当选为教皇，而在1887年才想起他对法国的好感来呢？是否首先因为法国本国的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在这个国

① 爱·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1903年»，第47页。

家复辟帝制的打算彻底失败了呢？

利奥十三世确实力求达到教会在罗马保护下联合的目的，但梵蒂冈人士不可能不了解，俄国东正教会坚决反对与罗马教会合并，而外交上接近俄国远远不是教会联合的保证。

208 关于利奥十三世与威廉二世的友好关系，利奥十三世传记作者、天主教徒索德里尼曾经写到过。他说，只有1889年至1893年是短暂的不和睦时期，因为教皇对法国的政策使人怀疑，似乎梵蒂冈积极参加建立法俄同盟并鼓励对三国同盟的任务攻击。有人认为教皇赞成传播共和派的理论，还支持中央党搞的蛊惑性阴谋，但这种罪名是无根据地强加在中央党身上的。实际上，索德里尼写道，德国人错误地理解了利奥十三世的意图。他丝毫不认为共和制比君主制好，而认为教会应当既同贵族的君主制合作，也同民主的共和制合作。至于梵蒂冈对三国同盟的态度，在1892年2月27日致驻巴黎和驻慕尼黑教皇圣使的命令中，拉姆波拉令法国天主教徒服从现行政权，命令中还说，罗马教廷毫无“暗中损害同盟国”的意图。这一说明，按照索德里尼的说法，象“中

央党的聪明政策”一样，驱散了罗马与柏林关系中的阴云①。所以，这位天主教作者说，梵蒂冈与德国关系恶化时期仅限于1889年至1893年，但没有谈梵蒂冈外交方针的根本改变。

卡尔·巴赫姆——中央党的首领之一——写道，罗马教廷的政策由亲德转向亲法是九十年代末的事情。巴赫姆认为这件事与梵蒂冈确信自己在“罗马问题”上依靠德国的打算已经落空有关。他还说，社会舆论在1891年6月——8月从《罗马观察家报》的文章中得知这一转变。梵蒂冈的这种政策方针，按照巴赫姆的说法，在利奥十三世去世和庇护十世当选教皇时就改变了。巴赫姆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将梵蒂冈外交与其恢复教皇世俗政权的计划联系起来，将梵蒂冈转向法国与利奥十三世不满意德国对这个问题的漠不关心联系起来，他反对梵蒂冈某些“无头脑人”的集团，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集团把教皇推上反对三国同盟的政策。德国的天主教活动家开始在天主教大会上反对梵蒂冈的新方针，虽然不敢直接批评

①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与德国的‘文化斗争’》，第298—300页。

教皇，却猛烈抨击他的国务卿——拉姆波拉[1]。

209 在美国的天主教著作中关于利奥十三世外交动机的说法则完全不一样。在1948年出版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历史专著中，引用了该大学原校长约翰·基恩1894年7月31日致红衣主教吉邦的信。基恩在信中向红衣主教报告，不久前他受到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接见，从教皇的谈论中他得出如下结论：这位教皇国际政策的实质和目的是通过提高民主法国和美国威信的办法来破坏三国同盟（它意味着君主制、军国主义和对罗马教廷的压制）的威信，这一途径预示着教皇得以处于可接受地位的民主制意大利或联邦制意大利的诞生。[2] 这种把利奥十三世评为"民主"战士的说法与事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目了然的。

实际上，梵蒂冈与法俄接近是在同德国多年合作之后出现的。这是梵蒂冈对德国政府为保持三国同盟而不支持罗马教廷恢复其世俗政权的要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9卷，第25—35页。

② 帕蒂克·亨利·艾亨：《美国的天主教大学，1887—1896年》，华盛顿，1948年版，第150页。

求不满的表现。梵蒂冈人士对意大利参加德奥同盟不满，因为参加同盟本身就意味着德国和奥匈帝国承认以罗马为首都的意大利国家。1887 年，红衣主教加利姆别尔季同俾斯麦会谈“罗马问题”。俾斯麦说，如果意大利将罗马归还教皇，他将感到幸福；如果意大利的共和派获胜，他就毫不迟缓地为恢复教皇世俗政权采取行动①。

俾斯麦不打算为了教皇而牺牲与意大利王国的同盟。

众所周知，利奥十三世对1888 年威廉二世访问梵蒂冈时，他这位教皇未能在恢复教皇国问题上得到德皇支持是不满意的。

1889 年 5 月，意大利国王到达柏林，受到非常隆重的欢迎。这种显示意德同盟巩固的活动，梵蒂冈是不赞成的。

1889 年 2 月，伊兹沃利斯基由罗马向吉尔斯 210 报告，去年威廉二世拜会教皇“无疑地向他表明，一旦发生困难，根本不能指望中欧强国会无条件地站在意大利一边。因此利奥十三世迫切要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 9 卷，第 14 页。

求——这一点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报告中指出——尽可能扩大他的政治关系范围并得到缔约国之外的国家的友谊"①。

法国和俄国，都属于利奥十三世扩大自己政治关系的对象。罗马教廷同德奥具有长期而巩固的友好关系。但是，当梵蒂冈确信这两个与意大利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不支持罗马教廷对世俗政权的要求之后，便开始寻求同法俄联系，以扩大同它关系密切的国家的范围并通过显示与法俄的友谊向中欧强国，特别是德国，施加影响。

德国也极力保持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并努力以和解精神劝说自己的意大利盟友。

1889年11月30日，威廉二世的亲信布烈斯拉夫尔主教柯普向教皇写信报告自己同德皇的谈话。柯普将教皇在罗马的困难处境告诉德皇，并说克里斯比政府在敌视教会的活动中依靠同德国的联盟、德皇反驳说，这使他感到惊讶，因为柏林曾不止一次向克里斯比提出警告；克里斯比政府对教会的行动不利于意大利政府而有利于革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06页。

命①。

梵蒂冈开始与法俄接近使德国统治集团不安。1889年7月9日，在德国外交部颇起作用的戈尔施坦男爵向瓦德西伯爵报告法国外交活动在梵蒂冈活跃起来的情况：不应当低估教皇的力量，他正在向千百万虽然智力有限但是正直的人扩大自己的影响。戈尔施坦认为，应向梵蒂冈另派一位大使代替施勒策尔，还应当通过奥地利向罗马教廷施加影响，奥地利可以向教皇指出，“当他以法兰西首席主教和异教俄国的盟友面目活动时”②，对自己是有害的。 211

梵蒂冈与法俄同盟

法国天主教会与保皇派休戚相关，支持并参加他们反对共和国的阴谋。所谓的“法国王位追求者”得到天主教主教们的支持，这些主教认为共和国是暂时的体制，将为“合法的帝国”取代。

① 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1747—1920年》，第370页。

②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瓦德西元帅书信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家——麦克马洪、布朗热和德雷福斯案件制造者——与教权派一向关系密切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天主教是法国反动派的旗帜。关于麦克马洪的拥护者，马克思在1873年5月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唯一能使这些人形式上联合起来的就是上帝，即天主教。"马克思指出了耶稣会士在麦克马洪周围的巨大作用①。而麦克马洪则是教权派的驯服工具②。

布朗热也利用天主教徒的宗教感情投机。他的支持者有教会人士、天主教报刊和天主教活动家，其中包括德·曼伯爵——天主教工人联盟的组织者③。

但法国人民对君主制深恶痛绝。这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出来：保皇派得票愈来愈少，而共和派候选人得票愈来愈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保皇派所得票数如下：1876年——三百二十万张，1885年——三百四十万张，1889年——三百万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81页。

② 见《欧洲导报》，1873年，第7期，第372—383页。

③ C·S·菲利普斯：《1898—1907年的法国教会》，伦敦，1936年版，第220页。

1893年——一百万张，1898年——九十万张。这几年共和派所得票数为四百万张、四百三十七万张、四百六十万张、六百万张、六百七十七万张[①]。

与保皇派来往使教会威信扫地，敌视保皇派的劳动人民自然也仇恨教权派。教会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资产阶级乘机利用人民对保皇僧侣的仇恨进行反教权主义宣传，引诱工人脱离与剥削者进行的阶级斗争。

同时，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限制教权派欲望的措施。 212

部分法国高级僧侣早在八十年代已得出结论：与共和派不和及炫耀同保皇派的友好关系都对教会不利。法国僧侣在对待共和国问题上的分歧，于1881年选举时表现出来，当时教会拒绝在保皇派不可能获胜的地区公开支持他们[②]。但远远不是大多数僧侣倒向共和国一边。1880年迪顿神甫在巴黎教堂讲道时号召天主教徒做现代社会的顺民，教会当局强迫他缄口并将他放逐到与

① 《欧洲导报》，1902年，第5册，第167页。

② 《欧洲导报》，1881年，第6期，第864—865页。

世隔绝的科西嘉修道院去。十二年之后，即1892年，才允许他继续从事神甫工作。

统治阶级迫切要求树立反对工人运动的支柱，这对教会转向共和国起了主要作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社会主义而信仰上帝，教会上层人士（他们还担心宗教衰落）由于害怕社会主义而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结盟。1891年4月19日，拉姆兹多尔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前法国外交部长弗鲁兰斯到达彼得堡，他向外交大臣吉尔斯谈到“法国国内形势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即“……法国上等阶级日益笃信宗教，下等阶层与平民愈来愈不信宗教。现在，天主教僧侣承认并支持共和国政府。教皇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懂得从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好处……”①

面临君主复辟计划破产的现实，部分法国高级僧侣开始改变方针，声明决心同共和国合作。这种情绪在阿尔及利亚大主教、红衣主教拉维热里1890年11月12日在庆祝法国舰队到达阿尔及利亚宴会上的讲话中反映出来。拉维热里在这

① B·H·拉姆兹多尔夫：《1891—1892年日记》，莫斯科，1934年版，第98页。

次讲话中谈了公民接受现行政体的义务，并表示希望法国僧侣同意他的看法。在他讲话之后，“白衣兄弟修会”乐队演奏《马赛曲》。

就信念来说，拉维热里是君主主义者。1874 [213] 年，他曾向自己的密友、“法国王位僭望者”、（旁波王朝的）香勃尔伯爵建议，依靠军阀夺取政权。但时间也使他信服了，君主主义思想不受欢迎，将教会与君主主义混为一谈对教会本身是危险的。因此，持君主主义政治观点的红衣主教拉维热里才主张承认共和国①。他的立场受到与他关系密切的法国政府的赞许，也得到教皇的同意。1890 年 10 月，即公开声明承认共和国之前，拉维热里曾到罗马同教皇、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和宗教非常事务圣部秘书费拉塔主教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时决定，为了宗教的利益红衣主教将向法国天主教徒发出支持共和国的号召②。拉维热里和利奥十三世将法梵接近看作向意大利施加

---

① 见 W·兰格尔：《1890—1894 年的法俄同盟》，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1929 年版，第 133 页。

② J·F·帕尔：《泰奥菲尔·德尔卡塞与 1898—1905 年法俄同盟的活动》，弗里堡（瑞士），1951 年版，第 5 页。

压力的手段。

对拉维热里的讲话一部分法国主教反对，一部分（格勒诺布尔和凡尔登等地的主教）同意。1892 年 1 月，五位法国大主教——巴黎大主教、兰斯大主教、图卢兹大主教、雷恩大主教和里昂大主教——发表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控诉国家措施违背教会利益，同时建议天主教徒坚持下列立场：尊重国家法律，因为它们与信仰没有矛盾，尊重当局和宪法，同违背教会利益的措施进行斗争。五位大主教的这一声明实质上意味着教会诸侯承认共和国，虽然附带许多条件。此后，大多数法国主教开始采取这种立场。

法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对主教转向共和国持肯定态度。资产阶级不愿同教会“作战”，因为需要它这支反对社会主义的同盟军。1891 年，参议院收到建议政府起草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案，政府代表反对这一法案。法利埃部长在参议院中说，政府相信与教会言归于好的可能性。政府首214脑弗雷西奈声称，某些主教的行为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政府希望和平，谁要不尊重共和国——不仅政府，而且整个议会都将反对他。

法国主教在承认共和国之前与之后都不是共和制的崇拜者。他们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曾容忍共和制，但这样做是居心不良的：他们打算承认共和国以便改变法制，占据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加强反动分子和教会在共和国中的地位，继续独揽教育大权，阻挠加强国家机构中的世俗成分。加尔尼叶神甫在鲁贝的天主教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奉利奥十三世的命令接受共和国。我们登上火车是为了驾驶它。"①

这样的观点在高级僧侣中甚为普遍。1892 年 2 月，多明我派神甫马乌穆斯在巴黎教堂讲道（讲道词曾呈报教皇圣使批准）时说：在罗马帝国倾覆前夕，教皇向蛮族伸出手来。如今出现了新的力量。这种力量象从前的蛮族一样要求在阳光下占据地盘；"这种应当重视的力量……就是民主。永垂不朽的利奥十三世在他那光辉的通谕中用下列方式拥护民主：他向主教和神甫们说：'这就是新的蛮族，到他们中间去吧，你们将和他们一起建设未来的圣殿'。"②

① 见《教育》，1904 年 4 月，第 76 页。

② 《欧洲教育年鉴，1892 年》，第 263 页。

但是法国劳动人民阻挠天主教主教控制共和国。是人民反抗教权派的斗争，而不是资产阶级对世俗国家的忠诚，迫使它同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1904 年)并通过教会与国家分离法(1905 年)。

尽管如此，在拉维热里讲话前，即 1890 年前，已可以看出，法国天主教主教的立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由敌视共和国转向承认共和国。

这种趋势也符合梵蒂冈的计划，它这时已经明白，法国保皇派不可能成功，教皇与他们结盟威胁教会本身的安全。梵蒂冈人士这时也坚信不移，三国同盟的主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不215打算满足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要求。这就是梵蒂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向法国和法俄同盟卖弄风情的原因①。

法国统治集团也力图同梵蒂冈保持良好的关系，首先，因为天主教会在殖民地的传教活动和

---

① 某些作者说，拉姆波拉还打算提高共和制在法兰西的作用，以此"巩固意大利的共和思想，打击掠夺教皇国的王朝"，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见 O·贝克尔：《俾斯麦与德国的包围》，第 2 卷——《法俄同盟》，第 134 页；W·兰格尔：《1890—1894 年的法俄同盟》，第 133 页）。

法国“对东方基督徒的保护”权给法国资产阶级带来好处。此外，法国同梵蒂冈保持友好关系，可以利用“罗马问题”作为反对意大利的王牌。

梵蒂冈走上同法国合作的道路后，打算和法国共同反对意大利，因此对法国政府的反教权措施态度比较冷静，它认为，罗马教廷的政治目的高于某一个国家天主教会的利益。

梵蒂冈支持拉维热里。一位法国主教曾向教皇请示，如何对待红衣主教拉维热里承认共和国的问题。1890 年 12 月，即在阿尔及利亚红衣主教公开讲话之后不久，《世界》杂志发表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拉姆波拉致这位法国主教的公开信。信中写道，天主教教义中没有指出这一种或那一种国家制度与天主教是对立的；信徒应当参与国事，施加影响，因此，如果法国天主教徒走这条路，必将做出有益的事情。

1892 年 2 月，《新法兰西》周刊发表教皇致拉维热里的信，利奥十三世同意他的活动。教廷半官方刊物发表一系列论述梵法接近的文章，大都具有对三国同盟示威的性质。梵蒂冈外交人士想要说明，既然中欧强国不支持梵蒂冈的要求，那

么它将在另一个阵营中找到愿意帮助它同意大利斗争的盟友。

1891 年 6 月 19 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文章，教会向“它宠爱的女儿”法国伸出手来。在 1891 年 8 月 24 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说，事物的本身也不允许梵蒂冈脱离天主教会的“长女”——法国。

216

1891 年初，梵法接近的拥护者多米尼科·费拉塔奉命出任驻巴黎圣使。他曾接受训令要疏远有王朝复辟主义情绪的僧侣，并显示梵蒂冈与共和国政府关系和睦。

1892 年上半年，教皇发表一系列致某些法国主教的信件，说明天主教徒对国家应尽什么义务。教皇警告不要开展可能引起国内群情激愤的论战，建议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维护教会利益。1892 年 2 月 16 日，教皇颁布致法国僧侣与全体天主教徒通谕，内称，教会不应与生活中即将消失的方式、现象和某一种特定的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通谕说，天主教徒应当承认现行政府；应当团结起来，用合乎宪法的手段自卫，反对滥用法制。

教皇通谕要求天主教徒和僧侣承认宪法并在

现行制度的基础上为争取按照教会要求改变法制而斗争。

在 1892 年 5 月 5 日致六位法国红衣主教的信中，利奥十三世重申 2 月 16 日教皇通谕的基本原则并强调指出，通谕的主要精神是无条件承认和服从共和国这一神授的国家制度。

教皇之所以谆谆告诫，是因为主教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法国天主教贵族权势集团热衷保皇，反对教会同共和国合作。

1893 年 6 月 23 日，主张教会与共和国和解的驻巴黎圣使费拉塔，向教皇与国务卿报告，法国僧侣已分成两派：北方的主教们，由于生活在与旧制度联系不多的居民之中，比较愿意承认共和国。南方则不同，那里党派之间鸿沟较深，有些地方保皇势力根深蒂固（旺代、布列塔尼半岛），所以主教们比较不喜欢共和国，有些主教对保皇派抱有特殊的好感①。

费拉塔接着指出，北方和南方的主教都不愿 217

① U·施图茨：《利奥十三世时期的教皇外交》——据《红衣主教多米尼科·费拉塔回忆录》，柏林，1926 年版，第 131—132 页。

疏远保皇派，因为他们给予教会的资助最多。

利奥十三世并不象爱·温特所想的那样，刚一登上教皇宝座，立即作出必须与共和国达成协议的结论。温特写道，利奥十三世"刚一即位"就希望与法兰西共和国恢复和平并建立合作关系，为此于1879年派红衣主教恰基前往巴黎①。关于这件事，驻巴黎圣使费拉塔却有另外的说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利奥十三世自恰基蒙席出任圣使之初即认为，让法国天主教徒反对共和制不合时宜，又甚危险；由此读者可以看出后来教皇指示的萌芽，因为"当时象圣父十年之后那样去说服天主教徒自愿归顺共和国，还为时过早。在恰基蒙席时期，宗教政治斗争使天主教徒思想过分紧张，情绪过分激烈，保皇派对共和国必然垮台或可能不久即将垮台还抱有信心……圣父明白，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最初仅采取观望等待的政策"②。综上所述，利奥十三世最初采取观望态

---

① 爱·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1903年》，第68页。

② 引自U·施图茨：《利奥十三世时期的教皇外交》，第63页。

度，是因为考虑到法国保皇派的事业还胜负未定。仅在十年之后，如费拉塔所说，教皇才要求法国僧侣和天主教徒承认共和国。这在时间上与利奥十三世对三国同盟的新方针和对中欧强国在“罗马问题”上的立场的不满是一致的。

利奥十三世力图一箭双雕：首先，他想利用同法国接近为罗马教廷解决“罗马问题”的外交活动助一臂之力，将梵法接近变成向三国同盟施加压力的手段之一；其次，巩固法国教会在国内的地位，使它能够比较有效地参加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斗争。

1891年2月拉姆兹多尔夫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及拉维热里讲话一事时写道：“……有人说，有一位神甫或一位接近教皇的宗教界人士吃惊地告诉教皇，有位红衣主教听了《马赛曲》，据说利奥十三世的回答是：这比听梵蒂冈宫墙外演奏的《国王进行曲》好。”①

218

利奥十三世的新方针使三国同盟成员国惊慌不安。1891年6月21日，德国驻巴黎大使闵斯

① В·Н·拉姆兹多尔夫：《1891—1892年日记》，第30页。

特向卡普里维首相报告法国形势："共和国不断巩固。保皇派的拥护者日益减少。王位僭望者及其家族不受重视，最重要的是罗马与共和国正在和解……布朗热主义是君主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僧侣过去还相信帝制复辟的可能性，现在认为自己错了。教皇想要利用共和国（此处威廉二世加上：'反对信奉新教的德国'——舍英曼)，否则红衣主教罗捷利不会在极乐宫发表这样的讲话，而《罗马观察家报》上的文章清楚说明，他的讲话经过批准……教皇和民主共和国接近首先对意大利(此处威廉二世写上：'同样也对我们'——舍英曼）有害，我的意大利同行及其政府惶惶不安地看着这些表现。"①

瓦德西在1897年指出，威廉二世根据拉维热里的讲话认为，教皇"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②。教皇的手腕也使意大利惊慌不安。伊兹沃利斯基报告，意大利首相克里斯比在议会发言时"指责

① 《总政策》，第17卷，第303—304页。6月10日，红衣主教罗捷利在为他举行的红衣主教授冠礼上向法国总统卡诺致辞，强调"罗马教廷的命运与法国的命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② A·瓦德西：《回忆录》，第2卷，第390页。

梵蒂冈同意大利的敌人结盟，还说阿尔及利亚大主教扮演法国政治代理人的角色”①。

在与法国接近的同时，梵蒂冈外交界开始争取同沙皇俄国接近并恢复1867年中断的梵俄外交关系。利奥十三世指望，梵俄建交将提高罗马教廷的国际威望并保证沙皇政府在“罗马问题”上支持它。此外，罗马教廷认为，通过与俄国沙皇政府接近还可以实现其国际政策的另一目的——建立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势力的联盟。

伊兹沃利斯基在由罗马发出的一系列报告中说，利奥十三世预见到最近期间欧洲列强即将发生军事冲突，“希望在危机之日俄国与宗座精诚 219 团结，依他之见，这对保证我国边境安全极为有利，并可使罗马教廷得到他认为必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起仲裁作用的唯一大国的道义上的支援”。这一报告伊兹沃利斯基写于1888年12月②。时隔不久，即1889年2月，伊兹沃利斯基又写道，教皇“在恢复他的世俗权力问题上无论如何不可能对俄国寄予很大希望”，但他（教皇）认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10页。

② 同上，第103页。

为，俄国将在未来的列强冲突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希望同它保持友好关系[1]。

考虑到俄罗斯专制君主害怕革命，利奥十三世在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书信中表示愿与他同仇敌忾，一致反对“有破坏作用的”意向和理论。

利奥十三世反对社会主义的教皇通谕一向得到沙俄统治集团的支持。例如，象拉姆兹多尔夫伯爵这样的反动分子竟称教皇《新事物通谕》为“关于工人问题的卓越通谕”。

订立梵俄同盟共同对付社会主义是促使利奥十三世寻求与沙皇政府接近的动机，但它对沙皇政府愿与梵蒂冈接近却不起决定作用。沙皇政府需要俄梵接近还另有打算，即将俄国天主教会，首先是波兰地区的天主教会，变作自己的驯服工具，以便在梵蒂冈和教会的帮助下圣化对波兰人的民族压迫，使他们成为沙皇的忠实臣民。

此外，沙皇政府还将俄梵协作看作是削弱罗马教廷在巴尔干的亲奥活动的手段，因为俄国和奥匈帝国为维护各自的帝国主义利益经常在巴尔

---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07页。

干发生冲突。

1887年，亚历山大三世的代表A·П·伊兹沃利斯基到达梵蒂冈。利奥十三世在同他进行谈判时坚决强调，沙俄——梵蒂冈同盟是阻挡革命运动的堤坝。1888年3月，利奥十三世在首次会见伊兹沃利斯基时就向沙皇政府表示以此为宗旨订立同盟①。

这也是沙皇政府的希望。在给伊兹沃利斯基的指示中已明确说明这种希望并命令他在同教皇谈判时告诉对方，“陛下特别希望，教会和国家在目前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相互帮助在各族人民中确立道德与社会秩序……”② 众所周知，俄罗斯专制君主和罗马教皇对什么是“确立道德与社会秩序”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220

甚至非常不支持沙皇和罗马教皇接近的俄国东正教会主教也认为，为对付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沙皇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同教皇合作是可以容许的③。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73页。

② 同上，第71页。

③ 例如，见《教会通报》，1912年，第35期，第1088—1089页。

前已指出，教皇在同俾斯麦、威廉二世进行谈判时，曾两次牺牲并入德国的波兰地区居民的利益。同样，为保持同俄国沙皇政府的良好关系与合作，利奥十三世也毫不犹豫地牺牲并入俄国的波兰地区波兰居民的利益。

波兰问题是伊兹沃利斯基与利奥十三世及其国务卿拉姆波拉谈判的主要问题之一。谈判的结果是，罗马教廷同意帮助沙皇政府（象帮助德国与奥匈帝国政府那样）镇压波兰民族运动。

1888 年 4 月 11 (23) 日伊兹沃利斯基向吉尔斯报告，以亚当·萨佩加公爵为首的奥地利的波兰贵族权势集团到达罗马。他们根据德奥利益极力阻挠梵蒂冈与俄国接近。伊兹沃利斯基说："但梵蒂冈人士行动极端谨慎，仅安排个别人觐见教皇，而且规定不得对教皇与俄国关系提任何抗议。"① 梵蒂冈如此谨慎，正合亚历山大三世的心意。他在伊兹沃利斯基的紧急报告上批道："……为不损害我国与教廷的关系，教皇何等谨慎。"②

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伊兹沃利斯基宣布，梵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 78 页。

② 同上，第 77 页。

蒂冈准备向俄国罗马天主教主教发出指示，命他们“遵照国家意图”行动。拉姆波拉通知他们(1888年4月25日（5月7日）伊兹沃利斯基紧急报告)，利奥十三世“真诚希望主教们遵照国家意图行动，如陛下政府愿主教们受到这种训示，圣父将欣然从命”①。利奥十三世向伊兹沃利斯基保证，教皇权威“永远适用于规劝波兰天主教徒奉公守法，忠君报国”②。

221

梵蒂冈当局甚至宣布，愿与沙皇政府代表共同协商起草梵蒂冈致天主教僧侣指示。1888年2月伊兹沃利斯基报告：“红衣主教(拉姆波拉——舍英曼）准备和我共同讨论这些信件（致俄国天主教主教信件——舍英曼）的内容并将成文事先通知我。”③伊兹沃利斯基（1889年2月）毫不含糊地说，梵蒂冈为同沙皇政府接近而牺牲波兰人的利益。“……利奥十三世在欧洲局势恶化之际向我们提供宝贵友谊时特别指出波兰问题，他认为自己的宗教权力可在这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79页。

② 同上，第89页。

③ 同上，第100页。

用。"①

伊兹沃利斯基的使命胜利完成，俄梵建交，俄国于1894年5月在梵蒂冈设公使馆②。他被任命为驻办公使。在此之前两个月，即1894年3月，颁布致波兰主教的教皇通谕。教皇在通谕中讲述波兰效忠罗马教廷的历史并强调指出，教廷从不教人违抗君权与民族利益。教皇号召俄国天主教主教捍卫宗教利益(按照天主教主教的理解，就是与革命运动斗争)，避免与世俗当局对立并注意遵守梵俄协定。在这一通谕中，教皇还要求加里西亚的波兰天主教徒效忠奥匈帝国的皇帝并感谢他对宗教的热诚。教皇规劝普鲁士的波兰天主教徒奉公守法，相信德皇的"公正"③。罗莎·卢森堡说，利奥十三世以此通谕向俄国的波兰人说明，"在天国也失去了复兴波兰的希望，从今以

222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07页。

② 在此之前，即1893年，沙皇政府在内务部外国宗教事务司编制中曾设驻罗马天主教事务专员一职，该专员在梵蒂冈的活动不具有外交性质(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2016，第1—7页)。

③ 《欧洲历史年鉴，1894年》，第282—283页。

后，上帝在波兰的真正代表就是俄国的鞭子”①。

教皇号召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波兰人做本国君主的忠实臣民，前已指出，是符合波兰资产阶级和波兰贵族利益的。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写道，在俄国，二十世纪初波兰工业“已与俄国工业通过共同托拉斯和辛迪加合二为一”，但“促使波兰和俄国资本家联合的主要因素还是他们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切身的阶级利益。工人运动愈强大，波兰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忠心愈真诚……”至于波兰地主，“只要沙皇政府保护他们不受农民侵犯，就足以使他们放弃爱好自由的理想了”②。在奥匈帝国和普鲁士，情况也是这样：尽管波兰人遭受迫害，被迫迁往他乡，波兰贵族仍然效忠德皇。因此，利奥十三世的1894年通谕不仅符合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愿望，而且对波兰资产阶级和贵族来说也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它旨在反对波兰民族运动，反对波兰劳动人民。

---

① 罗莎·卢森堡：《稳步前进》，莫斯科，1926年版，第49页。

② 尤·马尔赫列夫斯基：《波兰史概论》，《全集》第6卷，莫斯科，1931年版，第230—232页。

1898年11月24日(12月9日)恰雷科夫报告，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同他谈话时说："如果某一主教与政府（俄国政府——舍英曼）之间出现困难情况，请通过驻梵蒂冈公使馆转告我们，教皇方面将永远支持你们并随时准备给予主教应得的教训。我重申，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我们的道德权威——支持你们……"①

1899年11月，教皇利奥十三世几乎一字不差地向恰雷科夫重复了这些话。据恰雷科夫说，教皇同他谈话时"再次热情地表达他个人对陛下的感情和他在加强俄国的波兰主教竭诚忠君报国223精神方面发挥作用的一贯愿望……"②

1901年2月27日(3月12日)，再次出任俄国驻梵蒂冈代表（驻办公使）的古巴斯托夫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他向教皇递交国书并在递交国书后同教皇进行长时间谈话的情况。"利奥十三世谈及波兰僧侣与皇帝政府的关系，并说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规劝访问罗马的波兰人和波兰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47--148页。

② 同上，案卷6，第130页。

主教做本国君主的忠实良民，认真执行政府命令……”①

当时，沙皇当局怀疑俄国天主教神学校有亲波倾向，政府设立监督这些学校的机构，因此发生磨擦，在这种情况下利奥十三世向古巴斯托夫声明，他准备在罗马开办为俄国培养天主教神甫的学校。教皇向他说明，在罗马办这种学校对沙皇政府何等有利。教皇说：“这个学校当然由公使馆管理……至于校长，我将努力寻找最适当的人选，推荐一位值得你们信任的人。这个学校将给俄国政府带来的好处是：在罗马度过六、七年后的毕业生将丢掉狭隘的波兰观点与成见，因此将成为比当地神学校毕业生优秀的神甫……”②利奥十三世通过这种方式向沙皇政府代表说明，从俄国的波兰居民中培养“丢掉狭隘波兰观点”、效忠沙皇政府的天主教神甫由罗马教廷承担。为证明这对沙皇政府有利，利奥十三世又以奥地利政府为例说，它“长期不同意在罗马办捷克神学校，但在已故布拉格大主教、红衣主教顺博恩的努力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第36页。

② 同上，案卷8，第36页。

与协助下，十年前这里开办了一所神学校，现在奥地利政府十分欢迎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丢掉捷克的民族个性后，成了政府的忠实仆人……”①

利奥十三世（以及他的继任——庇护十世）提出与俄国缔结宗教条约的建议。1898年5月12 224 (24）日，恰雷科夫向穆拉维约夫写道，俄国驻巴黎大使馆一等秘书A·斯维钦途经罗马时，教皇曾接见他。按照恰雷科夫的说法，利奥十三世在同斯维钦的谈话中再次发挥“体现世俗界权威原则的俄皇与体现宗教界权威原则的教皇之间的协作有益于全世界”的思想。教皇又说，他非常希望“这种协作扩大为‘宗教条约’的形式”。他向斯维钦说：“对我来说宗教条约具有双重重要性。第一，它毕竟是极端重要的文件。第二，罗马教廷和强盛的俄国缔结宗教条约在全世界面前有巨大的、有益于罗马教廷的意义，因为教皇在罗马的处境非常难堪。”“我，”利奥十三世继续说，“没有意大利警察护送(虽然我的尊严不容许这样做)或不冒群氓侮辱的危险便不能走出梵蒂冈。由于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第37页。

不久前暴动者进行攻击，我支持现在的政府。但我的处境非常困难。”① 从利奥十三世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教皇指望梵俄宗教条约为按照梵蒂冈要求解决“罗马问题”大开方便之门。值得注意的还有，教皇曾顺便提及他支持他阴谋推翻的意大利政府，因为“暴动者”攻击它，也就是说，教皇支持这个政府反对意大利人民的革命运动。恰雷科夫评论利奥十三世讲话时指出：现在教皇说出“宗教条约”一词……“毫无疑问，他与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准备尽最大努力，也许作出重大的、实际的让步以达到这一目的”②。

罗马教廷力争在俄国建立圣使馆，即使是临时的和非正式的也可以③。1895 年 1 月 1 日，拉姆兹多尔夫记载，收到洛巴诺夫公爵（当时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关于他与梵蒂冈谈判的报告：利奥十三世“说他愿规劝俄国天主教僧侣持和解态度，在俄国设教皇圣使馆是有益的”④。1901 年 1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5，第 184—186 页。

② 同上，第 186 页。

③ 同上，案卷 8，第 182 页。

④ 《红档》，第 3（46）卷，1931 年版，第 18 页。

月致梵蒂冈驻办公使古巴斯托夫秘密指示的草案中说，“罗马教廷在意大利的处境及其迫切要求，225促使它不断寻求与世界强国接近。至圣的利奥十三世尤其珍视与俄国的关系，因为深知其威力并看到，俄国专制君主是世界上唯一的神授国君。”①

梵蒂冈还积极努力使俄国驻梵蒂冈公使馆升格至大使馆。

沙皇政府准备接受罗马教廷的许多要求，期望它采取日益公开的反波方针。东正教会主教团坚决反对宗教条约和驻俄圣使馆，担心天主教会独霸俄国。正教院首脑波别多诺斯采夫在致尼古拉二世的信件中坚决反对彼得堡接受教皇圣使②。

虽然罗马教廷和沙皇政府在俄国天主教会的体制与活动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后也不断出现分歧，但是罗马教廷直到1917年革命时仍然帮助沙皇政府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遵循梵蒂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第193页。

② 《波别多诺斯采夫致亚历山大三世书信集》，第2卷，莫斯科，1926年版，第323—324页。

冈指示的俄国波兰天主教僧侣，扮演沙皇政府警察局密探角色并且（象东正教及其他宗教僧侣一样）将教堂讲台变成政治讲台，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

1901年11月12日，华沙大主教波比尔向天主教僧侣发布通告，在通告中对社会主义进行粗暴的诽谤性攻击。按照这个梵蒂冈代表的说法，社会主义“将一切归结为尘世利益与情欲”。华沙大主教大发雷霆，斥责社会主义者“不仅自己攻击富人，而且煽动别人反对他们，否定私有制，用共产主义取代私有制，鼓吹自由放纵……”社会主义宣传在工厂工人中取得的成就尤其使波比尔惊慌不安。他建议僧侣“防止危险”，向信徒灌输教会关于当局的教义、私有制的教义和“必须通过辛勤劳动谋生”的教义。还特别建议僧侣阻扰在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①。

1902年，希尔施·勒克尔特谋杀维尔诺总督冯·瓦尔（残暴的沙皇官吏、大规模屠杀维尔诺工人的组织者）未遂后，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俄 226

① 《火星报》，第16期，1902年。

国驻梵蒂冈代表古巴斯托夫表示慰问，后者提出，听说某些天主教僧侣有参加格罗德诺州与明斯克州“骚乱”的嫌疑，拉姆波拉“说，他很难断定这种传说是否正确，因为曾不止一次训示波兰僧侣不要做一切可能引起政府对他们不满或气愤的事……”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法俄开始接近并于1891—1893年订立法俄同盟。“法国比俄国更需要军事同盟。它可以利用沙皇政府在财政上依附法国资本的关系使俄国接受同盟义务的约束。但不能认为这种依附关系是法俄同盟的唯一基础。沙皇政府也象法国一样害怕在德国面前孤立，虽然害怕的程度不如法国那么厉害。1891年5月6日重新订立三国同盟，同时三国同盟成员国公开表示与英国友好，这时沙皇政府大为惊慌……”②

法俄同盟的形成与梵蒂冈毫无关系。这一同盟的建立是法俄帝国主义利益与德奥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计划发生冲突的结果。但是一连数年梵蒂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9，第186—187页。

② 《外交史》，第2卷，莫斯科，1945年版，第104页。

冈及其外交界和报刊突出罗马教廷在建立这一同盟中的作用。梵蒂冈在建立法俄同盟中几乎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也反映在历史著作中。

1893年11月，梵蒂冈半官方刊物《罗马观察家报》上说，法俄同盟是宗座的创造①。在评价这种说法时必须注意，天主教报刊的共同特点是夸大罗马教廷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将它的影响说得言过其实。某些历史学家也过分夸大罗马教廷对建立法俄同盟的作用②。德国历史学家贝克尔写道，罗马教廷与法兰西共和国曾经同心协力 227 为实现法俄联合而努力③。另一位历史学家普莱勒尔写道："……无庸置疑，梵蒂冈是缔结法俄同盟的中间人之一或唯一的中间人，虽然这还需要通过第一手材料进一步证实。"④这样的结论并没

---

① O·贝克尔：《俾斯麦与德国的包围》，第2卷——《法俄同盟》，第133页。

② 参阅，例如，J·帕尔：《泰奥菲尔·德尔卡赛与法俄同盟的活动》，第5—8页。

③ O·贝克尔：《俾斯麦与德国的包围》，第2卷——《法俄同盟》，第135页。

④ 《政治与历史档案，1924年》，第10卷。摘自E·A·阿达莫夫的前引著作，第22页。

有充分的根据。

有意思的是，法国外交家说自己在梵俄协作中起中介作用，而梵蒂冈外交家说自己在法俄同盟中具有父亲的身份。

梵蒂冈关于俄法同盟的历次声明中都强调指出一点，即法国与俄国结盟将有助于法国保守集团地位的加强。

沙皇政府，首先是亚历山大三世，敌视法国共和制。法国与梵蒂冈接近，不仅法国贵族而且俄国沙皇政府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证明共和制法国及其统治集团的保守的行动，也是“意志善良”的独特表现①。在E·A·阿达莫夫公布的俄国外交部档案中的一份备忘录（说明在彼得堡设梵蒂冈代表机构是有益的备忘录，看来全部或一半来源于梵蒂冈，登记时间为1898年）中说，“天主教徒（法国的——舍英曼）与共和国和解给激进派造成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并阻挠它在国内确立统治地位”②。德国驻巴黎代办冯·绍恩在过去向卡普里维首相所作的报告(1891年8月20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38页。

② 同上。

日）中也是这样估计形势：法国不仅与俄国，而且与梵蒂冈接近一事推翻了法国保皇派关于共和国似乎不能与专制政府结盟的论据①。

梵蒂冈人士认为，法兰西共和国与俄国君主制接近将进一步加强法国（和欧洲）反动派的地位，从而巩固梵法关系。例如，《罗马观察家报》228 1893年11月2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具有代表性，其中说道："……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关头：我们可以担保，'圣彼得堡的教皇'（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舍英曼）将是上帝手中的强有力的工具，足能将法国完全归还'罗马教皇'。"②

恰雷科夫在1898年向彼得堡报告，梵蒂冈人士非常重视法俄同盟，利奥十三世在同斯维钦谈话时"提及梵——法——俄协作的巨大重要性"③。

梵蒂冈与法俄接近被看作是反对三国同盟的

---

① 《总政策》，第7卷，第222页。

②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9卷，第43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86页。

政策。1891年7月，伊兹沃利斯基向吉尔斯报告教皇对三国同盟的态度："我从可靠的来源得知，最近起码有一位中欧强国的代表，即奥地利大使，试图在梵蒂冈进行解释，说三国同盟对罗马教廷毫无敌意，因此后者感到担心并在法国寻找支柱是不必要的。"①

两大强国集团为在梵蒂冈争夺权势而明争暗斗，每个集团力图按照自己的观点解释并向舆论界介绍梵蒂冈的立场，以此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这种情况通过天主教报刊和全德天主教大会就梵蒂冈对三国同盟态度问题展开的论战看得尤为明显。这种论战有时带有攻击梵蒂冈的性质。在1891年9月但泽召开的全德天主教大会上，巴列斯特列姆伯爵发表声明阐述中央党对《罗马观察家报》敌视三国同盟言论的态度。他称该报这种言论是"无耻的"、"愚蠢的"，声明德国天主教徒仍然对天主教会和教皇忠实顺从，既然"一家罗马报纸""胆敢把教皇说成是与某些反德国家搞秘密活动的人，把他(教皇)说成是德国的敌人，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16页。

那么我们对这种前所未闻的无耻行径岂能不义愤填膺或嗤之以鼻"①。

1892年6月，绍列麦尔·阿利特男爵在多特229蒙特德国天主教联盟庆祝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梵蒂冈机关报《罗马箴言报》3月7日刊登的关于三国同盟是罗马教廷解放的最大障碍的声明"毫无意义"。

德国天主教活动家想挑起对梵蒂冈的不满以巩固梵蒂冈亲德分子的地位。

正当德国天主教报刊和天主教大会愤怒声讨《罗马观察家报》亲法俄言论的时候，德国天主教徒代表大会，为保持与三国同盟参加国意大利的团结，都从大会决议中取消恢复教皇世俗权力与重建教皇国这项要求。德国天主教报刊和天主教活动家一再表白对教皇忠贞不渝，否认教皇敌视三国同盟，但是指责教皇顾问，首先是红衣主教拉姆波拉，推行危害梵蒂冈的政策。

德国政府对梵蒂冈外交转向法俄同盟方面颇

① 《欧洲历史年鉴，1891年》，第108—109页；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治》，第10卷，第34页。

为不满，因此于1892年7月召回本国驻梵蒂冈大使施勒策尔，派奥·比洛前往。

1892年10月，伊兹沃利斯基由罗马报告，梵蒂冈目前的政策因支持法国政府和与俄国接近而受到猛烈抨击。他写道："在罗马得到强力支持而又人数极多的不满意者，公开责怪利奥十三世为追求恢复世俗权力的空中楼阁而忽视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的利益。"①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坚信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保持与意大利的团结而不打算再支持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要求之后，梵蒂冈外交界决定向中欧列强表明，梵蒂冈还可以另作选择——参加法俄同盟。于是，梵蒂冈开始与法俄接近。两种不同方针的拥护者在梵蒂冈内部明争暗斗。

法国统治集团利用梵蒂冈外交这着棋在对内政策方面企图与罗马教廷合作削弱保皇派，在对外政策方面企图以十足的保守主义身份与盟邦沙俄交往。沙俄政府也力图利用梵蒂冈外交新方针削弱波兰民族运动。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23页。

230

德国政府在天主教中央党首领的支持下，为使梵蒂冈在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中继续做三国同盟的盟友而展开积极的活动。

梵蒂冈与法俄同盟决裂

梵蒂冈与法俄的友好关系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断。这由下列原因促成：意大利实际上开始脱离三国同盟，因此梵蒂冈不必要再显示同德国的敌人亲近，何况梵蒂冈已开始与意大利当局合作共同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梵意宿仇渐消（又加上梵蒂冈自十九世纪末日益卷入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成败，尤其在非洲，与梵蒂冈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除此之外，法国政府的反教权政策也促使梵蒂冈依靠德国、德皇（作为宗教保护人）和德皇的盟友、信奉天主教的奥匈皇帝的外交方针日益加强。

1892 年 10 月伊兹沃利斯基由梵蒂冈报告："共和国政府与法国高级僧侣之间的尖锐斗争，最近一年更加激烈，法国驻梵大使馆的地位因此发生深刻变化……勒弗夫尔公民本人仍然深受教廷信任……但他也承认，法国政府的地位大大削弱

了他的影响。”①

如果认为，梵蒂冈在与法国保持数年特别突出的友好关系之后在十九世纪末对它冷淡的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实行反教权政策，那就错了。因为甚至教权派人士也指责梵蒂冈对法国“迫害”教会漠不关心。

虽然有拉维热里的讲话，虽然支持他的那部231分主教赞成承认现行共和制，法国教权派在十九世纪末仍与共和国势不两立，而且拉维热里和梵蒂冈原想教权派承认共和国就可以影响共和国政策的打算已经落空。十九世纪末年的德雷福斯案件再次表明，教权派与保皇派沆瀣一气。法国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等)利用德雷福斯案件攻击共和国。天主教修会，尤其是耶稣会，特别积极参加保皇反犹宣传②。教权主义保皇派阴谋家的活动在全国引起抗议，法国统治集团提醒梵蒂冈注意，僧侣与天主教人士参与德雷福斯案件对教会本身反而有危险。1899年1月5 (17) 日，恰雷

---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22页。

② C·S·菲利普斯：《1848—1907年的法国教会》，第254—255页。

科夫向穆拉维约夫报告，法国驻梵蒂冈公使普贝尔不久前自巴黎归来，告诉他曾同红衣主教拉姆波拉谈过教权派参与德雷福斯案件的问题。据恰雷科夫报告，普贝尔向教皇国务卿说，天主教人士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象戴·拉克神甫[①]之流的煽动，在解决这个不幸的问题时必然在法国引起反对天主教会的反应”[②]。

梵蒂冈支持法国反德雷福斯的保皇派[③]。

1898年左拉写了一封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公开信为德雷福斯辩护，控诉军阀藏匿真正的罪犯，因此左拉被判处监禁。梵蒂冈对这一判决的反应，在恰雷科夫1898年2月17日（3月1日）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左拉案最后判

---

① 戴·拉克神甫是当时巴黎著名的耶稣会士。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172页。

③ 庇护十世多么不喜欢共和国和害怕人民，可根据下列情况判断：1907年3月20日(4月2日)萨宗诺夫报告，教皇接见他并在谈话时提到法国局势问题。教皇说：法国“蛊惑家”向人民群众宣传人民掌握主权的问题；“说到这里，”萨宗诺夫写道，“教皇明显地激动起来，大声说道：‘人民怎么能成为统治者呢？他们是臣民，为求自己幸福应当永远做臣民’。”（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9，第89页）

决的消息传来，这里的教权界喜形于色。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我表示他的看法，说这种判决证明法国人民明智和通情达理，同时还赞扬了法国军人所表现的毅力与‘esprit de corps’①。红衣主教又补充说，刚才听说，法国议会选举筹备工作进展良好。这次选举将是两方——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为一方，一切正直的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决斗，国务卿认为，应当依靠法国一切保守分子齐心协力互相帮助。根据这些话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一再正式辟谣，但事实上教皇政府对即将进行的法国选举并非无动于衷，而且为促使现任法国内阁取胜正在作坚持不懈但又谨慎小心的努力……”②

232

梵蒂冈为右派在法国选举中败北而痛心失望。1898年6月23日（7月5日）恰雷科夫写道，法国的选举结果与布里松组阁“对教皇政府来说是非常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恰雷科夫写道，罗马教廷全力以赴，为温和的共和派获胜准备条件，努力替他们拉拢“原先投票支持保皇派的天

① “团结精神”。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4页。

主教徒。但利奥十三世徒劳无功"：上台执政的不是比麦林内阁更温和、更信仰天主教的内阁，而是主张国家机构内世俗成分占优势的社会党人所支持的内阁。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痛心之至。他说，"法国建立依靠社会党人的政府必然使俄国也不痛快。"①

法国驻梵蒂冈大使向恰雷科夫说："梵蒂冈政客做得太过分了。他们干涉我们的选举，不受欢迎，也没有成功……"②

恰雷科夫的报告以下列结论结束："不能不看到，这种复杂情况对德国在这里的预谋的利益、勒索与贿赂是何等及时。大概红衣主教拉姆波拉与利奥十三世的脑海里现在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问题：他们的法俄政策好处是否如原来预料的那么大，在目前情况下与德国接近是否能得到更好的结果？……"③

所以说，梵蒂冈开始对法俄同盟冷淡的主要原因，不是法国政府的反宗教政策（对这一政策 233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4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同上，第96页。

教廷最初是处之泰然的），还存在更为重要的原因：梵蒂冈本来打算，教权派“承认”共和国后，可以向右扭转其政治方针，加强自己在政府和国家中的地位，从而也使梵蒂冈在恢复教皇世俗权力问题上可以依靠法国政府的有力支持，但是这种打算落空了。

法国进步努力，首先是工人运动，阻挠教权派贯彻他们的意图。

可是在梵蒂冈，亲德集团占了上风。他们到处散布法国“道德败坏”的传说。后来希特勒匪徒津津乐道的、诽谤法国人民“道德败坏”的无耻谰言，就是梵蒂冈这时制造的。据瓦德西陆军元帅证明，1903年耶稣会总会长马丁（法兰西人）在梵蒂冈同他谈话时说，各个阶级的法兰西人通通“道德败坏”①。

十九世纪末期，梵蒂冈开始疏远法俄同盟，转向德国及其盟国一边，这一次为时甚久。

罗马教廷向敌视法国并与德国结成巩固联盟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柏林，1923年版，第213页。

的立场转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①。法国对僧侣参与德雷福斯案件的反应使梵蒂冈大为震惊。为在不损害主教团威信的情况下退却，利奥十三世在1899年6月致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里沙尔的信中建议法国天主教徒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竭力保护“宗教与国家的最高利益”②。但教皇没有谴责教权派保皇分子的阴谋和僧侣参与阴谋的行为。1899年9月，利奥十三世发表致法国僧侣教皇通谕，其中谈到加强宗教纪律、更好地教育僧侣等问题，但只字未提法国所关心的、与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有关的各种问题。1899年9月 234 14（26）日，萨宗诺夫由罗马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教皇通谕对深深激动法国人心的事件未作丝毫暗示。教皇似乎意识到不能沉默，却又不敢轻易说出众人所盼望的博爱、和平的话。这

① 1898年8月恰雷科夫向彼得堡报告，梵蒂冈因法国选举结果和成立激进内阁而担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它同法国政府的关系象麦林内阁时期一样良好。利奥十三世与拉姆波拉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和原则——与德国和三国同盟疏远，而与法俄接近（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12—113页）。但是梵蒂冈与法俄集团之间业已形成的分歧后来日益加深。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85—87页。

种不表态的做法，被梵蒂冈的敌人解释为罗马教廷对法国教权派反犹运动的支持，而这里的天主教报刊却认为，这是教皇不愿出面干涉，以免给负责处理德雷福斯案件的政府增添麻烦①。

法国僧侣和听命于它的保守分子带头进行违背基督教义的宣传，天主教会首脑对此仍不加以谴责，可能又是出自罗马教廷历来最关心的政治考虑……"②。

自1898年以来，俄国政府驻教廷代表的报告中不断指出，法国在梵蒂冈的势力衰落，教皇

① 一系列事实证明，梵蒂冈是支持反德雷福斯分子的。关于存在可以揭露这一案件全部真相的秘密文件的消息传开之后，德雷福斯夫人曾请求教皇处理，教皇拒绝对这个问题表态。德雷福斯兄弟请求著名的法国天主教活动家德·曼伯爵关心这一案件时，他甚至拒绝讨论此事。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里沙尔对请求他处理德雷福斯案件的回答是，干预这个案件不是教会的事。这种说法是伪善的。

梵蒂冈和法国主教表面上对德雷福斯案件保持"中立"，但他们实际上站在反对共和国的保皇反犹阴谋分子一边。法国僧侣也积极支持阴谋分子（见G·S·菲利普斯：«1848—1907年的法国教会»，第254—255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107—108页。

利奥十三世、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和其他梵蒂冈主教对法俄同盟感到失望，德国在罗马教廷的地位增强。1898年12月8（20）日恰雷科夫写道："……法国政府在这里的感召力今非昔比的状况依然如故……"①

翌年，即1899年11月9（21）日，恰雷科夫又写道："……一位支持这个国家(法国——舍英曼）并谙知其情况的红衣主教，不久前大为失望地告诉我，利奥十三世的对法政策遭受挫折。他说：费·富尔在世时，我们曾经希望法国建立一个尊重共和制也保护教会利益的教权派保守党。而现在执政的却是社会党人和激进派，法国天主教利益受到很大威胁……"②但是，恰雷科夫补充说，教皇及其国务卿仍然支持法国。恰雷科夫的报告中指出，梵蒂冈把希望寄托在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赛身上。 235

罗马教廷逐渐放弃接近法国的政策，于是德国在梵蒂冈的地位日益增强。1898年11月10（22）日恰雷科夫写道："对此地普鲁士公使馆的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51页。

② 同上，案卷6，第141页。

态度明显地客气起来。"①

除以上种种原因之外，梵蒂冈对法政策转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梵蒂冈一向力求依靠比较强大的国家。恰雷科夫写道："与机智果断的德皇和武装良好的英国相比（顺便提一下，英国的武装给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的印象极为深刻），法国显得力量单薄，而威廉皇帝对德国天主教徒的吸引力同时也使教皇国务卿担忧。这种力量之大，看来已经达到使梵蒂冈担心中央党对它是否忠诚的程度。因此，教廷一面讨好德国政府，一面却急忙设法巩固它对中央党的权威……"②

路德维希·帕施托尔说，1907年5月12日他同罗马教廷权威人士德·蒙戴尔主教谈话，后者说，拉姆波拉劝利奥十三世实行亲法政策，但在1901年7月，拉姆波拉亲自对奥地利驻梵蒂冈大使列维尔捷拉说，他对自己的计划大失所望③。

法国政府通过反对宗教团体的法令更加深了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208页。

② 同上，第200页。

③ 路·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319页。

梵蒂冈与法国的分歧。

宗教团体是保皇派教权势力的中心。1879年议会委员会关于修会活动的报告中指出："宗教团体现在比革命前还多，它们以可怕的速度增加，聚敛无法计算的大量财富，手中（学校中）控制着我国一半以上的青年……"① 十九世纪末 236 修会的力量更加雄厚，其财产总值估计有十五亿至四十亿法朗②。

1789年革命前夕，法国有六万名僧侣，1900年僧侣人数增加了一倍多。1880年正式取缔的耶稣会实际上继续存在，拥有大量资本，在教权派中起领导作用。修会还从事工商业活动。它们在国民教育领域的阵地特别巩固：截至1898年12月，六百万名小学生中有二百万名在修会所属小学就读。全体中学生中起码有一半在宗教团体所属学校学习。教权派还占据了高等学校这块阵地。工业技术学校，象公立学校一样，三分之一以上的学员曾在修会所属学校受过教育③。反动

① 引自《欧洲导报》，1879年7月，第433页。

② 《欧洲导报》，1901年8月，第818页。

③ 《教育》，1904年3月，第26—29页。

的教权主义对法国高级军官有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并不奇怪。

修会是保皇派的支柱，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敌人。它们遭到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的痛恨。1901年7月，瓦尔德·卢梭政府通过限制宗教团体活动法。

1902年至1904年，孔勃政府对教权派把持学校和修会逃避执行社团法的规定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斗争。教权派、耶稣会士和保皇派主张学校教权主义化，反对国家接管初等教育并为此进行斗争，他们提出"教育自由"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含义就是他们有用反动思想麻醉儿童的自由。1904年通过的法令禁止宗教团体从事教学活动；教会学校应当取缔。法令对殖民地无效，因为天主教传教士团及其所属团体是殖民地当局的支柱。反对宗教团体的法令也不涉及天主教宣传的巨大中心卢尔德。

梵蒂冈反对法国政府的反宗教团体措施。1903年4月萨宗诺夫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红衣主教国务卿在谈到孔勃先生的宗教政237策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气忿，他称这种政策是雅

各宾暴政的大发作。”①

1904 年 3 月 18 日，教皇(庇护十世) 发表反对法国禁止天主教修会从事教育青少年活动的讲话。这篇讲话引起法国政府的正式抗议。但梵法绝交与废除宗教条约并不是由于通过反对宗教团体的法令，而是因为法意接近，法国在“罗马问题”上改变立场。

1903 年 10 月，意大利国王访问巴黎。俄国驻罗马大使涅利多夫 10 月 7 (20) 日就此事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最近二十五年的隔阂已彻底消除，两国人民重修旧好，亲如手足……”②

意大利形式上仍是三国同盟成员，实际上与法国接近；1902 年 11 月 1 日法意缔结严守中立的协定。

1904年4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贝将到罗马回访意大利国王。《罗马观察家报》声明，信奉天主教国家的首脑到罗马来是对教皇的莫大侮辱③。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1，第 56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03 年，案卷 92，第 1 册，第 180 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3，第 40—41 页。

1904年4月20日（5月3日)萨宗诺夫由梵蒂冈报告，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赛在路贝访问罗马期间未与梵蒂冈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会晤，也未试图这样做，使梵蒂冈“有些失望”①。

梵蒂冈认为法国国家首脑到罗马拜访意大利国王是对教皇“尊严的莫大侮辱”。4月28日，梵蒂冈向法国政府发出抗议总统访问罗马的照会。抗议照会也发给一切与梵蒂冈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一照会文本落入饶勒斯手中，他便在5月17日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上予以发表。教皇照会中说，路贝总统访问维克多-厄曼努伊尔国王是教皇不能忽视的严重事件；天主教国家首脑应比非天主教国家首脑在有关教皇尊严、独立和238权利的事务中更加关心教皇。法国首脑尤其应当这样，因为法国有许多特权，在红衣主教团中有不少代表，而且由于教皇的垂青还享有对东方基督教徒的保护权。天主教国家首脑来到罗马，不向罗马教廷膜拜，而向夺走教皇世俗权力、束缚教皇自由独立的人表示敬意，这是对教皇的莫大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47页。

侮辱。以上就是这份文件的内容。

梵蒂冈这样做不仅是干涉法国事务，而且是企图将仅与法国有关的问题变成国际议题。

1904 年 5 月 4（17）日，萨宗诺夫就梵蒂冈这一行动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罗马教廷采取这种行动预见到，法国政府必然坚决回击；教廷的目的在于向天主教国家证明，自庇护十世即位以来，教廷对教皇世俗权力——它认为这是宗教权力的必要保证——问题的态度毫无改变。"① 教廷提出抗议的另一个目的，萨宗诺夫继续写道，是防止（由于路贝开创先例）其他天主教国家君主到罗马来。

1904 年 5 月 20 日，《罗马观察家报》说，假如路贝不在罗马，而在另外一个地方拜访意大利国王，教皇不会反对。在罗马隆重欢迎法国首脑就意味着同意 1870 年事件(即取消教皇世俗权力)。

梵蒂冈的行动激起法国所有进步人士的义愤。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法国政府于1904 年 5 月 25 日发布决定召回法国驻梵蒂冈代表的消息。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3，第 53--54 页。

5月27日，国民议会讨论教皇照会问题。一部分议员要求与梵蒂冈断交。政府首脑孔勃说，从梵蒂冈仅召回部分使馆人员，大使馆继续保留。

路贝访问罗马引起的梵法冲突，在罗马教廷惩处两名法国主教，要求其中一名自动放弃教职，两名全到罗马受审之后，更加尖锐起来。

两位主教请求宗教部长援救。法国政府对梵蒂冈违犯宗教条约的行动提出抗议，条约规定，主教由法国和罗马教廷共同协商任命（所以撤销239主教职务也应经政府同意）。法国抗议书中指出，主教作为共和国高级官员，未经本国世俗上级允许无权离开所辖教区，教廷在召唤主教上罗马之前应同法国政府接洽①。

根据梵蒂冈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法国政府7月30日通过本国驻罗马教廷代表通知红衣主教国务卿，因罗马教廷违反宗教条约，法国同它断绝外交关系。

可以认为，梵蒂冈在路贝访问问题上和主教问题上均采取"强硬"立场的原因之一，正如俄国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82—87页。

驻梵蒂冈代表报告屡次指出的那样，是罗马教廷认为孔勃内阁寿命不长。

1905年12月5日，法国经过长期内部斗争，通过了国内进步力量早已要求的教会与国家分离法。

教会与国家分离法绝不是“迫害”法国天主教与教会的法令。它规定，国家保证一切人信仰自由与举行任何一种宗教仪式的自由，但物质上不支持任何宗教；取消宗教预算（但学校、寄宿中学、收容所、监狱的宗教活动费由国家负担）；不属于国家与世俗团体的教会财产，依法移交当地宗教协会；属于国家的宗教建筑物也移交宗教协会免费使用；这种建筑物一概免税。这项法律规定发给工作满一定年限的神甫养老金（以便将来取消这类养老金）。它还规定建立宗教协会(负责接收和管理教会财产）的程序，以及其权利和义务。

1905年6月30日（7月13日）俄国驻巴黎大使涅利多夫写道：“现在这种分离法不会使天主教徒的宗教利益受到过分沉重的打击。天主教各界人士，虽然绝不支持从社会与国家生活中公开

而彻底地抽掉宗教基础这种原则，但毕竟承认，240在新法律下法国天主教可以存在并继续保护宗教与基督教的道德……"①

梵蒂冈人士比法国本国的教权派更反对、敌视教会与国家分离法。

1905年4月，在这一法案讨论之前，一批法国议会右派议员来到梵蒂冈。议员德尼·科申会见教皇，劝他对议会讨论处之泰然，以免在表决法案时引起党派斗争的激化，同时希望收到罗马教廷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皆大欢喜的效果②。

梵蒂冈未重视法国天主教右派人士的建议。1906年2月，教皇发表致法国僧侣通谕，对教会与国家分离法表示抗议。

一部分法国教权派主张承认分离法和建立其中规定的宗教协会，一部分反对。

1906年5月法国主教会议同意教皇对教会与国家分离法的谴责；关于建立宗教协会问题，主教们声明，如果教皇不同意，他们将服从教皇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1929，第31—32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5，第79页。

的决定①。

法国主教团采取妥协立场，但梵蒂冈认为必须继续与法兰西共和国作战。1906年8月14日教皇又发表致法国主教通谕，庇护十世在通谕中坚决驳斥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中规定的宗教协会。教皇这一通谕实质上象他呼吁法国天主教徒齐心协力保护信仰的号召书一样，是抵制教会与国家分离法的敕令。由于僧侣抵制，在贯彻执行分离法时发生许多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

1906年10月红衣主教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与萨宗诺夫谈到法国形势时，后者问，为什么教皇不听被询问的多数法国主教的意见，不作任何适应新制度的尝试（多数主教赞成这种尝试） 241 就拒绝宗教协会法呢？国务卿回答，教皇确信，1905年12月5日的法令“打算消灭法国教会组织”，假如教皇承认这种协会，那么教会“在很短期间必然在法国丢掉任何教规概念……”②

萨宗诺夫本人认为，教皇不妥协的原因有二：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7，第110—112、150—153页。

② 同上，第202—203页。

(1) 不承认政府事先未取得罗马教廷同意就通过的任何立法措施，是梵蒂冈的政治信条；(2) 梵蒂冈害怕，承认法国的教会与国家分离法将促使其它国家在激进党压力下也通过这样的法律①。第二个原因在罗马教廷对法国不妥协的政策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1906 年 12 月末，萨宗诺夫与教皇交谈法国国内情况。据萨宗诺夫说，"教皇认为法国影响别国人民的魅力是很大的危险，他们很容易接受法国思想界的各种运动和影响……"教皇举西班牙为例，说那里的激进派要根本改革有关教会的法规②。

萨宗诺夫还说，在对法政策问题上，庇护十世"回忆两位先辈与年轻的日尔曼帝国作斗争的情况，深受鼓舞，那次斗争以强硬的德皇亲自到意大利卡诺沙城堡请罪而告终……"③

庇护十世及其谋士们希望法国重演卡诺沙事件。必须指出，萨宗诺夫当时就说这种打算必然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7，第 202—203页。

② 同上。第 275 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 1951，第 247 页。

落空，因为法国尚未建立象德国中央党那样的政党。

1907年初法国报刊公布教皇圣使馆文件，这是教皇圣使馆档案管理员蒙塔尼尼离开巴黎（1906年12月）之后发现的①。文件揭露：圣使馆是教权派反共和国阴谋的组织者，圣使支持和鼓励抵制教会与国家分离法的活动，组织人对主教钉梢，以便查明谁倾向与当局妥协，蒙塔尼尼收到梵蒂冈的指示令其帮助保皇分子和教权主义分子皮乌在1906年选举中获胜，梵蒂冈在某些国家首都策划反法阴谋。1907年3月20日政府首脑克雷孟梭在议会上说："……巴黎乐士街住着一位意大利神甫，他不仅是法国教权派一切诡计的核心，而且是策划各种阴谋的首脑，各式各样的议员在发言之前跑来找他商量……例如问他：'今天我要发言，该说些什么呢？……'我们

242

① 这些文件公布之前，萨宗诺夫在1907年3月6（19）日报告说，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对可能公布在圣使馆发现的文件感到不安，因为其中有不少文件，不仅可以败坏某些法国政治家的名誉，"而且能够使现居巴黎、从法国召回圣使后未与蒙塔尼尼蒙席断绝关系的外交官威信扫地……"（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9，第76页）。

确实知道，某些巴黎神甫接到号召他们公开违犯法兰西共和国法律的命令……开始侦查后，根据线索我们来到蒙塔尼尼的住所……"①

梵蒂冈迫害那些准备与国家妥协的僧侣。为在群众中煽起宗教狂热，还采用了宗教恐怖手段。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每当梵法关系恶化，罗马教廷即重新提出让·贞德列圣程序。这位女英雄在1431年被以法国主教科申为首的宗教裁判官加上"与魔鬼往来"的罪名处以火刑。梵蒂冈主教们利用法国人民对法国民族英雄尊敬怀念的心情为自己谋利。

列圣程序步骤很多，如果愿意，可拖上几十年。罗马教廷正是这样为让·贞德列圣品的。1894年开始办理的列贞德为真福品案。1898年3月，贞德列圣最终报告呈交红衣主教宗教法庭②。1902年，围绕限制修会活动问题展开斗争后，梵蒂冈"想起"让·贞德，宣布继续办理列贞德为真福品案。1904年颁布教皇法令准许进行真福品列

① 《外交人民委员会通报》，莫斯科，1921年，第3—4期，第13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30页。

圣程序①。与此有关的一切措施都通过隆重的宗教仪式进行，这些活动成了教权派的政治示威。因此，饶勒斯在议会发言时说，罗马先将让·贞德处以火刑，然后列圣，以便利用对她这位人民英雄的怀念和民族崇拜为教会谋利②。1909年4月，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向许许多多朝圣者（三万多法国人）当众宣读宣布贞德为“真福”的宗教敕书③。庇护十世向朝圣者讲了天主教徒热爱祖国的天职问题。但教皇对法国却说的是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谈到法国时说：“这个国家不能够要求爱它”，因为它与教会斗争，亵渎圣地，而能够引起人们热爱与尊敬的是“与教会结成神圣同盟的祖国”④。

243

列圣庆祝典礼转到法国举行，在这里具有教权派的政治示威性质。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12年，教权派和保皇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2页反面。

② «世界»杂志，1905年第1期，第51页。

③ 列真福全部程序长达三十三年（见莫里塞·佩尔诺：«庇护十世的政策»，第174页）。

④ Th·施曼：«德国与总政策，1909年»，柏林，1910年版，第159页。

派将让·贞德五百年诞辰纪念变作自己的节日①。

法国对东方基督教徒“保护权”的命运问题，在法梵斗争中占重要地位。下面将说明，这个问题梵蒂冈也是按照它依靠三国同盟、有利于德帝国主义的方针解决的。

法国资产阶级虽然实行反教权政策，但并不打算削弱宗教在国内的影响。

反对宗教团体法令的贯彻时断时续，拖延多年。实际上，许多宗教团体保留了自己的财产和学校。资产阶级需要宗教和教会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被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吓破了胆的法国统治阶级，开始与教会244重修旧好并寻求与梵蒂冈接近。法国资产阶级还需要梵蒂冈在业已开展的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中支持它。1909年，白里安宣布与教会和解是必要的。1912—1913年，报刊上提出与梵蒂冈恢复外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梵蒂冈继续实行利用人民尊敬怀念让·贞德的政策，为向法国天主教徒的良心施加压力，开始了列她为“圣者”的程序。

交关系的问题①。这个要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实现。

法梵断交是在教皇庇护十世时期，不过从上述全部情况看来，在其前任教皇利奥十三世时期梵法关系已开始恶化，梵蒂冈政策已开始改变，即放弃依靠法国（和法俄同盟）的方针，但利奥十三世努力避免梵法冲突尖锐化。庇护十世及其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开始坚决实行使梵法关系紧张和与德国、奥匈帝国接近的方针。

当选教皇的庇护十世是德奥候选人，他被提名是与法俄候选人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相对抗的。

利奥十三世去世以前很久，围绕新教皇候选人问题已展开了幕后斗争。1898 年初，俄法驻梵蒂冈代表开始私下讨论未来的教皇选举会问题。1898 年 3 月 31 日（4 月 12 日），恰雷科夫报告，法国驻梵蒂冈大使普贝尔告诉他："……法国和俄

① 1912 年 7 月，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向俄国驻梵蒂冈公使馆代表说，"他认为，目前确实可以看出，不仅法国社会人士，而且政府人士都有很大改变。很进步的人不久前还拥护与梵蒂冈绝交，现在却希望同它妥协。"其原因之一，麦里·德尔·瓦利先生指出，是法国在北非需要梵蒂冈的支持（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88，第 27 页）。

国都希望，利奥十三世的继承者尽可能遵循利奥十三世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主要表现在避免与三国同盟来往和保护自己的独立不受意大利国王侵犯……”① 恰雷科夫象普贝尔一样认为，在有关未来教皇选举会的问题上应当依靠红衣主教拉姆波拉，虽然恰雷科夫预见到拉姆波拉将被奥地利否决②。

在1901年1月9日沙皇批准的致俄国梵蒂冈驻办公使训令草案中说：“据悉,三国同盟正预245先采取措施以保证支持其意图的一派的红衣主教之一当选教皇。因此，您应立即与您的法国同行制订行动纲领，逐步准备在新教皇选举会上维护我们的利益。”③

奥匈帝国与德国政府也在为教皇选举会作准备。比洛的保证毫无意义，他曾保证说，似乎他——比洛在教皇选举会之前就向红衣主教柯普坚决声明，“我们应当尽量保持中立”④。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75页。

② 同上，第177页。

③ 同上，案卷8，第184页。

④ 伯·比洛：《回忆录》，第1卷，第619页。

1903年7月16（29）日，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卡普尼斯特由维也纳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我有理由认为，奥地利红衣主教备有以防万一之用的奥匈帝国政府关于'否决'的全权证书。这种全权证书，不言而喻是保密的，维也纳内阁方面的'例外'大概主要指的是，如果预期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可能得到足够当选票数的话……"卡普尼斯特还说，他得知，克拉科夫红衣主教普齐纳将是教皇选举会上奥地利政府的代理人①。在教皇选举会上被德奥派拉拢过去的人中还有北美红衣主教吉邦，他虽然形式上未参加德奥派，但和他们一起投票②。为使萨尔托（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世）当选，吉邦特别卖力。美国天主教历史学家写道，"使庇护十世成为教皇出力之多者莫过于吉邦。"③法国红衣主教接受本国政府指示投票选举红衣主教拉姆波拉。8月1日教皇选举会进行第一次投票，拉姆波拉得二十四票，戈蒂——十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1903年办公厅全宗，案卷110，第214页。

② 伯·比洛：《回忆录》，第1卷，第621页。

③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548页。

七票，萨尔托——五票，其他票数分散；第二次投票时拉姆波拉得二十九票，戈蒂——十六票，萨尔托——十票。于是德奥红衣主教开会讨论形势，决定撤销候选人戈蒂，将选票投给萨尔托。在第三次投票之前，与德国红衣主教协商后，克拉科夫红衣主教普齐纳发言，代表奥皇声明反对候选人拉姆波拉①。奥地利的反对决定了选举结246果。8月4日进行第七次投票，萨尔托得五十票，而拉姆波拉得十票。萨尔托当选②，接受“庇护十世”的命名。奥地利报刊欢迎对奥地利抱有好感的萨尔托主教当选。

庇护十世智力有限，原是乡村神甫(“政治上平庸”——古巴斯托夫的说法)，由于列强玩弄政治阴谋而被推上天主教会首脑的宝座，完全成了耶稣会士的傀儡。

比洛1911年曾访问庇护十世，认为必须在自

① 自中世纪以来，三个天主教国家——奥地利、西班牙、德国——的君主享有在教皇选举会上声明反对不合他们心意的教皇候选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在1909年由庇护十世取消。

② 古巴斯托夫在1903年7月23日（8月5日）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这一人选是出乎梵蒂冈人士意料之外的。”（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1，第153页）

己的回忆录中驳斥认为教皇在政治问题上“幼稚或头脑简单”的观点；比洛写道，他同我讨论了一系列政治观点，表现出“见解通达，并不缺乏外交机智”①。

庇护十世时期的俄国驻梵蒂冈公使萨宗诺夫写道，这位教皇周围全是“主要因靠近耶稣会及其后台(堪称天主教黑帮的教皇权力至上论集团，即极端派)而被提拔重用”②的人。1903年12月，瓦德西在自己的日记中关于庇护十世这样写道，他认为他是被耶稣会士捧上台的，应当对他们趋炎附势；他的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就是耶稣会士③。

庇护十世支持封建保守分子。他敌视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不容忍异端教徒与违背天主教义的言行，在这些方面很象庇护九世。

庇护十世在位期间始终不懈地同“现代主义”

---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3卷，第109页。

② S·D·萨宗诺夫：《艰难的六年》，柏林，1927年版，第13页。

③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第221页。

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自他即位后，梵蒂冈与法俄的关系更加恶化。他象利奥十三世一样认为，与社会主义斗争是罗马教廷最主要的任务。正是为了这种目的他才在与法国绝交后仍同沙俄长久保持良好关系并开始缓和梵意关系。庇护十世时期，梵蒂冈与南美诸国、美国有了进一步的接近。但最247受庇护十世及其左右钦佩的还是德意志帝国日益增长的威力。庇护十世将威廉二世及其政府视为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的堡垒，当俄国沙皇政权在革命运动冲击下明显地暴露出不稳固性之后尤其如此。1909年，弗·伊·列宁写道："半世纪以前，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从十九世纪后三十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有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愈是不稳定，就愈没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① 梵蒂冈一方面帮助沙皇政府镇压革命，同时寻求比沙皇政府更有力量的欧洲宪兵与其结盟。威廉二世的德国在梵蒂冈主教们的心目中正是这样的角色。德国的盟邦奥匈帝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28页。

国被庇护十世看作天主教的堡垒，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的天主教堡垒。

1904年初，庇护十世通过奥地利驻梵蒂冈大使转达，他“将尽力而为，以使陛下如愿以偿”——指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陛下①。由于庇护十世实行罗马教廷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的方针，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梵蒂冈和这些国家站在一起。

梵蒂冈帮助沙皇政府镇压革命

法梵绝交不能不影响梵蒂冈与法国的盟邦——俄国的关系。但梵俄关系并未立即发生变化。直到1910年才明显地恶化。罗马教廷疏远法俄同盟后，沙俄和梵蒂冈的良好关系还保持多年，因为在法梵绝交的那一年俄国开始了广泛的人民革命。这次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俄国国界。被革命吓破了胆的沙皇政府将梵蒂冈看作自己镇压起义人民的同盟者，而敌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梵蒂冈也认为在沙皇政府困难时期加深同它的分

① E·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1903年》，第128页。

歧是不合适的。

248　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热情欢迎俄国1905年的革命事件。“听到你们英勇奋斗的消息，全世界工人万分激动，心中充满希望。”——巴黎工人工会联盟致俄国工人一月事件宣言中这样写道①。俄国驻罗马大使馆参赞克鲁平斯基在1905年1月22日（2月4日）向彼得堡报告，俄国的一月事件“在意大利，象在世界各地一样，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罗马）都举行了反对沙皇政府的示威游行。驻罗马大使涅利多夫报告，法国城市中举行了许许多多支持俄国革命的集会，参加集会的主要是工人②，在其它欧洲国家的首都也举行了这样的集会。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带头进行的俄国革命，不仅使俄国资产阶级心惊胆战，而且也使其它各国的资产阶级闻风丧胆。弗·伊·列宁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写道：

“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

---

① 《前进报》，1905年1月31（18）日，第4期。

② 《红档》，第2（9）卷，1925年，第33—42页。

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①

沙皇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后备军，是它的同盟者。当俄国爆发革命时，国际帝国主义急急忙忙援助沙皇政府，是不足为怪的。

教皇庇护十世也挺身而出，帮助沙皇政府镇压革命。1905年5月，俄国沙皇政府梵蒂冈驻办公使纳雷什金在同红衣主教国务卿谈话时表示，"满怀信心指望，罗马教廷方面愿向俄国罗马天主教僧侣下达绝对忠于俄国政府的指示……"麦里·德尔·瓦利担保，教廷将满足沙皇政府的要求②。

1905年12月17（30）日，教皇接见纳雷什金，在同他谈话时"强烈谴责"俄国革命运动，并且说他"应当号召俄国罗马天主教僧侣沉着冷静，249 责成他们教导本区教徒顺从俄国当局……"③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45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5，第11页。

③ 同上，第63页。

1905年12月颁布教皇致俄国天主教会大主教与主教的通谕（《波兰人民》）。它象其它许多违犯波兰人民利益的教皇文告一样，也以“教皇热爱波兰人民”作为开场白。教皇要求波兰主教“规劝”信徒顺从当局。教皇通谕对革命极尽污蔑之能事，宣称革命运动为“暴徒党”的事业。教皇要求波兰天主教徒不支持革命党派，拒绝和全体俄国劳动人民一起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要他们考虑“死后幸福”，因为，通谕说，“天主教义教导我们，寻求永久的幸福应当高于一切转瞬即逝的尘世福利……”教皇还要求天主教徒“始终站在秩序一边”，对当时来说即站在沙皇政府一边；要求他们忠君。教皇要求俄国天主教徒不仅祈求“和平”，而且要组织自己的同盟与革命作斗争，破坏罢工。通谕结尾是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赞美。

俄国统治集团对教皇通谕拍手欢迎。1905年12月8日，外交大臣 B·H·拉姆兹多尔夫在致内务大臣 П·H·杜尔诺沃的信中写道：“教皇庇护十世主动向俄国罗马天主教主教发布特别通谕，向他们授意，要千方百计协助在维斯林湾沿

岸地区安定人心和加强帝国波兰族居民效忠皇帝陛下的感情。"拉姆兹多尔夫建议"立即"将教皇通谕的俄语译文在《政府通报》上公布并在俄国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中广泛传布，因这一教皇文件"从政治角度看极其重要"①。杜尔诺沃非常赞成，他写道，"使人民群众了解教皇所述观点极为适当"；他表示愿意广泛散发教皇通谕并在印刷时附加说明，此件发至俄国各个罗马天主教教区②。

拉姆兹多尔夫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写道，教皇通谕是"头等重要文件"并请求沙皇为此向教皇表示"特别感激"③。尼古拉二世在奏折第一页上批示："同意"，沙皇对教皇通谕，即对教皇积极参与镇压革命，所表示的"特别感激"，于1906年1月5（18）日通过纳雷什金转达教皇。麦里·德尔·瓦利当即向纳雷什金宣布，他认为不妨在报纸上登载这样一条简讯：据悉，罗马教廷认为教皇通谕不仅适用于波兰教区，而且适用 250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第2司全宗，1905年，Ⅱ—5，案卷34，第2页。

② 同上，第24—25页。

③ 同上，第29—30页。

于俄国所有其它天主教教区①。

要求波兰人效忠沙皇政府的教皇通谕，违背波兰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沙皇政府是波兰人民的敌人，也是俄国各族人民的敌人。通谕公然谴责波兰民族运动，不仅谴责革命党，而且谴责那些“承认自己拥护所谓‘激进民族主义’”的人。

波兰人对教皇通谕纷纷抗议，怨声载道。因此利沃夫主教泰奥多罗维奇不得不呈请教皇批准向波兰人民发表文告，“由于对教皇通谕众说纷纭，误解甚多”，他在文告中为通谕辩护并恳请人们相信教皇热爱波兰。泰奥多罗维奇文告象通谕一样，基本思想都是俄国的波兰人不应参加革命，而应继续效忠沙皇政府②。

巴结沙皇政府的波兰主教急忙向教皇致谢，感谢他发表这一通谕。例如，华沙大主教维肯蒂·波比尔向教皇致感谢信，特别感激教皇在通谕中对他反对罢工表示赞许。卡利什主教斯坦尼斯拉夫·日托维茨基也向教皇写了这样的效忠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7，第286页。

② 同上，第10—16页。

信[1]。麦里·德尔·瓦利向纳雷什金说，这些信件“他愉快地下令在报上予以公布，就象利沃夫主教泰奥多罗维奇发表致波兰人民文告一样，都是为了消除波兰地区的‘敏感’”[2]。事关镇压革命运动，梵蒂冈和波兰主教就是这样与沙皇政府合作的。251

对天主教僧侣甘心为沙皇政府当走狗镇压革命运动，波兰工人作了公正的评价。1905年5月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由华沙写道：“在波兰教堂里与天主教神甫的斗争已经开始——最初不是有组织地参与此事，而是自发的。向神甫发出嘘声，叫喊‘撒谎’等。神甫在教堂里散发小册子，工人立即将它撕毁，直到打起架来。”[3]

联合梵蒂冈共同镇压革命的思想在沙皇官僚中颇为流行。

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尔夫在1906年1月3日向尼古拉二世上的奏折中建议与德国政府、梵蒂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7，第22—26页。

② 同上，第20页。

③ 《捷尔任斯基选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82—83页。

冈和“唯一按中央集权制组成的，又是普世性的”天主教会共同进行国际规模的反社会主义斗争。他写道，德国新教政府早已同梵蒂冈合作，在对外政策上共同保护“古代传统的基础”，在对内政策方面共同依靠天主教中央党。至于俄国，拉姆兹多尔夫说：“梵蒂冈的友好协助”对进行反社会主义斗争“同样也非常重要：且不谈宗座通过地方僧侣专门对我国波兰事务的调节作用——最近的教皇致波兰主教通谕就是在这一方面迎合俄国政府愿望的非常重要的步骤——梵蒂冈还可以在另一方面给予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即向俄国政府提供……破坏性……组织在巴黎的一切线索、该组织及其分支的活动情况，因为梵蒂冈对它们不能不高度警惕，密切注意”①。拉姆兹多尔夫关于和梵蒂冈建立密切关系既便于共同镇压革命运动，又便于梵蒂冈和沙皇特务机关合作共同对俄国革命侨民开展间谍活动的建议，正合沙皇心意，于是他在拉姆兹多尔夫奏折上写道：“应立即开始谈判。完全同意这里所说的想法”。

① 《前外交部档案馆秘密文件汇编》，№6，1918年1月，第270—271页。

沙皇政府被革命吓得晕头转向，虽然它过去252一向将一切特权给予东正教僧侣并维护东正教会的利益，这时也决定更广泛地向天主教僧侣求援以镇压革命。1906 年 2 月 24 日向俄国各大使馆、公使馆和领事馆发出外交部通函，内称："内务部认为，鉴于目前发生的事变，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僧侣不仅来波兰王国，而且来俄国各地信奉天主教居民区向工农讲道以抵制农民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实属有益。因此对上述神职人员申请来俄不加阻挠，一律照准，无须分别与本部事先接洽……"① 对来俄天主教僧侣仅提出以下条件：(1) 应出示本人实属传教团僧侣证明；(2) 来俄目的应是"与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斗争"；(3) 在俄国逗留期限为两个月。

1906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梵蒂冈驻办公使萨宗诺夫向彼得堡报告他同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谈俄梵关系的情况。红衣主教坚持在彼得堡设圣使馆或某种其它形式的教皇代表机关，这还是利奥十三世时的要求。萨宗诺夫在报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 1960，第 17 页。

告中说明与梵蒂冈保持良好关系并准许其代表到俄国来有利于俄国政府。他还以沙皇政府与罗马教廷利益一致为理由说："双方政府实质上都是保守的"，双方政府都受到"世俗敌人"的攻击①。

萨宗诺夫认为，梵蒂冈的支持对沙皇政府反对波兰民族运动有利。他写道："……甚至以向罗马教廷的政治虚荣心作某些让步为代价得到它充分与真诚的协助以遏止波兰——立陶宛的民族热望，对我们是否有利呢？宗座将站在俄国政府一边反对这一民族运动大概是不成问题的……"②

253 总之，沙皇外交官坚持俄梵接近共同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

罗马教廷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一如既往，决心牺牲波兰人民的利益以迎合沙皇政府。1906年4月萨宗诺夫向教皇递交国书并同庇护十世进行谈话，特别谈了波兰地区的形势。萨宗诺夫写道，教皇说，"陛下可以完全信赖他有诚意阻止波兰进行的宣传，他认为在目前艰难时期迫切需要平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1950，第1—3页。

② 同上，第3—4页。

定波兰及其附近诸州的局势下，这种宣传极为危险……”

教皇还向萨宗诺夫说：“……我只有一个办法对付贵国罗马天主教臣民发热的头脑，即向主教发出文告，每次我都采用这个办法，可以预料它是行之有效的。不瞒您说，最近我致波兰主教的通谕给我引起不少麻烦，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波兰人经常将本民族置于自己的信仰之上，信仰往往只起次要作用，我的声音——希望只是暂时的——常常湮没在民众骚乱的喧闹声中。但是我仍然坚决希望，贵国国君的宽大政策与教廷的努力能够逐渐平息民族与政治激情以造福于俄罗斯帝国和宗教世界……”①

1907年6月12（25）日萨宗诺夫报告，他开始与红衣主教国务卿谈判承认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可以在规定之外的天主教礼拜仪式上象波兰语和俄语一样使用的问题。萨宗诺夫写道：“……我认为可以补充几句话以说明宗座最近几年对波兰人采取的立场，它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宗座对用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秘档全宗，案卷249/250，第5—6页。

俄语作礼拜的问题突然改变方针上。"萨宗诺夫接着写道："梵蒂冈对波兰人的态度自庇护九世时期开始改变，目前他们在罗马的'地位'看来已大大动摇。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热望得不到教皇和教廷人士的任何支持……我敢说，在加入罗马教会的各族人民中，宗座最不喜欢的是波兰人……"① 萨宗诺夫还说："我曾不止一次听到红254 衣主教国务卿和他的同僚们痛苦地抱怨'无论干什么都不知分寸的波兰人'。"②

萨宗诺夫指出，梵蒂冈既采取敌视波兰人的立场，又"小心翼翼地回避使波兰人指责宗座忽视他们利益而向俄国政府献媚的一切可能"③。罗马教廷如此小心谨慎的原因有二：害怕马利维特运动的发展引起波兰教会分裂和罗马教廷在物质上依赖受其宗教管辖的各族人民。

俄国驻梵蒂冈代表1906年至1908年的报告无一不强调指出，教廷采取反对波兰的立场并准备牺牲波兰人的利益以迁就沙皇政府。俄国驻梵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1，第6页。
② 同上，第7页。
③ 同上。

蒂冈代办席林男爵在1907年9月18日（10月1日）的紧急报告中向外交大臣写道，教皇庇护十世“对实现波兰人的民族热望漠不关心。教皇虽然一向愿在有关波兰人的信仰问题上支持他们，但他常常指责波兰人使天主教会利益服从个人目的的倾向。据我从完全可靠的来源听到的教皇不久前所说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庇护十世在接见一位主教并同他谈波兹南的形势时，以他有时具有的那种激动，高声说道：‘这些波兰人实在使人伤脑筋：他们首先是波兰人，其次是波兰人，第三还是波兰人，然后才有一点儿是天主教徒’……”①

这个报告中还说：“在罗马的波兰秘密代表”根据这种情况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提及波兰以往对教廷的功劳，而只谈到对梵蒂冈的保护失去信任的波兰人，大批改奉新教和加入马利维特教派②。

沙皇政府力求削弱波兰在俄国天主教会中的势力，梵蒂冈在这方面也迁就它。1908年，沙皇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1，第37页。
② 同上，第7页。

政府根据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倡议向罗马教廷提出不在彼得堡天主教神学院，而在罗马培养俄罗斯、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族天主教神甫的问题，这也是利奥十三世在世时候的建议，因为在彼得堡，如
255 斯托雷平信中所说，他们"受到周围波兰人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①。俄国驻梵蒂冈宗教事务代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中说，麦里·德尔·瓦利同意接受俄国教士入梵蒂冈学院受完神学教育。传信圣部乌尔班学院院长向俄国代表说，希望到他这个学院来学习的俄国教士"不是公认的非常不安分守己的波兰人……"②

可见，法梵绝交后罗马教廷与沙皇政府继续合作多年。对俄国革命和波兰人民解放斗争的共同仇恨，密切了它们的关系。

自 1910 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梵俄关系逐步恶化。罗马教廷彻底倒向三国同盟不能不引起俄梵关系恶化的后果。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第 2 司全宗，1908年，Ⅱ—5，案卷 60，第 1—3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 2004，第 5 页。

1911年末俄国驻梵蒂冈公使布拉策尔在报告中写道，去年一年中俄梵关系恶化了[①]。布拉策尔以后的报告也不断提醒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注意俄梵关系的恶化。

1912年2月22日，萨宗诺夫在致内务大臣马卡罗夫的信中写道，在社会主义潮流到处泛滥的情况下，政府应认真注意天主教僧侣的保守性，不要使俄国政府与管辖这些僧侣的权力，即教皇权力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②]。俄国统治集团念念不忘罗马教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它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波兰民族运动的潜在盟友，即使只有这一种原因，也足以使它认识到与罗马教廷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了。

1912年8月梵蒂冈向俄国政府提交陈述俄国天主教会情况的备忘录，1913年提交第二份这样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罗马教廷要求扩大俄国天主教会的活动，在彼得堡设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2，第41—43页。

② 同上，第76—78页。

立总主教讲道坛与教皇圣使馆，改变教皇文告及其它文件的公布办法，扩大天主教宗教教育，等256等。这些要求与沙皇政府以保持东正教会统治地位为方针的宗教政策发生冲突。此外，沙皇当局不信任天主教僧侣，怀疑他们支持波兰民族运动，虽然梵蒂冈和俄国天主教主教都准备竭尽全力削弱波兰民族主义集团对天主教僧侣的影响。

但教会体制问题的分歧并不是梵俄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这种分歧早已存在，前已指出，为共同合作反对革命，任何一方也不愿加深这种分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罗马教廷与德奥的关系日益亲密，这对梵俄关系的影响愈来愈大。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帝国主义利益在巴尔干发生冲突，梵蒂冈积极支持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马罗教廷与俄国的关系因此紧张起来。但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仍然珍惜梵蒂冈这一敌视社会主义力量的保守作用，认为与梵蒂冈达成协议非常重要。

1914年1月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批准外交部编写的报告，它论证了“利用巨大的天主教会保守力量同民间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潮流与反政府

潮流斗争不可能不符合国家最根本的利益"①。报告举例说，德国天主教组织"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强有力的斗争"，这对政治选举结果发生影响。报告又说，意大利最近举行议会选举时，"反教权主义政府采取与天主教组织达成秘密协议的办法以保证自己的候选人……"报告中表达了应当与梵蒂冈达成协议的思想，因为这符合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利益。

罗马教廷虽然与沙皇政府有各种分歧，它也仍然珍视沙皇制度——欧洲反动势力的重要支柱之一。1913年2月26日（3月11日），俄国驻梵蒂冈公使涅利多夫就庆祝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一事写道，"宗座历来忠于君主主义与王朝正统主义原则，以礼貌和同情的态度对待统治俄国的王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毫无疑问想以此说明，宗座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能够超脱那些往往使它同俄国政府疏远的暂时分歧……"②

257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2，第273—274页；《红档》，第47—48卷，1931年版，第184—188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4，第26页。由涅利多夫1913年11月5（18）日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某些

梵蒂冈虽然与沙皇政府同恶相济，一致反对社会主义，但它认为，罗马教廷的命运这时还是与最胜任欧洲宪兵角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为妙。这样的国家它认为不是法国，因为法国实行反教权措施，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反对教会，也不是信奉新教的英国，更不是沙俄，因为人民革命动摇了沙皇政府的统治并对其它国家有很大的影响，而是德意志帝国，因为德国的反动制度在梵蒂冈看来坚如磐石，与梵蒂冈有联系的天主教中央党自二十世纪初已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党、执政党。

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政府的非正式协议

意大利脱离德奥同盟为梵蒂冈彻底倒向这一同盟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也消除了前面指出的，导致十九世纪末梵蒂冈与三国同盟关系冷淡和罗马教廷倒向法俄同盟的一个基本障碍。

梵蒂冈头面人物在和他谈话时表示在贝利斯案件中支持沙皇黑帮分子，这一事实证明，当梵蒂冈与沙皇政府关系严重恶化时，梵蒂冈主教们也何等支持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34，第 88—89 页）。

意大利逐渐脱离三国同盟与法国接近始于十九世纪末年。“1896年，意大利向法国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承认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权。时隔两年，即1898年，缔结法意贸易条约；继而向意大利开放法国金融市场，自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后，曾禁止它进入这一市场。这样，法国停止了 258 对意大利的关税战和抵制意大利信贷的运动，这些都是法国自八十年代中期破坏意大利国民经济，迫使它脱离德国集团的手段。”①“1902年签订法意协定后，意大利实际上已脱离三国同盟。”②

为对抗意大利脱离三国同盟，德国统治集团采用支持教皇恢复世俗权力的威胁手段，在此之前，用这种手段威胁意大利的是法国。

1895年12月，德国首相霍恩洛厄指示德国驻罗马大使伯恩哈德·冯·比洛在与意大利大臣勃兰克男爵谈判时，如后者提出意大利可能脱离三国同盟，应如何表态。霍恩洛厄写道，意大利不再属于三国同盟或仅表面上属于三国同盟的消息一旦传出，不仅德国天主教徒，而且信奉新教

① 《外交史》，第2卷，第123页。

② 同上，第180页。

的居民将会立即掀起强大的运动呼吁：德国的政策应以恢复德皇与教皇完全和睦为方针的时机已经来到。有人建议霍恩洛厄向意大利外交大臣声明，引导意大利沿着脱离三国同盟道路前进的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将使国家四分五裂并使教皇恢复世俗权力①。德国外交界公开威胁要利用“罗马问题”反对意大利。

时隔七年，即1902年1月，已任德国首相的比洛，命令德国驻维也纳大使爱伦堡向意大利驻维也纳大使尼格拉伯爵声明，德国政府对意大利与法国接近深感不安。比洛写道，德国权势集团和权威人士现在已经遗憾地指出，德国与意大利结盟使教皇及其在德国国内外的拥护者与德国政府不和。比洛还命令告知尼格拉，利奥十三世与德皇最后一次会晤时，教皇说：“陛下，把罗马还给我吧”，威廉答道，这件事他办不到，因为古姆贝特国王是他的朋友。比洛写道，让德皇象在加洛林王朝那样将罗马“归还”教皇是不可思议的：259但是，如果法国象1849年那样动用武力恢复政

① 《总政策》，第10卷，第235—237页。

治上独立的教皇国时，德国答应一定袖手旁观，教皇大概也就满足了。比洛继续写道，这样做将加强法国教权派的势力，甚至不信仰天主教的那部分法国居民也欢迎，因为他们认为恢复教皇世俗权力是破坏意大利统一的手段，此外，法国的教权主义民族主义政府将比共和政府更受俄国支持①。这就是德国政府代表向意大利政府描写的、意大利一旦脱离三国同盟的前途。

1904年路贝访问罗马的计划传出后，比洛甚为不安，他认为这蕴藏着对三国同盟的危险②。同年9月，意大利首相焦利蒂赴汉堡会见比洛，以消除德国统治集团对意大利立场的怀疑。比洛证实德国有人认为（因路贝访问罗马）意大利与法国过分接近。

据比洛说，焦利蒂向他担保，意大利仍然忠于三国同盟，路贝访问罗马对意大利有利，这次访问“永远埋葬了教皇世俗权力问题。可以被怀疑有恢复教皇世俗权力倾向的强国本来只有一

① 《总政策》，第18卷，第2册，第519—520页。

② R·霍埃尔尼克：《意大利在法国与三国同盟之间》，哈雷，1931年版，第76页。

个，这就是法国。如果法国政府首脑访问了罗马，对教皇毫不在意，这个问题也就从此结束，罗马真正成了意大利王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首都……”①

按照焦利蒂自己的说法，他向比洛说，从此（路贝访问罗马后）主张恢复教皇世俗权力者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比洛对此表示同意②。

梵蒂冈在法国失去阵地迫使罗马教廷对意大利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这一点意大利政府尽量加以利用。1902年古巴斯托夫由罗马报告：“法国与宗教团体不停的斗争现在不知不觉地使黑衣僧侣与白衣僧侣接近起来。教廷对法国冷淡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意大利政府想要利用这一点，它非常巧妙地消除梵蒂冈对它不满的一切因素以改进与梵蒂冈的关系。”③

260

促使梵蒂冈接近意大利统治集团的另一个原因，是教会诸侯的物质利益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利益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在罗马教廷积极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2卷，第60页；《总政策》，第20卷，第1册，第82页。

② G·焦利蒂：《回忆我的一生》，伦敦，1923年版，第184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9，第154页。

支持的1911年意土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总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罗马教廷与意大利统治集团已开始接近。接近的原因除上述情况外，罗马教廷希望帮助资产阶级与意大利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作斗争，也起了不小作用。

1904年9月，克雷莫纳主教鲍诺麦利在意大利议会选举之前向教皇建议取消《不许》令，以便对抗“无政府主义社会党可怕的发展”。教皇不同意这一建议。于是，天主教运动参加者保罗·博诺米接受外交大臣蒂托尼的建议和天主教活动家的委托去见教皇。教皇接见了他，他向教皇说明，必须让天主教徒参加选举才能联合一切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力量阻止社会主义。

庇护十世起初拒绝博诺米的建议，但后来承认他理由充足，告诉他：“良心指示您做什么，您就去做吧。”他还补充说，他——教皇“将保持沉默……”① 得到梵蒂冈默许后，天主教人士与团

① 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天主教运动》，第345—347页；A·萨洛蒙：《正在形成的意大利民主》，费城，1945年版，第36—37页。

体积极参加了选举，主要目的在于阻止社会党候选人当选。

1904年11月2（15）日，俄国梵蒂冈驻办公使纳雷什金在致拉姆兹多尔夫的私人信件中写道："从红衣主教国务卿在周接见日同我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议会选举结果使梵蒂冈非常高兴……教廷对来自激进党方面的一切危险并未疏忽大意，在不干涉天主教徒履行国民义务的借口下既给自己谋利，也给现任内阁不少帮助……"① 纳

261 雷什金还写道，为了保证政府拥护者（桑蒂尼）在11月13日复选时获胜，"天主教徒又增援许多人去投票，其中甚至有神职人员……"②

意大利政府人士对庇护十世甚为满意。1904年焦利蒂向比洛说，利奥十三世与拉姆波拉曾经想消灭意大利君主国，建立以教皇为首的联邦共和国，但"自仁慈的庇护十世即位后便不再谈这个问题。当然，教皇不可能在全世界面前放弃罗马教会的任何原则，也没有一个意大利人要求他这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177—178页。

② 同上，第178页。

样做。但实际上庇护十世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意大利人，他保护并支持意大利君主国”①。

《不许》原则在1904年选举时已放宽，在1905年6月11日颁布的教皇通谕中又进一步放宽，通谕实际上允许天主教徒参加选举。通谕中说，教皇不能背弃利奥十三世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参加立法权力机关的法令；“除非社会最高利益提出与此同等重要的理由……要求在个别情况下不执行法令……”② 关于这种由“社会最高利益”提出的、迫使罗马教廷放弃《不许》原则的重大理由，纳雷什金在1905年6月14（27）日写道：“促使教皇颁布这种命令的主要原因，是表示教权愿与现行世俗政权和睦相处的愿望和建立与势力强大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作斗争的坚强堡垒的迫切要求……”③

天主教组织积极参加了1909年3月的意大利选举（教权派在罗马市内大败）。在1909年2月竞选期间，萨宗诺夫报告：“根据不久前同红衣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2卷，第60页。

② 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天主教运动》，第351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5，第24页。

主教麦里·德尔·瓦利的几次谈话我确信，梵蒂冈希望通过这次选举巩固焦利蒂先生的地位，因他善于控制极端分子，所以宗座对他抱有好感，万一不能如愿，起码也要以富蒂斯内阁代替焦利262蒂内阁，富蒂斯内阁短期执政给梵蒂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①

梵蒂冈与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共同反对社会主义，缓和了以“罗马问题”为中心的斗争，但并未勾销这一问题，因为罗马教廷不放弃它的要求。前已指出，1910 年初梵蒂冈曾对摩纳哥国公访问罗马提出抗议，在向梵蒂冈驻外国代表发出的通报中指出，教皇不能容忍这种访问并继续坚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首脑在目前情况下不能来罗马的原则。

1910 年 4 月 27 日（5 月 10 日），布拉策尔就此事由罗马报告：“梵蒂冈抗议恰巧现在提出，是因为意大利政府打算邀请外国国君到罗马来参观 1911 年举行的庆祝意大利统一五十周年展览会。”②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26，第 20 页。

② 同上，案卷 27，第 52 页。

1910年9月，罗马市长纳坦在庆祝意大利军队进驻罗马四十周年大会上谴责梵蒂冈对意大利的立场，并宣称庇护十世想阻止人民追求进步。纳坦将罗马教廷比作害怕空气、一接触空气就要解体的埃及木乃伊。市长的讲话引起了梵蒂冈的抗议。

但是，在梵蒂冈与执政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之间不仅存在分歧，而且存在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在意大利殖民政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1911年，意大利帝国主义为侵占的黎波里与土耳其交战。弗·伊·列宁说，这场战争"是由意大利的财政寡头和资本家的贪婪引起的，因为他们需要新的市场，需要意大利帝国主义不断扩张"①。这场战争对和梵蒂冈有密切关系的罗马银行来说好处特别多。俄国驻梵蒂冈代办沃尔康斯基公爵1911年10月10日（9月27日）报告："意土争夺的黎波里之战，不能不引起梵蒂冈的兴趣……社会舆论一致认为，目前危机有利于罗马教廷，并且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次意大利对教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30页。

廷产生了一定的好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263先，因为在谈到对外政策问题时，不能责怪这里的僧侣缺乏爱国主义，其次，如果萨伏依①的十字架将代替月牙②，梵蒂冈就可以期待自己在的黎波里的活动必定成功。而且，梵蒂冈与罗马银行的某种关系几乎起着主要的作用。只要提起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该银行的领导人是罗马教权主义的代表、崭露头角的梵蒂冈名外交家欧仁·帕切利蒙席(自1939年任教皇，称庇护十二世——舍英曼）的叔父恩斯特·帕切利先生。这家银行在目前冲突中所起作用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这里的社会舆论也作了过高的估计，断言似乎这场战争是由罗马银行领导人的活动引起的……最后，我冒昧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意大利军事行动的胜利可能使这里的教权界既获得尘世的利益，又保持宗教上的中立。”③

1911年9月27日（10月10日），俄国驻罗

① 指意大利的萨伏依王朝。——译者

② 指土耳其国旗上的月牙图案。——译者

③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18卷下册，莫斯科，1938年版，第125—126页。

马大使多尔戈鲁基公爵报告："罗马银行是的黎波里事件的策源地，这家银行与梵蒂冈关系密切，是它在的黎波里大部分利益的唯一代表……"①

德国驻罗马大使冯·亚哥夫也向柏林报告梵蒂冈罗马银行在挑起的黎波里战争中的作用。1911年3月1日，他向德国首相盖特曼-霍尔韦格写道，根据桑·朱利阿诺侯爵（意大利外交大臣)的意见，主战运动主要是罗马银行导演的，罗马银行还要把这场戏演到占领的黎波里为止②。

6月13日，冯·亚哥夫又报告，桑·朱利阿诺认为，在的黎波里处境不妙的罗马银行主张进行战争宣传，力图挑起事端以促使政府占领这个地方③。

1911年10月17日，冯·亚哥夫写道，"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教权主义"集团主张打这场战争④。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1年，案卷109，第218页。

② 《总政策》，第30卷，第1册，第28页。

③ 同上，第30—31页。

④ 同上，第123页。

英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文献中也指出了经管梵蒂冈财政事务的罗马银行在的黎波里战争中的作用①。

264 意大利僧侣采取沙文主义立场并宣布这场战争是"对基督教敌人的十字军远征"是不足为怪的。红衣主教瓦努泰利声称，这场战争"可以将十字架的文明带进屈服于可耻的月牙桎梏的国家……"

天主教集团的沙文主义宣传简直成了公开挑衅，社会舆论又认为战争与梵蒂冈的利益休戚相关，这使《罗马观察家报》不得不与特别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划清界限。1911 年 10 月该报发表声明说，某些天主教机关报和演说家将战争说成好象是教会支持的圣战；因此，《罗马观察家报》受全权声明，罗马教廷与战争无关并且不同意这种说法②。布拉策尔解释道，发表这种"声明"说明，罗马教廷担心天主教集团的沙文主义宣传可能导

① 《1898—1914 年大战初期的英国有关大战起因的文献》，第 9 卷，伦敦，1933 年版，第 260—261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0，第 128—129 页。

致梵土关系恶化①。

采取反战立场的不是梵蒂冈，而是意大利的劳动人民。意大利社会党对资产阶级的军事冒险行为提出抗议，工人举行抗议罢工②。

利比亚战争使梵蒂冈与意大利统治集团更加接近③。在1913年议会选举期间，天主教选举联盟首脑金蒂洛尼伯爵在梵蒂冈的同意下与焦利蒂订立选举协定，旨在不使社会党人获胜。同时向各地天主教组织发出通报，指示在选举时持什么态度和在什么条件下天主教徒可以参加投票。建议天主教徒投票选举那些以书面形式公开声明支持教会选举纲领的候选人；候选人应声明：他们将反对一切反对宗教团体的法案；不阻挠开办私立（即教会的）学校，捍卫家长要求其子女在公社学校中受宗教教育的权利，反对离婚④。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案宗，案卷30，第128—129页。

② 《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来的生活与斗争》，第46—47页；《欧洲导报》，1912年6月，第300页。

③ 1912年4月，教皇将英勇奖章授予许多负伤的意大利士兵（《欧洲历史年鉴，1912年》，第401页）。

④ Дис·康德洛罗：《意大利天主教运动》，第385—387页。

265 《不许》原则在1913年选举中实际已被取消，意大利全国各地均未遵守。

教权派与政府在1913年选举运动期间合作，加强了教权派的和解倾向。他们之中有人坚决要求在不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条件下解决“罗马问题”。例如，1913年12月米兰天主教社团第八次代表大会（有“天主教社会周”之称）上的发言就具有这种精神。《罗马观察家报》针对这些发言写道，“既然上帝至今实际上未创造出更好的条件保证领土独立这种教会自由，那么，教会从不否认，将来可能出现充分保证这项自由的其它条件……”①

这一声明可以解释为，梵蒂冈报承认梵蒂冈可能不一定以恢复教皇世俗权力作为与意大利和解的条件。关于米兰大会上的辩论，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向涅利多夫说：“为什么理论上不能容许有这样的可能，即意大利政府有朝一日会说：为了取得和平，我们把从教皇那里拿走的东西还给他吧。”②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4，第105页。
② 同上。

总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梵蒂冈人士考虑了采取不同方式解决“罗马问题”的可能性。

梵蒂冈与德帝国主义结成巩固的联盟

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愈激烈，德国统治集团巩固德梵联盟的活动便愈积极。前面已引用过的呈文——《在圣彼得堡建立宗座常设代表机关之理由》(1898年，此件全部或一半由梵蒂冈授意)中说：“为促使罗马教廷倾向德国鹰，威廉二世尽力设法掌握国际天主教一切有生力量：天主教中心、主教、传教士、红衣主教、高级僧侣与驻罗马代表。对此事进行观察研究大有教益。”①

威廉二世有意显示与利奥十三世的亲密关系，曾三次访问教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舆 266 论界可能不甚了解教皇利奥十三世和我之间的友好与互相信赖的关系。一位接近教皇的主教曾经向我说，第一次访问时我就赢得了教皇的信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136页。

任……"①

1905年8月，威廉二世在格涅兹诺发表关于德国人在东方的使命的讲话，他向德国天主教徒说："我最近一次访问梵蒂冈时，长老利奥十三世在告别时双手拉住我，尽管我是新教教徒，他仍然给我祝福，并保证说：我代表德国各民族各等级臣民中的全体天主教徒向陛下保证，他们永远是德皇和普鲁士王的忠实臣民。"②

虚荣而自尊的威廉二世扮演先知、宗教卫士和救世主的角色，从不放过参加宗教典礼与发表演说的机会，大讲宗教在社会中的意义以及他对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一视同仁的庇护。

威廉二世认为宗教是巩固现行制度的重要因素；他本人就是神秘主义者，据切尔宁伯爵(前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说，他相信"他是天命皇帝"③。威廉向德国玛丽亚·拉赫天主教修道院院长本茨列尔说，普鲁士军队和教会同样都是世界上最伟

① 威廉二世：《1878—1918年的人与事》，第176页。

② 《欧洲历史年鉴，1905年》，第109页。

③ O·切尔宁：《在世界大战的日子里》，莫斯科，1923年版，第65页。

大的力量①。那个厚颜无耻的近卫军尉官②——恩格斯这样称呼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大国务活动家，而且是精通宗教、神学问题的里手。1903 年德国历史学家杰利奇作了批判圣经的学术报告，当时德皇在报上发表声明，公开谴责杰利奇超越专业范围；德皇谴责动摇宗教基础的言行，按照他的说法，应将宗教保留给人民③。这个粗野的军人从实现他军国主义与大国主义计划的需要出发对待宗教。1897 年 11 月，威廉出席在基尔举行的新兵宣誓典礼，他说："谁不是良好的基督教徒，谁就不是真正的人，也就不是普鲁士士兵，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做到普鲁士军队对士兵的要求。普军要求士兵具备基督教徒的两种崇高品质 267 ——自我克制与自我牺牲，还要求无条件服从和听命于长官……"④

---

① L·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 377—378 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7 卷，第 10 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03 年，案卷 14，第 50 页。

④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 6 卷，第 263 页。

德国教会组织——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尽心竭力教育德国士兵甘心情愿当炮灰，做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阶级黩武计划的工具。难怪威廉二世授予主教们勋章，就象授予自己的军官一样。他在1906年曾将一枚黑鹰勋章授予最忠实于他的红衣主教之一——柯普（布列斯拉夫尔大主教）。

威廉二世奢谈宗教意义的讲话正合德国主教们的心意，也使梵蒂冈主教们高兴，他们认为这个普鲁士上士最可贵之处就是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

威廉在谈到他1903年访问梵蒂冈时教皇向他讲过这样的话："他（教皇——舍英曼）不仅要将我比作查理大帝，而且甚至认为我继承了伟大的祖先腓特烈二世的路线。"教皇还说，德皇的使命是"使欧洲回到基督教的怀抱……"①

威廉访问梵蒂冈的随行人员之一瓦德西写道："德皇与教皇争先恐后地互相恭维，互表敬意。当时德皇是否做得过火，无人确切知道，我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1卷，第614页；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1747—1920年》，第392页。

想——非常过火。"[①] 利奥十三世一心想巴结他的朋友（威廉断言，利奥十三世是他个人的朋友），甚至采取了"闻所未闻的行动"（瓦德西这样称他的行动）：他破例接见了威廉二世的全体侍从——总共约六十名新教徒——并向他们一一伸出手来[②]。

1903年威廉访问梵蒂冈时(象以前一样)，不只是他同教皇互相问候，还有德国首相比洛与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拉姆波拉进行合作谈判。1903年4月22日（5月5日）古巴斯托夫由梵蒂冈报告："德国君主还从未对罗马教廷如此关心，如此殷勤。"[③]

268

俄国驻柏林大使奥斯坚-萨肯，在1903年4月25日(5月8日)致拉姆兹多尔夫的信中说，威廉访问罗马与德国政府拉拢天主教中央党和加强德国在东方与非洲地位的计划有关。大使写道："保护德籍天主教传教士早已是威廉二世政治纲领最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第210页。

② 同上，第211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1，第69页。

重要的方面之一，不仅是为了拉拢天主教党，主要为了加强德国在东方与非洲的政治吸引力。”①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德国统治集团已有建立教皇驻柏林圣使馆与帝国政府驻梵蒂冈大使馆（代替已有的普鲁士大使馆）的计划。为此，天主教中央党著名活动家冯·盖特林格男爵不止一次赴罗马与教皇谈判。他每次去都以希望解决在斯特拉斯堡建立神学系的问题为借口。据他说，实际上比洛还希望他更好地了解罗马情况，因为打算以后将梵蒂冈的普鲁士大使馆改为帝国大使馆，比洛觉得盖特林格最适合担任大使②。德国统治集团后来（例如在1903年）还讨论过在梵蒂冈设帝国大使馆的问题，作为巩固政府与中央党关系的措施。威廉二世对这项计划未加批驳③。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03年，案卷14，第96页。

② 伯·比洛：《回忆录》，第2卷，第101页。

③ 同上，第339页。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被革命吓破了胆的德国资产阶级动员一切力量，包括天主教会，反对革命时，这一计划才得以实现。1920年设立驻梵蒂冈帝国大使馆，而驻慕尼黑圣使帕切利（后来的庇护十二世）也以驻帝国政府圣使身份到达柏林。

梵法分歧不断加深，罗马教廷日益希望德国帮助，特别是在解决“罗马问题”方面。据帕施托尔证明，1898年梵蒂冈人士已注意到德国在“罗马问题”上支持教皇的可能性①。1898年5月，法国驻梵蒂冈大使向恰雷科夫说，为在东方取得教皇支持和排斥法国保护权，威廉二世“甚至准备牺牲盟友意大利国王，目前德国已公开否认意大利的军事作用，还提出恢复教皇世俗权力问题作为对教皇的诱饵……”② 269

有一个时期，德国天主教组织取消了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的恢复教皇世俗权力问题，以免引起德意关系紧张，现在又开始对教皇处境问题提出抗议。例如，1904年雷根斯堡第五十一次全德天主教大会按照这种精神通过一项决议。

德国政府还采取措施，在教皇左右增加德国籍高级神职人员，企图通过他们影响教廷的活动。1898年5月，恰雷科夫报告，法国驻梵蒂冈代表普贝尔“发现：自占领胶州湾以来，德国在教皇

① 路·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311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67页。

周围人士中加紧活动”①。比洛报告，利奥十三世在1903年与德皇会晤时向威廉说，他——教皇“被德国人包围了，最近自己也差不多变成了半个德国人”②。

利奥十三世时期开始的梵德合作与接近，在其继任教皇庇护十世时期大大加强。威廉二世向德国考古学家、天主教神甫威尔佩尔特说，他过去与利奥十三世是盟友，新当选的教皇令人转告他，要继续发展他和利奥十三世建立的友好关系③。据比洛说，庇护十世也象前任教皇利奥十三世那样非常赏识他④。

1906年德国人维恩茨当选耶稣会总会长。报刊指出，此人当选是德国对梵政策成功的又一证明，法国报刊断言，维恩茨是德皇提出的候选人。

1906年9月，俄国驻梵蒂冈代办席林男爵就维恩茨当选问题报告：“……这个条件，德国政界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82页。

② 伯·比洛：《回忆录》，第1卷，第614页。

③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1806—1918年》，第266—267页。

④ 伯·比洛：《回忆录》，第2卷，第100—101页。

将尽量加以利用是非常可能的，近几年来事件给德国造成的一系列有利条件又多了一个……德国僧侣在国外占据的有权有势的职位，可以列成一份长长的名单，人数有增无已。德国这种向天主教机关的"和平渗透"("penetration pacifique")，使德国政府在目前向罗马教廷献殷勤的情况下掌握扩张本国势力的强大工具。"①

270

在教皇本笃十五世周围的人中，有德国军事谍报机关的间谍，如教皇高级侍从、德国神甫格尔拉赫。

利奥十三世曾经支持德帝国主义建立强大的陆海军计划。1903年利奥十三世接见威廉二世时，据德皇说，教皇曾问他海军的建设情况并希望皇帝"有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以保卫和平与德国的文化利益"②。众所周知，德帝国主义者建设海军，象其他帝国主义者建设海军一样，不是为了"保卫和平与文化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侵略政策。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7，第195—196页。

② 伯·比洛：《回忆录》，第1卷，第615页。

1906年，国会讨论驻西南非洲部队给养预算，中央党不支持政府，红衣主教柯普向比洛首相写信说，他不赞成中央党的路线，梵蒂冈也对中央党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不满①。

1908年比洛访问梵蒂冈时，庇护十世向他担保，梵蒂冈与柏林之间存在着充分的信任。教皇还说，德国天主教徒是教会最优秀和最忠实的儿女，他为此感到自豪②。1908年4月萨宗诺夫报告，比洛与庇护十世会晤时，在讨论的问题中也有中央党的政策问题。萨宗诺夫听说，教皇为中央党与比洛决裂担忧，他"怕中央党由政府党变为反对党后逐渐失去它那种特殊地位的利益。有人告诉我，由于这种原因，教皇认为向德国首相表示希望调解德国政府与天主教议员目前的纠纷是有益的……"③

梵蒂冈与德帝国主义日益接近产生的另一个271后果，是梵蒂冈（利奥十三世与庇护十世）无条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2卷，第272—273页。

② 同上，第406页；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第395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3，第93页。

件地支持德国政府反对波兰的政策，这种政策还是俾斯麦开始实行的。

“泛德意志同盟”是最富有侵略性的德国帝国主义集团的组织，产生于1891年，象“保卫东部地区德国利益同盟”一样，是反波兰活动的中心①。波兰贵族代表虽然有时也对虐待波兰居民的暴行提出抗议，但最后还是与德国殖民主义者找到了共同语言。追随天主教中央党的波兰籍国会议员，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支持威廉二世政府。“德国国会和普鲁士地方自治代表会中的波兰代表，”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写道，“在一切经济问题上支持反动的容克地主阶级，一贯投票赞成海军与战争拨款，仅偶尔斗胆对可耻的德意志化政策提出郑重的抗议以装饰一下门面而已……”②

波兰天主教高级僧侣也采取这种做法，他们假惺惺地说保护波兰人的利益，实际上支持普鲁士政府的措施。

① 《红档》，第92卷，1939年版，第221页。

② 尤·马尔赫列夫斯基：《波兰与世界革命》，莫斯科，1920年版，第15页。

德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年代的（以及在此以前的）反波兰政策，得到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德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梵蒂冈的支持。中央党议员阿伦贝格亲王向比洛说，许多中央党党员同意，必须采取“防御性措施”以抵制“蛮横无礼的波兰宣传”并对东方的德国人实行有效的“保护”，但从国会策略角度考虑不采取反波兰派的立场。比洛也说，他的“朋友和关怀者”布列斯拉夫尔大主教、红衣主教柯普“坚决反对波兰词语”①，并支持德国政府反波政策。柯普由罗马给比洛写信说：“对教皇、红衣主教国务卿以及梵蒂冈领导集团，你们可以完全相信。这里对您的信任也是不可动摇的，无论波兰人，还是耶稣会士，都不能强迫教廷对您加以阻挠。普鲁士的主教们对阁下极其信任……”②

272

天主教党首领和德国主教不反对掠夺和驱逐波兰农民，但乐意保护波兰人的“宗教利益”，例如在作礼拜与讲宗教课用什么语言这类问题上。不过，主张残酷迫害波兰人的威廉二世，也自充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1卷，第566页。

② 同上，第589页。

波兰人"宗教利益"的保护者。1905年8月9日，威廉二世在格涅兹诺演说时向当地神甫会说，有些波兰臣民不太清楚，他们是否受霍亨索伦王朝的庇护？威廉二世反对根据"历史回忆"与"幻想"作出的"虚假结论"，即反对希望复兴波兰的人，并声明："我重申，我希望每个天主教徒知道，他的宗教受到我的尊重，信仰这种宗教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阻挠。"①

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及其首脑——德皇，甘心情愿将"天国"给予波兰农民，而将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梵蒂冈也实行这种策略。罗马教廷对损害波兰人宗教利益提出抗议，但对掠夺和强迫波兰人德国化却听之任之，就象不反对俄国政府的反波政策一样。

1900年7月，普鲁士宗教事务大臣施图特命令，波兹南中小学宗教课程一律不用波兰语，而用德语进行。学生与家长一致反对。波兰儿童在宗教课上拒绝回答用德语提出的问题，还拒绝读德文圣经与祈祷文。1901年5月，在弗莱谢诺城

① 《欧洲历史年鉴，1905年》，第108—109页。

对波兰儿童施以体刑——十四名学生受了体罚。举行抗议毒打儿童示威游行的家长被送交法庭定罪，二十四人被判处监禁①。《火星报》说，弗莱谢诺事件引起全世界文明人的公愤②。

天主教集团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如何呢？

273 1901年12月10日，拉齐维尔公爵以极其温和的语气对弗莱谢诺事件和强制实行德国化政策提出质问。比洛对拉齐维尔心平气和的质问表示感谢并声明，政府不改变自己的政策并将继续保护德国，防范严重的“波兰危险”。

天主教中央党代表在国会上假惺惺地“谴责”强制实行德国化，维护波兰人用本族语向波兰儿童讲宗教课的权利，但努力将德国化问题归结为（他们过去就这样做）波兰地区新教排挤天主教的问题③。1902年1月，在普鲁士地方自治代表会中讨论弗莱谢诺案件时，天主教中央党的代表

---

① 《欧洲导报》，1902年，第1期，第389页；第2期，第830—831页；泰·施曼：《德国与总政策，1901年》，柏林，1902年版，第403页。

② 《火星报》，第18期，1902年3月10日。

③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十届议会第二次会议，1900—1903年》，柏林，第3083—3093页。

说，压制波兰语应当受到谴责，但波兰人应当感到自己是普鲁士的臣民，放弃一切恢复波兰国家的计划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新时代报》说，中央党口头上轻描淡写地批评政府对波兰人的政策，但实际上支持德国化②。

中央党领导人随机应变：他们支持（虽然附带保留条件）泛德意志主义者及其大国主义计划，但作为“天主教代表”，又必须哪怕口头上表示保护波兰天主教徒的利益——不是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与社会利益，而是他们的“宗教利益”。

梵蒂冈对迫害波兰人既不表示反对，也不提出抗议。1902年，对弗莱谢诺案件舆论界尚议论纷纷时，威廉二世派洛厄将军代表他赴罗马祝贺教皇利奥十三世即位二十五周年。威廉二世1902年6月19日在亚琛演讲时说，教皇向洛厄将军宣称，他对德国人，尤其是德军笃信宗教，一向评价很高；教皇请他转告德皇：欧洲有一个以服从、纪律、秩序、尊重当局和敬重教会为主宰的国

① 《欧洲历史年鉴，1902年》，第18页。

② 《新时代报》，第28期，1903—1904年，第55页。

家，在那里每个天主教徒都可以自由无碍地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这个国家就是德国，他因此非常感激德皇①。洛厄将军证明，德皇这些话属274实。据他说，利奥十三世还称赞德皇对待天主教臣民“公正”并绝对赞成普鲁士的教会与国家关系②。利奥十三世通过称赞普鲁士教会与国家关系“合理”而为弗莱谢诺体刑和普鲁士当局一切其它反波措施开脱罪责。

教皇故意将普鲁士天主教徒的处境渲染得无限美好，以便与法国“迫害天主教徒”形成对比，因为当时法国加紧进行反教权派及其团体的运动。

教皇庇护十世接二连三颁布抵制法国反教权措施的通谕，但对普鲁士迫害波兰天主教徒却一言不发，甚至在触及纯粹宗教方面的问题时，如格涅兹诺当局命令（1905年10月）波兰教师训练波兰儿童用德语忏悔和参加圣餐礼，或命令用德语上宗教课，他也保持缄默。

梵蒂冈与德意志帝国结盟，因而对波兰天主

① 《欧洲历史年鉴，1902年》，第112页。

② 同上，第123—125页。

教徒在普鲁士的处境熟视无睹。

梵蒂冈帮助德国政府"安抚"波兰人。1907 年 3 月，萨宗诺夫向伊兹沃利斯基报告他和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谈论普鲁士波兰地区学校罢课的情况。萨宗诺夫写道："我问，宗座是否直接参加了平服波兹南与东普鲁士民族激情的活动？红衣主教国务卿回答，虽然普鲁士政府没有请求宗座干预，但它认为可以对当地僧侣施加影响，使他们对宗座并不认为是不公平合理的政府要求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这种要求主要是指前面提到的在民办学校高年级用德语上宗教课的法令……"①

路德维希·帕施托尔 1907 年 4 月 18 日在日记中写道："红衣主教费舍尔来访，他要我相信，教皇与红衣主教国务卿对德国事务了如指掌并对德国有强烈的好感。这首先是柯普的功劳。教皇对波兰学校问题心中清如明镜。他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的政治方面。至于纯粹的波兰民族要求，罗马人士是不屑一听的。"② 275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9，第 84 页。

② L·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 473 页。

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归根结底就是波兰地区德国化，这一点教皇丝毫不加反对。

德国政府还力争梵蒂冈支持它的阿尔萨斯—洛林德国化政策，并得到了这种支持。

弗·伊·列宁在1913年说："四十多年来，普鲁士人强迫阿尔萨斯的法国居民'德国化'，并以百般重压'迫使'他们服从普鲁士王国的、军曹的、官僚的所谓'德国文明'的纪律。然而，阿尔萨斯人回答是唱起抗议的歌曲：'你们夺去了我们的阿尔萨斯、我们的洛林，你们尽可以使我们的土地德国化，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征服我们的心——永远不能'。"①

为征服阿尔萨斯人"心"，德国政府借助于天主教会。据1900年调查，阿尔萨斯—洛林一百七十万居民中有一百三十万天主教徒②。德国政府依靠这里的天主教会组织，安排效忠普鲁士国家的主教担任教会领导，逐步使教会德国化，指望这样实现全体居民的德国化。

威廉二世政府要求教皇同意将为阿尔萨斯培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14页。

② 《政治家年鉴》，伦敦，1903年版，第691页。

养僧侣的整个体系德国化。它自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与梵蒂冈谈判建立斯特拉斯堡大学罗马天主教神学系取代斯特拉斯堡神学院的问题。据萨宗诺夫说（1900年7月18（31）日报告），阿尔萨斯的神学教育，就其组织与传统而言，直到现在还是“法国统治的活纪念碑”；德国政府还要求教廷同意将这些地区的神学教育纳入“全德教育系统”，即要求它德国化。

德国政府的无理要求遭到法国政府和法国僧侣的一致反对。教廷的态度是，萨宗诺夫写道，“原则上不反对德国的改革计划，但难以表示同意，因为关于这种措施的传统，使阿尔萨斯僧侣 276 与当地百姓群情激愤……”①

1900年夏，盖特林格男爵受德国政府委托到罗马与教皇谈判这一问题。他向梵蒂冈暗示，教廷在建立斯特拉斯堡大学天主教系问题上让步，代价可能是设立教皇驻柏林外交代表机关。萨宗诺夫说，梵蒂冈非常重视与不同信仰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大概可以不必怀疑，如果教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88页。

廷认为冯·盖特林格先生诱人的讲话不是空头支票，而能指望消除柏林皇室与帝国新教居民反对圣使入柏林的意见，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向它提出的条件……”①

最初（法国实行反教权措施之前），德国政府的计划在阿尔萨斯遭到天主教徒和僧侣的反对。古巴斯托夫1901年4月24日(5月7日)由梵蒂冈报告，阿尔萨斯僧侣认为德国政府的改革计划是使阿尔萨斯德国化的纲领，因此力求原封不动地保留现有宗教学校②。

威廉二世政府与梵蒂冈通过长期谈判终于在1902年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建立大学天主教系以取代斯特拉斯堡原有的高等宗教学校，该系实际上受德国当局监督，因为任命该系教授的决定权属于德国当局（虽然威廉二世同意斯特拉斯堡主教也参与任命教授事）。萨宗诺夫1902年10月报告：“我听说，教廷肯于让步，因为在法国政府不久前采取的反宗教团体措施影响下阿尔萨斯僧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第62页。

② 同上。案卷7，第88页。

侣中出现改变方针的迹象。”①

1903 年利奥十三世接见威廉二世时向他说，在解决斯特拉斯堡神学系的问题时，必须阻止斯特拉斯堡僧侣的反抗；他——教皇希望德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感到满意，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277 的是中央党首领盖特林格和红衣主教柯普——“我们两个都是可以信赖的人”（教皇利奥十三世语）②。

德国政府提出，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教辖区应由德国主教领导，梵蒂冈迁就这一要求。1901 年斯特拉斯堡主教去世后，德国政府与罗马教廷开始谈判继承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问题。德国政府坚持不让法国人当新主教。然而梵蒂冈国务卿却收到阿尔萨斯天主教徒许多来信，他们要求不要委派德国人管理斯特拉斯堡主教区。结果，在下列原则上达成协议：任命德国人为斯特拉斯堡主教，法国人为副主教③。同年，又批准一名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9，第 148 页。

② 伯·比洛：《回忆录》，第 1 卷，第 612 页。

③ E·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与德国的‘文化斗争’》，维也纳，1934 年版，第 356 页。

德国人担任梅斯主教。

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是1903年德皇访问梵蒂冈时威廉二世与利奥十三世谈判的题目之一。1903年5月古巴斯托夫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从红衣主教拉姆波拉一些不连贯的插话和半吞半吐的话语中可以得出结论，皇帝企图说服教皇以他的权威向阿尔萨斯信奉天主教的居民施加影响，灌输与德国彻底合并的精神，他还指出，提升梅斯主教为红衣主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极其有效的手段。"①

德国和法国自十九世纪末期展开了争夺所谓对东方天主教徒保护权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梵蒂冈也站在德国一边。

"泛德意志同盟"提出了庞大的帝国主义掠夺计划。它的野心在欧洲是向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罗马尼亚、巴尔干诸国、意大利与法国的领土进行扩张。痛恨斯拉夫人民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制订瓜分俄国，奴役斯拉夫人民，首先是波兰人的计划。他们的计划还包括侵占中国、非洲、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1，第73页。

小亚细亚①。

德国统治集团早已对近东——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垂涎三尺。“在‘病人’——尼古拉一世这样称呼奥斯曼帝国——床前早已站着土耳其遗产的觊觎者——俄国、英国、法国。每个觊觎者都想护住这份‘遗产’，唯恐竞争者暗中打劫……但是，在八十年代末一个新的竞争者——德国，终于挤进了争夺土耳其权势的角逐场。”② 然而这时对东方天主教徒享有保护权的法国，在土耳其领地上的地位仍然是巩固的。“当希腊东正教徒请求俄国保护时，罗马教廷授权法国保护东方各民族天主教徒的利益……宗教力量是促进法国道德威望增长的重要力量，自然也是促进法国政治威信提高的重要力量。”③ 278

法国对土耳其天主教徒的保护权，是阻挠德

① 《红档》，第92卷，1939年版，第217—222页；《英国有关大战起因的文件》，第3卷，伦敦，1928年版，第350—352页。

② A·C·耶鲁萨利姆斯基：《十九世纪末期德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与外交手腕》，莫斯科，1951年版，第191页。

③ 儒勒·卡姆邦：《外交家》，莫斯科，1946年版，第49页。

国在东方实现侵略计划的障碍之一。

保护权的简短来历如下：自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廷帝国倾覆之后，法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后来的法土特别协定获得对土耳其版图内天主教徒的保护权。1740年，根据法土条约规定，法国作为土耳其天主教徒的保护者，得到对耶路撒冷及其它地方的“圣地”进行保护的权利。按十七、十八世纪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规定，与哈布斯堡帝国接壤地区的天主教徒，由奥匈君主国保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奥匈帝国特别关心保留对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天主教徒的保护权）。在远东，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承认，这种保护权归法国所有。

梵蒂冈既承认法国保护权，也承认奥地利保护权：罗马教廷通过1888年5月22日梵蒂冈传信部通令说明，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权（法国与奥匈帝国的）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得到支持①。

十九世纪末，德国参加瓜分世界的斗争，在东方与法国保护权发生冲突。教会机关、传教团、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129页；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2004，第16—17页。

个人与土耳其当局（在中国——与中国当局）的 279
一切纠纷都请求法国外交代表处理。这自然加强了法国的地位。

德帝国主义将近东、中东的大片领土纳入侵略计划之后，便想方设法取消法国保护权。为达到这一目的，威廉二世动用一切手段向土耳其和梵蒂冈施加压力。他的政府鼓励天主教和新教团体的传教活动，而这些团体则要求对东方“天主教徒利益的保护”改由德国负责。

十九世纪末，德国开始争夺对土耳其天主教徒的保护权，要求将这一权利移交给它，其实“保护基督教徒”这种理由不过是德帝国主义者侵略计划的幌子而已。从下列事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896 年土耳其当局大批屠杀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当时，觊觎“基督教保护者”角色的威廉二世为避免德土关系恶化，对亚美尼亚人坐视不救。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萨乌尔马“向苏丹声明，他认为‘镇压亚美尼亚暴动’是‘君主的权利与义务’，并用这种观点为采取‘严厉措施’进行辩解”①。

① A·C·耶鲁萨利姆斯基：《十九世纪末期德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与外交手腕》，第199页。

德国争夺保护权与德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冯·马夏尔在1898年2月24日致冯·施瓦尔增施太因——外交部领导官员之一——的信中写道，德国与法国在土耳其和宗教政治领域可以较量权势的时机已到；马夏尔证明，打击法国宗教政治野心的斗争，必须在德国政府确信教皇是德国的盟友或对德国哪怕保持善意的中立时开始进行。马夏尔写道，教皇本人不喜欢法国保护权，可能已在考虑，土耳其苏丹担任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比法国更合适一些；但也有可能，他不愿打破现状。问题主要取决于罗马，这里首先要遏止法国的野心①。

280 马夏尔在1898年2月25日呈德国首相霍恩洛厄公爵的长篇报告中写道，德国对土耳其政策的任务之一，就是压倒法国对该国罗马天主教徒宗教事务的影响，从而在政治问题上间接取胜。法国依靠保护权加强了它在土耳其的地位，但自从与俄国合作后，不再关心天主教徒的利益。马

① 《总政策》，第12卷，第2册，第593—594页。

夏尔说，土尔其的德国天主教徒，习惯于请求德国政府处理他们的宗教事务；其他非法国籍天主教徒认为，他们对一个让东正教俄国牵着走的国家不能抱任何希望。根据某些资料判断，教皇本人也觉得法国的保护不合适①。马夏尔指出，目前的条件对德国彻底动摇法国保护权与建立德国保护权非常有利，这样做将大大提高德国在东方的威望。

马夏尔这一报告也强调，问题取决于梵蒂冈的立场，德国与梵蒂冈对立未必能达到目的，应当争取它支持德国的要求，至少也要保持中立②。

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罗滕甘和布列斯拉夫尔大主教柯普——最忠于德帝国主义的德国主教之一——坚持不懈地努力使梵蒂冈取消法国保护权。1898年5月恰雷科夫报告，法国驻梵蒂冈大使说："他认为，德国政府力图排挤法国对东方天主教徒的保护权，为此开始在教皇周围人士中，甚至在德国报刊上进行宣传：法国做了俄国的同盟者之后，不再是罗马天主教利益比较忠实与热

① 《总政策》，第12卷，第2册，第595页。

② 同上，第597页。

心的保护者，为了满足俄国人支持的希腊教会的要求而牺牲罗马天主教的利益，在巴勒斯坦尤其如此。”但是，如果教皇愿意利用德国的威力和威廉二世对苏丹的影响，那么天主教会就不必为自己在东方的业绩担心，罗马教廷的国际地位也会因此而加强①。

无论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梵蒂冈，德国外交官都在为土耳其苏丹和罗马教皇建立外交关系 281 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在有关土耳其天主教徒问题上的中介作用已无必要②。

1898 年 3 月 4 日马夏尔电告柏林外交大臣：土耳其外交大臣通知他，教皇在君士坦丁堡秘密试探，苏丹是否同意向梵蒂冈派遣外交代表，苏丹表示同意。马夏尔也要土耳其大臣相信，没有理由使苏丹不行使与别的主权国国君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利了。马夏尔说，如果土耳其代表派往梵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5，第 65—66 页。

② W·兰格尔：《帝国主义的外交 (1890—1902 年)》，纽约，1951 年版，第 638 页。下面还要谈到威廉二世政府曾力求梵蒂冈与中国政府建交，从而取消法国在中国的保护权。德国外交官担任北京政府与梵蒂冈的中间人，打算加强德国在中国的地位。

蒂冈，那么对法国的野心将是有力的打击[①]。

1898年3月30日马夏尔报告，土耳其天主教会与别的教会不同，它同国家没有直接联系，而通过法国大使馆与土耳其国家联系。这当然使罗马教廷不满。不过教廷愿与土耳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梵蒂冈将梵土建交和实现其东正教会归顺罗马的计划联系在一起[②]。

1898年5月26日（6月7日），恰雷科夫报告，驻梵蒂冈土耳其外交代表机关问题，看来又提上日程，土耳其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怂恿下又企图进行这方面的谈判；但法国政府反对教廷与土耳其建立外交关系。“根据昨天我同普贝尔先生（法国驻梵蒂冈大使——舍英曼）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恰雷科夫写道，“可以得出结论：梵蒂冈人士和利奥十三世本人都希望建立土耳其驻教廷大使馆，以提高罗马教廷的国际地位，因此至今未给予法国政府肯定的保证，说土耳其的打算不会实现……”[③]

---

① 《总政策》，第12卷，第2册，第598页。

② 同上，第599—602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80页。

282　恰雷科夫补充自己的意见说，德国对土耳其基督教徒的保护权可能成为俄国与德国发生新的误会的根源，有利于德国殖民政策在这里取得胜利，意味着法国势力的衰落并成为德国政府向苏丹、罗马教廷和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施加影响的又一工具①。

法国政府不愿放弃对东方基督教徒的保护权给它带来的好处，所以法国外交界努力破坏梵蒂冈与苏丹建立外交关系的计划。

1898 年 4 月 15 日，外交大臣伯·比洛打电报询问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报纸上有关法国反对苏丹与教皇建立直接外交关系已发生作用，这一消息是否属实?② 德国外交官利用苏丹的虚荣心投机取巧：他们使他相信，作为握有主权的国君，他可以随便同谁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反对梵蒂冈与土耳其建立外交关系是侵犯苏丹权利的行为。

1898 年 4 月 16 与 18 日，马夏尔电告柏林外交大臣：法国大使声明，法国不能容忍在君士坦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5，第 81 页。

② 《总政策》，第 12 卷，第 2 册，第 602—603 页。

丁堡建立圣使馆；因此他——马夏尔竭力巩固苏丹反抗法国的决心并在同土耳其外交大臣谈话时说服他，苏丹有权缔结外交协定，他国的干涉只可能开创危险的先例。马夏尔还向土耳其苏丹说，威廉二世政府“特别感兴趣地”获悉向梵蒂冈委派土耳其大使的消息并建议苏丹毫不动摇地坚持已作出的决定①。

1898年5月8日马夏尔电告柏林，虽然教皇又向土耳其提出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但目前在法国的压力下他日复一日地拖延对已任命的苏丹代表阿基姆别伊表示同意②。

由于法国反对，土耳其苏丹与教皇未建立外交关系。1898年8月，比洛向德国驻伦敦大使加特茨费尔德伯爵写信谈别的问题时提到，向梵蒂冈派土耳其大使，如果不是过早宣布使法国人得到对此进行阻挠的机会的话，早已成为事实了③。 283

这样的结局使德国政府感到不满。教皇与苏丹建立外交关系的计划失败后，威廉二世开始准

---

① 《总政策》，第12卷，第2册，第603—605页。

② 同上，第606页。

③ 同上，第14卷，第1册，第356页。

备访问巴勒斯坦。在致尼古拉二世的信中（1898年8月8日），威廉二世假惺惺地为他访问“圣地”引起舆论大哗而伤心，他口是心非地写道：“一个基督教徒，出自纯正的宗教感情，迫切希望到我们的救世主生活与历难的国家去，而这种感情在所谓十九世纪的上等阶级中几乎泯灭了，因此他们只能用政治理由来解释普通的朝圣活动，看到这种情况，真是失望极了。”①

这一切不仅是德皇如此喜爱的自我标榜，而首先是政治打算：威廉二世知道，宗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在动身到东方去时，威廉说，这是朝拜基督教“圣地”的活动。但是从“圣地”回来时，威廉却在大马士革讲自己对伊斯兰教的好感，讲全世界三亿穆斯林有德国皇帝作为自己的朋友。

威廉二世在东方扮演“基督教徒庇护者”的角

---

① 《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往来书信集》，莫斯科，1923年版，第28页。文献中存在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说法，即威廉二世朝拜“圣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纯正的宗教”动机，也有政治打算（参阅《帝国主义的外交》，W·兰格尔著，第637页）。威廉访问之前的全部经过，象访问过程本身一样，推翻了这种说法并且证明，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首先出于政治动机。

色，是打算动摇法国在东方的威信，而鼓励土耳其的泛伊斯兰教主义者，是打算利用他们反对英国和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在向尼古拉报告自己同威廉二世的谈话时写道（1910年11月4日），他请德皇注意泛伊斯兰教主义宣传对俄国的危险性，这种宣传来自土耳其并受到德国的鼓励。萨宗诺夫向德皇说，他扮演“穆斯林庇护者的角色不能不被穆斯林解释为对继续进行这种宣传的鼓励……新哈里发国（“柏林的”）的出现……不能不使拥有两千万穆斯林臣民的俄国担心”①。

威廉“朝拜圣地”之行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德法争夺对东方“基督教徒保护权”的内幕。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弗·伊·列宁在谈到帝国主义时期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的垄断组织有无限的权力时，他引用《银行》杂志出版人兰斯堡谈威廉二世到巴勒斯坦去旅行的一篇文章，其中说，此行的直接结果是巴格达铁路的建筑②。德意志银行行长与威廉二世同时到达君士坦丁堡，通过与 284

① 《红档》，第3卷，1923年版，第5—6页。

② 见《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779页。

苏丹谈判，德国垄断组织在土耳其得到租借权。德皇访问“圣地”必然会加强德帝国主义在近东的经济扩张。

德皇访问“圣地”之前不久，德国政府通过土耳其苏丹用十二万法朗买下了巴勒斯坦的 Dornition（“圣母长眠”）这块地方（通过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向苏丹说明，威廉二世本人非常关注将这个地方卖给德国），准备赠给巴勒斯坦的德国天主教组织，后来它们就在这个地方修建了天主堂与修道院①。

外交大臣比洛在 1898 年 6 月 4 日致威廉二世的信中写道，为了削弱数百年来法国靠对土耳其天主教徒的保护权取得的强大势力，需要赠送这样的礼物；一方面要支持动摇法国威信的一切，另一方面还要支持在东方的德国天主教徒与法国天主教徒的对立②。

10 月 18 日德皇到达君士坦丁堡，10 月 29

① 《总政策》，第 12 卷，第 2 册，第 607——612、617—622 页；威廉二世：《1878—1918 年的人与事》，柏林，1922 年版，第 181 页。1910 年威廉二世派自己的儿子去参加这座天主教堂的净化仪式。

② 《总政策》，第 12 卷，第 2 册，第 610—611 页。

日到达耶路撒冷，那里的德国新教与天主教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德皇及其随行人员参观了教堂与德国的各种机构。德皇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人有义务让大家看到什么是基督教。在向德国天主教联盟授与购买的土地时，德皇说，他虽然是一个新教徒，但象父亲一样关怀自己的天主教臣民。在致利奥十三世的电报中，威廉说，他已承担保护巴勒斯坦德国天主教徒的使命。在巴勒斯坦的一次讲话中，威廉二世向德国天主教医院院长说，“医院所受的正是对极东地区德国天主教徒那样的保护，现今亨利亲王率领的德国装甲舰就停泊在那个地区……”① 威廉二世坦率地解释说，德国装甲舰准备象当时在中国那样在中东为德国传教士扫清道路。 285

德国的天主教报刊、天主教主教与天主教中央党，完全支持威廉二世的侵略计划。关于德皇访问巴勒斯坦一事，红衣主教柯普向瓦德西说，这是德国僧侣第一次表现出德意志的民族感情②。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26页。

②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2卷，第421页。

这种“德意志民族感情”，即德国沙文主义和拥护德帝国主义，德国的天主教僧侣与新教僧侣将在今后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

德国政府反对法国保护权的活动与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使法国统治集团惊慌不安。

1898年9月7日，德国驻巴黎代办向霍恩洛厄首相写道，威廉二世即将对东方的访问使法国紧张不安①。法国天主教的主教们支持捍卫法国的保护权，因此必然反对自己的同行——德国主教。

兰斯大主教、红衣主教兰热尼耶向教皇提出成立法国“保持与捍卫法国保护权全国委员会”的建议。红衣主教向教皇写道，法国永远不能同意失去这一光荣的权利。8月20日，教皇答复红衣主教兰热尼耶说，他满意地读了红衣主教关于建立保留与坚持法国在圣地的保护权委员会的来信，天主教的敌人在那里加倍地增强压力，以便阻挠教会忠实的儿女到圣地去。教皇写道，法国在东方得到上帝赋予的崇高使命，这一使命不仅

① 《总政策》，第12卷，第2册，第612页。

通过实践，而且通过国际条约证明它应受到尊崇，除此它还得到宗座的承认①。应当注意的是，286 当发生前述事件时，罗马教廷尚未完全放弃亲法俄的方针。这就是教皇给法国红衣主教作如此答复的原因。

德国政府不喜欢教皇的回答。国务卿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普鲁士驻梵蒂冈代办担保（1898 年 9 月），教皇致兰热尼耶的信不是反对德国，也不赋予任何人新的特权，而是声明，在东方应保持原状，这不仅涉及法国的保护权，而且也与奥地利的保护权有关②。

1898 年 10 月 8 日，利奥十三世在法国朝圣者招待会上确认他不久前关于法国在东方传统保护权的声明。德国驻梵蒂冈使者接到柏林通知，在威廉二世即将访问巴勒斯坦的前夕，教皇这样的讲话侮辱了德皇。但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向普鲁士代办担保，教皇的讲话与德皇访问东方无关，教皇这次讲话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讲的是保持

---

① 《总政策》，第 12 卷，第 2 册，第 613 页；《欧洲历史年鉴，1898 年》，第 305 页。

② 《总政策》，第 12 卷，第 2 册，第 614—615 页。

原状。他提醒使者注意梵蒂冈在要求对中国基督教徒的保护权问题上的立场(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教皇按照德国的要求解决了这个问题)①。关于这件事，恰雷科夫在1898年10月13（25）日报告："……红衣主教拉姆波拉成功地迅速消除了教皇讲话的不良印象。他解释说，教皇没讲任何新的东西，仅仅确认实际上早已存在的状况……"②

为了维护德帝国主义的利益，格涅兹诺与波兹南大主教（斯塔布列夫斯基）被派往梵蒂冈。斯塔布列夫斯基受到教皇与红衣主教国务卿的接见，他向他们说，德国天主教徒不能承认法国对他们的保护权。斯塔布列夫斯基向比洛报告，教皇不能够正式和公开地限制历史上形成的和条约肯定的、作为纯粹宗教机构保护者的法国的地位；至于个别人士，教皇则给予他们充分自由。据斯287塔布列夫斯基说，梵蒂冈重视既成事实——如果有一天天主教团体寻求德国保护，那么教皇对此一定表示同意。此外，他还知道，教皇指示耶路

---

① 《总政策》，第12卷，第2册，第621—622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24页。

撒冷总主教为威廉举行隆重的欢迎会①。

梵蒂冈努力消除教皇对法国朝圣者的讲话在德国统治集团中造成的影响。10月18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文章，强烈批评意大利自由派报刊给教皇讲话加上反德倾向。拉姆波拉向普鲁士驻梵蒂冈代办说，今后他将尽量做到避免教皇对朝圣者讲话所引起的这类纠纷②。11月11日，教皇因德皇把巴勒斯坦的一块土地赠送给德国天主教组织而向科隆大主教克列缅茨写了一封信。他对这件事表示满意，赞扬德皇并说，德国天主教徒在自己的会议上感谢德皇的馈赠使他高兴。

1898年11月，法国统治集团派红衣主教兰热尼耶前往梵蒂冈，以便维护法国的保护权。普鲁士驻梵蒂冈使者秘密报告，红衣主教必须获得确切证明，梵蒂冈在这个问题上持审慎态度的决定不会动摇③。

德国的天主教报刊也将威廉二世作为东方"天主教徒的保护者"加以吹捧。1898年12月，

---

① 《总政策》，第12卷，第2册，第624—625页。

② 同上，第627页。

③ 同上，第631页。

天主教中央党议员弗里增与李伯尔在国会上发言，讲到德皇访问东方的问题。他们两人都颂扬德皇，并说从今以后，德国天主教徒将不向外国代表而向德国代表寻求保护，德国天主教徒“由于民族与宗教原因”拒绝法国的保护并骄傲地信托德国政府保护自己的利益①。

中央党代表与德国天主教报刊关于保护权问题的言论变成了如此严重的沙文主义宣传，以至于《罗马观察家报》认为必须发表声明，为了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利益停止论战②。

288 梵蒂冈并不认为，可以立即取消法国的保护权：这会使它与法国的关系复杂化，并给土耳其的天主教会造成困难。问题在于，近东的大多数传教士组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是法国的。在土耳其，到1912年初等教育还掌握在法国修女手中，宗教团体拥有五千多所学校③。法国传教士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所高等神学院，在贝鲁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第十届议会第一次会议》，第1卷，第24、110—111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49—150页。

③ 《欧洲导报》，1912年3月，第304页。

特建立了一所大学，他们还有初级、中级学校和技术学校、医院①。法国传教士只是逐渐地被德国和意大利传教士、后来又被美国传教士排挤出去。此外，十九世纪末期法国向梵蒂冈提供的传教士团用费比其它大国要多。拉姆波拉在同普鲁士驻梵蒂冈代办谈话时（1898 年 9 月）顺便提了这样一条意见："还有，你们不应当忘记，法国每年给我们的传教士团提供四百万。"② 对这一切，即用法国钱供养的法国传教士团实际上占优势一事，梵蒂冈不能不予以重视。但罗马教廷政策的总方针是与德国建立联盟，所以在保护权问题上也日益倒向德国。大主教斯塔布列夫斯基与巴伐利亚驻梵蒂冈使者向柏林秘密报告，要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改变立场，梵蒂冈需要时间。他们写道，建立愈来愈多的德国传教士团，它们有事不请法国领事，而请德国领事处理，事实上将使法梵条约化为乌有。后来发生的情况大致如此。

1898 年 10 月，在同普鲁士驻梵蒂冈代办谈到教皇对法国朝圣者关于法国保护权问题的讲话

① 《欧洲导报》，1915 年 3 月，第 285 页。

② 《总政策》，第 12 卷，第 2 册，第 615 页。

时，拉姆波拉说道："比如说，父亲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还有一个生病的孩子，考虑到后者的健康状况，父亲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给他特殊的爱抚。让健康的孩子不要因此而感到不痛快吧。"①

罗马教廷现代史学家施米德林写道，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后，对东方与中国基督教徒的保护权问题向有利于德国传教士团的方向转化②。

289 德国政府努力利用法梵关系的紧张化。罗马教廷则想表明，由于法国政府实行反教权主义政策，法国受到多么大的损失。1903年5月，俄国驻东柏林大使奥斯坚-萨肯关于威廉二世访问梵蒂冈问题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如果皇帝能够使教皇倒向德国，那么这一成就的后果指日可待。至今享有东方所有天主教徒庇护者声誉的法国，必将与德国分担这个角色，德国实际上已将本国天主教臣民从法国精神影响下解放出来，目前正在争取教廷正式承认德国的权利。"③

---

① 《总政策》，第12卷，第2册，第625页。

②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第469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03年，案卷14，第97页。

在争取取消法国保护权的斗争过程中再次提出建立土耳其驻梵蒂冈大使馆的问题。1904年末，安蒂奥克宗主教基里尔到达梵蒂冈，带给教皇一封土耳其苏丹的信，给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和戈蒂(传信部长)带来了土耳其勋章。报刊评论说这是双方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的标志①。

罗马教廷在保护权问题上采取比较公开的亲德路线是自它与法国关系恶化，直至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不过法国政府一再声明，反宗教团体法和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不改变它对传教士活动的善意态度，法国仍然认为自己是东方基督教徒的保护者，因为保护权与国际协定有关，不由罗马教廷决定。

法国保护权实际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列强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取消的：各方政府为实现自己的侵略政策竭力把持对东方诸国中本国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实际上是在“保护基督教徒”的借口下攫取干涉东方国家内政的权利。

梵蒂冈对取消法国保护权与增强德国天主教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第175页。

组织（德帝国主义特务机关）的地位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290 国务卿、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1913年6月向涅利多夫说，以前罗马教廷授权法国庇护东方的天主教机关，但“一方面法国愈来愈不忠于职守，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甚至在宗教生活问题上也不断发展，因此宗座当然不能阻止任何一个机构将自己置于本国代表机关的特殊保护之下……”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两个大国集团之间的斗争愈尖锐，梵蒂冈与德国的关系愈密切。1910年，帝国首相盖特曼-霍尔韦格到达罗马。关于梵蒂冈对他亲切招待的情况，布拉策尔3月16(29)日向伊兹沃利斯基写道：“……现代总的政治形势允许非常有把握地作出结论，德国与罗马教廷双方都有不少相互接近的理由。反教权主义运动最近一个时期，象我不久前荣幸地向尊敬的阁下报告的那样，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人士，甚至政府人士都有非常强烈的影响，而在德国，这种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4，第46页。

影响就少得多。梵蒂冈哪怕仅仅保持这一个大国的好感也是对它有利的，同时帝国政府也自然珍视教廷的善意，因为现在极为强大的中央党是听命于教廷的……”①

一年后，即1911年9月，俄国驻梵蒂冈代办沃尔康斯基公爵在他的梵蒂冈对外政策简述中写道："显然不是没有根据地推测，这一政策将日益强烈地倾向于同中欧两大帝国有一定的接近。普遍认为，甚至从前被人说对拉丁系与斯拉夫系有政治好感的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目前也开始倾向德意志世界……”②

由于列强之间即将发生军事冲突，德国统治集团要求巩固梵德联盟极其强烈，竟致不顾德国新教徒的抗议，并对教皇攻击新教教会之举视而不见。1910年5月26日，庇护十世颁布纪念卡尔·博罗麦奥列圣三百周年的教皇通谕（博罗麦奥通谕）。卡尔·博罗麦奥是反宗教改革的活动 291 家之一。通谕对宗教改革进行了侮辱性的攻击。教皇称宗教改革活动家为“基督十字架的敌人”、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7，第31—32页。

② 同上，案卷30，第111页。

“把自己的胃当作上帝”的人、败坏道德的“罪人”①。通谕使德国和其它国家的新教界（注意，属于新教教会的有德皇，还有统治集团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义愤填膺。通谕问题成了1910年6月普鲁士众议院的议题。发言人对侮辱福音教派居民的教皇通谕纷纷提出抗议。在对这些发言致答辞时，盖特曼-霍尔韦格首相承认教皇通谕对福音教派居民来说是侮辱性的，并且通知大家，已命令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向教廷提出抗议并希望教廷采取措施防止通谕造成损失②。

据帕施托尔说，事情几乎闹到撤销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馆的地步③。另外一种说法是，普鲁士驻梵蒂冈公使米尔贝格这时一直带着捆好的箱子坐在那里，准备离开④。但后来举行的谈判表明，双方都希望避免关系紧张化。

1910年5月25日（6月7日），布拉策尔写

① J·霍费耳德：«1849—1934年德意志帝国历史文献»，第1卷，柏林，1927年版，第449—450页。

② «欧洲历史年鉴，1910年»，第37页。

③ 路·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520页。

④ 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1747—1920年»，第401页。

道：为消除教皇通谕在德国造成的不良印象，教皇在1910年6月6日接见一批德国朝圣者时，“用特别动人的言辞请求上帝给威廉皇帝及其至圣的家族赐福……”①

然后《罗马观察家报》很快登出官方消息说，教皇通谕中根本未点任何一国人民与统治者的名，教皇没有侮辱德国非天主教居民或其国君的愿望，不久前教皇对德国朝圣者的讲话，就是教皇对德国抱有好感的证明②。由于普鲁士驻梵蒂冈代表与罗马教廷进行了谈判，所以教皇命令通谕不要在德国公布③。

总之，梵德联盟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292 结束。

促进梵德联盟巩固的因素还有一个，那就是信奉天主教的奥匈帝国与德国共处于一个同盟之中。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7，第66页。

② 同上，第68页。

③ 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第40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梵蒂冈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

以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为首的奥地利封建教权军事集团，抱定宗旨粉碎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占领塞尔维亚并将塞尔维亚领土并入哈布斯堡君主国版图。

奥匈统治集团将挑动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宗教纠纷作为推行奥匈巴尔干政策的重要手段。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施基1912年11月向首相盖特曼-霍尔韦格报告，维也纳统治集团中有一种自我安慰的论调，说向南方斯拉夫人传播各种不同的宗教将妨碍他们团结一致反对哈布斯堡君主国，还说克罗地亚天主教徒永远不会与他们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兄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君主国。但契尔施基认为，事实说明，这种打算是靠不住的①。

1908年10月，奥匈帝国正式宣布兼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积极主张兼并的是教权主义集团。在此之前不久，即1908年8月，德国驻维

① 《总政策》，第33卷，第369—370页。

也纳代办布罗克多夫-蓝拆伯爵向首相比洛公爵报告，外交界正在积极谈论即将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他特别指出，这是军事集团与施塔特勒尔大主教异常亲近的教权主义集团早已梦寐以求的事①。

德国在侵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支持奥匈帝国。中央党中的德国教权主义者也和德国统治集团一起支持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09年1月1日，奥地利教权派机关报《帝国邮报》发表德国国会议员、天主教中央党代表埃尔茨贝格的文章，它指责比洛首相1908年12月10日在国会上就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表讲话时，没有更坚决地支持奥匈帝国，也没有声明，一旦发生国际冲突，德军将支持奥匈帝国。天主教中央党机关报《德意志报》，也提出这样的指责②。 293

奥地利占领区的居民中有八十二万四千名塞尔维亚人（东正教徒）、六十一万二千名穆斯林、四十三万四千名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同源民

① 《总政策》，第26卷，第1册，第20—21页。

② 同上，，第2册，第479页。

族，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和少数德国新教徒与犹太人①。

1908年之前早已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据为己有的奥匈帝国，极力依靠并庇护当地的天主教会及其团体。当局鼓励开办天主教学校，在任命官员时优先安排天主教徒②。

胡达利主教说："欧洲任何地方的宗教和教会也不象巴尔干国家和东欧那样与政治混在一起③。梵蒂冈和与它关系密切的奥匈政府，广为利用这种条件，借助宗教与教会实现本身的政治目的。

前已指出，哈布斯堡君主国自土耳其统治时期起享有对巴尔干国家天主教徒的保护权，就象法国在东方享有这种权利一样。哈布斯堡君主国力图保留这种权利，因为利用这种权利可以干涉

①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4卷，莫斯科，1931年版，第304页。

② 《外交部通报》，第6册，莫斯科，1915年版，第151页；《欧洲导报》，1909年3月，第51—52页；4月，第484—494页。

③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大使馆，1806—1918年》，第277页。

巴尔干国家的内部生活。1913年初，奥匈帝国政府发表正式声明，宗教保护权是君主国自古以来的权利，君主国珍视这一权利的实现，就象法国珍视它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权一样[①]。

塞尔维亚政府人士认为，塞尔维亚与梵蒂冈建立直接联系后，奥匈保护权自然取消，因此塞尔维亚政府在十九世纪末与梵蒂冈进行缔结宗教条约的谈判[②]。

294

俄国沙皇政府驻梵蒂冈与贝尔格莱德代表，对缔结宗教条约的主张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缔结这种条约将加强罗马教廷与天主教在巴尔干的地位，扩大奥匈帝国的影响。1901年3月，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恰雷科夫向塞尔维亚外交大臣说，缔结宗教条约出自政治原因，即——塞尔维亚渴望也在宗教事物方面摆脱奥地利的霸权。但是他不相信，通过缔结宗教条约能够达到这种目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2004，第16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政治档案全宗，案卷2906，第1—4页。1896年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在访问利奥十三世时说，他主张缔结宗教条约（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2157，第14页）。

的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塞尔维亚宗教条约问题再次提出。这次阻挠缔约的是不愿失去保护权的奥匈帝国，俄国外交界已不再反对宗教条约。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1914年6月11日向驻梵蒂冈公使写道，巴尔干战争结束与塞尔维亚版图扩大后，该国信奉天主教的居民增多，因此反对宗教条约的老观点已经过时，因为“只有通过塞尔维亚政府和罗马教廷建立直接关系才能结束奥匈帝国至今对上述地区天主教徒的保护……”②

在此之前，即1913年1月28日（2月11日），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吉尔斯报告：“如果塞尔维亚缔结宗教条约成功，那么奥地利将失去在保护教友的借口下干涉塞尔维亚内政的一切依据……”③

1913年9月俄国驻梵蒂冈代办H·博克写道：“无论是塞尔维亚人，还是黑山人，显然都会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政治档案全宗，案卷2906，第9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2004，第17页。

把取消奥地利在新并入塞尔维亚与黑山地区的保护权作为本国与梵蒂冈协定的首要条款①。

缔结宗教条约有利于梵蒂冈，不利于奥匈君主国。罗马教廷为保护奥匈帝国的利益宁肯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1914年3月涅利多夫由梵蒂冈报告，由于奥匈政府干涉，塞梵谈判受到阻碍②。

1914年3月涅利多夫又报告，他在同国务卿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会晤时曾提出下列问题：奥地利打算干涉塞梵谈判的传说是否正确？涅利多夫写道，红衣主教回答说：当然，奥地利没有直接参加谈判的使命，但宗座不能不考虑奥地利在前土耳其地区的实际地位和天主教会依法授予它的权利。“此外，”红衣主教说，“我们应当感谢奥地利在那些地区迄今为天主教所作的贡献。”③由此可见，梵蒂冈坚持保留奥地利保护权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特权。麦里·德尔·瓦利建议1914年4月到达罗马与教廷进行谈判的 295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4，第70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2004，第32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5，第33页。

塞尔维亚代表维斯尼奇预先同奥地利达成协议，塞代表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承认奥地利保护权①。

据哈特维希报告(1914 年 5 月)，奥匈政府对宗教条约谈判提出下列要求：(1) 在所有塞尔维亚天主教堂圣像壁前右侧为奥匈帝国代表设荣誉席；(2) 在教堂正门上方绘制奥匈帝国国徽；(3)作礼拜时高声朗读奥匈帝国皇帝名字；(4) 授予奥匈帝国监督塞尔维亚履行条约中一切义务的权利②。

总之，奥匈政府要求塞尔维亚天主教会成为它的机关并为它的利益服务。梵蒂冈支持奥匈帝国追求干涉塞尔维亚内政权利的野心。

罗马教廷力争吸收奥匈政府参加谈判，力争塞尔维亚政府和奥匈政府在与宗教条约有关的问题上事先达成协议。由于塞尔维亚代表坚决声明：这种要求将使谈判破裂，罗马教廷才被迫放弃这种意见。

1914 年 6 月 11 (24) 日签订塞尔维亚宗教条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35，第 54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政治档案全宗，案卷 532，第 202 页。

约。由于梵蒂冈的努力，保留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天主教教会机构的某些"荣誉保护"权。

缔结宗教条约并未将罗马教廷变成塞尔维亚的朋友。这在缔约之后立即表现出来：由于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梵蒂冈采取了与塞尔维亚敌对的立场。罗马教廷希望：塞尔维亚将成为战败国阵营的成员，那时宗教条约问题、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统治复辟问题将重新考虑，这正是罗马教廷梦寐以求的事。 296

"奥地利和意大利为追求亚得里亚海制海权而在阿尔巴尼亚争雄。"① 就宗教信仰而言，阿尔巴尼亚居民由天主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组成。通常认为，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受奥地利保护。但奥地利对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徒的"保护"远远超出宗教问题范围，成了巩固奥匈帝国政治势力的手段。

1898年10月，阿尔巴尼亚普里兹伦德城天主教徒代表团到罗马请求教皇准许他们的天主教会免受奥地利保护。教皇未予接见。代表团又向

① 《外交史》，第2卷，第217页。

法国驻梵蒂冈大使馆提出请求，但得到的答复是：法国仅在本国保护权行使地区尽量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不能干涉受奥地利保护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天主教徒的事务①。

罗马教廷是同意保留奥地利在阿尔巴尼亚的保护权的。

1909年7月俄国驻梵蒂冈代办席林男爵报告，罗马教廷在对阿尔巴尼亚的保护权问题上站在奥地利一边，“这种权利在那里是奥地利势力的强大工具”②。

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恰雷科夫1912年1月向外交大臣写道，奥匈帝国具有在阿尔巴尼亚“保护天主教会的传统权利……但是奥匈宣传远远超出这种纯粹宗教保护的范围，大概不能将奥匈帝国在阿尔巴尼亚广泛办学校的事划入这种保护范围吧”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列强政府制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32页。

② 同上，案卷26，第66页。

③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19卷，上册，第315页。

订建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计划。梵蒂冈支持这种奴役阿尔巴尼亚的新形式。奥地利驻梵蒂冈 297 大使顺堡-哈滕施太因 1913 年 1 月16日向维也纳报告，在同他谈到将来阿尔巴尼亚王位属谁的问题时，国务卿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说：“未来的国王最好是天主教徒，如果不是，那么穆斯林比新教教徒好。”①

1913 年 8 月，红衣主教阿利亚尔季向奥匈帝国驻梵蒂冈公使帕利菲伯爵说：“……在一切情况下都要保留在阿尔巴尼亚的保护权，因为它是贵国皇帝皇冠上的宝石和天主教会的幸福，它给教会带来了无穷的好处……”②

阿利亚尔季又说，什么人做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对罗马教廷利害攸关。自然，罗马教廷比较愿意让天主教徒执政，但没有合适的人选，此外，意大利也反对，因为担心天主教徒倾向罗马教廷，从而与意大利发生矛盾。罗马教廷认为，新教徒做阿尔巴尼亚国公（据红衣主教说，美国

① 《自 1908 年波希米亚战争至 1914 年战争爆发时期奥匈帝国的对外政策》，第 5 卷，第 468 页。

② 同上，第 7 卷，第 139 页。

出钱进行这种宣传）是“最大的不幸”，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一使命赋予穆斯林。阿利亚尔季补充说，他和埃及亲王法乌德-帕沙有来往，在他看来，法乌德是阿尔巴尼亚国公合适的候选人，他愿意承认奥匈帝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保护权①。

梵蒂冈的主教们不愿考虑阿尔巴尼亚本国人民的愿望，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斗争不共戴天的仇敌。

奥匈帝国的走狗依靠天主教教会组织，煽动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徒与穆斯林的宗教敌对情绪，直到发生流血冲突。1915 年 6 月，俄国驻斯库台里副领事在他的阿尔巴尼亚形势的秘密概述中写道：“……奥地利宣传，在效忠奥地利的天主教僧侣的帮助下，利用阿尔巴尼亚报刊进行收买作为手段，使信奉天主教的居民对此地穆斯林的仇恨达到疯狂的程度……”②

---

① 《自 1908 年波希米亚战争至 1914 年战争爆发时期奥匈帝国的对外政策》，第 7 卷，第 139—140 页。

②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 8 卷，第 1 册，第 288 页。

梵蒂冈支持奥匈帝国侵略阿尔巴尼亚的计划，反对意大利侵略阿尔巴尼亚的计划，梵意关 298 系因此恶化。意大利在巴尔干反对奥匈帝国的斗争中寻求与沙皇俄国接近，这又引起俄梵关系的恶化。

罗马教廷不顾黑山反对，支持奥匈帝国要求对黑山天主教徒的保护权①。

梵蒂冈对巩固天主教在保加利亚的势力也抱有希望。奥地利驻梵蒂冈大使顺堡亲王1912年12月报告，红衣主教国务卿在同他谈话时表示，希望保加利亚教会改为合并派教会②。

俄国驻索非亚代办Ю·萨布列尔1913年10月7日向涅拉托夫报告，保加利亚的教会合并运动正在发展，奥地利对它很有兴趣③。

甚至在解决南方斯拉夫天主教徒做弥撒问题时，罗马教廷也考虑可能触动奥匈帝国多少利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1910年驻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2059，第34、36页。

② E·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8年—1903年》，第132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政治档案全宗，1913年，案卷1351，第169页。

益。南方斯拉夫天主教徒早已提出用斯拉夫语作礼拜和使用“格拉果尔字母”版圣礼书而不用拉丁文圣礼书的问题。斯拉夫天主教徒认为这是抵制民族同化的一种手段。

利奥十三世准备满足这种要求以利于传播天主教。但是，自列强在巴尔干争夺权势的斗争激化后，罗马教廷解决作礼拜所用语言问题的立场以是否有利于奥匈帝国为转移。1905 年 5 月，教皇在罗马召集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伊斯的利亚和克莱纳主教会议，讨论用古斯拉夫语作礼拜和地方僧侣使用“格拉果尔字母”版圣礼书问题。主教会议主席是红衣主教瓦努泰利，据纳雷什金说，他“一心效忠奥匈权势，主持讨论时努力讨好奥地利……”① 值得注意的是，主教会议在奥匈帝国驻梵蒂冈大使馆内进行，据萨宗诺夫报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代表虽然没有领导主教讨论，但起码可能按维也纳政府的希望对讨论施加影

299 响②。教皇对这次主教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的决定，通过 1906 年 12 月 18 日圣礼部命令的形式宣布。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5，第 17 页。

② 同上，案卷 19，第 6 页。

教皇的决定不利于解决用斯拉夫语作礼拜问题①。在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的利亚，只有三十年来一贯坚持用斯拉夫语作礼拜的教堂才允许用斯拉夫语作礼拜。这一决定引起纷纷抗议，在抗议压力下教皇下达稍加放松决定的指示——授命圣礼部准许三十年来用斯拉夫语作礼拜间断过的教堂在一定情况下用斯拉夫语作礼拜。1908 年 4 月 1（14）日萨宗诺夫报告："我认为不妨指出，我对奥匈帝国驻梵蒂冈大使将为尽量限制用斯拉夫语做弥撒施加压力的推测，已从完全可靠的来源得到证实。众所周知，维也纳政府这方面的愿望是与威尼斯出生的教皇个人对亚得里亚沿海地区斯拉夫人的民族要求抱有反感相吻合的……"②

可见，梵蒂冈参加了镇压哈布斯堡王朝压迫下的斯拉夫人民民族运动的政治活动。

巴尔干是欧洲某些国家帝国主义利益发生冲突的地区——一方是德国支持下的奥匈帝国和对它持善意态度的苏丹土耳其，另一方是沙俄和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梵蒂冈在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9，第 7 页。

② 同上，案卷 21，第 80 页。

列强奴役巴尔干人民的斗争中属于奥匈帝国与德帝国主义及其盟邦土耳其阵营①。

1912年12月涅利多夫报告，梵蒂冈在有关巴尔干国家的事务中，“如果不是公然敌视东正教，起码对奥地利政策及其利己的无理要求非常支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奥地利也将能够并且广泛利用天主教这面旗帜以达到政治目的”②。

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假仁假义地用“保护基督教徒”、“保护天主教徒”、“保护东正教”等等“高尚的”口号掩饰自己的掠夺计划。同时，300 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各国政府与梵蒂冈，却对土耳其当局经常组织屠杀基督教徒的暴行漠然视之。

“只有国际社会民主党，”Д·勃拉戈耶夫在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能够对欧洲的土耳其领地的兽行，对资产阶级政府鼓励这些兽行的行为断然提出抗议，并坚决主张解放正在为自由与比较高尚文明的生活而斗争的

① 1906年1月，苏丹授予三位著名的罗马教廷高级官员土耳其勋章，这是天主教会首脑与土耳其友好关系的表现。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2，第199页。

国家。”①

奥地利统治集团极为重视罗马教廷在巴尔干的亲奥政策。1907年，国务卿红衣主教麦里·德尔·瓦利获得奥地利最高奖赏——圣·斯特凡勋章。萨宗诺夫就此事写道，这一奖赏将巩固罗马教廷对奥匈帝国的友好感情。“罗马教廷的好感，”萨宗诺夫写道，“目前特别受到奥地利政府重视，因为用斯拉夫语做弥撒问题在亚得里亚沿海斯拉夫人中引起的风潮仍在继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通过不久前的选举，天主教党各派在奥地利国会中占了优势，而且看来，梵蒂冈满有把握指望它们俯首听命。”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即1914年2月，大批罗马教廷高级神职人员（红衣主教瓦努泰利·德·拉伊和其他二十六名高级神职人员）获得奥地利勋章。

梵蒂冈在巴尔干采取亲奥政策，将巴尔干国家的天主教会变为传播奥地利影响的工具，以及日益公开地以同盟者身份加入德奥同盟——这些都是促使梵俄关系恶化的原因。如果说直到末日

① 《火星报》，第48期，1903年9月15日。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1，第8页。

临头沙皇政府还同梵蒂冈保持外交关系的话，那么是因为需要梵蒂冈支持它镇压俄国波兰族居民的革命运动。

梵蒂冈与英国

英国也象其它国家一样，力图依靠梵蒂冈的支持来维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无条件服从教301皇的爱尔兰天主教僧侣势力强大，因此与梵蒂冈合作共同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运动，对英国统治阶级来说非常重要。

在英国本土，天主教的影响自十九世纪末期显著加强。这首先表现在贵族中，其中包括英国国教教会的高级代表。改奉天主教的有“英国国教僧侣、贵族、上流社会妇女。另外一部分新入教的人来自文学界、艺术界和戏剧界……但天主教对人民群众，甚至对中等阶级，影响不大”①。

英梵合作还能保证殖民地的天主教组织支持英帝国主义。1903年耶稣会总会长马丁向陆军元帅瓦德西说，英国从耶稣会士在殖民地的活动

① 3·加列维：《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史》，第164—165页。

中得到很大好处①。

罗马教廷也力图巩固它在英国的地盘。这样既能至少部分挽回宗教改革的损失，又可以在英国殖民地大力宣传天主教。同时，梵蒂冈对英国的态度还不能不取决于罗马教廷的总政策，前已指出，自十九世纪末期，日益明确地与德意志帝国结成牢固联盟的方针是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

英德矛盾自十九世纪末期逐渐成为列强之间一切矛盾中最深刻的矛盾。"……问题不仅在于德国的殖民主义野心、商业竞争、追求霸权。更重要的是德国开始建设强大的海军……有了强大的海军，德国就成为英国一切可以意料的敌人中最危险的敌人。"②

英德矛盾尖锐化推动英国与法俄接近。1903年夏，法国总统路贝到达伦敦。当时两国开始谈判，至1904年4月签订瓜分非洲的英法条约。1907年，英国同俄国结盟。英国还同意大利合作。

所有这些情况对梵蒂冈与英国的关系都有影 302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第213页。

② 《外交史》，第2卷，第132--133页。

响。在1898年—1902年的英布战争中，梵蒂冈报刊采取敌视英国的立场并非由于对布尔人有什么同情。“耶稣会的《真理之声报》证明说，意大利的强大只不过是由于英国的支持，因此，英国势力如果由于布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衰落后，无神论的意大利就会覆灭，教皇政权必将在罗马恢复。梵蒂冈报刊在英国天主教徒中展开这种宣传运动，引起巨大的骚动，甚至使这些天主教徒的‘世俗首脑’诺福克公爵认识到自己必须退出索尔兹伯里内阁，以便登记加入英国远征军去当军官。”①

1899年11月9(21)日，恰雷科夫由梵蒂冈向拉姆兹多尔夫报告，英国在南非的战争引起教皇政府及其机关报刊对英国的敌视，这种敌视程度严重，已迫使英国天主教人士提请国务卿红衣主教拉姆波拉注意，这种公开表示敌意是不合适的。拉姆波拉认为必须在《罗马观察家报》上声明，该报的反英言论仅代表该报编辑的意见，而不代表教廷②。这种答复未使英国天主教活动家满意。以诺福克斯基公爵为首的一批天主教徒公开

①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52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139页。

集会，宣读红衣主教国务卿的来信。会议认为，答复含糊，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作出决议：英国天主教徒“在宗教与道德事务方面”崇拜教皇的权威，但“对他们与祖国政治利益的关系，不许教会进行任何干涉”①。

关于梵蒂冈所采取的反英立场，恰雷科夫这样解释：“天主教徒希望英国失败，他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对新教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对英国政府支持建立意大利王国的报复……”“罗马教廷对英国的憎恶，”1899年12月恰雷科夫写道，“部分出于宗教原因，部分出于地区的政治原因。但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切反对英国的政治计谋，将受到罗马教廷、教权派报刊和所有欧洲与非欧洲国家 303 相当大一部分信奉天主教居民的同情和支持。”②

英布战争结束后，英国统治集团开始改善同梵蒂冈的关系。1903年4月，英国国王访问教皇。

无论在哪个时期，无论梵蒂冈与英国的关系如何，罗马教廷一贯支持英国政府反对爱尔兰人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24—25页。

② 同上，案卷6，第149页。

民的解放运动。这一点正是英国统治集团力图与罗马教廷保持良好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爱尔兰（与英国的）天主教主教们，经梵蒂冈同意并遵照梵蒂冈的指示，支持英国政府镇压爱尔兰人民的解放运动。

马克思写道，在爱尔兰运动中牧师这些高贵的先生们“是叛徒”①。

关于英国统治在爱尔兰的极其恶劣的作用，关于天主教在爱尔兰的横行霸道，弗·伊·列宁在1913年写道：“民族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使这个不幸国家的无产者变得一贫如洗；使农民成了僧侣阶级的落后的愚昧无知的奴隶；使资产阶级成了在民族主义美丽辞藻掩盖下的一帮资本家，成了压迫工人的暴君；而行政当局则成了惯于采取种种暴力的匪帮。”②

英国的天主教主教在英国政府与梵蒂冈和爱尔兰主教之间起中介作用。狂热的英帝国主义思想家约瑟夫·张伯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885年，他（张伯伦，当时任贸易大臣）经政府首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9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30页。

同意，曾与英国红衣主教曼宁会晤（会晤由红衣主教提出并在他的官邸进行），会晤时谈了天主教主教参加反对爱尔兰民族运动斗争的问题。红衣主教曼宁向张伯伦说，他曾同途经伦敦前往梵蒂冈的爱尔兰主教们谈过话。曼宁担保，爱尔兰主教们几乎全体一致反对爱尔兰与英国分离；只有几位主张另立议会，曼宁劝他们放弃这种主张并说服他们满足于地方自治。张伯伦向曼宁说，他——张伯伦，私下也曾表示希望爱尔兰成立具 304 有不损害英国国家整体利益的征税权和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可见，曼宁向爱尔兰主教们提出的正是压迫爱尔兰的英国政府所提的方案。主教们准备同意这个方案。红衣主教向张伯伦说，目前爱尔兰有两个权势因素——帕涅尔与主教们，后者在目前研究的问题上"站在我们一边"，即站在政府一边。关于当时最著名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帕涅尔的情况，据曼宁说，他（红衣主教）同一些爱尔兰运动著名代表人物有联系，其中有一位奥希大尉时常向他报告帕涅尔的观点①。看来这

① 约瑟夫·张伯伦：《1880—1892年政治回忆录》，伦敦，1953年版，第145—146页。

位大尉受红衣主教委托对帕涅尔进行间谍活动，然后尽量破坏他的名声①。曼宁和张伯伦联合行动，反对爱尔兰独立战士。“神父们在谋杀我，”帕涅尔向亲近他的人说。他指控僧侣们背叛爱尔兰民族事业②。

一向敌视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梵蒂冈也帮助那些压迫爱尔兰的人。罗马教廷一贯命令爱尔兰主教们，要求爱尔兰天主教徒对英国忠顺、“温和”和放弃反抗英国统治的积极斗争③。1882年，利奥十三世在致爱尔兰主教们的信中禁止天主教徒支持爱尔兰民族运动。1887年，英政府派诺福

① 1890年张伯伦的亲信奥希起诉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因为帕涅尔和她有多年亲密关系。他这样做，很明显是受张的主使，目的在于动摇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的道德威信，使他在天主教徒面前名声扫地（见И·Н·克尔任采夫：«爱尔兰为争取独立而斗争»，莫斯科，1937年版，第149—150页）。在这一诉讼案之后，天主教主教参加陷害帕涅尔的活动，发表了反对他的特别声明（T·杰克逊：«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莫斯科，1949年版，第294—298页）。

② «E·B·塔尔列全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114页。

③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第492—493页。

克斯基公爵赴罗马代表英国女王向教皇敬献礼品。当年，教皇就派佩尔西科主教到爱尔兰研究形势，1888年发表致爱尔兰主教的教皇文告，反对爱尔兰民族运动并禁止爱尔兰人采取抵制行动，进行土地斗争及违犯与地主所订的契约①。

305

1888年4月25日（5月7日），伊兹沃利斯基由梵蒂冈报告，教皇这一文告“实际上显然是诺福克斯基公爵两次罗马之行的结果……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对我也重申官方说法：不久前发表的文告是独立自主的，但同时承认，诺福克斯基公爵以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私人朋友的身份同他秘密讨论过某些重要问题。还向我承认——显然是有用意的——宗座还打算采取其它便于英政府在爱尔兰进行活动的措施……”②

英国国王1903年访问梵蒂冈，也与英国的爱尔兰计划有关。1903年5月，古巴斯托夫报告，国王对教皇的接见非常满意，“因他（国王——舍英曼）即将到爱尔兰去并期待受到爱尔兰天主

① T·柯蒂斯：《爱尔兰史》，伦敦，1950年版，第380—381页。

②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84—85页。

教臣民的欢迎，对后者来说，国王访问梵蒂冈是件喜事”①。

梵蒂冈帮助英国统治集团镇压爱尔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

参加爱尔兰人民解放斗争的爱尔兰神甫，受到主教们的迫害。天主教神甫弗拉纳甘的遭遇就是这样，主教们不止一次停止他的教职（1900年接受教职）并加以迫害。他在暮年得出结论，天主教徒在政治上不应遵循自己神甫的指示，而应有自己的见解。在1936年的一次讲演中，他向天主教徒宣布：“世俗天主教徒在政治问题上不应追随自己的牧师，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他愿做自由国家的光荣公民，那就更应当对政治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在那次讲演中弗拉纳甘神甫还说：“……我向教皇说，除了在纯粹宗教与道德问题上之外，您并不是绝对正确的。”②

306

梵蒂冈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

梵蒂冈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与美国接近。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1，第64—65页。

② 《爱尔兰民主主义者》，伦敦，1951年8月。

当时，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不断增长，在瓜分世界的斗争中成绩卓著，一向崇拜强者的梵蒂冈主教们自然趋炎附势，向美国靠拢。此外，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天主教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作用也日益显著。

弗·伊·列宁说，美国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①。

控制美国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一向不惜采取最残酷的手段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以保障一小撮亿万富翁的统治。它们是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最凶恶的敌人。倍倍尔 1904 年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说："例如，当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时，有比大洋彼岸那个伟大的共和国对待他们更残酷、更卑鄙、更下流的地方吗？"②

除直接使用暴力镇压工人运动外，美国资产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587 页。

② 《1904 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柏林，第 41 页。

阶级自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在群众中广泛散布“美国生活方式”优越、美国资本主义特殊、它可以使每个穷人变成亿万富翁等反动思想。美国百万富翁过去重视，现在仍然重视宗教从思想上控制劳动人民，使他们安于现状的巨大作用。恩格斯在1866年写道，美国人“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习惯、迷信、降神，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荒唐的东西”①。

美国资产阶级操纵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以及其它宗教组织，将它们变成统治人民的强大工具。美国天主教自十九世纪初逐渐发展为一支巨307大的政治力量。耶稣会士在这里很快扎下根来，教会把天主教高等学校、文学界、出版界的领导权交给他们，统治阶级对待他们也特别客气②。

美国统治集团（多半信奉新教）珍视天主教会，尤其是该教会的主教们所起的反社会主义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565页。

②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473页；《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第212页。

用。美国天主教主教吉邦、阿兰德等，为使天主教适应美国国情，为使它出色地发挥资产阶级统治的支柱作用，尽了极大的努力。梵蒂冈起初对美国天主教主教这种活动持怀疑态度，担心他们搞分立主义。这是事出有因的，例如，美国天主教主教在九十年代反对华盛顿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害怕教皇代表限制他们的权力①。

但是，对分立主义的怀疑迅速消释，罗马教廷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支持美国主教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意向。

渐渐地美国天主教主教们也在梵蒂冈取得很大权势。拥有亿万财产的美国主教团向教皇金库缴纳一笔又一笔巨款，其作用是非同小可的。

1908 年，朝圣者成群结队到梵蒂冈参加庆祝教皇庇护十世即位五周年的盛典。北美朝圣者人数众多，特别引人注目。俄国驻梵蒂冈代表报告，美国人带来多少金钱的问题在新闻记者中引起很大争论。他说："……可以认为，梵蒂冈收到巨额捐款而大发横财，据可靠人士说，仅仅一位纽约主

①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 490 页。

教就代表本教区教徒献给教皇三十多万法朗"①。

美国统治集团在二十世纪初已与罗马教廷在殖民、对外政策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1898年4月，美帝以"援助"古巴反抗西班牙压迫者为名，308发动美西战争，目的在于使古巴和菲律宾服从美元统治。

麦金莱总统以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所特有的那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的腔调断言，美帝侵占菲律宾群岛，是因为美国"必须"让菲律宾人"接受文明与信奉基督教"。"对我们说来，"麦金莱宣称，"唯一的途径是占领它们（群岛——舍英曼），象对待我们的亲人一样教化菲律宾人，提高他们，使他们接受文明并皈依基督教，因为基督殉难也为了他们。"②

但当时菲律宾人早已被"基督教化"，几乎全是天主教徒，由此可见，总统这种假仁假义的慷慨陈词何等虚伪。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3，第227—228页。

② 帕·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纽约，1947年版，第73页。

对美国为争夺古巴和菲律宾而向西班牙开战，欧洲列强仅限于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照会，呼吁美国政府适可而止。它们虽然不希望美国强盛，但谁也无意与这个大国发生冲突。可是英国却积极帮助美国侵略者，指望因此而使本国在远东的霸权得到承认。

德帝国主义者对西班牙领地，尤其是菲律宾，早已垂涎三尺，但不敢轻易反对美国。他们选择另外一条途径：德国政府在开战前夕向梵蒂冈和西班牙政府提出请教皇仲裁美西问题的建议。

外交大臣伯恩哈德·比洛在1898年3月15日致德国驻维也纳大使爱伦堡伯爵的信中写道，德皇威廉二世担心，西班牙王后——摄政女王应承担殖民地长期经营不善的责任。“愚昧而又狂热地相信宗教的人民”要求她承担的责任，只有教皇仲裁审理才能减轻，因为西班牙是最尊崇教皇权威的国家①。

有人向普鲁士驻梵蒂冈公使推荐一个实现教皇仲裁的可行计划。如果西班牙战败，君主制将

① 《总政策》，第15卷，第11页。

被推翻这一条，正是为支持教皇仲裁而提出的；309 考虑到教皇在西班牙天主教徒中的威望，无论教皇作出什么决定，都会被该国接受①。

比洛向普鲁士驻梵蒂冈使者指示，考虑到天主教在美国国会中的作用，可以通过美国主教们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它同意教皇仲裁。比洛还提出一条意见：可以通过美国天主教主教们建立华盛顿与梵蒂冈在这一问题上的联系。

看来，梵蒂冈接受了德国政府的建议。3月29日，普鲁士驻梵蒂冈使者通知柏林，他同红衣主教国务卿进行了谈话，国务卿告诉他，教皇已电告大主教阿兰德，建议他前往华盛顿，坚决敦促对他友好的总统和平解决冲突②。

美西战争前夕，梵蒂冈完全支持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的西班牙君主国。亲教皇集团为西班牙一旦战败后的君主国命运担心。1898年4月，恰雷科夫向彼得堡报告："……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在数礼拜之前已向我说过，他担心，可能爆发战

① 《总政策》，第15卷，第14—16页。

② 同上，第17页；L·M·西尔斯：《美国对外关系史》，纽约，1927年版，第439页。

争（美国与西班牙之间——舍英曼），西班牙王朝可能无法避免灭亡的危险。"①

战争爆发后，西班牙失利，梵蒂冈这种担心更加厉害了。

1898年8月初，拉姆波拉同恰雷科夫谈话时又表示担心，战争继续下去，西班牙君主国可能灭亡②。

挽救西班牙教权君主制的愿望是教皇企图出任美西仲裁人的主要原因。此外，考虑到天主教会在西班牙与菲律宾的利益，罗马教廷力求使这块殖民地仍归西班牙所有。

1898年8月，俄国驻西班牙大使舍维奇报告：马德里"人士坚信，在教皇心目中，西班牙失去群岛也是对天主教的沉重打击，目前教皇正在华盛顿和马德里积极设法为西班牙保留这块殖民地，那里有八百万信仰天主教的土著，其中大多数至今处于隐修士独一无二的影响之下……"③ 310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45页。

② 同上，第97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太平洋司全宗，1898年—1900年，案卷1479，第162页。

美国天主教主教们支持压迫菲律宾的美国侵略者。教会主教为侵略者辩护并要人们相信，菲律宾归美国人管辖，天主教会将得到好处。顺便提一下，红衣主教吉邦在战争期间还为在美军中增加天主教神甫名额而操心①。一位美国学者写道，大主教阿兰德在战争期间的立场“与美国政府如此一致”（即与狂热的扩张主义者的立场如此一致），以致于失去了他一些欧洲同行的好感。阿兰德在战争期间帮助政府，在战争结束后还帮助它更换教会与修会的领导人员——撤除西班牙人，任命美国人②。阿兰德在战争期间的立场，甚至引起利奥十三世的不满③。

在这次战争中，西班牙的陆军和海军全被击溃。1898年12月10日在巴黎签订和约。根据条约，古巴宣布独立，实际上受美国保护。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也转入美国手中。

梵蒂冈非正式地参加了美西和平谈判，它担

①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530—531页。

② M·苏利文：《我们的时代》，第3卷，纽约，1930年版，第109页。

③ 《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2卷，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51年版，第1299页。

心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转到美国手中后，教会将处于什么地位。这些地区的居民——一千万人——几乎全是天主教徒。这种情况，“在梵蒂冈权威人士看来，应当使北美政府和罗马教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与往来……”①——恰雷科夫在1898年11月24日（12月6日）写道。

果然不错，虽然战前梵蒂冈支持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可是当美国战胜后，教廷便与胜利者携起手来。

1898年12月8（20）日，H·恰雷科夫向穆拉维约夫书面报告，罗马教廷根据自身得失与声望行事，美国对西班牙的无礼使它愤怒，但美国的胜利却导致白宫和梵蒂冈接近的后果……②

美帝国主义者占领菲律宾后，便动手“开发”它。首先是血腥镇压菲律宾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粉碎1898年宣布成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征服者-“基督教化者”对当地居民进行空前残酷的迫害。美国少校沃勒命令他的士兵将十岁以上的菲律宾人

311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144—145页。

② E·A·阿达莫夫：前引著作，第52页。

全部杀死。后来他被送交法庭治罪。他在法庭上说，这是他的将军斯密特下的命令。法庭宣判沃勒无罪①。斯密特将军——好战的美帝国主义代表向部队颁布的命令中说："我要你们烧杀，你们杀的越多，我越高兴。整个萨马岛内部应当变成荒无人烟的废墟。十岁以上的人均应杀掉。"②在菲律宾烧杀抢掠的美军首领是麦克阿瑟将军，过了半个世纪，他的儿子因对朝鲜人民犯下罪行而臭名远扬。

美国天主教主教帮助侵略者"开发"菲律宾。西奥多·罗斯福（自1901年任美国总统，以前为纽约州州长）在他1900年写的一封信中说，他极其希望给予大主教阿兰德和其他最闻名的天主教神甫在菲律宾以行动自由③。美国统治集团对天主教主教们的帮助非常重视，这从下列实例中也可看出：1899年6月，西奥多·罗斯福曾给麦金莱总统写信，支持美国天主教权势集团希望总统

① 《欧洲导报》，1902年5月，第402页。

② 引自《欧洲历史年鉴，1902年》，第311页；又见《马克·吐温选集》，第2卷，莫斯科，1951年版，第503页。

③ 《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2卷，第1299页。

帮助大主教阿兰德得到梵蒂冈红衣主教帽的请求①。罗斯福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提升阿兰德为红衣主教，对美国来说是件幸运的事，它对美国在菲律宾及其它殖民地的事业尤其重要②。

美国征服者还打算借助有钱有势的当地天主教教会组织巩固自己在菲律宾的统治，为此首先应当使它“美国化”。问题在于天主教是西班牙征服者在菲律宾用强制手段传布的，三百年来，教会和修道院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主要支柱之一。菲律宾群岛所有的基层教区，都由多明我派、奥古斯丁派和方济各派隐修士领导。在大多数基层教区中，神甫是西班牙政府的唯一代表，学校、整个保健事业掌握在他们手中，隐修士也是捐税征收人③。隐修会组织占有大量可经营地区，菲律宾人处于依附他们的半奴隶地位。“隐修会是最残酷的地主。集中在它们手中的土地不下四十万公顷，而且是最肥沃的土地，又在人口密集的地

312

① 《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2卷，第1019页。

② 同上，第971—972页。

③ J·H·拉塔涅：《世界强国美国（1897—1907年）》，纽约，1907年版，第82—83页。

区。许多城市和乡村建立在隐修士的土地上，他们除剥削农民劳动外，还不断提高城市房产地租。隐修士的贪婪往往引起整区整区居民暴动。”①

不久前还在为西班牙人忠心服务的菲律宾天主教教会组织，迅速适应新环境，转而为保留教会全部特权的新主子服务。

1898年9月，舍维奇由马德里报告：“西班牙神甫与隐修士在巴结他们的自私自利的西班牙行政当局的保护下实际上占有吕宋岛已二百多年，现在却以罕见的缺乏爱国主义的姿态开始同美国人调情，因为美国人向菲律宾的修会提供它们在西班牙制度下享受的那些优待……”②

1899年1月12(24)日，舍维奇报告，西班牙僧侣在安的列斯群岛与菲律宾群岛采取的立场，引起了西班牙的愤慨。“在与西班牙远隔重洋的殖民地，当地僧侣仅仅关心教会的物质利益与宗教团体的前途，在接受罗马指示的北美天主

① A·A·古贝：《1898年的菲律宾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莫斯科，1948年版，第61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太平洋司全宗，1898—1900年，案卷1479，第208页。

教主教的影响下，一旦相信西班牙为保留自己的殖民地所作的努力徒劳无益时，就公开站到征服者一边……”①

“我最后一次觐见摄政女王时，”舍维奇当时写道，“女王陛下对我毫不掩饰她对西班牙殖民地僧侣反爱国主义行为的愤慨，并向我说，近日会见教皇圣使时已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全部愤 313 慨’。”②

由于菲律宾发生群众性的反教会占有土地运动，美国政府成立以威廉·塔夫脱为首的委员会在当地研究问题并调解纠纷，在委员会的训令中说，私有产权（当时指修道院与宗教团体的私有权）不应受到侵犯③。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如果菲律宾天主教会受美国主教团管辖，将更好地为它们服务。1902年，菲律宾总督塔夫脱与主教奥戈尔曼以美国总统代表身份前往梵蒂冈。在罗马进行谈判时向教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太平洋司全宗，1898—1900年，案卷1479，第288页。

② 同上，第289页。

③ 《美国宪法》，第5卷，华盛顿，1909年版，第3162—3163页。

皇提出这样的方案：美国政府赎买西班牙修会的土地，向宗教团体赔偿战时损失；教皇在两年之内必须从菲律宾召回所有修会成员——西班牙人，取消西班牙主教团管辖群岛教会组织的权利并将这一权利交给美国主教团。

1902年7月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卡西尼伯爵书面报告，在塔夫脱与教廷谈判期间"公布大批官方文告，菲律宾群岛天主教僧侣的道德品质在文告中被美国当局丑化"①。

谈判达成协议，梵蒂冈接受美国政府建议。1902年9月颁布美国主教团接管菲律宾教会的教皇诏书。1903年2月，梵蒂冈又将古巴天主教会交给美国主教团管辖②。

1902年4月，利奥十三世在致美国主教们的信中对天主教在该国的成就表示高兴，可是数百年来一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教皇暗示法国——如今却为改革精神所控制。利奥十三世大肆314吹捧美国政府对天主教会的善意态度。

1903年，红衣主教吉邦代表总统西奥多·罗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0，第18页。

② J·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卷，第499页。

斯福携带礼品赴罗马庆祝利奥十三世即位二十五周年。他来罗马是美国统治集团与罗马教廷日益接近的表现。

利奥十三世的继位教皇庇护十世在梵法关系紧张时期的讲话中指出，虽然美国政府由新教徒组成，但它保护天主教会。庇护十世称亿万富翁摩根是“伟大而善良的人”①。

实际上，美国政府自二十世纪初与梵蒂冈已有非正式的关系②。

美国天主教徒人数不断增加，依靠大量群众组织的天主教会日益强大，成了美国的重要政治因素。

1912 年 3 月布拉策尔书面报告：“北美天主教的成就迫使罗马教廷特别关心那里人数众多的教徒群众并与美国政府保持尽可能友好的关系……”③

① R·G·马格洛斯基：《创业年代的美国保守主义》，纽约，1951 年版，第 132 页。

② 《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 5 卷，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52 年版，第 335 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库，第 2 办公厅全宗，1912 年，Ⅱ-5，案卷 106，第 1 页。

梵蒂冈自十九世纪末又在拉丁美洲国家展开积极活动。1898年12月25日，教皇向拉美国家主教发布文告，通知他们1899年5月在梵蒂冈召开拉美各国全体主教宗教会议①。会议于1899年5月28日开幕。恰雷科夫报告："据红衣主教拉姆波拉说，在这次宗教会议上提出通过拉拢西班牙继续发展泛拉美团结的问题，西班牙原是大多数美洲共和国的宗主国。"②

最初，"泛拉美团结"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亲西班牙反对美国向拉美国家渗透的性质，但以依靠最强者为常规的罗马教廷，很快便帮助美国向拉美国家渗透，而天主教的"拉美团结"成了美国对这些国家政策的工具。

美帝国主义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315 它将一系列有信奉天主教居民的国家（南美、菲律宾）置于自己的控制与监督之下，它敌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些都是促使梵蒂冈与美国统治阶级接近的原因。

因此并不奇怪，罗马教廷的主要同盟者与希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5页。

② 同上，案卷7，第180页。

望——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它开始争取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恢复教皇世俗权力问题。

综上所述，关于罗马教廷的国际政策与这一政策自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演变，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梵蒂冈作为巨大的国际宗教中心，依靠传统势力与遍布世界的天主教教会组织，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国际生活施加影响。

梵蒂冈在上述历史时期的国际生活中不起独立的作用，它追随当时比较强大的国家或强国同盟。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各种势力与派别，在梵蒂冈内部明争暗斗。究竟哪种方针最后占上风呢？利奥十三世曾经打算建立三国皇帝与教皇的联盟以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随着瓜分世界的不同强国集团利益逐渐界限分明，梵蒂冈日益倒向德国及其盟邦奥匈帝国。当确信与意大利结盟的德国不愿在“罗马问题”上支持教皇后，罗马教廷曾在一段时期转向法国及其盟邦俄国。但是，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梵

蒂冈又同德奥同盟长期联合，直到大战结束始终忠于这一同盟。

梵蒂冈国际政策的这一基本方针并不妨碍罗马教廷保持与巩固同其它国家的关系：它必须表面上严守中立，以免动摇它在天主教徒中的威信。

依靠一个强国集团的方针也不妨碍罗马教廷与一切国家合作共同反对社会主义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第五章　梵蒂冈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

316

帝国主义时期传教活动的特点

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少数强国瓜分了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并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殖民奴役制度。殖民者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它们变为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弗·伊·列宁在第二共产国际说："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①

"当我们着手研究英国人在印度的经济政策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3页。

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道，“就会看到，印度人民现在的贫困化是这一政策的必然后果。这种贫困化毫无神秘之处……”①

“南罗得西亚矿山百分之五十五的土著死于因饥饿而产生的各种疾病……儿童死亡率是：从尼日利亚的千分之三百，到肯尼亚的千分之四百。在烟草种植园中，非洲人一年的平均工资为三十三先令，而一个英国‘监工’的工薪为一千英镑。”② 法属刚果的人口1900年为八百万——一千万，1921年则减为二百八十万③。比属刚果的人口最初曾达四千万人，1900年下降至一千五百五十万，1933年下降至九百四十万，1938年为一千零三十万④。

317

为了替自己统治殖民地人民进行辩护，殖民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莫斯科，1955年版，第321页。

② 《西奥多·德莱塞文集》，第12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106页。

③ 帕克·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纽约，1947年版，第114页。

④ 让-保罗·加鲁阿：《非洲——死亡的土地》，莫斯科，1954年版，第218页。

主义者创造了种族论——上帝创造白色老爷的上等种族来统治世界，又创造殖民地奴隶的下等种族来为前者干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道："……自英国人统治的第一天起，我们在印度就认清了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这种统治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老爷民族'和统治种族的思想体系，而政府的结构正是以它为基础的；统治种族的思想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统治者明确地宣布这种思想。然而他们的行动比言词更具有说服力，整个印度和每一个印度人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遭受欺凌、侮辱和蔑视。他们告诉我们说，英国人是统治种族，上帝亲自赐与他们管理我们并使我们处于从属地位的权利；如果我们反抗，就提醒我们注意'统治种族的虎权'。"①

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们断言，殖民主义强国给被征服国家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文化"等等，但在事实面前这种论调是不堪一驳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其它许多国家的人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349页。

民都有本国数千年的古老文化，而殖民主义者却阻碍这些国家文化的发展。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们指出，占有殖民地的强国在殖民地国家中创办学校，带来了欧美的医学成就、现代技术、通讯工具，等等①。实际上，殖民地国家的学校教育至今水平仍然极低，并首先用来培养儿童对侵略者318的顺从精神。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帕克·托马斯·穆恩写道（他的书出版于1926年），殖民地的国民教育费少得可怜，儿童就学率极低。阿尔及利亚每一千名居民中就学儿童仅占四十六名，马达加斯加——四十点五名，突尼斯——二十二至二十八名，法属西非和喀麦隆——三名，比属刚果——二十六名，英国殖民地乌干达——五十名，南非——四十名，黄金海岸——十二名，尼日利亚——七名（有的资料上说——一名）②。

---

① 参阅：肯尼思·斯科特·拉图列特：《中国的发展》，纽约，1946年版，第163—164页；福斯特·雷亚·杜勒斯：《中国与美国》，普林斯顿，1946年版，第41页；P·H·B·肯特：《二十世纪在远东》，伦敦，1937年版，第228等页。

② 帕克·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第559—560页。

南罗得西亚1934年初等教育经费的支出情况是：当地居民十万名儿童的教育费用为五万英镑，欧洲人八千名儿童的教育费用为十六万英镑。可见，一个欧裔儿童的教育费用比一个当地儿童的教育费用高出四十倍。在初等教育中也实行种族歧视政策①。

至于高等学校，即使在殖民地国家某些地方创办起来，也首先是为了给殖民行政机关培养崇拜征服者的文化和蔑视本国民族文化的奴仆，而能够进这种学校的只有极少数当地居民特权阶层，主要是封建阶层的子弟。建立为数极少的医疗和慈善机构是为了证明征服者对他们所压迫和奴役的各族人民的"关怀"。至于技术、现代通讯工具等等，帝国主义者为剥削殖民地需要多少就带来多少。

传教士组织过去和现在对巩固和维持殖民统治都起巨大作用。基督教传教士们伪装成"真正宗教"的传布者，似乎对世俗事务漠不关心，采用比侵略军更巧妙的手段来实现巩固殖民主义者的

① G·帕德莫尔：《英帝国如何统治非洲》，伦敦，1936年版，第40页。

统治，使殖民地的劳动人民相信殖民主义制度的神圣性和“白种人”的优越性，扼杀他们反对征服者作威作福的精神。

资产阶级学者们也承认，传教士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宣传者。Д·霍布森在他的《帝国主义》一319书中（用列宁的话来说，该书作者“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①）写道，在基督教布道和教会的整个传教活动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写道：“‘基督教帝国主义者’有一定的声望，在某些社会集团中‘工业传教士’的声誉很高，后者的目的是在有利可图的事业的无限广阔的天地中传播基督教，利用教授实用技艺的间隙宣传宗教教条……”②

霍布森引用了英国驻广东领事的报告中的一段话，领事写道：“如果在中国的各种传教士团成员能够和我国的领事们共同从事开发该国的工作并且象宣传神学教条一样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宣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738页。

② Д·霍布森：《帝国主义》，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165页。

扬商业思想，就能够给予我们的商业以巨大的帮助。”霍布森指出：“英国领事承认基督教的商业效用这段话是再坦率也没有的了。”①

传教士作为殖民侵略者的先锋队来到殖民地国家：最先来的是传教士，接踵而来的是商人，然后是侵略军。

穆恩写道，传教士“教给土著穿衣服和使用工具，为商人开路，商人又引来了军舰”②。

朝鲜历史学家李清源写道：“欧美资本主义侵入朝鲜是从基督教传入我国开始的。基督教会……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先锋队，在朝鲜实行侵略政策……继传教士间谍潜入之后就开始了外国公然武装入侵朝鲜的活动。”③

传教士起着间谍，有时甚至是外交官的作用。1882 年，艾伦以美国新教传教士的身分来到朝鲜。“……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三年，一步一步地走过了由一个普普通通的传教士、美国间谍机关

① п·霍布森：《帝国主义》，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165页。

② 帕克·穆恩：《帝国主义与政治》，第 64 页。

③ 李清源：《朝鲜近代史概论》，莫斯科，1952 年版，第 27 页。

的密探到美利坚合众国公使的漫长道路。”①

320 与帝国主义以前时期的传教活动相比，十九世纪末期以来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传教活动有它本身的一些特点。这首先表现在传教活动完全服从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由此产生出它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外交人员与武装力量的紧密联系。传教士既是他们所在国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收集者，又是外国和资本主义商行的直接代理人。美国进步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写道：“……美国的传教士生活奢侈。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国外某些地方受到谴责和理所当然的非难……这些新的社会阶段的腐化的传教士，生活在他们认为需要自己效劳并为之造福的国家中，他们蹂躏该国的人民，俨然以全权主人自居。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的表现就是这样。”② 德莱塞指出，现代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新特点是它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有直接的联系：“……作为教会的使者，我们的传教士同时又是

① A·多勃罗夫：《日俄战争时期美国的远东政策》，莫斯科，1952年版，第164页。

② 《德莱塞文集》，第11卷，第270页。

美国工业的特使，他们主要忙于经营工业……他们的全部思想就是关心‘物质福利’，即关心如何在当地居民中推销澡盆、缝纫机、电器生活用具和冰箱——总而言之，推销美国托拉斯化工业所制造的一切商品。”①

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有一位研究者在1900年写道："他们活动的重要性仅仅由他们挖掘中国内部秘密的多少而定。传教士作为商务代办受到极大的重视，不是在推销商品方面，也不是在传播基督教和欧洲文化垃圾方面，而是在提供有关该国动态的情报方面。”②

关于二十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在朝鲜的情况，宗教阵营的代表——朝鲜东正教传教士团首脑，一个根本不反对传教士活动的人写道："一般美国人所具有的实用主义在传教士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朝鲜给他们起了一个不大好听的外号‘商贩’……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我们也可能碰到关于美国传教士中的不光彩的流言蜚语和事 321

① 《德莱塞文集》，第11卷，第271页。

② 《东方学院学报》，第2卷，第3分册，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年版，第190页(摘自E·Γ·斯帕利文教授的报告)。

实：N放高利贷，X用商业活动代替了鸣钟祈祷……”①

著名的俄国地理学家和旅行家M·维纽科夫，关于上个世纪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情况写道：“下列事实将使人们充分了解这些罗马天主教的伪善行为、贪权图利的代表们所宣扬的宗教道德。耶稣会士在徐家汇有一座天主教图片和塑像工厂，他们将产品出售给中国基督教徒牟取厚利。在这家工厂里，‘为了使中国人尊敬天主教’②，耶稣基督被画成穿着中国式厚底靴的人，天堂被画成完全象中国城市一样的堡垒，如此等等……徐家汇工厂还购买中国儿童，强迫他们在修道院工厂里从事无酬劳动，每天八——十个小时。这种农奴般的生活一直延续二十年，然后工人们，不言而喻，皈依基督教，那些已经熟习耶稣会士商业的人被宣布为自由人，成为购销商品的代办，而能力差的人就为耶稣会种田、种菜，给耶稣会

① 隐修神甫帕维尔（伊万诺夫斯基）：《朝鲜基督教传教士团的现状》，符拉迪沃斯托克，1904年版，第70—71页。

② 陪同我参观徐家汇工厂的耶稣会士向我这样解释（M·维纽科夫注）。

士当轿夫，等等。"①

1902年1月，俄国外交部驻奉天官员科洛科洛夫向俄国驻北京公使写道，天主教传教士在奉天省已有很大势力并取得中国当局完全不干涉其教徒群众生活与事务的特权。他们开始干涉该省的政务；他们庇护为逃避罪责而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

这位官员又说，新教传教士与天主教传教士不同，他们通过慈善事业赢得居民的好感，但是"如果说新教传教士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那就是喜欢在本职工作之外经营各种各样的商业，有时近似于做小买卖。他们之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某种经纪人或商务代办，某些人甚至用自己的钱经 322 商或冒险……"

这份有关在中国的传教士情况的文件还说："传教士的活动一般来说并不限于单纯的宗教宣传。他们研究人民及其生活方式、性格与特点，同人民经常密切接触。这种优越地位使他们完全可能看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并在某种程度上左

---

① M·维纽科夫：《现代中国概论》，圣彼得堡，1874年版，第63—64页。

右这些现象。传教士这样的地位早已受到重视，他们被利用来收集必要的情报——政治性的。这样，传教士便具有了不公开的政治间谍作用，不仅向这个或那个政府提供它们感兴趣的情报，而且还按照他们收到的指令通过巧妙的方式向居民和官员灌输这种或那种思想……”①

综上所述，宗教宣传不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唯一活动。不仅如此，宗教宣传和慈善事业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间谍从事政治活动最方便的掩护，传教士实际上就是这种间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非其它国家也是这样。

由于传教活动成了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主义强国便将传教组织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在它们强迫附属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有传教士及其组织和信奉基督教的居民规定特权的专门条款。

传教士习惯于指靠本国政府的军事援助，而不指靠自己宗教宣传的影响。上个世纪末，英国海军上将理查斯在写给政府的一份正式报告中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80，第97—99页。

说：在中国，“传教士团体显然故意地在国际条约规定的欧洲人定居区之外居住。这样安排好住处之后，他们就……大喊大叫地要求炮舰来保护……”①。“保护传教士”、捍卫他们的特权，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日益成为列强向殖民地国家施加压力并对它们进行武装侵犯的借口。

32 3

用武力为传教士取得的特权和列强的庇护使传教组织成了国中之国，不受当地政权机关的管辖，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为他们在当地居民中的信徒不断争取特权。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入基督教的往往是追求物质利益或逃避罪责的人。我们在《东方学院学报》1901年合订本中看到关于这种情况的报导：“国际条约给西方和美洲的各种可疑分子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打着宣传基督教义的旗号追求比劝说新的教徒群众相信基督教真理更为自私的目的……分布在中华帝国各地的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士团，有大量的钱财，首先引起沦为中国社会渣滓的人的注意，这些人希望轻而易举地获得生活资料，在传教士（对受洗礼

---

① 《东方学院学报》，第3卷，第1分册，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年版，第40页。

的人重量而不重质）金钱施舍的引诱下皈依了新的宗教，他们并非出自信仰，而纯粹出于自私自利的企图……正派人永远不会入基督教的信念在中国逐渐形成并巩固下来。"①

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象法国和英国这样国家的比较老的传教士团受到德国和美国传教组织的排挤，而新教传教士团则受天主教传教士团的排挤。俄国驻梵蒂冈代办（H·博克）在1913年7月2(15)日写道，法国的传教活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由于德国政府支持其臣民的传教活动，千方百计地鼓励，德国人乘机成了法国传教士的继承者（在远东有一部分法国人已为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所代替）……"②

属于同一种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却往往属于不同的国家，他们代表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又与其它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他324们为巩固本国的地位而在殖民地互相争斗。瓜分

① A·鲁达科夫：《义和团及其在最近远东事件中的作用》，载于《东方学院学报》，第2卷，第3分册，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年版，第168—169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4，第51页。

非洲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例子①。同时，他们又结成统一战线，一贯（并正在）反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巩固殖民主义制度的斗争，是帝国主义时期传教组织全部宗教政治活动的基本内容。

他们活动的主要领域是思想领域（虽然他们远不以此为限），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的重要补充。毛泽东在1939年写道，除了采用军事的、经济的、外交的和其它的压迫中国的手段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②。

① 1919年11月30日，被殖民地国家反帝斗争搅得惶惶不安的教皇本笃十五世颁布了教皇《夫至大通谕》，其中写道，殖民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团将本国的利益置于“神国”的利益之上，这一点使他感到痛心。教皇又写道，这将使“多神教徒”疏远基督教。他教导说，传教士应当为基督而不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但是教皇的训诫却改变不了担任本国政府间谍的传教士活动的整个内容。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48页。

梵蒂冈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开展广泛的传教活动。利奥十三世——帝国主义时期的第一任教皇，十分重视天主教会在殖民地的传教活动。他在位期间在非洲和亚洲建立了许多宗座代牧区和教区：1879年——在塞内加尔和黄金海岸，1882年——在达荷美，1883年——在费尔南多波，1884年——在尼日尔河上游，1886年——在法属刚果，1889年——在尼日尔河下游，1897年——在法属几内亚，等等①。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在中国也建立了许多天主教传教士团。

俄国驻梵蒂冈代办沃尔康斯基公爵在1911年9月报告了罗马教廷在东方、美洲和非洲广泛
325 进行传教的情况。他写道，罗马教会的传教士在当地居民中有很大的权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那些已取得梵蒂冈好感的国家来说，天主教在遥远的异国能够成为多么巨大的推动力……”②

梵蒂冈的传教政策与罗马教廷的国际政策有紧密的联系。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梵

① E·索德里尼：《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140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30，第111—112页。

蒂冈日益依靠德皇帝国，宗座也愈来愈积极地支持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团——德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

1903年5月，当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随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梵蒂冈时，他接受接近耶稣会士的法维埃主教（遣使会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的建议，会见了耶稣会总会长马丁。耶稣会首领向瓦德西伯爵论证，允许耶稣会士到德国去对德国有利，因为耶稣会士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影响的斗争，此外，同耶稣会来往，强国可以从中得到有利于本国殖民主义政策的好处。马丁指出，英国在它的殖民地中得到耶稣会的好处，例如，耶稣会"将印度划分为五个修会省"，每个省中有二百五十至四百名耶稣会士①。

所以，传教活动是教皇国际政策的王牌之一。

在帝国主义时期，梵蒂冈传教活动的方法改变了。罗马教廷考虑到，殖民地人民不相信过去那些同殖民主义者有密切联系的传教士，所以采取从当地人中培养天主教干部的方针，指望他们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柏林，1923年版，第212—213页。

比外国人更受居民的信任，可以有助于削弱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梵蒂冈这一方针完全符合列强在殖民地为自己树立由当地居民上层剥削分子组成的支柱的政策。但是同时，教会组织和传教士团中的关键性职位却仍旧保留在外国僧侣手中。

例如，梵蒂冈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教会组织，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还没有一位天326主教主教是中国人。与此同时，自1900年起当地普通僧侣的比重却开始比较迅速地增加（外国僧侣仍然占多数）①。

① 肯尼思·斯科特·拉图列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伦敦，1929年版，第557页。以后的年代仍然保持着这种状况，下列介绍殖民地国家天主教传教士团情况的资料就可以证明：

	1925年	1936年
外国神甫	8196	11847
当地神甫	4516	6660
外国兄弟	3187	5624
当地兄弟	732	2645
外国姐妹	12944	23820
当地姐妹	11158	25435

（《大英百科全书》，第15卷，1951年版，第600页）

与此同时，天主教的仪式与教会的实际活动也逐渐改变以适应当地的宗教习俗，当地最流行的宗教节日和仪式被纳入基督教的礼拜活动。耶稣会士在此以前也曾这样做过。但梵蒂冈通常拒绝批准这样的做法。这种情况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改变，梵蒂冈为了传教活动的顺利而开始同意将当地的一些仪式纳入天主教的礼拜活动。例如，1911 年传信圣部满足了散得维齿群岛（夏威夷群岛）僧侣的要求，允许在该地焚尸时举行祈祷①。

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们美化传教士在殖民地的

关于非洲英国殖民地天主教会外国与当地神职人员人数的对比，有下列资料（1956 年）为证：

	外国教士	当地教士
肯尼亚	297	10
尼亚萨兰	160	36
乌干达	361	120
坦噶尼喀	734	174

（《天主教国际消息》，巴黎，1956 年版，第 22 期）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梵蒂冈进一步采取使天主教适应当地宗教观念习俗的步骤。1936 年，梵蒂冈准许日本天主教徒参加神道教的宗教典礼——视天皇为神和敬仰阵亡将士。时隔不久，梵蒂冈又准许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供奉祖先的古代风俗。

活动，但抹杀他们帮助殖民者对亚洲、非洲、南美洲人民进行奴役这一事实。辩护士的著作将传327教士描绘成"文化传播者"，而利奥十三世的传记作者索德里尼伯爵则把这位教皇写成反对奴隶制的战士①。利奥十三世确实在1890年发布教皇通谕反对贩卖奴隶，他说，基督教会一向致力于消灭奴隶制。但是历史事实却完全相反。

文献中提供的有关贩卖奴隶的资料如下：1666年至1766年，仅仅英国人就贩运到美洲的英属、法属和西班牙属殖民地三百万奴隶（二十五万死于途中）；1680年至1786年贩运到美洲英属殖民地二百一十三万名奴隶；仅牙买加就吸收奴隶六十一万名；自1716年至1756年底，运入美洲各殖民地的奴隶每年平均七万人。共计运出奴隶三百五十万。1752年至1762年，仅牙买加就进口奴隶七万一千一百一十五人；1759年至1762年，瓜德瓦普岛进口奴隶四万人；自1776年至1800年底，运入美洲各殖民地的奴隶平均每年七万四千人，而运出奴隶平均每年一百八十

① 见E・索德里尼：《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140—142页。

五万名（平均每年：英国人运出三万八千名，法国人运出两万名，葡萄牙人运出一万名，荷兰人运出四千名，丹麦人运出二千名）①。

直至十九世纪仍然进行大规模贩卖奴隶的活动。1808 年至 1860 年有二十多万奴隶运进北美南方各州，其中：1808—1820 年运进六万名，1821—1831 年运进五万名；1831—1840 年运进四万名，1841—1860 年运进七万名②。

当把人作为猎物并将他们卖为奴隶时（不是一年，而是数百年），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在哪里呢？那时罗马教廷为奴隶制辩护，而教会也不忌讳从贩卖奴隶中得到收入。例如，关于葡萄牙人早期贩卖奴隶的情况，我们看到过如下的记载："所有的黑人——男人、女人和儿童，在被带上镣铐装船运走之前，神甫给他们举行洗礼……教会从这项业务活动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因为它向每个黑人（吃奶婴儿除外）索取三百列伊③

① E·莫雷尔：《黑人的重担》，伦敦，1920 年版，第 19 页。

② G·帕德莫尔：《英帝国如何统治非洲》，第 22 页。

③ 列伊——货币单位。——译者

作为洗礼费。"①

美国的天主教会在十九世纪中仍然捍卫黑人奴隶制。罗马教皇也是如此。1839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颁布关于贩卖奴隶的教皇通谕，他在通谕中说反对贩卖奴隶，但不反对奴隶制。教皇发328挥了下述思想，即虽然奴隶的命运很苦，但他与"永远得救"不是势不两立的，虽然奴隶制是灾害，但它对于善良主人的奴隶并不是灾害，何况奴隶身分也不是升入"天堂"的障碍②。

184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当时的国务卿福齐特援引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的教皇通谕，企图将天主教会与废除奴隶制度运动联系起来。为了帮助教会摆脱奴隶主们的这种指责，美国著名的天主教头面人物之一英格连德主教发表了一系列致国务卿的信件，论证国务卿的指责是不正确的，教皇写的是反对贩卖奴隶但不反对奴隶制。他写道，教会在历史初期不是谴责，而是承认奴隶制，

---

① 德雷克·卡尔滕：《非洲啊，非洲》，莫斯科，1955年，第18页。

② Th·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第342页。

在《新约》和《旧约》中是允许奴隶制的①。大家还知道，教皇庇护九世同情美国南方的奴隶主，而不同意废除奴隶制。

十九世纪末期，教皇利奥十三世无须顾忌同有权势的政治力量反目的危险就可以反对贩卖奴隶，因为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过时了。现在连主张肆无忌惮地剥削殖民地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府也摆出了坚决反对奴隶制和贩卖奴隶的姿态。

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在十九世纪末期一方面发表反对奴隶制的言论，一方面却在殖民地依靠传教士与传教组织全力以赴推行另一种比较现代化的奴隶制——殖民奴役制。

梵蒂冈、传教士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

关于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实质，弗·伊·列宁简明扼要地阐述如下："1895：……掠夺（'瓜分'）中国。（日本+俄国+英国+德国+

① J·墨菲：《1825—1925年美国天主教对移民与黑人态度之剖析》，华盛顿，1940年版，第42—43页。

法国。)"①

中国历史学家胡绳举出下列事件，说明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1899年英国强占港口威海卫并将长江流域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沙俄侵占旅顺口和大连并将满洲与蒙古视为自己329的霸权与特权范围；德国侵占胶州湾并控制山东省；法国迫使清政府承认它在云南和两广部分地区的特权，将广州湾作为它的租界；日本除按照马关条约占领台湾外，取得对朝鲜的控制并强迫清政府声明，中国永远不将福建省及其附近岛屿让给其它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瓜分中国……"②

同其它列强一起瓜分中国的还有美国。1898年美国总统麦金莱向国会宣称："在中国沿海的部分地区落入他国手中的关头，美国不能坐视不管……如果我们不愿被列强排挤出去，就应当参与中国的事务。"③

每个侵占一部分中国领土的国家，必然派自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775页。

② 胡绳：《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莫斯科，1951年版，第114页。

③ 钦本立：《美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莫斯科，1951年版，第33页。

己的基督教传教士到它选作“势力范围”的那些中国地区去。这样一来，传教活动也划分势力范围。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除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外）有下列天主教组织：耶稣会、卡普勒修会、多明我修会、奥古斯丁修会、特拉普修会、遣使会及其它修会——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比利时的，等等。1889—1890 年中国有六百五十七名天主教传教士（和一千二百九十六名新教传教士）①。到了 1907 年，中国已有四十三名天主教主教，而在天主教传教士团中，除修女修士（两千多人）外，仅神甫就将近两千人(外国神甫将近一千四百名)②。这时新教传教士有三千五百多人。天主教传教士团渐渐超过新教传教士团。1926 年中国有天主教传教士七千名以上，而新教传教士的人数在 1936 年才达到六千名。 330

① 肯尼思·斯科特·拉图列特:《中国的发展》，第 163 页。

② B·沃尔费尔斯坦：《中国的天主教会》，伦敦，1909 年版，第 449 页。在 1901 年发表的梵蒂冈传信圣部报告中举出下列资料说明十九世纪末天主教传教士与天主教机关在中国的情况：

	1895 年	1898 年	1901 年
传教士	1016	1168	1375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大批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被派往中国。据档案资料统计，1907—1913年期间仅取道俄国到中国去的就有：一百名左右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布鲁塞尔传教士团），维也纳传教士团、巴伐利亚黑衣教士传教团、德国"神联会"的传教士，英国、法国、瑞典、美国的传教士。

在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都附有规定传教士特权的条款。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条款中说："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①1858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中写的几乎还是这些话。中美天津条约中有一条的内容是：美国传教士将在中国享有自由并受到保护。中法天津条

教会	3119	3930	4126
教养机构	2739	2962	3614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第132页）

① Э·格里姆：《远东国际关系史条约及文献汇编》，莫斯科，1927年版，第59页。译文引自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外条约汇编》，1936年版，第6页。

约中也规定了传教士的特权，包括他们在中国各地活动的权利。

天主教传教士干预中国的政治生活，力求获得对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的司法权①。“当局审理案件时，不敢作不利于基督教徒的决定；征收捐税时，对老百姓敲骨吸髓，但对以传教士为后台的基督教徒却不敢索取分文。”②

1895年7月29日，俄国驻福州领事向上级报告了在距福州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公里处传教士被杀的情况，同时他发表意见说，传教士干涉中国人的私事并庇护中国基督教徒是使许多坏人为掩盖自己的非法行为而加入基督教的主要原因；这引起了非基督教徒对传教士的敌视③。 331

中国当局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不得不向传教士提供越来越多的特权。1899年3月15日中国皇帝下旨颁布关于中国当局同天主教传教士相互关系的规定。教皇驻北京代表(宗座代牧主教)法维埃主教参加了这些规则的制定工作。圣旨规

① 《欧洲导报》，1881年1月，第432页。

② 胡绳：《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史》，第89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80，第32页。

定，各天主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与相应等级的中国官吏平起平坐①。

随着列强奴役中国的斗争日益尖锐，它们之间围绕着传教士活动问题的斗争也加剧了：各个国家都为自己的传教士争取最大的特权。因此，有关所谓“保护”在华基督教徒的争论也激烈起来（同时，如上所述，围绕“保护”中东和近东基督教徒的问题也进行着斗争）。

法国自路易十四世以来就享有保护在华所有天主教传教团的权利。传教士在同中国当局发生误会时应请求法国外交代表协助解决。这种状况加强了法国的地位。法国对在华基督教徒的保护权也得到梵蒂冈的承认。俄国驻梵蒂冈代表H·恰雷科夫在1898年3月31日(4月12日)向彼得堡报告，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团“自路易十四世起就受到法国的特别保护，法国极其热心地维护它那由宗座和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保护权”②。

德帝国主义自从投身殖民主义冒险活动后就

① H·F·马克奈尔：《中国近代史》，上海，1923年版，第586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第49页。

开始注意中国，德国政府反对法国的保护权。德国统治集团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天主教主教安泽尔（1897年这位主教被中国皇帝提升为满清官吏）①。

给予法国保护权第一次打击的是德国。经过安泽尔主教的努力，从前象中国所有天主教传教团一样处于法国保护之下的山东省德国天主教传教团，在1891年终于改由德国保护。同时，柏林内阁还敦促它的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还有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按照它的先例去争取保护本国传教士的权利②。 332

为了进一步动摇法国在中国的地位，德国统治集团中又产生了一个促使梵蒂冈与中国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计划，果能如此，对在华“基督教徒的保护”就成为教皇圣使的事，而不是法国的事了。俄国驻北京公使在1892年5月28日向彼得堡报告：“而且据我所知，梵蒂冈与中国政府已经背着法国开始秘密谈判，谈判通过驻北京和罗马的德国外交人员进行，其目的是向北京派教皇

① Th・德瓦兰：《当代争夺东亚的精神斗争》，第28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80，第9页。

圣使……"①在这份紧急报告中，公使还报告法国驻北京公使列麦尔和中国天津总督李鸿章，由于法国贸易在中国的地位和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护问题，发生了冲突。争论时，"怒气冲冲的总督，忘记了一切，向法国代表出示了反对该国保护权及规定向北京派教皇圣使的协议草案。在这份草案中提到，拥护这一草案的人中除山东的德国主教安泽尔外，遗憾的是，还有法维埃神甫——遣使会的法国神甫，他属于北京主教辖区，以极其聪明、虚荣、活跃而闻名。"②

对天主教传教团的保护问题，俄国公使写道，最近向不利于法国的方向急转直下。"它的解决显然受三国同盟首脑德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得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不同意将自己的责任，虽然是沉重的责任，交给三国同盟中的一个国家，即德国或者更可能是奥地利，而放弃这一责任将给它在欧洲和中国的威望以致命的打击。"③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80，第9页。

② 同上，第10页。

③ 同上，第10—11页。

德国政府和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中国建立教皇 333
圣使馆的计划使法国统治集团极为不安。俄国政府在梵蒂冈的驻办公使伊兹沃利斯基在1894年1月25日（2月6日）向彼得堡写道，新任法国驻北京公使热拉尔于赴北京途中在罗马停留，谋求教皇接见并向他探听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事务的观点。由于过去曾有过在北京建立圣使馆的尝试，"法国政府密切注意使教皇方面不采取任何有损于法国对天朝帝国天主教传教团保护权的措施。"① 按照伊兹沃利斯基的说法，"由于法国坚决要求"，利奥十三世放弃在北京建立圣使馆的计划，但是梵蒂冈又产生了一个在北京建立固定的天主教主教辖区的计划。同时，教皇向热拉尔保证，法国的保护权将仍然有效。

罗马教廷中在保护权问题上采取敌视法国立场的是红衣主教列多霍夫斯基——传信圣部长官②、罗马教廷亲德政策的拥护者。

综上所述，梵蒂冈积极参加了列强奴役中国的斗争，同时罗马教廷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明显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80，第22页。
② 同上，第23页。

地倾向于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法国与罗马的正式关系断绝后（1904年），梵蒂冈更加支持德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法国对在华天主教徒的保护权在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实际上被取消了。①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大批到中国去的传教士除德国的外还有美国的(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士)。中国历史学家钦本立写道："在参加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帝国主义最善于掩饰自己的侵略行径。他们采取杀人不见血的侵略方式——334这就是所谓宗教文化投资。据勒麦估计，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零四千八百八十九美元。这个数字高于向中国政府的贷款数额……这些投资绝大部分不是分散在大城市，而是偏僻的地方……宗教文化投资不是集中于沿海一带，而是分散于内地。这是企图在国内每一个偏僻的角落建立桥头堡，在"文化"、"上帝"、"慈悲"的掩护下训练中

① 1906年1月，法国驻北京大使向中国政府声明，根据法国教会同国家分离的原则，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将仅处理有关法国传教士的事务，其它国家的传教士有事应请有关国家的使馆处理。这时法国的保护权实际上已不存在。

国人民认敌为友……”①

尽管美国形式上教会与国家分离，该国政府仍然向中国为美国传教士争取特权。1903年美国同中国签订的贸易协定中就规定了美国传教士的特权，其中之一是传教团在中国各地有占有财产的权利②。Б·威廉斯(匹兹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写道，“在华的美国人有一半同传教团有联系。”③

中国的俄国外交代表指出，中国有人数众多的美国传教士。原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谈到他1895年的北京之行时写道：“……轮船上使人感到吃惊的现象是，携带妻子儿女赴中国的美国传教士非常之多。”④ 俄国驻中国代办1911年向彼得堡外交部报告，“相当多的美国传教士”居住在

① 钦本立：«美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莫斯科，1951年版，第74页。

② Н·В·莫尔斯、Н·F·马克奈尔：«远东的国际关系»，波士顿——纽约，1931年版，第496页。

③ В·Н·威廉斯：«美国外交»，纽约，1936年版，第127页。早在1926年前，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大天主教团体中有一半来自美国（K·S·拉图列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第716页）。

④ 尤·索洛维约夫：«我的外交工作二十五年»，莫斯科，1925年版，第30页。

甘肃省和陕西省①。

美国传教士帮助本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巩固阵地。1910 年 12 月 2 日，俄国驻中国公使科罗斯托维茨由北京报告，美国人极力争取中国人，努力使中国人相信，“无私地”捍卫中国完整的国家只有美国一个。科罗斯托维茨写道，“封建政府的335努力受到美国社会、商业和实业界人士以及许许多多在华传教士的热情支持。”② 美国历史学家写道，在华传教士与华盛顿的决策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和长期的联系③。

美国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建立鼓励传教士活动的天主教专门机构。1896 年在芝加哥附近开办了天主教专门学校，主要是为中国培养传教士。1911 年美国的大主教们批准建立大型的传教士团体“美国天主教国外传教士协会”。中国是这个组织的和其它美国传教士组织的主要活动对象之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 19 卷，第 1 册，第 183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 133，第 531—532 页。

③ R·范阿尔斯廷：《美国外交在行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德市，1947 年版，第 354 页。

一。

俄国沙皇政府在其对华殖民政策中也努力依靠传教组织，首先是东正教会。某些著名的俄国外交家考虑到中国人民对传教士的敌意而表示反对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但正教院与俄国贵族权势集团却主张鼓励东正教的传教活动。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尔夫在1904年2月29日致正教院总检查官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写道，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能"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引起有极大危险的麻烦"，因此，拉姆兹多尔夫写道，"我向您极诚恳地请求，您是否认为可能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办法使居住在中国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停止活动，直至远东政治生活恢复平静时为止……"① 波别多诺斯采夫在1904年3月7日给拉姆兹多尔夫回信时写道，正教院"注意到，我在华东正教传教团的传教活动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可能引起有极大危险的麻烦……""命令至圣的佩列斯拉夫斯基（北京俄国宗教代表团团长）采取一切他可能采取的措施，暂时停止归他所管的神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82，第6页。

职人员的传教活动，直至远东政治生活恢复平静时为止。”①

336　沙皇政府并未长久地停留在这种小心谨慎的立场上。北京宗教代表团团长英诺森（早在1902年已提升他为主教并授予他“佩列斯拉夫斯基”的称号），开始广泛开展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这引起了如上所述的驻北京俄国代表的抗议。

1907年2月，驻北京公使波科季洛夫就英诺森主教的活动一事向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写道：“在我向帝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中，我曾不止一次地说明自己对在中国扩大东正教传教活动问题的看法。我一向认为，我们在这里没有传教士是我们在中华帝国政治地位的最大优点之一，我斗胆上陈，如果人为地鼓励此地的东正教传教活动使我们在中国本来已不轻松的任务愈益复杂化，则是我方极大的错误。西欧与美国的经验相当雄辩地说明，由于传教士与土著居民和当局冲突而经常发生多么讨厌的麻烦。”② 波科季洛夫又写道：“如果认为必须在中国传播东正教”，那么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82，第7页。

② 同上，案卷188，第2—3页。

首先不应当在中央地区进行，而应当在靠近俄国的边境地区进行，按照波科季洛夫的说法，“东正教布道者的活动可以与俄国经济领域先驱者的进军协调一致”①。波科季洛夫容许东正教会在接近俄国的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传教活动，认为它在那里将为沙皇政府的政策服务。

沙皇政府不反对利用在中国的东正教传教士。它还准备利用天主教传教士为它效劳。俄国财政部驻巴黎代表1909年向彼得堡写道，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远东思想界的情绪，利用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为己效劳看来是合适的，由于他们经常直接同居民来往，所以有可能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变化②。财政大臣科科夫策夫阅后认为需要将此事通知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

在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看来，传播基督教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奴役中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民知道，传教士同外国商人、外交人员和敌视中国的其它力量一样，所依靠的是那些不平等条约和

337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88，第2—3页。

② 同上，案卷180，第102页。

外国军队。因此反传教士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更正确地说，当时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团并不是因为他们痛恨外国的宗教，而是因为当时传教团在中国人眼中是帝国主义侵略最直接的代表。”① 以写中国闻名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写道，基督教宣传在这个国家不很成功。“基督没有进入中国的生活……我们一个半世纪的全部传教活动所留下的痕迹没有古代景教的多，这指的是沙漠中风雨侵蚀、被人忘记的碑铭，这时不禁产生一种想法：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②

帝国主义列强以“保护”传教团和传教士为借口进行对中国的军事讨伐，对中国居民进行空前未闻的暴力镇压，最后往往以强迫中国签订新的奴役性条约而告终。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和1900年在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的指挥下列强联合镇压人民起义的历史，可以作为这方面的鲜明事件。

① 胡绳：《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第134页。

② 《德莱塞文集》，第12卷，第40页。

传教士与德国侵占胶州湾

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在1886年结成“泛德意志协会”，他们制订了在全世界侵占殖民地的大规模计划，侵占中国的领土，其中包括胶州湾，就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①。

这个海湾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就被德国的扩张主义者看作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合适基地②。　338

1895年3月11日，侵占胶州湾的前几年，德国外交大臣冯·马夏尔男爵向海军大臣戈尔曼海军中将写信说明为德国海军在中国攫取加煤站与军港一事必须马上开始准备工作。信中指出，德国驻北京大使认为山东的胶州湾与澎湖列岛适用于这一目的③。同年4月17日，戈尔曼海军中将在复信中提出了侵占中国领土的计划。他的侵

---

① 见俄国驻柏林大使1901年1月4日呈外交部负责人拉姆兹多尔夫的紧急报告与关于泛德意志协会的呈文。《红档》，第1(92)卷，1939年版，第220页(文件上港湾的名称是Киао-чао)。

② 《德意志帝国殖民政策文献》，莱比锡，1938年版，第123页。

③ 《总政策》，第14卷，上册，第6页。

略计划所包括的许多目标中就有胶州湾①。

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在回忆录中写道，从军事角度来看，胶州湾最适于作德国海军的据点和基地②。

综上所述，侵占这一部分中国领土以便进一步深入中国的问题，在德国统治集团中早已预先决定。为完成这一任务进行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准备。需要的仅仅是一种借口，而且是能够把侵略者打扮成“基督教文明拯救者”的借口。

1895 年 9 月 23 日，威廉二世在致外交部与海军上将冯·克诺尔的电报中写道：“最近获悉，由于中国国内风潮四起，大规模迫害基督教徒并非不可能之事。广东事件招致英国集结大批军舰。在德国传教基地附近亦须驻泊德国军舰。”③进攻中国的理由定为：“可能发生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威廉命令德国军舰开往中国并停泊在山东半岛附近。在此之前不久，1895 年 8 月（19）

① 《总政策》，第 14 卷，上册，第 10 页。

② 《冯·阿尔弗雷德·蒂皮茨回忆录》，莱比锡，1920 年版，第 62 页。

③ 《总政策》，第 14 卷，上册，第 16—17 页。

31 日，威廉打电报给帝国首相霍恩洛厄说他打算侵占中国的领土，"为了象在其它方面一样不落后于英国人或法国人"①。

德国驻北京大使建议本国政府迅速行动。进攻中国并强占它领土的最好借口，根据他的意见，是中国迟迟不满足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的申诉②。 339

促使统治集团以"保护"德国天主教传教士为借口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的还有在华德国天主教主教安泽尔。德国驻北京大使说，安泽尔主教曾不止一次抱怨说，德国天主教传教团丝毫得不到当局和老百姓的尊敬，并要求为他的传教团采取紧急有力的行动以引起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尊敬。不然的话，安泽尔暗示，他的传教士可能强迫他重新要求法国保护，而法国的保护确实比较有效③。

当然，"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并不是德国统治集团主要关心的事。俄国驻北京代办巴甫洛夫在 1897 年 3 月向彼得堡外交大臣报告，德国驻北京

① 《红档》，第 2（87）卷，莫斯科，1938 年版，第 27 页。

② 《总政策》，第 14 卷，上册，第 26 页。

③ 同上。

大使盖金格男爵对中国外务总理衙门采取步骤，要求将中国的海湾之一让给德国以便建立德国军港。这里说的就是胶州湾。巴甫洛夫写道："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设备完善的军港和商港，按照盖金格男爵的意见，将使德国一方面有可能大大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另一方面巩固德国在中国的贸易地位，因为这样的港口以后可以成为德国商品的堆积站，就象现在香港是英国商品堆积站一样。"① 从巴甫洛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大臣坚决反对把胶州湾出让给德国②。

胶州湾问题是1897年8月威廉在彼得戈夫拜会沙皇时，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谈判的题目③。沙皇政府最后终于牺牲中国，与德国妥协，这种立场为德国帝国主义者实现其目的减少了困难④。

正好在这个时候，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杀死了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德国统治集团

① 《红档》，第2（87）卷，第31页。
② 同上，第34—35页。
③ 同上，第31页。
④ 《外交史》，第2卷，第125页。

对这一杀人案拍手称快：他们现在有了盼望已久的出兵理由。现在德皇威廉二世可以装扮成“基督教的捍卫者”去强占中国的领土，对中国居民采取屠杀和恐怖手段了。340

1897年11月6日，德皇命令海军上将冯·季杰里赫斯立即率舰队开赴胶州湾并占领它。在同日发出的致外交部电报中，德皇说，对袭击在我的保护下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一事，要通过德国海军积极干预的办法索取“高价赔偿”，德国舰队应立即开赴胶州湾，占领附近的中国领土，如果中国政府不马上用重金赔偿损失，如果不对凶手进行有效的追缉和惩处，就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威廉又说，他坚决主张在东亚，如果需要的话，采取“最残酷的毫不留情的”行动，以便让中国人看到，“德皇不是好惹的”。威廉说，采取这种行动，更为必要的是，他以此能够向自己信奉天主教的臣民，包括教皇权力至上论者（指中央党）证明，他关心他们的幸福，他们可以指望他的保护①。

① 《总政策》，第14卷，上册，第67页。

在1897年11月7日致外交大臣比洛的电报中，威廉二世掩饰不住自己对杀害传教士一事的喜悦。他写道：“这样一来，中国人终于向我们提供了……热切盼望已久的理由和机会。”指的就是此事。威廉还说，他决定立即出兵，因为根据从东亚回来的人的书面、正式、非正式和口头报告的全部情况看来，勿庸置疑，目前的时机对德国的目的、威信和发展商业的前景来说是决定性的时刻。德皇再次提到他曾命令在中国采取坚决行动并以惩罚相威胁，然后又说：“成千上万的德国基督教徒得知德皇海军就在附近时，将松一口气，千百名德国商人意识到德国终于在亚洲站稳脚跟时将为之欢腾，而千百万中国人感觉到德意志帝国铁拳就在他们眼前挥舞时，将吓得发抖。”①

德皇威廉这个目光短浅、残酷而又爱面子的容克贵族，给比洛打了这样一份兴高采烈的电报，它是一篇发展商业、渴望屠杀和“保护基督教徒”341 的大杂烩。他坚信，在“保卫基督教利益”的体面借口下对中国进行血腥报复是上帝的恩赐。

① 《总政策》，第14卷，上册，第67页。

在1897年11月7日(10月26日)致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威廉也装扮成“基督教的保卫者”，而尼古拉二世模棱两可的回答只能起鼓励威廉的作用。威廉在向沙皇述说杀害德国传教士一事时写道：“我应当惩罚这些中国人。”威廉电告沙皇，德国舰队开赴胶州湾，以便从那里动手：“我必须让德国的天主教党看到，我能够保卫他们……”德皇在电报末尾武断地说：他所采取的对中国人的“惩罚”是“必要的并将给全体基督教徒带来好处”①。

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德皇在他的电报中常常提到他应当尽他对天主教党的义务。过去是反对党的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益卷入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政策。威廉以保护天主教传教士的口号掩护他对中国的军事征讨，使天主教政党更加依附于他。

杀害传教士之后数日，德国舰队开进胶州湾，接着陆战队登陆。德皇威廉在1897年11月30日

① «1894—1914年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往来书信»，莫斯科——彼得堡，1923年版，第21页；«总政策»，第14卷，上册，第70页。

的国会演说词中是这样为这一强盗行径辩解的：“杀害德国传教士和袭击我皇权庇护下的我所关心的在华传教机关，使我不得不派遣我的东亚舰队到距肇事地点最近的胶州湾并让部队登陆，以达到彻底报复之目的与得到此类悲惨事件不再重演的必要保证。”①

德国不仅要求中国当局“惩罚肇事人”并付给天主教传教团赔偿费，而且首先要求给予德国商人和企业家一系列特权。按1898年3月6日的条约规定，德国有权利在任何时候在距胶州湾五十公里的范围内自由通行，“租用”该湾入口处两面的地区九十九年并有权在该地区建筑工事②。342 同时，中国还向德国提供在山东省修筑两条铁路的租让权和一系列矿山的租让权。这样，整个山东省实际上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而德国侵占胶州湾成了英国、法国、日本和沙皇俄国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借口。杀害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竟成了威廉德国武装侵占中国领土

① 《欧洲导报》，1898年1月，第408页。

② J·霍费耳德：《德意志帝国文献》，第1卷，第317—318页。

的借口，全部情况使人有理由推测这一行动的挑衅性质，而插手这一行动的可能有德国间谍。北京外交界人士认为，自传教士被杀之后“德国人走运了”①。俄国驻北京代办巴甫洛夫1897年11月2（14）日向彼得堡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写道，即使不发生杀害传教士事件，“德国公使或德国舰队司令无论如何也要在最近期间制造某种新的事件，使德国政府可以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1897年12月1日，英国驻日本大使萨托乌向在伦敦的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报告：“杀害德国传教士的消息传出之后，紧接着就是侵占胶州湾，行动之神速简直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是一种阴谋。”③

宗教界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呢？耶鲁大学教授、基督教传教史学者拉图列特写道，杀害传教士成了德国政府侵占中国领土和要求在山东省的专有特权的借口。“可能，”拉图列特补充说，

① 尤·索洛维约夫：《我的外交工作二十五年》，第56页。

② 《红档》，第2（87）卷，第44页。

③ 《英国有关大战起因的文件，1898—1914年》，第1卷，伦敦，1927年版，第3页。

"起码罗马天主教当局的某些人对此是不会不满意的。"① 确实如此，天主教当局，特别是德国的，对德国帝国主义因杀害传教士而获得实现其准备已久的对华扩张计划的适当借口感到满意。

山东省德国天主教主教安泽尔，在杀害传教士的那些天身居柏林，他掩饰不住自己对这一杀人事件的喜悦。他宣布："那是我们战友的流血343牺牲，它将把德国鹰引到华东去。"②

据德国副国务大臣冯·罗滕甘男爵1897年11月7日的记事录记载，安泽尔主教曾向他表示希望德国利用形势"占领胶州湾——这是一个对我们在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最好的和有最大发展前途的据点……"③ 11月16日在觐见德皇威廉时，安泽尔主教对德国在中国的行动表示满意；他说，德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放弃胶州湾，它将来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比现在的上海还要重要。这位东方天主教会的主教宣称，德国占领胶州湾

① K·S·拉图列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第498页。

② Th·德瓦兰：《当代争夺东亚的精神斗争》，第28页。

③ 《总政策》，第14卷，上册，第76页。

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因为这是大家早已预料到的事。①

总之，对安泽尔主教说来，也象对泛日尔曼主义者营垒里的德国扩张主义者一样，杀害两名德国传教士是天赐良机，是使他们有可能在“保护基督教传教士”的借口下在中国侵占根据地的侥幸事件。

侵占胶州湾也受到德国天主教会其他头面人物的欢迎。1897年12月15日，布列斯拉夫尔大主教、红衣主教柯普向威廉致贺电，祝贺派遣以德皇兄弟为首的德国舰队到中国去“保护十字架”。

因此事而向德皇致电祝贺的还有波兹南与格涅兹诺大主教斯塔布列夫斯基。他说，他的祈祷将伴随着率领德国舰队开赴中国的德皇兄弟，使基督的十字架在远东有可靠的保护并继续前进。

在答复这些贺电的回电中，威廉再次撒谎说，他的兄弟到远东去大兴问罪之师是为祖国效劳和“保护十字架”。德皇向柯普写道，他为有对祖国和教会同样忠诚的人的祈祷伴随亲王出行而感到

① 《总政策》，第14卷，上册，第76页。

高兴。①

高级天主教僧侣支持谎言并亲自散布谎言，说德国政府的行动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神职344人员为侵略辩护，其中有些人还主张对中国人进行残酷的报复。

安泽尔主教要求严厉惩罚"肇事人"，坚持要从这一事件中不仅为德国的工商业，而且为天主教会牟取最大的利益。

在德国政府的坚持下，两名无辜的中国人被处决，许多人被逮捕。中国政府答应付给天主教传教团一笔赔款，并出钱修建三座天主教堂及一所供传教士住的房屋。

1898年2月8日，在德国国会讨论预算时讨论了东亚政策问题。外交部大臣冯·比洛在发言中说，德国政府早就认为必须在东亚占有一个为经济、军事和政治目的服务的据点，作为进入中国的门户。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比洛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德国应当象其它强国一样进入这个市场。从比洛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侵占胶州湾

① 《欧洲历史年鉴，1897年》，第167—168页。

的问题早已预先决定了。但是比洛也认为需要利用“保护基督教”这个借口。在承认德国在中国追求经济、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后，比洛说，德国承担了保护在山东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传教团的责任之后，不是把实现这种保护看作自己的义务，而是看作光荣；对于我们来说，比洛继续讲道，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些传教团的代表安泽尔主教明确说出的话：巩固德国在胶州湾的地位是关系到传教团在中国继续存在的生命攸关的问题。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针对比洛的发言发表演说，他揭穿了德帝国主义者在华行动的百分之百的掠夺性质并强调指出，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之事仅仅是入侵中国的借口。倍倍尔说，如果传教士不被杀害，也会发生别的杀人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首领李伯尔不仅赞成政府的殖民侵略政策，而且还对政府“保护传教士”表示感谢。他提醒说，中央党“从传教任务的角度看”，一开始就支持政府的殖民政策。李伯尔欢迎侵占胶州湾并表示希望现在德国

345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1897—1898年»，第2卷，柏林，1898年版，第895页。

也能够做到其它强国为保护传教团所做的事。①

天主教会人士与中央党的天主教政客是德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及其它国家进行殖民侵略思想的积极提倡者。

德国（和其它国家）的殖民主义者不止一次提出“保护基督教徒”的口号作为向中国提出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借口。俄国驻北京公使吉尔斯 1899 年 3 月 28 日向彼得堡写道，德国向中国政府要求铁路租让权，但没有成功。于是“柏林内阁”便提出山东迫害基督教徒的问题并利用侮辱德国工程师一事向益州派了一支二百人的队伍……②。

同年 5 月 21 日吉尔斯报告，德国驻北京公使同中国政府完满地结束了关于修筑铁路的谈判③。

梵蒂冈、传教士与 1900 年的人民起义

1900 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起义（或书中常

---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1897—1898 年»，第 2 卷，柏林，1898 年版，第 906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 116，第 36 页。

③ 同上，第 86 页。

说的“拳民”起义)。这次人民起义是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积极行动……”①

“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也遭到专制君主(中国本国的——舍英曼)的反对,后者不认真支持爱国运动,只耍阴谋诡计,恶毒欺骗中国人民”②。

沙皇政府外交部常任委员Φ·马尔滕斯教授在他1900年编写的关于在中国爆发的起义的简要报告中指出,引起这次起义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是:难以忍受的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基督教传 346 教士的活动。马尔滕斯写道:“欧洲人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的剥削已经残酷到极点……如果说英国臣民的虚伪欺诈和贪财图利使中国人产生仇恨和蔑视,那么由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和‘最惠

---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55年版,上册,第483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50年版,第403页,此处应为:“……义和团运动则是中国人民自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译者注)

② 胡绳:《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第141页。

国'原则，这种仇恨和蔑视的感情必然会扩散到一切外国人身上。"①

马尔滕斯又写道，"引起目前这场惨祸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中国人的特点是对信仰问题毫不关心，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信仰自由的国家。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在其祖国的活动漠不关心。1858年的天津条约成了基督教疯狂地倒行逆施的根据，于是基督教在正派中国人的眼中便成了使他们义愤填膺无限仇恨的对象……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国中之国，他们的新教同行也努力争取这样的地位。法国与其它天主教强国把支持天主教传教士这种最有害的要求看作自己的光荣责任。英国、美国和德国认为自己在庇护新教和英国国教传教士极其不合理的要求方面决不应该落后于天主教强国。在这种情况下，神圣的基督教在中国变成了最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和最强烈的无政府要求的遮羞布。传教活动动摇了中国的国家基础，使无政府状态蔓延，这引起

① 《红档》，第1（20）卷，1927年版，第179页。

中国人民的优秀阶层对基督教及其代表人物的深切痛恨……"①

这些话就是沙皇政府外交部负责官员对基督教传教士活动的评价。按照他的说法，违背中国人民利益的传教活动是反传教士运动经常发生的原因。Ф·马尔滕斯写道，"在中国人民看来，欧洲的文明是地狱的产物，基督教是'洋鬼子'用来消灭中国人的正常秩序、福利、良好的风俗和数 347 千年文化的有利工具……"② 这是不足为怪的。

人民起义使殖民者惊慌起来。英、德、美、法、俄、日等列强国家政府，派遣德国陆军元帅冯·瓦德西指挥的八国联军到中国去。它们的目的是镇压起义，用恐怖手段威吓中国人民，巩固外国侵略者的地位，维持中国的反动、软弱的封建制度，由于它愿意接受帝国主义的一切要求，对它们曲意奉承，卑躬曲膝，因此得到它们的支持。

美国总统麦金莱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表示："……知道暴动者正在搅乱中华，贵国皇室对他

① «红档»，第1（20）卷，1927年版，第180页。

② 同上，第180—181页。

们决不姑息纵容……，我国乐意为贵国尽力效劳。"①

为了替八国联军辩护而提出一种论点：似乎中国人起义是为了反对"白种人"，而派八国联军是为了帮助基督教传教士并保护他们。特别坚持残酷镇压起义的威廉二世，在他1900年7月22日致外交大臣比洛伯爵谈出兵中国问题的电报中企图使人相信，他所关心的仅仅是基督教传教士与其机构的命运。威廉说，传教士丢下他们的事务听天由命，传教站也被摧毁，"可能同时还有基督教徒牺牲"。德皇没有忘记提醒人们他同梵蒂冈和天主教中央党的合作。他在这份致比洛的电报中说，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大声疾呼和坚决声明并在梵蒂冈保证过把保护我们传教站的责任改由我们自己承担。不言而喻，这项任务应当通过恢复传教站的途径来完成。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梵蒂冈就会认为法国人是正确的，而我们将失掉中央党天主教徒的支持"②。

德皇建议出兵占领中国最重要的地方并保证

①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莫斯科，1951年版，第46页。
② 《总政策》，第16卷，第67页。

传教士……和铁路工程师在中国工作的可能性：威廉首先担心的是德国在中国的铁路租让合同的命运，但是为了替正在准备进行的军事远征辩解，这种理由确实是不太体面。 348

当外国列强可以用“保护基督教传教士”这种纯宗教理由为军事讨伐再次掠夺中国进行辩解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威廉二世在侵占胶州湾时就利用了这样的借口。而在1900年又以此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新的军事征讨。

弗·伊·列宁在他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揭露了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讨伐的全部罪行。列宁写道，欧洲各国政府“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①。弗·伊·列宁痛斥沙皇政府参加瓜分和掠夺中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15页。

国，他写道："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①

弗·伊·列宁揭露主战派种种说法的虚伪性，什么中国人民的起义似乎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他写道："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 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②

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最先向本国政府提出派遣武装力量镇压义和团运动。

1900 年 5 月 7 日，吉尔斯向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报告：北京天主教传教团团长法维埃主教写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17 页。

② 同上，第 214 页。

信给法国驻北京公使比松，他在信中惴惴不安地 349
报告了人民运动发展和反基督教活动的情况。这封信末尾提出了调海军陆战队来“保护我们本人和我们的财产”① 的请求。

法国公使接到主教的信后，就向外交使团团长建议立即召集外国代表讨论此事②。外交使团团长召集外国代表会议，“讨论根据天主教传教士的申请调海军陆战队问题”，会议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残酷镇压、逮捕和处决运动参加者的要求③。

派往中国镇压人民起义的帝国主义军队在中国的活动极端残酷。1900 年 7 月 27 日，威廉二世在不来梅欢送德国赴华士兵，要求他们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不留俘虏（“谁落到你们手中就消灭他！”），要求他们象匈奴那样留下千年不忘的可怕印象；这个“基督教骑士”宣称，要用你们的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 117，第 156—167 页。

② 同上，第 165 页。

③ 《欧洲导报》，1900 年 8 月，第 821—822 页；又见 H·B·莫尔斯、H·F·马克奈尔：《远东国际关系》，纽约，第 462 页。

武器杀得一千年内没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对德国人白眼相加！他又补充说："上帝祝福你们。"

参加远征的德国及其它国家虔诚信仰基督教的战士们，尽心竭力地完成了德皇的屠杀与消灭的命令。

联军总司令冯·瓦德西伯爵残酷异常。

"作为普鲁士容克贵族军阀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瓦德西一向主张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政治压迫甚至军事暴力来镇压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①

他对中国人民起义采取的军事镇压和恫吓措施则更加残酷。请看当时报刊对瓦德西及其所指350挥的军队的报导吧。"代表列强发号施令的瓦德西伯爵……把人数众多的讨伐队派向四面八方去惩罚和毁坏那些支持中国义和团的地方……许多大小村镇被毁灭了，这些村镇的居民被怀疑同义和团有来往，——象一份紧急报告中说的那样——'给土著造成尽可能深刻的印象'。"②

---

① A·C·耶鲁萨利姆斯基：《十九世纪末期德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与外交手腕》，第69页。

② 《欧洲导报》，1900年12月，第806页。

据英国记者报导："在北京和天津欧洲士兵驻扎过的房屋里，可以看到成堆的尸体，有男人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的，甚至还有家畜的；各种不同年龄的妇女，先遭到强奸，然后被刺死……"①

1900年7月3日，俄国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由天津报告联军进入该城时的烧杀奸淫的情况："多么残酷的战争。不留俘虏，把受伤的人都打死。这比任何非洲战争还残酷。"②

俄国驻北京财政代办波科季洛夫，1900年8月9（22）日打电报向财务大臣报告英、日、俄、法、美五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情况。他写道：军队"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屠杀和平中立的中国人并拼命地抢劫。日本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③

瓦德西本人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提供了联军进行巨大破坏的情况④。按他的说法，各个国家的

---

① 《欧洲导报》，1901年6月，第820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775，第39页。

③ 同上，第4页。

④ 见《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第20、48页。

部队互相争夺掠夺冠军的称号①。在德国报纸上登载的信件中德国陆海军士兵“天真坦率地叙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惨状，同时还坚信不必用我们通常的道德概念对待中国人……”②

关于法军在中国的活动，1900年12月上海一家报纸报导：“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报告，法军占领了涿州并烧毁了这座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351 中国人损失四尊大炮，有一千士兵被击毙，法国人没有任何伤亡。”③美国官兵同其它国的讨伐者一起参加了联军在中国进行的残杀和掠夺④。

参加掠夺的还有传教士。“在谈到联军与传教士向北京进军的表现时，《每日快报》和《寰球》周刊战地记者乔治·林奇先生写道，英国兵头一、两天没有参加洗劫北京的活动，直到他们看到大家都这么干时，才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抢劫。

---

① 《欧洲导报》，1901年6月，第821页。

② 见《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第36页。

③ 《东方学院学报》，第2卷，第1册，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年版，第211页。

④ 刘大年：《帝国主义侵华史》，第45页；又见《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第37页。

军官率领队伍出去抢劫，抢来的东西送到英国大使馆去拍卖。东西从各处抢来：店铺、私人住宅，大部分是被遗弃的住宅……传教士是最会搞无组织抢劫的人。军队抢劫终于被禁止。但这一禁令与传教士无关，他们继续从有钱的中国人家里搬东西并出售他们抢夺的一切。他们还强迫他们的教民从私人住宅和商店给他们不断地拿东西来。”①

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写道，传教士也参加了外国列强军队在中国的烧杀掳掠：“当时从公使、统兵将官、兵士、教士、普通外人以至翻译、汉奸、一部分教民都参加了这个‘文明’兽行，天主教把它叫作‘发洋财’（«保安教传»）。”②

关于传教士参加瓦德西伯爵指挥下的联军所组织的抢劫活动的情况，1901 年马克·吐温也作过描写。在抨击性文章«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中，他引用了纽约«太阳报»上登载的一则来自中国的

---

① «东方学院学报»，第 2 卷，第 2 分册，1901 年版，第 145 页。“据一名英国记者报导，掠劫物的拍卖，除星期日外，每天在英国使馆的柱廊下进行……”（«欧洲导报»，1907 年 6 月，第 821 页）。

②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文版，第 378 页。

报导，其中包括一位美国国外传教团干事会的圣352阿缅特先生发表的讲话，他到中国各地访问归来，在中国得到了补偿起义时所受损失的“赔款”。

《太阳报》说，“他无论到达什么地方，都强迫那里的中国人付给他钱。”他不仅让中国人赔偿基督教徒全部被毁财产，而且“还额外索取比战败国赔款高出十三倍的罚款。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教义”①。《太阳报》写道：“阿缅特先生声称他比一些天主教徒得到的赔偿少得多，天主教徒除了得到金钱外，还杀人偿命……”这位教会代表阿缅特不否认传教士参加了对中国居民的迫害、抢劫，他还称赞“德国人的铁拳”。在评论阿缅特的讲话时，马克·吐温愤怒地写道，他“在财政舞台上建立功勋”是为了用这些被鲜血染红的金钱来传播福音教义……②

参加联军的列强，要求中国政府“惩办肇事人”并“赔偿损失”。中国应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中国政府应处决许多起义的参加者，为外国遇难

① 《马克·吐温选集》，第1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496页。

② 同上，第498页。

外交官树立纪念碑。传教士特别坚持“赔款”这项要求。在中国许多地方向老百姓征收特别捐税，用收来的钱酬劳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士①。除此还允许他们本人向居民征收“赔款”②。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传教士在本国公使的支持下担负起保护在拳民运动时期受难的中国基督教徒利益的责任③。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传教士便极力设法不仅要保留他们原有的特权，而且要保障新的特权。1901年北京的英美传教士向英国和美国大使提出正式声明，坚持要求在即将同中国缔结的条约中规定保护与鼓励传教士的措施。此外他们还要求承认过去条约中有关保护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基督教徒及其特权的一切条款。请求书中说：“……我们希望在修改条约时明确规定传教士有在该国居住及租用和购买他们进行活动所必须的 353

① 《远东现代大事记》，载《东方学院学报》，第3卷，第1册，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年版，第114页。

② 同上，第9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118，第229—230页。

不动产的权利。"① 写声明书者要求，传教士在该国旅行时能受到保护，要求鼓励"传教士与中国官吏友好往来"。

人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对中国人民表现得最残忍的是传教士这些宣传"基督之爱"与"宽恕一切"的伪善人。

吉尔斯 1901 年 2 月 9 日由北京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大多数公使，部分由于遵照本国政府的指示，主要由于他们所庇护的传教士影响，表现得异常残酷。他们的根据是英国公使在我们同中国全权代表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原则：拳匪首领中罪行最轻者也应判处死刑，因此，对一切犯罪的人只有一种惩罚——那就是死刑，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死刑……"② 吉尔斯写道，关于惩处罪犯问题的谈判暴露了"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中那些不光彩的方面。这些传教士的绝大多数，不论他们属于哪一教门和哪个民族，都是主张用火与剑来报复中国多神教徒对他们的迫害

① 《远东现代大事记》，载《东方学院学报》，第 2 卷，第 3 册，1901 年版，第 330—332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 118，第 11 页。

这一思想的主要鼓吹者，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我的一位对待中国人并不特别宽容的法国同事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看到天主教主教要求惩处的无限长的中国官吏名单时气得怒发冲冠。比松先生(法国驻北京公使——舍英曼)说，许多特别忠于天主教的法国军官向他说，他们的宗教情感受到传教士所做所为的严重侮辱，这些传教士常常跟着讨伐队并以村民迫害基督教徒为借口唆使军官们烧毁整个整个的村庄……”①

梵蒂冈与各个国家的天主教主教们对向中国派遣联军表示赞同。 354

联军司令冯·瓦德西陆军元帅在赴华途中向德皇报告(1900 年 8 月 25 日)，当他在罗马短时间停留时，“许许多多的天主教僧侣以最积极的方式参加了”② 对他的欢迎仪式。瓦德西在1901年 6 月 1 日由中国向德皇作的报告中指出，天主教主教对他表示特别热烈的感谢③。值得注意的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中国科全宗，案卷 118，第 13—14 页。

②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 3 卷，第 10 页。

③ 同上，第 142 页。

是，甚至这个戴着“基督教保护者”假面具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赞美传教士的征讨者也承认，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之中有的人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挣钱的手段，因此他们开办各种企业赚钱。瓦德西写道，他本人曾见到过在行军医院和营房中象商人一样做买卖的传教士①。

义和团运动暴露出长期积存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对传教士的怨恨和敌视，它搅得梵蒂冈人士惶惶不安。俄国驻梵蒂冈代表恰雷科夫 1900 年 6 月 6（19）日报告，梵蒂冈国务卿拉姆波拉红衣主教接到驻北京宗座代牧主教法维埃汇报情况的电报后，“对北京的事件极为担心”，他“通过驻巴黎圣使向德尔卡塞先生提出，请求法国政府对在华天主教徒给予保护，因法国有对他们的保护权。德尔卡塞先生回答，他将同其它国家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②

梵蒂冈外交人士极力袒护传教士。1900 年 6 月 20 日（7 月 3 日）恰雷科夫向拉姆兹多尔夫写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 3 卷，第 76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7，第 55 页。

道，按照红衣主教国务卿拉姆波拉的意见，肇事者，更准确些说，是德国人，他们在胶州湾空前粗暴地侵占领土，最先引起了中国人的义愤与痛恨……"①

1900年7月4（17）日，俄国驻梵蒂冈公使馆临时负责人萨宗诺夫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他同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就中国事件进行了谈话。拉姆波拉极力驳斥一部分欧洲报刊的观点，它们力求把中国反基督教运动的责任强加在传教士身 355 上。萨宗诺夫写道，按照拉姆波拉的意见，"义和团运动是纯粹的政治运动，其矛头一方面针对外国人，因为他们抱着强占领土与大发横财的目的入侵中国，在同人民交往中既不顾惜其民族自尊心，尤其不顾惜中国人极为强烈的个人尊严，另一方面针对无力抵御外侮的王朝。"②按照拉姆波拉的意见，传教士与中国基督教徒受迫害"不是由于他们代表的宗教教义与群众格格不入，……而是由于他们是中华民族与民族文明的敌人"③。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67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同上。

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大体上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运动产生的原因。但是这并不妨碍梵蒂冈支持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和鼓励传教士帮助侵略者。至于不受中国人民欢迎的清王朝，拉姆波拉同萨宗诺夫谈话时说，最近“在教皇同摄政太后之间甚至有了意义重大的接近”，这表现在他们首次互相交换信件和礼物；他们之间的牵线人是法维埃主教，按照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的说法，法维埃受到“中国皇室的特别敬重”①。这样，梵蒂冈既同帝国主义者合作，也同中国人民所仇视的中国皇帝的政府合作。

拉姆波拉向萨宗诺夫重申不久前对恰雷科夫说过的话；他对在中国的德国外交人士和德国其他代表的行动方式与手段作了指责。“……按照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的说法，德国人是现在这次起义的罪魁祸首……”②

红衣主教拉姆波拉不止一次向俄国驻梵蒂冈的代表们说过下述想法，即俄国应当同法国一起在宗座的帮助下在中国进行与其它国家“自私自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77页。

② 同上。

利的动机”相反的活动[1]。

梵蒂冈赞成坚决镇压人民的起义。1900 年 7 月 18（31）日，萨宗诺夫向拉姆兹多尔夫写道：红衣主教拉姆波拉“象过去一样继续对中国事件的发展情况极为担心……我从红衣主教国务卿的话中发现，他怀疑在镇压现在的反朝廷运动之后，是否能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原则不受侵犯。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这一运动的后果可能仅仅是 356 无政府状态的继续和进一步杀戮外国人……”[2]所以，梵蒂冈主张将中国进一步划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

从萨宗诺夫的报告中还可以看出，梵蒂冈人士满意地注视着镇压部队在中国的行动[3]。

梵蒂冈象列强政府一样，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向中国政府要求“赔偿费”。1900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6 日），萨宗诺夫报告，拉姆波拉等待北京宗座代牧主教法维埃到罗马来。法维埃来的原因是罗马教廷希望了解中国的情况。萨宗诺夫写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7，第 68、78 页。
② 同上，第 83、84 页。
③ 同上，第 108 页。

道，“红衣主教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准确地查明我们传教团所受破坏的程度并考虑为恢复被破坏的东西筹款的问题……”红衣主教说，梵蒂冈打算向中国政府要求赔偿费，而这个问题将是“梵蒂冈与法国政府专门讨论的题目”，法国政府“这次将以罗马教廷全权代表的身份行事”①。

1900年12月，法维埃主教到梵蒂冈来听取有关列强代表在北京谈判问题的指示。法维埃在宗座关心的事务上是教皇和列强代表的中间人②。

1900年12月19日（1901年1月1日），恰雷科夫就此事向彼得堡报告，按照法维埃的意见，把中国的太后“看作反动分子是错误的”；“主教将北京的革命者比作‘巴黎公社’，从起义中看出社会内幕……”③

法维埃在梵蒂冈是反映法国对华政策的人，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132—133页。

② 《东方学院学报》，第2卷，第3册，第289—290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176—177页。

他也认为“侵占胶州湾地区”是起义最直接的导火线。

德国政府也努力要在梵蒂冈获得对德国在华政策的支持。1900年8月，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到罗马逗留一天，参加意大利国王古姆贝特的葬礼。虽然在罗马逗留的时间如此之短，亨利亲王仍然受到教皇的接见，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在向萨宗诺夫说这件事时，“带着明显的满意神情，虽然极为审慎”。萨宗诺夫写道，根据他的尚未核实的 357 消息，亲王觐见教皇与中国事件有关。1900年8月1（14）日，萨宗诺夫向彼得堡写道：“我知道红衣主教拉姆波拉不赞成德国在远东的政策，希望引起他开怀畅谈，因此我发表意见说，教皇大概不会错过机会通过亲王向德国政府建议在中国推行欧洲文明的事业中要明智和慎重。从红衣主教尽管是极其含糊的回答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亲王受命争取教廷支持德国的政策，其办法是给目前在罗马的山东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团长安泽尔主教作符合德国政策意图的指示……”①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7，第205—206页。

梵蒂冈主教们对瓦德西的血腥活动持肯定态度。1903年5月瓦德西访问梵蒂冈时，耶稣会总会长马丁感谢他对北京天主教传教团作了"有效的支援"①。瓦德西指出，耶稣会总会长是梵蒂冈最有权势的人物。因此，他对瓦德西在中国的行动的看法反映了梵蒂冈最有权势的人物的意见。瓦德西说，教皇利奥十三世也欢迎他并对"他在中国为基督教徒，尤其是为天主教传教士所做的事"②表示感谢。就是在那个时候，教皇授予瓦德西一枚梵蒂冈勋章表彰他为教会建立的"功勋"。这就是梵蒂冈对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反应。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代表对在中国的战争也提出抗议。他们揭露"保卫欧洲文明"、"保护基督教"等口号的虚伪性，这些口号只不过是政府向中国派遣军队的借口。弗·伊·列宁痛斥帝国主义列强，其中包括俄国沙皇政府，因为它们挑起了对中国的战争③。列宁强调指出，俄国

① 《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3卷，第212页。

② 同上，第211页。

③ 见《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16页。

工人阶级和俄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政策。

1901年2月31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德国国会发言反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反对国家对他们的保护和给予他们特权。他说，传教士对1900年的事件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倍倍尔还说，许多中国人，并不是好人，皈依基督教，因为这将使他们得到一定的好处。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官吏平起平坐，在法庭上袒护不应受到袒护的教友，这在中国人中引起了痛苦的感情。 358

倍倍尔引证了一系列文件，其中有多年任德国驻华大使冯·勃兰德的声明，他写道，在中国的外国人，最受敌视的是传教士，如果在这次事件之后传教士活动不改变，那么再过十年中国将又会发生比这次更严重的危机。倍倍尔指出德国天主教主教安泽尔在中国所起的恶劣作用；他说，山东省对德国人的敌视是这位主教活动的结果①。倍倍尔要求停止德国干涉中国事务，这种干涉是在保护传教士的幌子下进行的。

至于梵蒂冈，它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及后来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1900—1902年»，第2卷，柏林，1901年版，第1344—1347页。

的几十年中，一贯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抱敌对态度。罗马教廷支持外国侵略者，还支持那些中国社会内部仇恨本国人民并向帝国主义者出卖本国利益的反动势力。

1955年初，梵蒂冈将在1900年事件时在中国被杀害的五十名基督教徒(其中包括耶稣会士)列为“真福”，以此显示它支持中国人民的压迫者①。梵蒂冈“忘记了”在那些日子里被镇压者杀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梵蒂冈与非洲的瓜分

在资产阶级的著作中有一个专门术语——“基督教占领非洲”，用来表示在非洲大陆各国人民中传布基督教的功绩。“基督教占领非洲”与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和残酷压迫非洲人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英国、法国、葡萄牙、德国、瑞典、荷兰、美国和其它国家的传教士——天主教 359 和新教的——是进入和征服非洲的先驱者。甚至传教士的辩护士们也承认，非洲各国人民一贯把

① 《罗马观察家报》，1955年2月23日，4月18、19日。

传教士看作压迫他们的那种力量的代表。有一个这样的辩护士承认，南非的班图族人民说："欧洲人来的时候，我们有土地，他们有圣经，现在我们有圣经，他们有土地。"①

在列强为瓜分非洲而互相争斗时，基督教传教士——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其它国家的——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相互搏斗，他们不择手段，以便赶走自己的竞争者，尽管他们也是基督教传教士，但代表别的国家②。

梵蒂冈在非洲的巨大积极性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明显地表露出来。1895年，非洲有二十四个宗座代牧主教辖区和十八个圣徒辖区（传教士组织除外）。到1905年，则增加到三十二个宗座代牧主教辖区、二十五个圣徒辖区、一个主教辖区和一千六百名传教士。到1915年梵蒂冈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数目就更多了：四十九个宗座代牧主教辖区、三十二个圣徒辖区、二千零七十八

---

① G·E·海恩斯：《非洲——未来的大陆》，哥本哈根，1950年版，第450页。

② M·F·希尔：《轨道（肯尼亚——乌干达铁路史）》，内罗毕（肯尼亚），1949年版，第25、27、33、34、42等页。

名欧洲传教士和八十四名当地神甫①。在天主教传教团增加的同时，新教传教团的数目也增加了。

十九世纪末期，在非洲传教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宣传英国殖民政策的英国新教传教士和宣传法国征服政策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后者的活动是与阿尔及利亚大主教和非洲首席主教拉维热里红衣主教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本是一个保皇派，后来转为共和派并同执政的资产阶级积极合作。

1868年，拉维热里组织修会“白衣兄弟会”，在非洲进行传教活动。这个组织在许多地区建立自己的传教团，它们传播基督教，同时也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在撒哈拉、苏丹、西非和中非扩大法国的势力②。研究非洲殖民地史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拉维热里希望在阿拉伯人、柏伯尔人、黑人中传播基督教，同时也同样希望把他们变成法国人或者受法国保护的人③。法国资

① L·伯格：《德国‘文化斗争’时期的天主教异端》，第1卷，亚琛，1927年版，第162页。

② C·S·菲利普斯：《法国教会》，第212—213页。

③ H·约翰斯顿：《非洲沦为异族殖民地的经过》，剑桥，1930年版，第246页。

产阶级反教权主义者注意到教会在殖民政策中的 360
重要作用，因此认为，反教权主义仅仅是对内政策的事。甘必大宣称，反教权主义“不是出口的东西”。法国的殖民政策不需要它。

和“白衣兄弟会”一起在非洲活动的还有“世俗兄弟”——农业和其它各种技术的专家。为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白衣兄弟会”还行医。修会的修女组织在妇女中进行宣传。“白衣兄弟会”开办学校、医院和其它设施，它们象传教士在殖民地建立的其它类似机构一样，都是对当地居民进行精神奴役并使他们服从殖民者的工具。

拉维热里与他所建立的组织使法国资产阶级更易于实现其在非洲的侵略计划。1875年，拉维热里在迦太基建立传教中心，不仅是为了传播宗教，而且为了扩大法国的政治势力。当时法国和意大利都对突尼斯垂涎三尺。拉维热里和法国总领事一致行动并和他共同研究为法国征服突尼斯的问题。对他的活动茹尔·费里政府持赞许态度。1881年，法国建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制度。这时拉维热里以军事当局的顾问身份活

动①。

和"白衣兄弟会"一起为非洲法国殖民者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还有一个传教士组织"圣灵兄弟会"（在桑给巴尔、法属刚果等地）。

拉维热里同法国政府及其在非洲的代表进行合作，他用在"多神教徒"中宣传基督教和与贩卖奴隶作斗争这样纯粹宗教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活动。然而反对贩卖奴隶的宣传并不妨碍拉维热里和某些教会代表积极协助殖民主义者奴役非洲人民。

梵蒂冈支持拉维热里和他的组织，这不仅与利奥十三世力图扩大天主教在非洲的势力有关。

罗马教廷从来不反对殖民者对非洲人民的奴361役，正象它不反对在亚洲、大洋洲和其它地方侵占殖民地一样。梵蒂冈根据它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目的时而支持这一派，时而又支持那一派殖民主义者，但是它从来没有反对过殖民主义本身。例如，利奥十三世支持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活动和拉维热里，恰巧是在教皇指望法国帮助按照教皇

① C·S·菲利普斯：《法国教会》，第325页。

权力至上论的精神牺牲意大利解决梵蒂冈问题的时候。他在1890年7月写信给拉维热里，对非洲各国人民“文明的成就”表示满意。众所周知，殖民主义者给非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文明”就是对这些民族的奴役和骇人听闻的剥削。

1899年3月28日，恰雷科夫由梵蒂冈写道：“法、英关于划分两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的协议，在梵蒂冈受到高度赞许……”① 可见，罗马教廷丝毫不反对殖民主义者瓜分非洲。恰雷科夫写道，教廷对这一协议满意，除其它原因外，还因为它“使意大利受到一些损失，即使不是物质利益的损失，也是其现任政府政治魅力的损失②。罗马教廷在非洲的全部传教活动也完全如此，是同帝国主义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传教活动对帝国主义政策的从属性，从各基督教传教团在乌干达争夺权势的长期尖锐斗争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教会传教团”的英国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先在乌干达开始进行活动。他们打算通过传播基督教将乌干达变为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第48页。

② 同上。

英国的殖民地。不久，“白衣兄弟会”继新教传教士之后来到乌干达，他们的目的是把这个国家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双方都不择手段，拉拢当地的统治者及其亲信，唆使他反对自己的竞争者。有一个时候，双方都被驱逐出境，但又回来了。传教士联合起来，准备对加紧渗透的伊斯兰教进行反击，但后来他们之间的斗争却又变得更加尖锐。在拉维热里领导下工作的法国“白衣兄弟会”，甚至同意德国的保护制（如果法国不建立保护制的362话），但是不同意英国的保护制。文献中指出，拉维热里的主要目的是在中非建立梵蒂冈管辖下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士及他们在当地居民中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发展为流血冲突，英国以此为借口将英军从苏丹调入乌干达，以便后来（1884年）对它实行保护①。“侵占乌干达说

① J·伊万斯：《英帝国在热带非洲》，剑桥，1929年版，第306—308页；H·约翰斯顿：《非洲殖民地化史》，第377—379页；L·拉斐尔：《好望角到开罗之梦》，纽约，1936年版，第271—273页；又见Б·И·沙列夫斯卡娅：《英帝国主义在非洲英国领地的宗教政策》，载于《宗教史与无神论问题》，莫斯科，1950年版，第106—136页。

明了帝国主义向落后地区渗透的伎俩：首先来的是手拿圣经的传教士，接着是商人，最后是带着机关枪的士兵……”①

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英国殖民主义者除向乌干达派遣新教传教士外，还派去了以爱尔兰籍主教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②，他们和殖民行政当局一致行动。以伦敦圣约翰学院为中心的天主教组织——“圣约翰兄弟会”的传教士活动，自十九世纪末期在乌干达开展起来。除乌干达外，这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天主教代理机构还在肯尼亚扎根。英国天主教传教团象法国的一样，也开办学校、医院作为扩大英国势力的工具③。

在乌干达扎根的还有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团——意大利资产阶级殖民利益的代表。其它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团扎根在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

德国殖民主义者还广泛利用传教士协助他们实现在非洲的侵略计划，非洲被泛德意志协会选

① G·帕德莫尔：《英帝国如何统治非洲》，第87页。

② H·约翰斯顿：《非洲殖民地化史》，第379页。

③ 《东非的光明与黑暗》，伦敦，1927年版，第58页。

为德国资本扩张的对象之一①。穆恩写道，“传教士团体给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撑腰打气。巴门来因传教团在西南非洲建立了十几个传教士活动站，广泛地经商并通过本团的督察向德国政府要求保护。德国传教团在太平洋岛屿上积极活动。363 而笃信上帝的德国居民还极热烈地希望海军按着福音行动。”②

1912年在德国殖民地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团网。仅天主教传教站就有二百二十五个，其中有一千二百名神甫、修士和修女③。

德国传教士“在世界大战前夕就展开了极其紧张的传教活动……其目的与其说在于改变多神教徒的信仰，不如说在于占领别的传教组织早已占领的阵地……”④

德国殖民主义者象其它国家的殖民主义者一

---

① 《德意志帝国殖民政策文献》，第56、58—59页。

② 帕克·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第48页。

③ 《德意志帝国殖民政策文献》，第206页。

④ E·A·科罗文：《天主教是当代世界政治的因素》，莫斯科，1931年版，第9页。

样，虚伪透顶，极力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它的目的似乎是要给非洲人民“带来基督教的光明”。1894年12月11日，霍恩洛厄首相（德国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首相，他的兄弟是红衣主教）在国会发言时宣称：“德国的殖民政策也有理想和宗教的基础。如果德国人民不愿参加消除奴隶制最后的灾祸并将光明带给黑色大陆的文化使命，那有损于德国在世界上的声誉……”① 霍恩洛厄说，政府将千方百计帮助传教团进行活动。

德国的天主教与新教僧侣参加了泛德意志主义者召开的殖民地代表大会。科隆大主教创立了“德国天主教徒非洲协会”。在每年召开的全德天主教代表大会上经常提出加强非洲传教士宣传工作的问题。

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是积极的殖民主义扩张的拥护者。

中央党的首领们，正如前已指出，有时因殖民行政机关方法粗暴、殖民地当局的血腥活动而批评威廉政府，但他们从来不反对德帝国主义的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5卷，第376页。

殖民主义扩张。他们不断指出，教会的传教士组织是殖民地征服者的最好助手。

1906年3月5日，天主教中央党首领施潘在德国国会宣称需要支持传教士，因为德国殖民地
364 的“文化”发展靠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传教士①。

同梵蒂冈有联系的天主教活动家、中央党议员埃尔茨贝格，是德国殖民主义侵略政策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坚决拥护者。

1913年3月6日，埃尔茨贝格在国会发言时宣称，天主教党根据宗教、经济和民族方面的理由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支持德国的殖民政策。他说，殖民任务不吸收传教士参加就不能完成。他要求国家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值得注意的是，埃尔茨贝格要求，德国殖民地的传教士应是德国人，而不是其它民族的人。他说，梵蒂冈同意考虑这一要求②。

埃尔茨贝格不顾事实，硬要人们相信，德国

---

①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1905—1906年》，第3卷，柏林，1906年版，第2029页。

②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1913年》，柏林，第4304—4310页。

在非洲的殖民政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关心非洲人民的文化和经济①。

综上所述，梵蒂冈与天主教会的传教士活动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一个殖民主义强国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才可能合作，而不同国家的天主教（或新教）传教士才会互相敌视②。

梵蒂冈把传教活动变作自己国际政策的工具。罗马教廷根据这一政策的目的而决定鼓励和支持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传教士。当时，天主教传教士团数量增加，将新教传教士团排挤到次要地位，这促进了罗马教廷国际作用的提高。沙皇政府外交部1898年关于俄国与梵蒂冈关系的备忘 365 录指出，"罗马教廷由于宗教保护制及其传教士团而对世界的支持作用愈来愈大。众所周知，这

① M·埃尔茨贝格：《德国殖民政策的结果》，载于《从世界法庭看德国殖民政策》文集，巴塞尔，1918年版，第6页。

② 1905年12月，南非的德国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团代表在德国总督的主持下开会，签订了协调传教士活动的协定。协定包括这样一项内容：当地居民中的孤儿由当局平均分配给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团教养（见《欧洲历史年鉴，1906年》，第34—35页）。

就是德国和英国力求博得教皇好感的原因①。

梵蒂冈实际上改变不了各个天主教传教团的"民族"性，因为传教士不是对殖民地国家"用基督之光进行启蒙"的抽象思想的代表者，而归根结底还是本国统治阶级的代表。同时，反对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明确倾向是世界各国天主教（及其它）组织传教活动的共同特点。这对罗马教廷的传教士政策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基督教传教活动同殖民主义政策的联系引起殖民地人民对传教士的不信任。因此产生了反传教士运动，它是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写道，传教士"是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的头等侦探，无恶不作。身受其害的中国人民自然有理由攻击他们，驱逐他们"②。

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殖民地国家中，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当地居民改奉伊斯兰教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及其代理人——传教士的方式之

① E·A·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冈的外交》，第136页。

②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文版，第338页。

一①。随着氏族关系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原来氏族和部落供奉的神祗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社会的宗教。由于亚非人民看到基督教便联想到欧美侵略者，所以人们往往宁可皈依伊斯兰教。

天主教中央党的代表们在德国国会上惊慌不安地谈论伊斯兰教在非洲传播的问题。中央党首领施潘1906年3月6日在国会上宣称，据传教士说，非洲的问题是这样的：或是伊斯兰教取胜，或是基督教取胜。施潘说，德国必须在本国殖民地帮助基督教的代表(传教士)，并以此对抗伊斯兰教的成就②。埃尔茨贝格在发言中也提出这样 366 的抵制伊斯兰教在非洲传播的要求③。

关于伊斯兰教在非洲对"基督教的威胁"问题，勒文施坦-维尔特海姆公爵曾在1909年8月布列斯拉夫尔举行的全德天主教代表大会上讲

① 唐纳德·弗雷泽：《新非洲》，伦敦，1927年版，第49—55页。

②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1905—1906年》，第3卷，第2030页。

③ 同上，第4309—4310页。

过。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里日益经常地成为天主教与新教报刊的内容。

随着殖民地国家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在政治口号下发展。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同盟军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了动摇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强大因素。

梵蒂冈和传教组织同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一样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残酷敌人，他们在被压迫民族的反殖民斗争高涨的条件下开始寻找永远保存殖民主义的新方法。

第六章　梵蒂冈与1914——1918年的战争

梵蒂冈与奥匈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

关于宗座对战争的态度，人们已编造出许许多多的神话。其基调都无非是：罗马教廷从战争一开始便采取严守“中立”的立场，并大公无私地谋求交战国之间达成和解。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4—1918年战争是一次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双方都力求重新瓜分业已瓜分完毕的世界、侵占别国土地、征服和统治别国人民、消灭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交战双方营垒中的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还有镇压劳动人民解放运动的目的。弗·伊·列宁写道：“战争并非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宣扬爱国主义、博爱与和平并不比机会主义者差）所认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

阶段，它与和平一样，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合乎规律的形式。”①

对于交战双方来说，这次战争都是掠夺性的，非正义的，尽管每个交战国的资产阶级都竭力要使本国人民群众相信：正是他们进行着正义的“自卫”战争，而其对手则进行着抢劫性的、掠夺性的、非正义的战争。弗·伊·列宁在揭露这场骗局时写道：“交战国双方，在掠夺方面、在战争的野蛮和无限残酷方面，都不相上下，但是为了愚弄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唯一真正的解放战争，即反对‘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368争，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各国资产阶级都竭力用爱国主义的谎言来宣扬‘本国’民族战争的意义，硬说资产阶级力图战胜对方，并不是为了掠夺和强占土地，而是为了‘解放’本民族以外的其他一切民族。”②

列强两大集团——协约国与三国同盟多年以来一直在备战。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交战双方营垒中的帝国主义分子，而直接发动战争的则是德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2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569页。

国的军国主义分子。

那么在帝国主义列强两大营垒的斗争中宗座所采取的又是什么立场呢？

1914年6月28日，奥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德国统治集团支持奥国政府中主张同塞尔维亚开战的好战分子，因为他们知道这定然会导致欧战，而欧战则是德帝国主义渴望已久的，同时，威廉二世也认为德国在军事上对此已作好了最充分的准备。①

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递交了最后通牒，数日之后，战争就开始了。

关于梵蒂冈对奥匈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态度，人们从巴伐利亚驻梵蒂冈大使冯·里特尔1914年7月24日报告与奥国驻梵蒂冈公使帕利菲伯爵1914年7月29日报告中便可看出。

冯·里特尔在其1914年7月24日发回慕尼黑的电报中写道："教皇赞赏奥国对付塞尔维亚的强硬的行动方式，而一旦同俄国发生战争的话，

① 《外交史》，第2卷，第246—249页。

他对俄、法两国军队并不重视。红衣主教国务卿也相信奥国此次能坚持到底。他不能想象，要是奥国现在不下决心藉武力去反击外国宣传的话，那么什么时候它还能进行战争呢。因为这种宣传已导致王太子被暗杀，除此以外，在目前的情况下，还威胁着奥国自身的存在。由此可见，罗马教廷对泛斯拉夫主义也深为恐惧。"①

1919年，根据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的倡议，这个材料已公之于众。在这些文件公布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梵蒂冈的以及与梵蒂冈有联系的政治活动家们的种种"更正"和"辟谣"。冯·里特尔男爵这个1919年仍留任巴伐利亚驻梵蒂冈大使的人物曾于1919年5月5日给班堡霍夫曼的巴伐利亚政府写道：他1914年7月24日的电报并不是说教皇鼓励奥国进攻塞尔维亚，电报所说的是教皇同意对导致暗杀大公的塞尔维亚的宣传进行反击，甚至可以采取武力。② 冯·里特尔建议向

369

① 《巴伐利亚文件（战争初期和凡尔赛审判期间）》，慕尼黑——柏林，1925年版，第206页。

② 《巴伐利亚文件（战争初期和凡尔赛审判期间）》，慕尼黑——柏林，1925年版，第209页。

宗座圣使表示遗憾，并就公布他的电报为梵蒂冈招来不愉快的嫌疑一事赔礼道歉。

在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被镇压后，霍夫曼的反革命的巴伐利亚政府向宗座圣使声明：公布里特尔电报一事是外交部文件被“非法攫取”的后果。该声明还断言：从里特尔电报原件不能得出教皇怂恿奥国用武力去对付塞尔维亚的结论。①

然而，后来进行的辟谣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冯·里特尔在其1914年7月24日电报中曾报告过，无论是教皇还是国务卿都赞成奥匈帝国所采取的对付塞尔维亚的积极行动。

而宗座的这种立场，奥国驻梵蒂冈公使帕利菲伯爵也报告过。他在其1914年7月29日发往维也纳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报界对梵蒂冈在当前发生的事件中的立场所作的阐述并不确切，特别是有人天真地认为奥国照会的尖锐性质是对塞尔维亚同罗马教廷所订宗教条约的报复，并认为奥匈帝国想以另一种形式来赢回它由于宗教条约

① 《巴伐利亚文件（战争初期和凡尔赛审判期间）》，慕尼黑——柏林，1925年版，第210—211页。

的签订而失去的东西。① 帕利菲指出：他认为需将罗马教廷的实际观点同报界的那些错误评价作一对照。两天以前，他帕利菲在拜会国务卿麦370里·德尔·瓦利红衣主教时，后者曾谈到当时全欧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帕利菲指出：在红衣主教国务卿的言谈中并无和善可亲和爱好和平之感。帕利菲报告说："他（指红衣主教国务卿——舍英曼）致塞尔维亚的照会是极端尖锐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条件地赞同，同时还间接地表示相信君

① 前面已指出，塞尔维亚政府指望通过与罗马教廷缔结宗教条约来打消奥国对塞尔维亚境内的天主教徒的保护（庇护）权的要求。该项宗教条约于 1914 年 6 月签订，1915 年 3 月批准。然而宗座对早在 1914 年末塞尔维亚政府就已提出的关于设立塞尔维亚驻梵蒂冈的外交代表常设机构的问题，迟迟不予解决。俄国驻梵蒂冈公使涅利多夫 1915 年 4 月报告："可能是由于奥国的影响"，梵蒂冈想表明：它认为当时任命塞尔维亚公使为时过早。涅利多夫写道："此项谈判看来注定要旷日持久，我以为梵蒂冈在此场合下希望争取时间，以期时局明朗化后解决问题。"（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50，第 61 页）

梵蒂冈等待，一旦奥匈帝国和德国成为战胜国，就会决定它同塞尔维亚关系的性质。一年以后，即 1916 年 3 月，涅利多夫向彼得格勒报告时写道："梵蒂冈至今仍未同意与塞尔维亚建立经常性的正式关系。"（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88，第 39 页）

主国能坚持到底。当然，红衣主教认为未能及早‘割取’塞尔维亚的领土是一件遗憾的事，因为要是这样，大概也就不会有现在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事件。这个意见也符合教皇的思想方法，因为近年来宗座曾就奥匈帝国错过机会‘惩治’其多瑙河畔的危险邻国一事多次表示遗憾。”①

梵蒂冈在战争前夜的真正的思想情绪就是如此：它想“惩治”塞尔维亚，要对它进行“宰割”。

帕利菲在其报告中写道：人们可能要问：天主教会是由一个“全身心浸透宗徒思想”的首脑领导的，而竟然如此“好战”，应作何解释？帕利菲写道，答案十分简单：教皇和罗马教廷认为塞尔维亚是瓦解奥匈帝国的一种疾病；奥匈帝国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它是现代基督教会信仰的强大堡垒，这个堡垒的毁灭对天主教会来说，无异于丧失它最得力的支柱，丧失反东正教的先锋。对奥匈帝国来说，从其机体中消除（如有必要则可诉诸武力）败坏机体的病根

① 《奥匈帝国在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至1914年战争爆发期间的对外政策》，第8卷，维也纳——莱比锡，1930年版，第894页。

是自我保存的需要。对天主教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竭尽全力来为这一目的服务。帕利菲在结束其报告时写道："由此观之，不难理解宗徒思想方法与好战精神之一脉相通。"①

帕利菲和冯·里特尔的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梵蒂冈不仅有严重的反塞尔维亚情绪，而且对奥匈帝国致塞尔维亚照会持赞赏态度。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T·马萨里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梵蒂冈在大战开始时在情绪上无疑是亲奥和亲德的，出自奥国驻梵蒂冈大使馆（帕利菲伯爵）并在克维利纳利斯宫（马基奥）流传的消息说，教皇本笃十五世反对塞尔维亚，倾向奥国。当时我手头有关于帕利菲伯爵的准确情报。他在罗马声言，奥国是天主教徒占优势的国家，它是教会的捍卫者，主要是反对东正教。帕利菲伯爵强调指出：无条件赞成反塞尔维亚行动的不仅是国务卿，而且还有教皇本人。"②

371

① 《奥匈帝国在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至1914年战争爆发期间的对外政策》，第8卷，维也纳——莱比锡，1930年版，第894页。

② T·Г·马萨里克：《世界革命》，第1卷，布拉格，1926年版，第53页。

1936 年，在前引帕利菲报告公开发表多年之后，梵蒂冈国务秘书处代表向意大利法西斯报界公布教皇本笃十五世在位期间的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红衣主教的三份“私人文件”。这些文件是要反驳当时业已形成的观点，即宗座 1914 年 7 月对奥匈帝国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持同情态度。第一个文件是麦里·德尔·瓦利关于他同帕利菲伯爵 1914 年 7 月 27 日会谈的纪要。这位红衣主教写道：他同帕利菲伯爵之间进行过内容如下的谈话：伯爵问红衣主教，他对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印象如何？麦里·德尔·瓦利回答，他感到通牒十分严厉。帕利菲问红衣主教，他是否认为塞尔维亚会接受最后通牒。麦里·德尔·瓦利回答，他对此深表怀疑，特别是某些条款。帕利菲声言，“或全部接受或干脆什么也不接受！”对此麦里·德尔·瓦利回答，这会导致一场燎原大火。帕利菲反驳说，大灾难也比目前的状况为好。麦里·德尔·瓦利写道，对此他指出，他觉得情况十分严重，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发生后，奥国不应退让，它有权要求最体面的赔偿，有权保卫自身的存在，但是他红衣主教却从来没有表示过这样

的希望和观点：奥国应当发动战争。

麦里·德尔·瓦利的另一份纪要注明的日期为1923年10月22日，是对公布冯·里特尔的电报所作的回答。麦里·德尔·瓦利写道，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后，他在不同的时间内的确曾声言过奥国有权要求最体面的赔偿，有权保卫自身的存在，但是他红衣主教却从未使用过冯·里特尔在其电报中硬加给他的用语，也从未表示过希望奥国诉诸战争。

在第三份注明日期为1926年1月18日的（不知是谁写的）文件中说，红衣主教否认帕利372非伯爵信中所说的关于挑动战争的事。这种思想是写信人的，而不是红衣主教的。

甚至从麦里·德尔·瓦利显然是替梵蒂冈以及他本人的立场进行辩解的几份文件中，都可以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梵蒂冈赞成奥匈帝国为反对塞尔维亚所采取的行动方式。在麦里·德尔·瓦利的文件中，重点在于说明红衣主教并未

---

① 卡·斯福尔扎：《梵蒂冈和世界大战》，载《当代评论》1937年6月号，伦敦，第696—700页。（此脚注见原书第371页。标号注11，但正文中并无此标号。——译者）

号召奥国以战争去反对塞尔维亚，也未挑动战争，而“只不过是”赞成奥匈帝国政府的行动方式。然而这一行动方式正好导致战争。这一点，梵蒂冈的外交家们心里是明白的。

用意大利进步史学家 Дж·康德洛罗 的话来说：“……梵蒂冈也正象大多数奥国当权者一样，都主张冲突局部化，以便奥国能给塞尔维亚以决定性打击，使奥国由于这场格斗而巩固其阵地，但又不发动全面的大战，以免欧洲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遭到威胁。”①

不能不指出，宗座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德国统治集团的立场不谋而合，后者一直在竭力设法使奥塞关系尖锐化。“1914年7月5日，威廉二世在波茨坦宫接见奥国大使谢切尼，对他作了明确的答复：‘采取这一（反塞尔维亚的）行动事不宜迟。’这是谢切尼所述德国皇帝的回答。”②

---

① Дж·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406页。

② 《外交史》，第二卷，第248页。有关德国统治集团如何推动奥匈帝国朝奥塞关系尖锐化的方向发展的情节，也可参见H·文德尔：《哈布斯堡王朝与南斯拉夫问题》，贝尔格莱德——柏林，1928年版，第738—740页。

关于威廉二世的急不可待的心情，关于他竭力谋求奥塞关系尖锐化以导致战争的心理，可以从他对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报告如何反应上判断出来。1914 年 6 月 30 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施基作了关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报告。他写道，他甚至还从某些要人处听说需认真与塞尔维亚算账。威廉二世在此处边上批示："就在现在，否则永无可能！"契尔施基写道，他竭力告诫奥国统治集团不要操之过急。威廉二世在此处批示："何人授权他如此表态？此举极为愚蠢，此事由他这般办理极不合宜，奥国采取何种方式，那只是奥国的事情……与塞尔维亚人理当断绝关系，而且事不宜迟。"①

373 梵蒂冈也充满此种情绪。红衣主教国务卿对帕利菲伯爵的谈话，也透露出同样的心愿，希望奥匈帝国能去"惩治"塞尔维亚。

梵蒂冈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态度决定于教廷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总政策和战前年代即已形成的梵蒂冈同中欧列强的友好关系。

① 《德国富翁们的对外政策》，1871—1914 年，第 4 卷，柏林，1928 年版，第 739—740 页。

奥匈帝国和德国都是同一营垒里的大国，多年以来，梵蒂冈一直都把实现自己的各项重大政治目标同这两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梵蒂冈把奥匈帝国视为唯一的天主教君主国，天主教在中欧的台柱及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桥头堡。意大利外交家、前外交大臣斯福尔扎伯爵写道：对于天主教来说，列强中，奥匈帝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其君主每年都参加圣体瞻礼宗教出游仪式。梵蒂冈深知，为这种宗教仪式需要经常付出何种代价。①

德国是奥匈帝国的盟国。它在中欧大国战争集团中扮演主要角色。对于新教（德国最为流行的宗教），梵蒂冈同它一贯水火不相容。这一点在战前不久教皇庇护十世即在所谓的博罗麦奥通

① 卡·斯福尔扎：《五十年战争和巴尔干地区的外交》，纽约，1940年版，第106页。文献中还指出战争前夜庇护十世倾向奥国的同情之心这一情况（当然只是局部的情况）——这就是教皇对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太子弗兰茨-斐迪南的私人关系良好。后者以主张教权主义和仇视意大利著称。（卡·斯福尔扎：《五十年战争和巴尔干地区的外交》，第74页）“他以狂热笃信天主教和仇视东正教而知名于世。”（《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4卷，莫斯科，1931年版，第81页）俄国驻梵蒂冈

谕（1910年）中已经阐明。该通谕对德国的宗教改革活动家进行了粗暴而带有侮辱性的评论。[①]尽管如此，宗座如前所述，早在战前就已确定依靠威廉皇帝德国的方针，指望在德国的支持下来实现其最重大的政治目标。如果说，在梵蒂冈最保守的权势人物心目中奥匈帝国是天主教的台柱

374 的话，那么威廉皇帝的德国就是反社会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除此，梵蒂冈还考虑到在该国政治生活中天主教中央党起着显著的作用。此外，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也被罗马教廷视为天主教的一大台柱。

T·马萨里克写道："奥匈帝国是当时欧洲的唯一的天主教大国，事先就可以而且应当指望梵蒂冈会站在奥国一边。梵蒂冈知道，奥国天主教

代办（H·博克）1914年7月1（14日）向萨宗诺夫写道："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作为充满热情的天主教信徒和教权派首领，当然得到梵蒂冈的好感和同情。他的逝世，对于天主教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从这个观点来看，教廷的半官方刊物称已故奥王位继承人为'已熄灭的希望'是公正的。大公夫人霍亨贝格以笃信上帝和忠于教会著称，在梵蒂冈各界人士中也得到广泛的同情……"（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4年，案卷178，第50页）

① 见第290—291页。

只不过是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德国天主教各大报对它的反映都是如此），因此它的希望是德国天主教，后者由于具有生命活力和政治力量（中央党），想一定能带动奥匈帝国的天主教徒。”① 有一位研究普鲁士和梵蒂冈关系的德国天主教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出版得到教会当局的赞同）写道：“教皇庇护十世认为德国的天主教徒是教会中最优秀的天主教徒，他为他们而骄傲。② 俄国驻梵蒂冈公使（涅利多夫）在1914年5月报告教皇提升十三名新的红衣主教时指出，被戴上红衣主教之冠最多的是意大利主教，而其它“民族中，大多数的红衣主教之冠都戴在德国人头上，如科隆的、维也纳的和慕尼黑的大主教。”③

属交战国另一营垒的有信奉新教的“自由”英国、“不信神的”法国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对这些国家，宗座都无任何好感。梵蒂冈同俄国在世

---

① T·Г·马萨里克：《世界革命》，第1卷，第53页。

② 见F·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慕尼黑，1954年版，第395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4年，案卷257，第10页。

界大战前夕关系之所以紧张，不仅仅是因为有许多与天主教会在俄国的地位有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梵蒂冈的领导层人士与沙皇制度在共同革命进行的斗争中是同心同德的。然而，与此同时，他们非常关心奥匈君主国的利益，因此对沙俄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也怀有戒心。如前所述，宗座认为这是对奥匈帝国和天主教的一个威胁。根据同样理由，梵蒂冈对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有更大的敌意。

斯福尔扎伯爵写道，庇护十一世在其亲信的小圈子里直称法国为“共济会、基督教民主主义375和现代主义的魔鬼的三位一体”。他又把现代主义称作“法国教会的祸根。”斯福尔扎写道：“因此，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看来，德国的新教徒大军似乎是上帝选来用以惩罚法国的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①] 又是这位作者写道：在教皇的“正直的但却笨拙的头脑中”，德国进军“巴黎”被作为天主惩罚其“教会的长女”的一种形式来理解，因为他在位期间，这个“长女”给他添了许多麻烦，他在心

①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纽约，1944年版，第105页。

灵深处宁肯让土耳其人战胜“自由主义分子”。[①]Дж·康德洛罗写道：“在（意大利——舍英曼）中立期间，顽固的教权主义分子的老牌机关报（《天主教团结报》，1914年10月10日——舍英曼）上可以读到内容如下的主张：‘正当法国以挑衅的姿态脱离教会的时候，对教会表示特殊的尊重的难道不正是路德派的德国吗？法国甚至把僧侣也都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而德国则提供神甫从事本职事务的机会……法国误入歧途，它从学校中收走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从教科书中删去天主的名字，而在此期间德皇却禁止军中跳探戈舞，承认学校中有宗教的地位，并希望教育青年敬畏上帝。正当法国的立法者们羞羞掩掩地有意对天主避而不谈的时候，而威廉皇帝……却广泛采用宗教教义和宗教术语……’”[②]

还有一个使得梵蒂冈有权势人士在战时同情奥德联盟的不可谓不重要的情况：梵蒂冈对于在这个联盟的帮助下按照罗马教廷的利益解决“罗

① 同上，第189，203页。

② Дж·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409页。

马问题"并未失去希望。

前面已经指出，梵蒂冈的头面人物，上自利奥十三世开始，都认为欧战不失为解决"罗马问题"的一条途径。"神圣的宗座在1914年7月所表现出的好战，一如他在以前年代里所表现的那样，都可以说明：从任何一次战争中（甚至从美西战争中）罗马教廷都能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好处，而欧战则是它认为实现其政治纲领的基本部分和恢复教廷在罗马地区的主权的可靠的不二法门。自从这次战争成为欧洲外交界考虑和计划的中心时刻起，教廷就是这样认为的。"①

诚然，在意大利参战后不久，梵蒂冈为了平息意大利的舆论，也不得已发表声明，扬言罗马教廷并没有把欧战看作是解决"罗马问题"的一个途径。然而梵蒂冈的这种情绪却得到了中欧大376国，特别是德国统治集团的支持。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卖力气的是埃尔茨贝格，战争年代他在国外为德国进行宣传，为德国军政界与梵蒂冈的联

① E·A·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冈的外交》，第62—63页。

系而奔走。①

接近梵蒂冈领导层人士的胡达利主教记述：1914年11月教皇高级侍从保罗·马利亚·鲍姆加尔滕受柏林委托，在教皇本笃十五世单独接见时向教皇作如下秘密报告：战后德政府一定要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办法来支持奥匈帝国政府所采取的旨在改善宗座在意大利的地位的一切措施。

据胡达利说，教皇对此所作的回答是：他只能接受他本人满意的改善，而任何其它改善他都将加以拒绝。② 胡达利认为教皇的这个回答是对德国建议的拒绝。然而即使是在胡达利主教口中，教皇的答复也并没有干脆拒绝柏林对他的建议。

德国统治集团在战争进程的全部时间内，一直没有放弃为本身利益利用"罗马问题"的念头。埃尔茨贝格曾说，1915年他曾向派往慕尼黑的圣使（帕切利）建议，成立一个由知名天主教界人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9卷，第383—384，406—408等页。

②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1806—1918，第293页。

士(每国五至八人)组成的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筹备召开国际天主教徒大会。这个大会应向各交战国发出呼吁：在缔结和约时保证罗马教廷政治上的自由和独立。显然，圣使对这一方案并未表示反对，因为事后埃尔茨贝格还同一些国家的天主教活动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谈判。埃尔茨贝格认为在解决"罗马问题"的同时，使罗马教廷比以前更进一步国际化并增加其中德国人的名额是具有重大意义的。①

377　上述种种足以明确回答帕利菲伯爵报告里就已提出来的问题，即如何解释梵蒂冈在战争前夕的日子里的好战表现。尽管梵蒂冈在战争开始前不久（6月24日）曾同塞尔维亚签订了宗教条约，② 但是它对奥匈帝国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却表示了赞赏。

---

① 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什图特加特——柏林，1920年版，第127页。

② 无条件忠于罗马教廷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都接近梵蒂冈统治集团的意大利天主教神甫路易吉·斯图尔佐(基督教民主派的天主教政党的创始人)写道：教会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面尚缺乏"道德准则"。斯图尔佐问道：为什么1914年有那么多的中立国天主教徒在奥国进攻塞尔维亚时，对奥国抱同情态

1914年教皇选举会，本笃十五世当选，他的第一个通谕

1914年8月20日，在战争开始三星期后，教皇庇护十世去世。亲梵蒂冈的书刊报章都编造宗教神话，说教皇之死是因战争爆发受到震惊。庇护十世在位期间的国务卿麦里·德尔·瓦利在其回忆录中也人云亦云地重复这样的神话。他写道：“无法用言语说明这一可怖的悲剧是何等深深地打动了他(指教皇庇护十世——舍英曼)。我已说过，他早已预见到并且预言了欧洲的冲突。一旦这场冲突真的爆发了，缠绕着他的惊骇和苦痛就十分强烈。残酷斗争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以及他所预见的斗争所必然引起的灾难和痛苦，日日夜夜都在折磨着他的心灵。对比利时的入侵和最初几次交战的消息都使他内心充满了最大的苦痛和

度，而稍后在德国进攻法国并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时，又对德国抱同情态度？斯图尔佐回答道：不幸的是政治的与类政治的感情占上风，压倒了道德准则；因为塞尔维亚是东正教的国家，而且同俄国有联系，而奥国则是天主教国家。(M·穆斯：《车·卢伊季·斯图尔佐——基督教民主派》，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45年4月号，第285页)

悲伤。他急切地等待着所有这些事实的确凿的证据，以便拟定一条明确的行动路线，使他能为保卫正义与和平的各项神圣原则而大无畏地高声疾呼。”① 麦里·德尔·瓦利写道：死亡阻碍了他去实现这一目的。

关于此类宗教故事，斯福尔扎伯爵写道：1914年以及更晚一些时候产生的这一类传说，最有生命力的是关于教皇庇护十世对奥国进攻塞尔维亚的态度。这一传说告诉我们，庇护十世为反378对战争的爆发而进行祈祷和奋斗，对基督教分裂为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极其惊恐，终于因入侵比利时和爆发战争他感到惊恐悲痛而去世。② 斯福尔扎写道，另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当教皇知悉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后，他立即派遣其圣使前往维也纳，以至高无尚的主的名义规劝老皇帝，但奥皇左右的外交家和军人阻挠庇护十世的圣使同皇帝交谈。最后一个传说是：教皇在确信自己已无力阻止这场灾祸后，由于悲伤而突然去

① 麦里·德尔·瓦利红衣主教：《回忆教皇庇护十世》，伦敦，1939年版，第71页。

②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第186—187页。

世。①

斯福尔扎反驳了这些传说。他引证了前述帕利菲报告来证明，庇护十世对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持赞成态度。他写道：至于说教皇死于“悲伤”，则他从其参议院同事，一个医生那里知悉：教皇系死于疾病，疾病早就把他折磨得虚弱不堪。②

8月31日，梵蒂冈召开教皇选举会。主要交战大国的政府及其外交家和教会上层分子，尽管处于战争时期，也都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来影响教皇选举，使其朝着他们最期望的方向发展。法国驻伦敦和马德里大使都接到训令，要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四国红衣主教能在教皇选举会上结成一个联盟，以保证把协约国所希望的人选上教皇圣座。③

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雷蒙德·彭加勒的

---

①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第187页。

② 同上，第189页。关于教皇并非死于“悲伤”一事，俄国驻梵蒂冈公使8月6(19)日电报也可为证。他在电报中报告说：“四天之前，教皇即已患支气管炎。”(俄国外交档案馆，第2办公厅全宗，Ⅱ-5，1914年，案卷124，第1页)

③ H·约翰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外交》，牛津，1933年版，第8页。

回忆录中，关于1914年8月21日有如下记载：他收到了巴黎大主教区大主教阿麦特红衣主教的信，请求他（作为总统）参加为已故的教皇举行的追思弥撒，信中并补充说，如果他，彭加勒愿意在他赴罗马之前见他的话，那么他愿为他效劳。后来通过儒勒·卡姆邦（战前法国驻比利时大使）转告阿麦特，法国"政府指望法国红衣主教团结爱国，他（卡姆邦）知道，他们将投票选举一个最配得上的候选人，同时也是对法国最友好的人，然而他们在涉及与其它国家的关系方面必379须很有分寸，异常小心谨慎地行事，免得表现出他们所遵循的好象是某种本民族的口号……"①

红衣主教阿麦特在赴罗马前夕曾向政府代表（儒勒·卡姆邦）保证他"一定做到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把法国红衣主教们的选票都集中到一个候选人身上，大概也就是费拉塔蒙席身上。阿麦特蒙席认为马林区主教迈尔西埃红衣主教，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们，可能还有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博恩蒙席，他们同法国人在表决问题上能取得一致。

① 雷蒙德·彭加勒：《在为法兰西服务的岗位上》，第1卷，莫斯科，第77页。

杜美格(外交部长——舍英曼)命我驻伦敦和马德里大使千方百计支持这个半官方的协议草案。”①

奥匈帝国和德国政府也都在依靠本国的红衣主教和天主教领导集团，对教会选举会议施加影响。1914年9月2日，有一份由埃尔茨贝格提议并参予起草的《德国天主教徒关于世界大战的备忘录》提交教皇选举会议。②在这一文件中德国天主教活动家(在备忘录上签字的有六十人)声明：宣战和动员在德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宗教革新”，“德国并不想要战争”，它“进行战争并非为了征服，它只是为自己的存亡而奋斗。在这次战争中必须经受住来自东正教俄国人方面的最沉重的攻击……俄国的胜利会给天主教带来最惨重的损失。”③这一文件中还说，天主教在整个西欧，没有比俄国更为危险的敌人了。它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曾几度强行使波兰天主教徒脱离教会。

俄国驻罗马大使克鲁平斯基1914年9月1

① 雷蒙德·彭加勒：《在为法兰西服务的岗位上》，第1卷，莫斯科，第85页。

②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286页。

③ 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11页。

（14）日向萨宗诺夫（外交大臣）报告：德国人给参加教皇选举会议的红衣主教们寄来一份“天主教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中向他们反反复复说明俄国的胜利将会是天主教的失败，将会是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和强迫加里西亚人和波兹南人改信东正教。”①

在这一文件中，德国天主教活动家们不仅偏袒德帝国主义，强调它所进行的战争并非是掠夺性的，而是“自卫性的”（其它各交战国教会活动家也无不如此袒护本国资产阶级），他们力图以“俄国的威胁”来吓唬教皇选举会议，想使人们相信协约国的胜利（因此也是俄国的胜利）是东正380教的胜利，同时也是对天主教的威胁。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天主教会与德奥匈联盟的胜利休戚相关（虽然，众所周知，投奔这一集团的还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土耳其）。② 奥国统治集团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4年，案卷33，第21页。

② “基督教的保卫者”——威廉二世和德帝国主义分子讨好天主教，而以东正教的威胁相恫吓，也乐意利用伊斯兰教来为自己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战争的最初日子开始，德国在土耳其的间谍机关便展开广泛的泛伊斯兰宣传，以煽动穆斯林居民来反

欢迎德国天主教界致教皇选举会议书①，这份呼吁书对红衣主教们发生了影响。

研究罗马教廷外交史的英国天主教史学家写道：前来参加教皇选举会的"各协约国红衣主教们都看到了：俄国胜利的幽灵对罗马的教会上层的印象有多么深刻，认为德奥两国是权威和秩序的重要因素这种信念传播得多么广泛"②。

教皇选举会议经过了十六次表决，终于选出玻伦亚大教区大主教德洛克埃兹继位，取名本笃十五世。他出身于热那亚一个古老家族，据深知他为人的一个研究罗马教廷史的德国史学家路德维希·帕施托尔说，他是一个沉着审慎的人，是个外交家。帕斯托尔在本笃十五世当选后不久写

对德国的对头。俄国驻土耳其大使吉尔斯写道，在土耳其人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德皇威廉接受伊斯兰教，说德国人所信奉的宗教，与伊斯兰教并无任何区别。我得到报告，说在君士坦丁堡某些地方曾为德皇进行祈祷，而且还用特为他起的土耳其名字来祈祷"（引自1914年10月10日吉尔斯发给萨宗诺夫的紧急报告，俄国外交档案馆，1914年政治档案全宗，案卷1050，第204页）。

①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286页。

② H·约翰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外交》，第6页。

道：这位教皇大概将会奉行利奥十三世的方针①。胡达利写道，本笃十五世是拉姆波拉学派的一位主教②。众所周知，拉姆波拉奉行的是法国的方针。许多作家都说本笃十五世是拉姆波拉派的外交家，这无非是想指出他的亲法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梵蒂冈大使馆秘书格雷戈里也声言，本笃十五世是拉姆波拉的一名忠实的追随者，他批准一个同巴黎和法国有着紧密联系的人物为自己的国务卿（费拉塔红衣主教，他死后是哈斯帕里）③。

381 据格雷戈里说，在梵蒂冈罗马教廷内，在罗马的各种教会所属机关里，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举棋不定：参战国的一方(中欧列强)代表了权威、秩序、法制和稳定，这一方包括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来因、阿尔萨斯以及所剩下的两个天主教王朝中的一个；参战国的另一方是信奉新教的英

---

① 路·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海得尔堡，1950年版，第612页。

②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286页。

③ J·D·格雷戈里：《在外交的边缘上(1902—1928年)》，第88—89页。

国、共济会的法国和东正教的俄国的联盟。这个联盟的胜利有害于教会利益①。事实表明，前一方的支持者为数较多。

斯福尔扎写道：选举后，德奥匈政府开始时都把本笃十五世视为拉姆波拉的受造物，因此也就是他们国家的大敌。然而事隔不久，巴黎和伦敦都作出结论：新教皇"亲德"②。

梵蒂冈正式声明，它采取中立的立场，并将为和平而工作。1914年10月8日《罗马观察家报》声明：宗座在战争中严守中立，因为他认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睦高于一切。尽管梵蒂冈领导集团对奥匈帝国和德国抱有同情心，但是罗马教廷毕竟还得遵守表面上的中立，以免梵蒂冈在中立国和协约国天主教徒心目中名声扫地。此外，在双方胜负未定之前，公开把自己同一方联系在一起并不有利。

然而却有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宗座在战争年代的行动同交战双方的统治集团都是一致

① J·D·格雷戈里：《在外交的边缘上(1902—1928年)》，第89页。

②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第202页。

的，这就是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要求有任何的“中立”。实际上，教皇本笃十五世的第一个通谕（1914 年 11 月 1 日）主要是反对社会主义的。①

教皇通谕花了很多辞句大谈关于破坏和流血以及战争恐怖等方面的一般论点，教皇说，使他惧怕的还有人们在思想上和道德观点上的种种变化。

出路何在？这份教皇通谕对此并未作出答案。谁是战争祸首？对此教皇通谕也避而不谈。本笃十五世向之求援的势力，恰巧是发动战争的势力。他向各交战国统治者大声疾呼停止残杀。他断言，一切罪恶之源在于不崇敬权力，这与忘记宗教原则和宗教道德有关，与将宗教赶出学校大门有关。

382

必须注意，这样提出问题就使人们不能正确理解战争的原因，认不清它的帝国主义性质和交战两大营垒资产阶级的罪过。

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即社会民主党中没有

---

① 见《教皇言论集》，纽约，1940 年版，第 265—273 页。

背叛社会主义、没有投入资产阶级营垒而仍然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那一部分认为，自己的最主要任务是使群众认识战争的真实的、帝国主义的性质。1914年9月末，弗·伊·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的责任，首先是揭示战争的这种真实意义，无情地揭穿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了鼓吹战争所散布的谎言、诡辩和‘爱国主义的’言论。”①

无论是俄国布尔什维克，还是其它国家仍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活动家们在战争的最困难的条件下，在警察迫害、军事特别法庭以及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条件下，同时还在第二国际多数领袖背叛的条件下，都仍然坚持不懈地向人民群众解释战争的真实性质，并指出各国劳动者有必要掉转枪口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德国，卡尔·李卜克内西拒绝对军事拨款投赞成票，1914年12月2日，他在国会发表演说声明：“这场战争的爆发，既非为了德国的，也非为了别的国家的人民的福利，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中，没有一国人民要这场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568页。

争，是争夺对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占有的战争，是争夺工业投资和银行投资最重要势力范围的政治霸权的战争。”①

各种教会，其中也包括作为天主教会中心的梵蒂冈在战争年代中的活动，其目的都是帮助每个国家资产阶级掩饰战争的真实性质。本笃十五世的第一个教皇通谕就是这种性质的。因为通谕的第一部分为资产阶级辩解，而第二部分则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教皇声言：社会已分成两支互相斗争的军队；无产阶级反对私有者，他们由于未取得私有者那种地位而充满仇恨。鼓动者对无产阶级说：因为人们天生平等，所以他们在社会上383也理当地位平等。这种宣传，教皇不能容忍。他反对世上人人平等的思想。教皇写道：有些穷人起来反对富人并以为自己也可以参与掌管富人财富，他们的所作所为，非但为正义与仁慈所不容，而且还极不明智。

看来教皇大概是为了在对待富人、剥削者和战争的罪魁祸首方面无损公道，他才在现在，在

① 卡尔·李卜克内西：《演讲选录，书信和论文》，柏林，1952年版，第281页。

战争年代，号召整个僧侣阶层、各天主教组织和出版机构同社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还提醒人们注意：同社会主义斗，也是利奥十三世对教会的遗训。

本笃十五世深表不满的是：竟有人教唆人们相信没有什么必要追求天国的幸福，而应当在这里，即在尘世就成为幸福的人。教皇写道：因为尘世上的物质财富的分配并不均等，所以每个不幸的人便都起来反对幸运的人。天主教首脑便是这样地把阶级斗争“解释”为“不幸者反对幸运者”的斗争。

教皇在通谕中力图使人相信，尘世的财富不会给人们真正的幸福，天主圣训：“穷人有福”，天主把他的爱给予他们——“穷人”。教皇建议：需在人们心中复活对“永生的”未来幸福的信念。

综上所述，教皇在战争开始时的首次公开言论中所反对的就并不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而是社会主义。

罗曼·罗兰在其《战时日记》（1914年冬至1915年期间）中记道：“人们是多么急不可待地等候教皇的声音，他终于大声疾呼了，他大声疾

呼，为的是谴责……社会主义！在新发表的教皇通谕中说：当最不富裕的人们为反对富人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不但违背正义和慈爱，而且污辱了理性本身，更何况只要他们愿意的话，也能通过诚实的劳动竞赛达到美好的境地……”

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不能总是不说对近人的爱。然而，“这种爱当然不应导致消灭地位和阶级差别的后果。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正象要使得活的机体内的各种器官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是不可能的道理一样；然而，多亏有了这种爱，地位高的人们对地位低的人们才会有某种方式的体谅，不仅对他们公平相待，而且在与他们交往时定会表现出慈善、可亲和容忍，而地位低的人这方面也为前者的幸福生活而感到高兴，并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前者的帮助上，正象在一个家庭中幼子总是指靠长子的保护这个道理一样。”

384 如此侮辱人的恩赐！如此贵族式的傲气！一眼就可以看出，说这些话的人从未体验过贫穷的滋味。他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麦涅尼·阿格里帕的寓言来，——要知道他在活的机体里已占据了脑袋的地位！这种思想的实质在于崇拜已经获得胜

利的力量，这种崇拜表述如下：

"除神授权力之外，别无其它任何权力。一切现存的权力，均源于天主的安排。任何治人之权，上自公侯之权，下至低级长官之权均为天主所授！"① 罗曼·罗兰就是这样评价教皇通谕的。

本笃十五世的第一道通谕结尾时抱怨教皇在罗马的处境和没有自由，并声明应当结束教会首脑不正常的境遇。

教皇通谕的这一番话证实：梵蒂冈也确在指望战争的结局使得"罗马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罗马教廷。

天主教会与战争

战争还使得又一个奇谈怪论到处传播：似乎教会有能力防止人们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相互残杀，似乎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的冲突中它能当一名公正的法官。

在统治集团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忠于宗教教义、忠于基督教原则的国家之间爆发了战争。对

① 罗曼·罗兰：《战时日记（1914—1919年）》，载《新世界》，1955年，第3期，第209—210页。

垒双方的基督教僧侣阶层（也象非基督教的僧侣阶层那样）都愿主降福于自己的军队，惩罚敌方军队。

罗曼·罗兰1915年在其《日记》中写道："……至于说到我，直至去年还一直试图把对基督教的崇敬与自由思想调和起来，但这次战争的经验已向我证明：基督教只是以其蒙蔽手段加剧了已经被弄得昏昏然的各国人民的疯狂行为，并竭力使其昏昏然的状态神圣化。基督教是在凌辱基督，把他变成了屠杀人形牲畜者的同伙。这就是说，基督教是有害的，一旦战事结束，需要毫不动摇地同它作斗争。"①

所有交战国中一切教派的僧侣阶层在这次非正义战争中，都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他们在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都力图利用战争的灾385难以巩固教会在人民中间的地位。法国天主教僧侣从战争一开始便开展运动，号召组织全国规模的祈祷，求天主庇护法军。某些高级神职人士（如雷恩教区大主教）竭力使人相信，法国由于对

① 罗曼·罗兰：《战时日记（1914—1919年》，载《新世界》，1955年，第3期，第213页。

宗教漠不关心，遭此奇祸罪有应得。①

彭加勒在其回忆录中说(1914年8月29日札记)：有妇女和神甫向他呼吁，坚决请求“将法兰西奉献给耶稣圣心”。彭加勒写道：“在许多场合下，这些要求确实发自饱受痛苦的心灵，出自真诚的信仰。然而，可惜的是另一些要求之提出与其说是出于宗教感情，勿宁说是出于政治狂热。我们的失败，在这里看来是天主给予共和国的罪有应得的惩罚。”②

无论是帝俄，还是在英国以及协约国的其它国家，各种教派的僧侣阶层在这场非正义的掠夺性战争中，都对本国资产阶级采取无条件支持的立场。

中欧列强营垒中的僧侣阶层也都是狂热的主战派。战争刚一开始，维也纳大主教便发出牧函，断言塞尔维亚迫使“最酷爱和平的”奥皇诉诸

① 《教会通报》，1914年11月6日，第45期。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高级教职人士以同样的祈祷来为希特勒匪帮占领法国辩解。

② 雷蒙德·彭加勒：《在为法兰西服务的岗位上》，第1卷，第112页。

武力，在这次“强加给”奥国的战争中，奥国不得已而起来反击塞尔维亚人，保卫的“不仅是本国的强国地位，不仅是本国光荣军队的威力和荣誉，而首先是崇高的、完善的幸福与自己的神圣权利，贪图他国领土的敌人公然想对这一权利加之以暴力与暴动……”维也纳教区大主教慷慨激昂地感叹道：“难道在我们中间还能找出一个对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并不完全深信无疑的人吗？”①

德国天主教（以及新教）僧侣采取了沙文主义的立场。德国的主教们都对德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战争大肆吹捧，说它是正义之战，是高等文化反对劣等文化之战，是强大的德国天主教反对弱小的法国天主教之战。德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战争及其吞并主义纲领也得到了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386 该党在1915年10月发表的关于战争目的的宣言中声称，德国需要攫取他国领土。② 无论是在战时还是战后，中央党领袖们都为德皇德帝国主义

① 《欧洲导报》，1914年8月，第402页。

② 汉斯·冯·加特茨克：《德国的西进》，博耳提莫尔，1950年版，第103页。

辩护。中央党领袖之一巴赫姆写道："在德国没有一个人是想要战争的，无论是皇上，还是首相，无论是最高统帅部、国会，还是老百姓……"① 说德国劳动人民不要战争，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说德皇、最高统帅部和资产阶级不要战争，这当然是荒谬之至。因此，巴赫姆的声明与事实毫无共同之处。按巴赫姆的论断，威廉的容克地主德国不仅是在为本国的"荣誉"、"财富"和地位而战，而且还为"欧洲国家秩序的道德思想和国际生活中的正义，为各国人民的权利平等"而战。②

巴赫姆写道，天主教中央党的信念就是如此。德国军阀用火和血来推行的这一"国家秩序的道德思想"，其代价是欧洲各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使千百万人丧失生命。

中央党的另一个著名活动家埃尔茨贝格，在战争爆发不久便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热烈赞颂德军大本营这个普鲁士军国主义、反动势力和战争的

---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8卷，1931年版，第224页。

② 同上，第227页。

重要中心①。埃尔茨贝格是蒂森的代理人（1915年他正式成为蒂森财团理事会理事，薪俸四万马克。而阿尔弗雷德·蒂森本人也是中央党的党员②），他同军部合作，并受军部之托，在国外进行战争宣传③。与此同时，他还到梵蒂冈执行政府的任务。例如他竭力借助有影响的天主教人士来阻拦意大利站到协约国方面参加战争。

1915年初，法国天主教和天主教政治社会活动家们公开反对德国军阀在比利时以及其它德占区的罪行。成立了一个“法国天主教国外宣传委387员会”，为首者是巴黎教区大主教阿麦特红衣主教和兰斯教区大主教柳松红衣主教，并有博德里亚尔、图里纳乌等主教参加。该委员会出版了文集《德国之战与天主教》和德国军阀战争罪行影集，该书译成各种外语。该会还出版了一系列其它书籍，其中一部分是由神甫撰写的。这些书证

---

① M·埃尔茨贝格：《动员》，什图特加特——柏林，第1914页。

② 汉斯·冯·加特茨克：《德国的西进》，第20页。

③ I·M·威尼威克茨：《在德国国内我们有无盟友?》，伦敦，1944年版，第1页.

明德国进行战争的原则违背基督教，证明德国开启战端破坏比利时中立，证明德军毁灭教堂，屠杀和平居民。

德国天主教主教团以及有影响的天主教界人士竭力设法消除这本书给人们所造成的印象。虽然这本法国出版的书有法国两大红衣主教的参与，但是德国的两大红衣主教（慕尼黑大主教伯京格尔和科隆大主教哈特曼）在郑重上书德皇时仍称《德国之战与天主教》这本书是“对德意志祖国及其光荣的军队的诽谤”。这两位红衣主教还声明，他们将向教皇控告该书的法国作者。

1915年夏，有七十七名德国天主教活动家也效法法国成立了“德国天主教徒委员会”，以便在教会的庇护下为德国进行战争宣传。该会为首者是中央党著名领袖之一盖特林格。该会也出版了一本《德国之战与基督教》的书，作为对法国同名书的回答。这本书批驳了法国天主教活动家关于德国军阀野蛮暴行的声明，大肆吹捧德军、德皇以及德国的战争目的。在论及德皇时，说他是个善良的基督教徒，说他1914年7月31日战争爆发时演说的结尾是：“现在你们都到教堂里去，跪

在主的面前，祈求主帮助我英勇的军人。”他引证这一句话，意思是说：难道这样虔诚敬神的皇上能成为罪恶战争的主使者吗？

七十七人的德国天主教徒委员会无条件地为德国军阀在比利时的种种行径辩护，大谈德国部队“笃信宗教”。在德国天主教徒的出版物中也说：可能会有个别的“无纪律”行动，但总的来说，不能指责德军残无人道，冒渎神明。

连德国的神学家和主教们也都卷进了这场论战。福尔加贝尔主教（后升红衣主教）援引基督教教义来证明战争有理，并宣扬：圣经中所说的世界和睦，意指未来的天国。福尔加贝尔声称，就是基督本人也是全身披挂的，这就是战争具有正义性质的明证。

388

法国天主教委员会出版新书来回答德国天主教活动家的言论。交战双方营垒的天主教神学家和政治家的尖锐斗争一直继续到大战结束[①]。这

① 《欧洲导报》，1917年版，第7—8期，第333—340页；《统一》，柏林，1948年版，第10期，第924—933页；《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第230—231页；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11—15页。

一论战本身表示，天主教会同帝国主义是多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对此，亨利·巴比塞在其名著《火线》中以文艺的形式作了出色的描述。他引用了法国飞行员的一段叙述，说有一次礼拜天早晨，当他在火线上空飞行时，他发现：无论是在德国人那里，还是在法国人那里，都有神甫在做主日弥撒。"我飞得越低，就看得越清楚，这两群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结果一切都显得荒谬绝伦。任何一方的仪式都是另一方仪式的翻版。您想想看，两群一模一样的人们，双方都大声念诵着一模一样的，但毕竟又互相对立的词句，发出互相敌对的，但同时却又是同样的叫喊，主又该怎样回答才好呢？我知道，主知道一切，但他虽然甚至一切都知道，大概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①

耶稣会士在德军中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中有许多人受到褒奖，获得铁十字奖章②。德国在

---

① 亨利·巴比塞：《火线》，莫斯科，1955年版，第262页。

②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9卷，第358—359页。

1917年4月废除了1872年“文化斗争”时期通过的反耶稣会士法。这难道不是由于他们对德帝国主义的尽忠效劳吗?①

交战国双方的教会思想家和领导人都竭力寻找神学的、道德的、历史的以及其它种种根据，为本国资产阶级罪行辩解。弗·伊·列宁写道:“作家、诗人、神甫和所有的书报杂志都在专心致志地歌颂战争。”②

那么，作为天主教会最高首脑的罗马教皇在交战国天主教会之间沙文主义的论战中又采取什么立场呢?关于这一点马萨里克写道:“对这些争论和其它争论，梵蒂冈一概不管，它表面上保持389客观。它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它回避了当代的种种棘手问题，而满足于空谈神的使命。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梵蒂冈尤其擅长。”③

交战国双方的红衣主教和主教们都向对方提出极其严厉的指控，都积极支持非正义战争，而

① H·费奈:《教权史》，第1卷，魏玛，1950年版，第587页;卡·巴赫姆:前引著作，第8卷，第234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323页。

③ T·马萨里克:《世界革命》，第1卷，第54页。

教会首脑却保持“中立”。但事实上教皇本笃十五世本人也被卷入这场论战之中。埃尔茨贝格写道：当他就成立“德国天主教徒委员会”撰写对法国天主教所出版的文件的答复一事征询许多德国天主教知名人士的意见时，本笃十五世就曾表示过，希望撰写这类反驳言论时不要有教会活动家参加，而且在需要的时候由知名的世俗天主教徒参加。①

罗马教廷的中立，仅虚有其表。实际上梵蒂冈并不中立。交战国双方在战争的全部过程中也一直在梵蒂冈勾心斗角，力图左右教皇及其亲信，以利用其宗教权威为自己的军事目的服务。沙俄政府也是如此。

在战争开始前半年的1914年1月成稿的前引外交部报告中贯串着这样一种思想：俄国政府与罗马教廷接近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与社会主义作共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沙俄国际政策的利益。此外，在报告中还指出：“勿庸置疑，我国如善于利用（驻梵蒂冈——舍英曼）外交代表机构，就

① 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11页。

能促使教会最高当局对各教区主教和僧侣施加更为有力的和实际的影响，其效果要比单独用全部政府法律来直接施加压力为好。但是如果在位的教皇是一位象利奥十三世那样的政治方面的大人物，那么也就不排除利用天主教会的国际力量和影响以达到世界政策的纯世俗目的的可能性。"①

1914年12月，英国政府在没有把问题提交议会审议（可能是担心遭到反对）的情况下向梵蒂冈派出外交代表团。当时曾宣布，派出代表团只限战争时期。然而从那个时候起，英国同梵蒂冈的关系一直没有中断。

390

该代表团秘书格雷戈里写道：许多年来在梵蒂冈一直没有法国和英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在那里表现得最为活跃的是德、奥两国大使。他们"垄断了这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于1914年末往那里派出自己的使团，以便阐明大不列颠王国的观点，证明它参战有理，

① 《红档》，1931年第4—5(47—48)卷，第184—188页；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22，第273—274页。着重号是文件原有的。文件上面有批语："大臣大人1914年4月批准。"

声明德国必须对它的行为，首先是在比利时的行为，负全部责任。①

俄国驻梵蒂冈代办写道：大不列颠王国使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同德国把持梵蒂冈进行斗争”②。

由此看来，大英帝国在战争一开始便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所追求的是军事政治目的。

格雷戈里写道：梵蒂冈是欧洲最好的情报机关。这里获取各种事件和战争进程的情报，要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政府都高明。大概都能看到天主教组织，特别是宗教修会在世界各地的网点，每天都自交战国双方源源不断地向梵蒂冈送来报告。③ 在某些人士看来，大英帝国使团驻梵蒂冈既可供宣传之用，又可作为联系交战国双方的渠道（一旦出现谈判机会）。④

大不列颠王国统治集团还指望在殖民地问题上，也象在爱尔兰问题上那样，取得宗座的支

① J·格雷戈里：《在外交的边缘上》，第91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02页。
③ J·格雷戈里：《在外交的边缘上》，第91页。
④ 同上，第101页。

持。这种支持梵蒂冈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给过他们，从而破坏了爱尔兰民族运动。格雷戈里在谈到自治领问题时声言：必须使政教范围内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最高政教当局亲善合作的气氛下解决①。

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奥匈帝国大使在梵蒂冈的活动十分活跃。奥国驻梵蒂冈使馆也忙于把“罗马问题”列入中欧列强的纲领之中。它也操心如何使得意大利教会方面的舆论对战争的罪魁祸首问题保持中立。胡达利断言：1915年两名宗座圣使（驻慕尼黑圣使弗里维尔特和驻维也纳圣使斯卡皮奈利）晋升为红衣主教一事，奥使馆曾间接施加过影响②。

391

由此可见，在梵蒂冈也进行着一场与前线战争紧密相联的特殊形式的外交战争。交战双方都力求得到这个天主教中心的支持，希望它在这场因战争而引起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在争取中立国

① J·格雷戈里：《在外交的边缘上》，第105页。

②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1806—1918年》，第290页。1915年晋升红衣主教者有六人，其中有五名意大利人（其中有驻维也纳圣使），一名德国人（驻巴伐利亚圣使）。

家方面，在镇压人民群众反抗血腥屠杀方面，能为自己这一方的利益服务。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教皇本笃十五世的亲信中间有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这是教皇四个私人秘书之一，巴伐利亚人鲁道夫·冯·格尔拉赫。据俄国驻梵蒂冈代办报告（1917年2月7（20）日）：尚在意大利参战之前，意国政府和协约国列强使馆都认为格尔拉赫是德国奸细，在罗马帮助埃尔茨贝格为德国进行宣传。意大利参战后，格尔拉赫仍留在梵蒂冈。据说，教皇禁止他离开梵蒂冈。但这一禁令显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其效力的。格尔拉赫不时招摇过市，“甚至还在那里执行官方任务……看来滥用职权的格尔拉赫蒙席是在充当德国政府同它在这里的暗藏奸细之间的中间人。”①

格尔拉赫的同谋意大利人或遭枪决或被判徒刑。而格尔拉赫则多亏梵蒂冈向意大利当局请求，只是被驱逐出境，迁至瑞士，然后缺席审理，判处无期苦役。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22，第4—5页。

教皇的和平祈祷

宗座虽然同情中欧列强集团，但同时却又竭力表白自己的中立。梵蒂冈积极开展“人道的”“维护和平”活动也莫不与此有关。

1914年11月中旬，梵蒂冈向各交战国建议圣诞节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一天。这一建议未被接受。萨宗诺夫电示俄国驻梵蒂冈公使涅利多夫，392说军事当局认为圣诞节停战“实际上不可能”①。彭加勒写道：教皇思想“如此不切实际”，以致于连“俄国圣诞节在时间上和我们并不一致”也都忘了。②

1915年1月22日，教皇向红衣主教们发表讲话，说流血不见有终止之日，他声言，不论哪一方违反正义，他都要予以谴责。本笃十五世声明他在战争中严守中立后，号召那些占领他国领土的人们除军事占领需要之外，不要去毁坏任何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4卷第2分册，莫斯科，1935年版，第168页。

② 雷蒙德·彭加勒：《在为法兰西服务的岗位上》，第1卷，第253页。

东西，特别要爱护教堂、僧侣和宗教权利。对于被占领国家的居民，教皇劝说他们不得破坏秩序，这样做才能不使自己的处境恶化（这首先是对比利时的，号召该国居民屈服于占领者）①。战争发生乃天主之意，它是对世人的一种惩罚，因为他们的全部心思都用于尘世俗事。最后教皇建议2月7日在欧洲各天主教堂，3月27日在其它各国教堂举行一次特别的祈祷仪式来祈求和平。

教皇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不仅世俗的军政当局未加支持，而且连交战国双方的教会上层也莫不如此。他们对和平呼吁都不以为然。因为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所想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和平，而是挫败敌方并实现其掠夺目的。他们担心举行祈求和平的特别祈祷将会使群众中的反战情绪增长。俄国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于1915年3月20日致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时写道："教皇圣谕在有倾向性解释的情况下会动摇陛下臣民为胜利完成战事所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②"沙皇政府根

① 转引自《教皇的和平图案》，纽约，1944年版，第20页；《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1915年，第1003—1004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8，第5页。

据这些理由认为，在俄国领土上执行教皇关于组织祈求和平仪式的命令不合时宜。”①

在法国统治集团中间，教皇的和平呼吁被认为是对德国有利的行为②。俄国驻梵蒂冈公使涅利多夫1915年2月4日（1月22日）向彼得堡393报告：法国政府“注意到教皇的创议影响居民政治情绪和干涉国家内政”，决定禁止公布和扩散教皇的命令和祈祷文。因此，“巴黎教区大主教阿麦特红衣主教立即发出牧函，解释说，教皇所祈求的和平，绝不应该必须理解为非马上就实现的和平，为和平而和平，而应理解为人类生活准则的和平，持久的和永世的和平……因而每个教徒在祈求和平时，都有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理解和平的自由，即都有把和平作为实现他所属国家民族愿望来理解的自由。其他的法国主教也都发表了意思相同的言论……”③在此以后，政府对教皇命令所加的禁令也就撤销了。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8，，第4页。
② 同上，案卷51，第3页。
③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7卷，第1分册，第173页。

那么教皇是否反对对他所提出的和平祈祷作这样的解释呢？没有。据涅利多夫报告："本笃十五世在同尼斯教区主教沙庞谈话后，完全同意在教皇祈祷词正文中各地牧师可因地制宜地加入本区教友最中听的思想。"①

红衣主教国务卿在答复涅利多夫有关沙皇政府不允许宣读教皇祈祷词的通知时说："每个人在祈求和平时，可以各有各的理解，一切悉听尊便，正象法国主教们对和平作的解释那样。"②梵蒂冈一点也不反对德国主教们把教皇的和平祷辞当作愿德国武装力量胜利的祷辞来解释，而法国主教们又把它当作愿法国武装力量胜利的祷辞，俄国主教们也不妨把它当作愿俄国武装力量胜利的祷辞。

由此可见，教皇1915年1月的和平言论以及以后的许多此类言论所能起的作用只是在群众中散播幻想，似乎本当对战争负责的资产阶级也能给人民公正的和平。

---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7卷，第1分册，第173页。

② 同上，第8卷，第1分册，第72页。

意大利参战

交战国双方之间进行着一场拉拢意大利的争夺战。而意大利统治集团则在等待时机，既与协约国又同中欧列强讨价还价，打算哪一方面出的394价高，谁得胜的机会多就跟谁合伙。

俄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波科列夫斯基于1915年1月15（2）日电彼得堡，向外务大臣报告他同意大利驻罗马尼亚公使就意大利在战争中的立场所作的谈话："公使厚颜无耻地认为今日之战场已树立了暂时的均势，而意大利参战则可打破均势而使任何一方力量增加。因此，要想得到意大利的协助，只有出高价才有可能。"①

梵蒂冈积极参与了列强争取意大利的斗争。

1914年12月，德前首相比洛以德皇代表身份前往罗马。他受命为德国游说意大利统治集团。比洛同梵蒂冈建立起联系。数日之后，埃尔茨贝格也抱同一目的前来罗马，指望利用自己同梵蒂冈各界的联系。比洛虽对埃尔茨贝格并无好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7卷，第1分册，第21页。

感，然而却也承认后者在罗马"竭诚效劳。"①

格雷戈里写道：德国竭尽全力来防止意大利参战（参加协约国一方）。埃尔茨贝格来到罗马，为的是对意大利天主教界人士施加影响。他常在梵蒂冈露面。对于他的积极活动，英国使团曾非正式地表示过异议。②

奥国政府也竭力使罗马教廷尽一切可能促成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取得一致，不让后者参加到协约国方面去。③

宗座对中欧列强所作努力也并非无动于衷。比洛写道："……本笃十五世热情支持我所作的旨在保持和平的努力。他希望保存哈布斯堡王朝这一最后的天主教大国。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奥国不拖延地作出牺牲，至少是放弃特兰提诺的条件下，避免战争才有可能……他授意维也纳教区大主教皮弗尔红衣主教就此事与老皇帝弗兰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3卷，柏林，1931年版，第209页。

② J·D·格雷戈里：《在外交的边缘上》，第97页。

③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1806—1918年》，第290—291页。

茨-约瑟夫谈谈。但当这位红衣主教谦虚谨慎、战395战兢兢地提起此事时，八十四岁高龄的老皇帝却根本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他老脸怒气冲冲，拉着红衣主教的手，一下推出门外。”①

奥匈帝国驻意大利大使马基奥男爵否认比洛的这段叙述，对这一事件另有说法。他写道，皮弗尔红衣主教全权委托他辟谣，彻头彻尾否认比洛所说的皮弗尔曾受本笃十五世之托前来游说，劝弗兰茨-约瑟夫将特兰提诺割让给意大利，而老皇帝则把他逐出门外。从来自各种私方而根本不是来自教皇方面的说法看来，确曾有人呼吁过他皮弗尔去迈出这样的一步，但是他谢绝在这种政治事件中对皇帝进言。他，皮弗尔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曾有一个巴伐利亚嘉布遣会修士，受埃尔茨贝格的差遣，竭力设法以这种思想来对老皇帝的亲信施加影响。实际上，比洛所说的那个建议，是由驻维也纳圣使斯卡皮奈利转告老皇帝的。皇帝的回答是，他宁肯退位也不能让出他所继承的土地，那怕是最小的一块土地都不能

① 伯·比洛：《回忆录》，第3卷，第228—229页。

让。[1]

是红衣主教皮弗尔还是驻维也纳圣使接受过教皇的委托都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教皇的计划和比洛的计划完全吻合，都是要奥匈帝国方面作出让步来把意大利拉进中欧列强集团。俄国驻罗马大使克鲁平斯基1915年1月22日（2月4日）向彼得堡报告时写道："……说比洛公爵插手——坦率地或不坦率地——奥国割让领土问题的推测可能接近事实……"[2] 同一个克鲁平斯基在1915年2月2（15）日写道，某些亲近德国驻罗马使馆和梵蒂冈的意大利报纸宣传说，意大利可以不经战争而从奥国手中得到更大的领土让步。[3]

协约国也竭力利用梵蒂冈的亲信为自己的利益对意大利施加影响。特别是大英帝国驻梵蒂冈使团更忙于这方面的活动。以使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主教集团，他们在有英国大使馆代

---

① 弗赖赫尔·冯·马基奥：《真相！比洛公爵和我在罗马，1914—1915年》，维也纳，1931年版，第63—64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案卷38，第20页。

③ 同上，第26页。

表参加的情况下定期集会，针对各种业已成熟的问题制订行动计划。①

396 梵蒂冈和意大利有影响的教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也有利于中欧列强。英国驻巴黎大使洛德·伯蒂在其1915年8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记载，说据大英帝国驻梵蒂冈大使亨利·霍华德说，教皇在思想情绪上并不反英，但却极端亲奥。② 1915年1月，国务卿哈斯帕里红衣主教曾对路德维希·帕施托尔说过：一旦意奥爆发战争，事情就不单是要求割让特兰提诺，而是推翻奥匈君主国的问题了。③ 因此，本笃十五世建议奥国皇帝在领土问题上要不战而让，以便保存君主国。

在意大利，也正象在别国一样，反对参战，反对参加任何一方的是劳动人民。"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及不久以后意大利也参加战争，从那时起，意大利无产阶级就坚决反战，劳动人民

---

① J·格雷戈里：《在外交的边缘上》，第94—95页。

② 《伯蒂勋爵日记》，第1卷，第227页。

③ 路德维希·弗莱黑尔·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第615页。

中的先进部分也准备好为反对战争而斗争，但是社会党仍然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它的活动也不能适应当时复杂的责任重大的任务……意大利参战后，在国内最发达的地区时有人民群众的怒火爆发……"①

1915年5月23日，意政府对奥宣战。在此前不久，4月13(26)日，协约国与意大利政府缔结协约，其中规定意大利参战将得到什么。该协约第十五条还写明："法国、大英帝国和俄国将支持意大利反对吸收至圣宗座的代表参加一切和平谈判和一切调解此次战争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的谈判的任何建议。"②

意大利争取把这一条款写进协议，意在防止宗座插手和会和在会上挑起"罗马问题"，而中欧列强至今仍把这一问题视为对付意大利的一张王牌。

在意大利，人们都清楚知道梵蒂冈倾向奥德，

① 《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斗争史》，莫斯科，1953年，第47页。

② 《俄国与他国条约汇编，1856—1917年》，莫斯科，1952年版，第441页。

因而也就存在着一种怀疑情绪，认为宗座希望意397大利失败。有鉴于此，1915 年 5 月 28 日天主教报刊公布国务卿哈斯帕里红衣主教的声明，扬言宗座保持中立，无意于给意大利政府设置任何障碍，教皇寄希望于天主，期待着自己处境的改善，但是不是依靠外国军队，而是依靠意大利人民的正义感得胜。[①] 国务卿红衣主教以此声明：在解决“罗马问题”时，梵蒂冈并不打算依靠外国军队。

然而，在意大利参战后，当中欧列强使节离开罗马时（奥兰多在议院声言这些使节是自行离开罗马的），《罗马观察家报》公布声明（1915 年5 月底）说，教皇处于不正常的境地，教皇已不能直接与部分交战国的使节往来。与此有关，就教皇应否在战时暂离罗马并接受西班牙国王的提议移居该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教皇决定仍留在罗马。[②]

这样一来，“罗马问题”依然是反意政策的一张王牌，仍是列强用以对梵蒂冈施加影响的王

---

①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 294 页。

② D·格温：《梵蒂冈与欧洲大战》，伦敦，1940 年版，第 37 页。

牌。1916年8月间，这一问题更趋尖锐化，因为根据意政府命令，先前曾作为奥匈帝国驻梵蒂冈使馆所在地的威尼斯宫被占用。宗座就此照会各国驻梵蒂冈使节，提出抗议。1916年8月18(31)日，俄国驻梵蒂冈代办H·博克向彼得堡报告："这一照会的非同一般的结尾令人惊异万分。神圣的宗座并不是抗议了事，他还力图唤起其它大国来谴责意大利的这一行为。无疑，这一企图必遭完全失败。依我之见，没有一个中立国（盟国就更不必说了）能响应他，因为任何的答复，甚至最持否定的答复，都意味着对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之间关系的干涉，对所谓'罗马问题'的干涉。"①

与此同时，梵蒂冈对意大利天主教徒议员麦达出任（1916年）政府财政大臣参加内阁持放心态度。"……一位最为知名的天主教运动活动家担任大臣并继续得到天主教各种团体组织和报刊的支持，这还是第一次。"②《罗马观察家报》写道：麦达是"有明确的天主教原则的人"。他入阁 398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75页。

② Дж·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411页。

"同意大利天主教徒的行为并不矛盾"，因为宣战前他们都是"中立主义者"，"但一旦对奥宣战，天主教徒就不能回避作为一个好公民的义务"①，即支持战争。

本笃十五世论战争

意大利参战一个月以后，教皇本笃十五世在与法国《自由报》代表拉塔皮谈话时就战争的各项重大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涅利多夫于6月29（16）日报告：教皇在谈话时"就此次战争所引起的所有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关于进行战争的方法和手段问题，还是纯政治问题（例如关于宗座在罗马的处境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如此明确，出乎意料，以致这一谈话的真实性，特别是这一谈话转述的准确性立即到处遭到非议，人们都很感兴趣地等待来自神圣的宗座方面的辟谣，即便是解释也好。"②

对于该报记者所问为什么梵蒂冈对德军在比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52页。

②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8卷，第1分册，第469页。

利时的暴行保持沉默，教皇的回答是：人们提出对德军的每一指控，都受到了反指控，要就此问题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他无能为力。他说，拿神甫作人质，并非只有德国人才如此。教皇指出："俄军也拿天主教神甫当人质，有一次还强使一千五百名左右犹太人当先，用这一活的血肉城墙抵挡敌方子弹，自己躲在后面前进。"① 至于德军向鲁文和兰斯大教堂射击一事，教皇说，据德军统帅部解释是因为德军遭到来自这两处的射击。而兰斯大教堂更被法国人用来当作一个观察哨。就邮船"卢齐塔尼亚号"沉没事件教皇声明说，这无疑是一件重大的罪行，另一方面协约国对中欧列强的封锁，其目的也是使千万无辜百姓挨饿。②

就实质而言，教皇在谈话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399 上，都明显地采取了亲德立场。

教皇同记者的谈话，引起协约国列强驻梵蒂冈代表的抗议。梵蒂冈国务卿哈斯帕里必须作出解释。哈斯帕里红衣主教在同教权派报纸《意大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8卷，第1分册，第248页。

② 《1915年年鉴》，伦敦，1916年版，第209—210页。

利邮报》代表谈话时，声明拉塔皮从全文中断章取义歪曲了教皇的本意，说教皇没有谈到奥国人针对俄军在加里西亚所作所为而提出指控，他没有得到俄方关于此事的情报；至于说在比利时境内对僧侣和教会施加暴力一事，则无论是教皇，还是他的国务卿办公厅，都未曾从德国总督处得到比利时境内究竟发生何事的情报；教皇本想防止意大利参战；在它终于参战之后，他又恪守中立；关于“卢齐塔尼亚号”沉没事件，则教皇对此甚感痛心，但却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尚未有可能了解事情的真相。①

教皇所作的与梵蒂冈宣布的中立背道而驰的答记者问，就这样由他的国务卿一一作了更正。1915年6月13（26）日，哈斯帕里“主动”表示愿向俄驻梵公使涅利多夫就教皇同拉塔皮谈话中涉及俄国的一个地方作一番解释。哈斯帕里承认，这处地方“经编辑在报章上引用，可能有开罪俄国之处”，哈斯帕里解释说，教皇在提及奥国人指控俄国军事当局在加里西亚的行为时，既无

① 《1915年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第1006页。

对行为的这一方式加以评论之意，也非承认事实可信，只不过是想要以此为例“证明他不可能对交战双方发表明确的评论，特别是不可能对任何一方加以谴责①。”

经涅利多夫坚决要求，《罗马观察家报》刊登俄国驻梵蒂冈使团就教皇答记者问时涉及俄军在加里西亚的行为部分所作的辟谣。经大英帝国公使坚决要求，国务卿红衣主教写信给他解释为什么教皇认为可以开诚布公地同拉塔皮谈话，然后斩钉截铁地声明：“圣父的意见认为，英国对付德国所采取的严密封锁（包括禁止为和平居民运进粮食）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不构成违法行动；不言而喻，教皇在同拉塔皮谈话中提到这一点时，并无意表示说英国破坏了这些法规。”② 大英帝国使臣霍华德在接到此信后声言，他打算公布信中所陈述的解释，但国务秘书处对此坚决反对。这不足为怪，因为教廷国务卿的新解释使梵蒂冈声名受损，其程度不下于教皇的答记者问。 400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0，第31页。

②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8卷，第1分册，第470页。

给比利时驻梵蒂冈大使也有一信，“其中心思想可归纳为：虽然圣父没有可能就比利时和德国两方互相矛盾的论断表示自己的意见（比利时说它的中立由于德军的入侵而遭受破坏，德国则宣称比利时早在战前即以其与英国订立的可疑的协议自行破坏了中立），但是由于连德国首相本人也在国会演说中承认德军进入比利时是非法的，唯一的理由是军事需要，那么不言而喻，德国人在比利时的军事行动，就是一起教皇在其新历1月22日枢机会议圣训中所大声谴责的非法行为，因而教皇同拉塔皮谈话中也不能另作解释。”①

最后，教皇在一次谈话中也不得不对法国表示一点好意。在同《盖多马得尔评论》主笔洛德先生谈话（发表于7月3日《费加罗报》）时，“教皇力图向他的交谈者证明，他的‘中立’并不意味着他对一切漠然处之，他热爱法国，‘不只是天主教的法国，而且也热爱一般的法国’，并表示只要一有可能便要真心实意地竭力来证明这一点。”

涅利多夫在报告了所有这些事实后，作出如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8卷，第1分册，第470—471页。

下结论："综上所述，结果是本笃十五世不得不几乎处处否认拉塔皮先生就战争问题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说法，这一短处当然无助于宗座的'最高道义权威'，只是给报界提供新的话柄，使其无休止地议论教皇对欧战的真正态度及其趁机追求的目的等等。"①

梵蒂冈无论是在比利时中立受破坏的问题上，还是战争的其它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都引起天主教界人士，特别是协约国天主教徒的疑虑。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红衣主教博恩于1915年5月30日发表声明(后以评论性小册子形式出版)，401 为教皇的立场辩解。他对批评教皇者，特别是因教皇在比利时问题上保持缄默而对他批评的人们提出异议。② 其他的天主教活动家也纷纷发表文章为教皇的立场辩解。③

1915年11月2日（10月20日），涅利多夫向萨宗诺夫报告他同当时教廷非常事务圣部秘书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8卷，第1分册，第469—474页。

② D·格温：《梵蒂冈与欧洲大战》，第3—4页。

③ 参见《十九世纪以来》，1915年10月号，第851—861页。

帕切利蒙席（1939年起任教皇，为庇护十二世）的一次谈话，举行这次谈话是因为当时意大利教权主义报刊上出现一些文章对俄国政府的政策和目的，特别是它对君士坦丁堡的要求表示不安。涅利多夫向帕切利声明："对于一份机关报刊来说，虽说有人并不承认它为半官方的，但是尽人皆知它受神圣的宗座（这位以超国家和原则上调解权威自居的人物）的影响，提出微妙的问题是否合适，何况其形式又足以在俄国引起不友好的猜测，而在协约国中间至少会引起疑虑……"

涅利多夫在谈到他同帕切利的谈话时写道：他"不能不确信俄国在帝都立足与圣索非亚①可能受难的前景现已成为天主教界人士首先关注的问题。"②

梵蒂冈偏袒德国军阀。1915年9月26日教皇在给德国富尔特主教会议（会议曾向威廉二世致效忠电）回信时写道，他对众生在战争中死亡和种种破坏后果深为痛心。到处都渴求和平。教皇在同

① 帝都系指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即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译者

②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9卷，第136—137页。

一信件中写道：那些自以为得到允许可以书面或口头谴责别国天主教徒行动的人们已离开通向和平的正道而误入歧途[1]。显而易见，教皇的这番话首先是针对协约国天主教活动家的。他们抨击德国军阀，并谴责支持这个军阀集团的德国主教团。

梵蒂冈帮助德国部队在被他们占领的地区站住了脚。首先是在比利时，而该国居民强烈反对掠夺者。比利时红衣主教迈尔西埃在其1914年圣诞节文告中谈到，由于德军入侵国内被洗劫一空，谈到德国抛弃了自己承担的义务。德国在比402利时的占领当局禁止僧侣宣读迈尔西埃的文告，而迈尔西埃本人也遭软禁。

比利时的主教和天主教徒都期待教皇对德国的所作所为能有所谴责，但是教皇并没有这样做。[2] 他倒反而力求使比利时人民安于现状。埃尔茨贝格写道："我敢说，由于罗马教廷的努力，终于使得德国军事当局和比利时教会的最高机关能勉强共处。"[2]

---

① «1915年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第482页。

② J·格雷戈里：«在外交的边缘上»，第91页。

② 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204页。

梵蒂冈的某些看起来似乎是纯宗教的活动，实际上也只是有利于三国同盟的。战争一开始，结盟双方之间便展开了一场争取保加利亚参加自己一方的斗争。结果于1915年9月保加利亚政府参加三国同盟，并于同年10月参战。1915年3月，正当争取保加利亚的斗争趋于特别尖锐的时候，梵蒂冈撤销了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896年因太子鲍里斯改信东正教而将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革出教门的命令。

涅利多夫就此于1915年4月9（22）日写道："教会在保加利亚君王执行亲俄政策时给以上述处罚，而在其政治倾向彻底转变时则又取消这一处罚，这种吻合使我惊异。因此我认为向国务卿红衣主教询问这一'宽恕'的细节以及此事为什么正巧在现在，都是很有趣的。哈斯帕里红衣主教只向我证实确有其事，至于时间的吻合无任何缘由……"①

实际上，事情并不象哈斯帕里所说的那样。俄国驻索非亚公使萨文斯基1915年3月28日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0，第62页。

(4月10日)密电报告有关教皇撤销对国王斐迪南革出教门的处分一事时说:“因为这一措施看来是在奥国驻罗马大使的参予下实行的,所以很可能其真正原因是奥国人想要讨好那位因被革出教门而甚感烦恼已三番五次申请撤销这一处分的国王。”①

1915年2月,列多霍夫斯基伯爵当选为耶稣403会总会长后,德奥集团战时在梵蒂冈的影响也就更大了。列多霍夫斯基是德籍波兰人,同普鲁士和奥地利地主贵族以及这两国的教会上层人士都有联系。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受到德国的激励,据伯蒂勋爵之见,都指望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胜利会使教皇收回相当一部分昔日的权力。②

梵蒂冈参与各帝国主义互相勾搭的尝试

早自1915年初,在交战国双方统治集团内部即已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寻求妥协的倾向,出现一种想要摆脱战争,缔结帝国主义和约的倾向。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63,第1页。

② 《伯蒂勋爵日记》,第1卷,第299页。

"有两个基本原因使得各帝国主义需要终止他们所发动的战争：作战资源的枯竭和人民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①弗·伊·列宁于1915年写道：交战国双方的资产阶级都要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和平。他写道："一般的和平无疑谁都赞成，甚至基特切涅尔、霞飞、兴登堡和暴君尼古拉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要提出对'本'民族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即掠夺性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条件。"②

同资产阶级的和平纲领针锋相对，列宁坚持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纲领。他写道："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不在各国进行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民主的和平就是不可能的。社会党人不能容许资产阶级的政客用民族自由的空话欺骗人民，而应当向压迫民族的群众说明，如果他们帮助压迫其他民族，如果他们不承认和不坚持这些民族有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那末，他们自己的解

① 《外交史》，第2卷，第29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68—269页。

放也是没有希望的。"①

和平谈判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进行。

1915年1月14日，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巴赫麦捷夫电告彼得堡说，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传播关于德国准备以恢复德国战争前夕的状况为条件停止战争的谣言，又说美国总统已决定派私人朋友豪兹去弄清真相：德国是否真的寻求和平？条件如何？② 404

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向本国报告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启程赴柏林一事，伦敦回答说："美国政府对英国如此不讲交情，建议要美方出来干预是不可想象的事……"③

瑞典国王④以及瑞典的和别国的银行家⑤都自愿效劳充当德俄两国之间的调解人。1915年末，福特以"和事佬"身分前赴欧洲。关于他此行使命，巴赫麦捷夫写道："人们的猜想不无根据，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72页。

②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7卷，第1分册，第12—13页。

③ 同上，第100页。

④ 同上，第275，332页。

⑤ 同上，第8卷，第2分册，莫斯科，1935年版，第104页。

他的事业只不过是富于想象的德国宣传的一种新表现形式而已……”①

梵蒂冈也积极参与了列强关于摆脱战争和缔结和约的幕后谈判。它还更积极地奢谈资产阶级可能缔结正义和约欺骗各国人民。

在战争的进程中，由于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日益发展，梵蒂冈上层集团担忧惶恐之心与日俱增。梵蒂冈对奥君主国的命运特别深感不安。埃尔茨贝格在谈到1915年访问教皇的情景时写道：教皇痛心地谈到了战争，“顺便还指出：如果战争长期拖下去，那么将会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②

这样看来，教皇调解争端的基本动机原来就是急于从战争中脱身，以防止革命发生。

尚在1915年3月，本笃十五世就声言愿意负起维也纳和协约国之间的调解的责任。③

斯福尔扎指出，随着中欧列强取胜的前景日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9卷，莫斯科，1937年版，第471页。

② 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43页。

③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303页。

益渺茫，本笃十五世自战争开始以来一贯主张的那种和平，便日渐成为同盟国所希望的了。而协约国则千方百计抵制这种和平。①

德国统治阶级把希望寄托在教皇和他的调停 405 上。比洛写道："和谈最理想的中间人该是教皇本笃十五世了。他对德国及其奥匈盟友怀有亲善友好之意是勿庸置疑的，正如他对和平怀有真诚的爱一样……"② 据比洛说，威廉二世的侍从将军冯·赫利乌斯告诉过他有关德皇的情绪，对此他写道："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补充一句：这里有着一种意见，认为教皇入春后一定会出面建议和谈，并以调解争端自任。这一想法甚合陛下之意。自然，这只是在军事现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③

俄国驻伯尔尼公使巴赫拉赫特于1915年11月3日（10月21日）向彼得堡报告：由于德国政府代表比洛公爵抵瑞士，此间谣言四起，似乎他此行目的是为了判明和谈的可能性。巴赫拉赫特写道："……更有可能的似乎是公爵有意同至圣

①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第203—204页。

② 伯·比洛：《回忆录》，第3卷，第266页。

③ 同上，第215页。

的宗座进行谈判。昨天他去过有名的埃因齐德尔修道院，同教皇圣使马尔克季会晤。”① 关于比洛同与梵蒂冈有关系的各种人物的会晤，巴赫拉赫特在另一电报，即 1915 年 11 月 25 (12) 日电报中也作了报告。据他说，法国大使向他说：“12 月 6 日 (11 月 23 日) 梵蒂冈将要召开一次御前枢机会议，据说教皇意欲在会上发表告各国人民书，呼吁和平。科隆大主教哈特曼红衣主教将参加会议。威廉皇帝似乎也欲在那时向全世界发布宣言：德国同意停战，以宽大为怀，让出比利时和所占的法国领土，恩赐波兰独立，为本国要求的仅是海上自由和殖民方面与经济方面的补偿……”②

枢机会议于 1915 年 12 月 6 日在梵蒂冈召开，哈特曼红衣主教参加了这次会议。教皇在枢机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公正的和平”，据他说，这种和平要通过双方让步的途径方可达到。教皇说，需要的是交战国之间直接地或通过中间人交换意见。

406 教皇的更为具体的和平纲领，梵蒂冈国务卿

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 9 卷，第 152 页。

② 同上，第 357 页。

向1915年9月晋谒梵蒂冈的法国主教博德里亚尔做了阐明。这个纲领要点归结如下：保存法国的领土完整及其大国地位；比利时独立及其领土完整；保存作为大国的奥匈帝国（但这并不排除从它这方面对意大利作出让步）；成立波兰国，其国界以情况所许划定（梵蒂冈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容后再述）；巴尔干地区应有能排除俄国势力和使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摆脱其影响的体制。①

教皇的议和条件是恢复战前欧洲的状况。教皇"和平纲领"中有一系列条例都是旨在反对俄国。

命运如此富有讽刺意义，以致在梵蒂冈人们所关心的不仅只是奥匈君主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命运，而且还关心土耳其的命运，而当时巴勒斯坦及在耶路撒冷的"圣地"却在土耳其的掌握之中。梵蒂冈宁肯让"圣地"继续由穆斯林的土耳其来掌管，也不愿它落入新教的英国或法国之手。梵蒂冈向法国政府提出建议，一旦协约国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应将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交

① D·格温：《梵蒂冈与欧洲大战》，第41页；H·约翰逊：《罗马教廷与意大利王国》，伦敦，1905年版，第105页。

东方仪式的天主教徒。①

协约国则认为，教皇的和平呼吁和建议是对中欧列强有利的一种举动。美国驻巴黎大使沙尔普在1915年8月6日向华盛顿报告时写道："在战争周年教皇对交战国各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呼吁，遭到法国报界的冷遇……"②

美国国务卿兰辛1915年8月18日上书总统威尔逊时写道，在当今的条件下，当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敌方的大片领土之时，这些大国将会欢迎中立国的议和的主张，因为它们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可以此来索取部分所占领土，此外，还可得到财宝作为赔偿。至于说到协约国，则它们不愿在目前的军事态势下考虑和平问题。要同占407 领本国领土的敌人缔结能使自己感到满足的和约，它们是无能为力的。③

伯蒂勋爵1915年8月1日的日记中有关于

① 弗里德里希·里特·冯·拉马：《罗马教皇和教廷对世界大战的政策》，伊莱尔蒂森，1926年版，第49—54页。

② 《1915年美国对外政策文件》，华盛顿，1928年版，第52页。

③ 《美国对外政策文件，兰辛文件，1914—1920年》，第1卷，华盛顿，1939年版，第13—14页。

教皇和平呼吁的记载：谁能判定教皇的议和条件是合理的呢？也许教皇的顾问们认为，教皇在法、意、比三国天主教徒中间造成不和会有利于德奥两国。法国对教皇甚为不满。这可能推动法国去成立独立于罗马的教皇权力限制主义教会。甚至连神甫也都对教皇对法国的态度而感到愤慨。①

梵蒂冈在其“调解”计划中对美国寄予极大希望②。1915年9月5日，伯蒂在日记中写道：“我不喜欢教皇坚持放出的试探气球。他通过吉邦红衣主教来迎合威尔逊总统的虚荣心，鼓励他为‘跛脚和平’自愿效劳。根据目前法国军队和老百姓的情绪，这样的和平是法国所不能接受的。”③

要真正公正和平的是人民群众，是劳动人民。

---

① 《伯蒂勋爵日记》，第1卷，第209页。

② 见《1915年美国对外政策文件》，第41页。

③ 《伯蒂勋爵日记》，第1卷，第231页。吉邦红衣主教受梵蒂冈委托于1915年9月2日谒见威尔逊，并向他转述了教皇的观点（D·格温：《梵蒂冈与欧洲大战》，第41页）。美国驻罗马大使1915年3月报告说，罗马盛传有关美国派往梵蒂冈的官方代表此行使命的谣言。（《兰辛文件》，伦敦，第1卷，第722页）

正是他们才饱受战争之苦，战事旷日持久之苦。

1915年2（3）月，弗·伊·列宁写道："在今天，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争取革命行动，这只能散布幻想，使无产阶级相信资产阶级的仁慈，使他们成为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具，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①

梵蒂冈力图阻挠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它号召各国人民祈求和平，要他们寄希望于那些发动战争的人们和那些对以强盗和约来结束战争感兴趣的人们。梵蒂冈同情交战国的一方（德奥联盟）并对它们千方百计地予以帮助。当它深信无疑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对战争的不满随时会爆发成革408命时，就出面充当和事佬，以谋求缔结帝国主义和约，更确切地说达成交战国双方统治集团之间的妥协。

但是，教皇的和平呼吁仍然在一心想要和平的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不知道教皇调解争端的内幕和教皇政策的动力。教皇在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40—141页。

人民群众面前扮演和平战士的角色，这使他的威信在群众心目中大为提高。弗兰茨·梅林于 1917 年 8 月写道："教皇在战争时期就以训诫和警告语气大唱反战高调，执行着一种只有从教廷的观点来看方可执行的最聪明的政策。"①

弗·伊·列宁于 1916 年年底在谈到世界政治正在开始转变时写道："许多资产阶级政府在世界政治中从帝国主义战争到公开主张帝国主义和平的转变。"② 这一时期，也正是梵蒂冈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是它对事态的进程干预更为坚决的时期。这在 1917 年 8 月 1 日教廷的和平照会中得到了反映。

梵蒂冈与德国的和平照会

（1916 年 12 月）

1916 年 12 月 12 日，德国政府正式提出开始和谈的建议。德军在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地区取得胜利以后，德国统治集团认为时机对缔结和约有利。和谈建议应当表现出德国"爱好和平"的诚

① 弗·梅林：《在战争的日子里》，莫斯科，第 27 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208 页。

意。它也是对德国（以及其它国家）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的一种让步。“德国外交界此举追逐双重目的：其一，假装爱好和平姿态，一旦此种姿态受到协约国方面拒绝，即可作为借口，向世人声称，战争之拖延，责任完全在协约国一方。德国人事先业已准备好的宣布‘毫不留情的’潜艇战有理可循；其二，一旦协约国同意，德国外交界即可望利用和谈来分裂敌方，以牺牲其它成员国为条件同协约国中任一国单独媾和。现已清楚：尚在1916年11月，柏林与维也纳已就两国在和409平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达成了协议。”①

德、奥两国照会经美国、瑞士和西班牙政府转交给各交战国。照会也送致教皇一份，并附有专函。致教皇书声称德国及其盟国都建议着手和谈，以终止流血牺牲。专函结尾部分盛赞教皇“调解”之功，并声言：“德国政府认为自己有理由指望四国同盟各成员国提出的倡议能受到教皇方面的好意对待，指望它们所作的有利和平的努力可能得到至圣的宗座的宝贵的支持。”②

① 《外交史》，第2卷，第294页。

② 《欧洲导报》，1916年12月，第363页。

奥匈帝国政府也照会教皇，请求他支持中欧列强和平创举，这一点梵蒂冈确也做到了。

根据现有各种材料可作出结论：教皇不只是单纯地支持德国的新“和平行动”，而且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梵蒂冈同意下开始的。

据埃尔茨贝格说，尚在1916年6月他已受德国外务大臣委托通知梵蒂冈，德国政府乐于接受教皇在缔结和约问题上担任中间人。①

俄国驻罗马大使在1916年12月3（16）日的密电中写道：“我得到可靠情报，德国此举梵蒂冈在事先即已知悉，德国已将议和条件告诉它。有一位教界非常有权威的人士曾把这些条件概括如下：对英、法、比三国，恢复战前状态。对意大利，向意国割让特兰提诺，并保证意大利人在的里亚斯特的特殊地位，“对俄国，保持西部边界现状”，“彼此承认对方所占之领土，这对德奥绝对有利”②。

1916年12月7（20）日，H·博克向彼得堡

① 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271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6年，案卷29，第2册，第643页。

报告，在一般性外交接见时，国务卿哈斯帕里曾问起过他，他对"德国最近这枚炸弹"即对德国照会能说些什么。博克回答说：除报纸上的消息以
410 外，他并未得到任何有关的正式情报。博克写道："谈到这里，我补充一句，他（指哈斯帕里——舍英曼）显然已得知全部详情细节，包括照会的来龙去脉和所提出的条件。对此，国务卿红衣主教向我声明，说德国人确已将其建议照会至圣的宗座，但是有关细节与条件，他一概不知。红衣主教哈斯帕里这一声明是否真诚，我以为很值得怀疑。"①

博克接着报告道：德国建议一公布，罗马天主教报刊就开始坚持必须要向读者介绍德国的条件，并证明如果不全面斟酌这些条件是否可以接受便盲目拒绝是有害的。

博克指出意大利天主教活动家对德国照会持肯定态度。他写道：然而"参加议会的天主教党却通过其议员之口表示希望意大利政府根据意大利利益考虑德国的建议"，"很难设想，仅仅和平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65—166页。

愿望就能使意大利天主教徒接受这种观点。人们认为受梵蒂冈鼓励的报纸和集团得到了梵蒂冈的指示：德国人所提出的和谈建议无论是对天主教会，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对意大利，都是有利的。这种想法看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①

这样看来，梵蒂冈不只是单纯的谈判中间人，它在事先即已知悉德国的计划及其媾和条件，并谋求协约国不要拒绝德国的建议。

劳合·乔治写道，哈斯帕里红衣主教声言，他有理由相信德国条件是适中的②。劳合·乔治指出，多数红衣主教同情奥国。

美国驻罗马大使佩奇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在1917年1月22日书面报告兰辛：有关当代外交界所采取的行动梵蒂冈消息灵通，了如指掌。它知道德奥两国究竟有哪些条件③。佩奇指出：“梵蒂冈为奥国大卖力气，这一点是一清二楚的。”④ 411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66页。

② 《戴维·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第3卷，1934年版，第1105页。

③ 《兰辛文件》，第1卷，第751页。

④ 同上。

德国的建议未被接受，因为协约国外交界得出结论：这些建议旨在分裂协约国。

梵蒂冈为何坚持要人们接受德国的建议一事，博克曾在1916年12月7（20）日的紧急报告中谈到。他写道，教皇作为教会首脑，不能不渴求和平。此外，“还存在着一个狭义的物质原因”，战争爆发后，原先从各国源源不绝地流入梵蒂冈金库的钱币暂告中断，因为战争使天主教徒众多的国家都民穷财尽，战争的继续使教廷国库有枯竭的危险。“最后，可以在除对俄国有所损失以外，对其它国家都是平局的条件下结束战争，这样的和平在梵蒂冈看来，至少是在梵蒂冈的实力派看来，是对天主教会有利的和平。”①

梵蒂冈一心要帮助德国和奥匈帝国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摆脱战争，在这方面它究竟走得多远，有一个迅速结束战争的方案可以证明。宗座正好是在德国政府提出和谈照会的时刻向美政府提出这个方案的。1916年12月29日，佩奇书面报告兰辛：梵蒂冈国务卿哈斯帕里红衣主教有一次同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67页。

一位与佩奇有联系的人士谈话时声言（他明知这一谈话将传至美国驻罗马大使处），说美国完全有能力在二十四小时内达到和平。当问到美国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时，哈斯帕里的回答是："那很简单，只要严格按中立国准则行事。"哈斯帕里进一步解释道：美国只需中止同协约国的贸易（而它们又不能同中欧列强贸易），就足以使战争结束。当对方表示异议，认为这种行为将被协约国视为不友好的行为时，哈斯帕里回答道：美国政府能找到应付的办法，可以声称它已无力再向外国运送装备和粮食，因为所有这些物资美国自己也需要。①

梵蒂冈的外交官们都热衷于上述思想。1917年3月20日佩奇书面报告兰辛说，1916年12月曾到他那里去向他讲述同哈斯帕里红衣主教的一席谈话的那个人又来向他陈述同一主意：美国总统能以禁运粮食和装备为手段立即中止战争。此后不久，兰辛收到了梵蒂冈有关此事的致美国总统书。②

---

① 《兰辛文件》，第1卷，第744—745页。

② 同上，第760—761页。

412

战争年代的梵蒂冈与俄国

俄国驻梵蒂冈公使涅利多夫在1916年1月22日（2月4日）的紧急报告中论及战时协约国与梵蒂冈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指出："协约国列强在梵蒂冈的地位以俄国最差……"①

前面已经援引过驻梵蒂冈临时代办H·博克1916年12月7（20）日所作报告，他说在梵蒂冈看来，至少是在梵蒂冈实力派看来，有损于俄国的和平对天主教会甚为有利。

一系列有关天主教会在俄国的活动和地位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梵蒂冈与俄国政府之间在战前就已有的磨擦的原因。在这方面起不小作用的是：沙俄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力图保持东正教（革命前俄国国教）的正统的地位。

然而把这看成是梵蒂冈在战时奉行反俄政策的唯一原因是不正确的。战争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把自己同中欧列强联系在一起的宗座主张按照中欧列强的利益来解决这些问题。波兰问题就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9页。

是这类问题中的一个。

梵蒂冈对战争初期俄军所占领的加里西亚的局势表现极大的关切。引起这种关切的不仅只是合并派教会及其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伯爵的处境，而且还有俄军对加里西亚的占领触犯了奥匈帝国。

梵蒂冈教界人士认为，有俄国参加的协约国的胜利会导致东正教势力的加强而使天主教受到损失。1916年1月，涅利多夫书面报告说，天主教报刊对俄国在加里西亚的行动及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意图怀有戒心。他写道：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不只是敌视俄国的势力，而且主要是害怕给天主教带来损失。①

加里西亚合并派教会首脑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伯爵于1914年秋在俄军占领利沃夫后被放逐到库尔斯克。多年以来，这位教长的活动一直是同德奥政策以及加里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 413 义分子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奥匈君主国统治集团指望：一旦战争开始，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9页。

舍普季茨基都主教及其领导下的教会就能大力帮助它实现其攫取乌克兰的计划。

尚在战争之前不久，舍普季茨基即拟定了一份有关乌克兰军事、民政和教会结构的报告为奥军占领乌克兰后应用①。这份报告上注明的日期是1914年8月15日②，一开头便写道："一旦常胜的奥国大军进入俄国的乌克兰，那么我们需要加以解决的便是一项三重性的任务：本区军事、司法和教会组织的任务。"舍普季茨基写道：任务在于"尽一切可能从俄国完全夺取"乌克兰各省。都主教建议：要使乌克兰从属于奥匈君主国，根据奥皇旨意，任命一位奥匈军的"最杰出的统帅"为该地之盖特曼，在乌克兰颁布奥国的法典，并建立独立自主的乌克兰教会，要尽量摆脱俄国东正教教会，以巩固奥国的统治。规定这个教会为奥国皇帝祈祷，而不为俄国沙皇祈祷。必须从日历中将"有关的（大俄罗斯的——莫斯科的）圣者除名"。教会的命令必须以"加里西亚和全乌克兰都主教"的名义即舍普季茨基的名义颁发。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ОПО 全宗，案卷161，第195页。

② 同上，第247—249页。

舍普季茨基深信，梵蒂冈一定会赞许他将要做的一切。他在其报告中写道："作为都主教，我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根据东方教会的教规①和我先辈的惯例，我有权（这一权力得到罗马赞同）在所有这些地区行施教权……"

舍普季茨基接着写道："罗马是会在事后同意所有这些决定和任命的。② 而且所有这一切（政府所供养的）东方主教们也都会赞许的。〔«Die Morgenländischen Pafriarchen (durch die Regierung gezahlt)werden sie auch approbieren»〕。舍普季茨基在其报告的结尾部分写道："所有这一切，我都可以使罗马方面加以承认，或者更明确地说，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准备好了所有这一切。"(«Ich würde③ deren Anerkennung in Rom dursetzen oder eher habe ich sie schon zum grössten Teil vorbereitet»)④。 414

---

① 德文文本中是"Nach den Principien"

② 此句在德文文本中被划掉。

③ 德文文本中划掉 musste 一词。

④ 德文文本中划掉 durchgesetzt 一词。

1914年8月21日，舍普季茨基致书“边疆乡镇和加里西亚各教区”的教民，号召他们同俄国作战，因为合并派天主教徒“正准备为神圣的信仰而战”。他写道：“奉上帝之命，我们同奥国和哈布斯堡王朝联结在一起。”①

对于这位教长的两面三刀的作风，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证明：他在俄军占领加里西亚后被逐出加里西亚，从基辅上书尼古拉二世，其中写道：“加里西亚三百万俄罗斯居民把俄国军人当作自己的兄弟，满怀喜悦地加以欢迎……”②

有一位加里西亚军事总督手下处理外交文件的官员于1915年4月28日报告席林男爵（外交大臣办公厅长官）：在利沃夫都主教处查找到的文件“可以确定舍普季茨基同柏林的联系无可置疑，他的活动是为奥军统帅部效劳的”③。

德奥宣传机构就驱逐舍普季茨基出利沃夫以及合并派教会在加里西亚的处境两事大做文章，掀起反俄运动。梵蒂冈所领导的教权主义集团也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ОПО 全宗，案卷161，第23页。

② 同上，第49页。

③ 同上，第65页。

参加了这个运动。因为在乌克兰和俄国传播天主教的事业中，梵蒂冈对合并派所寄希望颇大。1914年11月，涅利多夫向彼得堡报告，说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纷纷向他提出有关加里西亚合并派教会和舍普季茨基的问题①。

1914年11月，红衣主教国务卿通过俄国驻梵蒂冈代表提出让舍普季茨基去加拿大的申请书。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梵蒂冈接二连三地提出恢复舍普季茨基自由的方案，其中包括以他来交换被奥军俘虏的俄国新闻记者③。

1916年7月，红衣主教哈斯帕里向俄国驻梵蒂冈代表提出恢复舍普季茨基自由的三项建议：(一)，建议让他移居加拿大；(二)，让他移居英国，受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博恩的管束；(三)，移居罗马，责令他不得离开梵蒂冈④。1916年8月，H·博克报告彼得堡时写道：从1914年年底开

415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4年，案卷257，第161页。

② 同上，第164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7，第16、19页。

④ 同上，第32页。

始，“舍普季茨基事件成了俄国同梵蒂冈关系中主要的纠葛”①。

1914年11月教皇向涅利多夫声称：“我的朋友萨宗诺夫先生”（外交大臣）“既然容许把都主教放逐到俄国内部，想必他掌握了足够有关都主教的有份量的政治上的罪证。他很愿意了解加于都主教的罪状。”②有鉴于梵蒂冈新近一再提出的请求，萨宗诺夫于1916年给哈斯帕里寄去从舍普季茨基伯爵公文中找出来的他亲手写的报告草稿的照片。这个报告“可以揭露他的旨在从俄国分裂西南地区的活动”③。

1916年11月28日（12月11日），H·博克书面报告彼得堡：在萨宗诺夫致书红衣主教国务卿提出了“舍普季茨基的详尽无遗的罪证，并以使他声名扫地的文件的照片加以说明”以后，关于舍普季茨基的问题一度失去了其尖锐性，“似乎已退居次要地位”。但由于1916年末都主教被转移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760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4年，案卷257，第164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ОПО全宗，案卷161，第90页。

到东正教修道院（苏兹达尔的斯帕索-叶弗菲米叶夫斯基修道院），“归东正教领导和监督”，这个问题又再度尖锐化①。

战时俄国同梵蒂冈的关系也因合并派教会在加里西亚的遭遇而复杂化。尚在1914年12月，驻罗马大使克鲁平斯基电告彼得堡：“在敌视我国的教权主义权势集团中间和报刊上有一条消息广为流传并受到恶意的评论，说什么我们似乎在强行要求加里西亚的天主教徒改信东正教……”②

1915年2月12（25）日，涅利多夫报告，教权主义报刊开展经常性运动反对加里西亚俄国当局，说俄国当局强迫合并派教徒改信东正教，流放合并派神甫。③

帝俄军事和民政当局也搜集各种有关德、奥、匈军事当局在其军队所占领的俄国领土上逮捕东正教神甫以及它们劫掠和毁坏教堂、亵渎神明的 416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60—161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4年，案卷34，第149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50，第11页。

材料[①]（从来往公文判断，是转给俄国驻梵蒂冈代表的），双方都揭发对方藐视宗教、迫害宗教，以便使敌方在公众舆论心目中声名扫地。

实际上，双方都不考虑自己占领区居民的宗教感情，尽管交战国双方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统治阶级都竭力使人相信他们同时也是在为上帝和宗教而战。奥匈帝国和德国统帅部得到本国教会上层的赞同不惜迫害占领区的僧侣和宗教机关。而沙俄政府和军事当局也在东正教主教们的赞同和积极参与下，为了东正教的利益在加里西亚实行强行传布东正教的政策。都主教沃雷恩斯基·叶弗洛基在加里西亚开展积极活动，指望在那里开创大量的基层教区。[②]

沙皇俄国在加里西亚所奉行的，也就是奥匈君主国在此间数十年来所一直奉行的帝国主义奴役政策。

弗·伊·列宁指出，揭穿沙俄的及其它参战国的掠夺政策都极有必要。1915 年他写道："大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47，第 1—27、33—41 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ОПО 全宗，案卷 162，第 26 页。

谈比利时而不谈加里西亚，就是犬儒主义。”① 早在1914年秋，弗·伊·列宁在《给<前进报>和维也纳<工人报>的信》中写道：“我深信各国社会党人的义务是同本国（不只是敌对国）的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激烈地抨击了沙皇制度，并附带谈到了乌克兰的自由。但是我的意思全被歪曲了，短评只字没有提到我谈到了第二国际的破产，谈到了机会主义，谈到了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立场。”②

而天主教（以及梵蒂冈）报刊就俄国当局在加里西亚的所作所为发表的言论，特别是为合并派教会辩解的言论，则完全别有用意，别有企图。梵蒂冈以及天主教报刊正好是在这一场合下以奥匈君主国的（而不是乌克兰人民的）利益的保护人的身份出面说话的。从前述舍普季茨基报告中 417 可以看出，梵蒂冈是支持奥匈君主国奴役全乌克兰的纲领的。

综上所述，在战时围绕加里西亚问题愈演愈烈的论战和争论中，梵蒂冈是站在一个帝国主义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0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页。

集团方面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它的立场同乌克兰人民的真正利益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奥匈君主国都不想给乌克兰人民以自由。

战时梵蒂冈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同波兰人民的利益也无任何共同之处。

梵蒂冈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问题

无论是俄国的沙皇政府还是德国的威廉二世政府与奥匈君主国，都不希望波兰能有自由和独立。沙俄政府在战争开始时就想“兼并”波兰，使之“归于俄国沙皇的统治之下。”[①] 奥匈君主国也急于兼并波兰，而德帝国主义也自有打算，想使波兰听命于它。帝国主义者都是屠杀波兰人民的刽子手，他们只是对波兰的处于敌方统治下的那一部分讲“自由”，而讲“自由”的目的又只不过是为了欺骗本国和中立国舆论，欺骗波兰人，指望由于对手失败而得以征服波兰的其他部分。

① 《世界大战期间俄波关系》，中央档案馆编，莫斯科，1926年版，第17页。

弗·伊·列宁于1916年写道："……暴君尼古拉、赫沃斯托夫、切尔诺科夫、米留可夫之流现在完全赞成波兰独立，衷心地赞成波兰独立，因为这个口号实际上等于打败从俄国夺走波兰的德国的口号。"①

列宁还揭露孟什维克取消派。这些人在战前曾出来反对过民族自决的口号，反对过波兰有分离出去的自由，而今天，"当波兰从俄国的手里被夺走的时候，他们又赞成波兰'独立'了（从德国独立出去，这一点他们却审慎地避而不谈……）"。②

在交战国的另一个营垒里，各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纲领，他们虽反对俄国沙皇制度对波兰的压迫，但对本国帝国主义压迫波兰却只字不提。弗·伊·列宁谴418责考茨基向"最卑鄙龌龊的德国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尔利茨"伸出……和解之手，"否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有被压迫民族的分离自由，而承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32页。
② 同上，第132—133页。

认俄国的波兰有这种自由……"① 列宁写道：这种立场对威廉和兴登堡有利。"……考茨基承认波兰有从俄国分离出去的自由，而关于波兰人从德国分离出去的自由，却闭口不谈！！！"②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它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只有进行群众性革命斗争使社会主义在每个交战国中取得胜利，才会给被压迫民族带来自由，也给波兰人民带来自由和独立。弗·伊·列宁写道："大俄罗斯（和德国）工人应当无条件地赞成波兰的分离自由，因为不这样，在目前他们实际上就成了尼古拉二世或兴登堡的仆从。而波兰工人只能有条件地主张分离，因为谁想用某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胜利来投机……谁就会成为这个资产阶级的走狗。"③

交战国两大营垒的帝国主义者在战时都竭力拉拢波兰人，为此玩弄种种手腕，包括许愿给予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50页。F·奥斯特尔利茨为在战时采取沙文主义立场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

② 同上，第160页。

③ 同上，第23卷，第51页。

波兰“自由”、“独立”、“统一”等等。

波兰资产阶级和波兰地主，还有在俄国、奥匈帝国、德国的形形色色的波兰资产阶级政党都站在本国帝国主义分子一边，并把赌注押在他们的胜利上。在这些国家的波兰主教们所采取的也是这种与波兰人民利益为敌的立场。

罗马教廷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呢？

梵蒂冈表面上宣布它在战争中中立，此后就一直竭力表白它在这个问题上与交战国任何一方都无联盟。

梵蒂冈主教们不惜慷慨陈词，大谈特谈其对波兰人的同情及其对波兰的仁爱，但是无论是教皇还是他的亲信在战争年代都没有一次态度坚决地谈起过他们赞成自由和独立的波兰，既独立于俄帝国主义，又独立于德奥匈帝国主义的波兰。

1916年1月，波兰资产阶级活动家罗曼·德莫夫斯基和普利亚杰尔伯爵抵梵蒂冈，他们两人都是沙俄及其盟国的追随者。俄国驻罗马大使吉尔斯于1916年1月24日(2月6日）电告他们的 419

到来："他们之来罗马，为的是弄清梵蒂冈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初来时受到冷遇，但离开时却印象良好。据他们说，梵蒂冈赞同华沙大主教请求神职人员放弃政治活动的通函。"①

德莫夫斯基和普利亚杰尔在梵蒂冈受到"冷遇"是在根本问题上，即在关于波兰前途的问题上。梵蒂冈外交官要他们保证在同教皇谈话时不得涉及一切政治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谈波兰问题，这样教皇才能接见他们。

梵蒂冈有一个以耶稣会总会长列多霍夫斯基红衣主教为首的强大的实力派，他们遵循德奥的方针，主张根据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利益来解决波兰问题。

1916年1月22日（2月4日），涅利多夫报告：德莫夫斯基和普利亚杰尔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希图阻挡德奥在我们波兰的势力。他们深知德奥两国在梵蒂冈颇有权威，因此担心梵蒂冈不仅不会阻挡，而且还可能会鼓励波兰的亲德奥的势力。据他们说，他们后来发现梵蒂冈的亲德奥的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6年，案卷29，第1卷，第91页。

思想情绪比原先预料的要小得多……"①

两位沙俄外交官都根据德莫夫斯基和普利亚杰尔所说推断，认为他们无论如何在开始时曾遭梵蒂冈的冷遇。德莫夫斯基本人则对他们的遭受叙述得更为确切。他写道："想不到对于我们的志向和立场，在似乎最不该受到冷遇的地方梵蒂冈，我们却得到了最少的同情。先前我曾有过一个印象，满以为教皇本笃十五世对波兰深怀好意。但我未能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因为梵蒂冈的外交官和我有约在先，在接见时我不谈政治。但是同梵蒂冈政治领导人的谈话却足以判定其立场。

我谈到一个问题，一个对于天主教国家特别微妙，但同时又十分重要，并要求认真和确切解释的问题。我对教会和宗座的政策之间的不同之点作了一番区别。教会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是在信仰问题上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权力。而梵蒂冈的政策则是人间俗事，它也象任何一种人间俗事一样，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一样难免有错误。即 420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2页。

使是最虔信天主教的国家也都必然感到自己同国家政策联系在一起，其紧密的程度应以此政策与国家和人民的福利不相抵触为准。我觉得梵蒂冈在战争期间在政策上犯了极大的错误，特别是在波兰问题上。

梵蒂冈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可用我在1916年1月同梵蒂冈一位高级官员的谈话来作最好不过的概括。现在我一字不差地引用谈话中对此问题有意义的部分：

他们问我：

‘为什么你们要同俄国走在一起？’

‘因为我希望德国垮台。’

‘为什么你们要德国失败？’

‘因为不这样就不会有统一的波兰。’

‘您以为统一的波兰在俄罗斯君主国统治下将是幸福的吗？’

‘我认为只是在波兰受到瓜分时，它才会处于异国的统治之下。统一的波兰也将是独立的波兰。我们追求波兰的统一，也在追求波兰的独立。’

回答我的是一阵笑声。

'独立的波兰嘛！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我不能说这些话对我们波兰人是中听的。我反问道：

'那么阁下对我等又有何见教呢？'

'你们的前途同奥国联系在一起……'"①

德莫夫斯基总结道：梵蒂冈对波兰独立问题的态度，可以概括如下："波兰的独立是个不能实现的幻想，其前途同奥国休戚与共。"② 德莫夫斯基写道："梵蒂冈外交官……劝波兰人寄希望予中欧列强。"③

德莫夫斯基对吉尔斯与涅利多夫的报告作了很大程度的改正。他证明梵蒂冈外交界人士反对波兰独立，并劝波兰人依靠奥匈帝国。

梵蒂冈对波兰人民的"同情"表现在1916年 421 教皇规定了一个"波兰日"，"这一天，所有天主教教堂都为波兰祈祷，并为其饱受战祸的居民募

---

① 德莫夫斯基：《多产作家》，第5卷，《波兰的政策与国家的复兴》，琴希托霍瓦，1937年版，第259—260页。

② 同上，第260页。

③ 同上，第252页。

捐。"①

波兰问题并未因祈祷而得到解决。教皇1916年"为波兰祈祷"的号召，令人想起他1915年的"和平祈祷"，对此梵蒂冈外交界人士曾作过这样的解释：法国人可以把"和平祈祷"作有利于法国的理解，而德国人则可作有利于德国的理解。教皇"为波兰祈祷"的号召，在形式上如此空泛，以致于主张使波兰隶属于德奥集团的人可以对祈祷作自己的解释，而站在沙俄一边的人也可对祈祷作自己的解释。

华沙大主教卡科夫斯基和许多主教签名的波兰主教团1916年1月13日上教皇书中对教皇号召为波兰祈祷②并为其居民募捐表示感谢。

组织祷告的政治意义在于主教团（经梵蒂冈同意）引导波兰劳动人民去祈祷，而不去解决与波兰命运攸关的问题，却把这些问题交给资产阶级、地主和压迫波兰的列强政府去解决。

交战国两大营垒中的波兰人民的压迫者所指望依靠的力量，也包括梵蒂冈和波兰主教团。他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22页。
② 同上，第25页。

们竭力在波兰主教团中间物色最忠于他们的人。根据梵蒂冈和德皇政府的协议，1915年任命波兰人达利鲍尔大主教为波兹南大主教区大主教①。如果注意到德国统治集团曾阻挠过任命波兰教长为各教区主教的话，那么在战火正炽的时候任命一名波兰人为波兹南教区大主教一事就说明了新教长将忠于德国统治集团。当他举行就职典礼时，德国首相曾致电祝贺。达利鲍尔大主教在其复电（1915年9月）中写道，他请求天主使他有可能顺利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便国家与教会，德皇陛下与至圣的教皇都能看到他们所期待的一切的实现”②。

在德皇威廉二世1917年9月批准(以他自己 422 的名义并代表奥皇）的“波兰王国”摄政会议（德奥集团的傀儡机构)的三名成员名单中，名列首位的是华沙都主教大主教卡科夫斯基（另两名成员是柳鲍米尔斯基公爵和大地主奥斯特洛夫斯基)。

---

① 据埃尔茨贝格说，这一人选由本笃十五世在同他埃尔茨贝格在梵蒂冈谈话时提出的。(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43页)。

② 《1915年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第476页。

斯福尔扎证实，教皇本笃十五世尚在1917年夏就希望把“波兰的王冠”转送奥国。①

沙俄外交界也急于想得到梵蒂冈的保证：在波兰问题上能支持它。

沙俄外交官认为，可以在宗教事务上向梵蒂冈让步以换取它的保证：保证在政治事务上，特别是波兰问题上支持俄国。驻梵蒂冈代办H·博克于1916年6月写信报告萨宗诺夫说，宗教信仰问题构成了“波兰问题的最重要的部分”，因而在宗教问题上对梵蒂冈让步就会有可能得到好处并使所作出的让步得到补偿②。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一份题为《天主教会与交战国》的“绝密”报告，是给外交部准备的，其上注明的日期为1916年10月13（26）日，从中可以看出沙俄政府有同梵蒂冈合作之意，特别是在波兰问题上。报告中说：“……从国家观点看来天主教会在奥德两国都是最保守的因素。它如果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在波兰也能卓有成效地对俄国起同样的作用……”③

①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第205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49页。

③ 同上，案卷104，第11页。

1917年1月，波兰活动家埃拉兹姆·皮尔茨抵达梵蒂冈，他受到教皇接见，并得到国务卿哈斯帕里红衣主教数次接见。皮尔茨向教皇陈述了波兰各主要政党，特别是他皮尔茨领导的"现实派"的党的观点。"现实派"（妥协派）党代表波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同沙俄合作，因为它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革命。

皮尔茨在同教皇谈话时，竭力要使教皇相信：为了天主教的利益，梵蒂冈应当支持那些指靠沙俄的波兰活动家，应当抵制德奥对波兰的计划。皮尔茨对教皇说："天主教会作为王朝正统论各项原则的卫道者，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当局为镇压民族主义运动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从未大声反对最严厉地镇压这些运动的领袖，不论他们是加里西亚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还是意大利人。教会既然为了王朝正统原则认为上述镇压有理，那么也理应抗议德奥两国在波兰武装老百姓反对自己的合法君王。"① 423

皮尔茨作为力主同沙俄亲善的波兰地主和资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22，第7—8页。

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知道在谈话时该用什么话最能打动教皇的心弦。他提醒本笃十五世：沙皇制度是王朝正统和“秩序”的支柱，而教会则始终都是捍卫这些“原则”的。他提示：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天主教会从来都没有反对过采用“激烈手段”来镇压加里西亚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力图使教皇相信，为了同样的“保守主义和王朝正统论的各项原则”，教皇应当把俄国在波兰的沙皇制度当作“合法政权”来加以支持。

正当波兰劳动人民起来为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进行斗争的时候（1917 年初），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们却奉行反民族的政策，其中一部分人依靠俄国统治集团，而另一部分人则依靠德国或奥国统治集团。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竭力想把宗座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德奥两国军政两界在战争接近尾声时都在忙于为波兰物色一名国王，双方为“波兰王冠”归于谁而争吵不休①。但无论是德奥集团，还是协约国，对波兰人民的利益都丝毫未加考虑。

① 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 181 页。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波兰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但是，对这一革命则无论是梵蒂冈也好，波兰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也好，都满怀敌意。

罗马教廷与立陶宛问题

1915年德军占领立陶宛，在那里建立起一套残暴的殖民制度。占领者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他们奉行兼并立陶宛于德帝国的方针，并向立陶宛殖民。在一份关于德国占领立陶宛的专门文献中写道：可以说德国人在立陶宛再也找不出比立陶宛天主教僧侣更能理解他们的集团了①，尽管连埃尔茨贝格这样忠于德皇的德国天主教活动家 424 和制订德国奴役立陶宛的各种计划的积极参与者也都承认，德国占领当局不仅对立陶宛居民的态度，而且对立陶宛天主教僧侣阶层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下都是“极其丑恶的”②。大部分立陶宛天主教神职人员都和在占领者面前奴颜婢膝并用立陶宛人民的利益来做交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

① B·科利安杰尔：《1915—1918年占领期间立德关系》，阿博，1935年版，第66、33页。

② 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185页。

一鼻孔出气。当时，在这些人中间引人注目的就有斯麦托纳。立陶宛民族主义活动家和天主教活动家都通过埃尔茨贝格同德国政界联系，埃尔茨贝格是建立以德国亲王冯·乌拉赫大公为首的立陶宛王国这一“主意”的捍卫者。

某些立陶宛天主教活动家，特别是主张同沙俄亲善的天主教活动家，在战争期间竭力想吸引梵蒂冈人士注意立陶宛问题。然而对于梵蒂冈来说，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罗马教廷把立陶宛看作是波兰的一部分，梵蒂冈上层所听取的是那些梦想使立陶宛地区隶属于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波兰活动家的呼声。

1916年5月，国家杜马成员伊查斯来到罗马，此人的意图是想就立陶宛问题同教皇晤谈。H·博克报告：教皇同意接见伊查斯并听取其意见，是由于他，即博克施加了“相当的压力”。博克写道：“根据我的判断（这已由消息灵通人士以极其明白无误的暗示所证实），事情拖延的原因是波兰人反对这样的接见。”① 所谓波兰人，也即是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47页。

在梵蒂冈的亲德奥的有影响的波兰人士。

伊查斯请求教皇确定某一日为“立陶宛日”，类似“波兰日”那样，要所有天主教教堂在这一天都为立陶宛祈祷，并为其居民募捐。教皇对此一一允诺[1]。然而同年7月，侨居美国的立陶宛人代表巴尔图斯卡来到梵蒂冈请求教皇确定“立陶宛日”的日期时，本笃十五世向他声称，他已记不起他曾作过这样的允诺[2]。只是到了1917年初，连德国占领者也由于立陶宛劳动人民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日益加剧而开始认识到再使用老一套的强行德国化的方法，他们便一事无成，因而开始寻找别的途径来奴役立陶宛人民，这时，梵蒂冈才开始同意承认确有立陶宛问题之存在。1917年1月，H·博克从罗马报告，有一名立陶宛天主教仪礼员K·奥尔舍夫斯基来到梵蒂冈，力求解决举行“立陶宛日”问题。“开始时，他也碰到了以前人们所碰到过的各种困难”，只是由于“态度坚决和坚持力争”，才取得教皇的同意[3]。

425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46页。

② 同上，第54页。

③ 同上，案卷122，第9页。

教皇在长期举棋不定后，才允许为立陶宛举行祈祷仪式。当然这也无助于立陶宛人民。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才给立陶宛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

根据上述所有事实可见：梵蒂冈权势人士对立陶宛独立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到1919年6月17日，白党（高尔察克等人的）"政府"驻梵蒂冈代表雷萨科夫斯基还写道：梵蒂冈在立陶宛问题上没有下决心采取明确立场。雷萨科夫斯基又写道："宗座在对待立陶宛的态度上处境十分微妙，因为正如红衣主教(指国务卿哈斯帕里——舍英曼）不无忿慨地告诉我的那样，教皇必须在波兰的野心和立陶宛人对这些野心的反抗之间保持平衡。"①

梵蒂冈讨好法国

直至战争结束之前，梵蒂冈一直同情中欧列强，始终不渝地执行有利于这些大国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在战争快结束时宗座却对法国表示好

① 苏联国立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3696全宗，案卷22，第8页。

感。

1916年11月9日，H·博克自罗马电告：定于11月21日开御前枢机会议，将晋升十人为红衣主教，在这十人中没有一个德国人和奥国人，而法国人却倒有三名。博克写道："后一情况由于新红衣主教名单上没有德奥两国人一定在法国和其它协约国成员中造成最为有利的印象。"①

关于即将举行的御前枢机会议问题，1916年11月6（19）日，博克就曾写道："在已公布的名单（即已公布的新红衣主教名单——舍英曼）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三名新法国红衣主教的任命。这样一来，红衣主教团中法国成员的总人数达到长期未有的八人之多。毫无疑问，本笃十五世是想要用自己的这种行动来表明他对法国的垂青，他是想在梵蒂冈早已有人公开议论的关于同法国接近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一步……"② 426

1916年12月，本笃十五世在为前来罗马的法国新红衣主教的枢机主教加冕典礼上作了如下声明："……为什么我们不说出我们希望在对神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7，第55页。

② 同上，案卷88，第147页。

甫表示尊敬的同时，对教徒备加赞扬？为什么我们不说出，为了证明我们对三位法国儿女的好意，我们愿意着重强调：在我们心中永远都燃烧着对克洛维、圣路易和贞德的祖国的爱之火焰？”本笃十五世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他那篇动人心弦的演说：“我们因巩固了它（法国——舍英曼）与教廷的联系而感到幸福，我们坚信‘但愿主的事业通过法兰西人得以复活’的古人遗愿一定实现！”①

也就在1916年12月的这些日子里，梵蒂冈礼仪圣部在一次隆重的会议上宣布命令：为都灵“苦行者”科托连戈和法国的一个天主教团体的缔造人加里科阿神甫列为真福举行仪式，教皇就此事发表讲话并向在座的法国红衣主教、主教神甫和世俗教徒保证他爱法国，并请他们回国时转达此意②。

梵蒂冈在1916年末讨好法国可作如下解释：战争快结束时，教廷外交界已估计到德国有战败的可能，因而很想在战后取得法国的支持。但这

①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88页。

只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罗马教廷担心，一旦德国战败，协约国得胜，俄国就会加强。梵蒂冈外交官之所以向法国买好，也有要在俄法两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的意思。已有的文件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916年8月，各种报纸、其中包括天主教报纸上都刊登了国务卿哈斯帕里红衣主教同法国报纸《日报》记者赫瑟关于教皇对待战争的态度的谈话摘录。其中正如俄国驻梵蒂冈临时代办博克所说，作出了"希望恢复宗座与法国之间的正式关系的暗示，表示了对法国僧侣和法国人民的赞扬。据我所得可靠情报，刊登该文系经国务卿红衣主教的赞同。"① 在此以后，一家在荷兰出版的比利时报纸《比利时报》上登载了"耸人听闻的揭发材料，涉及一名法国记者与这位国务卿红衣主教的谈话。后者似已向法国发出警告，要它在协约国胜利后防范威胁着它的'俄国的危险'和即将面临的法国文化和天主教被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吞没的危险，并且表示说，只有法国同梵蒂冈友好，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23页。

才能预防欧洲既不受上述的危害，也不受‘意大利野心’的威胁。”①

《罗马观察家报》立即断然否认了这一报导。然而，《比利时报》驻罗马女记者伊尔玛·卡齐耶却在罗马《论坛报》上证实她最初所作的声明，表示愿意说出哈斯帕里曾对之说起自己思想的法国记者的姓名。在《罗马观察家报》再次否认后，她声明这些观点是红衣主教哈斯帕里向法国《日报》记者赫瑟谈的。

博克在报告此事时写道：红衣主教哈斯帕里第一次接见他时就主动向他辟谣，否认强加于他的想法，并坚决抗议人们说这些话出自他之口②。博克写道：“这种解释令人深感兴趣，因为红衣主教国务卿不得不如此强烈地加以否认的那些话，显然，事实上就是他说的。对此我是确信无疑的，因为不仅有协约国同行从报界得来的材料，而且还有使馆早就掌握的情报人员提供的完全可信的

---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88，第 123 页。

② 同时，据博克说，对于卡齐耶女士他作了不怀好意的评论，称她为赫瑟先生的情妇。（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88，第 124 页）。

情报。根据协约国天主教活动家不时向我使馆提供的情况，使馆在其报告中数次指出，所谓'俄国的危险'是指我国占有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与牺牲天主教的奥国的利益来扩大我国版图，对此，梵蒂冈政界某些人士，特别是红衣主教哈斯帕里特别关注。因此，我觉得可能是他由于说话不谨慎，有时不免失言，正如这次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很不策略，在接见赫瑟先生的时候，一谈就谈到了使他不安的幽灵，并把'俄国的危险'作为要同法国友好的理由提了出来。当然，当时他本指望谈话对方诚实谦逊，满以为审查谈话的校样可以使他所泄露的不该公之于众的话不致外传。然而他的这种指望却落了空。赫瑟先生可能是出于爱国心和与盟国的精诚团结的感情，认为有必要通过第三者披露他本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便公之于众的事，这样一来，使红衣主教非常尴尬，迫使红衣主教国务卿出面否认自己说过的话……"①

428

从这些材料中可见，用"俄国的危险"来投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24—125页。

机，对于梵蒂冈外交界来说，并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事。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宗座开始以极大的规模利用“俄国的危险”来进行投机。

梵蒂冈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虽然梵蒂冈上层认为世袭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虽然他们把人民的革命看作是触犯教会关于社会的教义的一种现象，然而他们对1917年2月俄国开始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却泰然处之。

请看1917年3月18（31）日俄国驻梵蒂冈代办H·博克给临时政府外交部长П·H·米留可夫的报告中关于梵蒂冈对待俄国革命持何种态度问题写了些什么：“毫无疑问，我国现今所发生的变革在梵蒂冈是有思想准备的，关于我国发生革命的消息对于它来说，丝毫不感到意外，虽然革命发生的时间及其所采取的形式它未必能未卜先知……”①

据博克说，俄国革命的消息在梵蒂冈产生了“混杂的印象”，但主要的是“为天主教会的利益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22，第24頁。

而高兴的自私感情”。梵蒂冈指望的是随着沙皇制度的垮台，国教东正教教会的特权也会因而废除，这就为罗马教廷提供了一个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在俄国传布天主教的计划的可能性。博克在同一紧急报告中写道：沙皇制度的垮台对梵蒂冈来说意味着“天主教在俄国通行无阻的新纪元的开始”①。

然而，与此同时，梵蒂冈也象欧美各国统治集团一样，又担心俄国革命不止于推翻君主制和 429 建立资产阶级统治。

博克写道：“我这些日子在梵蒂冈发现的另一种感情是担心我国的运动走向极端的感情。与此地教会上层人士交谈和阅读天主教报刊都给予我此种印象。这里的僧侣不大熟悉俄国和俄罗斯人民，尤其是这个阶层的最保守的代表人物，不仅对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之迅速和激进感到震惊，而且更为它的发展深感不安。此外，正因为对俄国不熟悉，他们将它与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提并论，唯恐我国革命今后会象法国革命，带动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22，第24页。

其它国家……"①

害怕俄国革命深入，害怕这一革命会对其它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并非宗座1917年出面调解争端的最后一个原因。

梵蒂冈的算盘是：俄国退出战争不仅会改善与梵蒂冈仍然休戚相关的中欧列强(德国和奥匈)的处境，而且会加速战争的结束，以便调转枪口镇压俄国和全欧的革命运动。

二月革命并未使战争结束，与英法两国资本家有条约上联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不想使俄国退出战争。这一情况使梵蒂冈有些失望。

博克在1917年3月18 (31) 日向米留可夫所作的上述紧急报告中还写道：来自俄国的消息在梵蒂冈所引起的第三种感情是失望之感。"……梵蒂冈的爱好和平者们抱着一种希望，指望俄国的变革会加速和平事业。"发现这种打算是错误的之后，就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失望"②。

1917年3月18 (31) 日，博克在向米留可夫所作的另一紧急报告中写道：他已遵命通知红衣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22，第25页。

② 同上。

主教国务卿有关俄国发生革命一事。哈斯帕里红衣主教对变革之迅速与牺牲人数之微不足道表示"惊讶与欣慰"，对废除宗教信仰的种种限制表示高兴，他也表示深信在新的制度下，俄国和宗座的关系会得到改善①。

临时政府并未废除东正教会的特权，也未使政教相分离。与此同时，1917 年 4 月，在内务部名下成立一个以谢·安·科特利亚烈夫斯基教授为主席的委员会来重新审查俄国现行的关于罗马天主教的法律。 430

宗座指望他对临时政府在宗教问题方面的立法活动能施加自己的影响。为此目的，梵蒂冈于 1917 年 6 月，请俄国驻梵蒂冈代表向临时政府转交备忘录，内容是有关梵蒂冈一直竭力争取重新审查的天主教会在俄国的地位的各种问题②。该备忘录的基调仍是 1912 年和 1913 年宗座在向沙皇政府提交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那些要求。所谈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纯宗教的问题，诸如异教通婚（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问题，这种婚姻下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 122，第 26 页。
② 同上，第 37—39 页。

出生的孩子的宗教归属问题，允许在一定的场合下用俄语作天主教祈祷仪式的问题，改信天主教的自由权利问题，用俄语传教问题以及其它一系列问题。

如前所述，沙皇政府对保持东正教会的特权地位态度坚决，在上列各问题（以及所有一切其它问题）上都偏袒这个教会。这也是它同梵蒂冈发生磨擦的根源之一。临时政府没有使政教分离，这样一来，有许多争议问题即使在沙皇制度被推翻后，依然悬而不决。宗座备忘录中所谈的也就是这些问题。

在教廷致临时政府的备忘录中，也提出了诸如准许教徒和主教直接同宗座通信，准许主教在其教区外进行活动，准许各种修会和天主教团体自由活动，准许在教堂和学校之外传教布道等等要求。

看来罗马教廷的意图是，利用新的条件在俄国积极开展传布天主教的活动。教廷的这一备忘录此意更为明显。为了指导这一活动，1917 年 5 月在梵蒂冈成立了一个东方教会事务圣部。1917 年5月13（26)日，博克电告彼得堡说，罗马各报都

在报导“将新建圣部，其任务是同东方教会友好。431
关于此事，最近我询问了红衣主教马里尼，他向我证实前述消息确有其事，他说，为了适应业已变化的局势，特别是为了适应给予俄国教会的自由，他建议教皇成立一个独立的‘东方教会圣部’……来代替教皇前些时候想成立的机构。”① 博克报告说，马里尼所制订的方案得到了教皇的赞同，“大概即将付诸实施”。他接着报告说：“新圣部的活动范围将包括原先属传信圣部主管的东方仪式天主教徒的事务以及处理天主教会同东方教会之间的相互了解、接近和联合等问题。有谣传说，新圣部的首脑将由教皇亲自担任，其秘书将为红衣主教马里尼。”②

东方教会事务圣部成立了，而且从1917年10月起，它成为梵蒂冈组织反苏活动的中心之一。指出下列事实是重要的：正如俄国驻梵蒂冈代办前述电报中所说，梵蒂冈上层自己也承认，成立东方教会事务圣部是由于俄国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是由于罗马教廷想在俄国广泛传播天主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32，第2页。
② 同上。

教的迫切要求所引起的。

同时，梵蒂冈对合并派教会及其首脑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伯爵寄予很大的希望。

1917年3月8日，临时政府作出决定："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加里西亚合并派教会都主教舍普季茨基伯爵。"都主教一到彼得堡，就立即着手成立合并派教会，作为梵蒂冈在俄国的支柱和传播天主教的工具。他大事招兵买马("授予教职")，任命了一批神甫，晋升其秘书Л·И·费多罗夫为主教，任命他为主教长，即俄国的希腊天主教的首脑。

费多罗夫现在作为合并派教会首脑，向宗教事务部提出申请书，申请每年从国库发放钱款作为希腊天主教全体神职人员的薪金，在彼得堡拨出房屋作为希腊天主教会房产，作为主教长办公室和他属下神甫住宅之用。申请发给希腊天主教本堂神甫户籍册，并授权与他，即费多罗夫，发给希腊天主教神甫身份证，并为此目的供应他身份证书等等①。

432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55，第1—2页。

宗教事务部部长卡尔塔舍夫在1917年10月12日通知外交部长捷烈申柯上述事项时指出：要满足全部这些申请有困难，因为主教团和教会方面的行政负责人是由梵蒂冈同俄国政府协商任命的，而希腊天主教，严格地来说，则“没有一名按这一手续任命的全权神职代表”。卡尔塔舍夫要求通过外交途径来弄清楚梵蒂冈在俄国组织东方（即合并派教会）天主教徒的宗教管理机构的意图以及任命何人为此机构的首脑①。

在这些问题上与梵蒂冈尚无协议，因此舍普季茨基的行动遭到了非议。1917年7月4（17）日，H·博克从罗马向外交部长捷烈申柯报告有关舍普季茨基的活动问题时写道：“此间俄国天主教徒”甚为不解的是，“一个奥国人在战争期间如何能组织俄国教会，使俄国僧侣和世俗教徒听其摆布，并且正如古文件里所记载的，‘对他们实行残酷的主教统治’，况且，这个奥国人不仅是笃信天主的牧师，而同时又是敌国的议员和政党的首领，这一政党对俄国是否有善意很值得怀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55，第2页。

疑。"①

梵蒂冈作出姿态，表明它并不赞同舍普季茨基的过火的活动。博克写道：这种活动"实际上不能不使宗座感到不安。因为不管如何，梵蒂冈从来都把俄国视为有朝一日会给它带来丰硕成果的沃土。而舍普季茨基所玩弄的那一套则会有损这一如意算盘。他所鼓吹的那种天主教，有过于明显的烙印，如果说这不是亲奥的烙印，那也是乌克兰分立运动的烙印，会给一切天主教的敌人提供强大的反天主教的武器的烙印……"②

为了使临时政府代表放心，梵蒂冈一再强调舍普季茨基的所作所为系他个人自作主张，并未通过罗马教廷。H·博克在报告他同国务卿哈斯帕里红衣主教的谈话时写道：国务卿"等待他(指舍普季茨基——舍英曼）已等得不耐烦了，要谴责他超越权限，要制止他对俄国事务的干涉。正如433红衣主教哈斯帕里今天又对我说起的那样，在对俄关系方面利沃夫都主教并无任何资格代表梵蒂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22，第59页。
② 同上，第60页。

冈。"①

很难设想，在教阶制度森严的天主教内，在中央集权和对罗马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情况下，都主教舍普季茨基会自作主张地进行活动。前面已经指出过，舍普季茨基在1914年8月写的向奥匈帝国和德国皇帝陈述侵占乌克兰的计划的报告中说，他所提出的全部措施，"可望在罗马"得到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一切他已准备就绪"。在同一报告中他谈到他要在乌克兰成立合并派教会的计划时说："作为都主教，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根据东方教会的教规和我先辈的惯例，我有权，有得到罗马批准的权来在所有这些省份行使大主教的教权。"②

无疑，都主教的行动是通过宗座并得到他的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22，第61页。在现代天主教文献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舍普季茨基1917年在俄国的行动主要的是以他早先从庇护十世处得到的权力为依据的，他任命Л·费多罗夫为俄国主教长也是以此权力为依据(见经巴尔的摩大主教教区准许和教会检查机关通过出版的著作——玛丽·尤斯特：《罗马和俄国》，威斯敏斯特—马里兰，1954年版，第152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ОПО全宗，案卷161，第248页。

认可的。

H·博克在向外交部长捷烈申柯报告时写道，关于舍普季茨基的权限问题尚未明朗："梵蒂冈尽管回答说对舍普季茨基在俄国的活动一无所知，也从未在对俄关系上授予他任何权力，但仍未能打消此间俄国教徒的疑虑。"①

舍普季茨基在建立合并派教会的各级机构，并为传布天主教打下基础以后，便于1917年8月去瑞士，让他所任命的主教长费多罗夫在传布合并派教的事业中积极活动。

1917年8月21日（9月3日），俄国驻巴黎代办谢瓦斯托普洛电告，根据他所得情报，教皇有意提升舍普季茨基为红衣主教，让他主持天主教在俄国的传教事宜。谢瓦斯托普洛写道："梵蒂冈认为，我们已形成的局面，对传教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② 在这份电报上，外交部长助理A·A·涅拉托夫写道："此事电告博克，并责成他作出努力，务使提升舍普季茨基为红衣主教一事不得实现，并指出临时政府释放了舍普季茨基就是对梵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22，第60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ОПО全宗，案卷161，第202页。

蒂冈的帮助……”

十月革命后舍普季茨基重又定居利沃夫，他至死（1944年）一直领导合并派教会，并在罗马教廷和各资产阶级国家反苏政策中起着不小的作用。

教皇1917年8月1日的和平照会

随着俄国革命的深入和各参战国人民群众反战抗议的革命呼声的高涨，宗座也越来越积极地介入事态的发展，他力图挽救中欧列强避免军事崩溃，纠集资产阶级力量以反对革命。这些目的促使教皇于1917年8月1日发出和平照会。

1917年8月1日，教皇本笃十五世向各参战国政府发出关于缔结和约的照会。教皇的照会中也包含了和平纲领。教皇此举与战争的全部进程以及各参战列强的政策紧密相联。

交战国双方统治集团内，由于担心人民群众的不满会导致革命，日益明显地出现一种想尽快结束战争的倾向。1917年1月，弗·伊·列宁写道，已经发生“世界政治从帝国主义战争到帝国主义和平的转变。帝国主义战争赠给各国人民的

是空前的浩劫和普列汉诺夫、阿尔伯·托马、列金和谢德曼之流先生们对社会主义的极无耻的背叛，而帝国主义和平对于人民则是一个充满甜蜜语句，小改良，小让步等等的大骗局。”①

两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促使资产阶级赶紧结束战争：战争物资枯竭和由于人民群众革命情绪增长，害怕革命爆发。

教皇为和平出面调停也是由于害怕革命。当然，作为曾经表面上宣布过中立政策的教会的首脑，教皇对自己力求尽快结束战争的言行，只能用宗教的和爱人类的目的来说明其动机。事实上435在1917年教皇“调解争端”的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下面的政治动机：梵蒂冈主教们通过其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对各参战国的民情了如指掌，因此担心人民大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处处都会转化成为革命，例如在俄国革命就已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连意大利都发生了革命的行动，这就更使教皇深信结束战争势在必行。

教皇于1917年为结束战争在参战国之间进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9—270页。

行斡旋的活动中，驻巴伐利亚圣使埃乌杰尼·帕切利甚为活跃。

1917年4月末，帕切利（当时是梵蒂冈国务卿助理）被派赴慕尼黑任圣使。俄国驻梵蒂冈代办早在1916年11月即曾报告过：即将任命帕切利为驻慕尼黑圣使一事已到处流传。“据可靠情报，巴伐利亚政府，特别是现居卢加诺的公使里特尔男爵强烈要求任命他（即帕切利）。”① 1916年11月末曾任命帕切利为圣使。只到1917年4月，当各参战国国内局势恶化，帕切利才被派往慕尼黑任圣使。他必须同德国有影响的政治家建立私人接触，力争取得对教皇的“和平倡议”的支持。当时，在梵蒂冈认为同德国媾和不言而喻导致同奥国媾和②。

在此以前各交战国代表之间已在进行秘密谈判。

1917年6月26日，帕切利会见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商谈德国的和平条件。埃尔茨贝格写道：“贝特曼·霍尔韦格与圣使之间的会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88，第141页。

②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305页。

晤导致有关媾和具体条件的广泛的交谈。"①

6月29日，帕切利会见德皇威廉二世。关于这次会见，威廉二世在其回忆录中有所记述②。他写道："谈话很快就以和平调解和达成和约为中心，提出、讨论并否定了各种方案和可能。"最后威廉建议教皇尝试出面调解缔结和约，威廉向圣使建议应如何来做和从何处着手。教皇作为所有罗马天主教徒的首脑，"应当首先尝试敦促自己在世界各国的神甫从人类的心灵中驱散仇恨，因为这是通向和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帕切利"认为这个主意绝妙，值得注意，只是觉得要吸收各主教团都来参与此项活动仍有困难"。帕切利知道：每个国家的主教都是把自己同统治阶级的军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对主教们对调停是否能热心，没有多大信心。帕切利询问威廉，除了他建议的步骤外，教皇还可以为缔造和平做些什么。威廉二世提出分裂协约国阵线，把意大利从其中分离出去，促进意奥单独谈判。威廉二世竭力使帕切利相信："……意大利和奥地利，这

436

① M·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第274页。

② 威廉二世：《1878—1919年的人与事》，第223—230页。

是两个罗马天主教国家，教皇能对它们轻而易举地施加强烈影响……我看为这两国进行和谈作好开端，教皇至少可以试一试，这并不是难事。”然后，别的大国也会继起响应。

帕切利没有同意，他说教皇不能为和平做具体事情，遗憾的是教皇并不自由，他同意大利没有直接关系，“要是他有自己的国家，或至少有自己的管区能由他来自治管理，独立自主地来支配和统治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而现在他却依附于世俗的罗马，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行动。”

帕切利开始同威廉谈起“罗马问题”来，谈起教皇要求恢复他的世俗政权问题。威廉二世就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理由，他声称，教皇如能完成议和的任务，“那么对他感激不尽的各国人民在和约缔结以后，当然乐于在意大利政府面前支持他独立的愿望。”威廉二世又重新打出“罗马王牌”——许愿在有利于罗马教廷的条件下解决“罗马问题”。威廉写道，这些话“打动了圣使，于是他说，我毕竟说得有理，教皇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所作为”。

最后，威廉二世还提出了一条有利于教皇出面的有分量的理由：现在全世界渴望和平之心甚切。“如果教皇无所作为（指对实现和平——舍英曼），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一种危险：促进和平的将会是社会党人，那个时候，教皇和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的末日就会到来，即使是在天主教徒中间也会是这样的。”威廉用“社会主义的危险”来吓唬圣使，说什么“各国百姓到头来会自己把这一事业承担起来。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发生这类 437 事件不会没有危险的震动和变革，天主教教会和罗马教廷也难保不受触动……”①

威廉指出，这个理由对圣使发生了作用。他声称，他一定把这些设想立即报告梵蒂冈，他本人也将尽力而为以促进教皇立即行动起来。

威廉二世的证言表明，教皇1917年8月的和平言论是在德国统治集团的参与下作出的。

如果说，所有交战国的局势正在变得不稳定和使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担心的话，那么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局势已变得特别令人不安，因为这

① 威廉二世：《1878—1918年的人与事》，第229页。

两国的战局自从1917年4月美国参战加入协约国一方以后已经恶化。

教皇怀着特别不安的心情注视奥匈帝国国内局势[1]。胡达利写道：1917年初，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切尔宁给查理皇帝的秘密报告已为外人知晓，他上奏道，奥国还能等待数星期，应寻求同巴黎与彼得堡谈判的可能性，并尽一切努力来防止君主国垮台[2]。这些事实梵蒂冈也已知悉，并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命运甚为担忧。

所有这一切情况也都推动教皇出面提出和平照会。这个照会的基本原则在帕切利和德国主要政治家的历次会谈中就已经定下来了。

教皇照会一开始便声言教皇在全部战争时期对所有交战国都一视同仁，早在战争的第一年年底即呼吁公正的体面的和平。如今教皇重又向“各国人民领袖”提出“更为具体和切实可行的建议”，敦请他们同意下列各点作为持久的、正义的和平的基础：(一)缔结各自同时裁军的协议，

---

①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303页。

② 见前引著作，第306页，并参见T·马萨里克：《世界革命》，布拉格，1927年版，第9页。

(二)消除一切国际交通道路的障碍，海上通航完全自由，(三)“至于赔偿损失与战争赔款，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便是各自完全放弃这些要求”，(四)各自归还现今所占对方之领土，“因此，德国方面是从比利时完全撤兵；使比国在政438治、军事和经济上独立而不从属于任何大国；也照此从法国领土完全撤兵；其它交战国方面则相应归还德国原殖民地”。在以后的各点中，教皇建议“以和解的精神”，“在公正的和可能的范围内”解决奥国和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以及“亚美尼亚问题，巴尔干各国问题，原属波兰国版图的领土问题”。①

教皇照会遭到协约国统治集团的反对。他们认为教皇的建议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利益一致。教皇的这一行动受到奥匈帝国统治集团的欢迎。至于德国军阀集团，则直至其彻底垮台前夕，都不想放弃已经到手的卤获物，特别是比利时。

劳合·乔治写道：英国报界对教皇照会的态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45，第4—7页，以及H·约翰逊：《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外交》，牛津，第26—28页。

度"是尊重的，但却并不友善"，认为梵蒂冈更偏袒中欧列强。《泰晤士报》写道，这个照会应当作为"亲德的和反协约国的照会"而予以拒绝①。

克雷孟梭把教皇所建议的和平称之为"德国的和平"、"反对法国的和平"、"反对协约国人民的和平"②。据伯蒂勋爵说，索维罗利侯爵（任葡萄牙驻伦敦大使至1910年）告诉过他：不论他是个怎样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教皇的和平建议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德奥的和平建议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皇和平条件中规定要德国部队撤出他们所占的法国领土，但却未规定撤出他们所占的俄国领土。

俄国驻罗马大使吉尔斯1917年7月30日（8月12日）电告说，宗座"急于利用对我们最为不利的时刻，即我军暂时转弱并从加里西亚撤出的时刻，来提出建议，让全部负担都几乎落在俄国身上，而使全部好处都为我们的敌人所得。如果说梵蒂冈至今仍力图在交战国双方之间保持那

① 《戴维·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第4卷，第2058页。
② H·约翰逊：《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外交》，第30页。
③ 《伯蒂勋爵日记》，第2卷，伦敦，第167页。

439 怕是表面上的不偏不倚，那么他的这一行动就无疑使得自己站到中欧帝国的立场上去了”。①

H·博克7月31日（8月13日）打电报说，在同哈斯帕里会谈有关梵蒂冈的和平建议时，他对“第四款中疏漏有关德奥两国从其所占俄国领土上撤兵的要求一事”不能不表示“困惑莫解”②。

协约国统治集团都确信教皇的照会及其所提出的议和条件，都是梵蒂冈在柏林的参与下制订出来的。1917年8月13日，兰辛报告威尔逊时写道：“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一（教皇的——舍英曼）议和条件的宣言来源于奥匈帝国，同时可能得到德国政府的认可。”③ 1917年8月20日，兰辛上书威尔逊，写道：他在经过详尽的分析后得出结论，教皇的呼吁“实际上并未超出德国10月间提出的和平建议”④。

威尔逊总统的心腹助手和手下工作人员豪兹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45，第8页。

② 同上，第2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兰辛文件》，第2卷，华盛顿，1940年版，第43页。

④ 同上，第44页。

上校在致书法国驻美大使时写道："我以为您的推断是正确的，(教皇的——舍英曼) 和平建议系由奥国授意，我没有多大把握认为德国也插手此事……"①

教皇的照会也遭到意大利统治集团的反对。"索尼诺向意大利各驻外使馆就教皇照会一事发出长篇通令，他在其通令中写道：'虽然对神圣的父亲及其善良的意愿保持敬意'，但仍要指出，教皇此时提出他的照会是最不合时宜的。"②

俄国驻比利时公使1917年8月11 (24) 日从勒阿弗尔打电报报告说：比利时外交大臣勃罗克维利男爵就教皇和平照会一事同他谈话时说过："这个照会起草前显然得到德国的同意，否则有关恢复比利时版图问题就不会谈得如此明确。勃罗克维利男爵断言，已有人向他肯定指明：德国政府已确信，对它来说承认比利时在国家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势在必行……"③　　440

① 《豪兹上校档案》，第3卷，莫斯科，1939年版，第116页。

② Л·阿利德罗万迪·马雷斯科蒂：《外交战》，莫斯科，1944年版，第89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45，第22页。

7月31日（8月13日）H·博克从罗马打电报报告：红衣主教哈斯帕里“竭力要我相信，它们（指教皇的和平条件——舍英曼）的成稿事先并未与交战国的任何一国有过磋商”。博克指出：“然而选择我国已被迫放弃加里西亚这一时机以及坚决要求归还德国殖民地这两件事，在我看来都足以证明，事情恰好相反。”①

综上所述，帕切利觐见威廉二世以及他同德国决策人物的谈话，在教皇拟定其和平条件时是起了不小作用的。这些条件非但符合中欧列强的利益，而且在拟定时也经他们同意的。对于帕切利在制订教皇的“和平建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亲梵蒂冈的作家们也都曾指出过②。《新时报》驻伦敦记者引用《观察家报》记者发自伯尔尼的报导，于1917年8月9日打电报说：据推测教皇照会是在瑞士罗马天主教埃因齐德尔修道院制定的，当时比洛公爵、埃尔茨贝格议员、前普鲁士驻梵蒂冈公使米尔贝格男爵和巴伐利亚驻梵蒂冈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45，第9页。

② 可参阅奥斯卡·哈列茨基：《埃乌杰尼·帕切利和平教皇》，纽约，1951年版，第32页。

公使里特尔男爵和列多霍夫斯基耶稣会总会长等人都到院磋商①。

亲梵蒂冈的作者们都费尽心机把事情说成象胡达利主教在其奥梵关系史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唯一能超脱党派，一心为基督世界谋和平者仅教皇本笃十五世一人耳。"② 但事实十分清楚，这种论调是多么站不住脚。

教皇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只是对一方有利。然而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因而交战国的任何一方都不想，而且也不去谋求正义的和平。

教皇的建议究竟有多少"正义"可言，可通过下列事实来判断。教皇建议只字未提满足捷克人的民族意愿的问题。关于波兰，在教皇的和平建议中只是说战后应本着和解的精神来解决原属于波兰国版图的部分领土的问题。兰辛就此上书威尔逊时写道：此处所说的是在原波兰的部分领土上，看来大概是在俄属波兰的那部分领土上建立

441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1917年报刊全宗，案卷189，第35页。

②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1806—1918年》，第308页。

波兰国家[①]。宗座建议只是"在波兰王国的领土上成立波兰国家，其中并不包括在德奥管辖下的波兰领土。然而，正如斯福尔扎伯爵所说的，这样的波兰国在梵蒂冈的计划中也必须交给奥匈君主国作为后者让给意大利领土的赔偿"[②]。

专事研究罗马教廷战时外交史的英国天主教史学家约翰逊写道：梵蒂冈赞成下列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即波兰要成为奥匈君主国的"小伙计"[③]。这意味着要变波兰为奥匈君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教皇的"超党派"及其议和条件的"正义"性质事实上就是如此。

1917年8月27日，威尔逊对教皇照会作出了答复。复函不乏空洞词藻，大谈美国统治阶级在战争中的"崇高目的"和"大公无私"，德国战争机器的罪行以及教皇此举的"宽宏大量"。然而威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兰辛文件》，第2卷，第44页。

② 卡·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第205页。

③ H·约翰逊：《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外交》，第29页〔应提起注意的是，该书出版有德·萨利斯伯爵（战后英国驻梵蒂冈代表）所作的序言〕。

尔逊却仍然拒绝接受教皇的和平纲领，他写道，这是因为如果接受它，“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就意味着促进它（指德国——舍英曼）国力的复兴和政策的复活”①。

英国政府决定仿照威尔逊复函的精神答复教皇，并指出如果中欧列强不对其战争目的作出说明，那么英国政府也不能对教皇照会作出详尽的答复。英国驻梵蒂冈公使受命通知哈斯帕里红衣主教，为了进行和平谈判，德国政府必须先发表一个关于比利时独立及战争目的的明确的声明②。俄国驻伦敦代办纳波科夫1917年8月8（21）日打电报报告：巴尔福交给他一份针对教皇照会给大不列颠王国驻梵蒂冈代表的指示文本。后者得到指示：要向国务卿表明，“如果中欧帝国及其盟国不宣布它们仍在继续进行的战争的正式目的，它们准备作出的退让和赔偿的规模以及确保和平和避免和平所受的苦难的办法”③，那么谈 442

① 伍德罗·威尔逊：《民主原则》，柏林，1924年版，第9—12页。

② 《戴维·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第4卷，伦敦，1934年版，第2060—2067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45，第17页。

判就不可能举行。法国政府也附议这一答复。

梵蒂冈自告奋勇要代表德国进行谈判。1917年8月23日，哈斯帕里向不列颠大使声称，德国在其国会决议中表示准备恢复比利时。但人们向他指出，左右德国的并不是国会。于是哈斯帕里在次日谈话中又声称，他等待德国发表关于比利时问题的正式宣言①。

事实上，梵蒂冈已委派驻慕尼黑圣使帕切利就有关教皇和平建议诸问题同德国政府着手谈判，并谋求德国政府发表关于战争目的的宣言，首先是恢复比利时独立的宣言②。

俄国驻罗马大使吉尔斯于8月22日（9月4日）打电报报告，据意大利政府"从梵蒂冈的一位驻外使节——驻慕尼黑的帕兰齐"处得到的情报，"帕切利的柏林之行，为的是确定教皇在其和平照会中提出的条件"③。8月30日，帕切利致书首相米哈埃利斯，告知德·萨利斯所收到的指示，

① H·约翰逊：《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外交》，第31页。

② F·冯·拉马：《罗马教皇和教廷对世界大战的政策》，第36—37页。

③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45，第42页。

并声言，特别命他争取关于比利时的宣言[①]。

德国统治集团想要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摆脱战争，同时他们也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东西。左右柏林政府政策的军阀集团在1917年秋德军占领里加，并在东方战场上向前推进以后，更指望其庞大的占领计划得以实现。1917年9月14日，鲁登道夫向首相发出一份备忘录，承认德国国内情况糟乱，然而在作战方面的情况则比协约国的情况要好些。他证明，即使是国内情况，德 443 国比起协约国来，也没有那么紧张。鲁登道夫接着写道：虽然如此，德国仍希望在冬季前取得和平。鲁登道夫在其备忘录中对总的情况作了这样一番估计后，便阐述其庞大的领土占领计划，企图更有效地准备新战争，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将占领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萨尔、洛林、卢森堡，扩展东普鲁士，等等。比利时在鲁登道夫的计划中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从属德国，因为据他说，比利时的中立是幻想。鲁登道夫的胃口很大，连荷兰也想染指。他为德国要求殖民地，甚至想在

① F·冯·拉马：《罗马教皇和教廷对世界大战的政策》，第37页。

南美洲要殖民地①。

德国统治集团的这种立场，也在首相9月19日发出的复教皇照会书中得到反映。德国政府在答复中保证：威廉皇帝及其政府始终不渝地想要保持和平，德皇政府在研究了教皇照会后，深信教皇各项建议甚合他的心意，答复中说，德国政府欢迎教皇的呼吁，以便用道义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德国政府的答复也是用这样笼统的宣言的形式来写成的。答复中只字未提比利时，因为德国统治集团并不想放弃它，对协约国政府所关心的其它问题也都避而不谈②。

奥匈帝国的查理皇帝9月20日在答复教皇照会时说：教皇的建议可以作为开始和平谈判的基础。

战争结束以后，在德国天主教书刊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强调德国不接受教皇的建议是由新

① 《戴维·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第4卷，第2069—2076页。

② 《1917年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第1卷，第801—802页；J·霍费耳德：《德意志国家历史文献，1849—1926年》，第2卷，柏林，第597—599页。

教徒首相米哈埃利斯一手造成的①。更为蛊惑人心的是胡达利主教的声明，说什么本笃十五世的计划未能实现是由于“共济会、世界资本主义”之过错，“在一定程度上”也由于“世界新教徒”之过错②。

这种解释与事实完全不相符合。德国的天主教徒工业界人士，特别是聚集在中央党周围的人士也都支持德国政府的掠夺政策，丝毫不亚于新教徒资本家。1917年11月召开的德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声明：“我们（天主教徒）随时准备捍卫教堂祭坛和皇帝宝座，反对国内外敌人。”③中央党全国领导也于1917年10月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说：他们“以憎恶和愤怒的心情拒绝威尔逊干涉德国内政的闻所未闻的不成体统的企图，他想削弱德皇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④。 444

天主教主教团和天主教中央党领导就是这样

① 参见F·冯·拉马：《被撕毁了的和平》，奥格斯堡，1926年版，第64页。

②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308页。

③ F·冯·拉马：《罗马教皇和教廷对世界大战的政策》，第85页。

④ 《1917年欧洲历史日历（教学用书）》，第1卷，第906页。

支持德皇及其政府，支持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直到威廉二世帝国最后垮台为止。因此，认为由于新教徒首相米哈埃利斯作梗，教皇"调解争端"才未达到目的这样一种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917年11月1日，盖特林格（中央党领袖之一）接任米哈埃利斯为首相。天主教史学家巴赫姆写道：盖特林格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笃信君主制，反对立宪制①。盖特林格任首相至1918年10月。他又究竟为什么没有响应教皇的"和平"倡议呢？难道在1916年国会上主张进行无限潜艇战的不是中央党党团吗？②中央党领袖们都赞成德国对比利时的占领。

中央党机关报《德意志报》1917年1月曾反对在比利时恢复战前状态，反对放弃比利时，并要求德国能得到赔款和殖民地③。因此问题不在于首相的宗教信仰，而在于德帝国主义、德皇和

---

① 卡·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8卷，第244页。

② 汉斯·冯·加特茨克：《德国的西进》，第166页。

③ 同上，第167页。

德军大本营还指望赢得战争，实现掠夺他国领土的庞大计划。天主教徒工业界人士和主教团（天主教和新教）都支持这一占领计划。

尽管德国政府对自己的意图，特别是在比利时问题方面的意图拒绝作出说明，梵蒂冈仍然继续争取在交战列强之间达成协议，但是，实际上它是偏袒德国政府的。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吉尔斯从罗马打电报报告：梵蒂冈已把中欧列强对教皇和平建议的答复转交伦敦；吉尔斯写道："同时证实了梵蒂冈是要使对方理解：德国会同意恢复比利时的。"① 9月29日（10月12日）吉尔斯在另一封电报中写道：索尼诺（意大利外交大臣）认为对于梵蒂冈向英国政府转交中欧列强的答复一事可不必答复梵蒂冈。因为在红衣主教哈斯帕里附寄的信中并未直接谈到比利时问题。"但是笼统地表示教皇的和平条件必将得到中欧列强的承认，认为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梵蒂冈准备敦促它们作出进一步的解释。"②

445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7年，案卷35，第544页。

② 同上，第567页。

俄国驻巴黎代办谢瓦斯托普洛1917年9月22日（10月5日）报告：不列颠政府已从梵蒂冈得到了通知。同样的通知，比利时驻梵蒂冈公使也已收到。红衣主教国务卿向后者指出："如果说德国的答复没有任何肯定的说法的话，那么奥国的答复却令人满意得多了，由于中欧两大帝国之间关系极为密切，维也纳内阁无疑是反映了德国的意图的。"①

梵蒂冈竭力"美化"德国的答复，言过其实地说它能为协约国所接受，吉尔斯写道：索尼诺认为，"教皇急于作出新行动，主要以此来保持他在和平事业中扮演的调解人的角色。至于议和条件，对他来说，似乎只居次要地位。在这方面，他的利益同德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后者希望能给社会舆论一种和谈已在进行而且从未中断的印象。"②

1917年教皇大肆活动，出面调停，其目的除前述者外，还有一个，即保证梵蒂冈在战后和会

① 俄国外交档案馆，梵蒂冈全宗，案卷145，第53页。

② 俄国外交档案馆，办公厅全宗，1917年，案卷35，第544页。

上能有一个席位。美国驻罗马大使佩奇1917年3月20日报告兰辛时写道：梵蒂冈的“第一个愿望”是使“现今只是意大利一国之事的保证法国际化，作为向此迈出的第一步便是：一旦和会召开，保证自己能在会上有个席位”①。

尽管宗座有自己的好恶，善于随机应变，擅长外交手腕，但是他始终未放弃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野心。他始终认为“罗马问题”并未解决。因此，人们，特别是在意大利，对教皇在外交上的积极活动持怀疑态度。 446

梵蒂冈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关怀

埃尔茨贝格曾在1919年7月德国立宪会议上说：“9月末（1917年——舍英曼）我到慕尼黑。教廷圣使（埃乌杰尼·帕切利——舍英曼）是我多年至交……在我拜访时，他噙着眼泪前来对我说道：‘一切都完了，甚至您可怜的祖国’。”②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兰辛文件》，第1卷，第762页。

② 《德帝国的垮台，1914—1918年》，第1卷，斯塔姆弗德（加利福尼亚），第447页。

1918年末，当哈布斯堡君主国处于危机之时，教皇为了防止这个国家发生革命，于11月1日致电英国政府，请立即善意地对待奥匈帝国单独媾和的请求。正如劳合·乔治所写的：在此以后，谈判很快就结束了，11月3日签订了停战协定①。说实在的，这已挽救不了哈布斯堡君主国。11月11日它就不复存在了。

梵蒂冈在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后，仍然对其关心备至。君主国垮台后，奥国驻梵蒂冈大使顺堡-哈滕施太因公爵离任前受到教皇接见，教皇授予他基督勋章，这是梵蒂冈授予国家元首的最高勋章。教皇当时还说，他想以此来纪念的不仅只是公爵本人的功劳，而且还有哈布斯堡君主国对天主教的历史性功绩。众所周知，即使是在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以后，梵蒂冈也一直没有放弃过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来重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计划。本笃十五世便是1921年出面为前奥匈帝国皇帝查理说话，主张满足他的财产要求的为数不

① 《戴维·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第6卷，第3315—3316页。

多的人中间的一个[①]。

教皇在战后对威廉二世的命运也同样时刻挂在心头。因为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该条规定成立国际法庭来审判威廉二世）可以提出要求荷兰把前德国皇帝交出并进行审判的问题，于是德国主教们便求助于梵蒂冈，要它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阻止交出威廉和送法庭受审。梵蒂冈确也是这样做了的。梵蒂冈报刊扬言：战争的原因系出于“占统治地位的无神论的可悲政策”[②]，因此提出战犯问题是不正确的。梵蒂冈的主教们就是这样为帝国主义者及其罪行辩解，并象他们常做的那样，把过错推到“占统治地位的无神论”身上，虽然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在战争爆发的1914年或更早一些时候，无神论都未“占统治地位”。 447

综上所述，可见梵蒂冈在战争中并不中立。在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中它站在交战的帝国主义两大集团的一个集团——三国联盟一边。甚至

---

① 阿·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第310，311页。

② F·冯·拉马：《罗马教皇和教廷对世界大战的政策》，第117—118页。

在美国统治集团中间都认为梵蒂冈的中立是“亲德中立”①。罗马教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种立场，是教廷战前年代政策的直接继续。

罗马教廷在二十年间一直把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君主国视为“秩序”的支柱，在它看来，还可以可靠地防范社会主义。从19世纪末起，同社会主义作斗争便开始成为梵蒂冈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战争结束前夕，社会主义幽灵已不复是幽灵，社会主义已成为现实。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在这一胜利影响下出现的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的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剥削阶级和梵蒂冈上层吓得魂不附体。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在罗马教廷政策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罗马问题”，从1917年11月开始退居次要地位。如众所周知，在法西斯夺取意大利政权后不久，即开始同墨索里尼谈判解决这一问题，并于1929年得到了解决。从此以后，同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作斗争便逐渐成为梵蒂冈政策的主要目标。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兰辛文件，1919年，巴黎和会》，第1卷，华盛顿，1942年，第46页。

人 名 表

（照原书译出，所标数字系原书页码，原书页码标在切口处）

A

Б

В

Г

Д

Н

O

П

Т

У

Ш

Э

Ю

Я

引用资料文献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IV, 195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Циркуляр против криге. Соч., т. IV.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Письмо А. Бебелю, В. Либкнехту, В. Бракке и др. («Циркулярное письмо» 17—18/IX—1879 г.) Соч., т. XXVII.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9月17—18日)》(1879年)。

Маркс К. Коммунизм газеты «Rheinischer Beobachter».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IV.

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

Маркс К. Критика Гот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

Маркс К. Письмо Ф. Энгельсу 10/XII 1869.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XIV.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

斯（12月10日）»（1869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

Маркс К. Письмо Ф. Энгельсу 31/V 1873.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XIV.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1日)»(1873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

Маркс К. Письмо Ф. Энгельсу 19/IX 1868.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XIV.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9日»(1868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

Маркс К. Письмо Фердинанду Фреклесу 21/1 1877.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XVI.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月21日)»(1877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

Энгельс Ф. Уепехи движения за социально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а континенте. К.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т. 1.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

Энгельс Ф. Принципы коммунизма.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IV.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

Энгельс Ф. Роль насилия в истории.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1.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

Энгельс Ф. Франкский период.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1.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

Энгелье Ф.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царизма.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

Энгельс Ф. Об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е.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

Энгельс Ф.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4-му немецкому изоанию «Коммунистиеского манифеста».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

Энгельс Ф. Введение к брошюре Маркс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о францич».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0年单行本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

Энгельс Ф. К критике проекта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1891 г.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

Энгельс Ф.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о второму поль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манифеста».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

Энгельс Ф. Об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панаме.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恩格斯：《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

Энгельс Ф. К истории раннег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

Энгельс Ф. Письмо Ф. А. Зорге 29/XI 1886.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XVII.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9日)》(1886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

Энгельс Ф. Письмо Фридриху-Альберту Зорге 7/1—1888.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XVIII.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7日)》(1888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

Ленин В. И. Фридрих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II.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Ленин В. И. 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Соч., т. IV.

列宁：《中国的战争》载《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Ленин В. И. Ц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ч., Т. V.

列宁：《宝贵的招供》，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

Ленин В. И. Что делать. Соч., т. V.

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Ленин В. И. Проект програм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Соч., т. VI.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

Ленин В.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зубатовцы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Соч., т. VI.

列宁：《莫斯科的祖巴托夫分子在彼得堡》，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

Ленин В.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ы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 Соч. т. VI.

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6卷。

Ленин В. И. Задач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олодежи. Соч., т. VI.

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7卷。

Ленин В. И. Третий сбезд. Соч., т. VII.

列宁：«第三次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

Ленин В. И.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оч., т. IX.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Ленин В. И. Социализм и религия. Соч., т. X.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

Ленин В. И.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рабоией партии к религии. Соч., т. XV.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载«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

Ленин В. И. Поездка царя в Европу и некотор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черносотенной Думы в Англию. Соч., т. XV.

列宁：«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

Ленин В. 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 его эпоха. Соч., т. XVI.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

Ленин В. И. Конец войны Италии с Турцией. Соч., т. XVIII.

列宁：«意土战争的结局»，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

Ленин В. И. Историиескне судьбы учен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Соч., т. XVIII.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

Ленин В. И. К двадцатипятилетию смерти Иосифа Дицгена. Соч., т. XIX.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 载《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18卷。

Ленин В. И. Отсталая Европа и передовая Азия. Соч., т. XIX.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载《列宁选集》, 中文第2版第2卷。

Ленин В. И. Классовая война в Дублине. Соч., т. XIX.

列宁: 《都柏林的阶级战争》, 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

Ленин В. И. Цаберн. Соч., т. XIX.

列宁:《萨比林》,载《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19卷。

Ленин В. И. Война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Соч., т. XXI.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载《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ожение и задач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Соч., т. XXI.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载《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21卷。

Ленин В. И. Русские Зюдекумы. Соч., т. XXI.

列宁: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

Ленин В. И.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заграничных секций РСДРП. Соч., т. XXI.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载《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21卷。

Ленин В. И. Вопрос о мире. Соч., т. XXI.

列宁:《和平问题》, 载《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21卷。

Ленин В. И. О мире без аннексий и о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ольши, как лозунгах дня в России. Соч., т. XXII.

列宁：《论俄国当前的口号：不割地的和平和波兰的独立》，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

Ленин В. И О «программе мира». Соч., т. XXII.

列宁：《论“和平纲领”》，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

Ленин В.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право наций на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Соч., т.XXII.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载《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

Ленин В.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оч., т. XXII.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

Ленин В. И. Ответ П. Киевскому (Ю. Пятакову). Соч., т. XXIII.

列宁：《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

Ленин В. И. О карикатуре на мерксизм. Соч., т. XXIII.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

Ленин В. И. Черновой проект тезисов обращения к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и ко все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 партиям. Соч., т. XXIII.

列宁：《告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

Ленин В. И. Поворот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оч., т. XXIII.

列宁：《世界政治的转变》，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

Ленин В. И. Письмо к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рабочим. Соч., т. XXVIII.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

载《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

Ленин В. И. Проект программы РКП (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оч., т. XXIX.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载《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

Ленин В. И. II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Доклад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 основных задача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Соч., т. XXXI.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载《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4 卷。

Ленин В. И. А. М. Горькому. Соч., т. XXXV.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载《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2 卷。

Ленин В.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асс немецкими католиками. Соч., т. XXXVI.

列宁：《德国天主教徒在组织群众》，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6 卷。

Ленин В. И. Тетради п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у. М., 1939.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9 卷。

史　料

俄国外交档案馆：

梵蒂冈全宗，案卷 5—11、13、15、17、19、21—23、26、27、30、31、34、35、45、47、51、58、87、88、104、122、136、144、145、155。

特别政治处全宗，案卷 161、162。

政治档案全宗，案卷 532、1038、1047、1050、1351、2906。

办公厅全宗，案卷 14、92、110（1903 年），109（1911 年），33、34、178（1914 年），38（1915 年），29、257（1916年），35（1917 年）。

太平洋科全宗，案卷 622、632、637—639、644—647、649—656、1479。

罗马大使馆全宗，案卷

1929、1950、1951、1960、2004、2016、2059、2157。

中国科全宗，案卷116—118、133、180、182、188、775。

秘密档案全宗，案卷249/250。

第2厅11-5全宗，案卷34、60、106、107。

出版处全宗，案卷189。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3696全宗，案卷22。

公开发表文件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планы Италии в связи с переговорами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Тройств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2 (87), м., 1938.

«由于商谈恢复三国同盟意大利制订的侵略计划»，载«红档» 卷2 (87)，莫斯科，1938年版。

Адамов Е. А. Дипломатия Ватикана в начальную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31.

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的梵蒂冈外交»，莫斯科，1931年版。

Ван-Коль.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Амстердамском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конгрессу). СПб., 1906

万-科尔：«殖民政策与社会民主党»(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圣彼得堡，1906年版。

Вильгельм II. Переписка Вильгельма II с Николаем II, 1894—1914 гг. Под ред. М. Н. Покровского. М.—Пг., 1923.

«1894—1914 年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往来书信»，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版。

Гримм Э.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руг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42—1925). М., 1927.

格里姆：«远东国际关系史方面的条约与其它文件汇编

(1842—1925年)», 莫斯科, 1927年版。

Доклады б.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 Д. Сазонова Николаю Романову 1910—1912.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 3. 1923.

«原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给尼古拉·罗曼诺夫的报告(1910—1912年)», 载«红档», № 3, 1923年版。

Записка Ф. Ф. Мартенса. «Европа и Китай».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1 (20) М., 1927.

马尔腾斯札记 «欧洲与中国», 载 «红档» 卷1 (20), 莫斯科, 1927年版。

Захват Германией Киао-чао.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2(87), 1938.

«德国侵占胶州», 载 «红档»卷2(87), 1938年版。

Из записной книжки архивиста.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Ватикан наканун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4—5 (47—48), М., 1931.

«摘自档案专家的笔记», (帝国主义大战前夕的君主专制和梵蒂冈), 载«红档»卷4—5 (47—48), 莫斯科, 1931年版。

К истории пангерманского союза.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1(92). М., 1939.

«泛日耳曼联盟史录», 载«红档»卷1 (92), 莫斯科, 1939年版。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т IV, VI, VIII, IX, XVIII, XIX, м., 1931—1938.

«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 第4、6、8、9、18、19卷, 莫斯科, 1931—1938年版。

Отражение событий 1905 г.за границей.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2(9),м., 1925.

«1905年事件在国外的反应», 载«红档»卷2 (9), 莫斯科, 1925年版。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 П. Письма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а К Александру Ⅲ. Под ред.

М. Н. Покровского, т. 1—II, М., 1925—1926.

«波别多诺斯采夫致亚历山大三世书信集», 第1、2卷, 波克罗夫斯基编,莫斯科,1925—1926年版。

Русско-п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Центрархив, М., 1926.

«世界大战时期的苏波关系»,中央档案馆,莫斯科,1926年版。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друг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1856—1917. М., 1952.

«俄国与他国条约汇编(1856—1917年)», 莫斯科, 1952年版。

Сборник секрет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из архива бывшего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 6. Пг., 1918.

«原外交大臣档案内秘密文件汇编», № 6,彼得格勒, 1918年版。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чен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во Франции. Пг., 1915.

«法国宗教社会思想的现代流派»,彼得格勒,1915年版。

Энциклика папы льва XIII об объединении церквей. Пг., 1895.

«教皇利奥十三世关于教会统一的通谕», 彼得格勒, 1895年版。

Die Auswärtige 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1914. Ausgabe…unter leitung A. Barhtoldy und F. Thimme. Bd. IV. Berlin 1928.

«德国富翁们的对外政策(1871—1914年)», 第4卷,柏林, 1928年版。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 und zum Versailler Schuldspruch. Hrsg. von Dr. P. Dirr, Munchen-Berlin, 1925.

«巴伐利亚文件(战争初期和凡尔赛审判期间)», 慕尼黑—柏林, 1925年版。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

—1914. V. 1, Ⅲ, IV, London, 1927—1933.

《英国有关大战起因的文件(1898—1914年)》,第1、3、9卷,伦敦,1927—1933年版。

Deutsche Kolonialpolitik in Dokumenten. Gedanken und Gestalten acs den letzten fünpzig Jahren.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E. G. Jacob, Leipzig, 1938.

《德国殖民政策文件集》(《近五十年的观念及形态》),贾可布编并作序,莱比锡,1938年版。

Deutsche Reichsgeschichte in Dokumenten 1849—1926 Von J. Hohlfeld, Bd. I. Berlin, 1934.

《1849—1926年德国历史文献集》(霍费尔德编),第1卷,柏林,1934年版。

Fall of German Empire 1914—1918, V. 1. Selected and edited by R. Lute. Stamford California, 1932.

《德意志帝国的垮台,1914—1918年》,第1卷,路特编选,加利福尼亚洲,斯塔姆弗德,1932年版。

The Feol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 and organic laws of the states, territories and colonies…, v. V, Washington, 1909.

《联邦宪法与州宪法,殖民地宪章与州组织法,领土与殖民地……》,第5卷,华盛顿,1909年版。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Sammlung der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Bd. 1—39, Berlin, 1922—1926.

《1871—1914年欧洲内阁总政策》(外交部外交文件汇编,第1—39卷),柏林,1922—1926年版。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1948.

《禁书目录》,1948年版。

Internationaler socialiten Kongress zu Amsterdem, Berlin, 1904.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柏林，1904年版。

Österneich Ungarns Aussenpolitik von der Bosnischen Kriese 1908 bis zum Kriegsaushruch 1914, Bd.I—Ⅷ, Wien-Leipzig, 1930.

《自1908年波希米亚战争至1914年大战爆发时期奥匈帝国的对外政策》，第1—8卷，维也纳—莱比锡，1930年版。

A papal peace mosaic 1874—1944, New York,1944.

《教皇的和平图案，1874—1944年》，纽约，1944年版。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3. Washington, 1904.

《1903年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文件》，华盛顿，1904年版。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Washington, 1928.

《1915年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文件》，华盛顿，1928年版。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V. 1, Washington, 1942.

《1919年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文件》(《巴黎和会》，第1卷)，华盛顿，1942年版。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nsing Papers 1914—1920, V. I, Ⅱ. Washington, 1939—1940.

《有关美国对外政策文件》(《兰辛文件，1914—1920年》，第1、2卷)，华盛顿，1939—1940年版。

The pope speaks. The words of pius XII, New York, 1940.

《教皇言论集，庇护十二世言论集》，纽约，1940年版。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 1884

—1890, 1894—1895, 1897—1903, 1905—1906, 1913.

《帝国议会听证速记报告》(1884—1890年, 1894—1895年, 1897—1903年, 1905—1906年, 1913年)。

定期刊物

报 纸

«Вперед», Женева, 1905.

《前进报》, 日内瓦, 1905年。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Бухарест, 1950.

《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 布加勒斯特, 1950年。

«Звезда», СПб., 1912.

《星》, 圣彼得堡, 1912年。

«Искра», Лейпциг—Мюнхен—Лондон—Женева, 1900—1903.

《火星报》, 莱比锡—慕尼黑—伦敦—日内瓦, 1900-1903年。

«Правда», СПб., 1912.

《真理报》, 圣彼得堡, 1912年。

«Пролетарий», Женева, 1905.

《无产者》, 日内瓦, 1905年。

«Berliner Zeitung», Berlin, 1952.

《柏林日报》, 柏林, 1952年。

«The Daily Worker», New York, 1938.

《工人日报》, 纽约, 1938年。

«The Irish Democrat», London, 1951.

《爱尔兰民主主义者》, 伦敦, 1951年。

«New York Times», 1955.

《纽约时报》, 1955年。

«Osservatore Romano», Roma, 1955.

《罗马观察家报》, 罗马, 1955年。

杂 志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М., 1894、1904—1909.

《神学通报》, 莫斯科, 1894、1904—1909年。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СПб., 1870—1918.

《欧洲导报》，圣彼得堡，1870—1918年。

«Вестник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М., 1921.

《外交人民委员会通报》，莫斯科，1921年。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900—1901.

《教育部通报》,1900-1901年。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1—1904.

《东方学院学报》，符拉廸沃斯托克，1901—1904年。

«Мир божий», СПб., 1903—1906.

《世间》，圣彼得堡，1903—1906年。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Пб., 1904—1909.

《教育》，圣彼得堡，1904—1909年。

«Церковный вестник», СПб., 1900—1914.

《教会通报》，圣彼得堡，1900—1914年。

«Die Einheit», Berlin, Nr. 10, 1948.

《统一》，柏林，1948年第10期。

«Informations catholique internationales», Paris, 1956.

《天主教国际消息》,巴黎，1956年。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1890, 1891, 1902—1903, 1904.

《新时代》,斯图加特,1890、1891、1902—1903、1904年。

年鉴、统计资料、百科全书

The Americana Annual 1957, New York—Chicago—Washington.

《美国年鉴，1957年》，纽约—芝加哥—华盛顿。

The Annual Register. 1914—1916, London.

《年鉴》(1914—1916年)，伦敦。

Christian Socialism. Encyclopediae Britannica, 1951.

《基督教社会主义》，载《大英百科全书》，1951年版。

Census of religious Bodies. 1926, 1936, Washington.

《宗教团体调查》(1926年，1936年)，华盛顿。

Missions. Encyclopediae Britannica, V. 15, London, 1951.

《传教团》，载《大英百科全书》，第15卷，伦敦，1951年版。

Modernism. Encyclopediae Britannica, V. 15, 1951.

《现代主义》，载《大英百科全书》，第15卷，1951年版。

Religions und Kirchliche Statistik, München, 1921.

《宗教与教会统计》，慕尼黑，1921年版。

Religionstatistik. «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Bd. IV. Tübingen, 1913.

《宗教统计》，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第4卷，土宾根，1913年版。

Schiemann Th. Deutschland und die Grosse Politik. Berlin, 1901—1914.

施曼：《德国与"总政策"》，柏林，1901—1914年。

Schulthess Europä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München, 1890—1918.

《欧洲历史年鉴》，慕尼黑，1890—1914年。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1899—1916, London.

《政治家年鉴》(1899-1916年)，伦敦。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A, Washington, 1955.

《美利坚合众国统计概要》，华盛顿，1955年。

所研究事件参加者与当代人的著作与回忆

Бебель А. Из моей жизни. М., 1925.

倍倍尔：《我的生平》，莫斯科，1925年版。

Бисмарк О. Мысли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ер. с нем. под ред. А. С. Ерусалимского, т. III, М., 1941.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3卷,译自德语,莫斯科,1941年版。

Вейтлинг В. Евангелие бедного грешника. Пер. с нем. Лейпциг—Петербург, 1907.

魏特林:《可怜的罪人的福音》,译自德语,莱比锡—彼得堡,1907年版。

Венюков М. Очер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СПб., 1874.

维纽科夫:《现代中国概论》,圣彼得堡,1874年版。

Вильсон В. Принципы демократии. Извлечения из речей и посланий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Пер. с англ. Берлин, 1924.

威尔逊:《民主原则》,摘自战时演讲与通讯,译自英语,柏林,1924年版。

Гед Жюл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и социализм. Пер. с франц. СПб., 1907.

盖德:《国营企业与社会主义》,译自法语,圣彼得堡,1907年。

Гед Жюль. Женщина и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Пред. М. Кашена.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25.

盖德:《妇女和资产阶级社会》,译自法语,莫斯科,1925年版。

Гед Жюль. Речи, произнесенные в Палате депутатов. Пер. с франц. СПб., 1908.

盖德:《议会演说集》,译自法语,圣彼得堡,1908年版。

Гев Ж. и Лафарг П.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ес основание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ней. Пер. с франц. В. Величкиной. Пг., 1917.

盖德和拉法格:《工党的纲领及其基础和注释》,译自法语,彼得格勒,1917年版。

Гед Ж. и Лафарг П.

Чего хотят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ы. Пер. с франц. С прим. Г. Плеханова. Женева, 1902.

盖德和拉法格:《社会民主党人要什么》,译自法语,附普列汉诺夫注释,日内瓦,1902年版。

Гере П. Как я стал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ом. Пер. с нем. СПб., 1906.

格雷:《我如何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译自德语,圣彼得堡,1906年版。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 Э.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М., 1957.

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选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

Дневник В. Н. Ламздорфа.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3 (46), М., 1912.

《拉姆兹多尔夫日记》,《红档》,第3(46)卷,莫斯科,1931年版。

Дюшен Л.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й церкви. Пер. с франц. т. 1. М., 1912.

杜申:《古代教会史》,第一卷,译自法语,莫斯科,1912年版。

Ивановский П. Современ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миссий в Корее; Иеромонаха Павла (Ивановског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4.

伊万诺夫斯基:《朝鲜基督教传教士团现状》,符拉迪沃斯托克,1904年版。

Извольскйй А. П.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ер. с англ. Пг., 1924.

伊兹沃利斯基:《伊兹沃利斯基回忆录》,译自英语,彼得格勒,1924年版。

Кауский К. Социальпемократия и католи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Пер.с нем.М.,1906.

考茨基:《社会民主党与天主教会》,莫斯科,1906年版。

Ламеннэ Ф. Слова верующего. Пер. с фрнц. М., 1911.

拉梅耐:《一个教徒的话》,

译自法语，莫斯科，1911年版。

Ламеннэ Ф.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абство. Пер. с франц. Н. Новгород, 1905.

拉梅耐：《现代奴隶制》，译自法语，诺夫戈罗德，1905年版。

Ламздорф В. Н. Дневник 1891—1892.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34.

拉姆兹多尔夫：《1891—1892年日记》，译自法语，1934年版。

Лафарг Пнль. Соч., т. I—III, М., 1925—1928.

拉法格：《保尔·拉法格文集》，第1至3卷，莫斯科，1925—1928年版。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Италия и война. Пг., 1917.

卢那察尔斯基：《意大利与战争》，彼得格勒，1917年版。

Люксембург Роза.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 т. 1. М., 1928.

卢森堡：《卢森堡选集》，第1卷，莫斯科，1928年版。

Люксембург Роза. Речи. Пер. с нем. М., 1929.

卢森堡：《卢森堡演讲集》，译自德语，莫斯科，1929年版。

Люксембург Роза. Шаг за шагом. Пер. с польского. М., 1926.

卢森堡：《稳步前进》，译自波兰语，莫斯科，1926年版。

Манн Том. Вопоминания.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24.

曼：《回忆》，译自英语，莫斯科，1924年版。

Ман Гендрик де и Бруккер Луиде.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Бельгии. Пер. с нем. М., (1926).

德·曼和德·布鲁凯尔：《比利时的工人运动》，译自德语，莫斯科，（1926年）。

Марескотти Л. Альдрованд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отрывки из дневника (1914—1919). Пер. с итал. Под ред. и с вступ. ст. Б. Е. Штейна. М., 1944.

马雷斯科蒂：《外交战》（回忆与日记摘抄（1914—1919年），译自意语，莫斯科，1944

年版。

Масарик Т.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т. I—II. Прага, 1926—1927.

马萨里克:《世界革命》,第1、2卷,布拉格,1926—1927年版。

Меринг Ф. В дни войны. Пер. с нем. Пг., 1922.

梅林:《在战争的日子里》,译自德语,彼得格勒,1922年版。

Меринг Ф. 9 января 1906г. в Германии. Пер. с нем. СПб. 1906.

梅林:《1906年1月9日在德国》,译自德语,圣彼得堡,1906年版。

Меринг Ф. История Германско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Пер. с нем. т. III. IV. М., 1921—1924.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3、4卷,译自德语,莫斯科,1921—1924年版。

Неру Джавахарлал. Открытие Индии.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55.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译自英语,莫斯科,1955年。

Пуанкаре Р. На службе Франци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за десять лет. Пер. с франц. т. 1. М., 1936.

彭加勒:《在为法兰西服务的岗位上》(十年的回忆),第1卷,译自法语,莫斯科,1936年版。

Роллан Ромен. Дневник военных лет (1914—1919). «Новый мир», М., 1955, №3.

罗曼·罗兰:《战时日记(1914—1919)》,载《新世界》,莫斯科 1955年,第3期。

Саблер В. О мирной борьбе с социализмом. 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 1911.

萨布列尔:《论与社会主义之和平斗争》,谢尔基也夫镇,1911年版。

Соловьев Ю. Я. 25 лет мое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лужбы(1893—1918).М., 1928.

索洛维约夫:《我的外交工作二十五年,(1893—1918)》,

莫斯科，1928年版。

Тимирязев К. А. Наука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Соч., т. IX. М., 1939.

季米里亚捷夫：《科学与民主》，《季米里亚捷夫文集》，第9卷，莫斯科，1939年版。

Тунеев В. Уничтожение монастырей в Итал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СПб., 1864, Ноябрь.

屠涅也夫：《意大利修道院的毁灭》，载《祖国纪事》，圣彼得堡，1864年11月。

Франко И. Католический панславизм. Сб. «Избранны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демократов». М., 1955.

弗兰科：《天主教泛斯拉夫主义》，载《乌克兰革命民主主义者社会政治与哲学著作选集》，莫斯科，1955年版。

Хачз Э. Архив полковника Хачза. Пер. с англ. т. Ⅲ. М., 1939.

豪兹：《豪兹上校档案》，第3卷，译自英语，莫斯科，1939年版。

Чернин О. В дни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23.

切尔宁：《在世界大战的日子里》，莫斯科，1923年版。

Bebel A. Auswahl aus seinen Reden. Berlin, 1926.

倍倍尔：《倍倍尔演说选集》，柏林1926年版。

Bebel A. Socialdemokratie und Zentrum (Eine Rede Bebels in Bamberg). Berlin, 1903.

倍倍尔：《社会民主党与中央党》，柏林，1903年版。

Bebel A. Znm ersten Oktober. «Die Neue Zeit», 1890/91, Nr. 1.

倍倍尔：《在十月一日》，载《新时代》，1890/91年，第1期。

Bertie. The diary of lord Bertie of Thame 1914—1918. v. I—Ⅱ. London, 1924.

伯蒂：《伯蒂勋爵日记(1914—1918年)》，第1—2卷，伦敦，1924年版。

Bismarck. Die Gesammelten Werke. Bd. 8, Gespräche. Berlin, 1926.

俾斯麦：《俾斯麦全集》，第8卷，柏林，1926年版。

Bülow B. Denkwürdigkeiten. Bd. I—IV. Berlin, 1930—1931.

比洛：《回忆录》，第1—4卷，柏林，1930—1931年版。

Chamberlain. J. Apolitical memoir 1880—1892. London, 1953.

张伯伦：《1880—1892年政治回忆录》，伦敦，1953年版。

Christentum und Socialismus. Eine religiöse Polemik zwischen Herrn Kaplan Hohoff in Hüffe und A. Bebel, Berlin, 1906.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卡普兰·霍霍夫和奥·倍倍尔二先生之宗教论战)，柏林，1906年版。

Crispi F. The memoirs of Francesco Crispi. Tr. by Mary Prichard-Agnett; from the documents collected and ed. by Th. Palamenghi Crispi. London, 1912—1914.

克里斯比：《克里斯比回忆录》，伦敦，1912—1914年版。

Dietzegen J. Die Religion der Socialdemocratie. Berlin, 1891.

狄慈根：《社会民主主义的宗教》，柏林，1891年版。

Dmowski R. Pisma, t. V. Polityka Polska a odbudowanie Panstwa. Czestochowa, 1937.

德莫夫斯基：《多产作家》，第5卷，《波兰的政策与国家的复兴》，琴希托霍瓦，1937年版。

Erzberger. M. Erlebnisse im Weltkrieg. Stuttgart—Berling, 1920.

埃尔茨贝格：《世界大战见闻录》，斯图加特—柏林，1920年版。

Erzberger M. Die

Erfolge der deutschen Kolonialpolitik («Die deutsche Kolonialpolitik vor dem Grerichtsgoi der welt»). Basel, 1918.

埃尔茨贝格:《德国殖民政策的结果》，载《从世界法庭看德国殖民政策》文集，巴塞尔，1918年版。

Erzberger M. Die Mobilmachung. Stuttgart—Berlin, 1914.

埃尔茨贝格:《动员》，斯图加特—柏林，1914年版。

Eulenburg-Hertefeld Ph. Aus 50 Jahren. Berlin, 1925.

爱伦堡-格特费尔德:《五十年》，柏林，1925年版。

Favre J. Rome et la Republique Francaise. Paris, 1871.

法夫尔:《罗马与法兰西共和国》，巴黎，1871年版。

Giolitti G. Memoirs of my life. London, 1923.

焦利蒂:《我的生平回忆》，伦敦，1923年版。

Göhre P. Die evangelisch-sociale Bewegung. Leipzig, 1896.

格雷:《福音社会运动》，莱比锡，1896年版。

Gregory J. D. On the edge of diplomacy (1902—1928). London, 1928.

格雷戈里:《在外交边缘上(1902—1928年)》，伦敦，1928年版。

Hertling G. 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 Ba. 1, Ⅱ. München, 1920.

赫特林:《生活回忆录》，第1、2卷，慕尼黑，1920年版。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Ch. Denkwürdigkeiten. Bd. 1—Ⅱ. Stuttgart-Leipzig, 1907.

霍恩洛厄-席林菲尤斯特:《回忆录》，第1、2卷，斯图加特—莱比锡，1907年版。

Ketteler W. E. Schriften. Bd. 1, Ⅲ. München, 1924.

克特累尔:《克特累尔文集》，第1、3卷，慕尼黑，1924

年版。

Liebknecht K. Ausgewählte Reden, Briefe und Aufsätze. Berlin, 1952.

李卜克内西,《演讲选录、书信和论文》,柏林,1952年版。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 Ⅲ—VI. London, 1934.

劳合·乔治:《戴维·劳合·乔治战争回忆录》,第3—6卷,伦敦,1934年版。

Macchio. Warneiti Fürst Bülow und ich in Rom 1914/15. Wien, 1931.

马基奥:《真相! 菲斯特·比洛和我在罗马(1914—1915年)》,维也纳,1931年版。

Merry del val, cardinal. Memoires of Pius X. Loudon, 1934.

麦里·德尔·瓦利,红衣主教:《回忆教皇庇护十世》,伦敦,1939年版。

Naumann Fr. Was heisst christlich-social. Leipzig, 1896.

纳乌曼:《何谓督基社会?》,莱比锡,1896年版。

Pastor L. Tagebücher—Briefe—Erinnerungen 1854—1928. Heidelberg, 1950.

帕施托尔:《日记—书信—回忆,1854—1928年》,海德耳堡,1956年版。

Pernot M. Lapolitique de pie X (1906—1910). Paris, 1910.

佩尔诺:《庇护十世的政策》,巴黎,1910年版。

The programm of modernism. A repey to the encyclical of pius X Pascendi domini gregis… Пер. с итал. New York—London, 1908.

《现代主义纲领》(给庇护十世《牧羊通谕》的回答,),译自意语,纽约—伦敦,1908年版。

Roosevelt Th.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 11, V. Cambrige—Massachusetts, 1951—1952.

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2、5卷,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州)，1951—1952年版。

Sasohoff S. D. Sechs Jahre. Berlin, 1927.

萨宗诺夫:《艰难的六年》，柏林，1927年版。

Sohlözer K. Letzte römische Bviefe, 1882—1894. Berlin, 1924.

施勒策尔:《最近罗马信件，1882—1894年》，柏林，1924年版。

Sforza c. Contemporary Italy. New york, 1944.

斯福尔扎:《当代意大利》，纽约，1944年版。

Sforza C. Fifty years of war and diplomacy in Balkans. New York, 1940.

斯福尔扎:《巴尔干地区五十年的战争与外交》，纽约，1940年版。

Sforza C. The Vatican and The world war.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London, 1937, N 858.

斯福尔扎:《梵蒂冈和世界大战》，载《当代评论》，1937年858期，伦敦。

Stutz ul. Die päpsteriehe Diplomatie unter Leo XIII Nach den Denkwürdigkeiten des kardinals Dominico Ferrata. Berlin, 1926.

施图茨:《利奥十三世时期的教皇外交》—根据《红衣主教多米尼科·费拉塔回忆录》，柏林，1926年版。

Sulliran M. Our times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5), V. III. New York—London, 1930.

苏利文:《我们的时代》(合众国1900—1925年)，第3卷，纽约—伦敦，1930年版。

Tirpitz A. Erinnerungen. Leipzig, 1920.

蒂尔皮茨:《蒂尔皮茨回忆录》，莱比锡，1920年版。

Waldersee A. Aus dem Briefwechsel da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 Bd. 1. Stuttgart—Berlin, 1928.

瓦德西:《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书信集》，

第1卷,斯图加特—柏林,1928年版。

Waldersee A. Denkwürdigkeit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 Bd. II. III. Stugart—Berlin, 1923—1925.

瓦德西:«阿尔弗雷德·格拉芬·冯·瓦德西元帅回忆录»,第2、3卷,斯图加特—柏林,1923—1925年版。

Wilhem II, Kaiser, Ereignisse und Gestalten aus den Jahren 1878—1918. Leipzig—Berlin, 1922.

威廉二世:«1978—1918年的人与事»,莱比锡—柏林,1922年版。

Williams B. American diplomacy (Policies and Practice). New York, 1936.

威廉斯:«美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纽约,1936年版。

历史研究与政论著作

Аварин В. Я. Борьба за Тихий океан. М., 1952.

阿瓦林:«争夺太平洋的斗争»,莫斯科,1952年版。

Барбюс Анри. Огонь М., 1955.

巴比塞:«火线»,莫斯科,1955年版。

Барраль-Монферра. От Монро до Рузвельта (1823—1905).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25.

巴拉里-蒙菲拉:«从门罗到罗斯福(1823—1905年)»,译自法语,莫斯科,1925年版。

Болье, Анатиль Леру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Пер. с франц. СПб., 1906.

安纳托里·列鲁阿·鲍里耶:«基督教与民主»,译自法语,圣彼得堡,1906年版。

Брейди Р. Кризис Британии.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52.

布雷迪:«不列颠的危机»,译自英语,莫斯科,1952年。

Брентано Л. Христианско-соци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Англии. Пер. с нем. М., 1906.

布伦塔诺：《英国的基督教社会运动》，译自德语，莫斯科，1906年版。

Вейль Ж. 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о Франции (1852—1902).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06.

魏尔：《法国社会运动史(1852—1902年)，译自法语，莫斯科，1906年版。

Галеви Э. История Англии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Пер. с англ. т. 1. М., 1937.

加列维：《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史》，第1卷，译自英语，莫斯科，1937年版。

Барнак А. Сущность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СПб., 1907.

加尔纳克：《基督教的真谛》，圣彼得堡，1907年版。

Барруа Ж.-П. Африка—умирающая земля. Разрушекие африканских почв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колонизации.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54.

加罗阿：《非洲—正在死亡的土地》(《在殖民地化影响下非洲基础正在崩溃》)，译自法语，莫斯科，1954年版。

Геркнер Г. Рабочий труд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Пер. с нем. СПб., 1899.

盖克涅尔：《西欧的劳力》，译自德语，圣彼得堡，1899年版。

Гладстон В. Рим и папа перед судом совести и истории. М., 1903.

格莱斯顿：《罗马与教皇在良心与历史审判台前》，莫斯科，1903年版。

Гобсон Д.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Пер. с англ. Л., 1927.

霍布森：《帝国主义》，译自英语，列宁格勒，1927年版。

Губер А. А. Филиппи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898 г.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М., 1948.

古贝尔：《1898年的菲律宾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莫斯科，1948年版。

Джексон Т. А. Борьба Ирландии за независи-

мость.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49.

杰克逊:《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译自英语，莫斯科，1949年版。

Добров 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М., 1952.

多勃罗夫:《日俄战争时期美国的远东政策》，莫斯科，1952年版。

Драйзер Т. Трагическая Америка. Соч., т. XI. М., 1954.

德莱塞:《悲惨的美国》,载《德莱塞文集》,第11卷，莫斯科，1954年版。

Драйзер Т. Америку стоит спасать. Соч., т. XII. М., 1955.

德莱塞:《美国值得拯救》,载《德莱塞文集》,第12卷，莫斯科，1955年版。

Дэвис Д. Капитализм и его культура.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49.

戴维斯:《资本主义及其文化》,译自英语，莫斯科，1949年版。

Ерусалимский А. С.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конце XIX в. М., 1951.

耶鲁萨利姆斯基:《十九世纪末期德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活动》,莫斯科，1951年版。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т. II.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М., 1945.

《外交史》，第2卷（新时期的外交），莫斯科，1945年版。

Камбон Ж. Дипломат.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46.

卡姆邦:《外交家》,译自法语，莫斯科，1946年版。

Конделоро Дж. Катол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Италии. Пер. с итал. М., 1955.

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译自意语，莫斯科，1955年。

Картэн Д. Африка, Африка!. Пробуждающий-

ся континет.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55.

卡尔腾：《非洲啊，非洲！觉醒的大陆》，译自英语，莫斯科，1955年版。

Керенский В. Римско-католический модернизм (Е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ущность и значение). Харьков. 1911.

克连斯基：《罗马天主教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来源、本质与意义)，哈尔科夫，1911年版。

Керженцев П.М. Ирландия в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 1936.

克尔任采夫：《爱尔兰为争取独立而斗争》，莫斯科，1936年版。

Коровин Е. А. Католицизм как фактор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М., 1931.

科罗文：《天主教是当代世界政治的因素》，莫斯科，1931年版。

Кутепов Г. Н. Босна-Герцоговина. «Извест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н. VI. Пг., 1915.

库捷波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载《外交部通报》，第6册，彼得格勒，1915年。

Кучинский Ю. История условий труда в Германии (1800—1945). Пер. с нем. М., 1949.

库琴斯基：《德国劳动条件史(1800—1945年)》，译自德语，莫斯科，1949年版。

Лаврецкий И. Ватикан. М., 1957.

拉弗列茨基：《梵蒂冈》，莫斯科，1957年版。

Лихтенберже 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Германия. Пер. с франц. СПб., 1914.

利赫坦别尔热：《现代德国》，译自法语，圣彼得堡，1914年。

Ли Чен Вон. Очерки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Кореи. Пер. с корейского. М., 1952.

李清源：《朝鲜近代史概

论》，译自朝鲜语，莫斯科，1952年版。

Лю Да-нянь. Истор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в Китае. М., 1951.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莫斯科，1951年版。

Манфред А. З.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Френции 1871-1891 годов. М., 1952.

曼弗雷德：《1871—1891年的法国对外政策》，莫斯科，1952年版。

Мао Цзэ-дун.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Ⅲ. М., 1953.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莫斯科，1953年版。

Мархлевский Ю. Ю.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Польши. Соч., Т. VI. М., 1931.

马尔赫列夫斯基：《波兰史概论》，《全集》，第6卷，莫斯科，1931年版。

Мархлевский Ю. Ю.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щения в Польше. М., 1920.

马尔赫列夫斯基：《波兰的社会关系》，莫斯科，1920年版。

Мархлевский Ю. Ю. Польша и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1920.

马尔赫列夫斯基：《波兰与世界革命》，莫斯科，1920年版

Михневич Д. Е.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реакции (иезуиты). М., 1955.

米赫涅维奇：《天主教反动派（耶稣会士）历史概况》，莫斯科，1955年版。

Павлович М. П. (Мих. Вельтман).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и борьба за великие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и морские пути будущего. кн. 1. М., 1922.

巴甫洛维奇：《帝国主义与争取未来的伟大的铁路线和航海线的斗争》，第1卷，莫斯科，1922年版。

Революция 1848—1849

гг. т. 1. М., 1952.

«1848—1949年的革命», 第1卷，莫斯科，1952年版。

Роменов Б. А. Россия и Манчжурия (1892—1906).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Л., 1928.

罗曼诺夫：«俄罗斯与满洲(1892—1906年)»(帝国主义时期专制外交政策史概况)，列宁格勒，1928年版。

Рубинштейн Е. И. Политика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западных польских землях конца XIX—начала XX в. М., 1953.

鲁宾斯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帝国主义在西部波兰地区的政策»，莫斯科，1953年版。

Рудаков А. Общество И-хе-туань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последних события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т. Ⅱ. вып. 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1.

鲁达科夫：«义和团及其在最近远东事件中的作用»，载«东方学院学报»，第2卷，第3分册，符拉迪沃斯托克，1901年版。

Серени Э.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талии. Итальян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борьбе зе демокретию. Пер. с итал. М., 1949.

塞雷尼：«意大利土地问题»(意大利农民为民主而斗争)，译自意语，莫斯科，1949年版。

Смирнов Н. Из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робле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социализм. М., 1903.

斯米尔诺夫：«当代问题»(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莫斯科，1903年版

Соколов В. Католи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Герман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ст. Казань, 1912.

索柯洛夫：«十九世纪下叶的天主教会与德国政府»，喀山，1912年版。

Таксиль Л. Священный

вертеп.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30.

塔克西尔:《神圣的巢穴》,译自法语,莫斯科,1930年版。

Тарле Е. В. Чарльз Парнель. Стракицы из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и и Ирландии. Соч.,Т. 1. М., 1957.

塔尔列:《查尔斯·巴奈尔》(英格兰和爱尔兰史篇),《塔尔列全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

Твен Марк. Человек, ходящий во тьме. Избрак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ер. с англ. т. II. М., 1953.

马克·吐温:《黑暗中徘徊的人》,载《选集》,第2卷,译自英语,莫斯科,1953年版。

Трайнин И. П.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в Австро-Венгрии и ее распад. М., 1947.

特拉伊宁:《奥匈帝国的民族矛盾及解体》,莫斯科,1947年版。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жизни и борьбы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б. статей и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П. Тольятти. Пер.с итал.М.,1953.

《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的生活与斗争》,载陶里亚蒂主编的文章与文件汇编,译自意语,莫斯科,1953年版。

Тягай Г. Д.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Корее 1893—1895 гг. М., 1953.

恰盖伊:《1893—1895年朝鲜的农民起义》,莫斯科,1953年版。

Фань Вэнь-лань.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Пер. с кит. т. 1, 1840—1901. М., 1955.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1卷,译自汉语,莫斯科,1955年版。

Фей с.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Пер. с англ. т. 1. М., 1934.

费伊:《世界大战的根源》,第1卷,译自英语,莫斯科,1934年版。

Фонер Ф. С. История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ША. От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времен до 80-х гг. XIX в.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49.

福纳:《美国工人运动史》(从殖民时期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译自英语,莫斯科,1949年版。

Фостер У. З. Закат мирового каиитализма.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51.

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译自英语,莫斯科,1951年版。

Фостер У. З. Очер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Америки.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53.

福斯特:《美国政治简史》,译自英语,莫斯科,1953年版。

Хатт. А. Английское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знение.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54.

哈特:《英国的工人运动》,译自英语,莫斯科,1954年版。

Хейфец Я. П. «Готтентотский блок» и выборы в Германский рейхстаг в 1907 г. «Ученые заиискн Кабард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ып. Ⅲ. Нальчик, 1951.

赫依费茨:《'果天托特联盟'与1907年的德国议会联盟》,载《国立卡巴尔达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纳尔奇克,1951年。

Ху шен. Агресс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в Китае, Пер. с кит. М., 1951.

胡绳:《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译自汉语,莫斯科,1951年版。

Цинь Бэнь-ли.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Китае. Пер. с кит. М., 1951.

钦本立:《美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译自汉语,莫斯科,1951年版。

Шаревская Б. И.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анг-

л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британских владениях Африк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религии и атеизма». М., 1950. № 1.

沙列夫斯卡娅:《英帝国主义在非洲英国领地的宗教政策》,载《宗教史与无神论问题》,莫斯科,1950年,第1期。

Aberly J. An outline of missions. Philadelphia, 1945.

阿伯利:《传教团概要》,费城,1945年版。

Ahern P. The Catholic universite of America 1887—1892. Washington, 1948.

艾亨:《美国天主教大学,1887—1892年》,华盛顿,1948年版。

Askew W. Europe and Italys acquisition of Libya 1911—1912. Durham, 1942.

艾斯丘:《欧洲和意大利攫取利比亚(1911—1912)》,达腊姆,1942年版。

Bachem K. Vor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Politik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 Bd. I—IX. Köln, 1927—1932.

巴赫姆:《德国中央党的创立前期、历史与政策》,第1—9卷,科隆,1927—1932年版。

Bainville J. La Troisième Rèpublique 1870—1935. Paris, 1935.

贝恩维莱:《第三共和国(1870—1935年)》,巴黎,1935年版。

Becker O. Bismarck und die Einkreisung Deutshland. Zweiter Teil—Das. Französischrussische Bündnis. Berlin, 1925.

贝克尔:《俾斯麦与德国的包围》,第2卷—《法俄同盟》,柏林,1925年版。

Berg L. Die Katholische Heidenmission als Kulturträger. Bd. 1. Aachen, 1927.

伯格:《德国'文化斗争'时期的天主教异端》,第1卷,亚琛,1927年版。

Berrhard L. Die Dolenfrage. Der nationalitäten

Kampf der Polen in Preussen. München—Leipzig, 1920.

伯恩哈德：《波兰问题，普鲁士波兰人的国籍斗争》，慕尼黑—莱比锡，1920年版。

Binchy D. Church and state in fascist Italy. London, 1941.

宾奇：《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与教会》，伦敦，1941年版。

Bornhak C. Deutsche Geschichte unter Kaiser Wilhelm Ⅱ. Leipzig, 1922.

伯恩哈克：《威廉二世皇帝时期的德国历史》，莱比锡，1922年版。

Brand F.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 St. Louis, 1927.

布兰德：《外国传教士团在中国》，圣路易，1927年版。

Browne H.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Knights of labor. Washington, 1949.

布朗：《天主教会与劳动骑士团》，华盛顿，1949年版。

Charvet P. France. London, 1954.

查维特：《法兰西》，伦敦，1954年版。

Colliander B.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Litauen und Deutschland während der Okkupation 1915—1918. Abo, 1935.

科利安杰：《1915—1918年占领期间立陶宛与德国之关系》，阿博，1935年版。

Cronin B. Father York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San-Francisko 1900—1910. Washington, 1943.

克罗宁：《约克神甫与1900—1910年旧金山劳工运动》，华盛顿，1943年版。

Curtis E. History of Ireland. London, 1950.

柯蒂斯：《爱尔兰史》，伦敦，1950年版。

Devaranne Th. Die gegenwärtig Geisteskampf um Ostasien. Gotha, 1928.

德瓦兰：《当代争夺东亚的精神斗争》，哥达，1928年版。

Dulles Foster Rhea.

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Princeton, New Jersey, 1946.

福斯特·雷亚·杜勒斯:《中国与美国》(1784年以来两国关系史),普林斯顿,1946年版。

Eckhardt C. The papacy and world affairs. Chicago-Illinois, 1937.

埃克哈特:《教皇与世界大事》,伊利诺斯州,芝加哥,1937年版。

Egelhaaf G. Geschichte der neusten Zeit. Vom Frankfurter Frieden bis zur Gegenwart, Bd. I. Stuttgart, 1924.

埃格哈夫:《现代史》(从福兰克福和约至今),第1卷,斯图加特,1924年版。

Einaudi M., Goguel F. Christian democracy in Italy and France. Notre Dame, Indiana, 1952.

伊诺第和戈格尔:《意大利与法国的基督教民主》,印第安纳州诺特勒达姆,1952年版。

Evans J. The british in tropical Africa. Cambrige, 1929.

伊万斯:《英国人在热带非洲》,剑桥,1929年版。

Feine H. Kirchliche Rechtsgeschichte, Bd. 1. Die Katholische Kirche. Weimar, 1950.

费奈:《教会法规史》,第1卷(天主教会),魏玛,1950年版。

50 Jahre Christlich-sozial. Berlin.

《基督教社会党五十年》,柏林。

Fishel W.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Los Angelos, 1952.

费舍尔:《治外法权在中国的终结》,洛杉矶,1952年版。

Fogarty M. Christian democracy in Western Europe, 1820—1953. London, 1957.

福格蒂:《西欧的基督教民主,1820—1953年》,伦敦,1957年版。

Fraser P. The new Africa. London, 1927.

弗雷泽:《新非洲》,伦敦,1927年版。

Friedjund H. Das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1884—1914. Bd. 1. Berlin, 1919.

弗里德云格:《帝国主义时代》(1884—1914年),第1卷,柏林,1919年版。

Fuchs A. Geistige Strömungen in österreich 1867—1918. Wien, 1949.

富赫斯:《1867—1898年的奥地利思潮》,维也纳,1949年版。

Fugger K.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Berlin, 1949.

富格:《德国工会运动史》,柏林,1949年版。

Garaudy R. L'Eglise, le Communisme et les Chrétiens. Paris, 1949.

加罗迪:《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徒》,巴黎,1949年版。

Gathrein V. Socialismus und Katho lizismus. Paderborn, 1929.

哈特莱因:《社会主义与天主教》,帕德博恩,1929年版。

Gatzke H. German's drive to the West (Drang hach Westen). Baltimore, 1950.

加特茨克:《德国的西进》,博尔提莫尔,1950年版。

Gilman N. Socialism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Boston—New York, 1893.

吉尔曼:《社会主义与美国精神》,波士顿—纽约,1893年版。

Gooch G.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879—1919. London, 1924.

古奇:《近代欧洲史(1879—1919)》,伦敦,1924年版。

Gualtieri H. The labour movement in Italy. New York, 1946.

古阿季叶里:《意大利的工人运动》,纽约,1946年版。

Gwynn P. The Vatican and war in Europe. London,

1940.

格温:《梵蒂冈与欧战》,伦敦, 1940 年版。

Halecki O. Eugenio Pacelli. Pope of peace. New York, 1951.

哈列斯基:《厄日尼奥・帕切利 和平教皇》,纽约, 1951 年版。

Hantsch H. Die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Bd. Ⅱ. Graz—Wien—Köln, 1953.

汉施:《奥地利史》,第 2 卷,格拉茨—维也纳—科隆, 1953 年版。

Hanus F. Die preussische Vatikangesandschaft 1747—1920. München, 1954.

哈纳斯:《普鲁士驻梵蒂冈使馆, 1747—1920 年》,慕尼黑, 1954 年版。

Hartung Fr. Deutsche Geschichte 1871—1919. Leipzig, 1948.

哈通:《德国史(1871-1919 年)》,莱比锡, 1948 年版。

Haynes G. Africa continent of the future. Kobenhavn, 1950.

海恩斯:《非洲—未来的大陆》,哥本哈根, 1950 年版。

Haynes T. Soci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New York, 1924.

海恩斯:《美国的社会政策》,波士顿—纽约, 1924 年。

Hill M. Permanent Way. The story of the Kenya and Uganda railway. Nairobi (Kenya), 1949.

希尔:《轨道》(肯尼亚—乌干达铁路史),内罗毕(肯尼亚),1949 年版。

Hirsch F. Der Taxil—Schwindel, oder Roms grószte Blamage. Wien, [1928].

希尔施:《塔克西尔的骗局》(或罗马的最大丑闻),维也纳, [1928 年]。

Hoernigk R. Italien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m Dreibund. Halle, 1931.

豪耶尔尼克:《意大利在法国与三国同盟之间》,哈雷, 1931 年版。

Hudal A. Die österreichische Vatikanbotschaft 1806—1918. München, 1952.

胡达利:《奥地利驻梵蒂冈使馆, 1808—1918》,慕尼黑, 1952年版。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churches. The Annu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hilaolelphia, N 192, 1922.

《工业关系与教会》,载《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鉴》,1922年第192期, 费城。

Italicus. Italiens Dreibundpolitik (1870—1896). München, 1928.

伊塔利库斯:《意大利的三国同盟政策(1870—1896)》,慕尼黑, 1928年。

Johnston H. A history of the colonis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 Cambridge, 1930.

约翰斯顿:《异族殖民非洲史》,剑桥, 1930年版。

Johnston H. The papacy and the Kingdom of Italy. London, 1926.

约翰斯顿:《罗马教皇与意大利王国》,伦敦, 1926年版。

Johnson H. Vatican diplomacy in the world war. Oxford, 1933.

约翰逊:《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外交》, 牛津, 1933年版。

Just M. Rome and Russid. Westminster—Maryland, 1954.

贾斯特:《罗马和俄国》, 威斯特敏斯特—马里兰, 1954年版。

Keeton G. China, the Far East and the future. London, 1949.

基顿:《中国、远东和未来》, 伦敦, 1949年版。

Kent P.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Far East. London, 1937.

肯特:《二十世纪在远东》, 伦敦, 1937年版。

Lama Fr. Papst und

Kurie in ihrer Politik nach dem Weltkriege. Illertissen (Bayern), 1925—1926.

拉马：《罗马教皇和教廷对世界大战的政策》，伊莱尔蒂森，1925—1926年版。

Lama Fr. Der vereitelte Friede. Augsburg, 1926.

拉马：《被撕毁了的和平》，奥格斯堡，1926年版。

Langer W. The a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New York, 1951.

兰格尔：《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纽约，1951年版。

Langer W. The Franco-russian alliance 1890—1894. Camridge, Mass., USA, 1929.

兰格尔：《1890—1894年的法俄同盟》，美国马萨诸塞洲坎布里奇市，1929年版。

Latané J. America as a world power (1897—1907). New York, 1907.

拉塔涅：《世界强国—美国(1897—1907年)》，纽约，1907年版。

Latourette K.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New York, 1946.

拉图列特：《中国的发展》，纽约，1946年版。

Latourette K.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拉图列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伦敦，1929年版。

Laubert M. Die preussische Polenpolitik von 1772—1914. Krakau, 1944.

劳伯特：《1772—1914年普鲁士对波兰的政策》，克拉克夫，1944年版。

Light and darkness in East Africa (A missiouary survey of Ugandd, Anglo-Egyptian Sudan, Hbyssinia, Eritrea and the three Somalilands). London, 1927.

《东非的光明与黑暗》(对乌干达、英-埃属苏丹、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和三个索马里的传教调查)，伦敦，1927年版。

Lugmayer K. Leos Iö-

sung der Arbeiterfrage. Wien, 1927.

鲁格迈耶：«利奥关于工人问题的口号»，维也纳，1927年版。

MacNair H. Modern Chiness history. Shanghai, 1923.

麦克奈尔：«中国近代史»，上海，1923年版。

Maynard Th. The story of american catholicism. New York, 1943.

梅纳德：«美国天主教史»，纽约，1943年版。

McGloskey R. American conservatism in the age of enterprise. Cambridg—Massachusetts, 1951.

麦克格洛斯基：«创业年代的美国保守主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1951年版。

Meyer M. Die Weltanschauung des Zentrums in ihren Grundinien. München—Leipzig, 1919.

梅耶：«中央党的世界观在基本路线中的反映»，慕尼黑—莱比锡，1919年版。

Mommsen W. Deutsche Parteiprogramme. München, 1952.

蒙森：«德国党纲»，慕尼黑，1952年版。

Moon P.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47.

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纽约，1947年版。

Moos M. Don Luigi Sturzo—christian democr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ril, 1945.

穆斯：«堂・路易希・斯图尔佐—基督教民主派»，载«美国政治学评论»，1945年4月号。

Morel E. The black man's burden. London, 1920.

莫雷尔：«黑人的重担»，伦敦，1920年版。

Morse H., MacNair H.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New York, 1931.

莫尔斯和麦克涅尔:《远东国际关系》,波士顿—纽约,1931年版。

Moyes J. The pope and the german atrociti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London, Oktober, 1915.

莫伊斯:《教皇与德国人的暴行》,载《十九世纪以来》,1915年10月号,伦敦。

Munby L. Religious reaction in the epoch of imperrialism. «The Modern Qudrterly», N 4, London, 1950.

芒比:《帝国主义时代宗教的反动》,载《现代季刊》,1950年第4期,伦敦。

Murphy J. An andlysis of the attitudes of american catholics toward the immigrant and the negro, 1825—1925. Washington, 1940.

墨菲:《1825—1925年,美国天主教对移民和黑人的态度之剖析》,华盛顿,1940年版。

Nowicki A. Watykanski bank Pacellich. Warszawa, 1952.

诺维茨基:《梵蒂冈的帕切利银行》,华沙,1952年版。

Padmore G. How Britain rules Africa, London, 1936.

帕德莫尔:《英帝国如何统治非洲》,伦敦,1936年版。

Parr J. Théophil Delcassé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Franco-Russian Alliance 1898—1905. Fribourg, Switzerland, 1951.

帕尔:《泰奥菲尔·德尔卡塞与1898—1905年法俄同盟的活动》,弗里堡(瑞士),1951年版。

Phillips C. The chuch in France 1848—1925. New York, 1936.

菲利浦斯:《1848—1925年的法国教会》,纽约,1936年版。

Ramus P. Francisco Ferrer.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Nürnberg, 1929.

拉穆斯:《弗兰西斯科·费勒尔》(生活与工作),纽伦堡,1929年版。

Ranke L. Bilder aus de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München, 1914.

兰克:《罗马教廷史画册》,慕尼黑,1914年版。

Paphael L. The Cupe-to-Cairo dream. New York, 1936.

拉斐尔:《好望角到开罗之梦》,纽约,1936年版。

Richter J. Pas Werd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 in China. Gütersloh, 1928.

里希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出现》,居特斯洛,1928年版。

Salomone A. Italian democracy in the making. Philadelphia, 1945.

萨洛蒙:《正在形成的意大利民主》,费城,1945年版。

Schilling O. Die Staats und Sociallehre des Papstes Leo XIII. Köln, 1925.

席林:《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国家与社会学说》,科隆,1925年版。

Schlesinger A.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 1864—1951. New York, 1954.

施莱辛格:《现代美国的兴起(1861—1951年)》,纽约,1954年版。

Schmidlin J. Papstgeschichte der neusten Zeit, Bd. Ⅱ—Ⅲ. München, 1934—1936.

施米德林:《教廷现代史》,第2、3卷,慕尼黑,1934—1936年版。

Schreiner A.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1871—1945. Bd. I. Bern, 1952.

施莱纳:《德国对外政策的历史问题(1871—1945年)》,第1卷,伯尔尼,1952年版。

Sears L. 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1927.

西尔斯:《美国对外关系史》,纽约,1927年版。

Soderini Ed. Leo XIII

und der deutsche Kulturkampf. Innsbruck—Wien—München, 1935.

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与德国的'文化斗争'》,因斯布鲁克—维也纳—慕尼黑,1935年版。

Soderini Ed. The pontificate of Leo XIII. V. I. London, 1934.

索德里尼:《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第1卷,伦敦,1934年版。

Somervell D. English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0.

索莫魏尔:《十九世纪英国思潮》,伦敦,1950年版。

Sturzo L. Ital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1944.

斯图尔佐:《意大利和新的世界秩序》,伦敦,1944年版。

Teifen T. Die christlich socialen und ihr Programm. Wien.

泰芬:《基督教社会党及其纲领》,维也纳。

Thälmann E. Das Zentrum, die führende Partei der deutschen Bourgeoisie. «Die Internationale», Berlin, 1923, Nr. 1.

台尔曼:《德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党—中央党》,载《国际》,1923年第1期,柏林。

Van Alstyne R. American diplomacy in ac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1947.

范阿尔斯廷:《美国外交在行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德,1947年版。

Veldt J. Van der. The city set on a hill. The story of the Vatican. New York, 1946.

范德维尔德:《建立在高地上的一座城市》(梵蒂冈史),纽约,1946年版。

Vider A. Prophecy and papacy. London, 1954.

魏德勒:《预言与教皇统治》,伦敦,1954年版。

Wahrmund L. Katholische Weltanschauung und freie Wissenschaft. München,

1908.

瓦尔蒙德:《天主教世界观与自由科学》,慕尼黑,1908年版。

Walferbach O. Leo XIII und die Arbeiterfrage.München, 1831.

瓦尔特巴赫:《利奥十三世与劳工问题》,慕尼黑,1931年版。

Wendel H. Aus dem südslawischen Resorgimento. Gotha, 1921.

文德尔:《源于南斯拉夫的Resorgimento》, 皋塔, 1921年版。

Wendel H. Die Habsburger und die Südslawenfrage. Belgrad——Leipzig, 1924.

文德尔:《哈布斯堡王朝与南斯拉夫问题》,贝尔格莱德—柏林,1924年版。

Winiewicz J. Have we allies inside Germany? London, 1914.

威尼威克茨:《在德国国内我们有无盟友?》,伦敦,1914年版。

Winter E. Russland und die slawischen Wölker in der Piplomdtic des Vatikans 1870—1903. Berlin, 1905.

温特:《梵蒂冈外交中的俄国与斯拉夫民族,1870—1903年》,柏林,1905年版。

Wolf G. Des elsässische Problem. Grundzüge einer elsässischen Politik in Zeitalter des Pakts von Locarno. Strasbourg, 1926.

沃尔夫:《亚尔萨斯问题》(洛迦诺条约时代亚尔萨斯政策的要点),斯特拉斯堡,1926年版。

Wolferstan B.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1860 to 1907. London, 1909.

沃尔费尔斯坦:《中国的天主教会,1860—1907年》,伦敦,1909年版。

Woodworth A. Christian socialism in England. London, 1903.

伍德沃思:《英国的基督教

社会主义》，伦敦，1903年版。

Zach L. 50 Jahre Zentrum. Wirtschafts und Socialpolitik im Reichstag (1871—1927). Berlin, 1921.

礤赫：《中央党五十年》(在国会的经济社会政策，1871—1927年)，柏林，1921年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梵蒂冈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时期）
作者＝（苏联）Ｍ．Ｍ．舍英曼
页数＝８８３
ＳＳ号＝１０１７４１８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１版